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上册

〔美〕汤普逊著



97592

K13

1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300—13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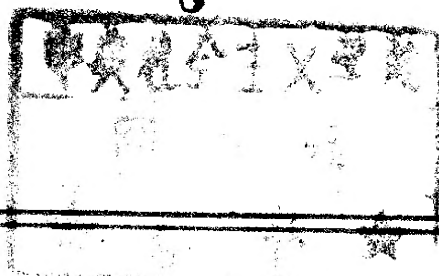
上册

[美] 汤普逊 著

耿淡如 译



200305927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中譯本序言

湯普遜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史》是一本在資產階級史學界流行較廣的書。它和另外兩種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寫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史(即:比利時歷史家庇倫所著的《歐洲中古經濟社會史》和奧地利學者道普什所寫的《歐洲文化的經濟社會基礎》)比較起來,在內容方面有顯著的不同。庇倫對於中世紀城市起源問題,道普什對於中世紀初期德意志的經濟發展問題都有自成一家的論點。他們的這些唯心史觀的論點,在資產階級史學界中有很大的影響。蘇聯學者對於他們的錯誤觀點曾予以有力的駁斥。湯普遜對於以上兩種著作也不同意,但是他所不同意的只是他們處理問題的某些方法,而不是他們的立場觀點(他和他們是站在同一立場,而且還吸取了他們的一部分主張)。湯普遜自稱他所用的方法是“歷史論述法”,寓觀點於敘述之中,而反對作出系統的解釋,提出鮮明的論點(見本書“序言”)。比如,關於羅馬帝國滅亡這個重大問題,他既不同意以前歷史家的各種解釋,也沒有專門論述自己的見解,而只是敘述了羅馬帝國瓦解的過程。他在另外一本著作《歐洲中世紀史導論》中,說出他採取這種作法的原因。他寫道:“[對於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歷史家坦白地承認他不知道。他有時能夠確定事實,有時甚至能看出症結所在,但是至於分析到歷史事件的為什麼,他是無能為力的。”(原書第25頁)。因此,湯普遜這部書的特點,從表面看來,似乎只提供了比較豐富的历史事實,而沒有提出什麼論點。但是,湯普遜和庇倫、道普什一樣,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運用唯心主義方法來編寫歷史的,只是他的論點不象其他二人那樣明顯而已。至於對舊中國史學界的影響,湯普遜就比其他

二人大得多。他所編的教本《西洋中古史》，解放前曾有中文譯本（陳受頤、梁茂修譯，1940年，長沙，商務印書館版）。不少在美國曾聽過他講課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後在各大學任教，傳播他的觀點。他們所散布的影響，至今尚未完全清除。目前我國學術界正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中文譯本就可以作為批判對象之一，幫助我們了解在世界中世紀史這門學科中正在進行着的無產階級歷史學和資產階級歷史學的鬥爭；幫助我們識別哪些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觀點，哪些是資產階級的錯誤觀點，從而運用自己所掌握的历史唯物主義這個思想武器，來對這本資產階級歷史著作進行批判，從戰鬥中來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來清除現今還存在着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影響。

下邊對本書作者的經歷作一簡單介紹，對於他的基本論點也提出一些初步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湯普遜（1869—1942）是美國比較著名的現代資產階級中世紀史專家之一。他生於美國中部的艾奧華州，1892年畢業於羅特學院，1895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畢業以後一直到1932年在該校擔任中世紀史的教學工作，晚年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任教。1942年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國宗教戰爭》（1909），《德意志封建制度》（1928），《中世紀經濟社會史》（1929），《中世紀晚期經濟社會史》（1931），《西洋中古史》（1933），《中世紀史》（二冊，1932），《歐洲中世紀史導論》（1937），《史學史》（二冊，1942）等書。通過這些著作和長期的教學活動，他在美國中世紀史學界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湯普遜研究歷史的路綫和他在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的幾個同事一樣（如擔任古代史的布萊斯提德，教近代史的施維爾和教美國史的惹內干等），都是屬於所謂“新史學派”的。這個學派對歷史

研究的基本主張是把历史学的范围从傳統狹窄的政治軍事史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在資產階級历史学界中，这种主張是始于十九世紀末德国历史家兰普萊特(1856—1915)所提倡的“新史学”运动。經魯濱孙(1863—1936)介紹到美国，而又加以重大的改变。兰普萊特以孔德的实証主义为主导思想，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他称之为“精神生活”)分为六个阶段，而企图发现它的規律。魯濱孙則以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为主导思想，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是有規律性的，并且反对把历史分成若干发展阶段，不主張以某种学說来解釋历史。而提倡“用历史来解釋历史”，“为历史而历史”。湯普逊正是属于这一派的。尽管他在本书中也搜集了若干社会經濟史料，也讲了一些經濟发展和階級斗争的历史事实，但是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經濟社会史与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觀是背道而馳的。

湯普逊在本书的“序言”中声明，他反对把中世紀史看成是由神学思想支配的“宗教时期”这一陈腐观点。他认为当时的天主教会拥有龐大的物质利益，絕不是一个單純的精神机构。他并且声称：“这本书的宗旨就在于叙述中世紀这些經濟社会利益和活动的历史。”从这篇“序言”和全书的内容看来，湯普逊是承认社会經濟的变革对历史发展是有影响的，而且也提供了一些史料。但是作者承认这一些，絕不等于作者就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上面已經提到，湯普逊这派人根本否认历史发展是有規律性的，而是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发生过程，他所強調的“社会經濟利益和活动”，也不过是一堆偶然事件中一部分历史現象而已。

再就本书的年代断限而論。湯普逊在本书中是把公元三百年至一千五百年間看作是中世紀时代的。为什么公元三百年是中世紀的开始，他在本书中并未交代。从他的叙述中也看不出公元三百年前和三百年后，究竟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在湯普逊的另外一

部著作《欧洲中世紀史导論》中(1937年,紐約,英文版,这是湯普逊所著的中世紀史最后的修訂本)指出了他这样分期的理由。他写道:“到了三世紀末,所有促成羅馬文化瓦解的神秘原因都开始出現了。……从某种意义上來說,羅馬帝国在它存在的前三个世紀中已經走完了一个循环;現在就需要另外一个救世主,另外一个奥古斯都,来挽救它的命运。”(原书第9頁)。这个新的“救世主”既然沒有出現,龐大的羅馬帝国終於瓦解了。他在这书另外一个地方又把公元四百年至八百年时期看成是中世紀的形成时期。(原书第2頁)。

可見他把公元三百年左右(按羅馬皇帝戴克里先去位于公元305年)作为中世紀的开端,主要是按政治上的表面現象,而不是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划分的。他虽然对羅馬帝国灭亡的原因沒有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那就是把羅馬帝国的兴盛和衰亡,都归結于个人的作用。足見他虽然标榜要以“經济社会利益和活动”来叙述中世紀史,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帝王将相,而不是人民群众。足見象湯普逊这样的資产階級历史家口头上提倡“用历史来解釋历史”,“为历史而历史”,儼然只有这一派的历史觀是最客觀的,实际上他們的資产階級立場,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就包含在他們貌似客觀的叙述之中了。順便說一下,有人被他們这种資产階級客觀主义所迷惑,也跟着說什么历史学就是研究史料,历史学就是要以史料挂帅,而据此反对以馬克思主义理論挂帅。殊不知資产階級客觀主义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們正是用自己的“理論”挂帅的。我們主張論和史結合,必須充分地占有史料,仔細的研究史料,但是理論总是統帅。而且只有掌握馬克思主义理論,才能正确地处理史料。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按照社会发展阶段作为历

史分期的标准的。中世紀是封建主义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国家占統治地位的时期。湯普逊在本书中虽然也談到封建主义，并且认为封建主义具有它的社会、經濟特征，但是他和其他的資產階級历史家一样，只是把封建制度看成是一种政治組織形式（見本书第九章），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根据这个定义，他认为西欧的封建制度是从九世紀初法兰克帝国瓦解后开始的。但是作者又认为羅馬帝国自四世紀以来农奴制已經占了上风。那么自四世紀到九世紀之間，这个漫长的时期，究竟是什么社会性质呢？由此可見，尽管作者也用了不少篇幅論述封建制度（第九章、第二十六章），但是由于他对封建制度的概念是錯誤的，因此他的那些論述也是似是而非的。

湯普逊在本书中也經常提到階級矛盾，但是同样由于概念的混乱，作者对于各个时代階級斗争的性质是沒有正确認識的。他把羅馬帝国末年的奴隶、隶农起义和中世紀的农奴反抗运动混为一談。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对于階級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一无所知，因此他在本书中虽然也提到一些人民起义，而对它們的影响却未能清楚地看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和其他資產階級历史家一样，对于重大的历史問題就得出正确的解答。比如对于羅馬帝国灭亡的問題，上面已經提到，他一方面以不可知論的态度，认为“历史家只能坦白地承认不知道”，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他在論述中，实际上是归結于个人作用的。而对于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馬克思主义才能作出科学的論断，那就是如《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所說：“奴隶主并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統治，它的統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綿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紅旗》，1960年第8期，第18頁）。

本书名为《中世紀經濟社会史》，顧名思义，本书內容應該包括中世紀各主要国家的經濟社会史，但是湯普逊在本书中只敘述了

西欧几个大国，而对于东欧方面只叙述了拜占廷帝国，其余国家則未涉及。这又是資產階級学者另外一个荒謬的看法。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学者对于中世紀史的处理，大致仍是沿用十八世紀末英国历史家吉朋在《羅馬帝国衰亡史》中所搭起的架子。但是，吉朋处在資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当时理智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大胆揭露教会的愚昧、反动（該书第十五、十六章），在当时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而且吉朋的主题是叙述羅馬帝国衰亡的历史，因此对于东欧他只讲到拜占廷帝国的历史，这还是可以理解的。現代資產階級历史家如湯普逊等，在叙述欧洲中世紀的历史时，对于东欧，除拜占廷帝国外，其他一概不讲，这就使人很难理解了。在中世紀时期，东欧方面的俄罗斯、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塞爾維亞等国的生产水平，文化成就，絕不比西欧英、法、德、意等国低。而作者却把东欧各国看成是在欧洲历史上无足輕重的，认为只有西欧各大国才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这种极端錯誤的反动观点是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制造理論根据的。

湯普逊在本书中所体现的資產階級傳統历史学，和資產階級其他学者的历史观点，在我們看来都是一丘之貉。但是在他們之間，还是有爭吵的。有一批更露骨的反动历史学者就反对湯普逊这一派的史学观点，他們认为傳統历史学所采用的考証方法和比較隱蔽的态度，未免过于繁瑣迂腐，而主張公开地任意捏造历史，創立“体系”，以为垄断資本效劳，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辯护。如美国的哥拉斯，以前也曾写过几种关于經濟史的著作。但是在他后来所写的《資本主义与企业史》一书中，竟把資本主义說成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即已存在的永恒制度，把垄断資本家歌頌为历史的主人。又如英国的历史家湯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竟把西方以外的国家都說成是处在瓦解过程中的社会，并且无耻地宣称美帝国主义要統一全世界是一种不可遏阻的趋势，以为美帝国主

义妄想霸占全世界的企图制造理論根据。

湯普逊这本书是第一次大战后的产物。他还是运用了西方資產階級历史学的傳統方法，进行編写的。我們对于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唯心主义的錯誤論点，應該加以批判。同时，也應該注意到，本书还搜集了不少資料。把他的整个体系加以批判，对于书中的資料，經過审查之后，剔除其中不可靠的部分，对于其中可靠的部分，还是可以加以参考利用的。

齐思和

1961年6月

前 言

本書是一部从經濟社会史觀角度所編写的中世紀史。它既不是一篇經濟学的專題論文，也不是一部社会学的研究著作。我在全書中力图避免前一类著作中常有的空論，以及后一类作品中总括性的論断。我所用的方法，是一种历史的論述法，往往敘述即是論点的表达。为了本書不致过分冗长，我故意省略了中世紀英国的一部分，除非当时英国的事情有涉及欧陆的地方。因为英文中已有很多关于英国的著作，這項省略似乎是有理由的。

今天流行的一种“新中世紀主义”和百年前浪漫主义运动时期中所崇尚的“中世紀主义”迥然不同。由于經濟社会史觀的发展，我們已可看出：很多过去的历史曾被估价过低甚至估价錯誤。中世紀有时被称为“宗教时代”，因为在那些时代里教会拥有莫大勢力而神学思想又长期占着上风。但是在中世紀欧洲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所关心的，是求得生活資料，而他們的統治者所注意的，是从农业和工商业所产生的資財方面征取賦稅。当时，教会也享有很大的物質利益，远不是一个單純的精神机构。本書的宗旨，就在于敘述中世紀这些經濟社会的利益和活动的历史。

按内容和形式說，本書是从实际課堂教学所产生的。真的，我在这里所提供的很多材料，是在“課堂討論”中同我的學生們一起整理出来的。这样获得的知識和經驗，我想会有助于别的教师以及我的班級以外的班級。由于本書所屬丛書〔指《世紀历史丛書》——譯者〕的体例的限制，我未能广泛地引証参考資料；为了稍稍弥补這項缺点，書末附有参考書目。但是，还应指出，本書的編写是依靠广泛閱覽第一手資料，而非仅仅依靠第二手的权威作品，不

論后者怎样重要。

本書所附地图,有些是由作者自己繪制,用以解釋在現成地图册內找不到合适地图來說明的那些課文部分。繪制这些地图的用意,不是要使学生不用历史地图册,而是作为对这种地图册的补充。最合乎学生使用的,是威廉·R.錫倍德教授所編制的《历史地图册》(紐約亨利·霍尔特公司出版)。它最近已有新版本。为了学生方便起見,若干章的开端附有脚註,指出应参考的适当地图。如欲作更充分的研究,《牛津历史地图册》(R. 兰-蒲尔主編)以及《劍橋中世紀史》(現已出版五卷)各卷所附地图可資查考。还应指出,巴門梯尔的《历史画册》第一卷(巴黎阿蒙·科林公司出版,1900年)包括有中世紀生活的——关于农业、工业、商业、服装和风尙的出色插图。为了課堂內应用的目的,作者繪制了一幅大型挂图,由伊利諾斯州芝加哥城尼斯特洛姆公司出版(編号:M. M. 4, 或 E. E. 15)。

我的妻子曾帮助我閱讀校样,罗宾絲小姐曾帮助我編制索引,在此致謝。

詹姆斯·韋斯福耳·湯普逊

芝加哥大学

目 錄

著者前言	3
第一章 羅馬帝国的盛衰	1
第二章 羅馬帝国和早期中世紀的教会	69
第三章 蛮族世界和大移动	108
第四章 羅馬帝国内的日耳曼王国 西哥特的西班牙、 汪达尔的非洲、东哥特和倫巴的意大利、教廷的羅馬和 拜占廷的意大利	137
第五章 寺院制度的兴起和傳佈	173
第六章 东羅馬帝国(395—802年)查士丁尼(527— 565年)	195
第七章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231
第八章 墨洛温朝、喀罗林朝的法兰克高盧和日耳曼， 查理曼(768—814年)	251
第九章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814—912年)	302
第十章 北欧人的扩展和殖民	343
第十一章 薩克遜和薩利安德意志(919—1125年)	358
第十二章 十字軍前的法国(877—1095年)	381
第十三章 十字軍前的意大利(887—1095年)	397
第十四章 十字軍前东羅馬帝国(802—1096年)	420
第十五章 巴格达哈里发国家和伊斯兰教的擴張	441
第十六章 十字軍(1095—1291年)	472
附录 譯名对照表	541

地圖目次

伊斯兰教的扩展.....	231前
公元 800 年左右的欧洲.....	251前
公元1000年左右的欧洲和拜占廷帝国.....	359前
公元1200年左右的欧洲	421前
十三世紀橫貫亚洲大陆的大商路	441前
东非沿海和中非洲阿拉伯貿易的发展.....	462
多瑙河中游地区(奥地利和匈牙利)到君士坦丁堡的貿易 和朝聖通路.....	475
威尼斯帝国.....	517

第一章 羅馬帝国的盛衰*

我們應該略知羅馬帝国的經濟社会結構作为一个背景，因为羅馬帝国不单单是中世紀的历史背景，而且羅馬文明的殘余大多滲入中世紀文明的成分里。羅馬創造了十分广大而又深厚的一种文明，因此羅馬国家虽然一去不复返了，羅馬法、拉丁語、拉丁文学以及好多别的羅馬文明却能保持下去，对世界发生影响。我們必須注意，不要認為羅馬只是一个穷兵黷武的軍事帝国，也不要認為羅馬文明的扩展是單純軍权的結果和單純軍权的淫威。羅馬帝国却是个从事建設工程的帝国。

羅馬的广大公路系統在羅馬帝国的商业发展上起着很大作用，可是海路的重要性也不次于陆路。地中海是羅馬扩展中的不应忽視的地理因素。这个几乎风平浪靜的海面把南欧、非洲和亚洲联系起来。欧洲海岸尤多港口。非洲和叙利亚海岸虽沒有这样良好的供应，可是有一群大小島屿在气候恶劣时期可供船只躲避之所，而且在貿易上也是經常有利的停泊港口。

从尼奥波利斯到亚历山大港需时十二天，从科林斯需时七天。从南高盧的那巴到非洲的航程，如遇到順风，仅需五天；从塞提斯到亚历山大港則需六天。从以弗所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的陆路行程当然須花費一个月的時間。在帝国的初期，在各海面上都有羅馬船舶往来航行。霍勒斯常提及大海上的漂泊商人；普林尼認為羅馬的海上貿易是它的最重要的商业。皇帝克劳第烏斯对羅馬的海上運輸的貿易和造船事业深感兴趣。尼祿和图拉真曾改进奥斯替

* 地图：錫倍德(Shepherd):《历史地图册》，第38—39頁。

亚、安提阿姆、奇維塔-維奇亚、安科納諸港口；安敦·庇护曾修理特拉西那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奧利港口加以改进。在那里，太尔人有着一个“商站”，好多儲棧、店鋪和办事处，象在十字軍时期意大利商业公司在利凡得所設的商埠那样。

現在我們还可看到有些流傳下来的关于第三和第四世紀船夫行会的重要文献；当时这些团体在帝国的大部沿海城市中都可找到。它們主要被僱傭于运入粮食，它們的經營和資本雄厚的商社相勾結着，而那些被禁止經商的羅馬元老往往是这些公司的匿名股东。大伽图就是投資于这类企业的一个人。虽有风浪的危險——而在帝国成立之前还有海盜的危險——又沒有保險制度，但是这类营业可获得很大的利潤。当时，所用的船舶有很多类型，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运云石的船只和运粮快船。在羅馬，沿台伯河畔，在阿文丁山脚下排列着一长行用扶梯伸入河中的碼頭，在那里有大儲棧、倉庫、貯藏室、武器庫，来保藏所有从已知的世界各地运来的商品。羅馬本土也有許多市場。公元前 184 年伽图曾建造第一所商品陈列所——商場——于公所^①內，从那时起公所逐漸变为象紐約的百老汇^②了。某些街衢专做某些商业，在羅馬城內也有为經營各种工业和工艺而設立的地段。商品和样子間的陈列，当占用人行道的时候，毕竟成为一种討厭的东西，所以多米蒂安加以禁止了。

在政府控制下的，甚至由政府专利的粮食貿易，是一种巨大而有厚利可图的事业。麦子从撒地尼亚、西西里、西班牙、非洲、尤其是从埃及輸入，埃及每年供給二千万摩底^③麦子。琉息安所描写的一只埃及运粮船“爱色斯”号有一百八十呎长，四十五呎闊，有三重

① 公所在羅馬城市的中央，用作大会場。——譯者

② 是商业中心街。——譯者

③ Modius 是羅馬的干量名，約合英国的两加倫。——譯者

甲板，載重一千五百七十五噸。每次所載的貨物平均約值一萬五千元。當時有整個運糧船隊，即亞歷山大船隊或亞歷山大商船分隊，它的船隻定期開到馬爾他、里吉安和西西里各碼頭。當運糧船到達鮑索里的时候，這消息馬上傳達到羅馬城。除亞歷山大船隊之外，從科馬杜斯（公元180—193年）時代起，另有非洲運糧船隊、西班牙運糧船隊和撒地尼亞運糧船隊。所有這些運糧船只是由那些和政府簽訂合同的公司來管理的。我們知道一些有關這類合同的條件。在第四世紀亞歷山大船隻可得4%的利潤，從非洲來的船隻可得1%。可是實際上那利潤是超過這一項數字的，因為政府供給造船木料而公司成員享有某種特權和免稅權。因此，他們終于失掉獨立性質而變成爲服務公家的工具了。

羅馬帝國的內河和沿海貿易雖不若海上貿易的重要，可是也很活躍。在帝國的早期，奧斯替亞港已淤塞，以致重載船舶不能越過沙灘進入。因而，在鮑索里用駁船來運送船貨；那時鮑索里已變爲羅馬城的最重要港口。後來，克勞第烏斯開始在奧斯替亞建築一個新港，後由圖拉真完成。這港口叫做“港口”、“烏爾比斯港”、“奧古斯提港”。此後奧斯替亞舊港逐漸沉入沙泥中去。奧斯替亞港和後來的“港口”都先後充滿着卸貨工人、秤手、計度員、挑夫、搬運夫、船匠、小販、封印員、公証人，等等，另加上各色各樣的商人，並有一個船夫行會叫做“科狄卡里”，壟斷着台伯河上運輸業。

羅馬帝國內所有沿海和沿河城市，在商業上，是依照上述形式組織的。在里昂，船夫組織了一個著名的團體。它的成員在尼姆的圓形劇場里享有四排坐位的權利，而且君士坦丁曾賜給他們武士的等級。在里昂還有兩個控制羅尼河水上交通的團體，另有一個在梭恩河上。在各條可航行的河道上，也許都有類似的組織。據我們所知，高盧的都蘭斯河和塞納河、西班牙的埃布羅河和瓜达尔

几維河、意大利的阿特里亚和佩斯奇亚拉、加达尔湖畔的里瓦、科摩湖、日内瓦湖、莱茵河以及卡尔斯堡的摩洛斯河畔的达謝，都有这种团体的存在。

所以，总括起来，那整个地中海区的統一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旧时的混乱情况逐步退减，而在帝国成立之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經濟供求規律而自行調整的趨勢，不再被政府的人为措施弄得混乱了。那些生产商品的地方，由于交換的方式，获得了由它們的自然的和制造的財富帶給它們的重要地位。毫無疑問，那些富人穷奢极欲的风气也人为地刺激了某种商品的生产。現在，即使我們沒有統計資料，尽管有这些不很均衡的状态，但我們可妥当地說，跟着帝国的成立，一种类似經濟上的平衡力量占着上风，这力量并在第一和第二世紀中繼續保持下去，这种情况使我們了解为什么在安敦时代結束以前羅馬世界能享有那一般所承認的普遍繁荣。

公共建設不仅在羅馬城內，而且也可以在各省的許多城市里看到；这些城市的遺跡迄今还有存在，可作为这种物質繁荣的有力証据。尼尔华和图拉真所設立的慈善院，由后任皇帝繼續維持到第三世紀。至少在意大利，各城市必須登記生死事件，又在第三世紀，法律家阿尔匹安設計了一种死亡率表格。

在公元 200 年左右黄金时代已在衰落的时候，甚至基督教作家，如爱里尼阿斯和特图良一派人的写作，还証实了这个时代的繁荣景象。从特图良的笔下，我們可看到下面一段頌揚文字：

的确，只要放眼看一看世界，就可知道土地耕种日多，人丁日益兴旺。現在一切地方都可暢通，为人們所熟悉，便于商业的經營。現在使人愉快的田野已把一切荒涼痕跡抹去了，丛林已被剷除而代之以春耕夏耘的隴亩、牲畜成群奔逐而野兽匿跡了。沙地已經播种了，山峪碎石已經扫除了；沼地已經排干了；过去貧困的农舍所在地，現在已被大城市占据了。島屿已不再[視

若海盜的出沒之地〕認為可怕了。到處可看到屋宇、人群、文治和文明〔國家所在，生氣所在〕^①。稠密的居民到處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世界已被我們擠滿了。自然物資已難于維持我們了。我們的欲望愈增加，而我們的需求也愈變迫切了。

奧古斯都（公元前 27—公元后 14 年）所創立的帝國對各省來說，標志着一個更有利時代的開端。這時代除了有些間斷外，綿延到安敦時期的結束（公元 180 年）。權力集中于一個人之手，使大批文武官吏所干的那幾乎不堪容忍的勒索勾當歸于停止；他們的一貫作風，原是搜刮各省的民脂民膏。而且帝國逐漸抹去了羅馬公民和省區屬民之間的差別，並由于兩類人民的同化，保證了省區人民可享受法律上的平等保護，特別緊急狀況下的政府幫助，以及那經常而有效能的行政利益。帝國的開始幾世紀，對有些地方來說，是它們歷史上的最繁榮的時期。這對敘利亞、高盧、非洲和埃及來說，尤為確當。埃及的人口有着顯著的增加。“羅馬和平”的利益，不僅在道德方面，而且也在物質方面；它在陸地上和海面上撲滅了搶劫和海盜行為，給生命和財產以保障，給旅行以便利。

第一世紀中，甚至象尼祿和多米蒂安一流最壞的皇帝，也切望保持各省內的良好行政。各省受苦最深的時期，倒是象克勞第烏斯那樣懦弱而好心腸的皇帝的統治時期。第一世紀中除了瘋狂的加力古拉以外，沒有一個皇帝不注意于各省的福利的。提庇留、多米蒂安、圖拉真和哈德良特別關心于各省的良好行政。他們的嚴厲監督，使各省長官的舞弊成為一種可招致危險的行動。在帝國的早期，有着審判不良長官的很多例証。就這一方面說，甚至塔西佗也承認尼祿的行政效能。但是，羅馬帝國政府沒有揚言過，它是為了慈善和文化的利益；它沒有那“白人的負擔”^②的近代觀念。

① “ubique respublica, ubique vita”

② 西方帝國主義者，把對落后國家和有色人種的侵略，硬說成為“白人的負擔”。——譯者

它只是热衷于各省的物質发展，使它們变成有利可图的地方。一个地区被征服以后，紧跟着的，便是开发农业、进行殖民、筑造道路、兴建港口等等事业，所以一般的結果，那被破坏地区的物質复兴，能迅速地完成。羅馬人到处应用了各种有系統的財政原則，因此在早期帝国内生产和搜刮資財之間能够保持平衡状态，使各省不致发生財源枯竭的現象。那共和国时代的包稅制度以及对各省的殘酷掠夺已被逐步消除，虽然这种恶习的完全剷除，直到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的統治时代(公元 193—211 年)才能做到。至于間接稅，在直接稅承包制停止以后，在有些省内，还是繼續承包。但是，所有的这些考虑，不是从什么人道主义出发的，而仅仅是为了行政效能而已。

在略述了背景之后，我們必須再談一談羅馬帝国内各地区的(虽然不是每一省的)特殊經濟状况。为了这样的一种概述，我們可在下列两种叙述法之間，加以抉擇：年代的叙述法和地域的叙述法。如果采用了前一項，我們就必须分出三个时期：(1)共和国时期，(2)从奥古斯都到戴克里先时期(公元前27—公元后 284 年)，(3)帝国最后几世紀时期，在西方到帝国統治消灭为止，在东方到帝国在 395 年狄奥多西逝世后轉变为拜占廷帝国为止。至于地域的叙述法，它似乎是比較好些，因为它具有一种优点，就是可使我們能更具体地表达，还可使我們更好地觀察經濟社会的轉变，而更清晰地了解各种过程。当然，由于交換品的种类繁多、市場数目的龐大、道路系統的复杂以及地中海沿岸和内地有着很多重要商埠，要詳尽地綜述羅馬帝国的内部商业，是决不可能的。

关于意大利，可以說，意大利即是羅馬城，因为差不多所有的意大利产物不是在产地消費了的，必然流入台伯河畔的那个大城市。現在我們有着很多資料，足以証明：在帝国时代汇合到羅馬的交易有莫大的数額，而羅馬城所消費的商品种类更是不胜枚举。历

史家、詩人、代人写信者、法律和銘刻都証明了这种貿易的数量、种类和价值。可是沒有关于它的性質和范围的概論，留傳下来。

羅馬城的主要港口是那不勒斯灣上的鮑索里，可是有些商品的輸入是經過次要港口的，例如安提阿姆、奇維塔-維奇亞、安科納、奧斯替亞、布林的西、他林敦、特拉西那和基泰各港。在帝国时代意大利本部已是一个大世襲領和大地主領地的国家；大业主拥有这些土地，使用着一大群一大群奴隶来耕种，在夜間把这批可憐人关入叫做改造所的牢獄圈里。这些大領主們几乎都經營种植橄欖和葡萄并牧畜牛羊。葡萄和橄欖的种植可提供特別优厚的利潤，因为羅馬政府在三百年期間，用对別处輸入的葡萄和橄欖征課苛重进口稅的方法，来保护意大利的葡萄园和橄欖林，也就是保护意大利的种植者。在高盧，甚至禁止种植葡萄，这项禁令直到普洛巴斯(公元 282—284 年)，才予以廢止。

巴士亚是意大利北部的大商埠。它是农产品产地，也是紡織业中心。阿奎里亚是一个从日耳曼运来的奴隶和毛皮的採購基地。阿勒索出产某些陶器。維塞利在斯特累波时代，不是重要地方，但塔西佗还提及过它。維罗那在奧古斯都設立上多瑙河省分之后，变得重要，因为它毗連着勃倫納山路。奧古斯都曾建立特里登得城，就是，近代的特稜特。米兰直到第三世紀末期，才变为重要。当时，戴克里先为了軍事理由，把米兰作为意大利总督区首府，因为它控制着阿尔卑斯山通路。

公元前 241 年羅馬从迦太基夺取了西西里的西部，后来又获得了島上的叙拉古部分。曾以麦产富饒而出名的西西里島到公元前第一世紀中期不复是羅馬的一个重要倉庫。另一方面，撒地尼亚和科西嘉已被西塞罗列入“共和国的三个谷物补充地”之內。

在非洲和努米底亞，羅馬勢力的不断进展，表現在物質文明方面甚于在精神文化方面。公元前 146 年迦太基被毁灭之后，約有

六千羅馬公民被賜給非洲的土地，一部分土地被售給羅馬的投机商人，其中 1/3 被留給國庫。結果，在羅馬屬非洲，興起了一個非常有錢而又有勢力的業主階層，他們的世襲領或大地產遍布全境。在尼祿時代，據老普林尼的估計，有六個人占有非洲省全部可耕地的半數。

泰巴喀、喜坡·第阿羅得斯（比塞大）、猶提喀、哈德拉孟敦、雷普提斯·馬格那、霍里亞·西利亞、塔普薩斯，都是除迦太基以外，非洲的最重要城鎮。的確，城鎮很多。努米底亞的情況也是那樣的。在普丁革的“城市表”里，列舉羅馬屬非洲地中海沿岸的六十個港口。

非洲人在羅馬軍團保護下，不受南方游牧族和西方（摩洛哥）部落的侵略，還有着那種官吏的統治，他們不求自己的致富，而以主權者的名義，經常力求有效能的治理；因此非洲人可十分安全地發展着他們非常富饒的地區。羅馬的公路似網一般地遍布了全境，由東到西，由海岸到沙漠邊緣。有些公路起源于迦太基人，而羅馬人使用軍團士兵一年復一年地加以建築；從而把它們大大地擴展了。

總督管轄下的非洲在第二世紀，無論農業或商業都達到了頂峯。非洲內地的產物依靠動脈似的公路，得到達海岸，居留地也依靠這些公路得向腹地一步步地推進。來自遼遠腹地的公路是以塔喀普、薩布拉特、奧伊亞、雷普提斯·馬格那為終點，從那里連接着那些穿越沙漠的舊商隊路綫。這個腹地從來沒有被羅馬人穿入過，直到在圖拉真的統治時期，那里的半游牧部族被征服以及軍站設立時為止。這些軍站，有的建立于沙漠中的綠洲上，例如：在比勒爾·海基夫的，由高摩達建立；在蓬真的，由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建立；在加列特和加達美斯的，由亞歷山大·塞弗拉斯建立。那時，地中海沿岸和非洲內地之間只在商業上存在着密切的關係而已。

甚至在奧古斯都統治時代，斯特累波已贊揚過塔喀普城為一個貿易中心，一世紀之後，普林尼也吹噓這個城所在的綠洲的繁榮情況。雷普提斯·馬格那欣欣向榮，直到 364 年它被柏柏人洗劫時為止。它是一個從遼遠內地運來貨物的特殊出口地；這些貨物包括有食鹽（產于巴克圖附近著名的自然鹽井）、皮革、駝鳥、羽毛、象牙、碎金、象和別種野獸（做馬戲用的）以及奴隸。

非洲省從公元前 146 年被征服到公元后 429 年喪失時為止，一向以羅馬帝國的一所谷倉地位和埃及相競爭着。它主要是一個農業省分。在利用山上瀉入運河的水流系統地灌溉着的肥沃土壤上，茂盛地長着谷物青苗、葡萄藤和橄欖樹。非洲省產的小麥、葡萄酒和葡萄干都是出名的。可是，小麥占着第一位。它比起那來自西西里島和埃及的小麥，既堅硬些，又飽滿些。在征服埃及之前，非洲省原是羅馬的最大谷倉，羅馬政府曾採用特殊措施，來維持該省的治安，保護那里的沙漠邊境以防止遊牧部族的搶劫性的突擊。迦太基的貨棧里和碼頭上，除了當地所產的谷物外，堆積着從內地經過喜波·勒吉斯、台維斯特和圖柏多·馬朱斯三條大路運入的大量小麥。當時，羅馬人期待着非洲省運糧船隊和後來期待埃及運糧船隊同樣地殷切。這可以說明為什麼維斯帕西安在公元 69 年因總督路求·派索久不承認他的新皇帝的地位，迅即把他罷黜；又為什麼由於同一原因，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登極時，趕快派遣軍團開往非洲。哈德拉孟敦在谷物出口港的地位上，是迦太基城的勁敵，而今天哈德拉孟敦后面的荒蕪不毛之地，當年曾是遍地青枝綠葉的橄欖園；從那里所出產的大量橄欖油運往羅馬城去，以供市場、浴場和運動場的需要。

羅馬的另一個豐富資源，是遮蓋着阿特拉斯山脊并沿山坡下延到海岸附近的密林。當意大利的森林被砍伐殆盡以後，非洲木材替代了意大利木材，有些港口，有着重要的造船工業。非洲森林

的逐漸伐除，沒有使它的繁榮景象減色，因為削光的地面上種植着葡萄和橄欖。甚至在公路兩側，橄欖樹排列成行，綠蔭密布，以致略為誇張些可以說，一個人從的黎波里到丹吉爾去，一路走在它們的林蔭之下。穆罕默德教的史家易賓·阿布德·哈坎所述的一件故事，使上面所說的事情，生色不少。他告訴我們，647年一個阿拉伯酋長占領蘇斐圖拉時，獲得了大量戰利品；他好奇地詢問當地的富源所在，因而一個路人獻給他一個橄欖。

非洲最名貴的樹木是香櫟樹；希臘人稱它為“紫茵”（thyine），羅馬人稱它為“色特倫”（citreum）。這種樹木在阿特拉斯山脈里，生長得很多，它的葉脈活象孔雀尾巴上的翎眼，老虎身上的條紋，豹身上的斑點，因此它受到了很大的珍視。它還有各種各樣的顏色。辛尼加有着三百張象牙腳的香櫟木小桌子。香櫟木大多是用作鑲蓋木以及用作製造小藝術品。努米底亞出產的云石，特別是一種濃牛血色的，非常名貴，成為一種重要商品。運輸船即重載船，裝載着努米底亞云石，駛過加拉塔島到卡拉里斯（卡格利亞里，撒地尼亞），再從那里到達奧斯替亞。這些船隻也載運着木材和野獸。另有一種有價值的磨石，是從摩洛哥采石場得來的。

在非洲和在羅馬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社會上經濟和社會等級是有着很大的差別，而且，還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趨勢。在城市里富商階層，大多是羅馬人和意大利人。另一方面，小店員和小商人，一般是布尼克人的後裔。當然，各大城市的社會結構象在這樣隆盛的工商業生活里，必然會密切地接近羅馬本部的社會結構。在那里，一定会有很多手工業者的行會，但是可以確實知道的，只有一個漂布工的行會。象所有的港口城市一樣，迦太基、雷普提斯·馬格那以及沿海城市都有着大批裝卸船貨的工人、碼頭工人、搬運夫等等。當時，奴隸制是廣泛通行的。但是，在羅馬屬非洲省，奴隸也好，自由人也好，我們知道得很少。

羅馬非洲省是一個多部族的地方；有些部族屬於本地血統，其他部族，象布尼克人和拉丁人，則屬於外來的血統。原始居民，包括利比亞人和柏柏爾人，雖然分成為很多部落，但在語言方面却是屬同一個系統的。他們在羅馬人統治下，保存了他們的姓氏，他們的宗教，以及至少保存了他們的部落部分自治權。這些部落大都始終住在山嶺地帶，所以，羅馬從來沒有辦法，迫使他們接受任何城市制度；這一事實後來阻礙了基督教在他們中間的傳布。布尼克居民占有了這沿海地區，已有千年之久；他們構成了那些城市的主要人口；而這些城市中，有很多是源出于布尼克人的。在羅馬非洲省存在的整個時期中，腓尼基人口^①在數字上繼續地占着或多或少的優勢。他們的宗教依然是古代布尼克人的信仰。布尼克語不僅是保存下來，而且還成為非洲的通俗語言，直到它被阿拉伯人所征服為止。後來，直到提庇留時代，所使用的硬幣，還是刻着布尼克的印章；羅馬語：“兩頭統治”(duumviri)，在布尼克城市里，叫做“蘇斐特”(sufetes)；布尼克語不但繼續被使用直到第六世紀為止，而且在長時期甚至成為有教育的人士的習慣用語，也有很多基督教社團，把它作為教會的習慣用語。皇帝塞普提米烏斯·塞弗拉斯有一個姊妹，生于雷普提斯·馬格那；她說拉丁語，說得這樣壞，以致皇帝因為她留在羅馬城而感到慚愧。約在423年聖奧古斯丁在努米底亞的佛薩拉，建立了一個主教區，曾委派一個通曉布尼克語的人；有一次他在自己的講道中，引用了一句布尼克成語，接着說，“我為了你們，再用拉丁語來說一遍，因為你們中不是都懂得布尼克語的”；還有關於另一個主教的例子：由於不懂得布尼克語，他在布道時，就不得不僱用一個翻譯員了。

可是，儘管有這些腓尼基的殘余繼續保持着，但如果把非洲的

① 就是布尼克人口，因布尼克人原是腓尼基的殖民。——譯者

羅馬化認為是浮面的，那將是一個錯誤。迦太基除了商業上重要地位以外，從第三世紀開始時起，還是一個學術活動的中心；它確實可以亞浦利厄、特圖良、亞諾比厄、息普立安、奧古斯丁這一批人，引為自豪的。

羅馬非洲省的衰落，開始於第三世紀中期，當時，努米底亞的副總督卡伯林納斯，為了馬克息馬斯、色雷克，推翻了戈諦安一世，並對所有擁護後者的城市，洗劫一空。從那時起到戴克里先登極時止，非洲省外受努米底亞人和摩爾人的不斷侵掠，而內遭派系的鬥爭而變為分裂。所有的“皇帝屯營”，沒有一個能夠維持那里的秩序，或給予保護。君士坦丁在312年推翻了馬克森細阿之後，曾努力恢復當地的秩序，特別是塞塔港。這個港口的名稱，由他改為君士坦丁，而那省的名稱改為努米底亞·君士坦丁那。後一個名稱到今天還是保存在法屬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州內。

在羅馬非洲省東部，即在利比亞沙漠和近代突尼斯之間，橫亘著一片廣大的，一度曾是肥沃的施勒尼高原（即近代意屬的黎波里）。施勒尼，原由多利安人移殖，在公元前322年被托勒密征服，後來隨同埃及的被占一起歸入羅馬的版圖。羅馬帝國在這個地區的建省，原是頗費躊躇的，因為那里的交通很不便利，而且容易遭到沙漠中貝督英人的侵掠。起初，羅馬政府滿足於僅僅占有托勒密的王室領，以及對當地主要產品通便樹脂的課稅；它是一種很名貴的藥材。那里的人口混合著利比亞人、猶太人、希臘人和埃及人。施勒尼的貿易一度是興旺的，但後來因為受到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影響而衰敗了。當時，羅馬政府似乎也未曾有所作為，來挽救這種衰落的趨勢。約在400年時它的衰落達到了極點；正是在主教息尼細阿斯時代，從他的書簡里我們可獲得關於羅馬帝國衰敗的耐人尋味的資料。

羅馬逐步征服了伊伯里安半島（西班牙）上的各部族，使之歸

順于羅馬的統治；这战争从第二次布尼克战争起（公元前 218 年）到公元前 19 年坎塔布立亚人最后屈服止，延續了两百年之久。在那里，最早建立的两省，是内西班牙省和外西班牙省。喀他基那在迦太基統治时期，原是西班牙的第一流的城市，現在成为内西班牙的首府，而哥尔杜巴（哥尔多华）成为外西班牙的首府。奥古斯都和提庇留努力把羅馬权力扩展到整个半島上。在斯特累波时代，半島的大部分，已在礼节、风俗和語言方面，变为羅馬化。后来，公路的建筑（特别是由龐培，及在他以后由各皇帝建筑的公路）、羅馬公民的移入征服地、西班牙人的被强制服軍役等等事情，使西班牙的徹底羅馬化底于完成。当时，西班牙有好几百座城市；重要的城市有四百座，次要的城市有二百九十三座。

西班牙是羅馬帝国的加利福尼亚州^①。它的金、銀、銅、鉄等矿产資源，起初曾由迦太基人开采，而后来由羅馬人大規模开发出来。新迦太基^②附近的白銀矿場僱佣着四万矿工，每天出产約值二万五千便士的白銀。硃砂和鉛是在俾替卡开掘出来的；毕尔比利斯，即近代的毕尔巴鄂，从古代起一直經過整个中世紀时期，是以产鉄著名的。

在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的半干燥高原上，牧养着无数的羊群，当时，西班牙的羊毛和西班牙的皮革，都是出名的。在它的南部，橄欖油是一种重要商品，并大量地出口。根据普林尼的話，俾替卡（安达盧西亚）和喜斯特里亚所产的橄欖油，就等級論，仅次于意大利所产的橄欖油。馬細阿尔曾說过哥尔多华所产的油，相等于意大利所产的最好的油。在茂密的橡櫟森林里，飼养着成千成万头的猪豚；坎塔布立亚出产的火腿，有广大的銷路。在羅馬統治时期，加第斯（加的斯）变成为西班牙的最重要的城市，非常富庶繁

① 美国西南部的一州，即旧金山所在地，曾以金銀矿产著名。——譯者

② 就是喀他基那城，在西班牙的东南部。——譯者

華，所以第二世紀中，和古代的太爾城一樣，它成為城市的代表。加的斯的魚市場是羅馬遊歷者所稱賞的地方。它出產的熏鮪魚、醃鮪魚輸出到羅馬城去。阿布第拉及西班牙南部的其他港口的情況，也是如此。

“高盧全部分成三區^①”。高盧不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利維拉在內，被稱為“那邦內細亞”，是在公元前121年時征服的。又在凱撒于共和國最後的一個世紀中完成了它的征服後，高盧乃分成為三大行政區；這些分區是很密切地符合古代凱爾特高盧的歷史分區的。這些行政區是：拉格杜息，即位於羅亞爾河、塞納河和梭恩河之間的領土；阿奎坦尼亞，即位於庇里牛斯山、色芬山和格羅內河之間的領土；以及貝爾吉卡，在三區中它是範圍最大的一區，西界塞納河，北濱海，東臨萊茵河。在帝國早期，有兩個日耳曼省，是從貝爾吉卡分割出來的。第四世紀中，奧古斯大·特累伏倫（特里爾、特累甫）成為貝爾吉卡府的首都。

羅馬高盧省成為整個羅馬帝國中的最繁榮的地方。在第三世紀中期以前，它很少顯出衰落的跡象。它的農業、工業、商業享有高度的繁榮。里昂、波爾多、阿爾茲、土魯斯和馬賽，都是最重要的商業區。但是，“在那邦內細亞省內，特別是沿着羅尼河水流，有許多欣欣向榮的城市的崛起，使馬西利亞城的繁榮逐漸減色，到了第四世紀，奧索尼阿斯不再把它列入高盧的漂亮城市之中。”布爾日以它的鐵製品出名；加奧爾以它的紡織品出名。特里甫和奧東，是政府兵器廠的所在地。甚至遼遠的布勒塔尼，羅馬商業也已滲入。

東方商人，主要是敘利亞人群集在馬賽、里昂、波爾多、奧爾良、巴黎各城市；他們的居留地在帝國滅亡之後，還是長期地存在着。近時，為要發現考古學上的碑銘，有人進行了發掘工作；在一

① “gallia est omnis divisa in partes tres”

个高盧羅馬人基督徒坟墓的石槨里(在波尔多附近),发现了陈酒。这陈酒和放酒的玻璃瓶一样,看来是源出于叙利亚的,因为我们在盧佛尔博物院內可看到那些在小亚細亚所找出的同一类型的很古酒瓶。玻璃瓶的形式是相同的,而玻璃可能是在盧佛尔那供应瓶子的工場里制造出来的。叙利亚所产的各种酒,在早期羅馬帝國內,已經非常有名;当时,叙利亚和波尔多間的貿易也已活跃。那在波尔多所发现的陈酒瓶是在法国境內所找到的第二只瓶子。1877年在阿尔茲,还发现了一只小酒杯。

高盧随着第三世紀中期各省的叛乱而开始遭受灾难。这些反叛运动由于經濟社会的緊張而声势更大,終于形成了巴古达的大叛乱。在加力伊那斯統治时期,日耳曼人侵入高盧,其成功的原因,与其說是由于阿勒曼尼^①的威力,不如說是由于这种内部的弱点。那时,高盧存在的内部混乱和外来侵略,給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举例說,在奥汾涅的克勒芒附近,上述的游牧部族破坏了雷苏城的陶器大工場,那里的商店根据近代的发掘所指出,行列綿延,长约五哩。制陶工业从第一世紀以来原是高盧一項主要工业,而現在因此受到致命的打击了。

关于羅馬征服不列顛,其进程是迟緩的。这一事实的基本原因,也許在于这个国家的富源有限。凱撒在公元前55年和54年两次出征不列顛,沒有获得持久的結果。事实上,他对不列顛被征服部落所課的賦稅,长时期內,也无人繳納,因为他沒有留下駐防軍在那里。后来,公元前34和27年奧古斯都也两次計劃出征不列顛,但是他的計劃都沒有产生什么成果,他只得以一种空洞的宗主权名义,聊以自慰而已。有些不列顛酋长好象請求过他的保护,另有些酋长对羅馬商人也准許过入境。但是不列顛繼續保持着自

① 日耳曼人的部族联盟。——譯者

由,直到公元 43 年时为止,当时,克劳第烏斯派遣將領阿格利柯拉出征該島,获得部分成功,因而羅馬从那里征收定期貢賦。至于不列顛島的完全征服,是在哈德良和安敦·庇护时代。

不列顛的最重要产品中有鉄、鉛,尤其是錫。泰晤士河流域成为产麦区,从这里輸出的谷物渡过海峡,上溯萊茵,以供应駐在那里的軍团,因为在高盧沒有东流的大河,使得中高盧谷物不能廉价运出。至于爱尔兰,虽然羅馬从沒征服过它,但它和該島也許有着通商关系。

在早期帝国,沿萊茵左岸的整个地区是和高盧分开的,并設立为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两省;前者約包括瑞士西部、亚尔薩斯以及現在的法屬和德屬萊茵兰;后者包括近代的盧森堡、比利时东部以及荷兰南部。

羅馬人在东高盧和两个日耳曼省內遍布了公路网,这些公路主要是为着軍用,但附帶地也大大地便利了貿易。这公路系統,虽在近代史上因它的輻射点从理姆向后推移到巴黎而作了很多更改,但还可容易地找寻出来。在羅馬时代,公路从理姆象扇形般地散开来。第一条路从理姆通往萊茵河畔美因斯;第二条路經梅斯和凡尔登到斯特拉斯堡(羅馬的阿根托拉敦);第三条路到图尔;第四条路經過朗格勒(羅馬的林哥尼斯)到味松省(貝藏松)。另一条大路,从里昂起上达索恩河,下达摩塞耳河經過梅斯、图尔、特累甫到美因斯和科隆,它橫断了所有上述的路,并使它們互相連接着。在羅馬的亚尔薩斯,有来自意大利越阿尔卑斯山的延伸路綫;它沿萊茵河下行,从巴塞尔到达科隆和烏得勒支。这样,有着两条沿河流的縱路,由各条橫路来联系着的。

然而萊茵河沿岸城市:科隆、美因斯、沃姆斯、科不林士、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直到帝国历史的后期,与其說是城市,不如說是軍營。但是后来,这些据点变成为从事于农业和貿易的大批平民

的居住区。洛林的矿业、摩塞耳河流的葡萄培植，以及养羊事业，都是重要的活动。

奥古斯都是羅馬帝国边防政策的創立人。在他的政治遺囑里，他劝告了他的后繼者务須保存他所建立的边防綫。后来克劳第烏斯征服了不列顛，多米蒂安組織了“十营陣”^①，图拉真合并了达謝、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在此之后哈德良回复到奥古斯都的政策；他滿意于按帝国界綫来巩固疆界，在沒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即用墙垣、壕沟、角面堡、塔楼等等組成边防綫。此外还有严格的边境管理章程。在日耳曼，非羅馬屬的萊茵河岸以及沿多瑙河岸，保留着一条无人地带；不讓任何蛮人的船舶在这两条河上航行，而羅馬舰队則在全綫上巡邏着。穿过上萊茵河和多瑙河所构成三角地的人工墙垣，是由哈德良开始建造的；这项宏大的工程由其后繼者繼續，而底于完成。这条人为的疆界是由土墙构成的，并用壕沟木柵，以及一系列的塔楼或堡壘来保卫着的。这城垣开始于累根斯堡西南的克尔海姆向西經威森堡和符登堡的干曾霍遜，到达罗耳士和卫尔柴姆，乃折向北，在弗洛登堡过美因河，在福吉尔斯堡之南和托納斯之北，迂迴曲折地延到瀾河，于是順河流而下，达科不林士对面的萊茵河岸。

羅馬的边疆警察对边界上的貿易实施严格的监督。任何人在天暗以后，不得穿越边界，也不得携带武器；要通过必須僱一个护送兵。有时甚至禁止任何人走近疆界的边缘，帝国的信使除外。一切貿易項目概須繳付进口稅；甚至外国君主或他們的使节，如果隨身携带商品，也須付稅。另一方面，有些商品是被禁止出口的，特别是鉄，无论生鉄或鉄制品，各种武器、酒、油、谷物、食盐以及貴金屬。在边境上的固定地点，設立官方批准的市場，在那里有一个軍

^① “Decuman fields”——古代羅馬的軍營的正門設在距敌最远的那一边，由每个軍团的第十营防守，因此得名。——譯者

事警察,实施监督。在所有的边境上,对一切进口物所征的正常税率是 12.5%,惟紅海口岸不在此例,在那里所征的税率是 25%。

我們幸有屬於努米底亚和摩里得尼亚边境的公元 202 年港口法的一部分。它有四种税率表。第一种表适用于奴隶、馬、騾、牛、駝;第二种表适用于农产品;第三种表适用于皮革;第四种表是关于各色各样的进口貨。所有的东西概須納稅。比起上項文件更有趣的,是高摩达統治时期的关于东方的进口貨的一項税率表。其中包括六类商品;(1)香料、香粉、膏藥和藥材;(2)棉織品、毛皮、象牙和印度鉄;(3)各种宝石;(4)鴉片和印度布匹、生絲和綢緞;(5)奴隶、馬戏場用的野兽;(6)染料、毛織物、馬匹。

看来倒是有趣,高盧人和日耳曼人对这些边境上的关卡,都深恶痛絕。公元 69—71 年在息維力斯統治下,巴塔維亚人叛乱时,萊茵河右岸的日耳曼人联合巴塔維亚人,共同要求关卡的撤消。日耳曼人虽是蛮族,但对做生意一門,却显得十分精明。日耳曼人最先接触到的羅馬貨幣,是共和国的銀币(比加蒂和塞拉蒂^①)。这种貨幣在帝国早期,还是在流通。但尼祿縮減了銀币(德那里^②)的分量,因而日耳曼人拒絕接受它,象塔西佗在一段有名的文字中所記載的那樣;他們要求給他們以旧的优良貨幣付款^③。值得注意的,在德意志发掘出的羅馬古币的窖藏里,比加蒂和塞拉蒂这些銀币,数量上多于那后起的德那里銀币。

里細亚在公元前 15 年被征服,并組成为一省;它包括多瑙河南的巴伐利亚、北提罗尔及东瑞士。勒赫河畔奥古斯大·文得力科倫(奥格斯堡)是从奥古斯都得名的,它变成阿尔卑斯山北側的

① 比加蒂銀币(bigati)刻着双馬拖双輪車图,塞拉蒂銀币(serrati)是邊緣上有刻痕的。——譯者

② 德那里銀币(denarius),也可譯作便士,原值羅馬的十个銅币。——譯者

③ [“他們的确認識并選擇我們貨幣及貨幣的类型”。“formasque quasdam postrae pecuniae agnoscunt atque eligunt”。]

最重要的貿易中心；由於它便於到達勃倫納山路的地位，羅馬和日耳曼的貨品，就在那里交換。在里細亞之下，是諾立坎，以產鐵著名。

班諾尼亞在公元 10 年組成為一省。它的本地居民幾乎全部曾被出賣為奴隸。它是上多瑙河三省中的最羅馬化的一省，這一點可從班諾尼亞省內的大批舊羅馬區獲得了證明。近代的伊塞克、阿爾-奧芬、塞蘭克曼、奧索尼、漢堡附近的德意志-阿爾丁堡、伊塞格、安吉爾河畔斯坦因、腊伯（阿拉波那）、來巴哈、息塞克、庇圖、彼特洛尼爾（羅馬的卡嫩敦）、特勒芬、息太耶伏、奧登堡；這些地方或在奧地利，或在匈牙利，或在塞爾維亞，最初都是羅馬人建立的。目前亞得里亞海東岸的大多數重要港口，也是這樣的。這裡的拉古薩、都拉索、薩拉，都是由羅馬人打下基礎的。

下多瑙河兩省，即兩個米西亞省，是在提庇留的統治時期建立起來的。這裡，希臘的傳統是很強的；羅馬城市過去大多曾是希臘人的大商埠。其中最重要的，是貝爾格萊德、尼科波利斯及伐那；它們今天還是存在著。在共和國時期，已有一條沿黑海岸的羅馬公路，從赫勒斯滂海峽到達托力克·契索尼斯半島。然而，色雷斯省是在羅馬帝國時期建立的。這一省（包括近代的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歐洲領土），就它的早期歷史來說，當然是要追溯到古希臘和馬其頓時代的。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色雷斯省中最重要地點是：巴拉斯特勒（古代的阿布第拉）、拜占廷、亞得里亞那堡、菲利波利和索非亞（羅馬的索第卡）。亞得里亞那堡是一個製造兵器的重要地點；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前，它還是一個羅馬巴爾干半島上的主要商埠。在軍營的周圍，往往興起了酒肆旅館，商人移民遂雲集在那里。貝爾格萊德城（新基德納姆）以及摩拉瓦河多瑙河匯合處的維密那西城便是這樣開始的。摩拉瓦河是一條重要的河流，因為來自薩羅尼卡的貿易，是沿河而上的，而尼西是這一條路上的一

个中途站。

第二世紀中，图拉真的征服达謝，是羅馬扩展領土主权的最显著表現。达謝位于多瑙河下游的北岸，即是今天羅馬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地区。由于那里有丰富的矿产儲藏，从經濟來說，它是一个重要的占領。它的本地居民差不多整个地被杀掉或出售为奴隶，因而这地区完全被羅馬移民居住。羅馬人来到那里的时候，只有一个重要城市，即是达謝国王的首府——薩米士基得斯大城。这地区和“十营陣”相似，是用人工牆垣来补充喀尔巴阡山的曲折崖壁的天然屏障，以防止蛮族的侵犯。在东南欧的这一部分，和南德意志一样，所有的重要城市，大多可追溯到羅馬人所創立的基础，如卡尔斯堡、托尔达（托倫堡）、克劳曾堡、图尼、塞維力那、奥尔索瓦、威特鲁克以及在小瓦雷啓亚的塞維林·巴納特。尽管有这些基地，但这地区的占領还是很不巩固的，因此哈德良想要把羅馬軍隊撤回到多瑙河南岸，但由于羅馬移民的抗議，这計劃未曾实行。所以，达謝繼續是羅馬的一省，直到加力伊那斯的統治时代，当时（256年）它的很多地区已受到哥特人的蹂躪。最后，275年，奧理略把它完全放弃了。

羅馬人对希腊，比对任何其他征服地，除了迦太基外，更加殘酷。他們破坏了科林斯、底比斯和卡尔息斯。他們使波的亚和优卑亚变为人烟絕跡，并沒收那里的土地作为公产。他們以苛重的賦稅强加在被征服的人民身上。因为土地集聚在少数大地主手里，希腊的人口有大量的减少，也有显著的移动。牧場的扩展破坏了农业。大部自由居民向城市迁徙，特別往沿海各城市，在那里工商业尽管不很兴盛，但还留存一些，并且在那里穷人可得公家的救济，象羅馬的“下民”^①那样。在希腊有許多城市完全消灭；别的城

^① “下民”(Iazzaroni)是羅馬城无家可归、依靠搬运貨物或乞食糊口的人。——譯者

市也人烟稀少。至于爱琴海上的岛屿大部变成一片荒凉的山岩。阿加狄亚几乎回到了自然状态。

为了避免繞过馬利亚角的又长又危险的航路，尼祿曾有一个开通科林斯地峡的可实行的想法。如果这计划能够实现，那会有利于希腊的航行，也会促进希腊半岛东西两岸城市之间的商业关系。公元 92 年多米蒂安为了意大利葡萄种植者的利益而禁止希腊的葡萄培植，使希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诚然，第二世纪中，希腊的若干地区获得了部分的复兴，因为有几个皇帝对希腊采取了有利的措施，特别是哈德良；后者对古代希腊抱有浪漫的好感。然而，在帝国的后期，据一般情况来说，希腊是一个财源枯竭的地区。

羅馬还繞着黑海北岸伸展势力，那里希腊的商业传统是很强的。关于它们的起源，我們可追溯到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的商业关系，这些殖民地，不仅和周围的非斯拉夫族而且和第聶伯河中游的古代斯拉夫人維持商业关系。其中主要殖民地是：奥尔比亚，在公元前第六世纪从米利都移来的人建立的，契索尼斯，位于同名称的半岛上的西南角；狄奥多西亚和帕第克比姆，位于东南海岸；番那哥立亚，位于息米立亚·博斯普鲁斯的东岸，以及坦納易斯，位于同名称的河流的河口，就是，近代叫做頓河的河口。这块羅馬人泛称为“西徐斯”的，而今天我们称之为克里米亚的地区，有着丰富的原料产品：牛、羊、馬、皮革、羊毛、蜜、蜡、盐；另外从其腹地可获得几千几万个奴隶。

不象希腊半岛一样，整个小亚細亚在羅馬帝国的統治时期，享有高度的繁荣。那里，有古老而数目又很多的城市，有稠密的人口，有从远古傳下的貿易技巧，有高度发展的艺术和手工艺，有当地的各种自然资源，——这一切創造了小亚細亚羅馬各省的繁荣条件。这里，也存在着商人和工人的有势力的团体。

在奧古斯都时代，以弗所和士麦拿各有人口二十万人。只在

亞洲一省內，有十二个城市，是羅馬殖民的中心社會。在小亞細亞各省，所有的合併組成的城鎮，數以百計。差不多全小亞細亞，在從拜占廷帝國到它被土耳其征服止這個整個時期，繼續保持着它的商業上和工業上的優勢。到了第四世紀，甚至加拉太也徹頭徹尾地羅馬化了。但是，卡帕多細亞，一般說來接受羅馬文明較慢，而且羅馬文明在那里從沒有過完全的發展。它的山區和低地草原，以養馬牧場出名。由於皮西底亞、弗里加、愛索立亞以及托魯斯的盜賊猖獗，羅馬政府一向認為統治小亞細亞的中央山區是一件難事。

敘利亞在羅馬出現於東方之前，已有一個悠久而又重要的工商業歷史。敘利亞的經濟發展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太爾和西頓兩城。它們的繁榮不會因為亞歷山大的征服而下降，反而上升起來。敘利亞這個古國中的一些最重要城市，有其遠古的根源。這些城市包括有阿勒頗、大馬士革、勞狄栖亞、的黎波里、西頓、太爾及貝利亞。從太古時代以來，——也許在埃及開始在經濟上對東地中海沿岸地區發生影響之前，——敘利亞-腓尼基人已形成為東方奢侈品經營上的卓越商人；在活動上稍弱於他們的，是散處於古代利凡得各地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中，沒有一塊地方，甚至小亞細亞各省也沒有，比敘利亞承繼着更加複雜的遺產。它是一張重寫過好多次的羊皮紙^①。敘利亞民族和語言沒有越出大馬士革範圍之外。東方和東南方的人口，屬於阿拉伯族；南方的人口，屬於猶太族；那沿海一帶的居民則是腓尼基人。插在這些不調和的部族之間的，有着許多源出於希臘人的城市，其中有的城市是從亞歷山大帝及其繼承人，特別是塞琉息茲朝開始的。除了這些血統、習慣和語言上的分歧之外，我們還須指出其他複雜情況。南敘利亞曾一度隸屬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而北敘利亞則歸塞琉息茲朝統治。這

^① 原文用“palimpsest”一字，指用以重複寫字的羊皮紙。古時，因紙類缺乏，把初次寫在它上面的字跡擦去，以便重寫，象我們使用的石板一樣。這裡用作比喻。——譯者

可說明存在两个叙利亞的原因。

叙利亞內地民風古樸，原是頑抗都市生活的。它的都市化是由塞琉息茲王朝開始而由羅馬人繼續着的。尤其在塞琉息茲·尼卡篤時期，叙利亞遍布着希臘式的城市。當時，猶太君主仿效它們，建造了凱撒利亞、撒馬利亞和提比里亞三城。在叙利亞，儘管有對內和對外戰爭，但它的城市的築造、道路的修建以及商業和工業，還是都在令人驚异地發展着。甚至那被猶太人認為是最荒僻、最淒涼的豪藍高原也接受了一些羅馬文化，然而在那里這種文化旋即消逝。在叙利亞，希臘和羅馬的影響都是從沒徹底深入過。那里的各種語言：叙利亞語、希伯來語、腓尼基語、阿拉美易克語、帕爾邁拉語，還是繼續存在着；那里居民的部落、部族、村庄形式的古舊生活，也是這樣的。然而，羅馬的成分在叙利亞的結構中却是一個有力的因素。

羅馬的阿拉伯省，面臨紅海的頂端，位于巴勒斯坦之南，而後者的唯一港口便是扎發。阿拉伯省的皮特拉城，即“古老的紅玫瑰城”，是東方和西方商人會集的場所；托勒密王朝曾看到這地點在貿易上的戰略價值。“他們要控制那橫過阿拉伯半島到迦薩的貿易通路；除了他們自己的尼羅河水道之外，它是对印度交通上的另一條路綫。”

誰也不知道，埃及和印度以及東方的貿易究竟已有多少久遠。埃及位于地中海的東頭和紅海的頂端、這双重地位使埃及獲得了那控制大量東方貿易的戰略地點，這項貿易原是西方各國自遠古以來一直渴望的。但是，埃及的勢力跟着亞歷山大帝的征服而上升，達到空前的程度。它成為歐洲的一部分而且成為歐洲文化的一個不可缺少部分。占有埃及的領土，可使那控制它的國家成為那支配着歐洲和東方間貿易上最大數額的主人翁。

不可能想象，羅馬在東地中海沿岸各地擴展的時候，最後不會

侵犯埃及的。有一連串的事件，促進了羅馬對埃及的占領，而這些事件也只是偶然的巧合罷了。所以，凱撒和安東尼發生互相爭奪地中海世界霸權的時候，埃及便成為爭奪的焦點。安東尼被迫得走頭無路的時候，就溜到埃及，作為避難所，所以羅馬的征服埃及是勢所必然的（公元前30年）。

羅馬對埃及的統治，對一般省行政的常規來說，倒有各種破例的地方。其原因是：埃及有特別長久的獨立國的历史，有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有稠密的人口。羅馬人在那裡維持了很多托勒密王朝的現成制度，比較上沒有作出多大變革。

自古以來，埃及是以其人口的稠密出名的；在古代，號稱擁有一萬八千至二萬所村莊和城鎮；到托勒密王朝時代，這項數字，據稱在三萬以上。戴奧多拉斯估計埃及在被羅馬占領之前的人口有七百萬人，約瑟福斯估計埃及在維斯帕西安時代的人口是七百八十萬人，比今天少些。在這項數目中，有着約一百萬猶太人。其餘的人口，包括有本地的埃及人、希臘人、羅馬人以及奴隸。本地人和希臘人在很大程度互相雜處，可是猶太人的大殖民地還是保持着它的隔離性。值得注意的，在埃及農業區里，由於有大量依附農或賤農，奴隸是很少的。

古代埃及人習慣于專制統治，他們是以虛偽性、謙卑性、宗教迷信、以及好小爭吵的性質出名的。羅馬在埃及所作的改革中，最少的，便是關於埃及的信仰方面。對於神廟，不加騷擾；對於僧侶所使用的象形文字，任它繼續流行直到卡拉卡拉時代為止，甚至更後一些——到第六世紀中為止。托勒密王朝所採用的希臘文仍舊作為官方語言。羅馬的各省一般是由一個省長來治理；但埃及則不然，是由一個擁有國王尊嚴的總督來統治的。象不列顛帝國中的印度一樣，埃及是受着一個特殊類型的統治的。

關於埃及的工業生活，一般說來，奴隸勞動和資本主義都是几

乎沒有起过什么作用。不仅埃及土地是完全由佃农来耕种，而且我們所知的埃及手工制造业大多是在小手工业者手里；他們或者为自己工作或者出僱于主人，替他工作。

埃及对羅馬帝国有其农业上的重要性之外，还在亚历山大城有着那个第一流的世界市場。它是羅馬和远东貿易的基地。象近代史一样，古代史很多是关于爭夺商路控制权的历史。当时，苏伊士运河虽然还没有开通，但紅海在欧洲和远东間商路上的地位和它在今天的地位，却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起初，东方的貨物似乎是由印度和阿拉伯的船只运到南阿拉伯和阿比西尼亚各港口的。可是，不久希腊人加入了竞争。普林尼曾提及那在馬拉巴海岸由希腊商人所建的一个殖民地。这样看来，欧洲和东方之間建立了一个直接的貿易关系。事实上，奥古斯都在公元前 25 年，就是在亚克兴战役六年之后，所頒布的最早法令之一，便是关于力图夺取这项貿易的控制权。为了这个目的，这位皇帝，由于錯認阿拉伯，而非印度和远东，是东方貨物的产地，乃命令埃及总督出征阿拉伯。这项努力是失败的。后来，羅馬人发现了这貿易是来自印度的，于是对东方貨物征收了 25% 的进口税。羅馬帝国对紅海上海盗的剿灭大有助于这项貿易的发展，可是尤重要的，是約在公元 48 年，关于印度洋上按季节吹来的貿易风或季节风的发现。此后，埃及和印度之間的东西航程就定期地进行着。但在此之前，所有的船只是依循那条沿波斯湾和馬克蘭海岸的又长又迂迴的航綫行駛着的。

和一般的想象相反，紅海航路的終点，不是在海湾的頂端——因为紅海的上端，富于淺滩与暗礁——而在迈奧斯-霍尔木斯(馬斯尔港)，即近代的拉斯·阿布·森默，在下行紅海的非洲沿岸的中途。这个港口是由于上紅海的航行有着危險性，由托勒密·非拉得尔斐斯在公元前 274 年建筑起来的。后来，在它附近，另有其他港

口兴起，如阿辛諾伊、多利买和阿杜力斯各港。在这些港口里，把貨物过船，再用駱駝队輸送，越沙漠达尼罗河畔科普多斯（近代的庫甫特），再順河下航达到河口的三角洲。据普林尼記載，約值二千万美元的黄金，每年从羅馬帝国支出去，以平衡东方貿易差額^①。現在印度发掘出并保藏于各大博物館的各色各样的羅馬硬幣，数以千計，那可証明普林尼所說的不謬。

此外，羅馬的貿易企业也深入了非洲中部。在奧古斯都时代，羅馬在埃及最远的南疆，是賽伊尼（近代的阿斯旺，近第一瀑布）。后来，这边界再向南推移，达到海厄拉·息坎米諾斯，它是“羅馬在熱帶上所占有的唯一地方”。这块地方是和非洲內地“蛮族”貿易的市場，在那里所进行的是純粹物物交換的貿易。

羅馬通过埃及，控制着那条經紅海和印度达远东的通路——海路。但是，还有一条橫貫陆地的大商路，开始于中国和印度之間，經巴克特里亚、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而終止于叙利亞的各港口，特別是安提阿港。

这一条陆地大商路上的西部各段，是經過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一事实一向使这两个地区内的任何政权，不管屬於巴比倫人的、亚述人的、波斯人的、帕提亚人的、新波斯阿薩西或薩薩尼王朝的、或穆罕默德教哈里发朝的，能用对过境的东方商品勒索通行稅以及对这運輸課以苛重不堪的關稅的方法，来堵塞住欧洲。例如，巴比倫和尼尼微堵塞过太尔和西頓；波斯堵塞过安提阿以及小亚細亚的爱奥尼亚希腊城邦；帕提亚堵塞过羅馬；阿薩西和薩薩尼王朝以及后来的巴格达哈里发朝堵塞过君士坦丁堡和东羅馬帝国。爱奥尼亚城邦由于痛恨波斯对它們的經濟压迫政策，在公元前500和494年之間，曾反叛大流士，而欧洲的希腊人就給予支援，进

^① 在奧理略时代(270—275年)，“一磅絲綢价值一磅黄金”。

行干涉：这一事件引导到薛西斯的劳而无功地企图征服希腊，引导到馬拉敦、德摩比利和薩拉密斯各战役。亚历山大帝东征的动机一部分也是經濟的，就是說，要打破波斯对西方商业的障碍，要消除欧洲和远东間的“中間商人”。他的东征在一个时期內，是成功的。由于波斯的复亡，希腊和叙利亚人获得了大利，同时，东方奢侈品的价格，在地中海区城市的市場上也跌落了。

但是，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和帕提亚帝国崛起后，西亚恢复了原来的局势。在这时期，羅馬成为对帕提亚商业控制的反对者。羅馬和帕提亚間的长期斗争，主要地是在古代史上的一个商业竞争，象从爱德华三世統治以后，英法两大商业国家为了商业竞争而发生的战争一样。在公元前250年和公元后226年間，帕提亚的阿薩西朝諸王的权力扩及幼发拉底河和印度河之間的領土上，在西亚形成了一个初对希腊的、后对羅馬的权力东侵的屏障。公元前53年革拉苏的惨败，使羅馬人长期留着痛苦的回忆。羅馬人对帕提亚所举行的各次正面的进攻都是以失败而告終的——公元前36年安东尼被打敗，公元232年亚历山大·塞弗拉斯被打敗，公元258年瓦勒里安被打敗而成为沙浦尔大帝的俘虏（他是唯一的羅馬皇帝死于俘囚里），公元364年朱理安被打敗而陣亡。羅馬在帕提亚的各次战争里，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羅馬想要对帕提亚举行正面的进攻，都是枉費心血的。它沒有能够冲入帕提亚的国境。的确，图拉真虽征服过两河流域的土地，并在那里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巴比倫和亚述各省，羅馬虽可占有以得撒、尼士比、崔格馬、撒摩撒达和帕尔迈拉，并在那里可設立海关，可是帕提亚还是这地区的主人翁，盘踞在“大商路”上。另一方面，帕提亚人对控制里海和尤克辛海^①間山区地峡中兇悍的居民，

① 即黑海。——譯者

即亞美尼亞人和伊伯里安人，一向覺得是有困難的。這一事實曾使羅馬人想到那兜過帕提亞的可能性。因為那經由亞美尼亞和伊伯里安通遠東的交通路線，可以不受着帕提亞的阻撓。這一觀念原不是新的，新的東西倒是在於實行它。

早在公元前第三世紀之初，帕特洛克里斯奉着安泰奧卡斯一世之命，曾往里海去探險，他回來報告說，那里有一條重要商路，起自北印度（和中國）到達奧克塞斯河^①，在那里乘船下行該河，或者經過奧克塞斯河流入里海的航道直達里海，或者登岸走一段陸路，以達里海。然後，把貨物用船運載，橫渡里海，并上溯庫爾河，達到航路的頂端，再從这里，把貨物運送，經過梯弗利斯……以達黑海……所以奧克塞斯河流域是一條貿易大道。它是通過里海和外高加索而進入西方世界的路線。跟着占有里海與黑海間的地峽，羅馬人就掌握着這條通路的控制權^②。

亞美尼亞原來是幼發拉底河上游的一個王國，就是，由本地君主統治的高加索王國。他們對帕提亞有着松弛的藩屬關係。對亞美尼亞，羅馬逐漸擴展其勢力。在那里，龐培立國王第奧塔魯斯為藩王；凱撒立國王阿利奧巴扎尼斯；奧古斯都立國王亞琪雷厄，尼祿立國王底格拉尼。然而，尼祿不久取消了这个國家的半獨立的地位，并把它的地區合并成為“小亞美尼亞”；維斯帕西安在那里設立了一個省政府，并在庫爾河畔建築了一座砲台。此後羅馬迅速地进行征服那整个里海地峽，直到公元115和117年間為止。圖拉真又獲得了“大亞美尼亞”，也把它組成為一個省。

羅馬現在可以繞過帕提亞所壟斷的橫貫亞洲的大商路了；它由於獲得那些對帕提亞沒有好感的高加索臣服部族的幫助，开辟了一條新商路。這條商路連接那在帕提亞東疆之外，即近代土耳其斯坦地方的橫斷大陸的干路，沿着里海南岸以達現在的巴庫；从那

① 即阿姆河。——譯者

② 麥琪(D. Magie)，《年報》，美國歷史學會，1919年，第1卷，第302—303頁。

里起有两条可进行远东貿易的不同路綫：一条是直接穿过海峡(需五天)，上行庫尔河流，到达黑海各口岸：科尔奇斯、非息斯、戴奧斯邱里亚斯(近代的伊斯庫里亚)；另一条是向西南上溯阿拉克賽河，下航幼发拉底河上游，达以得撒及撒摩撒达，乃至叙利亚。这两条路綫都是繞过帕提亚所控制的範圍的。

这两条路綫中的第二条路，进入叙利亚境后即和別的路綫相归并了，可是第一条路成为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条商路。由于这条商路，上述的尤克辛海各港口遂一跃而成为商业上的很重要地方；而这些港口的古老的历史可以远溯到耶孙和金羊毛的故事^①。科尔奇斯城建造在一个三角洲上的，在尼祿时代有着一百二十条桥梁。在戴奧斯邱里亚斯城，有着一百三十个翻譯員，来帮助处理那使用多种言語的交易。据說，在那里所講的語言和方言达三百种。这些港口的剩余品是运往特勒比遵德去的。

在羅馬帝国的最盛时期，远东和西方間的商业关系比以前所認為的还要扩大。由于近代学者的研究，增加了一大批的資料。卡尔·馬利·考富曼教授說过下面一段話：

那幅显示公元 100 年时中国、印度和羅馬間的交通路綫地图(刊登在来比錫大学比較宗教研究院 1922 年“会报”里)，有力地証明了：在那个时期全世界的相互交通已有高度的发展。普通讀者会惊异地看到欧亚間所存在的稠密的道路网，——特别是那些位于緯綫第十和第十四度之間的大批平行的貿易通路，以及那些在埃及和小亚細亚和索格狄亚那、巴克特里亚、根达拉和馬拉巴下行海岸之間的很多連接路綫。除了这商队路网和海路以外，这幅地图还指出：象印度河这类河流在那个时期的世界貿易里會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②。

^①按希腊神話。耶孙(Jason)是伊孙(Aeson)的兒子，爱奥尔卡斯国王比立阿斯(Pelias)的姪兒。比立阿斯为了使他不登王位，曾命令他去求科尔奇斯国王厄伊提(Aeetes)所藏的金羊毛。——譯者

^②《法兰克福周报》，1922 年 6 月 12 日，轉載于《活的时代》。

耐人玩味地指出，羅馬在這方面的努力，在中國不是沒有人知道的。那個時候，中國在西亞的邊疆，遠遠地超過它的現時的邊疆，確然包括了蒙古，並曾伸展到俄屬土耳其斯坦。雖然中國對地中海世界的知識，尚屬模糊，但是這“天朝帝國”却也曾約略知道羅馬的。中國史籍告訴我們，公元 97 年時甘雲出使“大秦”——在中國史上這個名詞是指安提阿的。但是這使節到了波斯灣，不再前進。他向西續進的企圖，也許會受到帕提亞商人的阻撓，因為阻止羅馬帝國和中國間的直接交通是對他們有利的。據中國史籍的記載，“大秦國王〔就是，羅馬皇帝〕一向希望派遣使節來到中國，但安息人〔帕提亞人〕愿和羅馬人進行着中國絲綢貿易，正是為了這個原因，羅馬人到中國的交通路線被隔絕了”。

但是，帕提亞的這種壓制外交，在第二世紀遭受了部分的失敗，因為馬卡斯·奧理略曾打敗帕提亞，并把塞琉細亞和特息丰化為灰燼，並且那失去了的美索不達米亞省也被克復了一部分。公元 166 年時，中國史籍上會明確地提及一個羅馬皇帝的名字：

至桓帝延熹九年^①，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②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③

毫無疑問，這個叫做“安敦”王者，便是羅馬皇帝馬卡斯·奧理略·安東尼那，但是，不可能斷言：這是否一個中國的正式使節，或冒用天朝皇帝名義的一個中國商人集團^④也不能確定，“陸上羊腸路”，究竟被利用到若何程度，但有一本中國史——《後漢書》^⑤寫

① 公元 166 年。——譯者

② 即越南。——譯者

③ 《後漢書》《西域傳》。此處作者系轉引自柏立（Bury）版，吉本（Gibbon）：《羅馬帝國衰亡史》第 4 卷第 535 頁。——編者

④ 按照事理，這裡應是：“……這是否一個羅馬的正式使節或冒用羅馬皇帝名義的一個羅馬商人集團”。——譯者

⑤ 宋范曄撰，今本共一百二十卷。——譯者

于第五世紀，曾提及一条“飞桥”，那可能就是幼发拉底河上那条有名的崔格馬桥。这一本历史还提及了一些东方和西方間的貿易品，例如，宝石、玻璃、絲綢和染料、香膏及其他藥品。又中国史上多次提到安提阿，叫做“安都”。

在羅馬帝国内完全的自由貿易是沒有的，因为有着許多关稅勢力圈；在它的边界上，征收那叫做“轉口稅”的內地通行稅，另外对食品，大多城市还課以入市稅。这些关卡有的比羅馬还要古老，特別是在东方的。每一个关稅勢力圈不是由一个省构成，而是由毗連的几个省集合起来的。稅率也不一致，一个关稅勢力圈和另一个关稅勢力圈各不相同，从 2% 到 12% 不等，后一項稅率起初是对奢侈品征收的。由于所掌握的資料太不充分，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这些关稅勢力圈确定下来。我們所可知道的，有意大利、西西里、高盧(包括两个日耳曼省在內)、不列顛、多瑙河各省(連同伊利里亚)关稅勢力圈。小亚細亚决不会是一个关稅勢力圈。事实上，亚洲、俾斯尼亚、本都、帕夫拉哥尼亚諸省，各自成为一个关稅勢力圈。关于非洲各省怎样集成关稅勢力圈，我們不知道，关于巴尔干半島、或希腊或叙利亚的关稅勢力圈，我們也一无所知。跟着帝国貧困的增长和賦稅負擔的加重，轉口稅率变得越来越大了。到第四世紀那不折不扣的 12% 稅率变为到处实施的稅率了。

現在，我們从羅馬的商业历史轉到它的工业历史。在这里，使我們立刻感到惊奇的，是在羅馬工业世界里行会組織的普遍存在。在这方面，本没有什么新的或特殊新穎的东西，因为屬于同行业手艺人 and 手工业者組織的团体，在古代已是一个寻常事件。然而，重要的，应指出这种組織的基本目的是社会性的。我們沒有資料来証明：它們象中世紀行会那样，供給学徒以技术訓練，或者象近代工会那样，力图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等等。的确，这类事情在古代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当时很多工业是由奴隶劳动来进行的。因

此，羅馬行會在工業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它們是由社會下層分子所組成的地方社會；象近代的“互助社”和救濟會一樣，旨在聯絡會員間的感情，辦理救濟事宜。他們援助病人，遇到死亡事件，進行適當殯葬。他們通常是在廟宇的庭院里集會的。只有極大的行會才能自設會所。這類行會往往有一個“贊助人”，就是，一個發財的會員，他為了充任會長的榮譽，願負擔一所會場的開支。所有的行會都侍奉一個神或女神，作為守護神，正象中世紀行會侍奉它們的“保護聖”一樣。它們也有各種職員，以及一種入會儀式。從銘刻里可看出：在帝國時代，羅馬城內，有八十種不同的行業，都是這樣地組織起來的。其中船員行會，即內河船夫行會，勢力最大，組織性也最強。在它們安分守法和不“玩弄政治”的條件下，政府對它們從沒加以麻煩，甚至幾乎不予以注意。只在小亞細亞幾個手工業人口眾多而又有高度技術的城市里，我們才可找到工人騷動和工業罷工的例子。

但是，在第二世紀，可看出政府的政策已有轉變。政府見到管理那些和國家應有關係的職業，可獲得經濟上的利益；例如，製造武器、製造軍事供應品、造船、運輸、食品生產和流通。圖拉真曾組織麵包工人行會，哈德良曾組織國家監督下的水手行會。在作為皇室大部收入來源的皇室領地上，各類工人都迅速地在國家控制下組織起來。

到第三世紀，另作出一種政策上的改變，那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甚至性質上是革命的改變。由於稅收的減少，課稅已成為政府的一個極端擔心的事件。它提高賦稅率，設計新賦稅，並設立新稅局。在卡拉卡拉時代，可能對若干種行業已經徵稅；但是，到亞歷山大·塞弗拉斯的時代（224—235年），一切手藝和行業被強制地合併起來，放在國家的控制下，而行會本身也成為一個課稅單位。各行各業包括有裁縫、各種紡織工和金屬匠、毛皮工、皮革匠、馬鞍

匠、制陶工、面包工、挑夫、碼頭工人、船貨裝卸工、木匠、石匠、小販和商人、旅館管理員甚至妓女。後來，戴克里先制定一項法律，要求每個城市對所有的這些職業進行登記。

根據課稅的各類對象，給予它們各色各樣的名称。但是其中最通用最普遍的，是“金銀稅”（Chrysargyrum）這一名称；它從希臘文金銀兩個字得來的，因為這項稅須用貴金屬來繳納，不象很多別的羅馬稅那樣，可用實物來繳付的。此後，政府管理了金銀的供應，規定了工資、價格和工作鐘點。它是羅馬後期一種最苛重、最失人心和最有害性的賦稅，因為它幾乎全部落在負擔已重的中等階層身上；毫無疑問，它是促使這個階層最後消逝的一個因素。500年時皇帝阿那斯塔細亞撤消了“金銀稅”，但是，到那個時候，它的壞影響已經表現無遺了。只有做小販的退伍兵士和教士階層是被豁免這項稅的，基督教在得到承認後，基督教僧侶也列入教士階層。

國家管理只要再進一步，就可實現政府在工業上奴役羅馬世界了，果然這種情況不久就出現。這就是那使一切手工業變為世襲的一種臭名昭著的法律，規定兒子必須繼承父親的職業。再也無法想像有比它更有效地壓制創造力和摧殘天才的辦法了。一個裁縫或一個馬鞍匠的兒子，不管有多少理想力和藝術的或文學的才能，被註定要固守他父親的縫針或鑽子，一個陶工的兒子被束縛於他父親的輪盤。只有法律、醫藥、教育、美術，各種“自由”職業則不在此限。這是在中世紀和近代中機械藝術和自由藝術區別的起源。

在第五世紀中，由於工資的低微、工作時間的久長、賦稅的苛重，或在職業上沒有興趣，有成千累萬的人放棄了自己的職業。他們從原住的城市，逃往別省去，甚至逃入邊疆上蠻族中去。高盧總督曾奉到一項指令，里面有下列一段文字：

凡是失掉了正当服务的社会，就失去了它們过去出名的繁华景象，特别是那些有很多行会人員离开的城市；这些人寻求乡村生活，隱匿于祕密荒僻的地点；但是，我們已以下列命令阻止这种勾当：不管世界上什么地方，所有被找出的逃亡者，概須强制他們回到原来的職位，不得有任何例外。

从上文看来，显然，商业和工业在羅馬帝国文明中已是重要的經濟和社会現象。然而，从範圍、生产和影响來說，农业的重要性則还要大得多。

我們現在的土地租賃形式、耕种方法和农村經濟制度，是从各种實踐方面得来的混合物，从羅馬帝国的羅馬人，从那些第四第五世紀侵入羅馬帝国并定居于帝国境內的日耳曼族得来的。在羅馬共和国的早期，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时（公元前 201 年結束）止，羅馬人主要是牧畜牲口的“民族”。在这时期，农业还是在簡陋的未发展的状态。大批猪群在广闊森林里寻食果实；牛羊在夏季里放牧于草地，而在冬季里則飼以干草和树根；所产谷物，仅足供制面包之用。羅馬人民的骨干部分，是由自由农民階級构成的。貴族，就是一个地主紳士兼軍官的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府。但是老百姓，除了每个自由人須担負軍事服役外，还不觉得政府压力的沉重。奴隶是很少的。种田被認為是一种荣誉的职业。新新納图抛弃犁鋤从戎，成为当时代的一个最偉大的將領，象在美国革命时期中帕特南那样；新新納图的这一故事，表明了这个时代有着朴素和民主的风气。农田是划成小塊的，由所有者和他們的兒子，借助于几个奴隶来耕种的。老伽图說过：“我們祖先，贊揚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頌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这样称頌的人，認為是获得了无上光荣。最强壯的人、最不畏縮的兵士，就是来自农民間的。”

但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紀里，意大利曾发生一个深刻的經濟革命，大大破坏了簡朴的农民生活。羅馬在公元前 200 和 146 年間，

征服了希臘，也在公元前 146 年滅亡了迦太基大帝國；於是，一些富庶的省分歸并於羅馬的版圖，在那里已有好幾百年流傳着高度發展的耕種方法。羅馬遂迅即向它所征服的敵人學習這種方法。

羅馬元老院命令迅速把迦太基人美哥著的有名農業論文譯成拉丁文。老伽圖，即著名的監察官，曾勸告羅馬農民應用書中所述新方法，而他也親自編寫了一本農田管理手冊。這是羅馬農業叢書中的第一本；這類叢書是論述耕種、畜牧、培植水果、修剪葡萄藤、養蜂等等的。結果，羅馬土地所有者，從那時起，試驗了更精細的種田方法，把有技術的農夫、種葡萄者及花園匠輸入意大利，還有牲畜的改良種和水果蔬菜的新種。研究土壤和種植及採用施肥、排水方法，跟建造優良谷倉及別的田間房屋同時並舉。

在共和國最後百年及在帝國早期中，我們可找到其他農業作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瓦魯、科琉麥拉和帕雷狄阿斯。瓦魯所出生的村莊，就是，後來詩人賀拉西所有的著名“薩平田園”的所在地。瓦魯屬於前一輩人，生活在凱撒和龐貝的極盛時期。在這兩人的內戰里，他是擁護龐貝的，但在凱撒勝利後，他很幸運，得被赦免。後來，他獲得了凱撒的嗣子和繼承人，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保護，從此以後他遂專心於研究工作了。他的學識很淵博，也許他是古代最多產的作家。他享年九十歲，根據他晚年自編的目錄，他曾寫成七十四種大著作。他所研究的領域，包括有歷史、修詞學、地理、科學、法律、教育、戲劇等。

在他的大量作品中，只有一本文法書及“農業論三卷”得流傳下來。後一書是在他八十歲時，用對話體裁寫的。第一卷講述耕種方法，第二卷講述牧養牲畜，第三卷講述養家禽和養魚類。但是瓦魯與其說是一個農夫，不如說是一個文人，他象許多富有的羅馬人那樣，喜歡他的田莊，因而有着關於田園管理的實際知識。但是，他對田園生活的興趣，在於避去那個喧擾熱鬧的首都，和自然

界接触,享受一个簡朴生活。上述的著作是关于农业的漫談,而不是关于实践的农业書。

作为一个农业作家論,科琉麦拉比瓦魯高明得多。他是一个羅馬化的西班牙人,在公元第一世紀出生于加的斯附近。父亲在他的壮年的早期去世,傳給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庄园;在耕种这些庄园方面,他非常感到兴趣。他不但勤勉地研究当代的一切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論文,而且亲自远遊各地,以求新的知識。西班牙在古代以及在中世紀是以养羊业出名的,而科琉麦拉对改进本地伊伯里安羊种特感兴趣,把从非洲亚特拉斯山区輸入的螺角羊和本地羊交配。根据有些作家的記載,他为了購買著名的叙利亚种的牡羊往叙利亚去,就死在那里。他的《农村論》凡十二卷,就是他的辛勤研究、到处旅行、实际观察和实验的結果。幸运的,这書能完整地流傳到今天。他是以优美的文笔和专门的技术写成它的;有时夹杂以輕松的哲学說教,因为科琉麦拉是向往于“誠朴的古代”,而歎息于当代增长着的奢侈虛伪风气的。例如,他說:一个土地所有者从他的庄园上租戶和奴隶所得的服务,比来自外地的租戶或購自远方外国市場的奴隶所得的还多。科琉麦拉对于中世紀的寺院田庄,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作家帕雷狄阿斯,可能約在公元 400 年时出生于高盧的波亚蒂尔。他曾著农业論十四卷。其中主要部分(第 1—12 卷)是依日历或历書形式排列的,依次講述各接續着月分的工作。他广泛应用古人的著作,特別是科琉麦拉的論著和迦太基人美哥的拉丁論文譯本。然而,另一方面帕雷狄阿斯却是一个开辟了新基地的羅馬作家,因为他大量利用希腊的农业专著。可惜他对引用这些資料,一般仅仅注明引自“希腊作者”。只有一个例外,即指明那由叙利亚的貝魯特·阿那托力奧斯所写的一本农业手冊。帕雷狄阿斯的論文由于編制上的实用性和說明上的簡明性,成为中世紀

人們愛讀的一本書。

羅馬元老院成員或特權貴族，由于法律禁止他們參與貿易的結果，遂變得過分重視了土地的占有。另一方面，他們却使用了間接的辦法來規避這項禁止參與貿易的法令，就是，使用一個靈巧的奴隸或自由人來代做生意。這說明了為什麼商業活動幾乎全部落在自由人手里。“發財要象自由人”曾是一句諺語。很多“新富”是屬於這一自由人階層，他們升任政府的高級官職，象克勞第烏斯時代的帕拉斯、象尼祿時代的那息薩斯。帕特洛尼阿的諷刺詩，“特立馬喬^①的宴会”，是針對這批暴發戶的一種譏笑。在尼祿時代以後，羅馬帝國開始把重要的行政官職委任給自由身分的人，特別是騎士階層。但到哈德良時代。國家所有的高級官職除了財政官職以外，幾乎完全不復由自由人來擔任。然而，他們還是繼續在行政機關內和法院內充任下級官職，但是他們必須和一大群外省人相競爭着，特別是和希臘人和敘利亞人。克利安得是在後期自由人中享有煊赫政治勢力的唯一例子；他在科馬杜斯時代，擔任過判官長（公元 192 年）。

奴隸制是一個重要制度。我們雖可有力地爭辯說在早期羅馬，從需要粗勞動的經濟觀點來看，奴隸制有它存在的必要，但這却並沒有否認了：在帝國時代，它是一個有害的因素。羅馬人從最早時代起，就有着奴隸，但起初奴隸的人數是很少的。在早期，羅馬農夫在種田時，除自己的勞動以外，很少需要別人的勞動；有幾個奴隸就綽乎有餘。下列四項原由，促使奴隸人數日益增加着：（1）農民被迫放棄耕種和大地產占有制的增長，帶來了由奴隸勞動來開墾土地的方法，奴隸勞動比自由人的勞動高出一籌，因為奴隸是不擔負軍役的，并可被迫無間斷地工作着；（2）奢侈風氣的增長，把大量新

① 特立馬喬(Trimalchio)是一個有錢而無風趣的暴發戶。——譯者

的需要引入羅馬生活里,而其中很多是需有奴隶的劳动来滿足的;(3)在制造业中使用奴隶日多,這項慣例在东方原早已存在,但在羅馬,却只在共和国历史的后期才被采用;(4)最后,奴隶人口的繁殖,由于需要奴隶来做的經濟工作的增加,由于立法改进了他們的命运,奴隶人口的增加也越来越多了。

奴隶分成为两大类,即城市奴隶和乡村奴隶;前者是屬主人的城市产业的奴隶,后者是屬主人的乡間住宅的奴隶。这两类的奴隶按照他們所做的职务的性質,各可再分为各种类别。一个希腊人說過:羅馬人的富源在于农业,他們比希腊人較少需要使用奴隶于工业方面;这句名言在羅馬帝国时代已不复适用了,因为当时我們可看到大批奴隶在矿井里和石場上,在造磚場和玻璃厂工作着,也有充任織工、染匠、漂布工、婢僕等等。农业愈衰落,資本愈多流入开发工业方面而城市奴隶的重要性也愈提高了。占有奴隶就是投資,而小农逐漸被迫得走头无路。那些被剝夺了土地的农民中,富有冒險性的,往往不顧一切地移往別的省去,特別是移往边境上新省去;但是,很多人听天由命,流入城市里,在那里他們变成富人的扈从食客,或者淪落于城市中日益增加的游民群里,靠公共救济来糊口,靠浴場和馬戏場来消遣。貧困的农民要找寻工作,甚至当个僱工,也越来越困难了。那反映公元第一世紀末期情况的《新約全書》指出在巴勒斯坦也是这样的,而巴勒斯坦是由农民居住着,那里經濟和社会結構比在其他很多羅馬省,要簡單得多。馬太福音第20章:第3、第5—7行里,曾提及有工人閒着站在市場上,等待被僱傭;西比太在他的加黎利海上的漁船上有着一队僱傭的船員,象希腊字“Misthotoi”所指出的那样(《馬可福音》第1章:第20行);一般講,在《新約全書》的时代僱工已不复被重視了,——“僱工逃走了,因为他是一个僱工”(《約翰福音》第10章第13行)。

使用奴隶来开垦土壤已成为日常事件。业主的农田,有时范

園广大，包括几千亩，由一个监工来管理，而监工本人往往就是一个异常聪明的奴隶，他监督着几百甚至几千个奴隶工人。G. C. C. 以西多勒斯死于公元前 8 年，他在遺囑里，在叙述他因这世紀的内战而遭受了巨大損失之后，还傳留了四千一百十六个奴隶，三千六百对牛，二十五万七千头其他牲口。另外还有一笔約合二百五十万美元的現款。大田庄上的奴隶的命运是苦恼的。他們不在田野劳动的时候，被關閉在奴隶大营里；他們的工作時間是长久的；他們被监工的皮鞭赶去做工。因此，他們中間死亡率很高，但是，奴隶市場繼續由羅馬的战争所获得的俘虜来补充着。下面一句話几乎成为早期羅馬农业經濟上的格言：与其厚待奴隶，宁可使奴隶劳碌到死，另买一个新奴隶，較为合算。庄稼的价值比人还大。伽图屬於这种硬心腸、辣手的功利主义的类型。对他來說，奴隶只不过是—只很聪明的牲口，而他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奴隶的。

大土地占有制大量地增加着，特別在意大利和非洲。对这改变了的情况，小农是无法进行竞争的。他負担着軍事服役，而富裕的土地所有者能驅使他的奴隶不断地工作着。大农比他能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場上出售牲口和农产品。結果，在相当时期以后，独立的小农被迫得无路可走。起初，他不得不把自己的部分田地抵押，最后，須把全部抵押了。一般說，抵押的經手人把抵押品售給附近的大地主，而后者正急切地想要增加他的田亩，好几年来本已垂涎于他邻人的小塊田地时机終於来到，当那些独立小农从他們祖傳的田亩上被逐出的时候，这些田地就又扩大了大地主們的已經很龐大的地产。拉丁文著作里，有很多关于这弊病的怨言；当时的思想家已看到这是正在侵蝕着国家的元气。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按羅馬共和国最后一世紀的奢侈标准来判断，西塞罗过着朴素的生活，但是，他所拥有的一座宮殿，連同地基在內，使他花費了約合四十八万多美元的錢。自由农民阶層，即作为每个健全社会骨髓

的中等階層，逐漸被消滅了。但是，有些開明公民所提出的抗議，完全無效。政府是由富有的資本主、政府承包商、隨軍酒食商以及有錢地主所構成的寡頭政治控制着。他們對這些抗議不予理會。羅馬史家阿匹安曾生動地描寫這一項農業危機。

這項土地壟斷的弊病遍及整個的羅馬帝國。儘管法律上限制大地產的占有不得超過一定的面積，但是大地主們用分散大地產于各省的方法來規避這項限制。第四世紀的一個作家A. 馬塞里納在他的《羅馬史》第27章第11節第1段內寫了一句名言：“世襲地產遍布世界”。這一句話是針對判官長S. P. 普洛巴斯說的。另一個擔任同一职位的辛馬奇斯，在羅馬城內領有三座宮殿，並在鄉村里領有十五所田莊。我們不知道它們的規模怎樣，但是它們的總數一定是龐大的，因為他每年的收入估計達九十萬美元的价值——而當合法利率在12%的時候，這已盡了一個人所能搜刮的能事。這種弊病，在中意大利、非洲和高盧最大。象上文所說，在尼祿時代六個業主占有非洲省內耕地的半數。據弗倫提納的記載，在尼爾華（死於98年）時代，非洲的私人地產和城市的領土同樣大小。

這些大田莊有時包括整個一郡，而它們的領主以私人資格，行使着過去地方政府的行政職權。地方政府和莊園政府已變為一而二，二而一的，都是在富豪的手里。政府的合法形式，只在理論上繼續存在着，而實際上已被代替。到第五世紀，帝國已變成為一個空殼。它昔日一度強大而集中的主權已經煙消雲散，而分裂成一群有勢力的私人土地所有者；他們執行司法、征集賦稅、維持公路（當公路還在維持的時候），甚至由於情勢或幻想的需要，隨心所欲地發動戰爭。一句話，封建制度上台了。

近代法国的地方名称，还証明了第四、第五世紀這種情况。奧俾內是從一個羅馬貴族名叫阿爾俾那者得名，而這個城市的雛型，

就是那些在第五世紀中聚居在他的广大的世襲領地上的居民形成的。索力那克是从一个名叫索倫尼斯者得名；弗勒里是从一个名叫弗洛拉斯者得名。这些領地的大小一定是不等的。但是，甚至当时認為是小領地的，今天我們看来似乎已是够大，而那些“大田庄”則一定是大得可觀的。在第四世紀，有一个富裕作家，記述了他在南法所領有的一个“中等”世襲領。在他的眼光里，它还是不够大，可是它已包括有四百亩谷田、一百亩葡萄园、五十亩草地和七百亩森林地。当日耳曼人进入羅馬帝國的时候，西方羅馬世界的情况便是这样。这种流行的状态，是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东哥特人在意大利、汪达尔人在非洲、法兰克人在高盧所看到的。他們自己的土地所有形式及他們自己的耕种方法怎样来改变这种制度呢？羅馬怎样来影响他們呢？这些問題，在另一章內將給以解答。

到第五世紀日耳曼人开始侵入帝國的时候，土地壟断的弊病已非常严重，实际上一个有势力的地主貴族階層已經占有整个帝國的土地。自由农民和自由手艺人差不多已經絕跡。他們已淪为世襲大領地的农奴；他們住在那茅舍密集小村里，这些小村往往是和大庄园上奴隶“区”毗連着的。这些奴隶在一个人監督下，成群結队地耕种那庄园里的原有的土地。至于其他部分的土地則由农奴耕种。这种土地是从繼續圈圍附近抵押出去的以前的自由田庄而得来的。換句話說，农奴原是自由农，虽丧失对自己土地的产权，但仍准予留在原地上作为佃戶，来替大地主工作。但是，农奴是一个永远不复能回复其自由的佃戶。按法律理論來說，他的劳动，便是地主所勒索的“地租”。过去这块土地原是他所領有的，現在它已变成地主的产业，而地主已变成他的主人了。用成語來說，他是“被束縛于領地”；因为他受到了永远还不清債務的束縛；他虽繼續以劳动来支付債款，但他是永远不能还清它的；因为債務积累的速度赶上了他以工作来偿付的速度。农奴，如果逃亡的話，可加

以逮捕，押回受审，作为逃避債務論罪。又如果他被判有罪的話，那么，他就完全失掉其自由，而淪为一个奴隶，因为他既然一貧如洗，拿不出分文，就应出售其本人来繳付罰金。在这样的情况下，逃亡农奴如果能以受到痛打而过关，則已是幸运的了。

农奴或甚至事实上的自由人，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常逃到日耳曼人，甚至匈奴人中間去。448年时，有一个由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派遣到阿提拉那里去的使节，在多瑙河外的地方曾遇到这样一个逃亡者。关于他們間談話的紀錄，值得閱讀玩味：

“他認為，他在匈奴人中間的新生活，比他在羅馬人中間的旧生活还好。羅馬臣民在和平时期的境遇，比受战禍还更痛苦，因为勒索賦稅凶猛得很，又因为法律实际上不是对所有的階級都生效的，所以，不法之徒胡作非为。富人犯罪不受处罰，而穷人犯罪則蒙受刑法制裁。”

除了上引文字以外，我們可举出一百年前另一个作家的話，來說明同一事情：

“多数人受少数人压迫。除强者以外，誰也不能逃避这批盜匪。穷人遭劫，寡妇嗟歎，孤兒受苦，終于很多出身名門的人，也逃亡到我們的敌人那里去了。他們因为不能容忍羅馬人中的野蛮人性，想在蛮族中找寻羅馬人性。”

概括說来，在第五世紀的开端，整个西欧是由有势力的地主貴族控制着的；他們占有着有时是毗連的，但多半广泛地分散的龐大世襲領，它們由两类劳动者，即部分是奴隶，部分是农奴来耕种。由于这些轉变，人口的移动，在总数上是很大的。商业和工业的萎縮，使城市人口减少。农业乃成为主要的，差不多独一的生产形式。財富是由土地来代表，很少由別的东西来代表的。跟着城市的衰落，乡村中兴起了很多由住在大領主的大庄园上农奴和奴隶构成的新社会。所有的大領地漸漸变成为一个私人业主手中的地方政府的单位，因而把合法的政权抹去了。

然而必須指出，即在后期帝国的最坏日子里，也从沒有过一个自由农或自耕农全部消逝的时期。毫無疑問，在羅馬城的郊区，小业主早已被排挤，同样可断言，坎佩尼亚及大部分南意大利已变为大地主領地，但是北意大利的一部分則沒有发生这种转变。它还保存着大量的小农。大地主領地的弊病曾被很多历史家夸大。对过去总括性的論断，我們必須审慎接受。“大地主領地”(latifundium)这一个名詞是一个相对的名称。这大地主領地制度在非洲及东方各地，在羅馬征服之前，原已存在。在有些地方，大地主領地的形成，並沒有把农民阶層挤出，而这种制度，和象在拉丁姆、伊特魯立亚、坎佩尼亚存在的性質迥然不同的其他大地主領地制度，繼續在羅馬世界里并存着。羅馬作家所特別引为悲痛的，是意大利的大地主領地制度，可是他們並沒有看到那些起源不同、性質也异的其他大地主領地。在高盧、非洲及其他省內，虽然大地主領地起着巨大作用，但我們无法准确地决定它的規模。但也有理由相信：各省的大地主領地和意大利的大地主領地，在性質上是大大不相同的。在有些省內，大地主似乎已从农民征收劳役或实物，和封建貴族一样。举例說，在高盧，羅馬貴族很巧妙地变换了旧的土地所有权，使农民阶級几乎沒有觉察得主人的变动。这类情况，也許在意大利的若干部分，特別是在北部同样存在着；这些农民，毫無疑問就是普林尼所說的“隶农”(coloni)；他們是以实物繳租，并以自己的工具来耕种土地的。

我們在羅馬历史和法律文献里，可看到各种描写一塊大地产的名詞。这些名詞，虽是同义的字眼，但它們的含义却是不相等的。如果說这财产在种类上沒有什么重要的区别，那么它們的經濟和社会条件却是大大不相同的。“世襲領”(patrimonium)是由几塊土地或者往往散布各地的田庄合并而成的大地产。一塊单独的土地，叫做“地产”(fundus)；它只包括着一組房屋以及附屬于它們

的土地；“林牧地”(saltus)是一片牧場，或一片森林地或未開墾的土地，其中可能包括或不包括一些農田。在包括農田的場合，它常常也叫做“地產”(fundus)；“莊宅”(villa)這名詞原來指業主的鄉村住宅或莊園別墅，後來，還用以指整個地產。到第五世紀，鄉村住所經常包括了三個方面：孤單的農場、附屬的小村及莊宅。“莊宅”這個詞可以同樣適用於而實際上是適用於後兩者中的任何一方面。一個不附土地的莊宅叫做大“建築物”(aedificium)。“小村”(vicus)這個名詞是有伸縮性的；在城市里它意味着一條街道，或一個街區；在农村里它意味着一個村莊；按後來的用法，它已很少用來指示一個鄉村的大建築物，因而已變成等同於“莊宅”一個名詞了。

羅馬皇帝在帝國中是一個最最大的地主，他在各省中幾乎都有地產。就埃及來說，那整個國家是屬於皇帝的財產。其中有些財產是跟着共和國的傾覆，移轉給帝國的；另一部分是从朱理安族龐大遺產的捐獻得來的。阿古利巴（他的妻子是奧古斯都的女兒朱理雅）所領有的廣大領地，在他死後，就移轉給皇帝。在每一塊新征服地上，一部分領土是為皇室保留的；所有的沒收、充公和歸公的土地也使這個皇室領地的數量增加着。整個說來，皇帝的領地，叫做“皇室財產”(res familiaris)或者“國庫財產”。有幾種財產，按其性質，是應屬於國庫的，例如礦地、石場、鹽井、廣闊森林地帶。帝國政府把帝國內重要的自然資源握在自己手裡。但是，它也把大量的井差不多包括每一省的麥田、農場、橄欖園、葡萄園等等，都歸入國庫財產之中。皇后利維亞領有巴勒斯坦的四個城市，其中之一便是亞實基倫。

所有上述的領地，是在皇帝的支配之下，他專設一個行政部門來管理它們。其中有些領地，是直接管理的，其他領地則租出去，或分成幾部分承包出去，但如果我們認為從這些財產所得的大量

進款，完全是私人的收益，那會是一個錯誤了。它們却是和近代君主國家中為了贍養王室、維持法院和支付文官俸給的撥款相同。英王的一部分收入是從康華爾直轄公領得來的，而這公領是一個王室領地。只有壞皇帝和揮霍的皇帝會濫用那些從皇家領地上所得的進款的。第一世紀中，加力古拉、尼祿和維特力阿斯的揮霍，使我們明白為什麼維斯帕西安要實行節約而變為吝嗇；公元69年他登極的時候，據說，國庫已亏空了四千萬。維斯帕西安所節省下來的，後來由多米蒂安花費光了。在第二世紀，安敦族的開明皇帝的時代，皇室國庫財產的管理，是又廉潔，又有效能，而且又可得盈餘。可是，其中大部再次被科馬杜斯和卡拉卡拉揮霍一空。從第三世紀開始到羅馬帝國的結束時止，帝國的財政狀況經常是在窘迫的狀態中。在後來幾百年中，國庫管理跟着所有別的事情一樣，敗壞腐化。

對皇家庄園里的居民來說，所過的生活和在別處的生活，沒有絲毫不同的地方。鄉村領地上的居民，是佃農或農奴；如果領地是一個城或鎮的話，他們是商人或手藝者。但是，他們不是隸屬於政府的普通行政官吏或長官，而是隸屬於皇帝私人的管理人，即受一個代理人或管理員的管轄的。

羅馬帝國和近代國家一樣，所有的重要資源及各種財富，都須課稅。但是，在帝國後期的情況下，課稅問題變成政府的主要利益的問題。原因是很多的：行政費用的增加、物價的上漲、貨幣購買力的跌落和貨幣制度腐化、富人用特權或規避的方法來逃稅（那必然會加重那些不能逃稅者的負擔）、壟斷和不公平的競爭、資金消耗而無法節約、民眾的日益貧困化、窮人的遊蕩、生產的下降（因為生產階級，無論是農民、商人或手工業者，都日益變得心灰意懶）、社會風氣的敗壞、政治叛亂（例如有些省的僭稱皇帝的反叛，有時竟發展到好多省，並連續幾年）、農民起義、盜賊橫行、費用浩

大的戰爭(象波斯的戰爭那樣),這一切,幾乎都是毀滅性的。其中有些因素,是非常複雜的,往往連什麼是因,什麼是果,也不易弄得明白的。

古代政府很少理解那經濟和社會勢力的性質或作用,雖然近代政府也不見得在這些方面,可夸耀已有了多大進步。但是,如資本、信用、消費、價值、分配、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流通、膨脹、間接稅、不勞而獲的增值、服務工業這類經濟名詞,甚至工業這個簡單名詞,會使一個羅馬人覺得莫名其妙。拉丁文不能表達由我們看來似乎是簡單而熟悉的經濟過程,那是由於羅馬生活比現代生活簡樸呢?還是由於思想上的貧乏和經濟上的缺乏見識呢?“米爾西斯”(merces)這一個詞,在古典拉丁文中按上下文的語氣可指工資、地租、房租、利息、價格。“利第脫斯”(reditus)這一個詞可指公共的收入,也可指私人進款。塔西佗創造了“公共進款”(reditus publici)這一詞以區別於“利第脫斯”(reditus),他前進了一步。

上文已提過,賦稅負擔的加重在後期羅馬帝國,——可以說從公元 200 年時起,已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我們也已談過一些關於工商業的課稅問題。現在我們應該稍為詳細地討論着羅馬帝國的課稅這一個題目,特別是關於土地稅問題,因為已提過,農業構成了羅馬帝國財富的主要泉源。

按廣義,羅馬賦稅可分成為兩類,即直接稅和間接稅,儘管羅馬官吏是不會理解這種區別的。主要的直接稅,是人頭稅和土地稅:前者是向一切沒有羅馬或拉丁公民權的臣民征收的。在皇帝的省分內(因為那些省分是屬於皇帝獨一的管轄權範圍),土地稅是按年產的一定比例額征收的;在元老院省內,土地稅是每年向各省社會所課的一個規定的總額。主要的間接稅,是關稅以及第三世紀起所征收的“金銀稅”。這兩類稅,上文已經說明過。此外,另有較少普遍性的間接稅:一種 1% 的售貨稅,一種奴隸釋放稅,一

種只向羅馬公民征收的5%的遺產稅。其中好多賦稅就是征收所課稅的實物，如屬動產，則征收所課稅的財產，雖然征稅吏所作的收稅報告里，這些課稅是以貨幣數字來表明的。甚至連在埃及，也是這樣，在那里，征收了琉璃、紡織品、紙張等等，並在出售以前，把它們堆儲于政府倉庫之內。

羅馬帝國對其臣民，要求擔當若干種義務性的公共服務。這些服務，叫做“公役”。其中最苛重的，是在各省內及各城市內須要維持驛站，即帝國郵站，就是說，須要給養信差用的和馱物用的馬匹以及騎師、馬夫、廐丁，另外，還須招待那些往來的官員。其他強制性的義務是：“賞金”^①和“獻金”；前者在理論上是一種自動的，而實際上是一種強制的捐款，每隔五年從城市官吏，征集一次；後者是一種相類的稅，加在帝國的元老階層身上，實際上，就是加在大土地所有者貴族身上。各省的元老階層，和羅馬城元老院，沒有什麼相干。其中很多人，從來沒有到過羅馬城。元老的头銜，到第四世紀，已成為一種社會尊嚴和貴族地位的標志；它是大地產占有制的表面象征。總起來說，土地稅，是由土地所有者階級來繳納的，工商稅是由中等階級來繳納的，人头稅由下層民眾來繳納的。但是，這畢竟是一個外表現象。因為賦稅的負擔歸根到底總是回到人民大眾的头上去的。地主階級可把加在他們身上的賦稅，或以增加地租的形式轉移到他們的佃戶方面去，或增加對農奴和奴隸剝削。至于商人和製造家，他們可把售給消費者的貨物抬高價格。

無可否認，羅馬帝國，就征稅方法來說，是不科學的，是粗糙的。例如，一個礦場的價值，是按它所僱傭的礦工數目來作估計的。又如一塊土地是按它的面積來課稅的，至于土壤的肥瘠，耕種

① 賞金(aurum coronarium)是各省獻給勝利將軍的。——譯者

的难易,或位置的优劣,都不加以考虑。

羅馬帝国从第三世紀起开始逐漸衰落,并接連不間断地衰落下去直到灭亡(其中的原因和过程,我們将在下文再談),这种情况使課稅問題,越来越被推到前台了。政府靠課收新稅来弥补国庫的經常亏空;同时,把旧稅,更加推广开来,象 218 年卡拉卡拉扩充人头稅那样;稅率也不断地在提高着。

第三世紀的危机,使局勢发展到頂峯了。那一世紀的好皇帝,象奧理略和普洛巴斯之流,曾企图进行这种或那种改革,但是都沒有成功。直到戴克里先(284—305年)和君士坦丁(311—337年)时代,才有持久而又徹底的改革出現;他們大刀闊斧地革新了行政,使帝国得延长了寿命。意大利原是轄免了繳納稅賦的,而戴克里先把征取貢賦办法,同样适用于意大利了。這項措施除了具有經濟上的公平性以外,还清楚地标志着:羅馬和拉丁貴族所享有的特权和勢力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此之前,他們的崇高身分,由于卡拉卡拉的扩大羅馬公民权,原已降低下来。

但是,戴克里先所作的最重要的賦稅改革,在于修正土地稅。他編制了一种新的土地清丈册,并建立了一种新的課稅估价法。土地稅一向是以“牛軛”^①(这个名称是从拉丁文“牛軛”这个詞得来的,大約等于一对牛在一天內所可犁耕的面积)作为单位的。过去,政府征收土地稅,按照土地的面积,而不分土地的肥瘠的。現在,戴克里先按照不同的肥沃性、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使用方法,例如用作果园、葡萄园或草地那样,建立各种不同等級的“牛軛”单位。他还把“牛軛”单位折算为一定数目的牲口或劳动力。比如作为相等“牛軛”单位的劳动单位,規定为一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在田地上耕作的劳动。对这些改变,大土地所有者,大声叫囂抗議。这是很

^① “牛軛”(fugerum)是古羅馬量地单位,与二万八千八百平方呎的长方形的面积相当,就是二百四十呎长乘一百二十呎闊,約二十五公亩。——譯者

易理解的，只要我們注意到貴族擁有多么大的世襲領財產的時候。但是，這項制度是賢明的、公道的，而在戴克里先的時代，也是徹底實行的。

約在尼祿時代，物價的高漲，換句話說，貨幣購買力的跌落，已開始尖銳地顯露出來了。幾代以來，羅馬吸收并壟斷了那流通于地中海區的貨幣。羅馬人用剝削各省所得的萬千貨幣，建立了持久的投機方法和成功的高利貸制度。巨富的豪華生活引起了奢侈品的大量消費，而這種奢侈品的貿易，又使大批貴金屬，尤其是白銀，源源輸出國外，流入西亞、印度，甚至中國。羅馬帝國不能以相應的國內產品，來抵消輸入的東西；結果，它的貿易差額，經常是入超的。在東亞文明國家里，帝國的糧食和制造品，卻是找不到銷路的。從印度來的輸入商品，無可比擬地遠超過那些從帝國輸出到印度的東西，而當時的亞洲人，和現在一樣，是有着窖藏金銀的明顯傾向的。

羅馬金銀數量的縮減，當然也是由于羅馬人把很多金銀消耗于藝術方面，那自然是絕對非生產性的消耗。其次，那些邊境上的蠻族地區，特別是萊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地區，還窖藏或埋藏着大量金銀。到了第三世紀中期以後，金銀礦的出產已不足以彌補這項虧空了。

在羅馬共和國時代，白銀原是主要金屬。但在帝國早期，制造了金幣“奧勒斯”^① (aureus) 以及比較少量的銀幣“德那里”(denarius 即銀便士，九十六個便士合成為一鎊) 和“塞斯脫”(sestertium 或 sesterce，相等于便士價值的1/4)。第一和第二世紀里，銀便士約值十八美分。在亞歷山大·塞弗拉斯(死于235年)時代，它的價值已不到七美分了。它已含有50%—60%的雜金。因此，跟着銀

^① 羅馬金幣(aureus)有着不同的分量，而且繼續貶值；在蘇拉時代等于1/31鎊，到戴克里先時代降到1/70鎊。——譯者

币的贬值,黄金騰貴而物价高漲了。从 250 年以后,当銅币及銅錫鉛混合币流通的时候,政府乃要求以黄金或白銀来繳納稅款(即金銀稅),虽然它有时还以贬值的貨幣来支付了自己的开支。

戴克里先的貨幣改革,包括他的最高限价法律,恢复了銀便士(德那里)的信用,采用了几种新銅币,制造了一种新金币(奧勒斯)。在公元 300 年时,白銀对黄金的比价,似乎曾是稍高于 14:1。君士坦丁的功績之一,是他企图并部分地完成了把羅馬帝国币制放在金本位之上,并把那高到 48% 的利率降到 12%。可惜这种改革不能維持久远。羅馬的貨幣問題,和它的經濟和社会問題一样,已經无法解决。它的整个文明繼續在瓦解着。

戴克里先所进行的經濟改革中最著名、又最受人欢迎的,是他的所謂价格詔令(301 年);严格說来,它不是这一种名实相符的措施,而是一种最高限价的法律。這項詔令的序文中,已明白地指出說:“朕决心要規定的,不是这些貨品的价格,那会是不公道的;而是这些貨品無論如何不准超过的限价。”這項法律的原意,在于保护政府来防止对各种供应品的过高索价。皇帝抱怨地說:“由于壟断者的貪婪,朕对軍队的供应,已成为不可能。貨物的价格已增加到四倍,甚至八倍于它們的实际价值了。”但是,這項詔令所产生的效果,一定也会减少对別人,即政府圈子以外的人的勒索高价的。的确,這項詔令也列举了很多和政府沒有直接关系的許多項目、业务和商品。詔令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那些谷物、羊毛和皮革屯积商人猛抬食物及其他必需品如服装、鞋子等的价格。这詔令是否曾施行于或想要施行于整个帝国,还是一个爭論的問題。但是,历史家都同意这一点,即在实践上,它只是在希腊及帝国的东半部,获得了成效。

虽然不可能按近代貨幣來說明当时的物价是怎样,但也有理由可猜想在第四世紀中(不是按今日的条件),物价仍然是高的。关

于确定当时物价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是把詔令中所列举的各种项目，来互相比較一下。一蒲式耳^①的裸麦价，值三双多鞋子，一磅猪肉的价格等于今天二倍或三倍于一磅猪肉价格的各种制成品。由此可見，食粮价格是高的，为什么？因为种田劳动力的缺少呢？还是因为生产率的下降呢（由于土質肥沃性的递减或由于耕种方法的不良）？是否奴隶种田比不上自由人种田有利呢？好多年来，在农村里，曾否有农民流入城市的現象，使种田方面缺少劳动力呢？要是这样的话，我們又怎样来解釋那农村工資反比城市工資低下呢？那是由于奴隶和农奴的競争嗎？提出这些問題，比回答它們，容易些。这项詔令在比較城市工人和乡村劳动者时，指出，城市里的自由工人所得工資是不差的。显然那陷入奴役状态的趨勢，在农民中間比在城市工人中还大。現在，我們所談的，是又复杂、又难于捉摸的各种現象，其中部分是經濟的，部分是社会的，部分是政治的，而它們又錯綜地互相起着作用。

戴克里先时代的繁荣（連当时象拉克坦蒂阿一流的反对他的人，也予承認）与其說是由于經濟建設，不如說是由于行政改革和强硬統治。就这些改革的本身言，花費是浩大的，特別是关于宮廷的改組：帝国分成四个总督区，每区有着一个宮廷；繁华富丽，仅次于皇帝的宮廷；宮廷以及省政府的官員在人数上也增加起来。毫無疑問，在戴克里先时代，賦稅的負担是在加重，不是在減輕。

从君士坦丁时代起，課稅問題成为政府的，也是人民的急切注意的問題。当这位皇帝建立“微賤公役制”（sordida munera）并征收一种“超貢賦”稅的时候，富人們瘋狂地爭求特权和免稅权；这种爭求状况，是破天荒的。他們鑽营教会圣职，或在許多异教中間求得宗教职位^②。已成为一种令人起反感的醜事。这种勾当是有成

① 蒲式耳(bushel)，量名，用以量谷类的，也可譯为噐。合8加倫。——譯者

② 当时，异教僧侶和基督教僧侶是同样享有免稅权的。——譯者

效的，因为君士坦丁发觉了：他必須收买富人阶级的好感，来获得他們政治上的支持。一个第四世紀的作家薩尔維抱不平地說，“現有很多富人，迫使穷人負擔他們的貢賦，同时富人又对穷人提出新的勒索，迫使他們繳付”。

君士坦丁保存了那些从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198—211年)到戴克里先(284—305年)时代逐步建立起来的壟断事业。君士坦丁的賦稅管理中所做的显著变革，是“小紀”制度^①的建立。这不是一种賦稅，而是一种决定稅率及重行估价課稅单位(即“牛軛”单位)的办法。它的第一次規定，是在313年。它的原来用意，是使評價和課稅估价，除非每次間隔了十五年时期，不应有所变动。但是，事实上这个时期不久递减到十年、五年，甚至三年了。据說“小紀”制度曾产生一个嶄新的紀年法，就是，按十五年时期来計算時間，标出第一、第二或第三等等小紀，来記述事件曾发生于某一小紀的某一年代里。由此可見，第四世紀中的賦稅问题，是多么重要了。这种新穎的紀年法曾保留到羅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紀史家，迟至十一世紀时为止，还是在沿用着它。^②

在整个第四、第五世紀中，賦稅負擔繼續加重起来，而这正是在帝国日益貧困化的时候。圣巴錫尔用下列比拟来描写这一禍害。他說，“比如有一个船夫在洶涌的波濤里駕駛着一叶扁舟，正在他應該減輕船貨，竭力使船平稳下来的时候，反而有人再以行李什物滿載于他的船上。”因此政府勢必一省又一省地撤銷欠稅，并减低課稅估价。公元311年君士坦丁曾把愛提安人所欠的五年稅款予

① “小紀”(indiction)包括十五年，系君士坦丁所創立的會計年度。——譯者

② 找出小紀的方法，是在普通紀元年代的数目加三，再以十五除这和数，所得余数即是“小紀”，如果沒有余数，“小紀”即是十五。另一确定小紀的方法，是从年代数目中减去312，用十五除之。这种老方法对历家來說是有用处的，但是对常人來說則是令人头痛的，尤其是因为按照这种計算方法，年代必須从9月1日开始，到次年8月31日为止。

以豁免，并对他們以后的課稅估价，削減了 1/4。公元 356 年朱理安对高盧人做了一种类似的事情；虽然由于安密亚那斯·馬塞里納^①（第 16 卷，第 5 章第 14 节）对这件事的記載模糊，我們还不能断定他究竟做到什么程度。瓦倫丁尼安一世慨歎着他政府无可奈何地对人民所加的賦稅負担。公元 422 年，霍挪留也大量豁免了非洲的賦稅，在那里由于多那特异端派的叛乱及努米底亚人的侵略，全国已有一半遭到破坏的地步。

自从布尼克战争以来，羅馬的私人、金融、銀錢业和政府已保持密切的联系。羅馬共和国和羅馬帝国在这方面，都和近代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之点。在格·白兰德司新近出版的《論凱撒》一書里，我們可讀到下列一段文字：

在共和国的最后两百年中，羅馬財富对立法和公私事务所发生的影响，日益增长起来。理財家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上，越来越占着重要的位置。那些势力雄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一批一批兴起，来做政府的生意；就重要性來說，它們不仅和政府机关分庭抗礼而且有时还会凌駕其上……在羅馬城金錢是万能的。西塞罗常常提及債券……老伽图以苛重的利率，放款給无数的借債者。布魯特斯以 48% 利率放款；曾迫使五个无力还債的元老餓死。龐培靠着他的軍隊和他的势力，迫使城市接受他放款的这种苛刻的交易；然后再靠这种势力来收集这些放款以及他所想要的成百万的利息。

当时，羅馬共和国在各省內包稅的恶习以及委派沒良心政客和成功將領充任各省长官的陋規，也加剧了这种政治和銀錢业之間的关系。

到帝国时代，有才干的皇帝，特別是奧古斯都、提庇里斯、图拉真、哈德良之流，取消了这些陋規恶习，并把財政管理放在廉洁而有效的基础之上。政府和銀号老闆間的关系虽依然繼續着，但是

^① 羅馬史学家（約 330—390 年），著有《羅馬帝国史》，凡三十一卷，留存下来的只有十八卷。——譯者

銀錢業營業却已由政府來認真監督，這監督任務，在羅馬城內由城市總監，在各省由地方長官來執行。當時，地方長官按他的省屬，帝國省或元老院省，分別對皇帝或者元老院直接負責。銀錢業對檢查人員必須公開它們的帳冊，並呈交它們營業的證件。這些帳冊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日記帳，登記每天所有的收入和支出。第二種，是流水帳，登記每一個人或一個公司的存款和借款。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帳，是收入和支出的清冊，記錄每一筆錢款的經營和投資以及有關人的姓名。

另從各城市物質和道德的敗壞方面，也可以看出羅馬帝國顯著的衰落狀態。為了充分認識這敗壞的重要性，我們必須記牢：羅馬帝國是由各城市或各城邦有機地匯合而成的一個大聯合。各城市宛如人體里的細胞，是最小的，可是最有活力的有機體。在羅馬世界裡鄉土觀念遠遠地強於我們的時代。但民族情緒卻不存在。種族感覺也不顯著。帝國除了它地方上接觸民眾的機構以外，是一個抽象的東西。羅馬人的愛國心，只是在對自己的城市或鄉土的愛護和忠誠方面表達出來。

在第一和第二世紀裡，富裕公民為了公共目的，對城鎮慷慨解囊，已是尋常事件。在奧古斯都時代，有一個阿提那城的富人遺給本城公民的財產，達一萬二千塞斯脫。幾年以後，又有一個馬塞城的公民，把他的全部財產遺給城市。小普林尼，曾有一時抱怨自己不是富人，後來在發財以後，他陸續捐給他的本城科摩六十萬塞斯脫，約合七萬五千多美元。其中 5/6 款子，充作那免費發給窮人食糧的基金，其餘款子充作建造公共圖書館的經費。在去世的時候他遺囑以五十多萬來建築浴場和救濟窮人，另給一千個自由人終身養老金。還有一個富人留給本鄉四十萬塞斯脫。

原在帝國的盛世，有勢力的公民會爭先恐後地競爭市政官位。這批人通常是巨富；他們能以自己的資財，來維持這種官位的開

支，來供給遊戲和競技場那樣的公眾娛樂。法律雖然使他們對中央政府向城市所征稅款如有不足應負責任；但他們並不因此裹足不前。他們覺得，即使遭受可能的損失，這职位的體面却已使自己够光榮了。的確，當時“光榮”和官位是同義的名詞。但是到了第三世紀，情勢迥然不同了。在那個時候，我們看到拉丁字“onus”意即“負擔”，作為官位的代名詞了。這種改變，首先出現於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時代，他死於211年。可是，城市衰落的象征，早在圖拉真時代（98—117年）已有顯露，因為我們看到那位皇帝給小普林尼的一封信里，提及那些不願意擔任“什長”^①的人。然而對城市財政上的亏空，往往應由城市本身，而非中央政府的苛捐雜稅負責任的。因為城市時常在進行公共建設、興建戲院、浴場等等上面揮霍金錢。很多城市已陷入這樣嚴重的破產狀態，使哈德良和馬卡斯·安理略不得不指派查帳員去稽核它們的帳冊以及阻止它們的浪費了。由於城市管理的不善，有時城市自治權被撤消，從而城市政府歸併於省政府。這種中央集權化的過程，雖可認為是遺憾的，但却是無可避免的。凡是批判這種趨勢的人，應該好好地記牢這一點，即美國聯邦政府權力的增長，一部分也是由各邦政府的貪污和無能所引起的。

當什長的私人財產遭受危險的時候，他們勢必榨取商人和店主，來挽救自己的破產；結果，那些苛重的捐稅逐步削弱了整個帝國的中等階級。為了挹注亏空，政府往往占取城市的公地，並照例把它們售給附近發財的地主，這批人的後嗣，後來就成為這個城市和它的周圍土地的封建主了。朱理安皇帝曾以沒收了的公地還給城市而聲名遠揚。到了第四世紀，城市狀況達到了這樣的嚴重地步，以致政府強迫有錢的人擔任官職，並有系統地以消耗私人

① “什長”(decurion)是十戶之長，或市評議會的議員。——譯者

財富來平衡城市的預算。為了這項目的，使城市官職成為富貴家族的世襲職位。如果什長逃亡的話，他將被抓回，受處罰；他從此不得再離城市他去。

城市和鄉村的一般貧困的增長，也在各省內的農民起事和沿海的海盜猖獗方面表現出來。對這些問題，各省長官往往是束手無策的。因此有許多沒有城垣的城市，就趕速築造了城垣，而富裕的地主也把他們鄉間的莊宅改為有牆垣的或有塹壕的田莊了。地方將領或有野心的貴族，正好混水摸魚，從中取利了，而在第三世紀里，有幾個省分的确曾好多年脫離了帝國而獨立，特別是高盧省。小朴茨默斯，是高盧的一個“僭主”的兒子，曾發表多次演說，把他所講出的經濟和社會痛苦暴露無遺。他說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了。他好像幾乎已經預見到284年巴古達地方^①發生的農民大叛亂。他大聲疾呼地說，“從前我們有法院和法律。而現在弱者備受壓迫了。該死的富人們！如果窮人真覺得不值得活下去的話，注意他們會使你們同歸于盡的。”儘管在這些演說里，包含着很多煽動性的呼喚，但是他所描寫的真情實況是顯然可見的。戴克里先，在他統治的第一年里，鎮壓了巴古達的起義，並大力處理了政府所面臨着的各種經濟問題。但是，他所能做到的，只是暫時阻止了衰落的進展。他終沒能夠把局勢長久地扭轉過來。

為了擺脫負擔，邱里亞^②階層所可找到的唯一出路，或者向上爬到元老地位，或者加入僧侶階層。我們可以斷言，在第四世紀中，好多中等階級的上層的“皈依宗教”，與其說是由於什麼宗教信仰，不如說是由於自私自利的心理。僧侶所享的“恩澤”是一個有利可圖的特權。但是，追求元老的特權、更甚於追求僧侶的特權，

① 在高盧。——譯者

② 邱里亞(curia)原是古羅馬部族之一，這裡是泛指羅馬中等階級的上層分子。
——譯者

因为前者是可傳子傳孫的。法国历史家佛斯特尔·得·庫兰曾主張：中等階級的上層以爬上元老地位而逃避了負擔的人數，多于向下淪落者；只是中等階級的下層，遭受着社会不景气和貧困的灾难。

我們有很多理由可支持这个論点。在后期帝国，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时候，羅馬皇帝越来越依靠富人了。但是相反的说法也是对的：富人越来越控制了政府，要不然的话，他們变得势力十分强大可以不把政府放在眼中了。羅馬皇帝一向切望維持元老階級的尊嚴地位，有时竟令人奇怪地立出法律，来保护这个階級的威望。从中等階級的上層对元老地位热衷追求看来，已可証明：这等級所享的特权一定大于它所負的义务。事实上，我們也已知道，它享受着範圍很大的豁免权。但这些豁免权的內容是随时变更的，有时且被削減；举例說，在 387 年后，元老階級必須捐助公路桥梁的修建；供应兵士宿舍，起初是自愿的，后来逐漸成为元老階級除了少数特权者外的一般义务；至于提供新兵，起初也不是强制性的，但在 375 年也推广到元老階級了。

政府官員的豁免权比元老的甚至还要大些。一般說，这批官員同时也是大土地所有者。羅馬皇帝表现出对他們的特別照顧，使他們不受国庫稅款的追索，还特別关心来帮助他們繳納稅款。元老业主是不付苛捐雜稅的。元老領地所有者，在他們的人員中，有正式的商人；他們借助他們主人的金錢、信用和名义，能够完全压倒一般得到营业許可的商人的竞争，使后者陷于破产。查士丁尼新法告訴我們：教会、地方长官和高级元老所經營的私人制造厂，由于免稅特权，破坏了正規的工业組織，查士丁尼取消了君士坦丁堡的这种恶习，但是，在別的地方它可能还是存在着。

然而，元老階級尽管享有各种特权，也不是完全免繳賦稅的。君士坦丁部分为了增加收入，部分也許为了分化元老階級，以两种

新稅，加在它的身上。因為社會上尊嚴地位甚至也可用賦稅來賜給的。我們可看到元老階層為反對皇帝的政策，所發出的很多怨言：例如，佐息馬斯，在其著作第2卷第38章^①，譴責了君士坦丁。但是，奧林拜杜魯斯告訴我們，在第五世紀中期，很多羅馬家族還有着大量常年進款。那擁有最多土地的貴族階層，幾乎完全支配着帝國內所可利用的資本，並因為大家族的數目，通過同一階層家族間的聯姻關係，經常縮減，這些龐大財產，非但不會分裂，反而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裡了。當時，大土地所有者階級中的趨勢，就是形成規模更大、數目更少的地產。第五世紀的地產和第一世紀的地產已是大不相同了，儘管有些歷史家，還沒有觀察到這點。

大領地領主擁有不斷增加着的財富，也表現出日益脫離政府的獨立性。羅馬皇帝在剝奪羅馬舊貴族的權力里，在縮減他們的古老的家族特權里，擴大了財富的優勢；久而久之，大財產的所有權卻反過來反對政府了。富人奪取了政府控制權，並在半私半公的地位上行使了這種權力。甚至在第二世紀的末期，我們已可聽到各省長官對私人僭竊政權的訴苦。地方大紳士可攔阻政府官吏對罪人的追捕。克勞第烏斯·哥克斯在第三世紀的末期，曾力求革除這種庇護犯人的弊端。可是，中等階級上層，為了逃稅請求大貴族的庇護；从而使皇帝遏阻這種發展過程的企圖，成為徒勞無功。中央政權的日益衰敗，看來又可憐又可笑。狄奧多西一世曾設立一種農村警察，即“治安維護者”，但在409年時狄奧多西二世，因為這種警察干着盜劫勾當，不得不取締它，並把地方警察的職務，委託給大領主本人。換句話說，公共行政權已移轉到私人手裡。按狄奧多西法典，法官不得進入私人土地上開庭審判；如果有犯人應受逮捕，執行逮捕者，不應是國家官吏而是領主的管家。只有領主

① 他是希臘的異教歷史學家，著有《新歷史》(Historia nova)。——譯者

拒絕执行的时候，皇帝的官吏才可使用武力。国家非取得奴隶主的同意，不得捕拿犯罪的奴隶。馬約林不平地說，許多大領地已給稅吏以閉門羹了。在帝国后期，大領主常常庇护着逃亡奴隶。圣奥古斯丁說過，自成一个单位的庄园，实际上是独立的。在查士丁尼新法和历史文献里，已可十分明显地看出把行使公法作为私人权利这一点了。强者侵占弱者的财产，已是寻常事情。私产很少有安全保障。有势力的人们厚颜无耻地掠夺离乡者的财产，搶夺孤儿寡妇的财产。一个羅馬总督劝告一个朋友趁着一个富孀离开的机会，侵占她的财产，同时他本人发牢骚說，他自己在摩里得尼亚的财产遭受了那里的长官的侵犯。在卡帕多細亚，那些替大貴族服务的奴隶军队，曾对皇室領地进行搶劫。薩尔維在其著作的每一頁上描写着小业主仰富人的鼻息。

当时，大領地越来越成为国家中的半独立国家，成为地方主权的小島；乡村和城市的下層階級，为了避免盜劫、蛮族掠夺，为了逃避苛捐杂稅的勒索，越来越多地向那里集中，以求庇护。無論在东方或西方，小业主和隶农为求避免各色各样的苛政，請求大領主，或政府官員，或軍事司令甚至或皇室領上官員的庇护。庇护已成为一种制度了。第四世紀中演說家里巴尼斯曾以全篇演說来談这种习惯所发生的恶劣影响。有些村庄全村請求庇护，在埃及尤其如此。它的效果是：阻塞了皇帝的权力的施行，妨碍了司法的执行和賦稅的征集，以至使政府权力化为烏有。尽管皇帝曾企图限制这种习惯的傳布，但無論在东方或西方，它还是方兴未艾。在小亚細亚、在西班牙、在埃及、在高盧，都有这种恶习的存在。

后期羅馬帝国轉变过程中的基本特征是：大地主并吞着周圍的小塊土地，有产階級由于庇护制度盛行，不断增加着他們的經濟和政治权力。这些过程破坏了帝国政权的完整性和深刻改变了帝国社会的結構。

上述的大領地，是經濟實體，也是政治實體。領地上的農奴可找得它們所需的各種東西。每個大領地，象美國內戰前南方的大農場一樣，是有倉庫的。在法律條文和銘刻里，常常說及：為了當地平民的便利，在領地上設立了工場和商店。每個領地的社會，宛似一個城鎮，有着商場和市場。我們可找出普林尼時代的資料，來證明：這些大領主的市場，是經由政府認可的。關於這些領地市場，有兩塊從羅馬非洲省得來的碑銘，特別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第一塊是關於公元 138 年“元老院關於貝基安塞斯牧場區市場的決議”原文；它批准大地主路求·阿夫立揆那在他的土地上設立一個每月開市兩天的市場，即在每個月的 2 日和 20 日。第二塊，是關於一個婦女叫做安托尼亞者，她在領地上設立一個類似的市場。碑文上還曾說及別地方的領主市場。因為“牧場區”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不同於城市，往往又是規模很大的，所以，它常常自有一座或幾座教堂，自有教士，而且（非洲）還自有主教。

上文已討論過各種問題，現在我們可以談一談那些住在世襲貴族大莊園上鄉村農夫群眾（奴隸除外）的經濟社會狀況；換句話說，討論隸農制的起源、性質和擴張。隸農（colonus）這個詞，第一次出現於 332 年君士坦丁的上諭里。可是，在羅馬社會中，這個階級的起源和發展日期還要早些。隸農階級不止於一個源流。從歷史上看，凡是完全是獨一的而又包括一切的理論，總是站不住腳的。我們至少可以找出三個源流：被削弱了的貧困自由小農；獲得部分解放的奴隸；移居在荒地或空地上的“蠻族人”。有些作家認為：重稅和政府的壓迫，是隸農制形成的原因。另有些作家則從那些空泛而又難捉摸的經濟社會力量的作用方面，來找尋各種原因。

隸農是依附的農民，耕種屬於別人的土地，以金錢、服役或實物來繳付地租的農民。按術語來說，他們是自由人，可是實際上，

他們在永远还不清的債務压迫之下，是被束縛于土地的。這項債務移轉給他們的子子孙孙，这样就发展了一个世襲的奴隶階層。这一类的农夫，在历史根源上、身分上，都异于真正的羅馬农奴。后者原是奴隶，由于获得其主人的准許，得自行耕种着那从奴隶群耕种的大土地上划出来的一塊土地。

在羅馬帝国内隶农的身分，按術語來說，在法律面前是一个自由人——就是說，不是奴隶——但按經濟地位來說，是一个不自由人。如遇他所耕种的土地被售出的时候，他連他的家族，一起跟着那产权的移轉，而轉給新主人了，因为他的債務原是由于他借以为生的土地而背的，而不是由于那土地的所有人而背的。只要他能以服役（服役逐漸由慣例来規定的）繳付他的地租，他不得从这田庄上被逐出去，他或他家族的任何成員，也不得被出售为奴隶。在这一点上，隶农的状况，是远优于奴隶的，因为奴隶仅仅是一种工具；可把他本人出售，或者出售其家屬給另一主人，而使他同家屬分离。

但是，尽管隶农的法律地位和奴隶的法律地位这样明显地区别开来，可是，两者的社会地位則完全混淆不清了。他們都是屬同一个人支配下的“下賤”劳动者，那个人是主人，也是的确确名实相符的地主。隶农的茅舍和“奴隶区”的小屋，是彼此毗連着的。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又是不相上下。一个隶农的兒子繼承其父亲的身分；而一个奴隶的兒子也繼承其父亲的身分。历时既久，这两类人的子女，因为在一起成长起来，势必发生联姻关系。这种情况，后来变成这样普通，以致法律終于規定了这种双重身分的婚姻，所生的子女应繼承其母亲的身分；举例說，如果一个隶农娶了一个女奴隶，他們的子女，也是奴隶。其次，君士坦丁关于財政政策的严峻立法，又使隶农制硬化成为永恒的农奴制了；因它不准任何人放弃他出生所屬的职业。象早期的工业劳动一样，現在第四

世紀中，農業勞動，也成為嚴格的世襲職業。^① 跟着時間的進展，我們就看到了整村整村的隸農。

到了第三世紀羅馬帝國內發生了“棄田”的問題，這個問題從那時起，使最英明的皇帝也覺得寢饋不安。促成這個問題的因素是：農村勞動人口移入城市的趨勢（這趨勢直到被強制隸農世襲制所阻止時為止）、資本的萎縮、沒收性的課稅、富裕地主的競爭、地力枯竭、自然資源的荒廢（387年聖安布洛茲“看着亞平寧山區的荒蕪景象，感到傷心”）、不安全狀態、盜風昌熾以及蠻族的不時侵襲。甚至早在哈德良時代（117—138年），我們已可看到把日耳曼人輸入來拓殖這些被遺棄的土地。馬卡斯·奧理略大規模地使用了這種制度。他的傳記作者寫道：“他把無數的蠻族人移住在羅馬土地上”。第三世紀，那些主張改良的皇帝，曾把這辦法發展到最高峯，特別是普洛巴斯；他被說成是“把羅馬省日耳曼化”。他曾把汪达尔人移殖到不列顛，阿勒曼尼人〔日耳曼部落——譯者〕到亞爾薩斯，革坡德人和加森基人（哥特人）到米西亞，法蘭克人到安茹，甚至到黑海沿岸的本都，又有幾千幾萬的巴斯特尼人，即凱爾特人的最後一支，也從萊茵河東岸攜老扶幼，移入色雷斯去。他的傳記作者還寫道：“蠻族人替我們勞作，替我們播種。”一個君士坦丁的贊頌者誇耀說：“法蘭克人耕種着我們的田地”，另一個人宣稱：“錢馬維安人和法里西安人替我們耕田。”

關於建立上述日耳曼人殖民地的經濟意圖，我們可從狄奧多

① 拉伯斯雷：《土地所有權的起源》，《美國歷史評論》，第8期，第430頁。“農奴制較奴隸制能更好適應新的農業狀況，起初是政府，其次是城市，再後是教會，採用了長期租賃的辦法；最後皇帝芝諾也承認私人業主採用這種辦法的合法性。第六世紀和第七世紀中，所可看到的農村經濟的最普通形式，是田莊劃分為兩部分：地主的住宅附近田地，由奴隸來耕種；其餘的土地則分成份地由依附佃人來耕種，不管他們是自由的或依附的……所以他們和隸農化成為一體了。阿那斯塔細亞曾規定：凡是使用別人土地的自由人，當然是被束縛於這土地的。”

西二世的一項法律里(公元 440 年)清楚地看得出来,該法律条文說:任何地主得向“判官长”申請那些从新近征服地息立来的劳动者。第五世紀的一个作家左息馬斯,也証明了这同一的事情:“好多省內的本地人口竟减少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使蛮族人移殖到那里,来接替他們,地方名称也竟被改变了。”这后一項的論証是有趣的,也是正确的。

在几个东方省内,农业的荒廢是由綿延和持久的旱灾所促成的。在阿拉伯省、巴勒斯坦和息里內易卡,情况尤其是这样。

和上述提倡开垦弃田的正式企图同时并进的,有很多“擅占土地的行动。”^①这些弃田和擅占土地的行动使羅馬法律增加了一条新的条款。羅馬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則,是私产的不可侵犯性。可是,在 193 年,皇帝帕提那克斯,在发給阿拉伯和叙利亚各省的一項詔令里,有下列規定:如果有人进行耕种弃田,这块田地就成为他的财产。如果旧主人在两年之內想要恢复它,他必須偿还給占据者对土地所作的一切改进費用。如果占据者占有土地已滿两年,而原主从未提出抗議过,他就获得这块田地的产权。在 193 年帕提那克斯的詔令之后,另有瓦倫丁尼安、阿卡狄阿斯及霍挪留的各项詔令。可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是:这项新立法反映出那久在穆罕默德时代之前,关于“死”地的阿拉伯人慣例。的确,瓦倫丁尼安的宪章,特地指出:这宪章的用意,在于維持他們中間的土地慣例。

这許多不利的力量同时起着作用,有时联合在一起起作用,使帝国人口逐漸縮減下去。在意大利早在公元前一世紀时,人口减少現象已經显然可見,而在外省內,則出現于早期帝国时代。公元 166 年的疫癘以及后来 251—253 年間的疫癘,特別严重也影响着

① 指沒有权利而擅自居住在新地或空地上的行动。——譯者

帝国的东半部。在第四世紀，坎帕納的蕭条景象已經显著，虽然它人口的减少可能是由于外移而不是由于死亡所引起。甚至連埃及的人口，也在萎縮着；如果象埃及那样的国家，如此免除了旱灾，人口如此稠密，还有人口减少現象，那么，你們想想，其他条件不如埃及优越的地方的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埃及人口縮減，已由第四世紀的一个历史家尤西比阿斯保存下来的文件証明了。他說，在亚历山大城，按救济分配处表册上所登記的四十至八十岁的人数，并不大于以前曾領取補助金的四十至七十岁的人数。由此可見，亚历山大城的人口是在减少着。

在紆迴曲折地分析討論了許多复杂的現象之后，我們最后就要面对着这一个问题：羅馬帝国衰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历史家曾作过很多的、也是良好的努力。可是，在一本新近出版的著作里，我們看到下面一段話：“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問題，即羅馬怎样兴起和它怎样会衰亡，从来不曾有过，也許永远不会有着一个彻底的解决。”自从吉本的著作出現以来，历史家的观点和意見是有着广大分歧的，試把它們作一比較研究，倒是很有意思的。下面所引文字，据我所知，是关于后期羅馬帝国的一个最出色的記載。可是还有很多未能說明的地方！

在公元最初几世紀里，羅馬帝国的經濟状况大部分是很窘迫的。……一个不健康社会的任何成分几乎都有。大塊乡村土地，弃而不耕。应作为生产用的資金，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于奢侈品上，而不使用于农业方面。大庄园的离乡地主^①揮金如土，鼓励下流艺术，濫賞濫賜作夸耀过眼即逝的官場的排場。小土地所有者被不平等和苛重的賦稅压得走投无路。财产逐步聚集于少数人手里，因而穷人和富人的界綫越来越見分明，直到那公民和外人間或公民和自由人間的旧区别，被那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間的新区別所淹沒了。各城市爭先恐后地竟造了巍峨壮丽的大廈；这些大廈的断垣殘碣，不仅告訴

① 指不住在庄园而住在城市过奢侈生活的地主。——譯者

了旅行者或历史家那一去不复返的宏伟景象，而且給经济学家指点关于挥霍的后果的教训。各城市为了支付它们的建筑经费，有时竟至負債累累；有时不惜以高利取得借款，以将来的收入来支付现在的費用；有时它們采用货币贬值的方法。城市的胡作胡为，竟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皇帝往往不得不派遣欽差大臣賦予特殊权力，来重新整顿城市财政；最后，皇帝对城市公共工程计划实施了否决权，又把制币权抓到自己手里。但是，皇帝的这种行动，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不是一种根本的治疗。果然它可使那最后的崩溃推迟一步，可是，不能阻止它的来临。同时，在这最后崩溃来临前的时代里，貧困的压力，已十分严重。这倒不是由于那种大飢荒或大疫癘所引起的灾难，而是由于那种社会有机体内神經的可怕紧张，象有人在我们社会里所可看到的那样。当时，在希腊-羅馬社会里，成长了一个新的阶层——貧民阶层——而且它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起来。^①

在說明羅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絕对的判断和概括的結論，是不中肯的，也是无意义的。現象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有着不同的性質，使我們不得不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那些货币贬值和黄金流入印度一类的有形現象，是迥然不同于道德的、經濟的和社会的現象；后者按其本質論，是看不見、摸不着的力量。而且，我們还須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因和表象。我們常常不可能断定，我們所講的，是某一現象的原因，还是它的后果。后果本身也創造出新的条件和原因的。当然，容易作出一个空泛的論断，比如說：这基本原因是政治的、經濟的、社会的或道德的；或者甚至較為明确地說，这主要原因，在于穷兵黷武、行政腐敗、賦稅过重、农业衰落、奴隶制、民众的日益貧困和地主貴族的日益发财、資金的减少、庇护制的成长、公德的喪失、风化敗坏、奢侈成风、种族血統的混杂（强壮羅馬血統的破坏和奴役出身者在比例数字上的增加）、那使羅馬精神革命化的东方影响的渗入，諸如此类。但是，如果我們思索一下，就可知上面所提的每个原因本身，都是从其他前在的原因或条件而得来的。

^① 哈赤(Hatch):《早期基督教会的組織》，第32頁。

人口的减少，是个原因，还是个結果？貧困，是个原因，还是个結果呢？亨利·緬因勛爵說過：“再沒有比这种說法，即賦稅过重使羅馬帝國貧困化的說法，更加荒誕无稽。”城市和羅馬中等階級上層的衰敗，是个原因，还是个結果呢？吉尔柏·墨累勛爵曾說過古代世界的衰落，因为“喪失神經”。但是这一句話，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为什么古代社会会喪失它的神經呢？农业的衰落是因为地力枯竭呢？还是因为农民階級的賦稅負擔过重和农村資本遞減？是因为地主貴族占夺土地和农民淪入农奴地位呢？还是因为乡村不靖和盜賊橫行？鄂图·西克曾說：基本原因，在于“优秀者的毀灭”（Ausrottung der besten）。在这項意見里，他反映出欧內斯特·雷南的主張：后者想要把犹太希腊和羅馬的历史，看作一項历史規律的例証，依此規律，国家和文明，由于尽了給人类服务的責任，而变得衰老枯竭；它們死去，正是为了使一个新的文明得誕生出来。但是，如果說这意見是对的話，那末，“适者生存”这句話，無論在生物学上如何正确，决不是一项历史的規律。是不是說人类种族象果树一样，經過几代以后，就变成不結果的呢？

基督教道德家，从圣杰罗姆到霍治金止，都說，异端主义和不道德，是羅馬世界衰落的基本因素，对于这种論断，我們可完全置諸不理。把古代文明的消亡，归結到上帝的意志是幼稚的，而且是无价值的。归結到奴隶制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同样，我們也可不理睬下面所提的原因：黷武主义、暴政、日耳曼人的侵入。但是，不管它的原因如何，羅馬帝國的衰亡，总是一大悲剧。

庫兰杰及其一派的其他許多作家，在大地主貴族权势里找出了主要原因。他們爭辯說，羅馬皇帝由于增加元老的人数，由于扩大元老的特权，由于在上層階級中細分社会等級，創造了一个具有高度貴族精神的社会。城市的中等階級和乡村的小农被維持这龐大貴族社会的重負压得破产了。結果，我們看到工人团体被牵制

于它們的工作上，农民群众被束縛于領主的土地上；因此，羅馬社会不曾有那个象在近代国家里产生了商业、工业和自由职业的阶级——只有这些因素才可成为对抗大地主貴族压力的力量。

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使军队成为一个放在元老院之上的政治力量，意大利历史家費勒罗認為这一行动是主要原因。辛科維奇看出古代文明的衰敗，在于經濟原因，而这些原因，在它們方面，主要地是由土壤貧竭所引起的。伊杭廷頓認為农业收获递减律是主要原因，收获递减是由于古代世界土地日益干旱所产生的。罗斯托夫捷夫教授認為：这地力枯竭的論点是“完全不对的”，他还指出，“这一点无论对埃及來說，或对其他很多(即使非大多数)省分來說，都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农业的衰落，是一个表象，而不是一个原因。罗斯托夫捷夫的《羅馬帝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1926年)，是关于这个题目的最近論著；据他看来，羅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在于政府的横征暴斂的政策。

我認為，羅馬帝国生活力的逐漸衰敗，可从……国家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情况得到說明……这种情况过去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东方各帝国和希腊各城邦的繁榮，那也是希腊化时代各王国，即羅馬帝国以前各国衰敗的主要原因。一旦国家最高地位成为决定性的，而又能使个人利益及社会集团利益屈从的时候，它必然对民众起着一种压制的影响，并使他們对自己的工作失掉一切兴趣。但是，国家加在人民头上的压力，从沒有象在羅馬帝国統治下的那样使人觉得沉重。早在公元第二世紀时，这种尖銳的感觉已成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最突出的特点，而且以后这种感觉更是有增无減……羅馬人……認為更价廉更便利的办法是：把有薪俸的官員人数減縮，把无报酬的、强制为替国家服役的人数增加起来；这样，就采用了一种替高官富人阶级做工作的强迫制度……在公元第二世紀的上半期，这项制度已获得了充分发展；在埃及差不多一切官职都屬於“公役”这一类……在財政管理方面，就是要对国家損失負責賠償的制度。如果有一笔稅款还没有收到，而不再能从納稅人勒索出来，那么收稅吏必須自挖腰包繳付。如果他不能这样做，他的财产就要被沒收出售了。

总之，这公役制，即由政府强制人民做无报酬的工作制以及“做国家工作者对国家的损失应负责赔偿制”，是祸根所在，所有的其他祸害，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如果我沒有弄錯了作者的想法的話——就是，中等階級的毁灭和与此俱来的工商业毁灭。羅馬帝国成为压迫的象征，它在破坏它的臣民的时候，也破坏了自己。

但是我們还是可以怀疑的。拜占廷帝国在它长期的全部历史中，是一个压迫人民并很貪婪的国家，和后期的羅馬帝国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它繼續存在到千年之久，而当它在 1453 年灭亡的时候，那也不是由于内乱，而是由于外来的暴力。我們怎样来解释呢？为什么羅馬帝国会灭亡呢？对这一问题，克力奥^①也沒有給予明晰的答复。

① 按希腊神話，克力奥(Clio)是保护史詩和历史的女神。——譯者

第二章 羅馬帝國和早期中世紀的教會

十九世紀對比較宗教史所作的研究，揭露了一項為過去學者所未認識到的歷史真理，就是，一切偉大宗教的創立，與其說由於神學，不如說由於社會原因和經濟條件。佛教的傳布，不是因為它的“涅槃”說的受人歡迎，而是因為它主張取消種姓。當印度教的貴族和有文化的上層輕視它，拒絕它的時候，佛教在下層分子和無家可歸的人中間獲得了一批信徒。我們可用很多相同的原則，來說明早期基督教的傳布。在歷史方面，沒有一個歷史領域比“早期教會”的歷史領域為近代的經濟和社會的歷史解釋方法提供了更大量的新知識和新理解。教會史上的事實和世俗史上的事實，就種類說，沒有什麼不同之點。社會上存在的力量，在教會歷史里，和在其他領域的歷史里同樣起着作用。如果不先了解公元最初四個世紀中羅馬世界的經濟社會狀況和流行的理想，我們就不能了解基督教的興起、傳布和影響。早期基督教是一種城市的宗教；它是城市性的，不是鄉村性的。它從一城到另一城，從一省到另一省的傳布，是沿着水陸的通商大路進行的。“基督教曾適應着城市生活，而城市生活是在羅馬統治範圍內一切地方社會組織上的主要特征”^①。

《新約全書》明顯地指出了基督教的轉變：即從耶穌時代的一種加利利省^②鄉村農民的宗教轉變到保羅時代的城市宗教。耶穌所引用的說明例證，是大家熟悉的东西，如葡萄園、橄欖園、無花果

① A.J. 麥唐納：《蘭法郎克(Lanfranc)傳》，第 100 頁。

② 在羅馬，屬巴勒斯坦的北部。——譯者

树、庄稼、田间野兽、空中飞鸟、风、红色夕阳。但是保罗所引的比喻，是有关城市、市场，和营帐的事情。我们只是按照保罗的游踪所至，就可发现这个重要事实。正是“在安提阿城，他们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几乎所有保罗的使徒书，是写给城市礼拜会的：给以弗所人、帖撒罗尼加人、科林斯人、罗马人。在“启示录”里所提及的“七个教会”都是在小亚细亚的城市中。在第二世纪基督教开始传入非洲、西班牙和高卢的时候，第一批成立起来的基督教团体是在迦太基、加的斯、里昂各城；而且，初期的基督徒，无论皈依的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多是小手艺人、手工业者、店员、商人；他们住在大城市的“街区”，在那里，各种行业都有专设的街道。保罗本人原是西里西亚城的塔苏斯的一个制幕工。该城以制造幕布而享有很大的声誉，所以拉丁文中“幕布”这一个字，就是“西里西亚”(cilicium)。保罗在科林斯，寄住在亚基拉家里，“因为他是同行”。

吉尔柏·墨累勋爵，在他的一本出色的书里，曾指出早期基督教的这种城市性质。他写道：

我一向认为，从历史上讲，基督教在早期几世纪中的性质，与其从它所宣示的教义中去找寻，毋宁从它所依靠的组织中去找寻；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些教义，在往昔希腊化时期的或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都找到其根源和极相似的东西。在我方面当我企图从大堆教义，如诺斯替教、三位一体说、一性论、阿利阿教派等的教义了解基督教的时候，我一无所获。后来，我试图把它作为一种互助的有着神秘的宗教基础，半秘密性会社来理解；起初它流传在安提阿和利凡得的许多大商业和制造业城市的下层社会，然后由于本能的同情，它传入罗马和西方的类似阶层中间，并且，和其他一些神秘教派一样，由于特别感动了妇女，它的影响就扩大起来了。在那个时候，历史上各种的谜底，就开始被揭穿了。①

① 《希腊宗教的四个阶段》，第179页。

古代微賤的人們，即奴隸或自由人中間辛勤流汗的群眾，居住于大城市中人口稠密的街区，生活于窄狹的圈子里，做長時間的工作，領低微的工資，所以他們的生活狀況是艱苦的，往往又是粗野的；對這批人，基督教所傳布的博愛的社會福音：“激發愛情，去做好事”以及所教導的經濟的公平：勞動者應得他被僱傭所值的報酬，曾引起着強烈的共鳴。

然而，有時基督教的教義，也曾激起勞動階層的憤怒，特別是在小商人遭受着生意損失的場合。不止一次地可看到，當宗教問題成為主要爭執的時候，經濟上自私自利的動機，確是宗教上不容忍的基本原因。一般人是不会容忍那些有損他們利益的教義的，但是他們也不會就根據這些理由來攻擊它們的。狄麥特琉，一個以弗所的銀匠，曾煽動同行手藝人起來反對保羅。那里的岱雅那大廟，是古代世界的奇觀之一，也是來之東方幾乎每一個國家的成千累萬人參拜的一處聖地。那個城市的居民以及周圍平原上的村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這些旅行者和香客，靠着神廟的經濟來過活的。那里有大畜牧場，專門飼養供祭祀用的牲口和綿羊，并有皮革制造、毛織品、硝皮、染色、紡織等各種主要工業。在城內有着云石、地毯、鑲木各種工匠以及“終生職業的工人”即金銀匠；他們靠着制造女神小象來維持生活。這些小象是售給香客，作為紀念品的。這批手藝人对保羅的“用手制造來的，不是神”的說法，極感憤慨，這倒不僅僅是由于他們的宗教偏見，而且是因為他們經濟上的自利心。當狄麥特琉喊出“我們這項手藝行將完蛋了”這句話的時候，他一針見血地談出那項利益了。公元113年在俾斯尼亞城小普林尼面前審訊基督徒過程里，當地人对他們所控訴的罪狀之一，是有关牲口芻秣銷路的跌落，而這些芻秣原是为飼養將作祭品用的牲畜的。這一點使人想到那原始控告是由附近牧養牲畜者所提出的。从俾斯尼亞的案件，我們还可看到有时历史会重演的一个突出例子。

“因为第一个公开攻击苏格拉底者，即喜剧作家阿理斯多芬，是阿提喀的农村各阶级的代言人；而苏格拉底成了商业祭司的牺牲品，也是今天叫做‘均田主义者’的牺牲品”^①。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訓誡，有时会产生經濟上的困难。凡有关一个人职业的問題往往可成为一种严重事情。异教神庙为几千几万劳动者提供了职业：木匠、磚瓦和云石匠、石板匠、鑲木細工匠、黃銅匠、金銀匠、漆匠和装璜匠；所有的这些行业都对于誠心的基督徒关門；可是还有人，虽皈依了基督教，但仍从事制造偶像和宗教小飾品的。特图良抱不平地說，有些确已选任为教会职员的人們，以保罗的下列格言来作为护符：“讓各人保持着他們原来所做的职业”，并援引摩西在荒野里制造过一条青銅蛇这一事情，作为辯解。禁止基督徒从事这样多的手工艺行业，那当然会有力地促使羅馬帝国最后一二世紀的美术衰落。

一切文武官职，实际上基督徒也不得充任。因为他們如果担任这类职位，就必须出席甚至参与展覽会、庆典和祝宴，这些都是和基督教的教訓不相容的。担任地方长官者必須出席競技場的比賽会，舞台上的比武角斗表演；他們也須招人承包神庙中那祭祀用的牲畜供应，以及监督庙宇收入。到了第三世紀，在生活的各部門中，在社会的各阶層中，都有基督徒，可是，他們除非和世俗相妥協——他們确是这样做的——否則不仅会难于謀生，而且，由于他們的超然和“不通世故”的态度，还会遭受群众的憎恶。

从古以来，在古代东方各帝国里，大城市里的下層劳动人民，已习惯于組成同行业的团体。这些組織从埃及和叙利亞傳遍于希腊和羅馬世界。一般說，这些团体有着慈善性質，是办理救济和殯葬事宜的会社。它們的成員，按月付費作为公共基金；它們有自己

① 賴納赫 Reinach:《奧甫斯(Orpheus)傳》，第90頁。

的集會場所，有一種儀式隆重的和半宗教的入會形式，也有他們自己的各種社會性的娛樂。在卡提林叛亂事件後，羅馬政府對這些團體變得驚恐起來，乃企圖取締所有的秘密會社，因為害怕它們會變成叛亂或作亂的中心。圖拉真曾命令解散俾斯尼亞的一個秘密的火鬥團體。但是，那結社集會的沖力，實在強大，壓制不了，所以，政府只好不加刁難，准許了那些辦理殯葬事宜組織存在。這些團體在早期基督徒的組織和傳布裡，曾起着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由於初期的基督徒本身就是來自羅馬社會的勞動下層，所以這些團體往往成為早期教會組織的所在地。團體所在地在所有的成員都成為基督徒之後，有時就是他們的集會場所，這種團體的宗教儀式曾影響着早期基督教的禮拜儀式；這是異教影響基督教的一個途徑。

基督徒財產所有權的最早形式是領有一塊墓地的形式。按羅馬法，死人的坟墓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屬什麼階級，都受到嚴密的保護。甚至對被迫害的犧牲者，也不得拒絕給以殯葬。為死人舉行葬儀是很普遍的事，所以墓地上的小禮拜堂往往成為當地基督教集團的禮拜場所。在受到迫害的時期，墓地常常成了暴徒攻擊的第一個目標。可是，另一方面，由於羅馬人對財產權和死人坟墓非常尊重，儘管基督徒的宗教是非法的，但他們對墓地的權利還是維持着。例如，亞歷山大·塞弗拉斯（死於 235 年）拒絕了一個旅館主的申請：他要求破壞一塊基督徒的墳地，來在那裡建造一所旅舍。當然，這種財產嚴格說來，雖然為了教會的目的，但不是屬於教會的財產，而是屬於一個團體的或主教以私人資格所領有的財產。在君士坦丁以前，在法律意義上，沒有教會財產這一回事，它只在事實意義上是存在的。313 年的“米蘭詔令”第一次在法律上建立了教會財產，并把一種新的財產類目，即團體機關的財產，加入了羅馬法內。甚至在那時，領有財產權起初也只限於教

堂、墓地以及其他用作禮拜或类似目的的建築物方面。直到 321 年，法律才准許基督教会享有收受贈与或傳給教会作为基金的財產之权，

現有一种广泛流傳的觀念，說早期基督徒过着穴居生活，隱匿在地窖里、地下室里、墓洞里；那是一种荒誕无稽的錯覺。他們和別人一样，是同世俗人相混居杂处着的，“和世俗人一起生活着，他們的食品、服装、住所和用具，都是相似的；他們也同样常到公所、市場、浴場、碼頭、市集等等，无可置疑：一个店員或商人在改信基督教后，一般地也不会改变了他的生活的外表。人們在街上或在公所里可以和他談談話，也沒有什么理由来怀疑他的基督教信仰。”

毫无疑問，早期基督教教义，在和羅馬世界当时的經濟和社会制度相比之下，是非常激烈的；如果实行起来的話，那会顛覆古代文明中最穩定的状态。但是，不管早期教会所抱有的經濟的和社会的觀念怎样激烈，它却从沒企图把这些觀念付諸实施。它把它的活动局限在实际条件內。博愛和慈善的福音，反映在施舍方面：如救济孤兒、寡妇、疾病殘廢者的苦难，救济第三世紀中那些被送到石場里、矿井里的基督徒囚犯，贖回那些被非洲摩尔人所擄的俘虜，賑济荒灾，維持傳教士的生活，照顧那些旅行途中的基督徒，因为款待客人的义务是神命的。在这些社会服务方面，早期基督徒的工作，都是慈善性的。可是，教会很少做那改进自己範圍以外狀況的工作。它單純地根据宗教理由来譴責事业界中的很多活动，但是，尽管有批評和譴責，教会从沒提出过一个建設性的改良方案。在有些方面，

基督教团体，把他們原来要消除的灾禍，反而加剧起来。在一般的社会情況下，孤女将会出嫁，很多寡妇将会再醮。但是在基督教社会中，兴起了一种永远童貞和永远守寡的趨勢，而这种趨勢，是由許多偉大傳教士培养出

來的。的確，出嫁並不是一種罪孽，但是它是一種弱點的招供；第二次出嫁，差不多被認為是一種奇恥大辱。因此，教會所供養的童貞姑娘和寡婦，在人數上與日俱增的比例，一倍倍地加多起來了。

如果認為早期教會，曾倡議過什麼革命的社会性質的運動，甚至什麼徹底改良性質的運動，那會是一個錯誤。在古代文明的最危急時期，教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接受了現成的制度。它可能曾作過努力，來減輕奴隸階級中難免的苦難，可是，它從沒否認過奴隸制度的合法性。它曾給奴隸以物質的和精神的慰藉；可是，它承認奴隸制是當然的事實。拉格坦蒂阿的常被援引的一句話是：“在我們中間，主人和奴隸沒有什麼區別；要不是相信他們是和我們平等的話，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我們可以弟兄的名義來稱呼他們；”這句話，不是詞藻，便是單純教條主義。對主人和奴隸間關係的“公道性”，教會從沒否認過。關於古代世界賤視勞動方面，教會所做的，也遠不如一般所相信的那樣，它從沒主張過象那常說的“勞動的尊嚴”；它所教訓的是忠實勞動的義務，以及勞工應得他僱傭所值的報酬。所以，就作為社会主力量論，教會的偉大時代，不是在早期，而是在中世紀時代。

有些史家認為：早期教會擁護並實行了一個人道主義的社會經濟的偉大綱領，企圖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又新又好的社會。那些史家是受浪漫主義或虔誠情緒引入迷途的。而且，他們還漠視了許多異教思想，特別是斯多噶學派的思想，這些思想對於糾正当時代的某些社會上的大弊病，曾產生類似的巨大影響。在第三世紀中改善羅馬法並使那些最不合於人道的特點趨於穩妥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斯多噶學說。斯多噶學說還教導了人生在世的價值，不管一個人屬於哪一個階級，並灌輸了羅馬公民權的尊嚴和義務的思想。在人道主義方面，斯多噶學說比早期基督教有更普遍的意義。確然，它是對上層階級而不是對下層階級呼喚的。然而，那是

因为它不是一种情緒和感觉的福音，而是一种理性的福音。它是不象基督教所做的那样，訴諸階級覺悟和階級矛盾的。斯多噶學說，完全和基督教一樣，規定了忠實勞動的義務以及對勞動的誠實報酬的義務，可是，它不象基督教那樣，進行着一種積極的、物質的和表面的慈善事業。另一方面它培養着一種內在的、精神的和理智的慈善事業，那倒是基督徒所不曾想到的。斯多噶學說，是容忍異端的；而基督教則反是，斯多噶學說是從不嘲笑異端的，而基督教則正是如此的。斯多噶學說教導着全人類的爱而早期基督徒所說的爱，則是只為了他們自己并只在他們自己中間的。用任何標準來判斷，斯多噶學說是崇高而又是開明的學說；今天其中有些教訓，還是使人感動的，而且有助於人類摸索前途。現在，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會對馬卡斯·奧理略和埃皮克提特^①，肅然起敬的。

在有些方面，基督教是古代悲觀主義的一個新的反映，就是說，它反映出在基督教時代開始前後幾世紀里，那滲透着古代世界的悲觀主義。它採用了，但變成這樣採用了希臘羅馬悲觀主義哲學中富有特征的思想，例如，藐視人性和對理性的不信任，以及尋求世俗快樂是徒然的一種主張；它依據這些學說，培養着禁欲、苦行和獨身主義一類的實踐。對這種信徒來說，忍受痛苦，使來世可以享福；生活是苦惱的；事物的虛幻和不公平，是現實的標記，也是最公平的證明；失望是使人希望來世的一種新的原因。古代悲觀主義通過基督教終於變為它的反面了。

在“前尼斯”^②教會史上，就是說，在君士坦丁時代前的教會史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基督教直綫的擴展；即從奴隸和下層工人

① 奧理略和埃皮克提特都是屬斯多噶學派的大學者，前者是羅馬皇帝，著有《默想錄》(Meditations)；后者本人雖沒有著作，但其門人阿利安(Arrian)搜集其格言，編成《便覽》(Enchiridion)一書。——譯者

② 就是在第一次尼斯會議(公元325年)之前的時期。——譯者

階層到羅馬帝國的富人階層和有錢貴族的自下而上的擴展。基督時代的最初兩世紀中，所有的皈依信仰者，差不多全部來自卑微的平民、奴隸、自由人、手藝者和商人。聖保羅適當地描寫這些人說：“按世俗標準來看，沒有很多聰明的人，沒有很多有勢力的人，也沒有很多高貴的人。”神父作家們經常把一個富人或一個有崇高社會地位之人之皈依信仰事件，作為特別慶賀的事件。關於本都城一個有錢的船主人馬桑的信教，即是一個例證。

直到第二世紀的最後時期，基督教才開始在羅馬社會的上層中間急劇地發展着；在第三世紀中，儘管已經開始普遍的迫害，但這項進展還是穩定地持續着。253 年受難于瓦勒里安的迫害的教皇哥尼流，是屬於著名的哥尼流氏族；它是一個羅馬最老的家族。瓦勒里安的詔令，用沒收財產、降低社會地位以及放逐來處罰基督徒；那就表明了在那個時候已有上層分子和有錢人皈依了基督教。當然，地中海世界的東半部比西半部，有着更多的基督徒。基督徒人數最多的地方，是敘利亞和小亞細亞。在本都，整村整村地皈依了基督教。可是，希臘長久頑固地保持着異教地位。特圖良約在 200 年時著文，認為在迦太基的人口中基督徒占有 $1/10$ 。第三世紀中期，在意大利存在着六十個有組織的教區。251 年時，羅馬教會有着四十六個神父、七個管事、四十二個侍僧、五十二個讀經者，維持着一千五百個孤兒寡婦；由此可見當時羅馬也許有着三萬到四萬個基督徒。其中奴隸和自由人的數字是很大的。

在第三世紀中，羅馬教會的財政力量對於教皇權力的發展是一個重要因素。

從各地教會和京都〔羅馬城〕間的頻繁交接來看，可知下列事情對所有的教會，尤其是在它們需要財政援助的時候，是極端重要的：取得和羅馬城教會的聯繫，接受它的支持，知道它對旅行的“弟兄們”的如何招待，以及有權替囚徒和礦場里做苦工的人們請求它的大力干涉……在帝國中，沒有一

个团体对和那偉大“羅馬教会”的关系，可以漠不关心的。甚至辽远地方的教会团体，也通过财政的援助……被束縛……于“羅馬教会”了①。

历史家們曾多次想要估計羅馬帝国内基督徒的数目，尤其是在第三和第四世紀基督教开始形成一种力量时的数目。但是由于資料的缺少，这些估計，不过是一种猜想罢了。吉本估計帝国在250年时，有一亿二千万人口，其中有基督徒六百万，就是人口的1/20。这两項数字，当然过高。舒尔茨曾把同一时期的帝国人口，算作一亿，其中1/10是基督徒。哈那克在他的《基督教的使命和扩展》一書中，承認了关于这类資料的有限，而力避作出总括的論断。他說道：“在戴克里先迫害(公元303年)以前的五六十年的时期中，发生了教会第一次的大扩展。”他依据所可得的資料来分析，区别出四种类型的省区：(1)基督徒在人口中約占半数的省区，在那里，基督教在第四世紀的初期，是傳布最广的宗教；(2)基督徒在人口中构成很重要部分的省区，在那里他們有着影响領導階層的势力；(3)基督徒零星地散布的省区；(4)基督教的傳布非常薄弱的省区。

有各种原因可以說明基督教的迅速扩展和最后胜利，可是，对这些原因的重要性，要作出决定，都是困难的。但是，經濟和社会的势力是在这些因素中的最有影响的因素。这里，再援引哈那克的下面一段話：

我們很难决定那作为基督教特征的各个势力在产生推动力方面的比重：也就是确定：这种推动力有多少从它的一神論得来，从耶穌基督的教义得来，从它的永生希望得来，从它的积极施捨和社会救济制度得来，从它的紀律和組織得来，从它进行宗教上的混合主义的能力和輪廓得来，还是从它在第三世紀里所发展的技巧得来，而这种技巧超过了任何迷信的魔力②。

① 哈那克(Harnack):《教义史》，第2卷，第159,164頁。

② 同上書，第2卷，第336頁。

另一重要的決定因素可能是：異教徒和基督徒在人口繁殖率上有着高低的差別。因為在異教徒間存在着殺嬰的風氣，而在基督徒間這種殺嬰的惡習，則被禁止的。

教會經過戴克里先時代最後一次的大迫害，比前更強。帝國政府的失敗，正是教會的勝利。可是，在精神方面，教會是受着損傷的。很多最勇敢、最優秀的人才已經死了。剩下來的，大多是屬於起碼等級的人，懦弱而少勇氣，為了策略而竟願犧牲原則；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財產，他們妥協了，甚至變節了。

十年之後，即在313年時，君士坦丁在米蘭詔令里，准許了宗教容忍。於是基督教遂成為一種合法的宗教。基督徒的人身和財產獲得了法律上的保護。但是，第四世紀基督教的勝利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付了極大的代價而獲得的勝利。跟着君士坦丁之後，統治階級、富人和奔走名利之徒，遂大批地涌入了教會，他們同時帶入了他們的原有的道德品質和社會準則以及他們所習慣的行為方式。結果，教會和世俗的界綫被模糊，宗教從屬於政策和政治，“起碼”的男男女女侵入了教會，理想越來越低，突如其來的巨大財富，起着腐蝕作用，而精神也硬化了。

第四世紀中，教會歷史上的突出事實是教會急劇轉變。它不復是一個由窮人和中等階層的人所組成的宗教社會，而變成為階層式和官僚式組織的團體，崇尚奢靡、爭權奪利的團體了。為了獲得那有財有勢的異教貴族的支持，為了取得他們的財產，教會向世俗投降了。教會權威的增加，是用喪失精神活力的代價來取得的。這種道德墮落的速度令人驚異，和它腐化的程度一樣。墮落情況竟達到了這樣嚴重地步，還不到一世紀已有不少重視道德的人士宣稱：教會對它的興盛所可歎息的理由，反而多於對它第三世紀所蒙受的災難和迫害。試把原始基督教和第四世紀的基督教比較一下，所可獲得的結論必然是令人沮喪的。歷史的分析往往就是病

症的診斷。研究第四世紀教會的道德和宗教生理，不是研究它的健康狀態，而是研究它的疾病；研究它的精神損傷、它的各種腐敗和弊端。

基督教僧侶，象異教教士、大學教授、雄辯家及醫生那樣，可以豁免稅役，即那些壓在很多人身上的重稅。結果，為了免繳賦稅，有“一批不信上帝的人爭求聖職”，尤其是那負擔很重的中等階級的上層。那些尋求聖職和鑽營名位之流侵入教會職位；他們爭求登用，把政治“關係”、社會勢力、甚至賄賂，來影響教會和政府，以求實現他們的目的。

由於這種出乎意料的情況，不到一年，政府震驚於它的進款的減少，不得不採取措施來限制僧侶的特權，以防止納稅人的逃稅。聖杰羅姆寫道：“我倒不抱怨這項法律，而是抱怨那些促使它成為必要的原因”。但是，當政府准許教會免繳象別的富人們必須繳付的所得稅的時候，當政府除道路和橋梁稅外不向教會征收任何稅款的時候，它怎樣能夠限制這種弊端呢？從世俗的和教會的立法的數量上看，可見政府對限制經濟流弊的努力，沒有獲得良好成就；我們可找到在整個兩個世紀中，關於這一問題的立法，特別是在360—361年和398年瓦倫丁尼安一世、狄奧多西大帝及其兒子所制訂關於禁止授聖職給中等階級上層分子的法律。在439年，瓦倫丁尼安三世在西羅馬皇帝中作了最後一次的努力，以求防止人們用成為僧侶來規避他們對國家的義務之流弊；他把聖職限于授給那些財產不滿三百蘇里德（約合一千美元）的人。但是所有這些限制性的立法都沒實施過。這種弊端在羅馬帝國存在的整個時期中從沒糾正過來。第五世紀中聖奧古斯丁抱怨地說，很多人進入了教會，只是因為他們希望可獲得某些世俗利益而已。查士丁尼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終于把政府的政策掉轉頭來，以管理城市財政之權授給主教。在民政方面，主教的特權，甚至還要廣大。他督察低級城市行

政官、行使从前由保民官所执行的否决权，监督公共建設和城市撥款，稽核城市帳册，最后他还亲自選擇城市管理員。很有意思，拉丁文“episcopus”（英文 Bishop [主教] 是由此得来的）这个字，是有时用以称呼异教庙宇的財政官的。

主教的政治势力和財富这样的发展，对教会所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教会和世俗間的界綫比前更加模糊了。有人認為，教会是不贊成这种宗教和世俗职务間的密切联系的，它欢迎政府对阻止富人闖入它的教士团体所作的努力，“作为防止不足取的教士的办法。”但是，我是沒有办法来找出資料以証明这种說法的。教会一旦尝着权力的甜味之后，再也不愿离开那世俗筵席了。

关于限制主教追求帝国政治势力的立法早已出現。阿塔內細阿对教会中剧烈爭夺有利可图的职位的現象，发出长歎。在撒狄卡會議(344年)上，奧賽阿痛罵主教爭求“宮廷上世俗爵位和权力”，而这會議的第七項立法企图限制这种行为。半世紀以后，杰罗姆还是在指斥这同一的弊病。非洲的主教，由于这种恶习，变为臭名昭著。較小的主教，整个來說，是醜态百出地爭求帝国恩惠，来获得更有实利的登用。下級主教，往往力图使用宮廷势力，来繞过京都教会，甚至长老为了逃避主教的管轄，也使用这同样的方法。

現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第四世紀中教会官职在数目上增加，一部分当然是合法的，因为在新形势下，給教会展开了更大的机会和更广的活动場所。然而，无可否認，高級教士所享有的榮譽和報酬，在吸引很多人加入僧侶等級方面，构成了一个有力因素。利希脫估計：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在帝国一百二十个省內，长老的数目达到一千八百个之多。尽管我們沒有什麼象統計数字一类的东西，可資証明，可是那些保留下来的材料，足足以使我們至少約略地計算出这大量增加的幅度。在教皇哥尼流时代(250年)，羅馬教会曾維持一百五十四個僧侶。如果說，在狄西阿迫害时期，大教堂

尚維持这样数字的職員，那末 313 年后这项数字該是怎样呢？据阿塔內細阿的估計，322 年时屬於亚历山大城教會的，有着十六个長老和二十四個管事；甚至在阿利阿叛乱后，335 年时，还有着十六个長老和五个管事。教會立法原早已力求把僧侶的不必要增加加以限制。可是，335 年时阿塔內細阿还是帶着五十个主教来出席太尔會議。400 年时，霍挪留曾規定：教會应要求修道士帮助教士工作。但是显然，这种限制性的立法沒有达到了目的，因为生在第五世紀中期的索左門还說道：“在很多教會里，流行着不同习惯……例如在叙利亞，許多城市只是共有着一个主教；而在其他地方，甚至一个村庄里，也委派了一个主教，象我在阿拉伯和塞浦路斯以及在弗里加的諾維細安人和蒙退那人中間所亲眼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是很不一致的。甚至在利奧大帝时代(440—461 年)，我們看到还有教皇抱怨地說：在一个長老已是綽乎有余的教會里，竟然指派了主教。教會为了維持这种教士队伍，开支龐大，尤其是因为主教們仿效着省长衙門的豪华风尚和仪式。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无怪乎巴錫尔对宗教行政上的浪費，发出长叹息了。

但是对教會紀律來說，財富的迅速大量增加比特权和豁免权甚至发生更大的破坏作用。第四世紀中僧侶拥有“寵幸階層的特权和富人階層的勢力”。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而教會也是穷的。慈善救济事业几乎用尽了一切来自信徒的捐款。下層僧侶天天在市場里、商店里工作着，只求糊口，而不領薪給。教會的不动产，主要在于墓地以及冒充作工人团体集会的場所。这些建筑物往往又小又不牢固，所以时常从一个老的地方移到另一个新的地址。在瓦勒里安和戴克里先两次迫害之間长久和平时期(258—303 年)，跟着基督徒人数的大量增长，他們的教會在数目和規模方面，都扩大起来。但是，那維持僧侶階層和教會建筑物的費用，还是依靠着捐款。那时，沒有，也不可能有贈与基金的。

但是，在 313 年後，財富象潮水般地涌進來了。不僅發還了戴克里先時代所沒收的私人的、教會的、基督教財產，而且有大批新的豐富贈與，賜給教會。君士坦丁的早期詔令之一，命令把“基督徒過去時常集合的場所”，還給基督徒，不管這財產已經收入國庫，或已經轉移到私人手里。對於後一情況，所有人可從國庫獲得補償。君士坦丁甚至撥出公款，來修理老教會房屋並建造新教堂。但是，這些贈與也許是從皇帝的私人錢袋里拿出來的。姑不論它的來源如何，君士坦丁和他的母親赫勒拿，的確，在給教會的贈與方面是很慷慨的。教皇西薇士德一世的傳記中，包括有一張長表，列舉那些接受君士坦丁從國庫領地撥出來的土地贈與的教會，即在羅馬城以及在意大利別處的教會。羅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希力奧波力、尼哥米底亞、安提阿、伯利恆、迦太基以及其他城市，通過帝國政府的資助，都有着教堂點綴着。這些教堂好多不是新造的建築物，而是象拉特藍宮殿那樣，屬於皇帝的大廈；據說是由君士坦丁獻給教皇的。早在 324 年時，已有一本收租卷冊，里面特別注明：“在意大利、非洲和東方某些房屋、商店、花園和田莊是屬於羅馬三個教堂的，即聖彼德教堂、無牆垣的聖保羅教堂和聖約翰·拉特藍教堂。”到吉雷西阿斯一世時代（492—496 年），教皇領地顯然是廣大的，而且它的管理，是依照偉人格列高里（590—604 年）書簡里十分詳盡地透露出來的組織方式進行的。

教會被賦予一種接受遺產的無限權力。“領受每個人在臨死時願意留給最神聖天主教會的產權証。”^①把遺產給教會，成為一種宗教義務的形式。為了使教會致富，許多基督徒剝奪了他們家屬的財產繼承權。好心腸的主教限制了這種贈與的流弊，但他們儘管指責流弊，還是堅持着原則的。聖奧古斯丁，在其一次講道里說

① “Habeat unusquisque licentiam sanctissimo catholico venerabilique concilio, decedens bonorum quod optavit relinquere”

道：忠实基督徒“应把基督放在他們的子女中間来考虑，并使他成为分得他們的遺產的一个人”。根据攸西比阿斯的話，君士坦丁會命令，一切殉道者的財產，如果他們沒有繼承人的話，应給予教会。瓦倫丁尼安一世和狄奧多西大帝曾規定：凡死而不留遺囑的或沒有嗣子的教士或修道僧所遺留的財產，应归給他們所屬的教会或寺院。一項补充法令，还規定了一个死去的主教的全部財產，除非这些財產是在他升任主教前获得的，或者从他的父母遺傳下来的，应留給教会和救济事业。根据羅馬法条文，凡是关于叛教和异端的罰款或沒收的財產，都归入国庫；可是，在实际上，其中很多款子是流入僧侶的錢柜的。教会的不动产，曾被宣布为不可剝夺的，如果出租地产超过了三代的时期，那是教会的違法行为。

第五世紀中对教会的贈与增加起来了。关于这方面，宗教历史家掌握着丰富資料。索左門說过：要描写狄奧多西的姊妹浦尔契亞所建筑的巍峨壮丽的禱告厅，所創立的穷人和旅客的救济所以及修道院的房屋，那不是在一个短时期所可做到的。“上帝、教士們以及一切羅馬帝国的臣民，都可作为她慷慨解囊的証明人。”她曾以精致地鑲嵌着黄金和宝石的桌子，贈給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索左門接着說，“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記述的話，讓他去查一查那公主的管帳員所保藏下来的帳册吧。”有一个西班牙的富裕的女繼承人米兰尼亚，十二岁出嫁，二十岁守寡；她的慷慨气魄比君主还闊綽。她的同时代的史家帕雷狄阿斯，作出下面的一段描写：

她曾把所有的絲綢衣裳，贈給神聖祭壇，她剪裁了她的其余綢服使它适合教会的別的用場。她曾把她的金銀付托給一个長老（他是来自达尔馬提亞的一个修道士），并曾把金銀經過海路輸送到埃及和提貝易德去，数达一万个大流^①；她送出一万个大流到安提阿去，但对巴勒斯坦，則送了一万五千个大流。她曾捐贈一万个大流給那些島嶼上的教会，給那些被放逐的苦人，

① 大流是古代金币名。——譯者

而且，對西歐的人們，我指那里的教會和修道院內的人們，對接待旅客的招待所，對一切貧困的人們，她還曾親手分發了她的贈與品。此外，她一定還曾捐出四倍上述數字的款子。

第四世紀教會史上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那爭造教堂的熱情。教會遭受了一種強烈的“建築熱症”，這種活動，一部分固然是由於正當的擴展願望，來適應人數越來越多的新需要，可是，一部分是由鋪張炫耀的病態狂熱而產生的。連早期的寺院主義也遭受了這種氣氛的影響。尤西比阿斯寫道，“許多教堂又從地面上巍峨地高聳着，豪華氣象，遠非過去被破壞了的教堂所可比擬。”在一個短時期內，這種狂熱竟達到了這樣程度，以致頭腦清醒的教士象聖杰羅姆那樣，提出了抗議反對這種無謂的浪費，而這種資金原可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的。杰羅姆不是沒有理由地抱怨說，教會變得太浪費了，教會對它們的外表裝飾比對管理它們的教士們的品質，給予更多注意。“今天，許多人建造教堂，考究它們的光滑云石牆垣、柱子，黃金閃鑲的天花板，鑲嵌着寶石的祭壇。可是，對於基督的牧師的選擇，則滿不在乎了。”

但是，這一時代的感情，却是和安布洛茲一致的；他寫道，“教士應該特別以適當的華麗來裝飾着上帝的廟宇，使主宰的宮廷輝煌顯赫。”杜森曾列舉在 200 年時期羅馬城內新建的或修復起來的二十三所教堂，他還列舉從西薇士德一世任教皇（314 年）到霍密斯達任教皇時期（514 年），在羅馬城外的五十所教會；而且他承認了這項資料還是不夠完全的。從那些關於建造教堂活動的資料看來，結論必然是：這種開支一定是遠超過正當的需要；其中很多是屬於奢侈和浪費的。儘管有私人的贈與和政府的資助，那几百所建築物所需的經費必然是一個很重的負擔。

另有一個弊病，教會必須予以對付的，是那些無所事事的富人們鑽入教會隊伍的情況，對他們來說，基督教已成為一個时髦的

東西。

基督教会被迫害火焰鍊得純潔的時候，對有野心的俗人來說，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担任教士职位是太危險了；所以除了純潔而又熱心的基督徒以外，再也沒有人要担任它了……然而，当教会的世俗地位，由于它在整个帝国中的优势，无可估計地提高以后，它遂成为实现野心的途径；同时它的财富，对懶惰和荒淫之徒提供了淫乐放縱的前景①。

輕佻的、有时放蕩不拘的男男女女，在玩膩了崇拜埃西和奧賽烈司，或弗里加的神秘教，或其他一些在后期羅馬帝国占有勢力的，象克拉勒姑娘②那样的无数东方宗教之后，在覺得厭倦于彷徨的岁月之后，为求得另一种新奇东西来鼓动他們的疲乏想象力，就力图在基督教里找寻一种新消遣。現在宗教迫害的危險已經过去，而且皇太后对新承認的信仰，又給予保护；所以社会上鑽營名利之流，群集于教会了。后期羅馬帝国貴族，在加入教会以后，完全未曾放棄他們的世界觀、階級和人生觀以及他們的傳統和偏見。另一方面，由于教会已向世俗妥協，俗人在教会里也不覺得有什么不慣情况。第四世紀中这种基督教貴族的图景，不是一幅动人的图景。

当大批輕佻放蕩不做事的富人們，从上面来侵入教会的时候，在同一时期，另有乞丐騙子群，装成貧苦和忠誠的样子，从下面来涌入教会；他們是被基督教的新財富和救济工作所吸引而来的。大城市的貧民，原是慣于依靠公共救济度日的，現在发现了一个新的供应場所。在一种意义上，教会的这种腐敗階層被拋棄了，而这一階層原是几百年来由羅馬施行有害的社会經濟政策培养出来的；但是問題是：教会是否曾把它所要解除的禍害，加剧起来，因为

① 李亞：《僧侶獨身制度》，第63頁。

② 指意大利尼姑聖克拉勒(1194—1255年)；她曾建立“勞苦姑娘教團”，后称勞苦克拉勒教團。——譯者

它欺騙的慈善，提倡了一種大規模的乞食制度。聖安布洛茲不平地說，“乞丐的貪心不足，從沒有過比今天更甚者。他們鼓足勇氣而來。他們之所以來，除了他們是在流浪的理由以外，再也沒有什麼了。”聖巴錫爾抱怨地說，要在真正貧苦者和騙子之間作出區別，是困難的。在教會圈子內，行乞已成為一種職業，象在外面異教世界裏，有數以千計的人久已干着這勾當那樣。到第四世紀末期，羅馬城的基督徒乞丐群，幾乎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等級。安密亞那斯·馬塞里納記述了下面一件故事：“367年時，當蘭伯庇阿將軍舉行某種盛大競賽會而分發大量的賞賜的時候，因為不堪忍受那批群眾往往奪取那些發給窮人的賞賜所發生的騷擾，為了表現他的慷慨和對群眾的蔑視，他一怒從梵蒂岡招來了一大群乞丐；並給予大量贈品，使他們發財。”

毫無疑問，教會的財源，綽綽有餘地可供給它在第四世紀中的正当需要。但是，僧侶階層的貪得無厭以及市政當局把維持城市中流氓無產者的負擔推在教會身上的傾向，兩者都使教會急於爭取新的財富。在教會力求摧殘異教運動裏，經濟自利心確是一個因素。異教教士們，大多是有錢的土地所有者。僧侶階層又垂涎於各種異教神廟所擁有的大量基金，這些神廟在羅馬世界裏的每個城內、每個省內都可以找到的。在君士坦丁的兒子們時代，教會開始了那剝奪異教廟宇財產的運動。君士坦丁原來規定了帝國內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間的平等地位。異教信仰不受排斥，異教廟宇不受騷擾，它們的財產受到保護，它們的特權繼續維持。可是到341年時，昆斯坦斯禁止了城市內舉行祭祀。君士坦都督以亞歷山大城太陽廟以及它的全部財物和進款，贈給亞歷山大城教會。狄奧多西還把塞拉匹神廟的全部基金給它。約在347年時，有一個名叫馬脫那斯的作家（不要把他和那同一名字的早期異教作家混同起來），曾出版一本題為“異教的荒謬”的小冊子，里面，他為了教會

的利益，曾擁護那沒收全部廟宇的財產的主張，甚至提出了并辯護了劫奪異教神殿的要求。

皇帝的貪婪心理，被主張沒收財產者巧妙地玩弄着。異教神廟的地產、黃金器皿和祭壇用具，代表着一項龐大財富。由於統治者的恣情揮霍，行政制度改組後的政府開支的激增，以及宮廷的奢侈風氣，儘管把賦稅一倍倍地提高起來，但政府維持開支卻越來越感困難了。有些騙取政府和宮廷官位的基督徒拚命要錢，慫恿皇帝走上這條掠奪的道路；他們曾指出皇帝有合法的權利，來奪取那些神廟的財產，因為依據羅馬法，所有的神廟土地，理論上是帝國的一部分，又因為皇帝對羅馬帝國內各種信仰，是世俗的當然首領，所以他可隨意將任何神廟財產并入國庫里。各種異教的無組織性，又是它們的處境的另一弱點。這些異教，種類繁多，沒有共同信仰，也缺少象基督教那樣的普遍性；這一事實，使它們容易成為這項掠奪政策的犧牲品。它們是不能團結起來的。

皇帝朱理安曾力圖重振異教搖搖欲墜的勢力，因此，他在幾百年中蒙受了誹謗，直到近時由於研究的結果，他的性質才從他所遭受的冤屈里拯救出來。他曾敏銳地看出異教信仰的弱點，努力使它們復活起來。他曾看出基督教由於它宗教的社會化性質而擁有力量；在他一封著名的書簡里，他指斥了異教教士階層沒有發放救濟金、救助貧苦者和受難者，也沒有維持醫院和學校象基督徒所做的那樣。他譴責了競技場上的野蛮行動以及舞台上的淫猥表演。可是，異教徒沒有能夠響應皇帝的這項號召，使自己適應於那改變了的環境，使自己的宗教變為社會化起來。這是它的最大弱點，也許就是它之所以失敗的基本原因。那些怠惰的教士，實際上大多把神廟的財產用在世俗方面，為了自己的享樂而消耗它們，至於神廟，則任其荒廢。

從本質上看來，朱理安的下列措施，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

是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的：他以立法来取消僧侶階層所獨享的特權和豁免權；他从公共帳冊上勾銷了那批象水蛭般地纏住的領取卹金的基督徒；他禁止了主教們免費使用政府的驛站系統，他們享有別人不能享有的免費權利，由政府開支，在陸上海上來來往往；他強制了教會發還那些異教廟宇的財產，而這些財產是教會用賄賂朝廷方法所取得的，或者，是擅自掠奪來的；他要求基督徒和帝國的其他公民一樣地履行着民事上和軍事上的義務。

但是，朱理安關於限制教會弊端的方法，非但沒有成為對教會的一種補藥，來祛除它內部的一些渣滓和腐朽東西，反而使它更堅決反對異教。象英國亨利八世掠奪寺院財產那樣，當時，掠奪異教財產，是一個逐漸的過程，歷時好多年代。這項過程是由君士坦丁的兒子們開始的；據說，在他們的朝廷上，“有些人吃用着那從神廟劫奪來的財產，從而他們從最窮的窮漢而變成為富翁了。”但是，主教和朝臣們一旦嘗着劫奪的味道之後，都渴望着更多的財富。在東方，亞歷山大城主教提阿非羅，是這項偶像破壞運動的領導人。在西方，這運動的最熱烈首領，是米蘭城聖安布洛茲；他詳細引証了猶太人在安泰奧卡斯時代的行為（載在《瑪喀比書》中^①），作為教會應該依循的先例。

這一問題，到狄奧多西一世時代，即在基督教升到帝國國教地位的兩年之後，發展到最高峯了。392年的詔令，在法律上沒有排斥異教，但是，異教徒從教會要求排斥異教的叫囂里，從皇帝的日益親基督教的傾向里，已看出對他們的不吉之兆了。394年時，羅馬軍隊中一個法蘭克軍官阿波卡斯特刺死了瓦倫丁尼安二世。該軍官因為不敢篡奪西方的皇位，乃立猶琴尼烏為皇帝。當時，異教徒就馬上擁護新皇，而新皇也立刻用恢復異教神廟的財產，使異教

^① 瑪喀比是在安泰奧卡斯四世時代宗教叛亂的首領之一，屬猶太族；《瑪喀比書》就是《內經》中之二卷（瑪喀比書一、二兩卷）。——譯者

徒重得收入，来求得他們中間的拥护者。这种措施以前格累細亞和瓦倫丁尼安都是拒絕采行的。在狄奧多西平服异教叛乱之后，跟着，发生了对异教的一般性取締，即对一切异教財產的普遍沒收。那时基督教取得了宗教上和物質上的全面胜利。我們很幸运还保存了一首为庆祝这事件的基督教胜利歌的手抄本。然而，神庙本身还是沒有一般地被搗毀；只是它們的財產被沒收，它們的神殿被封閉而已。当时，沒有象亨利八世时代英国教会所遭受的那样破坏景象。“从我們所可得的关于破坏特殊神庙的唯一記載里看，可知所有被破坏的神庙，都是有臭名昭著的仪式的神庙，或者是那些神庙，它們的存在使社会中基督徒觀念受到特別的侮辱。”教会已經有着它所需要的足够房屋。而且，可能有人还会追悔曾把异教神殿改作为基督教圣所的举动。直到第七世紀重新建造教堂的时候，庙宇才被拆卸、破坏，它們的石头才被移作建造新建筑之用。潘提昂庙被保存下来，改作为一所教堂；那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东方基督教比拉丁基督教在偶像破坏运动方面远远地更激烈，因为在那里，僧侶激起了群众的瘋狂并煽动了群众的暴动。君士坦丁堡的圣約翰·克立索斯吞和亚历山大城的息立尔（海派希亚牺牲在他手里的）表明了那些力主毁灭异教者的情緒。然而，甚至异教神庙在各省內已被封閉，祭壇已被搗毀，僧侶已被剝夺了进款而分散之后，异教崇拜还是在辽远地区，在沒有教士的状况下，偷偷摸摸地保存下来，直到第七世紀时为止。

毫無疑問，第四世紀中使教会腐化的最坏源流，是它大量而迅速获得的財富。这在教会史上，原是数見不鮮的。不幸，那时沒有象圣法兰西斯这一类人来号召教会离开它的粗野和物質的方式。“教会中的節約剩余”从来是不大的。但是，可以怀疑，基督教是否会象 300 年至 800 年之間的几世紀中那样墮落下去。当时高級僧侶們的貪得无厭、他們的力求猎取遺產、他們的世俗性、他們的揮

霍性、他們任用私人和詐欺取財的行為，都成為基督教道德家和諷刺家的好題材了。聖杰羅姆在400年時寫的又談諧又諷刺的“主教的日子”一文和朱未那爾及琉息安^①所寫的，是屬於同一類型的。

簡直令人喪氣的，是在第四、五、六世紀中的宗教文學里，看到現在名義上基督教歐洲的大部分人會這樣深深地沉溺於多神教的道德，異教的神話、習慣、風俗，拜物教，信仰符咒里。哈那克寫了下面一段辛酸而確實的話：

神學家們經常在心里想着僧侶、官吏和“良好”社會……而一般人……的生活却不是按照這種信仰，而是按照那第二等級的基督教的；就是，那表現在聖徒故事里、在偶像崇拜里、在尊敬天使和殉道者里、在十字架和符咒里，在把彌撒看作魔法崇拜里的基督教……我們在偉人格列高里方面和在第七次宗教大會的最後決議里所見到的基督教，就是第一等級基督教，顯示和那種隱藏的、徹底迷信的和多神教的“基督教”之間的最密切的結合，而從第三到第八世紀幾百年的時期乃標誌着這種融合過程上的各個階段。^②

為了和庸俗道德妥協，教會曾付出代價，也為了實施這種庸俗道德，教會擁有了一種為古代世界從沒有人知道過的工具，而這工具是有着特殊的社會動力的。吉本論及古代人民的時候，說過：“他們在現世生活里的行動，從來不以什麼來世的報酬或懲罰的嚴肅信仰來支配的。”但是，在教會勢力支配之下，社會上作惡的人們，會受到了那在來世生活中被處罰的威脅。基督教會大力地引用宗教制裁方法，作為一種道德上的警察力量，以求維持公共秩序和保護財產，而這種力量在古代世界裡是從不知道的。雖然不可能估計通過教會紀律和懲戒制度對社會管理上所發生的影響究有多少，但是，這種制度的力量 and 效果，是無可否認的。

① 兩人都是羅馬的諷刺作家。——譯者

② 哈那克：《教義史》，第4卷，第106, 304—305頁。

整个來說，关于第四、第五世紀的教会，历史的裁判是一个对它不利的裁判。有一位生于或死在教会史早期里的最大学者，記載了这一种意見，作为他对教会的深思熟慮的判断：

基督教本身以最有效的方式，助长了社会的腐朽状态；既然如此，它就不可能把群众提高，来建立一个按最中庸字义名实相称的基督教社会；相反的，它对群众的許多需要和愿望，一再地作出了讓步。有很多因素，促成了这最后結果，尤其是政治史上的冷酷的发展和經濟上的困难状况。与此密切地联系着的，是撤銷貴族、自由人和奴隶之間的古老区别，跟着而来的，宗教上和知慧上的“野蛮性”透入了上層等級，而这种野蛮性在下層等級里从沒被克服过。^①

“黑暗时代”的形成，至少，由于教会的腐敗不亚由于羅馬文明的衰敗，或“蛮族”的侵入。

在羅馬帝国内，教会所发生的影响远不是一个建設性的影响，而是一个头等重大的瓦解和分化的影响。在这点上，它所起的作用，象所有的东方宗教一样，是朝向摧毀古代社会的整个机构，但是，正因为它是东方宗教中的最大的宗教，所以它所发生的效果，也是最大了。詹姆士·弗雷泽勋爵，一位比較宗教史的卓越作家，写过下面一段話：

希腊和羅馬社会，是以个人屈从国家的概念作为基础的；‘它把国家安全，作为行为的最高目的，放在个人安全之上……所有这一切，由于东方的宗教傳布而改变了；东方宗教灌輸了灵魂和上帝間的感通的思想，而灵魂的永生作为唯一值得爭取的目的了；与此相比，国家的盛衰兴亡都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位。无可避免的結果……乃是吸引信徒越来越多地脫离了公共服务，使他們的思想集中在他們的精神情緒方面，培养了他們对現世生活的輕視；他們把現世生活，認為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和永生的生活所作的一个試練而已。在一般人的观感上，那聖徒和出家人对現世蔑視，对天国心移神往的生活，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而这种理想遂替代了那旧有的英雄和愛国主义的

^① 哈那克：《教义史》，第4卷，第270頁。

理想；愛國者和英雄們願意捨身為國，赴湯蹈火而不辭……所以，那生活的重心，似可說，從現世移轉到來世了；不管另一世界可獲得了多少，但可無疑問，這個世界，由於這項轉變而招致了重大損失。政治機體的總瓦解就出現了。國家和家庭的聯繫，也放鬆了；社會的機構分崩離析，因而陷入了野蠻狀態；因為文明只有通過公民的積極合作，以及通過他們把私人利益從屬公共利益的願望，才有可能。當時，人們拒絕了保衛祖國，甚至拒絕了繼續生育。由於他們念念於自己靈魂的獲救……他們滿意於擺脫了他們周圍的塵世而長逝，而這個世界他們原本視同罪惡的本原。^①

尼斯會議以後，最早時期神父的著作滿紙洋溢着教條主義爭論的氣氛，或充滿着對那批從加黎利派來的傳道師和護道師的態度和品德所作的輕蔑謾罵的激烈言詞，或放出迷信的氣味，當我們逐頁翻閱這些著作的時候，我們就有無謂爭辯和幻滅之感。當時，在東方，有三個偉大的卡帕多細亞人：巴錫爾和尼薩·格列高里（肉體上的胞兄弟，又是精神上的雙生子）以及納塞安會·格列高里；在西方，有聖安布洛茲、聖杰羅姆和聖奧古斯丁；這六個人曾舉起拚死效忠於基督教的旗幟；他們比任何別人是更多可敬而更少有可責的理由的。

蒙退那派，是曾建議給僧侶以規定工資的第一個教派。

因為僧侶階層越來越多地變成為社會里的一個特殊階層或等級，所以教會的老式經濟制度，對新的條件已不復適合了。在使徒的時代，僧侶原是自己維持生活的，這種經濟上獨立的理想繼續存留，直到第四世紀時為止。最後由於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對教會所作的變革，一個新的原則就迅速發展起來，就是說，凡是在祭壇供職的人應依靠祭壇來生活。因此，教會負擔起那維持僧侶生活費用的責任，教會的這一改變是重大的。

我們可合理地想象：從教會財產的大量增加情況看來，在313

① 弗雷澤：《三神傳》（“Adonis, Attis, Osiris”），第1卷，第299—301頁。

年以后僧侶的工資可以充分滿足他們的需要。這些工資，在大多數場合下可能是夠的，即使僧侶們的貪欲不會使他們大胆地從事外面的商業買賣行為，以圖擴大他們的收入。我們有少數幾個例子：在狄奧多西一世時代，有一個馬朱麻的主教芝諾能把麻布織工的生涯和他主教的職責成功地結合起來；另有一個在阿卡狄阿斯時代的梳羊毛工人利奧即卡帕多細亞的僧侶，巴錫爾曾使他經營着固定貿易。394年時，聖杰羅姆寫道：“救濟窮人，果然是一個主教的光榮，可是從貿易里積聚私人財產，却是教士們的恥辱。”聖安布洛茲，在他的“牧師的責任”一篇論文里，警告說，“應該掃除那愛錢的欲念。教士們不該從事貿易。利潤便是狡詐的標記。”他勸導了教士們從事農業，而不要做生意。教會里禁欲主義的培养原不是單單由於對獨身生活卓越品質的信念而來的。它一部分是用作一種方法，來阻止僧侶中間肉欲主義和世俗性的增長，一部分也是為了防止那些荒唐的僧侶、教士或主教把教會資金挪作私用的弊端。

從第三世紀起，主教在管事協助之下，掌管着教會財產。不是每個主教，象那尼亞的約翰主教一樣認真地記載着所管的事務。由於流弊的不斷發生，341年安提阿會議就不得不規定了教士和管事應具備關於財政管理的知識。在加爾西頓會議上所提出的主教盜竊公款一案，使教會財產管理的整個事情有了結論。這裡，正式決定了每個主教應指派一個僧侶，充當財政管理人員，在他領導下來管理主教區財產。教會關於限制由經商給僧侶帶來的腐化影響的立法是卷帙浩繁的。僧侶不該常逛十字路口和市場，不該在旅館周圍徘徊着，不該出去“兜攬生意”，不該用別人名義來賺錢，不該充當財產的保管人，不該做遺囑的執行人，也不該去獵取遺產。451年加爾西頓會議，把這種性質的一系列的立法明白地記錄下來。但是，從幾百年來形成的貪婪心理，已成為教會易犯的罪惡。僧侶們

惡劣地濫用“水能滅火，所以慈善能滅罪過”這一行著名詩句，來騙取信徒的贈與。這種思想，在中世紀的土地贈與或物品的贈與里，時常可以看出。原在神父時代，基督徒在他們貧困狀態下——因為他們所有的財產，是很少的——進行着施捨，來擴大福音，救濟病人，幫助窮人。可是，從第四世紀起，給教會的贈與，大多基本上不是為了別人的利益，而是為了拯救施捨者的靈魂。這是一種表面上不自私而實際上自私自利的行為。到了一個時期，一個人在他的遺囑里，必須把他財產的一部分，遺給教會；如果沒有嗣子的話，他還須把全部財產遺給教會。這種圖利的圈套，在 398 年迦太基會議法規第 103 條里表現得很明顯；它規定：富孀必須熱心替上帝服務。

安密亞那斯·馬塞里納是最後一個拉丁歷史家，關於他是一個異教徒還是一個基督徒這一問題，原是可以爭辯的，但是，很少有人會否認他是一個誠實的作家。的確，在第四世紀中所有的作家中，他是一個最不偏不倚的觀察家；他對當時的主教所作的描寫，遠不是阿諛的；這些描寫証實了下列一項論斷：即這批基督十字架的正式代表們，不得認為是有道德修養的人。367 年時，達馬薩和厄賽那斯在爭奪教皇位的衝突時，各從羅馬流氓無產者中間招羅了打手和暴徒。這是一個打到底的搏鬥；當搏鬥過後，有一百三十七個屍體橫陳在西西尼那斯大廈前的大道上；“這是一所基督教會，”安密亞那斯帶着輕蔑口吻接着說。

你以為卡帕多細亞的喬治，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是亞歷山大城的捐客、銀行家和主教。第四世紀中，再也沒有一個主教，這樣地抓住了那由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一世的新恩澤所提供的物質機會，把它更有利地利用着。他把基督教化作資本，把權力轉變成紅利，并使教會成了營業的工具，就效率和氣魄論，今天華爾街的每只豺狼對他也将羨慕不止。他一度曾服務於帝國的財政機關，在

阿利阿教爭論中，他放棄了這項職位，轉到那由教會提供的經濟剝削更廣大範圍去活動。在阿塔內細阿流放之後，他擔任亞歷山大城阿利阿主教，他表現了一個工業巨頭的卓越才幹。他在小麥市場上下着投機生意，組成“托拉斯”來開發埃及沙漠的硝礦，“壟斷”食鹽貿易，占取廣大沼澤地帶，在那里種植紙草和蘆葦，來製造紙和筆，最後還組織公司，來獨占亞歷山大城的殯儀館生意。

卡帕多細亞的喬治也許是一個極端例子，幸而，當時也有抱着真正責任感的主教。當帝國政府日益衰敗的時候，主教座，正是由於政府的放棄職守，被迫擔任行使那些原屬於各省省長的職權。據記載，塞浦路斯的主教，提奧多里塔斯，從他的主教座的收入項下，撥出款項來建造兩座橋梁，照管公共浴場，建築通水道以供應城市的飲水。在這同一島上，另有一主教埃匹非尼阿，他先花掉了自己的祖傳產業，繼而使用了教會的財產，來救濟窮人和遭船難者。有不少主教幫助那被壓迫的羅馬中等階級。在這類聰明而精力充沛的主教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個主教，是息多尼阿·阿坡利那里，即第五世紀高盧的克勒芒主教。

他相信一種基督教，就是，和世俗相接觸來革新世俗并支配世俗的基督教……在清晨時間，他接待所有的來人，听取控訴，調解紛爭，辦理很多屬於一個行政長官的職務……他有着和市議會有關的重要職務……他必須監督他教區內的土地耕種。第五世紀中不管在世俗事務或宗教事務方面，城市社會中的真正首領往往是偉大教士。元老階層儘管有着廣大土地和富有教養，但他們的權力一般不會超出他們莊園內農奴之外的。^①

在今天社會活動家中有誠實的人士，甚至有理想家，同時也有自私自利夸夸其談、言行不符的政客，第五世紀的教會情況也是這樣的；在野心的、汲汲於名利的主教、鑽營官職者、社會上向上爬者

① 第爾：《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世紀里的羅馬社會》，第214—215頁。

中間，也有若干理想家。聖奧古斯丁在所有的這類理想家中，是最偉大的理想家，也是在這些早期基督教會中的最熱心的基督徒。他同時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一個理想家、一個傳統主義者、一個熱情的天主教徒。他很少意識到歷史遠景，可是，對於教會歷史的發展，在神父時代，沒有人，除偉人格列高里以外，比他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奧古斯丁，由於情勢的逼迫，由於天才和品質的關係，比別人適於向世界表明教會對人類的永久價值。在《上帝國》(De civitate Dei)一書里，他力求以下列信念來說服他的當代：如果沒有理想，則人類的前途是破碎的；一切由人類設計出來的制度，連羅馬的國家和帝國政府在內，在促進社會福利方面，即使是暫時的，也不能象教會那樣成功的。在奧古斯丁看來，有機體的社会，是一個依照教會方式組織並加以管理的社會。奧古斯丁對第五世紀的社會主義的關係，正如卡爾·馬克思對近代國家社會主義那樣。在他看來，高尚的靈魂和卓越的法律都是從教會那里得來的。國家應是教會的仆役；民事和市政制度、商業、工業，簡言之，各種人類的力量，包括體質的和道德的在內，只有通過那作為指導力量和權威的教會，在服務里才可找到它對人類服務的方法。對社會服務，只有通過對上帝服務才行，而教會便是它的神聖工具。那幻想家所想像的社會職務，從沒有過一個比他更好的說明者。

但是儘管有着上述的美好指示，第五世紀的教會歷史，整個說來，却表明了：無論如何，它的腐敗程度是在增長，而不是在減少。在313年以前，看來，未曾有過對教會的買賣聖職和僧侶的不道德行為的很多控告，因為當時教會中的一般貧困和危險的狀況，阻止了這類惡習的發展。但是，當教會迅速積聚了財富以後，當鑽營職位者涌入了教會中以後，不久，買賣聖職乃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了。在尼西亞的補充教會法里，規定了：“任何人不得從擔任主教或長老職務者方面接受任何禮物；任何人有授予或接受報酬情事，將給

予剝奪聖職處分。任何人違犯上項教會法規者，宗教會議里的神父們應給他以開除出教的處分。”撒狄卡會議同樣地制訂了法律。那些古老的使徒教規，有着相同的意義。巴錫爾在總主教的地位，給他屬下主教們的一封長信里，說明了僧侶在鑽營職位方面的各種非法行為。

下引一個例子，可說明那操縱教會職位醜事的性質和範圍。在400年春天，召開了宗教會議，那是由聖約翰·克立索斯吞擔任主席的，大部分是由來自亞洲、本都和色雷斯的主教們組成的。在會議上，瓦倫第諾波利斯主教，尤西比阿斯，曾提出對他的總主教以弗所的安東尼那關於買賣聖職的控訴，當時，后者坐在會議席上。克立索斯吞曾指派三個主教組成的委員會，前往以弗所去調查。但是，安東尼那通過陰謀詭計攔擋了這項調查，不久那個犯罪主教，沒有受罰而死去。於是，有兩個敵對的派別，起來進行着激烈競爭。各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以求填補那空缺，而且，各運用了權力所及的各色各樣方法以奪取位置。

正在教會勝利的那一世紀里，象蒙西諾爾·杜森所寫的那樣，“教會對於任何要過着一個真正基督教生活的人來說，已成為一個不可能居住的地方了。”不可避免的反抗行動，是一定會來的。心地純潔的人，遂逃往沙漠中去。寺院主義連同它的理想化的貧困和禁欲主義，遂應運而生，作為對教會世俗性和粗野性的譴責。第四和第五世紀的教會歷史，說明了歌德的一句意義深長的名言：“每一種思想，只要它受到公眾承認以後，就會起着暴君式的作用。它所帶來的優點，馬上就轉變為缺點了。”

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以後，教會原來可能想到的無論什麼社會、經濟改革方案，都被拋在九霄雲外了。由於掌握着財富和政治權，它變得保守了。而且，教會的整個精力差不多被吸引到教義爭論方面去。在今天的情況下，幾乎每一個人都有着一套改

革社會的理論而教會已成為一個這樣活躍的社會力量的時候，很難理解那時為什麼大家如此集中心思，來激烈地爭辯着那些象神學和教義一類的和平常社會利益沒有多大關係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思索一下，理由是很清楚的。那個時代，對宗教問題的討論自然日益熱烈，因為政府對政治的自由討論加以壓制以及正當的地方政治活動日益萎縮。結果，在當時的宗教問題上，人們就找到了討論和研究的領域。各階層的人們對當時流行的神學論題，熱烈地討論着，象我們今天討論着政治問題一樣。這項討論的興趣，從社會的最上層，延及社會的最下層。尼薩·格列高里有一篇關於群眾對神學興趣的有趣文章，流傳下來。他描寫第四世紀的君士坦丁堡時，說：

這個城市布滿着手藝人和奴隸；而他們都是有學問的神學家，在店鋪里也在街道上，進行傳道。如果你要向一個人兌換一塊銀幣，他會告訴你，聖子在哪些方面是和聖父不同的；如果你要買一塊麵包，他就會告訴你作為回答說，聖子地位低於聖父；如果你問浴室已否準備好，他的回答是：聖子是從虛無中生出來的。

雖然這些異端邪說都帶着一種教義的性質，但如果我們深入一層去觀察，就可看出其中很多是染着經濟和社會的色彩的。對近代人來說，初看，果然難於理解為什麼這些枯燥乏味的神學爭論竟會激起了這樣大的普遍興趣。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就可獲得說明。因為在教會反異教的運動里有着經濟的動機，所以，在第四和第五世紀對異端的大衝突里，也可找出了經濟因素。

教會的龐大財富（主教們日益成為這財富的唯一保管人和分配者）自然而然地保證了主教們的正宗信仰；因為很少有人願意為了辯護一種可疑教義而冒着喪失這樣一個有利可圖的管理權的危險。“一切異端，當他們遇到有喪失權力的危險時候，是會接受信仰的。”沒有一個主教，會轉到異端方面的。那是沒有好處的。因

为政府所賞賜的特权，只是給予那些不同于分裂派和异端的天主教会即“大教会”的僧侶們的。正宗信仰对主教們來說，是一条有利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教会財富所具有的吸引力往往会激起其他僧侶們的野心和貪欲；后者力图排除主教而自己取得那些資金的管理权。对这样的野心家來說，可走下列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不是以异端罪控告主教，以求推翻他；便是开始辯护一种流行的异端，以期取得群众的支持。

有些异端，象弗里加的蒙退那派，西班牙的普立息力安派，从經濟观点來說，反对教会財富所发生的腐化影响，反对主教們的奢侈风气，拥护簡朴严肃的宗教生活。另一类的异端，是留恋于使徒时代的教会，因为那时在若干教会团体內，流行着一种兄弟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类的激烈派和梦想家都是拥护一种教会新社会主义的。

教会中所流行的异端，特别是对阿利阿教派的激烈爭論，不仅扰乱了教会的教义，而且敗坏了教会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組織。在选择主教时，大多不以德性，而以正宗信仰，作为标准。而且，由于有叛离正宗派的行动，僧侶的人数减少了，而教会为了补充它的空缺，使它的机构能照常工作，在选择新任人員里，就往往不能过分挑剔；另一方面，大批求职者，象近代鑽营职位者在一个党派胜利后的情况那样，涌入教会，来求职业。圣巴錫尔在給他的一个通信者的一封信里，伤心地写道，“教会的法律，是在混乱状态中。那些不敬畏上帝的野心家，闖入夺取了高級职位，而現在，象大家知道，高級职位已成为对不敬神者的奖品了。結果，凡是一个对宣誓愈觉有愧于心的人，大家反而認為是一个愈适合于充任主教的人。”

下列情况不是沒有意义的：那些正宗教会所要斗争的最流行而又最强大的异端，都是在阿利阿教派的埃及、一性論教派的叙利

亞和多那特教派的非洲，就是說，在那些國家里，在那里希臘化時期的文化或羅馬帝國的拉丁文化，原是一種由征服者所強加于上的外來文化。其中每一個國家，過去都有過獨立的地位和一種比希臘或羅馬還古老的文明。埃及人、敘利亞人、迦太基人，儘管是基督徒，然而在羅馬帝國的機構內，是被壓迫的民族；所以，這些民族，當帝國的羈絆逐漸鬆弛而重稅的負擔和行政的腐敗增長的時候，就渴望着恢復它們的民族獨立地位。那些關於教條和神學的爭論，遂使帝國東方國家內的離心的民族力量解脫出來。同時，國家和正宗教會的結合，使這一種反對勢力達到頂峯。阿利阿派、一性論派和多那特派都成為在這些有關國家內民眾表達民族情緒的工具；也通過它們，民眾提出了抗議，反對重稅，反對拉丁主人的大地產占有權，反對行政上的營私舞弊，或者反對那些象十八世紀英國的印度總督一樣，有進行掠奪的特權的正宗派和統治階級所享有的不公平的豁免權與特權。在這些國家里，雖然教會和國家是分不開的，但民眾對僧侶階層的憤恨，比對貴族還甚。其原因是：教會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並迫使農奴或真正奴隸來耕種它的田畝。當歷史家看到這些異端是由經濟上的不公平和社會上的冤屈的意識所激起的時候，當他看到異端運動包含着土地社會革命的種子在此內的時候，他對它們就會發生了一種新的興趣；並了解為什麼它們能夠獲得民心和在民眾間能夠擁有勢力。他還可了解，為什麼穆罕默德教能夠這樣容易地征服了這些懷有貳心的地方。正宗教會徐徐替代了羅馬帝國，成為社會上的統治勢力；正象帝國那樣，“正宗教會是堅決地反對民族區別的，而異端和分裂派，則是歡迎這種區別的”。

因為正宗帝國和正宗教會聯合一起來加強它們的壓迫政策，所以常有地方上異教徒和異端派合作事件的发生。社會上不公平狀態和苛重賦稅也是促成這種合作的因素。政府和教會，由於事

怕农民的起事（这些起事可能是由某些驍貴的軍事长官激起的），在取締乡村异教方面，一向采取了穩健政策，直到407年时，才頒布严峻法律，命令搗毀祭壇神象，封閉乡村庙宇神殿。

当我们从第四世紀的历史翻到第五世紀历史的时候，那在教会里最足以引人注意的重大变革，是教会势力向乡村和农业区的侵入，在那里异教在大业主世襲領上的农夫阶層、农村奴隶和农奴人口中，还拥有很多信徒。原来象上文已指出过，基督教运动是在城市方面的。但是，到了400年时，教会已把城市异教几乎根除无遺了，于是它开始着那所謂“田野的福音宣傳”运动。这运动的第一步，是由教会哄騙劝誘皇帝給它以帝国領地內的广大地产，因而教会得插足于农村地区。这项企图是很有成績的，特別是在东方，所以，小亚細亚的很多新主教区就是过去帝国的大庄园。卡帕多細亚省主教領有几乎該省的全部土地。在西方，非洲主教对于皇室領地虎視眈眈，毫不躊躇地使用了欺詐方法，来夺取这些土地。我們看到历史家左息馬斯（当时的几个非教会作家之一）嗟歎国库愈穷而教会愈富的情况。不久以前，大土地所有者，或者由于情感或者由于策略，也已开始以別墅和世襲領贈給教会。息多尼阿·阿坡利那里在第五世紀的中期所写的《書簡》里，指出：教会在高盧各省內，已是一个拥有过多土地的地主。的确，由于西哥特人的移殖的結果，教会的財產暂时被剝夺，因为西哥特人是阿利阿教徒；可是教会終究从天主教法兰克人获得了多于它損失的补偿，象我們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

基督教傳布到农村地区，在那里大地主在自己的龐大世襲領範圍以內几乎是个独立国王；因此就产生了庇护制或教会里的僧职授与权。乡村教区，往往和这些世襲地产同其大小，正象美国南方的“产棉地带”的牧师区和大种植园会同其大小一样。业主长久习惯于强迫农民信仰他們所信的同样的宗教，不管是屬於异教或

正宗信仰的，或屬於當時許多異端中的任何一種的。聖奧古斯丁的書信證明了：在第四和第五世紀里，世襲領主在他們的世襲領上，當場應用了“誰統治，誰決定宗教”這項原則，^①就是說，他們要求他們的農奴和奴隸接受自己的同一信仰。奧古斯丁在一封信里，曾祝賀一個領主，因為他強制了他的農奴信奉正宗信仰。在另一封信里，他指斥了一個領主曾強制他的農奴同他一起擁護了多那特教義。正宗信仰的皇帝的詔令以及宗教會議的立法都規定了下列條文：地主應以強制他們的農奴和奴隸信奉正宗宗教信仰一事，作為自己的一種義務。

領主們既享有了這樣獨立地位的傳統，當然願意和那些愿在他們領地上建立教區的鄰近主教作有利的妥協，而主教們也愿承認這些條件。領主以“庇護人”的地位，指派教士，往往就指派他的因此而獲得解放的一個農奴；他還為了自己的目的保留着權利，來使用那教區教會的部分進款，不僅是從贈與得來的，而且從結婚、殯葬和洗禮得來的收入。如果教會的財富由於獲得忠實信徒的贈與而增長起來，領主還是保留按照原來比例取得進款之權；當然，經過若干年後那項收入會變成很大的。我們很詳盡地知道這些農村教會的起源和傳布的历史以及這些農村教區的組織。阿卡狄阿斯及霍挪留的一條法律，清楚地說到了這些領主的教會。在蠻族時代，農村教會大多落到領主階層的控制之下。這種私人利用教會的情形，是由那跟着羅馬帝國的衰落而來的一般領主獨立性所產生的結果。領主，即他的領地的主人翁，拚命從自己領地內排除自己的以外的一切權力，愿意有着自己的教會，有着自己的教士。他的領地有着它的地方教會，象它有着它的地方市場、它的地方磨坊、它的地方釀酒作坊一樣。這種地方教會，是領主貴族的一個賺

① “Cujus regio, ejus religio.”

錢机关。

哥特人、勃艮第人和倫巴人的国王，尽管屬於阿利阿教派，但也未曾特別禁止在他們王國內把財產贈給天主教会。然而，异端毕竟使对天主教僧侶的贈予縮減了；由于阿利阿教会在日耳曼各王國內所接受的那些贈予財產，天主教僧侶对阿利阿教派和日耳曼国王的矛盾愈加尖銳化。毫无疑問，这种嫉妬是那两个教派間所以仇恨的一个因素。所以，496年当法兰克国王克洛維斯(481—511年)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其他蛮族王國內的正宗僧侶階層大为高兴。因而当克洛維斯进行征服西哥特人和高盧的勃艮第人的时候，当地的天主教僧侶曾給予热烈的贊助，而他們的出力也取得了報酬。因为那些被占据的阿利阿教会所屬全部財產，都分給了他們。

法兰克人的改信天主教，使在高盧的教会財產大量增加了。远在日耳曼族征服以前，僧侶已成为取得宗教性贈与的能手，又由于教条、崇拜和紀律的发展，那修行的“功德”得到提高，而教会財產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也建立起来了。这类說教，容易被新信教者接收；因为他們对懺悔形式的贊成傾向比对实行基督教的主要原則还大。在法兰克人占領北高盧后实行土地分配时，教会的財產已被尽力地保护着，而法兰克人改信基督教也大量增加。墨洛温朝諸王，在对教会的贈与方面，原是很慷慨的。克洛維斯賜給圣里迈教会大量土地；多哥伯特一世(629—639年)曾把图尔的全部收入給那里的圣馬丁教会。此后，地主貴族遂相繼仿效了王室的行为。到了第七世紀，許多教会拥有了七千或八千处庄园；那些領有二千处庄园以內的教会，还只認為是小有产者。当本尼狄克丁寺院主义开始傳入高盧的时候，法兰克僧侶們对修道僧的来临，曾覺得討厭，其原因是，后者要同前者竞争着贈与了。

教会所領有的土地，是大塊农田；它們在管理的形式和性質方

面，等同於羅馬貴族的“散布各地的世襲財產”，的確，它們就是原屬於這批貴族的地產。教會整個地採用了這些土地上原有的管理制度，事實上，正是從教會世襲領的管理制度中，我們可知道很多關於過去羅馬管理制度的東西。几百個有時几千個奴隸和農奴，住在這些大地產上人數擁擠的村莊里；他們在一個“指揮者”或管事的指揮下，耕種着土地，情形和貴族的大地產管理，是完全相同的。每個大農場構成了一個經濟單位。在每個大地產上有着堆棧、谷倉、牲畜棚；在奴役的工作人員中，除了種田者和牧人以外，还有着鐵匠、車輪製造匠、石匠，這樣，每個農場在經濟上是自給自足的。教會從土地上所得的收入用在支付僧侶的工資、建造教堂房屋、維持學校和醫院、救助窮人等等。所有的剩餘產物，則在公開市場上出售；為了這個目的每個主教有着一個代理人，有時有着幾個代理人。由此可見，教會在土地領主的地位上，怎樣變成了有錢貴族的競爭者，也可見它的競爭（由於它的特權而愈來愈厲害）怎樣使掙扎的小農一蹶不振；因為小農在經濟的競爭里是站不住腳的。常常當他被迫典出他的土地的時候，當地主教接受了這抵押，並和富有貴族一樣硬心腸地取消他的贖回權。

教會在經濟上的巨大變革，即從窮困到富有的地位，使教會的精神和品質也改變了。僧侶還在宣傳着窮困的理想化，空談着“有福的窮人”和“有福的馴服者”，並傳布着慈善的訓誡；可是事實上，教會已成為一個有錢的貴族團體，它雖明白標出了它的宗教誓約，而實際上卻是一個開發它所有的資源的一個龐大機構。在第二和第三世紀，教會曾表現出真正的人道主義，真正的願望，來救濟貧病者，來改善奴隸階層的狀況。但是從第四世紀起，在教會里出現了兩個不同的集團：一個是純粹宗教和仁慈的，另一個包括世俗性的貪婪分子，他們的慈善行為是為了夸耀、為了策略。這一集團灌輸着“馴服”的德行，為的要使那些不滿意的和被壓迫的仆役和奴隸

階層安心处于屈服的状态里。教会向中世紀欧洲的“賤农”和奴隶階層詳細地講述着天堂上的幸福和极乐生活；构成了一个极好論点來說服他們听天由命地在社会經濟制度的压迫下劳动着。在第十世紀中，維罗那主教拉特里那斯伪装神圣地确告农奴和奴隶說，一切人們都是弟兄，同时劝告他們遵守那項使他們受着束縛的神命，說“上帝慈悲地注定那些人要做奴隶；他看到，對他們來說自由是不相称的”。

为了开发它的广大地产的利益，教会現在已成为一个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支持者；它不仅反对解放奴隶，甚至把奴隶制扩充到原来沒有这种制度的地方。教会所宣称的对同胞的博爱和慈悲以及偉人格列高里所高談的“天賦自由”（但他沒有把它实施过），是旨在講給虔誠信徒听的陈詞濫調，从沒騙得过精于斯道的人。

現在沒有資料，可証明：当时有很多人对上述言論中所表达的宗教見解，是怀有同感的。不管这些言論怎样影响着有些优秀崇高人們的心灵，但是，它們要反对大多數人們，是无力的，要反对那在中世紀世界有无可估計的經濟重要性的奴隶制度，也是无力的。看不到什么遺跡，足以表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过認真的努力，要改变这些状况的。^①

教会有时指斥过奴隶貿易，但沒有指斥过奴隶制度。原因是那时这种貿易大多是在犹太人手里，并使他們致富，后来又是在穆罕默德教徒手里。教会从沒有只字抗議过出卖基督徒为奴隶；更談不上出售异教日耳曼人和斯拉窩尼亚战俘給基督徒了。狄奧多·坎特布里的“悔罪录”里，曾提及准許一个父亲出售他的兒子，如果后者年龄已超过十四岁。779年时查理曼力图管理奴隶貿易，命令所有的出售必須在一个政府或教会的官吏面前进行，但是沒有一句話曾譴責这种行为。的确，按法律，每个教区的神父有权領有两个

① 此指：《中世紀教会和奴隶制》，《美国历史評論》，第14期，第677頁。

奴隶，一男一女。寺院是大奴隶主。我們看到在整个中世紀时期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有着教會奴隶。主教不得釋放教會的奴隶，除非他們以自己的財產来补偿教會的损失。有这样一些例子：被解放的奴隶曾担任圣职而成为神父；后来被免职，又降到奴隶地位。最坏的，教會在原来按羅馬法沒有奴隶制的地方，創立出奴隶制。教會处罚叛逆背信罪，不仅使犯罪者本人变成奴隶，而且使他們的后代永远淪为奴隶。在西班牙，妇女犯有与人通奸罪者，被宣告为奴隶。如果貴族等級的妇女三次遺弃她的丈夫，她被判令苦修；即使她的丈夫死去，她也不得再嫁；但是如果一个平民妇女犯着这行过失，則她被出售为奴隶。按查理曼的法律，应把占卜星相者給教會作为奴隶。教會的避难权，有时拒絕給予奴隶。在法庭上奴隶不得做原告。連一个被解放的奴隶，也是沒有做原告的資格的。直到他們的第三代，这项禁令才可撤销。至于对待奴隶的态度，僧侶的殘暴是和世俗主人一样。最可恶的，是教會的人常常把他們的奴隶切断手足或使他們餓死。倘使有屬於同一主人的两个奴隶已結婚而其中之一已获得自由，而另一个人不能贖出自由的話，那个人可以再婚。

第三章 蛮族世界和大移动*

在羅馬帝国的后期,比如說第四世紀,蛮族世界包括萊茵河以东、多瑙河和尤克辛海以北的全部北欧,并无限地延入亚洲。在这广大地区的人种、“民族”和部族的波动里,最重要的是日耳曼族、斯拉夫族和匈奴族的历史。

我們在日耳曼制度中可找出关于原始游牧和畜牧生活的遺风,尤其是在“百家村”制度中。“百家村”看来原是由畜牧条件所产生出来的土地分区;后来由于部落成为軍事組織,“百家村”遂变为一个募兵地区,也成为一個政治单位。有人估計,在畜牧阶段,一个日耳曼家庭需要三十头母牛来供給它牛奶、奶油和牛肉。在一个日耳曼平方哩(約合現今二十一平方哩)荒地內,能够养活的,不多于六个家庭,也不多于一百八十头牲口。所以,一个“百家村”作为能够提供一百个战士(包括父子在內)的畜牧区,也許是那足以維持二十个家庭生活的地区,它大約包括三日耳曼平方哩,即約合六十三美国平方哩的一塊土地,或多或少,按照畜牧的情况而定。这样,古代“百家村”就成了一个經濟的、軍事的和政治的单位,比美国的“区”(三十六平方哩)还約大两倍。这区域內的社会生活反映出这种情况。

游牧营的牲口在荒野里,不能沒有牧人件隨而走来走去;它們必須分为畜群,而在畜群放牧的地方,必須由武装牧人来保卫,以防盜賊和野兽。产乳的母牛必須安放在妇孺的营帳附近,其他牲畜必須由牧人赶到远处;牧人在經過长久時間以后,才得回到营帳。又必須把若干数日的人員用于打猎;

* 地图: 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45、48 頁。

有些人还須保护营帳；一些耕种工作也必須去做。①

古代日耳曼人逐漸从畜牧阶段过渡到一个較多定居性質的阶段，因而发展了一种簡陋的农业，也許是从一个早期的零星耕种成长为經常的生产。这项轉变似乎是在凱撒(公元前50年)和斯特累波(公元1年)时期与塔西佗(公元100年)时期之間发生的。前两人曾描写苏維汇人、倫巴人和赫芒达列人大多是游牧的部族——“他們不专心于农业”②。在百年以后，塔西佗則描写他們都是有着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

关于早期日耳曼人耕种方法的性質以及它发展的程度，历史家們頗有爭論。这問題原本是困难的，而由于渗入了凱尔特人的和后期罗馬的方法，它愈加变为复杂化了。但是，我們必須试图了解这一問題，因为不管它是怎样复杂，它是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紀的經濟历史和社会結構的。

当日耳曼人組成定居的农业住所的时候，他們好象起初經常使用一塊地作为牧場，另一塊地作为耕地。然而，他們漸漸发现了下列現象，虽然还不懂得其中道理：把同样一塊土地繼續耕种，会引起土質的枯竭。因此，由于很多年代所累积的經驗，他們采用了每年讓一半耕地休耕以及每季交換耕地和休耕的办法。这就是所謂“田-草”③制度，即交換的耕作制度。后来也逐漸清楚地認識到谷物輪种制的必要，这一发现想必需要多年学习才获得的。

籠統地說明这些轉变，是一件易事。但是，想要作出專門性的說明，則难题就产生了。举一例說，在一段著名的文字內，塔西佗論及他当时的日耳曼人說过：“他們每年交換耕种”④。他所講的，是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12卷(迈曾的一篇評論)。

② “agriculturae non student”。

③ “田-草”(field-grass)制度，即是一半地播种，一半地长草的制度。——譯者

④ “arva per annos mutant”。

指耕地和休耕地的交換呢？還是谷物的輪種呢？如果他意指前者，那末日耳曼人在公元100年時所達到的發展階段，遠低於後者的情況。其次，這些轉變，是由日耳曼人從自己的農業經驗里發現的呢？還是從凱爾特人榜樣里或從羅馬人的榜樣里學到一些東西呢？如果是後者的話，這兩種影響中每一種的特殊性質和程度又是怎樣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所寫的卷帙，已經汗牛充棟。

凡是農業生活必然要使每一個居住區有着確定的界綫。“馬爾克”(Mark)便是這樣。可是，有一個麻煩問題就發生了：在早期日耳曼人中，有的居住於一個沒有圈圍的、即空曠的村莊(Dorf)，有的居住於一棟一棟周圍環繞着田畝的住宅(Einzelhöfe)。日耳曼人這種社會聚居形式上的不同，也指出了他們在歷史的影響上和接觸上的分歧。關於這些，我們可深入中世紀中找尋證明，如在房屋、小舍、街衢、田地、籬笆、樹木、土地丈量、地名方面，以及在土地登記、莊園測量、租冊等等方面。就這些資料來說，那一去不復返的一個時代的歷史，在歐洲地圖上，還是留着痕跡的。

那種居住於村莊的制度，是在原始日耳曼人中創立起來的。它最早成立的地區和保持它最純粹形式的地區，正是日耳曼人的最老家鄉，就是，薩勒河和威塞爾河流域的領土。當日耳曼人向外擴展的時候，他們帶去了這種村莊形式，但是在別的地方，他們的居住制度由於接觸了不同的種族和社會條件，曾有所變化。在西方，他們先後受到了凱爾特人和羅馬人的影響；在東方，受到了斯拉夫人的影響。孤單住宅是凱爾特人的一個居住形式。圓形村莊(Runddorf)是斯拉夫人的一個居住形式，從對稱方面看，這種形式遠勝於一個典型的日耳曼村莊，後者是由許多茅舍松散地集合起來的。結果是，在這“最古老日耳曼”以外，可找到社會單位的双重或混合的式樣。當日耳曼人移動的時候，他們有時採用了凱爾特的式樣，有時把帶去的村莊式樣，在征服地上建立起來。在“民族

大移动”运动过了以后，日耳曼型的地区，出现于高卢和意大利，同凯尔特型和罗马型的地区同时并存着（这里，必须注意到它们和罗马住宅的接触）。而且甚至在日耳曼痕迹早已消逝的地方，象在勃艮第、萨伏依和全部亚奎丹，我们还可知道，这样的集合是一度存在过的。在西欧，凡是经过日耳曼人征服的各地方（在不同的程度上遍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日耳曼人“把自己制度特征的烙印，盖在那些原来有着另一种制度特征的土地上”。

然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对这两种形式加以太明显的区别，也不要每种形式的起源完全归因于不同的种族习惯。凡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家，如属可能，必须经常判断什么是“某种种族型的经常伴随物”和什么是事物的环境和经济的来源。对于经济因素，必须予以重视。在日耳曼境内有丰富自然牧场的地区，畜牧业是胜过种谷业的，这种优势，可以造成一种日耳曼的住宅式样。有人这样地主张过的。可是，斯拉夫人的圆形村庄，当然是由于畜牧业的流行而产生出来的，据这一例证，似乎可争论，在畜牧业占优势的地方，日耳曼村庄的圆形式样应该早已发展起来。在凯尔特人旧残余不显明的地方，我们也可看到日耳曼人中的孤单住宅；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住宅，大多可能是由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所做的清除森林工作而产生的。在瑞士的日耳曼人区，我们可找出关于这方面的显明证据，在那里，岩石层和袋形豁谷是有利于孤单田舍的形式的。一般说来，在日耳曼境外的日耳曼村庄，在平原和可耕地上，在大公路沿线地带上是数目较多，而在崎岖的土地上，或偏僻的乡村区，或在清除了森林的土地上以及沼泽地上，我们所看到的，倒不是孤单田舍的占着多数，而是这种田舍比别处多些罢了。

每个日耳曼人村庄，包括有三类土地：(1)耕种的田亩，(2)草地，(3)森林和荒地，这就是所谓“公地”，即开放给大家而没有开垦的土地；可是跟着社会人口的增加，有时也从中划出新地来耕种。这

里，我們要特別談談第一類的土地。

在村庄的每一塊耕種地或可耕地上，把地面劃成為狹長條地，叫做“耕地”，再留一條未翻動的泥土或掘出兩條對立的犁溝作成的田塍或阻格，使它們彼此分開。這些地帶，是真正的田地。它們的大小平均約有四竿 (rods) 闊和四十竿長（合二百二十碼或一富浪或 $1/8$ 哩）。這些地帶再分成為小耕地或小田地，後來叫做“竿地” (virgates) 或“碼地” (yardlands)。大耕地叫做“海德” (hide)、“伊勃” (hube)、“伊夫” (hufe) 等等，它的面積約有一百二十畝，那是中世紀所通用的田賦單位。“海德”可能原來是在粗放耕種流行時期所需的較大單位；而碼地和竿地的較小單位，是由于粗放耕種轉變到精耕細作，從海德分裂出來的，而加速這種轉變的，是象節約以及農夫子女的增多這一類的社會因素。每一個農夫的“田地”是他所領有的分散土地的總和。這“田地”不是由那些連成一片的田畝，而是由許多耕地匯集而成的。不管過去地產的原始性質怎樣，現在這些條地已是農夫自有的土地了。我們不可能正確地說出，每個家庭所占有的田地平均究有多少面積。在這一點上，田地面積大小相當的程度不會超過今天美國的，在那裡有着各色各樣大小不同的田畝。一個農夫多些，另一個少些；那是取決於節約、勤儉、遺產、結婚等等的。

顯然，早期日耳曼人的農業操作方法和田地制度，使所有的田舍必須互相接近、位於同一塊土地上。如果每個田舍主人住在自己的任何一塊條地上（在他所有的這樣多的條地中，哪一個作為房屋基地最為合算呢？）他會遠離了他的其他條地，正象他住在村內一樣。而且如果他的田舍位於村庄之外，那末每隔一年，他會置身於休耕地的中間，而牛羊繞着他的田舍吃草。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看來不管怎樣奇怪，“聚集”的村庄在當時卻是十分自然的。這“聚集”的村庄，也可說明中世紀特殊的星形道路系統，從作為中心的

村庄放射到周围田地去，再从干路分出小路到各块条地去。

对早期日耳曼人土地占有制和耕种方法的了解，是很重要的。有些史家曾认为，这种田地的特殊安排是从过去公社土地制演化而来的，“这过程就是一个公有土地不断缩减的过程。”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再也不能想象出比土地私有权的起源更实际的问题了。在这些制度和办法中，我们会找出原始日耳曼人公有制的证据吗？

没有人怀疑，关于森林和荒地公有制是流行过的，但问题是：个人所有制，或者个别所有制真的是从过去耕地公有制演化来的吗？还是象有些人看来，由此足证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共同耕作以及同一原始的村庄企业如耕种和收获一类的合作呢？即使在这一点上，公社精神也许强调得太多了，因为村庄的纪律（日耳曼人的管理一向是严格的）可能是使村民需要共同行动的一个统治因素。邻人做什么事，每个人就得做什么事。村民不得随心所欲地去耕耘、播种或收获。季节性的职业当然是循环的，但是地方当局特别强调了季节性的需要。这强制的集体劳动可能是支配的力量，不是公社的精神，更谈不上共产主义了。

有些历史家企图从古代日耳曼土地所有制里，寻求原始共产主义的遗迹。此外，还有一种学派按照同一的证据，认为那争取平等占有土地的热烈愿望，是早期日耳曼土地保有制的决定因素。别人看来，为求得平等而这样地分配可耕地这一观念，似乎也太唯理主义了。这种解释，也许把十九世纪民主平等观念套到过去历史上了。可是，这项理论比公社的理论，较可说得过去。因为平等的分配也能流行于或原来流行于一个自由的或者一个不自由的村庄社会里。

有一个极端的学派嘲笑着“马尔克”的整个观念。依据该派的意见，原始日耳曼人既没有国家，又没有村庄权利，又没有轮种制，又没有强制性的耕种。土地是很多的，因而没有占夺土地的动机。

各个人得占据他所需要的土地,在收获之后,就把它抛弃来耕种另一塊新地,如果他愿意这样的話。那时沒有村庄社会,也沒有“合有制”,也沒有公共所有制,也沒有共耕土地制。“馬尔克”只不过是一塊界綫模糊的領土罢了;“公有权”(Allmende)也只不过意味着各人在集团所占地区的界限以內得开垦若干土地之权罢了。

我們姑不談这类問題:公社所有制是否曾先于个别所有制;或者認為这是否仅仅是共耕制即村庄合作制;“耕地的按期互相交换制是否曾先于私有财产制;”可是,当日耳曼人初次被羅馬观察者所知道的时候,他們确然已有着土地私有制度。但是这制度,不是象人們从簡朴的甚至原始的农夫情况所推論出来的那样单纯,相反的,它表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

現在,我們来談关于早期日耳曼人另一个麻煩而多爭論的問題:日耳曼基本民众的地位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呢?对于这一問題的討論,已費了很多笔墨。中世紀历史軸心的角度,似可說正是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一回事,如果古代日耳曼人群众以自由民地位开始,而后来被压制到农奴地位;但那是又一回事,如果他們在日耳曼原在一个不自由的状态下开始,而在遍布并占領西羅馬帝国以后几百年中,依然是不自由,直到十一和十二世紀农奴制衰落为止。

不幸,对这一問題的討論,經常不是平心靜气的。許多,甚至大多近代德意志历史家,由于过分受到民族自豪感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坚决反对上述的第二种解釋。他們把十九世紀早期盛行的自由民主思想,注入过去的历史里。另一方面,那些沒有被这些观念和偏見所歪曲的研究近代經濟和土地問題的历史家,对民主-民族主义学派的論点,却也很少找出了直接的証据。他們并不否認有些自由村庄存在过,但主張,大部分村庄是由不自由人居住着,至于孤单住宅(Einzelhöfe 或 Salgüter),它們是由农奴耕种的領主財

产。他們爭論說，日耳曼人中的貴族地主制度，远不是采自凱尔特人和羅馬人的办法的，而是日耳曼人中的旧制度；而封建占有制是由早期羅馬和日耳曼占有制延入中世紀上期的。大多数早期日耳曼村庄，不是从自由村庄而淪入庄园地位的，而是从不自由村庄而后来变成成为庄园的。按我們現有的知識範圍，一个科学假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可能的东西。但是，那主張日耳曼人的社会組織是基于享有平等社会地位和 平等土地所有权的自由人集合体的理論，看来是已經粉碎了。

日耳曼人有一些堡壘，似乎象防舍那样，它們是用木头筑成，建造在險要而不易达到的地点，并环以木柵和沟渠。当有敌人侵犯的时候，它們用作躲避和抵抗之所。这样的一个建筑叫做“堡”(burg)。堡这个字是在后期拉丁文里所能找到的第一个德文字，在第四世紀中它出現于拉丁文。日耳曼人自己是沒有城鎮的；他們在进入羅馬帝国的时候，对羅馬人有城垣圍繞的城市，頗不信任。安密亚那斯·馬塞里納写道：“城垣的圈圍，在他們看来似乎是捕人的罗网，而城市本身是埋活人的坟墓。”

从远古以来，日耳曼人和波罗的海区的人民以及地中海地区各国的人民之間已存在着貿易关系。早在公元第五世紀，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从辽远的北方，已获得琥珀和毛皮。在古代，琥珀是頗被珍視的，而波罗的海的海底樅树林，那时是而現在还是世界上琥珀供应的主要来源，这些琥珀經過大风暴而被冲到海滩上的。由于原在运输中落下的零碎琥珀的“发見物”，我們发现了一条古代商路。这一条路是上行維斯杜拉河或尼門河，再从那里下行第聶伯河或第聶斯德河以达尤克辛海。伊特拉斯坎人和后来的羅馬人的琥珀是从同一起来源获得的，一条路是上溯奥得河或易北河和摩尔道河，以达亚得里亚海的頂端；另一条路是从波罗的海濱到萊茵河，再經過摩塞尔河到罗尼河而达到馬賽(即希腊人所称的馬西

利亚)。普林尼在他所著的《自然史》中曾引述那生于公元前第四世紀的希腊地理家和探險家馬西利亚的皮特阿斯一句話：哥頓斯人(哥特人)是从事于琥珀貿易的。

日耳曼人和高盧的凱尔特人間的貿易，毫无疑問，在凱撒第一次記載它(公元前 50 年)之前，老早已經存在；日耳曼人以琥珀、毛皮、奴隶及战俘来交換馬匹。凱撒告訴我們說，涅微伊人反对在他們中間出售葡萄酒，因为它有兴奋的作用，但是苏維汇人欢迎商人，因他們得有机会来出售从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战争里所鹵获的战利品。羅馬商人跟着凱撒完成对高盧的羅馬征服之后，迅即进入日耳曼。公元前 25 年时因为有几个羅馬商人被杀死，一个羅馬將領馬卡斯·芬奇阿斯被派出征日耳曼人。在早期帝国，羅馬和日耳曼間貿易关系是密切的。一个重要的羅馬商人居留地，位于涅克河畔，近斯图加特的馬尔巴赫，曾維持几百年之久。除了琥珀、毛皮和奴隶以外，羅馬人还輸入甜菜(提庇留所喜欢的一种德意志蔬菜)、鵝毛、硬球般的肥皂以及头髮(因为南欧的黑髮姑娘曾珍視日耳曼人的紅黄色头髮)。当时，毛皮已成为羅馬的一种“时髦”东西；到了第五世紀，穿着日耳曼式裤子以代替羅馬式外衣，曾风行一时，以致皇帝霍挪留加以禁止。

在多瑙河上游区的几个羅馬城中，最重要的是奥古斯大·芬得力哥魯，即奥格斯堡。在奥古斯都时代，它仅仅是一个沒有城市权利的市場；后来，它成为一个城市。塔西佗說过赫芒达列人是日耳曼最重要的部落，它和“里細亚省的最宏大的居留地”有商业联系；当他說这句话的时候，虽然沒有提及奥格斯堡，但毫无疑問，他的意思就是指它的。

阿尔卑斯山外各省的經濟，当然受着边疆情况的支配。木材、牲口和兽皮是从里細亚运来的。諾立克以产鉄著名，但也有其他金屬如白銀和黄金；还有兴盛的养羊业和养畜业。君士坦士湖东

端的布累根茨有一些商业。在班諾尼亚，卡能敦是和多瑙河中游蛮族进行貿易的地点，直至第三世紀为止。它毁灭于第四世紀中。可是，在这里甚至羅馬統治消失之后，羅馬商人的居留地还是在多瑙河畔的累根斯堡(勒齐那·卡斯特拉)繼續存在着。

羅馬文化影响、羅馬商业、甚至羅馬行政制度，的确深入到日耳曼的內地，深入到按正式边疆我們不会猜想到的地方。近代考古学的研究已揭露出下列各种遺跡：一条从萊茵河下游到威塞尔河口的旧羅馬道路，美因河流域的几条羅馬道路，穿过沼泽地用木条构成的几条道路以及在西日耳曼羅馬建造的几座城堡，后者久被認為是墨洛温朝的建筑。

从碑刻方面，我們可知道萊茵河和多瑙河之間商业的重要性。尽管这些地方不象南方諸省有着很多庙宇、戏院、凱旋門，然而，在那里羅馬遺跡还是重要的，如巴塞尔附近的戏院、罗提尔的精細鑲嵌物、巴登威勒的浴場。为了这样的奢华享受，大量的商业資財一定是不可少的。

萊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长期和平，約有二百五十年之久，使這項貿易繼續地扩大，并一定使日耳曼的西部和南部的日耳曼人部分开化了。碑刻提供了有趣味的証明：在奧格斯堡有一个富商，在卡薩尔有一个銀行家，在馬尔巴赫和累根斯堡有几处外商居留地。古币的發現也說明了这种事实。古币的大部分是屬於早期帝国的。因为在第三和第四世紀当羅馬貨幣夹杂着銅或鉛而貶值的时候，日耳曼人精明地只接受那种純金的旧币。若干年之前，有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普利茨附近的泉水里发现了这些古币，显然是由在馬科曼族間經商的一个羅馬商人在那里鑄造出来，作为一种供神用品的。还在达克附近找出了青銅飾品，这些东西一度曾是小販的商品的一部分；为了安全，他們曾把它們埋藏于地下。的确，当时曾有一条可直达波希米亚的羅馬商路。

羅馬-日耳曼貿易的發展，如果沒有遭受着行政上的限制，決不會限于當時的情況的。帝國政府管制了邊境上的一切交通路線。多瑙河外的魁迪族、馬科曼族以及其他日耳曼部族被迫留出河的北岸若干哩領土作為無人地帶；蠻族船舶不准在河上航行，羅馬水師還在萊茵河和多瑙河上巡邏。顯然，這種在邊境上對商人和商品所實施的嚴格的警察管制延續了好幾百年。邊境市場設在規定的地點，並有着規定的時期；如果它們被封閉了，日耳曼人會痛恨這種剝奪行為的。這些市場的地點我們可從羅馬編年史上找出。甚至匈奴人也是重視它們的。這些地點，就是羅馬巡河水師的“碼頭”。在日耳曼人開始侵入的時代，這項商業遭受着嚴重的影響，不僅因為日耳曼人的敵對行為而使它不安全，而且因為羅馬下令禁止了通商。舉例說，公元 372 年，一群商人因不顧禁令而擅渡萊茵河，被皇帝朱理安的水師所捕獲；因而他們的財產就被沒收。

亞基列是和日耳曼人貿易有着最密切聯繫的一個北意大利城市。它位於亞得里亞海的頂端，伊孫左河口，約距現在的里雅斯特德二十哩。亞基列也是意大利和達謝間商業的主要集散地。

“它[亞基列]運出酒、油以及地中海沿岸各省所產的名貴織品，越朱理安阿爾卑斯山和卡尼克阿爾卑斯山達到班諾尼亞與諾立克；在那里換取它們的牲口、它們的皮革、從波羅的海運來的琥珀以及它們從邊疆戰爭中所俘獲的大批奴隸；這些戰爭是它們和多瑙河外及喀爾巴阡山外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永遠進行着的。”^①

在四百多年的時期中——就是說，從公元前 27 年羅馬帝國的創立到公元 378 年亞得里亞那堡戰役為止——羅馬帝國雖在它的威力下降着的時候，但也能維持對日耳曼人的控制權，在這長時期中，雖有着偶然的邊境戰爭，但大體上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和睦的，

① 黎德：《羅馬帝國的城市》，第 337 頁。

有几万，也许有几十万日耳曼人和平地进入了罗马帝国，并居住那里。现在，我们必须讨论这项移民的性质和范围，因为这必须认为是一个殖民运动。这项“和平侵入”终究深刻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的经济情况并更改了它的社会结构。

日耳曼人通过参加军队，极其容易地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在帝国的整个历史里，它继续招募日耳曼兵士。马卡斯·奥理略（死于公元180年）数以千计地挑选日耳曼人，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高贵出身的罗马人竟拒绝在蛮族军团里服役。可是，大体上日耳曼人却是优良的兵士。皇帝的卫队大多是由日耳曼人组成；在帕拉泰因山上皇宫守卫室墙壁上，还存留着由尼禄的一个卫兵所乱涂的一幅有趣味的漫画。奥理略·维克多论及第三世纪军团时说过：“我所说的兵士，几乎都是蛮族。”皇帝瓦勒里安在某一次重大战役之前，曾写信给他的手下大将，就是后来的皇帝奥利连，说道：“你应带着哈特多孟、哈尔德加斯特、黑尔德孟及卡洛维克出发”——这些人都是日耳曼军官。皇帝格累细亚很欢喜日耳曼兵士，竟使其他士兵大抱不平。我们还可看到：日耳曼军团不仅是驻在罗马的各边疆上，甚至在亚美尼亚和阿拉伯边疆上，而且内地也有日耳曼人驻防军，特别是在高卢省。第四世纪的《帝国要人志》(Notitia Dignitatum)指出：苏维汇人驻在巴叶、里曼以及在奥汾涅；法兰克人驻在勒内。406年立比阿立法兰克人^①曾竭力堵塞汪达尔人的侵入洪流。在第四世纪有两个法兰克人，阿波加斯特和包多，都是格累细亚的和狄奥多西大帝的亲信将领。在第四世纪中帝国军队的统帅，也是日耳曼人，例如，斯底利哥、亚伊细阿斯、里塞默等。

^① 按第四世纪法兰克人分为两支，住在莱茵河两岸者，叫做“立比阿立法兰克人”(Riparian Franks)，意即“河滨法兰克人”；另一支住在舍拉河(Sala R.)流域者，叫做“萨利安法兰克人”。——译者

然而，还有比軍团中的日耳曼士兵人数远多而重要性更大的事情，就是各日耳曼部族以“同盟者”的名义居住于边境各省內。他們类似以前的羅馬退伍兵那样；他們在战争时应服軍役的条件下，領取了土地贈与来耕种。这些日耳曼殖民者，如果住在羅馬业主的土地上，当然不得不应用羅馬人所用的同样的农作方式。但是，当他們住在他們自己的田地上，他們保留着日耳曼房屋式样、日耳曼耕种方式、日耳曼土地丈量制。羅馬省区的条件，果然深深地影响了那些移民的身分，但是对他們的旧习惯，却未曾妨害。所以，下列情形，特别是在高盧存在着（因为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少受到这种殖民运动的影响，直到第五世紀的真正征服为止）：羅馬測量員所用的“百畝”法^②，凱尔特人土地保有制的旧形式及日耳曼人的耕种和土地占有制的新形式都同时并存而又交叉着；当然，这些形式甚至象居民那样会漸漸混合起来。

另有一种异于日耳曼“同盟者”的日耳曼移民即是“隶农”（*loeti* 或 *coloni*）；他們移殖在人烟稀少或荒蕪的地区（法律上无主人的荒地），由羅馬人給予田地，甚至谷物种子以及役畜，使可着手耕种。这一类移民后来和各省內羅馬奴隶階級相混合，而形成了中世紀的农奴階級。在这些隶农中，有很多人原是战争中的俘虜，但是也有其他日耳曼人；他們从沒和羅馬交鋒过，由于他們背后部落的压力，从本乡被挤出来，力求在帝國內取得一塊安身之所。他們原不是奴隶，甚至也不是农奴，虽然后来淪落到农奴的地位。他們也被分配在皇室（国庫）的大地产上，或被分配給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富裕业主。早在帝国灭亡之前，羅馬人通过各省区内成千成万日耳曼人“隶农”的居留地，一定会熟悉蛮族的很多风俗习惯的。

日耳曼人每次几千人不断地渗入了羅馬帝国境內，因而羅馬

② “百畝法”（*centuriation*），就是以百畝作丈量的单位。——譯者

人和日耳曼人間的相互影响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第五世紀当日耳曼人以整个部族并在征服者的地位上涌入帝国境内的时候，他們发现在那里已住着很多他們自己的同种族人，后者已經采用羅馬的生活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經受到羅馬文明的同化。而且，甚至那些长久留在日耳曼境内的部族，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已接受羅馬的影响。这对哥特人來說，是特別正确；而对法兰克人和倫巴人來說，則是大为不然了。

这整个蛮族世界久已遭受深刻的不靖状态所激盪，而这种情况是注定要引导到第五世紀的“大移动”；就是，那被德意志历史家生动地称为“民族的漫游”。这里我們講到历史上一个最广泛而又最有力的現象——移民了。我們必須对这些声势浩大的移民的原因、方法和方式以及移民的路綫和影响，加以分析。

毫无疑问，这些移动的基本原因，在于粮食供給的不足。这可能是偶然的、暫时的現象，如在畜牧部族中遭到兽疫病时的情况，或如在农业部族中遭到旱灾时的情况；或者由于生产方法上的簡陋，也可能造成經常缺乏的現象。在古代，經常有着一种人口的壓力加在生活資料的上面。为了減輕压力，乃采用了战争和掠夺，就是，强的部族对弱的部族的排挤行为。这些运动变成了移民的原因，也是移民的結果。

有一个倫巴历史家保罗管事曾写道：倫巴人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由于人数的增加，分为三組，并用抽籤办法来决定其中哪一組應該外移。日耳曼人有时由于旱灾和飢荒的影响，被迫进入羅馬帝国境内。羅馬地理家斯特累波曾清楚地看出：古代日耳曼人迁移的动机，与其說是由于他們职业上的农业性質，不如說是由于他們职业上的畜牧性質，以及由于食粮缺乏的經常威胁。凱撒曾探寻日耳曼人騷动和好战傾向的經濟根源，在于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荒，并扼要地表达这思想說：“当时……由于土地荒和人

口的倍增,他們发动战争。”^①他还說,当日耳曼人移动的时候,他們还有着未开垦的广阔地带。所以,引导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原因,不是在于“因为国内缺少地盘”,象吉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在于农业的简陋制度、在于因生产过低所产生的粮食供应的缺乏以及在于爱好掠夺的品质。他們常常把自己的地方遗弃。日耳曼的人口不是过剩的。依据两个最著名的近代历史家也是统计家的估计,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的领土上(这是到第五世纪留下来的唯一日耳曼,因为斯拉夫人已遍布于所有的东半部,那里一度曾由哥特人、伦巴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马科曼人、魁迪人等等居住过),总共有着不多于一百万居民,住在二十万平方哩的领土上。在这个地区之内,估计有二十三个部族,而其中没有一个部族能有多于六千到八千战士的。由于他們的农业的简陋形式,日耳曼人是营养不足的,象一切生活在狭窄范围内的原始民族一样,他們迫切地追求生存资料。圣安布洛兹,也许是第四世纪所有的作家中对情况观察得最锐利的作家,他正确地写道:“里细亚已认识到自己土地肥沃的危险。它以它的富饶吸引了一种敌人的侵犯。”

移民果然可用和平伸入的方法来实现——这是在第五世纪前日耳曼人移民的方式——但多半是用战争方式来进行的。然而,移民有时不采用实际转移的方式,而采用扩展的方式以及征服或兼并新部族和新土地于本国的方式。举一例說,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后来又征服了大部意大利和部分西班牙,但是他們没有从西日耳曼的老基地撤退出来。我們很少找到整个部族移入一块空地的实例,可是伦巴人的占领波河流域,象在下文所述的那样,是属于这类性质的例证。然而,无论如何,新占领即意味着那强有力的种族的控制。

^① “cum……bella inferrent propter hominum multitudinem agrique inopiam”.

这类变更所产生的结果，当然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间的血统的混合以及他们之间的制度的融合。关于血统混杂的过程，由于下一事实，一般是进行得很便利的：被征服人民中的大部男人已经死去，而剩留下来的主要是女人。在所有的混合中，我们应该注意下列重要因素：两种人口的和他们活力的比例、本地的和侵入国的制度的力量和伸缩性、混合的程度、时间的因素以及最后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我们不应由于上述抽象的事实和对移民史的冷静分析，而看不见下列情况：它们果然是属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可是，同时也是属于最残暴的历史事件；战争、掠夺、屠杀、奴役、饥荒、破坏，是它们形影不离的伴随物。虽然如此，它们毕竟有着良好的后果，因为它们是历史上芟除劣等居民和腐朽文明的一种方法。

但是，遭劫的不是全在被征服者的方面。在德意志，特别在日耳曼的西南角，在那里来自亚洲的冲击和部族的压力达到了最大的激烈程度，弱小部族在部族“碾碎”的过程里，被磨得粉碎，而强大部族也只能用联盟方法来维持自己，象阿勒曼尼克和法兰克联盟的情况那样。正是这个压力，常常用以说明日耳曼各部族冲入罗马边境的疯狂行动，那终打破了这长距离的整个防线。405年时，拉特给萨斯的入侵意大利，不是属于一个部族或一个“民族”的行动，而是属于各部族的零星部分的行动，一群携带妻子儿女的亡命之徒的行动；他们要从所处的绝境里求得一个出路。他们的命运最后是被罗马军团饿死于多斯加纳山区里。倖免的几千人都被出售为奴隶，价格这样低廉，每一个人只售一个奥勒斯(aureus)。当时，牲口的价格还高些。但是，这些可怜的牺牲者还是高价购进的，因为几千人由于遭受了饥饿的影响，不久就死去。

日耳曼各部族的大移动，不是一个暂时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连绵进行着的并早在入侵之前已经开始的行动。关于它们的起源，

我們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二世紀的末期，辛布賴人的入侵，再到阿立奧維斯塔和蘇維匯族的入侵。即在這遙遠的時期，他們不是純粹的戰爭隊伍，而是正在行軍的部族：男人、女人、孩子，帶着奴隸和牲口，全體移動，來找尋土地。這項移動沿着整個帝國的邊境繼續進行着，但它的進展在一個長久的時期中被遏阻着。起初，那些駐防邊境上的羅馬軍隊有充分力量來捍衛多瑙河邊界。在第三世紀，由於一次很猛烈進攻的結果，大批日耳曼人穿入了帝國境內，而且暫時摧毀了萊茵河上的羅馬統治；可是後來他們還是被伊立連族諸帝逐回。

第五世紀的“大侵犯”是上述大運動的最後一幕，恰恰發生在這一時期是因為那時羅馬政府已經沒有力量來對付日耳曼人的移民。即在那時，日耳曼人除了少數例外，還沒有以大隊人馬，以征服者的地位而來。他們結成小隊而來，漸漸滲入，定居於這裡或那裡，起初在帝國沿邊境上人煙較少的地方，然後再從那裡逐步向內地伸入。但是他們是作為殖民者和移民、作為農民進來的；只在他們的入境被攔擋的時候，他們才使用武力。現在歷史家們對下列舊觀念已經放棄：日耳曼人是象可怕的天災般地進來的，而羅馬人被弄到走投無路的。事實上，日耳曼人的進入是常常被歡迎的，因為羅馬農民把日耳曼人看作反對帝國政府的吸血稅吏的保護人。由他們看來，主人的改變不能比目前更壞，可能是好些。里昂和羅尼河流域的居民，故意放縱了勃艮第人占領他們的領土。這些粗魯的蠻族，可能是粗暴無禮的，他們用牛油來整理頭髮，有着制革所的气味，但是，他們是性質良善而豪爽的大漢，公平地對待着無防禦的省民。

依據各種情況，我們很可以說，這種移民帶着一種“大遷徙”的性質。正象美國人越過阿利根尼山進入俄亥俄河流域“新西方”的“西進運動”的歷史一樣，正象那個運動後來越過平原沿着聖大非

和俄勒岡路綫进入“远西”^①的扩大地区被这批开荒者的后裔所忆念的一样,所以在那些住在羅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中,对他们祖先在大迁徙时期中冒险、艰难、战斗和胜利的回忆,常留在心头,而且这类事件已成为他们种族的故事和民謠了。在第六世紀当約但尼斯进行編写哥特人的历史的时候,除了民間歌謠告訴他一些消息以外,他没有关于这个早期的資料。在他的著作中的一章里,他描写哥特人在长期移民的过程中(至少历时一百五十年),所遭遇的一些危險:他們从維斯杜拉河口前行,直到有一天他們看到“被深藍海水冲破了的靜寂天涯”,而尤克辛海的一片汪洋出現在他們眼前,这是一个历史的图片,描写着正在迁移的哥特人的先鋒怎样陷入第聶伯河各支流間俄羅斯的危險沼澤地带——那个广闊的普里柏特沼地,在面积方面和爱尔兰一样大小。他說:

这块地方被關閉在动盪的沼地中,因而由于水陆两种因素混淆在一起,自然界使人不能进到那里。甚至到了今天,据說,旅行者还听到鬼怪野兽的叫噪,还看到人的幽灵在那些危險的沼地里掙扎着。

按日耳曼人每次移民的历史,都可以有把握地說:虽然搶劫是一个动机,掠夺是侵犯的附随物,但是日耳曼人的推动力却是要找寻生活所依靠的土地。約但尼斯还告訴我們哥特人怎样終於达到了“所想望的土地”。408年时,阿拉列曾要求諾立坎、伊斯的里亚、威尼斯和达尔馬提亞各省作为他的人民的家乡。当这项要求被拒絕时,他把他的要求减低到上述的最后三省。

每次移民的成功,个别來說是由于各种特殊的原因以及由于各种情勢的特殊結合。然而我們可发现一般的事实,并寻出一个对整个运动的說明。但是,为什么出現了这种情况:那些在第一和第四世紀間曾被羅馬阻止的移民运动,到了第五和第六世紀,变成为

① 指美国西部沿太平洋各地。——譯者

这样的广泛和这样的成功？原因不在于日耳曼族的人数或权力的增长。那一定是由于帝国完整的破坏、内部机构的破裂、帝国抵抗力的缩减（对帝国衰落的因素和原因的考察，已这样地指出了）。“罗马由它的仇敌看来，好象是一个硬壳，包藏着柔软的核。”一旦外壳被戳穿之后，蛮族就可流入而充满了它的内部。日耳曼人已在罗马军团里充当士兵；他们已移殖于空地和荒地上，主要在边境省分，正因为如此，罗马平民已向帝国中心撤退。

从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移入高卢的历史里，我们可获得关于上述后一现象的有力证明。勃艮第人渡过莱茵河后，首先住在柔拉和发特地方，这些地方当他们进入的时候，很可能是没有罗马居民的。至于科隆下面的下莱茵兰、比利时及东北法的情况，我们有明显的证据，可说明罗马居民已从这些地方退出；也有证据，可说明法兰克人在第五世纪渡过莱茵河而涌入了一块无人的地区。

在近代时期，这些地区发现了几百处罗马古币窖藏的“发见物”。这些事情的意义不言自明。因为古币的种类和“发见物”的数字都是和法兰克人的侵入有关的。情况当然是这样：当政权在边境省分崩溃时，罗马人向内地迁移，但是因为盗贼猖獗，不敢随身携带钱币，乃把它埋藏地下，希望日后回来时掘出。在这些“发见物”中，很少找出第二世纪的古币，但是在第三世纪当边疆时被冲破而又经常修复的时候，就可常常找出古币。在第四世纪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使行政刷新以后，古币的“发见物”又变少了。但是第五世纪，就是“大侵犯”时期的窖藏是很多的。这些“发见物”的地理分布情况，也是有意义的。在下莱茵兰、比利时和东北法，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所发现的古币为多；这说明了罗马人从这块领土上的撤退，几乎是完全的。

历史上的沉默也证明了这一点。关于法兰克人的第一次扩充，我们没有文字的记录，因为没有罗马人曾看到这事情。法兰克人

慢慢地迁入,并散布在一个荒蕪的土地上,在那里,甚至城市也已人烟絕跡。

在羅馬帝国另一部分,就是,在意大利的波河流域,在第四世紀我們可看到一个差不多无人地带的类似情况;在哥特战争时期,意大利的人口可怕地下降,当时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在貝利撒留和那錫士两个將軍統率之下,破坏了由狄奥多理东哥特人所創立的兴盛王国,从而使北意大利变成一个荒地。然而,那項衰敗在东哥特人占領以前已經开始,其原因是:賦稅繁重和行政腐敗已把当地居民逐出或毁灭了。

568年时,当倫巴人散布在波河流域的时候,这地区几乎是一片空地。这个最小的日耳曼部落的經驗,清楚地表明了“大移动”的性質。早在公元100年时,塔西佗論及倫巴人时說:“这批人却以他們的人数稀少而自豪,因为他們被这样多、这样强的部族所环绕,必須設法保存他們的生存,不用消极的服从,而用經常的战斗;在危險中找得安全。”倫巴人連續地移动,从他們被知道的时期直到568年进入意大利时为止。这一事件在历史家中成为一个很多爭執的問題,因为按照我們所有的証据,难以区别什么是他們的历史和什么是他們的傳說。但是,在日耳曼部族中很少比他們走得更远,搬迁得更多。保罗管事,一个倫巴族的历史家,告訴我們說:“他們遭受飢餓的大劫难”,在紆迴漂泊之后(显然从下易北河区开始的),“他們进入了魯吉兰(在多瑙河北岸、諾立坎的对面),在那里因为土質肥沃,他們停留了几年”。几年以后,他們再“从魯吉兰出发,定居于广闊的平原上,这平原在蛮族的語中,叫做‘斐尔得’(Feld)”,这只能是現在的匈牙利平原。在这里,他們陷入匈奴人的漩渦里,直到阿提拉死时为止,而后在一个时期中又降为日耳曼赫留来部族的附庸。在他們迁移的过程中,在某一地方,他們走到长着亚麻的一片綠野,錯誤地認為它是湖海。跟着,在多瑙河下游,

他們和吉比德人發生了戰爭。那時，韃靼族阿佛爾人已沖過羅斯平原，侵入了多瑙河區，強迫倫巴人把他們牲口的十分之一交給自己。倫巴人從這危險的地位在568年侵入意大利，以求出路。由於他們人數的稀少，倫巴人已成為一個混合的部族，因為他們似乎在這些遷移中曾零星地吸取別的部族的因素，因而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制度也受到了這種混合的影響。

日耳曼人在羅馬人眼光中，既不是仇敵，也不是陌生人。在他們之間，沒有種族矛盾的存在。在多事的第五世紀之前，這兩個種族彼此熟悉甚至互相混雜，已有四百年之久。當羅馬帝國象破屋一樣地逐漸倒塌下來的時候，日耳曼人填補了那些破壞了的省分（它們好象是這大廈中的房間）並和本地居民並肩雜處在那里。羅馬人更加蠻族化了。同時日耳曼人更文明化了。他們和教會一起，制定了新制度的式樣，並從羅馬制度的殘余以及從他們自己的更有活力的制度中形成了一種新文明。這兩種制度跟着時間的進展融合起來，形成了一種既不是羅馬式的、也不是完全日耳曼式的政府和社会。

蠻族人民在羅馬帝國內建立國家的歷史後果，是很重要的。姑不計及那些消逝了的國家——汪達爾、東哥特和西哥特——還有由幾個“部族”國家組成的集團，它們曾統治着整個中歐洲、高盧、德意志和北意大利；就是說，那些後來合併成為法蘭克帝國的國家。在其中每一個國家里，羅馬帝國制度曾被一再廢除，但是，教會還是保存着羅馬傳統的。

這樣建立起來的國家，是住着新人民的。這個事實的重要性是什麼呢？日耳曼人的來臨更換了人口嗎？這一個極有趣味的問題，曾經過熱烈的討論。當然，它不容有一個單一的或明確的答案，必須按照各國的情況來區別。關於進入帝國的蠻族人數，沒有文獻可供給我們以直接的資料，但是我們可推論他們的人數和羅馬

的居民相比較，并不算多。从这一点，有人曾作出結論說，他們的影响是表面上的，他們沒有留下任何永久的痕跡。

这是一个极端的見解。事实上，我們知道帝国的有些地区已深刻地日耳曼化，在这些国家里，在中世紀时期，居民、私法、习惯、特别是造屋方法，甚至言語都指明了：日耳曼影响的优势是无可否認的。这些国家就是，英国、巴伐利亚、阿尔曼尼亚、北法和东法、萊茵兰以及倫巴第。可是，这些地区正是在帝国末期由羅馬居民遺弃最多的边境部分。起初，日耳曼人“隶农”和侵入的部族大批住在那里，象上文所講的那样。日耳曼人看到在这地方上只有他們自己人，遂有時間来繁殖并創造新居民。

在羅馬居民繼續存在的地区，发生了各民族間的混合。人口中原先的成分在数字上是占着优势的，但是蛮族的后代形成国家中的統治部分，朝臣、首长以及大土地所有者，一言以蔽之，日耳曼人对于新王国的組織和創立，具有一种真正的勢力。所以，蛮族侵入的影响在沒有冲突的地区比較大些，而关于这项历史的文献，在数字上是最少的。

因为羅馬帝国制度，無論在行政、經濟或社会方面都是基于土地占有制的，而且因为日耳曼人移动的主要动机是在于求得土地，所以日耳曼土地解决办法的性質，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設想那項办法是整个地、粗暴地剝夺羅馬地主階級的土地，那是完全錯誤的。

第一，日耳曼人口和羅馬省区人口相比較，在数字上，实在是太少了，以致他們不可能在任何大的程度上这样做，即使有此心愿。我們可按照在五人中抽一个战士的标准来計算他們的人口数，作出一个保守的估計：西哥特人不会超过十五万人，东哥特人不会超过二十万人，勃艮第人不会超过八万人；克洛維斯法兰克人当他进入高盧的时候，只有六千个兵士。这样的数字，在八百万人口的

意大利,在一千到一千二百万人口的高盧,在八百到一千万人口的西班牙,还算是什么呢?

第二,必須記牢,在日耳曼兵士寄宿民家的帝国制度里,久已存在着一个管理羅馬人和日耳曼人間土地的分配先例,按照这先例,一个戶主須把他的房屋和土地划分,自己保留 $2/3$,把其余的 $1/3$ 給他的不速之客,后者有时委婉地叫做“客人”。

日耳曼人有时把这种分配比例倒轉过来,但是他們中間从沒有人完全劫夺和剝夺旧主人的。勃艮第人(关于他們的居留地我們知道得較為詳細),曾占取耕地的 $2/3$,奴隶的 $1/3$,每幢房屋及它的附屬物的 $1/2$,森林和未垦地的 $1/2$ 。高盧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曾占取土地的 $2/3$,可能按同样的比例,占取房屋及其他財產。意大利的东哥特人似乎只占取了屬於国庫的土地,而对于地主階級的土地,未曾加以騷扰。如果狄奧多理的宰相卡息奧多拉的話可以相信的話,对东哥特人是沒有恶感的。因为他說:“土地的分配促进了地主們的和谐。”还須記牢,卡息奧多拉本人是一个羅馬人。汪达尔人在非洲的土地解决办法,是相似的。倫巴人是最兇狠的剝夺者,他們的政府对羅馬省民压迫得最厉害,而法兰克人最为寬大。

关于法兰克人,他們之所以有着比較緩和的政策,是因为他們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主教能为居民訂出一个比別处寬大的解决办法。至于所有的其他日耳曼人,他們都是阿利阿异端派而被信仰天主教省民及他們的天主教主教所痛恨的。在这緊張局勢里,可奇怪的是,阿利阿派日耳曼人就他們的土地分配而論,是和天主教徒同样地緩和。拍拉的坡来那斯的奇异經驗(他是奧索尼阿斯的孙子,羅馬詩人中的最后一人,住在波尔多附近的富裕业主),表明了蛮族的解决办法是合乎一般情理的。他的地产由于哥特人的占領而变为烏有。他的很多余产又被一个硬心腸的亲戚所吞沒。在晚年,

他住在馬賽附近自己所有的一小塊土地上。有一天，他出乎意料地从一个哥特人手里收到了在波尔多附近他的庄园帳上的一笔結款，这个哥特人就是他曾被追分給自己庄园的人。这忠实的人不愿无补偿地占有着他的土地。这一件事不得認為是一个例外。“所有的証据都足以表明羅馬大家族在蛮族侵入的过程里，很少曾遭受暴力或沒收財產的痛苦。”

應該指出，这些土地是由日耳曼人用抽籤方法来分配給自己的，并在对蛮族国王服某种兵役的条件下，所有人得世代代領有它們。在其他方面，他們是被豁免賦稅的。这里，我們至少看到那后来封建制度的一种萌芽。的确，那些領有原屬羅馬人土地の日耳曼人，采用了当地的經濟制度，而变为完全一样的土地业主了。羅馬旧业主的田庄变为中世紀封建制的庄园。在进入的日耳曼人中間，占有本能发展得这样早、这样强烈，以致勃艮第法律規定：任何人不得出售他們的土地，除非售給另一个土地业主。日耳曼业主对他的不自由的佃人是傾向寬大的——不管这些佃人是由他所帶來的日耳曼农奴，或者是原在他的土地上的羅馬佃人——其原因是：他对羅馬的田庄管理制，不如旧羅馬业主熟悉，而日耳曼对奴役状况的管理不象羅馬人管理得那样严格。然而，我們一定可清楚地看出，“工业生活的樞軸跟着蛮族的进入而轉变了。”这类工业很多，甚至大多是屬於农业性質的。可是，羅馬商业在蛮族王国里並沒有消灭。我們就要多談一些关于日耳曼各王国的經濟和貿易。

羅馬國庫所屬的富饒庄园，都被在意大利、在高盧、在西班牙、在非洲的日耳曼国王所占有；在非洲，这些庄园构成了汪达尔王国的全部省分。因为日耳曼国王沒有建立賦稅的一般制度，这些庄园遂构成了王室进款的来源，并和过去一样地繼續管理着。从它們得来的进款，用作政府官吏的薪給以及蛮族宮廷的維持費。然

而,其中有些庄园是分給那些追隨國王的主要首長,後者因此就變成最大的土地業主,即封建時代的地主貴族的祖先。

匈奴人及他們的首領阿提拉,在歷史上不象日耳曼人那樣,沒有產生過持久的影響,所以對他們的历史可以更簡略地談一談。他們的幾乎是唯一的影響,是他們以無限壓力給日耳曼世界最後的沖擊力,這迫使各部族全部涌進了羅馬邊疆。匈奴人所發生的影響,在歐洲的想象力方面遠大於在歐洲的政治方面,因為關於他們的荒誕故事和關於他們的殘暴性,在第八世紀以前保羅倫巴人的著作中沒有出現過,而阿提拉的各种故事,還是後來經過馬扎兒人的來源而流傳於後世的。

從人種方面來說,匈奴人是屬於韃靼族,不是屬於雅利安族,他們和地中海世界的居民甚至連疏遠的種族血統關係也沒有,日耳曼人却是有的。從社會方面來說,他們是野蠻人,而從經濟方面來說,他們是游牧民族——“他們的國家是在馬背上的”。這句話就衡量出匈奴人和日耳曼人之間的莫大距離了。公元375年時,匈奴人沖過“烏拉爾大門^①”出現於歐洲地區;他們猛扑那住在南俄羅斯和近代羅馬尼亞的哥特人;當時,他們的進攻,使日耳曼人和羅馬人都充滿著驚惶情緒。我們還可看到同時代人描寫他們的生動記載。安密亞那斯·馬賽里納說,他們是醜惡可厭的人,雖知道取火但很少用火來煮食,穿著骯髒的獸皮。

該族中每一個人日日夜夜在馬背上生活著;在馬背上他們做買賣;在馬背上他們飲食……其中沒有一人耕種過田地,甚至連犁鋤的柄也沒有碰過。他們都是漂泊在外,沒有一定的居住地,沒有家庭或法律或固定的風俗;他

① “我們認識到,這是一個怎樣極無防禦的歐洲邊境,通過那里的空曠地點,所有亞洲的游牧部族,如匈奴人、阿倫人、阿佛爾人、保加利亞人、蒙古人進入了歐洲;他們的騎兵隊馳騁草原,搜索敵人或戰利品,他們的馬車載著他們的家眷和牲口跟在後面,除了有時受到有些大河的阻礙外,所向無敵;如果河流太深,不能跋涉,則他們乘著膨脹的皮囊渡過。”——布賴斯:《外高加索和阿拉拉特》(“Transcaucasia and Ararat”)。

們象永久的难民一样,以他們的馬車作为他們的唯一住所。

但是,匈奴人在居住于下多瑙河流域(近代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羅馬尼亚)的七十五年間,曾拾取一些羅馬文明的虛浮表面。“阿提拉的宮廷和营帳,从整个性質看来是富于肉欲的;但是,这肉欲性比那第一批橫渡亚速夫海的匈奴人的肉欲性,还远不及其污穢与可厭,这批人的习性曾由安密亚那斯描写过。”阿提拉的“宮廷”是一个大木房,它的地板和墙垣都是用木板作成的;而墙垣和地板都用兽皮盖着,以御寒气。在它的附近,有着比較遜色的住所,在那里住着他的妻妾,其中最漂亮的一所,是他的爱妻克勒卡住所,可是連她也沒有毛毯和地毯。匈奴人虽然来自东方,但沒有采用东方的这些奢侈品。那些房屋全部連在一起,以打入地下的木柵来环绕着,因而形成了一个凹凸不平的广场。

阿提拉生活費用的大部是从那些在他的权力下被征服人民——羅馬人、希腊人、日耳曼人——得来的;他們被迫繳納牲口貨物。但是,他的最大的財源,是向君士坦丁堡軟弱无能的皇帝进行勒索。公元423年时,他从狄奥多西二世取得了350鎊黄金的貢賦;次年,他勒索了双倍于这项数目的黄金。这皇室的常年“補助”,繼續了十五年之久,直到447年时为止,当时,这数额名义上已加了三倍,虽然同时阿提拉还要求一百二十五万(合美元計算)作为“欠款”。

为了征集这笔巨款,拜占廷帝国必須使用它那复杂的一切財政机关:

每一个元老被課某个数目的款子,往往大大地超过他的实际财产;但凡是列在他名下的数目,不管他有与沒有,是必須繳付的……在有些情況下,高貴妇女的家藏珠宝,或者那些一生过慣豪华生活的人們的家庭用具,就在市場上陈列出售。

普力斯克斯,生在这个时期的拜占廷历史家,伤心地說道:

國家的財富和皇室的寶物，不是花費于他們的正當用途，而是揮霍于可笑的鋪張、俗氣的虛飾以及一切娛樂和一切荒淫無度的事情，在這方面，凡是稍有理性的人，即使國家已達到繁榮的高峯，也不願浪費金錢的。

當普力斯克斯出使阿提拉而路過色雷斯的時候，他看到城市人煙絕跡，原野尸骨滿地。他曾把一幅生動的圖景，流傳下來，描寫這個蠻族宮廷，它的宴樂、它的吟唱詩人、王室小丑的嬉戲、一個醜形的侏儒、酩酊的祝飲、奇怪的服裝、極為稀奇的語言，即混合着匈奴語、希臘語、拉丁語、哥特語的喧嚷；大汗沉默地但不無威嚴地坐在这喧擾場面的中間，由他的披着蓬松毛皮的衛兵和兩個秘書在旁侍奉着；一個秘書替他辦理希臘文件，另一個秘書替他辦理和羅馬皇帝與帝國省長的通訊事宜。

這裡，當普力斯克斯在接待室裡，等待阿提拉接見的時候，有一個穿着匈奴服裝的人，講流利的希臘語，來招呼他，而这个人証明是一個希臘人。可令人玩味的，是他們間所繼續進行的談話內容，而這談話曾由普力斯克斯全部紀錄下來的。這位歷史家兼使臣，從驚異中鎮定過來後，詢問這個談話的人他怎樣會住在匈奴人中間，其實已是匈奴人的。这个人回答說，他原是個商人，而為了經商的目的，怎樣來到多瑙河畔米西亞省的維那西姆，距貝爾格萊德六十哩；該省怎樣被匈奴人襲擊，他怎樣被俘而作為奴隸送給阿提拉的寵臣叫做奧尼基希的，他怎樣獲得恩寵，被釋放為自由人，而娶了一蠻族婦女。當普力斯克斯表示詫異，不明白一個有文化的人竟能長住在匈奴人中間時，却獲得了一個對帝國政府不公平的嚴厲控訴，作為答復。

他說道：“我認為，我的現在生活方式比我過去好得多。因為當戰爭過後，人民過着安逸的生活，完全自由自在，毫無顧慮。但是，在羅馬境內，人民在戰爭中容易遭受挫折，因為他們把安全希望寄托於別人，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裡。他們的暴君是不將容許他們使用武器的。”

这里，这个讲话者埋怨道，内战和掠夺是后期罗马帝国的臭名昭著的祸害。

他接着说，“而且，还应想到税吏所干的一切残暴行为、密告者的无耻以及司法方面的极不平等。如果一个富人犯了法，他总是可设法逃避处罚；但是，如果一个不明事理的穷人犯了法，他必须遭受严厉处罚，除非在宣判之前，他确已死去；后一种情况，从法院颀预作风所造成的醜事看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最可耻的事情是，一个人必须付钱来获得他的合法权利。因为一个受害的人，如果不先付一大笔钱给法官和官吏，甚至不能获得法院的受理。”

他补充说，就是奴隶制在匈奴人中也比在罗马帝国内要缓和一些。

这一事件是在多方面值得玩味的，它揭露了罗马帝国内被赋税压榨的人民，甚至看待匈奴人象他们久已看待日耳曼人那样作为救星，来摆脱那蛮干和残暴的政府。这种揭露就不无意义。

阿提拉曾宣布，下多瑙河南岸罗马方面的米西亚一带领土，一百哩宽，三百哩长——东自近代保加利亚的西斯佗华西至多瑙海湾是一块匈奴的“沼地”或边境领土。在这里，有一个大市场，那所市场过去原是设在马格斯的，那时已设立在纳苏斯（即近代的尼西），距摩拉瓦河口一百五十哩。该河和瓦尔达耳河一起现在形成，过去几百年中已形成在爱琴海沿岸萨罗尼加和多瑙河流域之间的大商路。

阿提拉在 453 年死去，因此多瑙河流域被奴役的人民获得了解放，但是，他们已陷于绝境。当时，有一个历史家在阿提拉时代曾察访过东哥特人那里，根据他的记载，我们可判断匈奴人对东哥特人所产生的退化影响；他说：东哥特人也倒退到游牧生活，竟至这样的地步，以致他们已把农业忘了。因为这个区域已被扫荡得象打谷场一样地光滑，居民已陷于饥饿状态，这里或那里设着一个

有城垣的市鎮，在那里有着蛮族人和少数冒險的羅馬或希臘商人交換物品的地方性市場；这批商人很大胆地进入这一地区。《圣塞維立那傳》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凄凉景象，这一景象由于阿佛尔人、保尔加人和馬扎兒人連綿的襲击，延續了五百多年之久。多瑙河交通路綫仍然是一个封閉的道路，直到十字軍东征时期为止。此后，所有的东方貨物經過意大利达到西欧，或者由海路运到馬賽及罗尼河口，从那里再散发到北欧去。

在意大利，这种商业的主要經營者，是威尼斯，它的兴起是和阿提拉的侵犯意大利密切地联系着的。当时亚基列被匈奴人化为荒地，这个城市 and 巴士亚以及許多小鎮的居民惊恐万分，紛紛逃至亚得里亚海礁湖內的泥濘淺滩上；这些低礁的最高地，即里发斯·阿尔特斯，注定要在后来时期成为威尼斯的里阿尔托^①。巴士亚人居留区，是亚得里亚海未来王后^②的核心。在这里，居民是依下列职业为生的：在盆里煮海水来制造食盐，捕魚以及逐漸和大陆及大陆以外各地进行貿易。在第六世紀，卡息奧多拉曾这样地描写他們的。威尼斯的两栖地位，也使它沒有遭受兇猛的倫巴人的侵犯，因而兴旺起来，二百年后，它的势力强大，甚至能对查理大帝挑衅了。

① 里阿尔托 (Rialto)——威尼斯城的一个著名小島，为商业活动中心；美国紐約“百老汇”的一塊地方，也称为“里阿尔托”，是游乐賭博的場所。——譯者

② 就是威尼斯。——譯者

第四章 羅馬帝国内的日耳曼王国*

西哥特的西班牙、汪达尔的非洲、东哥特和倫巴的意大利、教廷的羅馬和拜占廷的意大利*

关于那些建立于羅馬帝国内的大部分日耳曼王国的内部經濟和社会的历史，我們只需簡略地談一談。因为除了法兰克王国和不列顛的盎格魯-薩克遜联合王国以外，所有的蛮族王国的寿命都是沒有延續到第八世紀以后的。

第一个日耳曼王国，是西哥特王国，那是建立在阿奎丹高盧和西班牙領土上的。王国的高盧部分，由于法兰克人的扩展，在 507 年被消灭。而它的西班牙王国在 711 年穆罕默德征服半島——半島的大部——之前傾复了。如果土魯斯而不是托利多^① 还是王国的首都，而南高盧繼續是王国的領土，那末，西哥特人的命运也許就不同了。因为那里“存在着阿奎丹的吸引力，富饒、土質肥沃和优秀的羅馬文化傳統。”因为西哥特新政府的开支比羅馬旧政府的开支要少，賦稅的負擔也比过去羅馬時代的負擔要輕，所以沒有疑問，这政府的改組是人民所乐于接受的。

但是，西哥特人由于人数太少，不能有效地保持西班牙的辽闊地面。他們遭受着加里西亚和北琉息退尼亚(葡萄牙)的苏維汇人的敌对以及比里牛斯山脉里頑强的巴斯克人的侵襲。可是，这些禍害还不如他們政府的无能来得严重。社会的、宗教的分裂从沒被克服过。甚至他們已变为天主教徒之后，“古法”(“Antiqua”)依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50, 52 頁。

① 土魯斯在南高盧，托利多在西班牙。——譯者

然是哥特人的法典，同时那仿效狄奥多西法典的“阿拉列簡明法”(Breviarium Alarici)是羅馬人的法律。而且，从一开始起，哥特貴族对国王就是一个威胁，而对下層群众是一个阻碍。貴族占有范围极大的土地。他們的平均財富，估計在十五万和二十五万美元之間。另一方面，大省区俾替卡是由西班牙-羅馬貴族控制着的，他們从瑪約里安以来，就領有这个省，国王无力使他們屈服。

大地主由他的忠心的卫队环绕着，实际上，能够长期不理睬国王的命令，直到偶然国内发生革命时，他自己归依了失败的一方为止；其时，他看到为了胜利者的党徒的利益，自己被剥夺了土地，他和他的子女被降到被人輕視的“賤民”階層……这些时代是不安靖的。国王远在别处，而大地主近在咫尺，实际上，在他广大的、往往非法占取的領地之内，已儼若国王了……經過若干代之后，那些毫無疑問在西哥特新社会制度內一定會存在过的小土地所有者……已不复見了，而且在这国家的后期发展里，实际上我們看到只有两个階級存在着——那些和王室多少密切联系着的大貴族……和他們的依附者，即乡下人、小人或賤人；后者虽在理論上若干方面异于不自由人，但实际上却已陷入和奴隶不相上下的地位了①。

在西哥特西班牙，象旧羅馬帝国一样，重稅的压力和司法的腐敗迫使日耳曼小土地所有者降到經濟上依附和社会上卑微的地位；这批小土地所有者，本来在哥特人中存在着，象在其他日耳曼人中一样。隶农和奴隶在西班牙所处的境遇比在任何其他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国内所处的，也許更坏些。在城市里，也沒有力量与这种压迫状态相抗衡。因为系出羅馬的城市居民，人数上虽超过哥特人三倍，但都是胆小如鼠而且也已貧困了。

西班牙在西哥特人时期，尽管有国内的丰富自然資源，但却不是一个很繁榮的国家。他們的文化是一种半野蛮人的文化，他們在农业方面，似乎是特別落后。他們的情况既然是这样，我們就不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2卷，第221頁。

能希望他們把國家的富源順利地開發出來了。

哥特人的工業是承襲并墨守着羅馬文明傳入西班牙的工藝技術的。其中主要的是：開礦、金屬器製造、羊毛紡織和制革。但是，在開礦方面沒有什麼成績可言。

然而，現有證據可以說明，西哥特人有着貴金屬、寶石和華麗服裝的各種財富；就是說，王室和統治家族領有這些東西。那些敘述穆罕默德教征服的阿拉伯作家，盛稱征服者所獲得的豐富戰利品，特別是從那些西哥特國王住過的城市，例如托利多、哥爾多華、塞維爾和美黎達各城獲得的。這些戰利品中，包括有無數的綉着金絲花紋的華麗外袍、精制的金鏈子以及長串的珍珠、紅寶石和翡翠。據說，在托利多，阿拉伯人曾找到一百七十頂純金王冠，鑲着珍珠、紅寶石及其他各種寶石；一千把國王所使用的寶劍；若干只放滿着珍珠、紅寶石及其他寶石的小箱子以及大批笨重的金銀製成的花瓶。在托利多，兩個阿拉伯人曾發現一塊華麗毯子，交織着金綫條紋，裝飾着純金細鏈。象這類的財寶足以證明，在西哥特的西班牙，有着物質的財富，至少屬於半野蠻性類型的財富。但是，那並沒有表現出人民的一般繁榮景象，也沒有提出關於工業或農業活動的什麼證據。

在西哥特的法律里，有關商業方面的很少，而有關社會階級的很多，幾乎構成了一部單行法典；這一事實足以表明王國內的主要經濟活動以及主要社會階級，即大土地所有者。也可以看出，它和南高盧、汪達爾的非洲、特別是和東哥特的意大利各港口進行着若干數量的海外貿易。“簡明法”中說及“海外商人”和“商人”，關於后一個名詞，我們不能斷定，它是指坐商，還是僅僅指販賣商人而言。但在拜占廷帝國征服地中海沿岸並在八十多年時期中控制它的時期里，這項海上貿易近乎被破壞而被縮小為只是沿海的貿易。因為皇帝查士丁尼在征服汪達爾的非洲之后，曾把他的矛頭轉向

西班牙。他的軍隊果然从未能深入它的难于进攻的内地，但帝国舰队曾占领喀他基那、瑪拉加、塔拉科那、加的斯、巴斯塔尼亚、塞維尔和阿塞杜那各城市，并在544到629年保住了它們。当时，哥尔多华，即拜占廷帝国总督府的所在地，象我們即将在下文所看到的那样，已成为哥特亡命之徒和不滿意分子进行阴谋的基地。

塞維尔的以錫多对哥特西班牙的歌頌，已由事实証明为謊言。他贊揚“西班牙的富饒和繁榮”，說它是在印度和赫斯拍立第^①之間的最美丽的国家，“是宇宙的珍珠和飾品；”这些自豪語是最无聊又是最似是而非的諛諛。“商业、工业和艺术从沒有过真正的兴盛。”狄奧多理哥特人，曾以年幼国君的攝政地位，从哥特的意大利統治哥特的西班牙达十五年之久。当他諷刺地說：“坏羅馬人模仿着哥特人而坏哥特人模仿着羅馬人”一句話的时候，他总结了西哥特西班牙的禍根所在了。

上述的恶劣情况，当国王由于害怕鬧事的地主貴族而投入僧侶的怀抱的时候，变为更糟糕了。因为西班牙僧侶的頑固性，在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僧侶无出其右。这样，西哥特西班牙遂成为历史上最受僧侶束縛的国家。

随着僧侶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出現了很多严峻的法令。非天主教徒連一个人也不准住在西班牙。犹太人特別蒙受着无情的迫害，而他們是国内唯一的冒險商人阶層。托利多的第九次宗教會議（655年）禁止犹太人举行他們自己的宗教节日庆祝，并强制他們参加基督徒的节日庆祝；第十二次會議（681年）重申这些禁令；第十六次會議（693年）禁止犹太人集合在港口城市的碼头上，即在“商人云集的地点”上，第十七次會議（694年）竟把每一个犹太人降为奴隶，或者屬于僧侶，或者屬于国庫。

① 按希腊神話，赫斯拍立第(Hesperides)是极西方之金苹果花园。——譯者

猶太人在他們走投無路的状态下，勾結了海峽對岸非洲的穆罕默德教化的柏柏爾人，在那里猶太人是享有伊斯蘭教的保护的。697年當阿拉伯偉大首領穆薩來到柏柏爾人中間之後，他就把基督教西班牙毀滅了。

沒有疑問，薩拉森人的迅速成功至少一部分可歸因於他們和猶太人的祕密諒解。在西班牙哥特領主腳下的基地，已被挖松，在每一個大城市里，可能都可找到一幫猶太人叛徒……在窮人中，特別是在奴隸和農奴中，也在猶太人中，〔對阿拉伯的征服——譯者加〕很少有抱怨的理由，因為他們的命運已顯然有所改善。至於大批貴族和主教，他們象風掃落葉般地被趕到雷翁地區和阿斯都里亞山脈中去，而且被禁在那里了①。

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住了三百年之久，可是他們差不多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在西班牙語言里，很少可找到哥特詞匯；而581年利奧維吉德為反抗巴斯克人所建築的堡壘維多利亞，是他們所建造的唯一的城市。

汪達爾人不象哥特人那樣，雖然他們中有些戰士曾在羅馬軍團中服務，但從沒在多大的程度上服從過羅馬的紀律。而且，在406年，他們進入高盧的時候，他們也不象好多日耳曼人一樣，是輔助的部隊，而就是侵犯者。在那個時候，意大利正在遭受着阿拉列的威脅，因而皇帝霍挪留不得不從不列顛撤回全部軍團，還從高盧撤回大部軍團。因此汪達爾人得在七年中橫行高盧各省；那時，高盧是羅馬帝國中的最美好的、最繁榮的地區。從《聖巴特里克傳》里我們得以略知汪達爾人在那里所造成的破壞景象，因為巴特里克，當他從愛爾蘭逃出的時候，可能曾在波爾多登陸，然後他上行格羅納河而抵達布羅溫斯。413年時，西哥特人來到高盧，把汪達爾人逐出，429年時，他們又被西哥特人從西班牙驅逐，乃渡海峽而至

① 《英國歷史評論》，第2卷，第221頁。

非洲。

應該知道当时的羅馬非洲省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对汪达尔人的来临以及汪达尔人在那里所建王国的性質，是有着很大影响的。迦太基非洲，在146年羅馬征服之前几百年中，本屬於腓尼基人或布尼克人，因为它是太尔城的一塊殖民地。但是，尽管羅馬統治了这国家几乎有六百年之久，曾建造城市，修筑道路，并令人惊异地发展了非洲各省的物質文化，可是羅馬从沒曾把那古老的血統或它的民风一笔勾銷。本地語言，直到最后还是布尼克語，而在乡村区域它竟是唯一的語言。而且，腓尼基异教的习惯，甚至把兒童献祭摩洛克神^①的恶习，还是偷偷摸摸地保持下去。在那里拉丁文化和羅馬行政只是虛有其表罢了。羅馬非洲省对羅馬的关系，正象不列顛印度对英国一样。所以，了解这在拉丁和东方种族与文化之間的根深蒂固的矛盾，便是了解429年汪达尔人从西班牙渡海过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件之第一把鑰匙。

第二把鑰匙，是了解那羅馬在非洲所发展起来的土地占有制的龐大程度。关于农奴制和奴隶制的負担，在非洲是严重的；又因为这批不自由者大多是本地人，所以，尖銳的种族、宗教、經濟和社会的矛盾，表现在反对羅馬的統治。

当基督教成为羅馬的国教并宣布“政教联合”的时候，事情益发严重起来了。因为那时正教会和政府对异教的战争正在推进着。在非洲，异教的抵抗是很頑强的，还由于农民对教会的痛恨而获得了增援。农民之所以痛恨教会，是因为教会由于皇帝从国库領里濫給土地贈与也变成为大地主了。所以，当多那特异端派发展的时候，它曾获得大批信徒，同时，由反叛的农民和奴隶所举行的社会和土地革命在非洲就应运而生了；这革命基本上是由經濟压

^① 摩洛克(Moloch)——閃族神，崇拜者以人身作为祭品，尤其是以初生的嬰孩。
——譯者

迫和社會不滿所推動，而又由宗教情緒的刺激所引起的。游僧（我們可叫他們“夜騎士”）的武裝隊伍出沒鄉間，燒毀田莊，殺死業主階級和天主教教士。因為這些大地主各有自己的教會、自己的教士，而羅馬業主為了和國教教會有着極密切聯繫，曾強迫他們的佃人皈依正宗教會。

那被世俗的和教會的大地主勒索得發瘋的又被國稅迫得破產的農民，那被剝奪了田宅的小土地所有者，那找不到職業的自由手藝人，這一切下層而失業的分子，把他們的信心寄托在多那特教派所提倡的社會革命方面。這一運動，開始是一個宗教分裂運動，而後發展成為一個政治叛亂，而且越來越落入愚昧無知的農民群眾控制之下。象在歷史上很多別的时代一樣，社會騷動和宗教熱情的這一結合，反映在建立各種極端激烈的團體方面，而這些團體是從一般群眾里形成的。這個革命曾以有力的速度蔓延開來。逃亡的奴隸、無力還債的債務人、破產的小業主以及游蕩無事的人們都歸向革命。非洲各省听任遭劫。大地主恐懼萬分；如果他們離開他們的莊園，他們就會碰到那些麋集路上的兇狠奴隸或農奴的隊伍攔路打劫。放債階層已無辦法來收他們所放的債款；對征收人員，武裝的暴徒幫會是以殺死來相威脅的。其中有些幫會有他們的首領，他們自稱為“聖人隊長”！

當努米底亞的首領吉爾多，一個羅馬化的非洲伯爵，企圖利用叛亂來擺脫羅馬統治的時候，情勢達到高峯了。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他趁着宗教分裂和社會革命的機會，占奪富人的莊園，並從各省騷動的而又強暴的暴徒中，找到了支持。最後，局勢混亂發展到這樣嚴重的地步，以致多那特教和異教中的穩健派開始傾向正宗教會，作為恢復社會秩序的唯一的方法，雖然多那特教派，作為一個黨派來看，還是支持着吉爾多，以期使非洲擺脫那羅馬統治的壓迫。

在391年吉尔多阻止了运粮船驶出的时候，帝国政府曾极度震惊。在以后的六年时期中，由于这项粮食供应的遭受阻挠，罗马城里的人真是做一天吃一天地生活着。政府被弄得走投无路。阿拉列正在威胁意大利，莱茵边疆正处在万分危急中。罗马大将斯底利哥又不能从海外召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料，希望来自吉尔多的弟兄瑪塞兹尔方面；他曾遭受吉尔多的虐待而愿意为罗马效劳。结果，罗马以曾在日耳曼战争中作战过的精兵七万人的军队给他指挥。于是，吉尔多完全崩溃了。那失败的首领曾企图逃到君士坦丁堡去，但遇到逆风，不得前行，最后自杀，使不落入他的弟兄手里。他那巨大的庄园被没收而归入国库，规模极大，以致要另立专局来管理它们。

于是，帝国和天主教的严刑峻法接踵而来。多那特教派的教会会被捣毁，他们的财产被取去，他们的买卖和遗传财产之权也被剥夺。地主们对他們庄园上的农奴和奴隶创立了恐怖统治。老的恶习也恢复起来。本地的布尼克人和努米底亚居民忧郁痛苦。最后，倒不是一个怨恨的罗马指挥官的阴谋，而是这些不满意分子的首领同西班牙汪达尔人的秘密谈判，加速了罗马非洲统治权的崩溃。429年时，汪达尔人以反叛的民众的同盟地位，渡过了海峡。在以后十年中，那整个非洲国家遭受了蹂躏，而迦太基城在439年终于陷落。

十年战事，使非洲人口大为减少，使无限广阔地带变为一片荒凉。但是最残暴的事情，不是由汪达尔人所干，而是由狂怒而发疯的本地农民和粗暴的努米底亚人所干的，他们焚毁了他们主人的村庄和别墅。吉本“未曾轻信，这是汪达尔人的通常行为：即在他們所要定居的地方他们把橄榄树及其他果树都连根拔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有关于汪达尔征服的记载，都是从失败者方面得来的，而“汪达尔主义”这个词在法国革命以前还未曾制造出来，作为破

坏性的形容詞。当时，高級天主教僧侶全被放逐，但对于屬於羅馬出身的或屬於正教信仰的下層階級，“大部分人民群眾，耕种广大皇室領地的被踐踏的奴隶，在沙漠邊緣仅求糊口的飢餓隶农，甚至在吉坡和迦太基城的商人和手工艺者，那有政治手腕的給塞立克對他們不曾企图使用迫害方法，来强制他們全部改信阿利阿教”。

关于汪达尔人的土地处理的性質，我們在上文已經講过。这办法和在羅馬帝國內各处日耳曼人所采用的办法，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就那些构成汪达尔王国社会的社会成分看来，它的性質就大不相同了。在意大利、在高盧、在西班牙所建立的日耳曼王國內，人口的大部是屬於一个消极的而又馴良的拉丁血統或拉丁化起源的血統。而在非洲，下層民众，主要是那些混合着努米底亞人和摩尔人血統和精神的布尼克人。而且，他們曾协助过汪达尔人的征服；也沒有象意大利、西班牙和高盧那样，有着宗教上的分歧，而使他們和汪达尔人疏远。因此这两个种族的混合跟着就开始，并迅速完成。結果，汪达尔人的日耳曼性質就很快失掉。所以，关于腐蝕了汪达尔人活力的原因，与其說是那炎热的气候及使人消磨精力的奢靡风气的影响，倒不如說是这种血統的混合，就是，他們和那远异于而又远低于欧洲日耳曼王国的农民血統的种族的混合。汪达尔人口的品質，由于和一个劣等的，而不是和一个平等的或优等的血統相杂交而降低了；他們变成一种品質較低的而不是一种較高的杂种，象西班牙血統在热带的南美和印第安人与黑人相混合那样。汪达尔人在和本地人口比較之下，經常是少数人口——所有移居在帝国境內的日耳曼人都是这样的——按比例看，他們也許还少于其他迁徙的日耳曼部族。他們甚至还比西班牙哥特人更少使用自己的語言，竟至沒有一个他們的汪达尔文字留傳下来。

关于汪达尔非洲的商业，我們所知道的又少又肤淺。普洛科

匹阿說過，迦太基在汪达尔人統治下，和過去一樣地是一個繁榮城市，這一說法，未可信以為真。可是，也有證據可說明那里過去的商業，雖在程度上不及以前，却曾恢復起來。迦太基和羅馬食糧貿易的中斷，使非洲失掉一個市場，而使羅馬經常陷入半飢餓的狀態。值得注意的，在456年時，列塞默對汪达尔艦隊作戰獲勝，使羅馬的麥價跌落。當貝利撒留出征汪达尔人的時候，他從那些和迦太基貿易的西西里商人方面曾探聽一些關於這個國家的消息。

因為汪达尔土地上的出產並無改變，又因為汪达尔人曾變為愛好羅馬的生活方式，似乎有理由可設想：汪达尔非洲的大宗貿易一定是和在羅馬占領時期不相上下的。我們還從普林尼知道，非洲的主要產品是羊毛、杉木、酸棗木、云石、寶石、一種類似肥皂的泥土、象牙、兽皮、黑人奴隸及馬戲場用的野獸。關於最後一項，狄奧多理哥特人是完全依靠非洲來獲得的。汪达尔的最基本的工業似乎是製造刀劍。關於日耳曼人占領非洲的一個有趣味結果是北日耳曼貿易遠及南方，因為琥珀、頭髮和鹿角雕刻品，可在非洲和西班牙出售。

然而，汪达尔人主要是海盜。一種最稀奇的事情是，這原住內地的日耳曼部族，這樣迅速地習慣於海上生活，他們利用了阿特拉斯山所產的木材以及羅馬人的造船塢，而變為海盜，變為對西西里和其他島嶼以及對西班牙、高盧和意大利沿海進行掠奪的恐怖的对象。455年時，汪达尔的劫掠羅馬城，不象410年時哥特人劫掠羅馬城那樣，乃是一件放恣而預謀的掠奪行動。他們的艦隊甚至向東駛入愛琴海，蹂躪希臘各島嶼。這些對商業上的掠奪行為，成為查士丁尼在533年出征汪达尔王國的一個主要原因。

令人有輕鬆之感的，是從汪达尔人的骯髒歷史轉到最高貴的日耳曼族——東哥特人的歷史，轉到日耳曼征服中的最高貴的人物——意大利狄奧多理大帝(489—526年)的歷史。

在第五世紀中，意大利的衰敗，又普遍又迅速，特別是在它的後半期；在476年時，凱撒世系在西歐歸於結束。瑪約里安(489—526年)，唯一的值得懷念的皇帝所頒布的改革法，指出了那社會經濟病根，它正在破壞整個西方帝國，也許首先是意大利。當時，人口數量曾這樣地迅速下降，以致儘管有教會的禁欲主義，法律却禁止未滿四十歲的婦女們帶着面紗，命令一切寡婦在五年內必須再醮，違者的一半財產將沒入國庫。生活費用曾這樣地高漲，以致有些家庭強迫子弟們加入僧侶等級。稅吏的貪婪曾變成這樣地厲害，以致為了保護納稅人免受行政官吏的勒索，曾設立保衛官署。城市居民逃入鄉村，以求避免這些經濟壓迫。貨幣貶值而又混亂。然而，這些改革都是具文，從下一事實，可以想見。根據這些改革減輕了最難堪的財政負擔為理由，竟把稅率提高起來了！關於一切公德心的墮落，有一個最奇特的事例，可資證明，即用法律來保護公共建築物，以防搗毀。在意大利各城市內，首先是在羅馬城內，充滿着古老的宏偉建築物、浴場、公所、皇宮；它們那時久已荒廢而不復使用，所以石匠和造屋匠或任何需要云石的人，從這些建築物採取石頭，好象它們是天然的采石場那樣。僧侶是在干着這種勾當中的最可惡的罪人，他們曾拆毀廟宇宮殿，來建造教堂。甚至云石雕象也被化作石灰。這種“汪達爾主義”在國內表現的形式繼續了千年之久。“古代羅馬的毀滅”，是由羅馬人自己造成的。

其時，意大利變成了那些來自多瑙河區的日耳曼軍事冒險家的掠奪物，他們不是殖民者，也不是侵犯者，而是真正的傭兵隊長，他們的兵士爭先恐後地奪取恩賜地，一般說，就是為剝奪財主或者國庫的借口。結果，在全意大利，地主開始在他們的鄉村住所設防，建造堡壘以求自衛，那是中世紀城堡的先驅。恩諾狄阿斯留傳下來一篇關於哥特人進入意大利時全國慘象的記載。他說，滿地

荊棘，田野已大部变为荒蕪了。

可是，跟着狄奥多理(489—526年)統率东哥特人到达意大利的时候，它的一个新的日子破曉了。狄奥多理名义上是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总督地位来統治意大利，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独立的日耳曼国王。他意图尽其力之所能，象羅馬統治者一样来統治；所以，东哥特王国，在一切日耳曼人所建立的王国中是羅馬化最強烈的。不象在高盧和西班牙那样，羅馬地主階級似乎未曾被剝奪他們任何部分的土地。

如果那沒收 1/3 的土地的办法行使于意大利，那末，那里的地主階級会遭到劫難了，可是所有的証据都指出，哥特的征服是异乎尋常地和緩的。因为有着廣闊的荒蕪地帶，哥特人的居住区可能不是从剝奪土地所有者方面得来的。当然，在某种情况之下，一定会有強暴的剝奪行为的。例如狄奥达特的行为，他是一个哥特貴族，在多斯加納曾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公国。但是，貴族階級沒有遭受着普遍占奪土地的損害。貴族保存着他們广大无边的領地，即他們的巨大財富。哥特人曾以分取土地上的产物为滿足。因此，羅馬業主得以仍然保有土地，这一事实在将来是很重要的。甚至那些在私人手中的國庫領地，也未曾加以騷擾。关于这些事情，卡息奥多拉^①的証明是有力的。

对本地羅馬貴族的安撫，是狄奥多理的政策的一部分。的确，他对这一階級的态度是太寬大了；他們濫用了所获得的特权，竟至率領他們的武装农奴和奴隶的队伍，互相战斗，互相越界来搶奪土地，最后他們还和查士丁尼携手，而毀灭了这个王国。为了取得大業主的支持，狄奥多理对待下層階級比旧羅馬政府还严厉。他曾禁止自由人、奴隶以及隶农控告他們的主人；这项法律把农业人口

^① 卡息奥多拉(468—568年)是狄奥多理的秘書和大臣，著有《哥特史》(“De Rebus Geticis”)。——譯者

中的大量群眾完全委諸業主的司法管轄了。

意大利所遭受的一個最大的禍害，是由人口縮減所引起的粗勞動力的缺乏。狄奧多理首先所注意的事件之一，便是要補救這一缺點。在他和鄂多瓦戰爭的時期中，勃艮第人曾侵入北意大利，擄走了幾千人，作為奴隸。狄奧多理曾派遣巴費亞主教聖埃匹非尼阿，到阿爾卑斯山外，要求收回這批人。當時勃艮第人部分為了恐懼，部分為了取得贖金，乃放回了他們；於是，那荒廢土地上才重新有人居住。

對於羅馬留下來的財政制度，哥特政府未曾作出什麼新的修改。羅馬度量衡制和羅馬驛站制繼續下去。各種舊直接稅甚至那在東羅馬已由阿那斯塔細亞取消的“金銀稅”也保留着。至於間接稅，它們在工商業的發展和中等階級的形成受着奴隸制阻礙的社會里，原是无足重輕的。狄奧多理曾降低了進口稅，以期發展一個哥特的商船隊，但是，對進口稅的征收成為麻煩的根源。當時，最失民心的賦稅是對各種買賣征值百抽四的交易稅，由買賣雙方各付一半，這項稅收曾由瓦倫丁尼安三世和狄奧多西二世所建立而變成了經常化。當然，買方是實際付稅者。為了部分補貼，哥特國庫對有些供應糧食和某種工業出品給大城市和宮廷的商人，賜以特權，這特權取了一個有重要意義的名稱，即壟斷權(monopolium)。在意大利，哥特的賦稅不如過去羅馬賦稅那樣的苛重。政府的開支更是少得多；教會和公共教育機關都沒有領到什麼定額補助費；軍費的開支在和平時期原是很少的，而和平時期繼續了四十年之久。官吏俸給看來是遠低於羅馬官僚制政府的官俸；而且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行政費內開支的。

上文已講過，在帝國後期，意大利農業情況是多麼淒慘。對於這種情況，狄奧多理未曾採取什麼積極挽救辦法，因為他不能改變那大地產占有制和奴隸勞動的普遍狀態。然而，農業也曾經復興

过，因为所建立的政府已消灭那长久性的叛乱和盗风了。在四十年的和平时期，意大利的人口是在增加着。同时代的目击者，甚至那些不会被人疑心对异端政府有所偏袒的天主教徒，也承認恢复繁荣。我們可看几件重要的事实。有两个私人地位的公民，斯皮斯和杜密提阿斯(他們的名字听起来象羅馬人)，曾建議用自己的經費来抽干斯波勒陀附近的大沼泽地，条件是国家将把这干涸的土地的产权，給予他們。这一事件指出了，大部分荒地可能在哥特的統治时期已被占取。另有一个公民伊西厄斯，曾进行抽干逢丁大沼泽地，而对于这一計劃，过去帝国政府是从不能够完成的。

然而，在有些年内，意大利的谷物收获是不够的。如果說意大利曾輸出麦子，这只是对西哥特或西班牙而言，而且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一般地說，麦子还需要不断地輸入；国王的命令不仅禁止谷物的出口，而且还禁止谷物从一省到另一省的轉运。如果說生活費用尽管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是在降低着，真正貧苦的人还是須依靠公共救济而过活；而且粮食管理局在羅馬城和拉温那所处的重要地位，还是象在过去时代一样。除了軍隊谷倉以外，还有很多其他谷倉；常常在飢饉时期，將軍总督規定出粮食的最高价格；而地主們被迫接受这最高价格，不得拒絕出售。一个同时代人說过，在哥特統治时期，食品的价格减低了 $1/3$ 。当时，谷物交易是一种用执照来管制的專利貿易。

在狄奥多理統治时期，单从农业方面來說，意大利曾得益不淺，可是資本的缺乏还是一項阻力。当时有着两种耕种方式，即由奴隶耕种和由佃人耕种。但是，在好政府之下，土壤的肥沃性部分地抵消了那方法上的缺点。谷物、葡萄酒和油脂是那里的主要产品。牛羊、馬匹和猪在南方諸省，出产很多；維罗那的葡萄酒是名贵的；布拉替安出产优等干酪。那些茂密地生长在山区的栗子树供給一种重要的食品。漁业欣欣向荣。波河上的漁夫組成为許多

团体，而政府从这里获得海員的供应。亚平宁山上的森林虽大部被伐除，但意大利并不缺少象松柏一类的木材供应。开采金矿业在布拉替安进行着，开采鉄矿业在达尔馬提亚进行着，但是，意大利还有相当数量的金屬从西班牙輸入，因为在这方面，意大利不是自給自足的。

至于工业組織沒有改变。富人們在自己家內有着作坊和手艺人。有些旧羅馬行会，包括自由人或穷苦自由人在內，繼續存在，但是这些組織遭受严峻管理制度的压迫，象狄奥多西法典上規定的那样。兒子必須繼續他父亲的职业，行会的成員除了娶同行手艺人的女兒外，依法不得娶其他女人，这些規則都足以使工业結構成为一种等級制度了。

关于工业方面的唯一例外是制陶业。对这项工业狄奥多理似乎曾給予特別保护，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給三个元老恩寵；这些元老使用了他們的奴隶、自由人和穷苦自由人来經營这项事业。国王为保护制陶业所頒布的命令，是属于这类性質的唯一命令，从而它有着双重的意义，因为它也暴露了羅馬元老在实业界里的活动。

在东哥特意大利市集中，最重要的是在琉卡尼亚的科索立那鎮附近的圣息普立安的市集；在那里南部各省人民常来交換谷物、牲口、衣服及其他商品。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奴隶市場。在狄奥多理死后(526年)，卡息奥多拉抱不平地談及某些“暴徒”的暴行；这批暴徒曾搶劫那些在圣息普立安节日集会的商人所携带的东西。因为圣徒的节日，是一个教会里的圣日，也是一个市場上的假日。

当时，意大利的經濟只是比較繁荣，因为哥特政府对現行制度未曾进行改变。“专利”制度还是有效。工业管制条款还是繁杂的。征稅制还是和內地商品的自由交換相抵触。狄奥多理，象羅馬皇帝一样，建造引水管和浴場，在城市公共建設和道路建筑方面花了

大筆款項；他還維持公共遊戲場，雖然他曾企圖取締這些劇烈表演中的不合乎人道的行動。度量衡和貨幣制沒有變動。帝國驛站制還在繼續。狄奧多理的政府不象西哥特政府那樣，對猶太人採取了容忍的態度。

東哥特人的首都，設在拉溫那，因為羅馬已迅速地變成為教皇城。這個“哥特和拜占廷時代的龐培”^①是一個舊威尼斯，雖然早在第六世紀，那填滿礁湖的工程已使那些原為羅馬船隻往來行駛的地方有開闢果園和花園的可能^②。

如果東哥特人能安然繼續統治意大利的話，他們可能在式微的羅馬帝國之內，造成一種最合乎人道的、高度發展的羅馬-日耳曼文明。可是，它遭到了一個有力的阻礙：哥特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可能還不到 1/10，而大部居民都是熱心的天主教徒，他們以沉郁的仇恨心理，對待阿利阿教哥特人的統治，把它看作異端的統治。天主教僧侶和羅馬貴族又把這種仇恨情緒孜孜不倦地培養出來。特別是羅馬貴族，他們住在由幾千個農奴和奴隸個人所圍繞的設防莊園里，象封建主一樣，力圖建立地方政權，因而對政府所加的政治束縛，深為憤慨。

最後，正是在狄奧多理逝世的那一年（526年），當他的女兒擔任攝政和他的孫子擔任名義上統治者（一個微妙的政治局勢）的時候，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登極；他決心消滅西歐的日耳曼各王國，來恢復舊羅馬帝國過去所擁有的廣大地區，再使地中海成為一個羅馬的內湖。533 年對汪達爾人的征服及 544 年對西哥特西班牙沿海岸的占領，都是屬於這宏大計劃的。

但是，在這個計劃中，東羅馬皇帝所付代價最高而所遭困難最

① 龐培(Pompeii)——意大利的坎佩尼亞南部的沿海古城，於公元 79 年維蘇威(Visuvius)火山爆發時被灰石所埋滅。——譯者

② 指新威尼斯。——譯者

多的部分是意大利的恢复。因为东哥特人不是象汪达尔人那样的一个墮落种族，他們的政府也不是象西哥特人政府那样一个軟弱而又腐敗的政府。帝国政府为恢复意大利的統治权，进行了十七年的长期战争(535—552年)，而且只在差不多把全部哥特族歼灭之后才能完成。战争是在535年从占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开始的，次年，意大利南部各省遭受了蹂躪。当貝利撒留的胜利消息遍傳各地的时候，意大利居民自发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从喀拉布里亚到多斯加納大地主，即使只用镰刀和铁耙，都把他們的佃农武装起来。在許多城市里，狂怒的民众屠杀了哥特的駐防軍。

我們无須詳細地追叙这长期而又殘酷的战争，但其中有些事件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些年代里羅馬城曾遭受四次圍困，經此大破坏后，它的面貌已不复是一个古代式的，而是一个中世紀式的羅馬城；它所經歷的轉变竟至这样的深刻程度。在536年貝利撒留一举占领了羅馬城；哥特人圍困了它一年(537—538年)，未得逞；后在546年羅馬城被哥特人占领，但不久被貝利撒留夺回并加强防御；在549年，它第三次被哥特人进攻而陷落；最后在552年，貝利撒留的后繼人那錫士，为了帝国的軍威，收复了羅馬城。

从这些事件里，可以看到几种重要而突出的事实。在第一次圍攻里，查士丁尼对非洲的征服显然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从迦太基到奧斯替亚的运粮船可以粮秣供应羅馬城。可是，那粮秣的供应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在城内凡是不用于战争的牲口和馬匹，都被杀了。可是，这又引起了一个严重問題。原来，羅馬人用麦子磨粉，是利用馬或牛来带动磨石的。但是，在特拉斯特維尔，还有几所水力磨坊位于查尼邱兰的山坡上，面对着現在叫做彭特·西斯陀桥，在那里利用着图拉真所建的高引水道所泻下的瀑布。可是，哥特人已把引水道割断，因而这些磨坊也停工了。在这危急状况下，貝利撒留曾把两只駁船并排停泊在台伯河急流中，而后以磨轮悬挂在

兩船的中間來磨碎麥子。這種異想天開的方法，沒有失傳。從那時起直到最近時期，台伯河上的水面磨坊已成為羅馬城的尋常現象。

在第二次圍攻里，哥特人截斷了奧斯替亞港因而阻止那來自非洲的小麥供應。貝利撒留也不怕什麼，把所有的非戰鬥員的居民都趕到城外去，並強制在這些空地上播種谷物。這一事實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表明了過去羅馬城內稠密的人口現在一定已經大大地縮減，而且另從別的資料方面我們知道，在第三世紀建造的两座奧理略城垣之間的地面上已是人烟稀少。當時，麥價猛漲到荒年時期的麥價水平，幾乎達到了一先令一磅的麥價，居民曾挨餓節食，來養活士兵；“戰時麵包”即用麩皮和切細的草根或青草製成的麵包是家常便飯。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那些隨軍賣食品的以及軍官們正好投機詭詐，發了橫財。

飢荒情況果然跟着戰爭的結束而消逝。但是，羅馬城在很重要的一方面已由於這些圍攻而改觀了。原來在幾百年中，政府大廈、凱撒宮殿以及同樣豪華的羅馬貴族住宅是建造在山丘之上的。卡匹托萊丘頂上，屹立着衛城、元老院大廈以及神廟；帕拉泰因丘頂上，高聳着巍峨的皇宮，其中突出的是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的堂皇的紀念碑；阿文丁丘頂上點綴着八十座私人宮殿。由於那些引水管的破壞，這批貴族階級的分子被迫拋棄了他們的宅邸，到城市的平坦地方找尋住所；在那里，貧苦階層住在台伯河的兩岸，以淺井或河水作為他們飲水的來源。因此，那些被廢棄的宮殿經過若干年後，墻坍壁倒，變成爲貓頭鷹、蝙蝠和毒蛇的棲息所了。最後，它們失掉它們的一切原來面貌，傾倒而成為大堆泥土；而中世紀居民遂在那里放牧牛羊了。巨大浴場也已破毀。所以，羅馬不僅遷移了它的政府地址和它的社會重心，而且它的習慣也改變了。

現在，羅馬中心是在哈德良和聖彼得陵墓周圍的地方。哈德良陵墓在羅馬被圍攻的時期中，已改成為衛城，在那里它的原有性

質和外貌的各種痕跡幾乎完全抹去了。在連續幾次的圍攻里，哈德良的巨型云石象，安敦尼朝諸皇的坟墓，彩色的云石地板、梯階、壁板、光滑的云石表門，一切東西除了大廈的堅硬磚石心子以外，都已被拆毀而破壞不堪了。當帝國守衛軍用盡了軍火的時候，他們“就使用那些裝飾大廈的很多雕象，作為投彈，並把這些雕象向哥特人投擲。打碎了的藝術品，神象及皇帝和英雄的雕象，象落冰雹那樣，紛紛大塊地落下。那些正在進攻的哥特人受到了神象身體的壓力而倒斃；這些神象也許曾一度裝飾過雅典的神廟，象坡力克利塔或普拉克息特利^①的作品那樣”。那著名的云石福恩神象^②及哈德良象的巨型頭曾在十七世紀被發現，它們都已經破壞，並已長久埋藏在城堡周圍的濠溝里。但是，那首先如此破壞古代藝術精華的恥辱，倒是不應加在羅馬人和哥特人身上的。因為塔西佗說過，維斯帕西安的一個弟兄，在那分裂羅馬的內戰時期，曾在卡匹托萊丘頂上以云石象筑成障礙物進行防衛。

“哈德良石堤”象聖安極樂堡壘（偉人格列高里時代這樣稱呼的）一樣，在千年以上的時期中，曾成為羅馬城的堡壘，的確，在名義上至今還是一個堡壘。與古代式羅馬城如此轉變為中世紀式羅馬城的同一時期，它也差不多擺脫了異教傳統的最后痕跡。雖然教皇住在拉特藍宮里，但大部分居民住在聖彼得大教堂的周圍；那是新羅馬城的宗教和社會的中心。很早已有香客來到這裡，而且在這裡已有旅館和商店；在台伯河彼岸的特拉斯特維爾，住着工人羣眾，即手藝者和匠人。在聖彼得教堂蔭影下和在聖邁克爾即基督教戰神象的銅翼下，羅馬民眾後來居住了好幾百年。

但是，另有一個後果，它也是從割斷引水管產生而深深地影響

① 兩人都是古代希臘的大雕刻家。——譯者

② 福恩(Faun)是意大利牧野神之一，具有人類的面容而有尖銳的耳朵，細小的角，有時並有山羊的尾或半羊半人的形狀。——譯者

着羅馬城的生活的。我們還可看到這些破裂了的引水管拱門的遺跡，它們象史前的恐龍一樣，還傲然橫跨于坎帕納地方^①。由於這些引水管的破裂，洪水曾泛濫于坎帕納，使羅馬城周圍幾哩的廣闊區域成為沼地；從這裡蒸发出的帶着傳染性的水氣，在幾百年中曾是“羅馬瘧疾”的根源。普林尼在公元前第一世紀里，曾以坎帕納的麥田而驕傲。但到了第六世紀，它們已成為瘧疾來源的沼地了。

由此可見，為了這一切原因并在這樣的情況下，古代式羅馬城消逝而中世紀式的羅馬城就出現了。

現在，我們可簡略地談一談哥特戰爭的結局。拉溫那在 540 年被占領。戰事遍及了半島全境。到處發生着疫癘、飢饉和荒涼狀態。一年復一年，很少田地有人播種，野生谷物茁長而沒有人去收穫。城市居民餓斃于街道上，鄉民逃往山區和森林中去。豺狼激增，它們找到了這樣多的尸首來大嚼，以致它們在許多地方變成一種恐怖。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行為。當戰爭停止的時候，意大利一半已是坟墓了。東哥特意大利，對當時來說已具有價值，而對將來而言可望有利于文明的发展；所以，它毀滅的歷史，是人類史上的最悲慘的一章。

人類的毀滅，由於疫癘的猖獗而增加起來；這疫癘似乎就是幾年之前曾使地中海沿岸國家變為如此荒涼的黑死病。一本歷史書上說：“畜群獨自留在牧場上而沒有牧人來照管。你可看到不久之前人煙稠密的農莊或設防地區，現已完全沉寂了：聽不到田野中的人聲，也聽不到牧人的哨聲。冬季已至，而莊稼沒有人去割，葡萄園內藤葉已落，葡萄已熟爛得光油油而無人去采。沒有過路人的足跡。人類的住宅已成為野獸的棲息之所。”

有很多哥特族人曾逃往阿爾卑斯山外阿勒曼尼部落中去。據

① 指坎帕納·第·羅馬 (Campagna di Roma) —— 羅馬周圍的起伏平原。—— 譯者

一个近代史家說，“由于他們的被逐，文明倒退了一千五百年。”然而，不是所有的哥特人或者被逐出，或者被歼灭的。尽管有着长期的殘酷战争和大規模的掠夺行动，在下一世紀里，我們还可看到为数不少的哥特人在帝国政府里和教皇政府里担任着行政职位，他們还是以显著人物或要人著称；这一事实表明了，有些哥特貴族在他們的國家复亡和他們的种族毁灭之后，想必是留存下来的。

查士丁尼的狂妄战争，使他貪得无厭地搜刮金錢，在这殘破的意大利領土上設立了总督，駐在拉温那，通过总督，他建立了拜占廷經濟压迫的精密机构。亚历山大“剪刀”，即皇帝的臭名昭著的征稅官，在任內大发其財。按法律，他应得所征稅款的 1/12，所以，对于他所能課征的范围，除了民众的負担能力以外，再也沒有別的限制了。甚至軍隊的餉銀，他也要窃取，对于破坏紀律的事件，他也要勒索苛重罰款。“一切意大利人，凡和哥特国王有过金錢交易者，或者在他們手下做过一官半职的，都必須交出一切所收款項的詳細帳目，即使这些款項是在四十年之前，即在狄奥多利統治的早期，由他們經手的。”

查士丁尼死于 565 年。他不及亲見他的工作遭到部分的破坏，为了这工作他曾消耗无可估量的鮮血和財物，并曾把沉重的負担橫加在意大利的身上。568 年，倫巴人即“大移动”中的最后一支日耳曼族，进入了意大利。整个意大利，由于哥特人的长期战争，已变成这样地广人稀，以致倫巴人差不多进入了一片无人之境。北部的大多数城市已經破坏；米兰城不止一次地被蹂躪。虽然米兰后曾恢复起来，但那錫士^①沒有来得及完成了他的城市建造計劃。

只有巴費亞城抵抗过。倫巴人迅速地蹂躪了整个波河流域包括威尼斯和利古里亚在內。当我们討論倫巴人的野蛮性的时候，

^① 那錫士(473—573年)，在 554 年被东羅馬政府任为意大利总督，在 567 年被免职。——譯者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听不到殘暴的事實。也許很少有人能够进行抵抗。“实际上，除了佩魯查的一个例外以外，帝国所保留下来的地点，不是在海濱的象热那亚和安科納那样，便是由水流环绕着的象孟都亚那样，便是有航路可直达的，象格里摩拿和皮阿森扎。倫巴人对航海术一窍不通，所以留在内地；希腊公侯，即东羅馬皇帝的代理人，統治着沿海口岸：拉温那、安科納、那不勒斯、阿馬斐、索倫多、基泰和大兰多。”倫巴人所曾占有的唯一港口，是比薩，但那也是好久以后的事。

下面是一个有趣味而又重要的历史事实。意大利沿海地区缺少着农业富源，倫巴人已占領波河流域的肥沃腹地，威尼斯占有着海濱的位置，而且是东方貿易的自然通路；这一切因素迫使威尼斯比以前更加努力，来发展它的海上貿易。現在热那亚也出現了，它是一个无城垣的小漁村，从羅馬时代以来久被遺忘，可是注定要变成威尼斯的最兇猛的貿易竞争者。威尼斯在603年时虽然失掉巴士亚和孟都亚，归于倫巴人；但它的海島地位使它免去騷扰，而它的人口由于来自大陆上的难民而增加起来，这批难民逃避倫巴人，和早期居民逃避匈奴人一样。在中部意大利，羅馬城是难民的庇护所。坎佩尼亚的居民逃往蓬廷沼地去；琉卡尼亚和布拉替安的居民逃往西西里去。主教們放弃了他們的主教座，僧侶們放弃了他們的寺院，城市空虛，田野荒蕪。在北部意大利有不少于十五所主教区，在好几年內沒有首长。

然而，我們不应夸大本地居民放弃波河平原的事实。可能有大举驅逐地主的行动，可是在几年以前已有各种势力，起着促使他們人数縮減或退出的作用。

中等階層的貧困化，阿拉列、阿提拉、盖塞立克、鄂多瓦和他的赫留来族，狄奧多理和他的东哥特人的先后侵入（尤其是那标志着东哥特战争后期的血腥报复），往君士坦丁堡的迁徙，所有高貴出身和有教育的人湧往官厅所

在地（不管在拉溫那或在君士坦丁堡）以求一官半職的趨勢，有些人被教會吸引去，有些人被修道院吸引去……這一切原因，毫無疑問，產生了意大利鄉村貴族可怖縮減的情況，甚至在倫巴人到來加速這過程之前就是如此^①。

在意大利被奴役農民中，一定有很大部分頑強地依戀着鄉土的。我們看到下一事實可資證明：羅馬的土地丈量制（百畝單位）曾遺留下來，的確，在倫巴第這制度從沒被廢除過。而且，意大利的地方名稱，幾乎全部都是羅馬的，而不是日耳曼人的，這表明了倫巴人人口稀少的情况和當地居民依戀鄉土的性質。此外，倫巴語言或藝術對當地的影響，確是微乎其微，那也說明了這同一的事實。從本質上看，意大利的語言和藝術的發展，還是嚴格地循着羅馬路線的。

從征服的性質上及從社會成分的程度上看來，倫巴人的居住區是不同於羅馬帝國內別處的日耳曼人居住區的；所以它深刻地影響了北意大利的歷史，並在和法蘭克高盧、東哥特意大利或西哥特西班牙比較之下，也不同方式地影響了北意大利的歷史。倫巴人是以征服者地位而來，不象別的日耳曼族以帝國政府的輔助者而來的。他們統治着那懷有敵意的本地居民，還受到教皇和拜占廷帝國總督的威脅，他們在人口上這樣稀少，永遠不能遍布整個半島。因此，倫巴人使他們的日耳曼制度的外壳（如果可以這樣說）強化起來，來防衛自己。再也沒有一個日耳曼族，象倫巴人這樣頑固地保持着日耳曼人的本來面目，或這樣長久地保留下去。但是，倫巴人的野蠻性，與其說是討厭的，不如說是古怪的。

我們已提過，那些在別處分割羅馬人土地給自己人的日耳曼人，叫做客人，這土地叫做“份地”（sors），而這所有權叫做“客敬”（hospitalitas）。但是，倫巴人似乎不是把土地本身取走，而是取去

① 霍治金：《意大利及其侵犯者》，第6卷，第589頁。

土地上产物的 $1/3$ (是否为淨的或总的产物,不得而知),似乎讓羅馬業主享有完全占領权,即使說不是所有权。但是,这業主階級的地位那时是怎样呢?这种繳納实物的形式,是暫時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呢?最早的倫巴法律,即《洛塔列(636—652年)法典》差不多是在征服一百年后出現的,不曾反映出原始解决办法条件,而第一个倫巴历史家还是生存在征服两百年之后的人;而且他的記載这样地模糊而混乱,以致难于理解。如果說大業主階級被降到隶农或农奴的地位——倫巴屬民中的“長老階層”(aldii)可能是这样的——那末,不自由階級一定会比他处或比以前被貶到更低的地位了。有些历史家虽然否認羅馬業主被这样地降低身分,但是,大多想要給予不利的解釋。然而,也有人主張說,这种严峻的政策只在征服的早期曾施行过,后来是把部分土地还给羅馬業主的,或者把征收 $1/3$ 的地租改变为征收 $1/3$ 的土地的;另有人主張說,当倫巴人习惯于他的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他遂完全剝夺了旧地主的土地,从而消灭了他們产权的最后痕跡,因此長老階層被降到和农奴一样卑微的地位了。无论如何,倫巴人的征服对羅馬居民所加的負担,确比他处日耳曼人的征服要苛重得多。如果說有什么高等羅馬人階層遗留下来,我們完全不知道这一点。我們也絲毫不知道关于城市中工人階級的地位和状况。但是,有趣味的,后来发现了显然屬於倫巴族的一个人数很多的中等階級;这件事在西哥特西班牙最为少見,而在法兰克高盧也是不显著的。的确,城市和城市生活的重要性,在倫巴第比在欧洲任何別的地方表現得早一些。

《洛塔列法典》是一种草率粗陋的法典,很少反映出羅馬法的影响。当然,它是用拉丁文写的;語法很不通順,但是其中包含有一种粗魯的正义觀念,足証倫巴人是一个专橫部族。法典中所列各种罪行是一个粗野甚至强暴的农业社会的証明,而这精神和制度正是屬於日耳曼族的。

在百年以後，盧易特普蘭(712—744年)即最偉大的倫巴國王，頒布了一個新法典。試把這兩種新舊法典作一比較，倒可以發人深思。現在，我們可看到關於產權、契約、典當等等的很多條文，也可看到文化提高了的各種象徵。現在，有着舊羅馬居民，而且，和在其他日耳曼王國內一樣，有兩種法律同時通行着：一種是為日耳曼人的，另一種是為羅馬人的。當時，奴隸和農奴所處的境遇是平妥的。然而，動產的價值和土地價格相對比，還非常高；這表明倫巴人在第八世紀還沒達到那穩定社會所具有的安居狀態。我們有極其有趣的資料，證明城市中存在着一種從事工業的階層和小手藝職工，尤其是科摩城一個石匠師公會(Magistri Comacini)，他們的建築技術後來創造了倫巴-羅馬式建築；當時，法蘭西和德意志都需要這批人來擔任建築師和石匠。還可找到資料，證明波河上及其支流上的商業接觸和造船業。倫巴貨幣是以拉溫那的拜占廷幣制為本位的；第七世紀中的金銀比價似乎是十八比一。715年時，威尼斯和盧易特普蘭曾談判一種通商條約，規定威尼斯得轉運利凡得商品上溯亞達河及的斯諾河，經意大利湖，越阿爾卑斯山路而達德意志和法蘭克高盧。

可是，從整個來說，倫巴人在這個時候對貿易觀念很少發展，那不是因為他們缺少這一觀念，而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局勢不利於這一方面。當時，他們的王國被虎視眈眈的敵人包圍着：拉溫那總督、教皇、阿佛爾人以及阿爾卑斯山外的法蘭克國王。商人可能是間諜。這閉關的和排外的政策，反映在拉特契斯(744—749年)和愛斯圖爾夫(749—756年)所頒布的法律里。前者曾禁止任何倫巴人不得國王的准許即前往羅馬城、拉溫那、斯波勒陀、貝尼溫陀、法蘭克區、巴伐利亞、阿勒曼尼、希臘或阿佛爾區，違者將處以死刑並沒收其財產。后者曾建立一種通行証制度，禁止和羅馬人的一切貿易。如果有任何倫巴人做了這種生意，他將喪失他的財產，須把他

的头髮剃成“羅馬人的式样”，并須游街示众，受人嘲笑。倫巴人“在头脑中还存在着他們祖先的非常魯鈍的野蛮性。他們还不象三百年以前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那样愿意和他們的拉丁邻人并居杂处”。

在羅馬-东哥特意大利的廢墟上，查士丁尼曾建立拜占廷帝国省行政制度，象他在汪达尔非洲所建立的那样。它是一种带着强烈的軍事傾向的文官政府。这一点，以及它的財政机构都是这制度最显著的屬性。但是，在第七世紀中也曾作过努力防止象亚历山大“剪刀”一流恶徒所干过的征税舞弊情事。城市和乡村大地主貴族有向君士坦丁堡請愿之权，以求昭雪。起初，各省省长不是由上級指派，而是由地方紳士选举出来的，但是，这种寬大措施，在流行的軍事情况的压力下垮台了。貨幣是稳定的，度量衡是被管理的，但十分奇怪，这些度量衡的标准，由教皇保管；这是如下文所述的許多証据中的一个証据，可說明教皇世俗权的徐徐成长。但是，省长和总督同样利用职权，竭力搜刮，他們在任期内，积聚尽量大的財產。

指出拜占廷的統治和希腊文明，在意大利半島的南部比起北部和中部，强烈得多，这是重要的。北方的焦点是在拉温那。希腊-东方的影响仅微乎其微地滲入中部意大利，这地区頑固地保持着意大利和羅馬的特性。然而，在南方，象那不勒斯、撒列諾、巴利、大兰多、布林的西各城都被盖上了拜占廷文化和制度的烙印——西西里也是这样——即后来在那里建立的薩拉森和諾曼人的統治也沒曾把它們完全抹去。在这三个区域以外，另有威尼斯城，它在政治上是自由的，而在商业上是自有其一套政策的。

显然，拜占廷政府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使意大利完全希腊化。当时，各省的省长是希腊人，僧侶大部分是希腊人；那里有几十所希腊修道寺院；甚至有几个教皇也是希腊人或希腊-叙利亚人。东

羅馬皇帝由於他們追求希臘化的熱情，竟指望教皇座本身迁移到拉溫那去。他們曾清楚地認識到，教廷是羅馬文明的樞紐。這一夢想，在西歐拉丁文化衰敗情況下，似乎不是完全不可實現的。

當拜占廷帝國的財政主要由於埃及和敘利亞被穆罕默德教徒所占取而越發窘迫的時候，它在剩餘領土上所實施的財政政策也越多掠奪性了。皇帝昆斯坦斯(663—668年)由貪婪的行為，使自己變成臭名昭著。在所有的東方皇帝中，獨有他一人把大部時間消磨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意圖或借口使用西西里作為反對那時正在蹂躪非洲北岸的薩拉森人作戰的基地。他曾一度克復過迦太基。“西西里、撒地尼亞、喀拉布里亞以及非洲省的農民，長久記着昆斯坦斯的收稅吏的壓迫手段。他們的勒索竟至這樣強橫程度，以致為了滿足他們的要求，丈夫被迫出售為奴隸而離棄其妻兒，兒女被迫出售為奴隸而離棄其父母。”沒有疑問，這些蠻橫行為使已陷於絕望的西西里居民寧可歡迎薩拉森人的征服，以求改變主人；他們認為，這總可好些，決不會更壞。甚至羅馬城也不能幸免于搜刮。從第五世紀以來，沒有一個皇帝曾住過“永不滅之城”里。帕拉泰因雖在徐徐衰敗的過程里，但至少一部分還可住人。但是，羅馬城已處在一片淒涼景象之中。昆斯坦斯在他停留羅馬的十二天中，從潘提昂^①屋頂上拆卸了鍍銅瓦片，如果他有膽量的話，可能將同樣地拆卸了聖彼得大教堂的瓦片。事實上他曾把許多教堂內祭壇上的花瓶和珠寶連同積存的各省稅款，一起運到西西里去。

昆斯坦斯的可憎的掠奪行為是由南意大利和西西里這樣富饒的情況所激起的。因為事實指出，在那里的港口上商業和貿易是活躍的。當時，穆罕默德教的海權還未曾興起。第六和第七世紀所發的執照，揭露出相當繁多的職業類別：染師、縫工、制蠟工、毛

① 就是羅馬城的萬神廟。——譯者。

皮商、絲商以及普通商人。我們在拉溫那、俄特兰陀和那不勒斯还可看到旧羅馬行会制度或同业公会的遺跡。在各城市里都可遇到“叙利亚人”(其中必須包括亞美尼亚人和东方的犹太人在內)。在拉溫那和羅馬城有一个叙利亚人的正式“居住区”。薩拉森对叙利亚的征服无疑地可說明为什么意大利有大量的叙利亚人。这批人是經營絲綢、香料等奢侈品的商业巨子,也是銀錢兌換商。在這項貿易里,他們所碰到的唯一競爭者是威尼斯人,因为到第七世紀,威尼斯也已着手对埃及的貿易。

更奇怪的是我們看到色雷斯人的殖民地,他們被保加利亚人逐出,而由帝国政府移殖于帕諾馬斯和那不勒斯的周圍的;另有一个保加利亚人的殖民地,他們随后被阿佛尔人逼迫,而由貝尼溫陀公爵引入他的公爵領內原已荒蕪的空地上居住的。在百余年以后,有一个倫巴历史家写道:“他們直到今天,还是住在这些土地上;他們虽然講拉丁語,[意大利語,当然,還沒曾形成起来。]但本国語言也未放弃使用。”

从意大利-拜占廷社会的橫断面可以发现三个階層:在底層,是奴隶和农奴的混合人口,包括乡村里的僱农和城市里的工人与小手艺者在內,其中很少人是自由的;其次,是小土地所有者和低級官吏;最后,是大官員和大土地所有者。尽管帝国政府有严密的机构,但帝国对大部居民的統治,却是半封建式的。自由的所有权还是存在的,但有着消灭的趨勢。僧侶和大土地所有者已变成封建領主,他們的“地产”虽常常是分散的,但加在一起,它們的面积却是很大的。奴隶制在和緩着,而农奴制在增长着。这类强大的貴族,稳步地力爭摆脱政府的全部控制;各种行政上的舞弊又使“庇护”制度得以扩展和傳布;而在封建制成长过程里,这制度本是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小自由农为了获得保护,自动地讓出他們的自由权利。有些人,因为貴族垂涎他們的土地,被压制到农奴地

位。另有許多軟弱而又無辦法的人們，力求托庇于教會的護翼之下。可是，由于教會的嚴峻的土地管理政策的影響，農民寧愿請求世俗地主的保護，而不愿請求教會地主的保護。偉人格列高里埋怨地說，教會農奴逃亡到世俗土地上去以求保護了。

現在，由于上面的討論，我們可進一步來談在中世紀意大利第三個重要國家的歷史，也是一個歷史上的特殊國家，“彼得的世襲領”，即教會國家的歷史。在上文里，我們曾講過在西歐各地教會怎樣變成一個大土地所有者和一個世俗權力。這個具有封建性質的過程，對世俗人說來，不是一件新奇的事，而對僧侶說來，這却是具有革命性質的轉變，因為他們的管轄權範圍原本是在精神方面的。每個主教，每個住持，都變成地主，而教廷變成最大的領主了。我們可相當正確地追尋教皇的世襲領和世俗權的成長過程；這過程歷時好幾百年，從君士坦丁時代起，當時帝國政府和私人開始以大批土地和金錢贈給教廷，直到在偉人教皇格列高里一世（590—604年）時代，教廷的封建管轄權已通行于意大利、西西里、撒地尼亞和科西嘉的遼闊地面上為止。按一個世俗統治者的地位論，在意大利或在任何別的地方，沒有一個教會是可与教廷相比的。過去，帝國的意大利領土曾巩固羅馬皇帝的權力，同樣，現在教皇所領有的廣大土地足以把教皇提升到國君的地位和權力。《偉人格列高里傳》的第五十三章內列舉了二十三個教皇世襲領，須知其中有很多“世襲領”包括屬於教皇的很多省分或城市的大部面積。曾有人計算過，如果把在格列高里第一時代羅馬城和它周圍的隸屬於教皇的地產合并成為一塊接連土地，它會包含有四十平方哩的面積。

但除此之外，教皇在薩卑那姆、在匹栖那謨、在坎佩尼亞、在拉溫那周圍、在波河流域、在喀拉布里亞、伊犁利根、西西里、在科西嘉，甚至在阿尔卑斯山外的阿勒拉特，都領有土地，它們的總面積

估計達一千八百平方哩，它們所出產的收入，按現代貨幣計算，約合一百五十萬美元以上。雖然教皇在理論上，根據查士丁尼的諭旨，所享有的政治權利比起別的主教所大無幾，但是實際上他已站在大部意大利，尤其是中部諸省的事實統治者的地位上了。他的領地是廣大的，他的教會是富裕的，而他又是聖彼得的繼承人。在羅馬城內，他是行政長官，也是教長。他指揮警察，管理市場，鑄造貨幣，維持民事和刑事法庭，修建城垣和引水管，補助學校和醫院，統率民軍，以及被攻擊時捍衛城市。“那由教皇因領有廣大土地而行使的權力，在帝國權力的衰弱時期，已差不多近於一個主權者的權力了。”

這些廣大產是作為莊園來領有的，在那裡有幾千幾萬人居住並勞動着。在這些產中最富饒的，是西西里的麥田；它們過去曾屬於帝國國庫的。單單這些麥田，按照當時的十八比一的金銀比價，估計曾出產合八萬美元以上的收入。倫巴人的侵入在好多年內使教廷喪失了所有的北意大利的世襲領——科替安阿爾卑斯山區，在那泥、奧賽摩、安科納、烏馬那和威拉·馬格那——直到盧易特普蘭收復了這些失地為止。但是，作為對這些失地的部分補償，君士坦丁五世曾賜給教皇撒加利一世諾耳馬和寧發爾的兩塊富饒的領地，這兩塊地在六百年以後，估價值五百萬美元。

所有關於這些產的行政管理，是依靠一個有權力的官僚機構，並完全按照過去羅馬皇帝管理莊園的辦法進行的。中世紀統計文獻，遺留下來的在數目上原是不多的。但是，幸而我們獲得了格列高里一世時代關於管理教皇領的豐富資料；就是，格列高里的《通訊集》以及羅馬城居民的戶籍簿一冊。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管理方法的主要輪廓。土地分成小塊給農民，收取現款租或實物租。勞役未曾起着這樣重要的作用，象我們後來當莊園制已成為一種流行的、高度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時候所可看到的那樣；

但是很显然，授田取租虽是主要形式，但种田須負擔勞役的制度也已广泛流行。每个庄园交給一个管家来管理，管家須向教皇提交詳細报告；因为財產的处理权是屬於教皇的。格列高里一世是一个信仰坚定而又有慈悲心的人，也是一个富有办事才干的人。他是兼有宗教精神和实践常識的一个杰出人才。他使用大部教會的資源作为維持費和慈善費，但是他精明地以余款購进更多的土地。他注意市場情况，出售木材給无森林的埃及，麦子給君士坦丁堡，撒地尼亚生鉄給东羅馬皇帝制造武器，出售橄欖和橄欖油于任何可能出售的地方。下引摘要，取自他給西西里的副管事兼教廷代表彼得的信里，是不言而喻的：

必須用心閱讀在你往西西里去的时候我給你的訓令……我們已查明，屬於教會的农夫对于麦价非常抱怨，因为要他們繳納的数目，在丰收时期，沒有保持在适当比例。我們的意思是，在一切时期，丰收也好，歉收也好，比例的尺度应依照市价。由于船难而損失的谷物，必須責成全部賠償，但是，有一条件，即关于裝运谷物在你方面并无疏忽之处。

这里所說的，是指从西西里运到羅馬城的麦子。麦子是在所有人自負危險責任的条件下裝运的，但是，教皇供給那些屬於教會的船舶作为運輸工具。如有損失情事，有責任的一方須負責賠償。

我們也已知道：在有些教會的庄园里，有一种极不公平的勒索行为，即农务管理人要求从七十升中抽取三升半〔田庄管家就是这样向农民敲詐的〕。这是可恥的，必須制止。

凡是年老不孕的母牛，或看来已很不中用的公牛，应即出售，这样至少还可从它們身上撈得一些利益。致于牝馬群，养着很无好处，我願把它們全部分散，为繁殖的目的，只保留年輕的四百头；这四百头应分發給我們田庄的管家，給每个人若干头，要使他們能在未来年代里从中获得一些利潤給我們。因为这对我們來說是很为难的：花費了六十苏里德給牧人而从畜群方面連六十便士也收不回来……

……应同我們整个領地內的牧人協商出一種办法，使他們能种地賺

錢。所有屬於教會的農具，不論在叙拉古或在帕諾馬斯，必須在它們因年久而銹成廢鐵以前售出……應溫和謹慎地對待農夫……應把你所征集的全部繳款帶來，連同你的全部帳冊……前次你送給我一头可怜的小馬和五头良好的驢子。小馬我不能騎，它是这样的一只可怜的动物；那些驢子虽然不差，我也不能騎……應从其他谷物生产者或出售者，收集价达五十金鎊的本年收获的谷物，并把谷物儲存在西西里各地，不使它发生霉腐；我們将于二月中派遣尽量多的船只往那里，来装运这些谷物到我們这边……这里食粮已經这样地缺少，以致将有飢荒景象；除非蒼天保佑，能把西西里的粮食收集运来。

从上面所引的話可以看出，公元600年时，意大利和全部西欧相同，差不多整个地陷于自然經濟的状态里，在这状态里，农产品和原料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商品。所有的工业也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簡單工业，例如紡織、制革、制造木器、打鉄、制草鞋、染色、制肥皂、烘面包等等。这些职业还保存着它們古代羅馬的行会形式，但是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稳步扩展，促使这类組織迅速地分化。我們偶然可看到鑲木細工、制玻璃工一类的高級技术工人；当然，他們都是由教會僱傭着的。

由于羅馬、拉温那和君士坦丁堡間，叙利亚和亚历山大城間的接触，我們看到某种程度上的高級商业。在羅馬城和拉温那有希腊商人和叙利亚商人居留地；他們主要是經營絲綢、香料、乳香以及教會所需的东方名貴商品。絲业工人是意大利实业界中的天之驕子，并自高自大地以特殊称呼(*oloseri capratae*)作为炫耀。为了进行国际貿易，在拉温那和羅馬城，还有着銀錢兌換商人。

偉人格列高里，就他的才干、紀律性和堅韌而論，是一个真正的羅馬人。当他贖回那些在倫巴戰爭里被擄的俘虜的时候，他也曾提倡那作为一种剝削制度的农奴制；对于奴隶制，他沒曾作出什么改善的举动。教皇公庫的勒索，比起世俗領地上的勒索还苛重。教皇够聪明地曾看出他的征稅权的強制性，并灵活地利用这

項權力。舉一個例說，他曾發出命令說：“因為在教會的莊園里住着很多猶太人，我願望：如果其中有人願成為基督徒，他們的一些繳款可以還給他們，使別人受到這種利益的刺激，也產生同樣的意願。”其次，在第六世紀，在鄉村低級農民中還存在着舊時異教習慣的很多殘余。格列高里就使用了他的地主的權力加以取締，象下文所指出的那樣：

告卡格利亞里主教：由於你的疏忽，容許了那些屬於你教會的農夫到今天還保留着異教信仰……如果我在撒地尼亞島上能找出屬於無論什麼主教的一個異教農夫，我將以這件事嚴厲責罰那個主教；但是，如果有這樣頑固不化的農夫，竟拒絕皈依主宰上帝，他必須負擔着這樣苛重的稅款，用重稅的處罰迫他趕快走上正路。

教皇的大量進款，在使用方面和在征集方面，是同樣地靈活的。教廷須供養僧侶，維持教會，照顧窮人，救濟病人、醫院、學校、孤兒院，不僅在羅馬城內的而且多少在意大利各省的。但是，因為教皇也是世俗統治者，他還須維持羅馬城及其附近的民事和軍政府。格列高里一世曾企圖恢復有些破碎了的引水管，抽干一部分教廷沼地，並移民到荒地（agri deserti）去，象在他以前羅馬皇帝所做的那樣。由於繼承了與過去皇帝差不多相同權力和地位，教廷必須負擔過去帝國政府在羅馬城所負的一切責任。其中也許最麻煩而又最困難的負擔是糧食救濟，即按照習慣以麥子、橄欖、有時還以酒肉，賜給羅馬無產者。在羅馬城居民中這類懶惰、腐敗的渣滓，是由帝國羅馬傳給教廷羅馬的一項遺產，也是一項最大的經濟負擔；這個最麻煩的社會問題，在好幾百年中教廷政府必須處理。為了維持這批流民的生活，教廷耗費了它的財富，教皇變成心神不安，並且必須把原可用在其他有益事業方面的經費消耗在這方面。教會的救濟事業是不健康的，它的錢款是浪費了的，象在帝國時期羅馬城，為了無產者發給麵包和演馬戲那樣。那在格列高

里一世死后不久所流傳的一件故事，指出了教廷的財政已陷入惡魔圈子內。據說，格列高里的繼承人薩卑尼那斯停止了他的前任所做的浪費的救濟工作；理由是，麥倉已有近于空虛的危險，而羅馬城的忠實的民眾已遭受着飢荒的威脅；但是，這“偉大主教”的幽靈曾在薩卑尼那斯夢中四次出現，警告他所採用的政策。不管怎樣，羅馬城後來不久的確就遭受了一個嚴重的飢荒。

教廷的龐大收入，對倫巴人在意大利擴展統治來說，是一個巨大障礙。因為如果說東羅馬帝國政府以軍隊供給拉溫那總督，那末這些駐兵的餉銀大多是由教廷公庫支付的。其次，當主張宗教改革的热忱乃至皇帝利奧·愛索立安的粗暴促成了著名的“聖象破壞的爭論”（公元725年）從而產生了帝國政府和教廷衝突的時候，教廷的敢于抵抗，教皇的巨額進款當然是有影響的。教廷的這項抵抗政策，是由複雜的動機所引起的，即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動機。但是，無可置疑，意大利的政治解放，至少羅馬城和中部意大利的解放，以及為教皇建立一個獨立的世俗權，都是屬於這一計劃之內的。在教皇和皇帝的衝突中，政治和經濟的利益是和正宗信仰的热忱混在一起的。論性質這爭執是一個分裂叛變運動，也是要从東方帝國的Control下解放意大利——或意大利半島上儘量多的地方——的革命運動；它是一個拉丁文化和希臘文化間的衝突，在同樣程度上，也是一個矛盾的宗教見解上的爭執。利奧三世的“異端”是教皇反叛拜占廷的一個借口，也是一個原因。一句話說，“聖象破壞爭執”是兩個敵對文化間的衝突，即“文化鬥爭。”

我們可从下一事實，知道這項爭執是具有基本的政治經濟的性質：教廷意大利點起“聖象破壞”的叛亂的導火綫，是帝國政府在意大利各省和西西里征收人頭稅這一事件。在此以前，世俗的和教會的土地，都曾按習慣繳付地稅，當然，不是沒有怨言的。但是“戶口調查”是一種新型的稅，即人頭稅。

沒有疑問，那主張改革的皇帝，当他制定征收人头稅及其附帶的必要条件即戶口調查或出生登記的時候，曾意图把一个亏空很大的預算平衡起来；這項努力是聰明的。戶口調查，在巴尔干各省和在亞洲原已不受欢迎，而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則更激起了雙重的反抗；一方面它是一种新的不公平負擔，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被群众所認為由一个异端統治者所加的征課。所以，抗拒這項稅收的激烈程度，就是当时人心的背离的标志。有人曾把利奧三世的命令，比諸埃及國王的殺嬰命令，另有人曾把这人头稅說成是穆罕默德教对非穆罕默德教臣民所征人头稅的模拟品。招致真正怨恨的还在于超年度征稅这一事实，就是說，皇帝为了弥补他的收入的不足，曾企图預征下一年度的稅款，这样一来，就要在一年之內征集两次稅款。教皇对帝国的这一行动提出抗議，認為非法，并鼓动意大利各省起来反叛帝国的政权。

单就意大利和西西里來說，利奧三世对收集稅款的关心，甚于对实行他所提倡的那些不受欢迎的教义和宗教仪式。他很懂得，圣象破坏主义本身在意大利不能达到什么有利的目的。但正是由一个异端統治者来創立一种失民心的課稅，这一事实使天主教派在他們反抗中占得优越地位。教皇根据那所提的所謂异端为理由，对皇帝进行战斗；但他的真正动机，是拒絕付稅，以及使意大利半島上尽量多的地方，尤其是中部拉丁各省，脫离帝国的統治。

由于拜占廷駐兵的軟弱无能，这种抵抗是相当成功的。教皇軍隊是一批杂牌部队，包括作乱的地主，有羅馬人，也有哥特人、倫巴人；他們率領着武装随从，又以来自各城市的烏合民兵及动乱时代常有的流氓地痞，作为补充。“希腊人”和“羅馬人”即“意大利人”的队伍，在城市和乡村里互相战斗；胜者搶劫財物，以求自肥；败者抱头鼠竄，冀免死亡。这批首領們除了自己招致的危險以外，在很多人的心头里，还时常恐怕被虐待以至于絕望的农夫会举兵反抗，

為他們所受的冤曲而報復；當時，還談不上要實現他們的權利，因為封建制度和農奴制都尚未有發展到可制定“權利”的地步。

732年時，由於奉派討伐意大利叛亂的皇家艦隊遇難，利奧三世的計劃已部分挫折了。皇帝因為不能占奪在教皇控制下的中意各省，乃把西西里、喀拉布里亞、亞浦利亞、基泰、那不勒斯各教皇領沒收歸入國庫，並使這些地區內的主教區脫離羅馬的管轄權。皇帝甚至企圖切斷南意和中意各省之間的貿易關係。一句話，他把南意的希臘即希臘化的各省與中意的純拉丁各省隔離，並使它們屈服於君士坦丁堡的壓迫之下。教廷雖然失掉西西里的豐富麥田、喀拉布里亞的產木區和礦場、那不勒斯和基泰的橄欖林和葡萄園，可是它在威望和精神力量方面已無限地增長了。因為那對東羅馬帝國和對希臘文化的令人煩惱的屈從已被消除。教廷現在已站在披着宗教外衣的一個純粹羅馬的和一個全然拉丁的組織的地位，而崛起於中部意大利了。教皇已成為享有世俗權的國君，他的權力僅次於倫巴國王的權力。在下文里，我們將看到：這日子已不在遠，那時倫巴人在意大利的統治，由於法蘭克干涉而趨消失；教皇的世俗權因獲得那消滅了的總督區的領土而增加起來，並從事實上的權力轉變到合法的權力，一個復興的西羅馬帝國在800年時，通過法蘭克王和教皇的合作而建立起來了，在帝國內，查理曼是皇帝，而教皇是最高主教。

第五章 寺院制度的兴起和傳佈

寺院制度的出現，是約在教會成立后兩百年的時期。但是，寺院制度的根源在歷史上可追尋到基督教紀元前很久。它的基本教規——禁欲主義和孤獨形式——可在以前的許多宗教里找出。在基督教前五百年時在印度創立的佛教，有着成千累萬的和尚以及數以百計的喇嘛廟；在古代埃及有着信奉安蒙^①的尼姑，在孟斐斯虔誠崇拜塞拉皮斯^②，她們的信條在羅馬帝國時期曾傳佈到希臘和意大利，雖然還找不出埃及境外的塞累匹斯教派隱居所的遺跡；在古代猶太人中，德拉倍太教派是禁欲主義者。雖然還沒有發現資料，可說明佛教和基督教間的实际接觸，我們知道，在第二世紀佛教向西傳入帕提亞，可能也傳入亞美尼亞。使徒時期的基督教灌輸無我、禁欲和自苦精神。獨身主義和童貞潔操曾由阿利振和息普立安^③兩人熱心提倡過。

所以，當東方宗教在羅馬帝國內繼續伸展勢力的時候，基督教是不可避免地要感受這些接觸的影響的。起初，寺院主義的理想和教規是和基督徒格格不入的。特圖良約在公元200年時著文抗議說，基督徒不是“擯棄世俗生活的婆羅門、赤腳仙^④、森林隱士”，那表明在教會內寺院主義的趨勢已經普遍存在了。在尼斯會議前好久，基督教禁欲主義者的團體在埃及已開始興起。據傳說，“高

① 安蒙(Ammon)——古代埃及的主神。——譯者

② 塞拉皮斯(Serapis)——古代埃及神。——譯者

③ 阿利振(185—254年)是早期教會中很有學問和創見的人；息普立安(200—258年)也是教會的神父之一，于258年殉道。——譯者

④ 相傳亞歷山大帝在印度遇見一個哲學派的信徒，他們裸體或半裸體游行，不肉食，專事冥想，他們被稱為“赤腳仙”。——譯者

僧”圣安多尼于251年曾帶領若干受狄西阿迫害的难民，逃往沙漠中去。索左門写道，在第四世紀，已有一本管理这些团体的規程書。无可置疑，基督教寺院制度是采自东方的异教信仰的。例如，“柱頂圣徒”^①与圣西緬·斯替来特斯之流，都是仿效那些在希拉波立^②庙中类似苦行僧的。

可是，教会的內在原因和条件所发生的影响，也許比起外在的暗示和接触还发生效力。寺院主义是以它的出世观念、它的忘我精神、它的严肃性来抗議那教会中已腐敗透頂的世俗性、財富和虛浮性的。“隱士是对宗教社会的一个活生生的批判。”在西欧第一个著名的异端，是西班牙的普立息力安，他屬於这一类型的一个清教徒。而且，那在后期羅馬帝国的緊張而虛伪的文明，造成了一种对新观念或新事物的渴望心理；而寺院制度就滿足了那种厭倦情緒，这种情緒正是縈繞着許多人的心头的。另有些人，对社会已覺得煩悶，对政治已覺得失望，对道德已覺得悲觀；對他們來說，退隱到沙漠中去是“一个絕望的出路”。教会在这热情浪潮里，看到了一个新手段使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生活理想化。現在，殉道是不再可能了；那种火燒般的熾熱情緒，固然曾在过去受苦的风潮时期激起早期信徒赴湯蹈火的决心，而現在却已逐漸冷淡了。

寺院制度起源于埃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埃及位于地中海角落，这一地位使它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間的接触地点。埃及的气候和地形又是最适合于寺院主义的生活的。在尼罗河流域，有着不很高的山岭，那里的无数自然洞穴，足供原始禁欲者以居住所。那干燥的气候和隱士自己的孤寂生活，使他不需很多衣服，而且他所需的微少生活資料，即枣子和黍稷，也是容易获得的。第一批

① 指棲身於柱頂上的苦行修道僧。——譯者

② 在小亞細亞古代大弗里家的一个城市。——譯者

象圣安东尼^①（約251—356年）和底比斯·保罗（約262—340年）那样的修道僧，当采取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不曾注意到别人也会去做这同样的事情的。但是，象这批人活得神圣和死得神圣的情况，那驅使成千累万人到沙漠去的宗教迫害，再加上瘋狂的热情，这一切使这运动大大地扩展，以致有人估計到第五世紀末期，埃及的隱士和修道僧，在数目上已几乎等于城市的人口了。

这批狂热者有时过着过度的自苦生活：他們由于把感觉和肉欲錯乱地混为一談，生活于污穢不洁的环境里，居住于蚤蝨毒蛇和昆虫之間，长夜不睡直至精神錯乱为止，吃那令人作嘔的食品，使自己半餓着，練習如癲如狂的柔軟操，象西緬·斯提里特斯所做的那样；这种状态已类似忧郁病甚至癲狂症了。从这些情况里，无可避免的会有一种組織形成起来，因而那沙漠中的隱士逐步成为修道院的修道僧。許多修道院是設立在旧庙宇或堡壘內的。图拉真在巴比倫（在后来的开罗附近）所建造的砲台，曾被派作这项用場的。差不多每一个沙漠中的綠洲都被占据着。在这些地方建造了防禦工程，以防止盜賊的侵襲；而在第六世紀，帝国政府曾利用它們来保卫边境，例如，賽那山上半宗教、半軍事的著名寺院，曾扼守那里的通路，以拦阻那来自北阿拉伯半島的侵犯。

在瓦倫斯統治时期（364—378年），寺院已正式备案，并获得了領有財產之权。这些寺院以龐大社会集团的地位，又以領受大量基金的法团地位，曾作出一种社会和經濟的改革；按当时的情况論，这改革是具有革命性的。在埃及这一运动达到了极端，但是，在东方的無論什么地方，在巴勒斯坦、叙利亞、小亚細亚、希腊、以及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島屿上，凡是寺院制度所傳布到的地方，都有着同样的效果。在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的时候，羅馬帝

^① 寺院制度的創始人，251年生于上埃及，隱居沙漠中修道，死于356年。按年代，和上文所引傳說中的“高僧”聖安東尼似乎不是同一个人。——譯者

国内有十五所寺院。在527年当查士丁尼登极的时候，有九十所寺院。到了第八世紀，各地村落变为人烟稀少，田野变为杂草丛生，荆棘满地，其原因是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离乡背井出家为僧去了。

巴錫尔高僧(329—379年)，一个有品格而能干的希腊人，曾在黑海附近的本都城，建造一所寺院。《巴錫尔規程》又規定了寺院範圍內外的生活細節；这規程后来曾以宗教會議和皇帝的許多决定，予以补充，并由查士丁尼把它們汇集編为帝国寺院的法規。“巴錫尔規程”遂成为东方修道僧团体的組織法了。

在埃及，有全城是完全由僧侶居住着的，象今天我們在西藏所看到的那樣。海洛尼馬斯在《天堂篇》里，曾描写奧科倫喀斯克城的情况，他說：

〔它〕这样地布滿着修道弟兄們的住所，以致那里的城垣几乎被冲破了；弟兄們竟这样多。而且，在城垣以外还有环繞着城垣的寺院，它們的数目竟多到这样地步，使人会想起它們形成了另一个城市，城里的聖殿和那里的庙宇，以及它們周圍的牆垣和空地，充滿着僧侶們。那也会令人想起，僧侶在人数上不致比城里的普通居民少得太多，因為他們的人数是这样多，甚至連城門口的房屋也被他們住滿了，有些僧侶还住在城門旁的堡壘內。据說，住在城內的僧侶人数，达到五千人，而住在城垣周圍的僧侶，也有五千人。那里主教曾声称；他有一万僧侶和两万童貞姑娘受他的管轄。

根据帕雷狄阿斯的記載，在提貝易德的塔貝那附近，約住着七千个修道弟兄們，而在可尊敬的帕科密阿斯^①住过的各寺院里，还住着一万三千个弟兄們；此外，还有其他寺院，其中每所寺院約有三百、二百或一百个僧侶住在一起；他們都是用双手来劳动并依靠劳动而生活的……在他們的服务周內，每天，有些僧侶起来后即去做他們的工作；有些人去做烹飪，另有些人去安排食桌，把面包、干酪、醋瓶和飲水瓶放到桌上。有些人，每周只吃一次。其中每个人是按照那給他的字条的指示去做工作的。有些人在“天堂”〔果园〕

① 埃及人，在公元340年在尼罗河的一个島上建立了第一所寺院。——譯者

里工作,有些人在花园里工作,有些人在鉄鋪里工作,有些人在面包房里工作,有些人在木匠間里工作,有些人在漂布場里工作,有些人把枝叶編成籃子和席子;有人是在編网,有人是在做草鞋,另有人是在抄写。这一切人,在做他們的工作的时候,都是依次背誦着讚美詩和聖經的。

帕雷狄阿斯遺留下来一篇文章,約写于390年,叙述尼特里亚山上的大寺院,在那里,除了几百个“世俗弟兄”以外,还住着五千个僧侶。这寺院在埃及領有几千畝冲积地的肥土。它出产大量谷物、橄欖、枣子、牲畜、羊、駱駝、馬、驢。从那里所得的一部分是用于維持埃及的教会,以及維持避难所、医院、学校等等。但是,它的大量剩余品,則是在亚历山大城市場上出售的,由于它的生产成本低和数量大,并在那里和大地主和小农进行激烈竞争。大地主还能苟延殘喘,而小农却慢慢地破产了。

这些新状况产生了新的弊病。財富开始象潮水般地涌入教会基金內,同时由此带来了各种腐蝕的影响,在第四世紀它們竟达到了破坏教会的神圣的地步。从宗教方面看,僧侶們是激烈的狂热者,从經濟方面看,他們已成为貪得无厭者。在第五世紀早期,亚历山大城曾被僧侶和游民群洗劫,这一事件对亚历山大城的貿易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那寺院数目激增的趨勢,加上了僧侶們的有些奢侈浪費作风,到第五世紀中期已成为政府惴惴不安的一个重大根源。人們紛紛进入寺院,以求規避納稅,以求逃脫軍役,或者要找尋一个安逸的生活方法,依靠虔誠而又慷慨的基督徒的贈与而生活着。他們把自己的亲戚朋友藏匿在那里。逃亡奴隶、逃走农夫,有时也有犯人逃到那里找到庇护所。有野心的和輕薄的修道僧,杂处在忠实的修道僧之間。僧侶的个人安貧乐道的宣誓不曾防止由僧侶团体来获得共同財產,因而奢侈风气和下賤行为潜入寺院之內了。那依照寺院“規程”的生活,已成为办不到的事情。451年在加尔西頓宗

教會議上，教會和帝國政府曾共同努力糾正這些混亂狀態，因而決定各寺院的基金須經主教的批准；各寺院須有適當的補助金，使它不致依賴捐款來維持；各種規程須嚴格實行；以及三年時期的修行學習——而這些規定，都會被住持視若具文。

寺院制度無可避免會擴展到西歐的。第四世紀中，基督徒已採用古代異教徒到聖地進香的習慣。“聖地”和埃及，先後就成為基督徒進香的地点，而這些朝聖者乃帶回了寺院制度的理想和習慣。寺院制度向西方擴展和兩個重要人物的名字是分不開的：聖杰羅姆和卡息亞那斯。聖杰羅姆在他的晚年時期，曾在伯利恆為自己建造了一所隱居所，並曾以他的著作來促進寺院制度的傳布。他是一個嚴肅的清教徒，是第一批起來反對教會的世俗性和財富者之一。卡息亞那斯在馬賽附近的南高盧曾建立兩所寺院，從那里運動遍傳于高盧全境並進入了西班牙。在第五世紀早期，那些在里維耶拉岸外的島嶼，尤其是雷朗島，已由修道僧們移殖。不久，多斯加納海群島上，也群集着修道僧們。米蘭·聖安布洛茲雖然從來不是一個修道僧，而他卻以頌揚靜寂生活的幸福，來大力地提倡這一新運動。393年，有一個名叫詹姆士的，“來自東方波斯的內地”——請注意東方的影響——在坎佩尼亞曾建立一所離世絕俗的退隱所。在同一年，諾拉的保林，一個富裕的羅馬業主，曾出售他的財產“逃避煩擾的世俗生活，來消磨他的晚年歲月”。另有一個東方隱士，退隱在奧汾涅的山区里。當時，都爾周圍的下羅亞爾河區域已成為西歐的提貝易德^①，因為那里有着大批修道僧的住所，他們在石灰岩上為自己所挖掘的洞穴，象在泥岸上的燕子窩那麼稠密。都爾的聖馬丁（316—396年）這個名字和這僧侶殖民地是永遠相聯系着的。聖馬丁寺院的修道僧們曾力圖訓練居民從事農業，

① 提貝易德，在埃及底比斯周圍的地方，為古代寺院制度的發源地。——譯者

并分发种子給他們。

在圣奥古斯丁时代,遁世者或隱士的生活在非洲省出現了,在那里僧侶人数增加得这样快,以致奥古斯丁(由于他的拉丁秉性,他厭惡这种无秩序状况)随即着手管理这项运动。在汪达尔人来的时候(429年),那里存在着很多寺院,常常位于大业主住所的附近。在那十年战争的时期,这些寺院都成为避难所,因为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汪达尔人虽屬阿利阿教派,但却是尊重这些会社而不曾加以扰害的。他們之所以有这种容忍态度,是因为各地的僧侶会社,在东方也好,在西方也好,都不是教士的团体,而是那些决心过寺院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俗人的团体。只要他們脫离世俗而对政治不进行干涉,他們在各阿利阿教王国是相安无事的。在教士生活和修道生活之間的这一区别是很重要的,應該記在心头,因为这区别一般人还不了解。

但是,西方寺院制度虽然是从东方輸入西方的,但在內容和实践方面,根本上却不同于东方的寺院制度。东方专心于怪誕奇特的苦修形式,而西方則是重实际的。东方僧侶过着一种孤寂的生活,致力于无效果的冥想或致力于无目的的閑蕩;他們中間除了一些有志于研究學問而抄写手稿的人以外,都依靠着虔誠而不适当的捐款来維持生活。相反的,拉丁西方的僧侶們在他們的思想 and 行动方面,是誠懇、清醒、活潑、勤苦,并依靠自己工作而生活的。西方人受不了象圣西緬·斯替来特斯或隱士那样的“柱頂圣徒”的行为:他們自愿流放于沼泽地上,讓昆虫刺伤,訓練他們的肉体受苦,他們或者在荆棘中禱告几天,或者弯腰曲背,繼續留在痛苦的位置上,或者大家一起在麻袋里坐几天;也受不了象圣安东尼的行为:他的皮肤“黑到象埃塞俄比亚人一样”积堆着皮垢,并以“蝎子和野兽作为他唯一的伴侶”。

从西方和拉丁寺院制度的健全状态和效能來說,我們看出罗

馬精神和希臘-東方精神之間的基本差別。前者是重視條理和實踐的，而後者是傾向於淡而无味的神學論辯、不容忍的態度、无聊的白天夢想，以及夸大和過度行為的。但是，寺院制度在西方開始的時候，就遇到一個嚴重的危險：東方影響可能占得上風。西方寺院制度依靠下列兩個偉人而擺脫了這個危險：卡息奧多拉和紐西亞的聖本尼迪克。526年時，當狄奧多理大帝逝世的時候，他的一個著名大臣，也是一個富裕地主即卡息奧多拉，退隱到在喀拉布里亞的斯基拉西地方他的莊園去，把他的莊園房屋改成為一所寺院，並集合了幾個虔誠信徒，他們在那里的花園里，讀書和研究，並間以溫和而有益健康的運動。為了管理這個小團體，卡息奧多拉曾起草一種簡明規程，這規程和以前其他類似團體，不管在東方或西方所制定的規則是有所不同的，特別在要求勞動方面。

另有一個比起卡息奧多拉年輕，而對拉丁寺院制度起着更大影響的同時代人，就是安布立亞城的紐西亞的聖本尼迪克。據傳說，他的生存時期是約從480到543年，但是可靠的說法，只是他生存在第五世紀後期和第六世紀早期的意大利而已。在他的傳記中，我們難於區別出什麼是故事，什麼是歷史。在那俯瞰坎佩尼亞風景秀麗的平原的突出的高地上建立的蒙特·卡竊諾寺院（520年？）是開始西方寺院制度第一次有組織運動的標志。蒙特·卡竊諾寺院曾成為意大利、高盧、日耳曼、英國和西班牙的幾百所寺院的母院，所有這些寺院都是受《本尼迪克規程》管理的。依據那傳留下來的版本，這項規程是一個法典。但是，從批判的理性來說，我們有理由可相信：這原始的規程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它通過實際經驗獲得了補充和發展；其中基本要素包括有“巴錫爾規程”，“卡西亞那斯的制度”，“阿爾茲的凱撒規程”以及愛爾蘭的偉大聖徒聖科蘭班的規定。凡是屬於寺院的職員，都是由住持來指派的。在有些盛產葡萄的寺院里，那看守酒窖的位置，是具有重

大意义的。按理論，住持个人只可支配着他所屬寺院收入的 1/3，应把剩余的进款，作为維持修道弟兄們的生活、发給服务工資、修建房屋、救济穷人等經費。但是，事实上住持只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負責罢了。

起初，本尼狄克制度是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約在 544 年时，本尼狄克的第一批信徒之一，格列高里·摩勒斯在罗亚尔河畔圣馬尔地方，建造了一所寺院。跟着偉人格列高里的接任教皇位(590—604 年)，情勢乃迅速改变了。本尼狄克制度在意大利发展得最快。到了第七世紀中期，本尼狄克規程已通行于高盧。788 年时，查理曼在法兰克帝国内各寺院强制施行这项規程。至于它傳入英国的日期，我們不能确定，虽然据傳說这和圣奧古斯丁在 596 年到英国去傳教事件是有关联的。在西班牙，直到第十世紀才被采納。

毫無疑問，格列高里一世的偉大人格对本尼狄克寺院制度的傳布是起着很大作用的。但是，我們也須注意其他因素，特別是經濟和社会性質的因素。在意大利，这运动正是在查士丁尼对哥特人进行可怕戰爭的同一时期。在法兰克高盧，它也是在第七世紀可怕的內战进行的同一时期。这些戰爭的破坏性影响：几千几万的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人，穷困、飢餓、疾病、不安全；这一切立刻产生了一个迫切的社会經濟需要，各种救济办法也是由此而来的。对难民和穷人，寺院遂成为救济所、寄宿所了。

本尼狄克制度因切合于时代的需要所以应运而生，当时其他寺院因不能办到这一点而失敗了。那理由很明显。本尼狄克制度不象东方和希腊僧侶所做的那样，也不象若干西方僧侶集团似乎要做的那样，要依靠信徒的捐贈来过着懶惰的生活。从一开始，它就強調懶惰是罪恶之母，并坚持劳动的責任和自食其力的尊严性。規程中包括着下列一段：

懶惰是靈魂的大敵。所以，僧侶應經常做事，或者做手工勞動或閱讀聖經。這些工作時間按照季節排列如下：從耶穌復活節到10月1日，僧侶應從第一小時起，去做工作，勞動到第四小時為止，從第四小時到第六小時的時間應用於讀經……[第九小時以後]僧侶應再工作，勞動到黃昏為止。但是，如果由於地方的情況或寺院的需要——這些事情會在收穫時期發生——要做較長時間的工作，他們不應認為受到不良待遇。因為真正僧侶，應以他們的手的勞動來生活，象使徒和神聖教父所做的那樣。

然而，應該仔細察看，不象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樣，聖本尼狄克規程沒有命令、也沒有強制手工勞動，但只推薦它而已。象十二世紀的評注家第次·魯拍特所指出的那樣：“勞動是容許的，或者是作為可以耐心考慮的意見提出的。”在同一世紀里，可尊敬的彼得，即克里尼的偉大住持，曾嘲笑僧侶需要用他們的手來做工這一觀念，他說要僧侶做手工勞動是“不合適而又不切實際的辦法”。

中世紀寺院制度為了規避安貧樂道的誓約，把龐大財產歸於集體所有。不管從道德方面對這種辦法給予怎樣的批判，無可置疑，中世紀歐洲由於大寺院田莊的管理適當而獲得了莫大的物質進步。農業是和早期日耳曼人的無定居的習慣相抵觸的，而且日耳曼人的耕種方法，在和寺院田莊的精細經營制度比較之下，是粗魯簡陋的。甚至貴族的大世襲領，也沒有管理得那麼好。有些中世紀寺院原有着伽圖、瓦魯科琉麥拉和帕雷狄阿斯等所著的農業書；後來，寺院也編寫了自己的農業指導和農業方法一類的書籍。大貴族地主也注意那些可使他們的土地開墾得更好的辦法。最後，在十三世紀，當有力穩定的政府對西歐的封建混亂狀況占得上風的時候，田莊管理手冊以及根據這些手冊所寫的農業論文，開始在英國、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流行了。有一個近代作家告訴我們說：

每一所本尼狄克寺院，基本上便是一個模範田莊；它保存了羅馬田莊的

外表,并依照习惯的方法进行农作。关于谷物和畜种的改良,我們不可能区别什么是由僧侶們所作的,什么是由羅馬人輸入高盧和不列顛的;但我們至少可以說,教会殖民地在原来耕种方法有被全部遺忘的危險的地方,把它保存下来了。

我們知道,寺院制度曾把关于农业、牧畜、种果等等的羅馬科学方法通过中世紀保留下来(对于这些方法日耳曼人原不熟悉,后来他們也是从教会学来的),但是,除此之外,寺院当扩展它們的土地的时候,还抽干了沼地,清除了森林,并且开垦了中世紀欧洲的大塊荒地。英国格拉斯吞柏立寺院的基地,原是一片茫无边际的沼泽地,經過好几百年它变为島上一个最富饒的农业区。东方諸州的“分兰区”^①原来全部都是沼泽地。当伊里大礼拜堂創立的时候,教会房屋是建造在寬广几哩的沼泽中的唯一的高地上的;因为那里盛产鰻魚(eel),所以該地就叫做伊里(Ely)。今天这块地已是青枝綠叶的田野了。可是,在一本古旧的《伊里志》中有一首短詩,指出在“諾曼人征服”之前,著名国王卡紐特是乘船到过伊里的:

“伊里僧侶快乐地唱着歌,
卡紐特王潑浆前进。
‘朋友們,划船向岸靠近,
听听我們僧侶的歌声’”。

在开垦荒地方面,寺院制度在中世紀比起任何別的力量有着更大的影响。僧侶們由于自动找寻离世絕俗的生活,乃深入森林的深处;而这些森林地逐渐被清除而变成为可耕种的田野。他們又因力求山区間交通迅速,在鞍形峯巔上通过隘口建造道路;他們还抽干沼地,建筑堤岸。一句話來說,寺院制度基本的經濟职能,在于农业和簡單工业以及在于殖民。在十二和十三世紀中,息斯脫西安教派^②的历史也是这样的。下面是給一个諾曼住持的通

① 分兰区(Fenland Country),意即沼泽地区。——譯者

② 1098年法国僧人罗柏特(Robert)在息斯脫西安創立的教派。——譯者

告：“你正在建造房屋的那个地点，是不适合僧侶們居住的，因为那里既缺少飲水，而森林又远在他处。这两个要素是为一个寺院生存的絕對必要条件。”

寺院中每天的日程如下：在参加早晨祈禱仪式后，僧侶們集合在牧师会所。住持給每一个人分配当天他应做劳动的数量和种类。其次，举行几次簡短的禱告，祈求他們工作上的賜福。于是弟兄們拿了工具，两人一排地前进，不声不响地走到田地去做所分配的工作。从耶穌复活节到10月初，他們从早晨六时起这样地做工作，有时做到十时；有时做到中午，工作時間的长短是取决于季节的。圣本尼狄克不能容忍东方寺院制度所实行的各种过度行为和狂热的严肃方式，他是一个头脑明晰的羅馬人，不贊成这种事情的。伙食虽然簡單但是丰厚。吃肉是有限制的，当然在一个地中海区国家里肉类不是很缺乏的。对于魚类、葡萄酒或奶油沒有限制。僧侶每天吃两頓飯，每頓他可有八盎司面包、一品脫葡萄酒、两盆蔬菜加上水果。僧侶的衣服用羊毛制成，来适应季节。当然，当寺院制度傳布到北欧国家的时候，有些食品的更动成为必要了。最显著的是，在有些气候上不可能生产葡萄的国家里，遂以啤酒来代替葡萄酒作为飲料。

象古代耕种方法由僧侶保存下来的那样，古代文明的各种工业也是由他們的作坊保存下来的；他們所保存的，在程度上比起世俗貴族庄园所保存的还大。僧侶在制造啤酒方面，虽不能說是有所发明，但至少可說是有所改进的。制造响鈴是寺院的一种特殊工业；其起源可追溯到凱尔特人。制造鉛管是寺院的另一种几乎专有的工业。埃塞尔烏德曾构造一根放水鉛管，把它埋在僧侶宿舍的地下。寺院也是最早使用泥灰石作为肥料的。

在墨洛温时代，教会和寺院土地上也許很少出产酿酒的葡萄。那繼續不断的战争使葡萄园受到了破坏。而且葡萄酒的贸易，象

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随处会碰到阻碍的。在“羅馬和平”不复有效之后，大貴族在他們的土地上开始征收私人性質的过路稅并从事勒索，这种情况在法兰克帝国的早期繼續存在着。他們在港口、渡头、桥梁——随便什么可能的地点——勒逼商人繳付捐稅，使貿易受到摧殘。但是，教会和寺院早已开始获得了免稅特权；这使它們在葡萄酒貿易方面取得巨大的便利，象它們在葡萄酒酿造方面所已享有的那样。大部分葡萄酒一般是在出产它的庄园里消費了的，可是，有些最好的葡萄酒（而最好的葡萄酒一向是从自寺院里来的）是在別处出售或甚至运到外国去的。波尔多、南特、盧昂、布倫周圍的各寺院和西班牙、爱尔兰和法里西亚进行着葡萄酒的貿易；在这全部时期里，英国人只知有法国的葡萄酒。葡萄酒在圣得尼斯市集上售給从全国各地来的商人，甚至从不列顛和法里西亚来的外国人。但是，那些长途跋涉、經營最名貴商品的商人，都是从教会和寺院里来的。在僧侶中間，禁欲主义甚至節約原則跟着財富和奢侈风气日益增长而已垮台；他們有着一种特殊商人，即“教会商人”，来替他們处理产品，来作为他們的商业代理人。其中有人为了这项貿易曾远到拜占廷和东方去；当时，在欧洲水陆沿綫的内部貿易方面，特别是在葡萄酒貿易方面，这种商人是占着重要地位的。現在我們有一項資料，可証明在墨洛温时代曾有大量勃艮第葡萄酒是由屬于吉美厄治、圣汪列尔和非坎普三所寺院的“商人”装运，沿塞納河下行，經過盧昂出海的。

然而，本尼狄克制度不是沒曾經过竞争而取得胜利的。在公元600到800年的两世紀中，爱尔兰寺院制度就是它的勁敌，而这一运动是有很重大意义和很大影响，所以我們必須在下面談一談。就爱尔兰的影响說，它的性質是奇异的，甚至可以說是獨特的；其原因大多是由于这民族的純粹凱尔特作风。在所有的西欧国家和民族中，只有爱尔兰从来不曾成为羅馬帝国的一部分，虽然羅馬人

从阿格利柯拉在維斯帕西安时代周航不列顛群島以后，已經知道爱尔兰。結果，爱尔兰人发展了一种脱离外来影响的文明和文化。古代凱尔特部落曾达到它的高度发展。每一部落各有着在它的酋长統治下的自己的領土；部落就是它的政治和社会集团。在烏尔斯特，有奥頓涅尔、奥尼尔、奥杜格尔多斯、奥汉隆斯各部落；在康諾得的有奥哈拉斯、奥克里斯和奥康諾各部落；在林斯德的有奥法勒尔和奥托尔斯两部落；在閔斯德的有奥德威尔斯、奥康尼尔各部落。这些領土原来都是小“王国”而后来变成为州县了。在这些地区，部落与部落曾进行着战争来夺取控制权；它們也曾組成部落联盟，来夺取对其他部落領土的控制权。全爱尔兰“国王”大体上是一个傀儡；而他拉是一个想象上的、感情上的首都，不是一个政治上的首都。早期爱尔兰有着一部精密法典，即著名的“布里昂法典”。当时，社会差別已很显著。私人財產主要在于牲口。土地是属于部落的共有財產，或者属于部落的一族的財產。农业未曾达到高度的发展，因为这地区是滿布着森林和沼地的；但是关于工业技术，象編籃、制革、制造金屬器，特別是制造金飾品这一类，爱尔兰人表現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水平。古代爱尔兰人的歌謠、故事和詩有着高度想象力，充滿着神話和幻想，注定要对中世紀文学发生一种深刻影响的。

“布里昂”是执行法律的法官的名称。詩人的地位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常常附着于酋长的宮廷，他又是一个哲学家、編年史家和修詞学家。事实上，詩人就是布里昂。詩人或布里昂是执行法律的。部落的世系、部族的历史、君王的大財產和浪漫史，都写成詩歌来背誦的。准备做一个詩人，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教育，并且需要一个專門化的教育。事实上，对一个兒童來說，获得所謂“文学的修养”意味着对他是很有好处的，是将来发达的机会。

尽管古代爱尔兰和大陆或羅馬帝国在政治上从沒有过联系，

但是在羅馬帝国的后期，它和它們在商业上联系的痕迹是可以找得出来的。在第四和第五世紀，羅馬商人似乎从高盧曾直接航行到爱尔兰島以及爱尔兰海面上的不列顛各港口。圣巴特里克曾乘那装运猎犬、陶器、貂皮、提籃开到波尔多去的一只船，从爱尔兰的俘囚里逃出。这项商业关系在羅馬帝国灭亡之后，还是存在着，而且，在蛮族王国时期，确曾更加活跃起来。在公元 600 年前时，圣科兰班也曾乘过一只上面所述类似的船渡过海峡到达布勒塔尼；当他被逐出法兰克王国而送至南特的时候，他在那里曾看到一只装着爱尔兰商品的船。圣菲力柏特是第七世紀的人，他在罗亚尔河口訥穆提尔島上曾建造一所寺院；他的傳記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一只爱尔兰船，“滿載各色各样的商品”怎样駛入了港口。

但是，还有一件比起这大陆和爱尔兰間的商业关系更重要的事情，即是基督教的傳入爱尔兰；这为爱尔兰的寺院移民和向国外傳教鋪平了道路。現已确切証明，基督教在第四世紀从不列顛傳入了爱尔兰。有一个羅馬傳說告訴我們，在国王里坎尔时代（429—458年？），教皇聞悉有基督徒在爱尔兰，乃派遣了帕雷狄阿斯到那里去（431年）。圣杰罗姆在高盧曾遇到过爱尔兰基督徒。图尔的第一位主教可能是出身于爱尔兰的。但是，帕雷狄阿斯的使命似乎是沒有成功的，也許因为他不懂得爱尔兰語。爱尔兰的真正基督教化，是从圣巴特里克开始的。他出生于不列顛西南部的一个羅馬化的不列顛族。他被爱尔兰海盜所捕获，在爱尔兰过了六年的俘囚生活（約 405—411 年），后来逃到高盧，在雷朗和奥舍耳讀書，而在 432 年时回到爱尔兰去。爱尔兰社会的部族性質立刻把它的烙印盖在爱尔兰寺院制度上。在一所寺院之內所有的同伴，往往都是血緣的亲族，外族人是不得參加的。正是这种部族性質可說明怎样并为什么在爱尔兰人中，寺院組織比起主教組織要强得多。整个部族都住在寺院里，这些寺院看来就是市鎮。

关于爱尔兰在第六及以后的几世紀中所出名的学术，不能归功于圣巴特里克。他缺少教育，他的拉丁文又是粗淺。在他的《懺悔录》里，他告訴我們，他不是一个人有学問的人。几百年以前，有一个抄写員，即从《亚尔馬志》中抄写他的《懺悔录》的人曾說过，他以前所抄写的部分，是从“圣徒”亲笔手稿中抄下的，但他覺得手稿很难讀，因为它又古旧又写得不好。如果这是确实的話，那末圣巴特里克看来不会把佛吉尔和西塞罗的学問傳入爱尔兰的。任何伴随巴特里克的高盧人或不列顛人，会把古典学术带入爱尔兰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在第六世紀末期，烏尔斯特的班哥和亚尔馬以及南爱尔兰的林斯馬尔，都是爱尔兰的最著名又最兴盛的寺院。那里的学术标准比起在偉人格列高里时代的羅馬城內的标准，或比起高盧的学院里的标准要高得多。这种学术是从第四世紀的学术无間断地发展而得来的。它怎样会傳入爱尔兰以及是誰把它傳入的，已是历史上的一个謎。但是我們几乎可以断言，我們完全不能設想古代爱尔兰的古典学术是由高盧的、或不列顛的傳教士带来或提倡的。問題的解决关键，似乎是約在公元 400 年时，也許由于 406 年汪达尔人大举入侵高盧的結果，有些高盧学者曾出亡到爱尔兰去。高盧的文法学家佛吉力阿·馬洛曾有若干著作流傳下来；他似乎曾是土魯斯学院中的一个屬于异端派的修詞学教师；他对爱尔兰的早期古典学术确是有影响的；可能他一度曾是逃亡到那里的一个难民。他生存在汪达尔人入侵和西哥特人征服南高盧的时代。

学术就是这样地傳入爱尔兰的——通过文人而不是通过傳教士的。圣巴特里克在他的《懺悔录》里曾說过，这些高盧文法学家，是“从高盧来的，他們是屬于异端派的修詞学教师，由于学术高超，自命不凡，以輕蔑嘲笑的态度对待着”不学无术的圣徒。这些高盧人一定多半是住在南爱尔兰和东爱尔兰的；換句話說，是住在閔斯

德和林斯德的；这两省由于它們面临大陆和不列顛的地位，毫無疑問，經常是爱尔兰的文明中心。这些难民正是来自一个羅馬化的凱尔特国家；也正是到了一个純粹的凱尔特国家。但是除了学者以外，似乎还有別种人从高盧逃亡到爱尔兰的。因为不久我們就可看到在爱尔兰酋长的支付俸给单上有着高盧僱兵。那带入了爱尔兰的新学术是屬於最好的学术傳統。正在大陆上古典学术开始消逝的时候，它被移植到爱尔兰去。在第六世紀末和第七世紀初，当爱尔兰僧侶傳教士开始涌入法兰克高盧和日耳曼的时候，僧侶的愚昧无知和教育的退化情况使他們感到驚訝。《科兰班傳記》中說，“在那个时候，由于主教的疏忽，国家里几乎不复有基督教的信仰了。”

都尔的格列高里所描繪的墨洛温朝僧侶的情景，是令人痛心的。有两个主教戴着軍帽，穿着甲冑，进行过战争，而在和平时期他們則是不折不扣的强盜。有一次宗教會議曾罢免他們，但是，他們“表演悔过的滑稽剧后”重新复位。法兰克僧侶恬不知耻地干着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勾当。他們利用“救济灵魂”这句话来勒索金錢或騙取土地贈与。因为河水不会上漲到比它的源流还高的水平，所以我們不能期待法兰克的人民大众会升到高出于僧侶的或甚至等于僧侶的水平。法兰克人是披着一襲基督教薄薄的外衣的异教徒。当特德柏特为反对哥特人和拜占廷人而侵入意大利的时候，他的士兵曾以妇孺的身体投入波河作为人体祭品，向倭丁神^①献媚。关于傳教工作，墨洛温朝教会从沒做过什么。在些耳德河彼岸，在下謬司河流域，在国王有些庄宅外不多几哩的地区，异教还占着最高地位。

爱尔兰人的冲动的本性，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热情，以及那使

① 星期三(Wednesday)，即是从倭丁神(Woden)命名的。——譯者

爱尔兰人足跡遍世界的愛好漂泊和冒險精神；這一切都使爱尔兰人象潮涌般地進入了蘇格蘭、英格蘭和高盧。《聖加爾奇跡錄》中正確地說，游歷是符合爱尔兰人的本性的。有一個法蘭克史家告訴我們說，從他的柳條編成的小袋，可在遠處認得出爱尔兰人來；因為法蘭克人所帶的服裝，是放在皮袋內的。

但是，爱尔兰人之所以向外遷徙，一部分是因為有著經濟社會因素所起的作用。爱尔兰人向來是一個繁殖力強的民族，我們有理由可認為，人口的壓力連同與此俱來的飢餓災難，也是一個因素。爱尔兰農業的落后狀態以及它的廣大森林區和沼地，使這情況更嚴重起來。聖科蘭班傳記的作者描述了在聖科蘭班兒童時期爱尔兰的和平狀態。可是，我們不得不認為，他是為了聖徒的目的，加以理想化了。到第八世紀，爱尔兰確然是在部族對部族的連綿戰爭狀態中，各部族力求剝奪對方的領土，或者如果辦不到這點，至少要趕走對方的牲口。爱尔兰基督教似乎不會遏阻這種好戰的傾向；相反的，爱尔兰僧侶們也參加了他們部族的軍事出征，甚至寺院和寺院也曾打起仗來。試看下面一段記載：

公元 768 年，克朗馬克諾厄寺院團和杜羅寺院團在阿卡莫因 地方進行了戰鬥，在那里頓尼爾的兒子德爾莫德·達夫以及杜羅寺院團的二百人同被殺死。麥卡德的兒子布勒塞爾和克朗馬克諾厄的寺院團贏得了勝利。

另有一段記載，在 816 年時，科倫西爾的“寺院團”曾被打敗，後來他們到他拉，“咒罵國王”。爱尔兰軍隊對別的王國內別的部族的寺院和僧侶們无情地進行洗劫和屠殺。克朗馬克諾厄、基爾得爾、克洛那德和阿尔馬各寺院都曾遭受過爱尔兰基督教部族軍隊的搶劫，在那里僧侶和他們的部族弟兄們并肩作戰。在第九世紀，閔斯德國君斐林，雖然是一個住持，也曾洗劫烏爾斯特的寺院，並殺死了它們的僧侶和教士們。

爱尔兰的僧侶，象东方的僧侶而不象西方的本尼狄克派那样，是傾向极端严格和严肃性的。爱尔兰寺院生活的特点，是对灵魂救济的热烈追求和內省方法，因而它成为傳布苦修和懺悔思想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他們的悔罪苦修制度，这制度通过英国教会傳入欧洲大陆，它和古代天主教會的制度大不相同，并对中世紀教會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于爱尔兰懺悔制度的形式也是这样的。格列高里一世完全不曾注意到凱尔特型的悔罪苦修的鍛鍊。无須用言語来指出那对中世紀早期那样的一个貪婪强暴的社会所发生的节制影响；因为这制度一定会发生了这样的影响的。教會对社会性的和刑事性的犯罪所征收的罰款和所加的处罰，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不仅对蛮族法典給予了补充；而且它們常常在压制和懲办犯罪方面有着更大效力。

爱尔兰圣徒的《傳記》，特别是圣科兰巴、圣科兰班和圣加尔的傳記，是屬於我們所可获得的最生动而最有价值的历史資料。其中第一人是在改变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信仰的人，其他两人是在大陆上的傳教士。圣科兰班的“規程”是从爱尔兰早期的僧侶制度流傳下来的唯一的爱尔兰寺院規則；它虽然不是在爱尔兰編写的，但无疑地是反映爱尔兰寺院傳統和习惯的。在第七世紀早期，爱尔兰寺院制度和本尼狄克寺院制度以竞争者的地位，在法兰克王国内相逢了。这个或那个寺院制度不久替代了或吸收了圣馬丁的古老高盧寺院制度。但是，須經過两百年时期之后，本尼狄克派才能替代或吸收爱尔兰的寺院。在这一时期中，爱尔兰僧侶在佛日山脉、在瑞士、在南日耳曼以及在北日耳曼建造了寺院。阿尔卑斯山上的大山峰由于它們的荒野和隔絕人世的地位，特別吸引了他們。如果說正是爱尔兰寺院首先把基督教和文明帶入了瑞士，那倒不是夸大其詞的。

《科兰班傳記》差不多可說明爱尔兰寺院在大陆上扩展时期的

每种特点和状况,为了这个原因,这里引述几段摘要。从下面一句话,可看出爱尔兰僧侣的热爱漂泊,其中也夹着傳教热忱。“他住在寺院好多年以后,向往到外地去,来服从上帝給亚伯拉罕的命令:‘走出你的国門,离开你的亲屬,离开你父亲的家,往我将給你指出的一塊地方去’……因此,集合了一群弟兄們以后,……他們乘船渡海,到布勒塔尼海岸去。”在法兰克王国,科兰班曾受到王后布綸喜德斯的欢迎。“在那个时候,有着一片广大荒野,叫做佛卡塞[佛日]其中有一座久已廢圯了的城堡,叫做安那格拉特[安尼格勒],”在那里就建造了一所寺院。这里是孤寂荒野,岩石重叠,在它的周圍森林中狼熊时常出沒着。这城堡原是一座羅馬的砲壘,在第四世紀建造,堵塞佛日山脉的山路,以防阿勒曼尼人的侵犯的,当时他們已渡过上萊茵河而蹂躪着亚尔薩斯。这地区的地主貴族,态度和藹,給这小小居留地以粮食和种子,直至那里能生长谷物为止。

由于僧侶人数的增加,科兰班去找寻另一地点,而在盧索維姆他找到了一塊地方。“这里有着大批石象豎立在森林中,它們在古时是受到可怖的仪式崇拜的。”但是,这地址不是一所古老的异教庙宇的地址,象傳記作者所設想的那样。不是这样,那里在古时有一所羅馬浴場,而这些“石象”不过是那些一度曾裝飾过浴場的破碎了的雕象。跟着羅馬文明的衰微,这地方已变成廢墟。盧賽威尔^①的起源就是这样。但是,这地区不久变为人口稠密了,因为大批移民流入,他們清除森林,开垦荒地并建立村落。他第三次去找寻一塊新的孤寂的地点,而在上摩塞耳河流域的丰坦那(丰坦)找到了,在那里有泉水涌出。在那里砍伐树木,开垦土地,播种谷物。弟兄們中有四个名字是列出的,很有趣味。三个是爱尔兰人,一个是苏格兰人。但是这地区的地主的名字是瓦尔德倫,这名

① 法国上梭恩州的一个市鎮。——譯者

字表明了他是屬阿勒曼尼族的日耳曼人。有人告訴我們說，僧侶們在手工劳动的时候，是戴着手套的。“这些手套，高盧人叫做‘Wanti’，”这是近代法文手套“gant”这一个字的来源；他們制造了啤酒，“啤酒是从蒸煮小麦或大麦所滴下来的汁液来制成的，除了爱尔兰人以外，所有的北欧部族都喜欢啤酒甚于其他飲料。”僧侶們也建立果园和葡萄园，还制造鞋子和鞍具。

在关于科兰班的小松鼠一段記載里，可看出爱尔兰人那种在他們周圍豢养小野兽的嗜好。爱尔兰寺院照例飼养着小鹿、土撥鼠和大鴉（他們偷东西的伎倆是很有趣的）以及小熊。圣加尔有一只小熊，它习惯于搬运他的木柴，并从他的手里吃东西。在一首日耳曼人中最古的詩即《熊的生活歌》（Ruodlieb）中，說及有会舞蹈的熊。这首詩虽是用拉丁文写的，但正确地反映出日耳曼人的风俗和习惯。瑞士人喜欢小熊的风气以及伯尔尼地方的著名熊井，无疑地是受到阿尔卑斯山区爱尔兰僧侶的影响而产生的。

最后，对寺院制度，我們將作怎样評价呢？这制度曾被热烈地拥护，也同样被猛烈地譴責，但是从几百年的长时期看来，寺院制度应予拥护呢？还是应得譴責呢？象一切人类制度一样，它决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常常是腐化的；既不是不可批評，也不是可以不屑一顧。无可怀疑，它尽管不符合我們的时代精神——虽然寺院制度在基督教世界里还有其地位——却是中世紀精神和状况的一个自然表現。如果只靠着容忍，或濫用权力或欺詐，它不会延續了这样久长的。它一定能够适应时代的若干方面需要的，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它不会只是通过單純的慣性或者純粹消极力量的影响，而能够持續下去的。从近代标准来判断，寺院制度的根源是自私自利的，因为僧侶的主要目的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用隔离世俗的方法来使自己的灵魂不受污染，用禁欲的方法来使自己的灵魂洗去渣滓。可是，寺院还发給救济品，給飢餓者以食物，給无衣者以衣

服,給孤獨者以安慰,給孤兒寡婦以保護,給旅舍和學校以維持費。是否可認為這一切事情都看作“功德”去做,要使施捨者可在天堂獲得光榮呢?還是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有着純粹的慈善心、真正的人道主義呢?

不管寺院制度的基本動機怎樣,很少人會否認僧侶在“黑暗時代”對社會的服務是具有重大價值的。

第六章 东羅馬帝国(395 - 802年)

查士丁尼(527 - 565年)*

在上面一章里，我們叙述并分析了古代文明的衰落。在西欧方面，羅馬国家的文明遺跡虽然在它崩潰以后还得留存下来，而且在和教会的及日耳曼人的制度相混合下，形成了新社会、新文明、新政治集团，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看，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在东方，羅馬帝国經過整个中世紀时期，繼續存在着，按傳統和政治制度，它是羅馬的，但按語言和文化則是希腊-东方的或希腊化的。皇帝的正式称号，用“Romaikos”^①一字来表明这一双重性。大批日耳曼侵犯者曾經過它的各省領土內，但沒曾定居在那里。东欧和西亚方面，沒曾感受到那个长期的晦暗状态，即象西欧所知道的那个倒退的状态。我們在东羅馬或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所看到的历史繼續性，是一个最动人的偉大历史事实。不是說，它的历史經過几世紀的悠长时期繼續停留在不动的或靜止的地位上。拜占廷帝国在几百年时期中，無論在內政和外交上，都是有着深刻变化的。但是，問題是政府和文明能胜利地控制着所有的反对勢力和革命，而无間断地“延續着”。拜占廷帝国对外来勢力的抵抗力或同化力以及它复原的力量是很大的。拜占廷是羅馬帝国在东地中海的一个延續。在这几世紀中，君士坦丁堡还是卓越的首都、国际的樞紐、东西交易的自然中心。尽管有战争和外敌的侵犯，它的商业关系未曾中断过。由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52 頁。

① 这个字意即羅馬皇帝，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合成的。——譯者

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轉運的利凡得產品，甚至在最混亂時期，仍然能達到西歐的市場上。哲學理論、藝術、文學和法律也跟著商人的足跡而來。由此可見，商業是舊世界和新世界間的、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間的紐帶，也是那些流傳下來的文明思想的轉運工具。

但是在這項活動里，對歐洲來說有威脅，也有利益。因為當歐洲文明陷於“大移動”劇痛裏的時候，古代東方文明以及那差不多早已被亞歷山大帝的征服所抹去了的古代文明的記憶在世界上重新抬起頭來，開始擺脫“希臘化”的桎梏。薩薩尼王朝統治下的波斯人、敘利亞人和埃及的科普特人復活了他們對民族傳統的回忆；東方象在亞歷山大帝以前一樣，又成為一個反對西方思想的文明舞台。第五和第六世紀的敘利亞人是歐洲商業上的霸主，他們在意大利、高盧和非洲的各大城市里所建立的殖民地，成為他們的特殊觀念日益向外擴展而且侵入西方的中心。在這時期，服裝、風俗、信仰、藝術紀念品、故事，即人類活動的各種形式，都蓋上了東方的印章。到第六世紀，東歐洲已屈從於來自東方的逐步侵犯，而它的後果是深刻的。在東方服裝的採用方面，在東方風俗的滲入方面，在以法律推行東方社會制度方面，在消除那些不曾順利地生根於埃及和敘利亞的羅馬-拜占廷制度方面，東方國家宣布了它們恪守不變的東方。在一千年時期中，君士坦丁堡是反對這項從東方興起來的潮浪的屏障。

現在，我們正在開始認識到，拜占廷帝國對西方文明所作的巨大貢獻，從查士丁尼時代到十字軍東征時止，關於一個司法行政的偉大制度，關於希臘文學，關於商業、工業和藝術，在君士坦丁堡遺風猶存。尤其是巴爾干山之南和維斯杜拉河之東的文明乃是君士坦丁堡的產兒。我們開始在擺脫着西方資料，即圖利的西方商人、有成見的西方教士、嫉視拜占廷文化的西方學者他們的著作上的

偏見。东羅馬的历史有它的雄强时代(即第八、九、十世紀及十一世紀的一部分)以及它的繁荣和力量,我們应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它。

問題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为什么作为拜占廷文化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当所有的其余世界受着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或阿拉伯人的蹂躪和侵扰的时候,还能保存文明并发展这样丰富的遗产?主要是因为它的沿海地位。君士坦丁堡靠着海生存,靠着海維持,最后也因为海而复亡。它的地位对于进攻退守两方面都是理想的。只要它的水师封鎖了博斯普魯斯和赫勒斯滂海峡后,它的三方面就成为不可迫近的地方,于是它可从容为那保护西北方的长城布防了。海面曾使君士坦丁堡成为牢不可破。而在进攻方面,海面給它向任何方面攻击的机会,向北也好,向东或向西也好。

但是我們应注意的,主要还不是海面对一个被圍的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而是君士坦丁堡的沿海地位对貿易上的影响。我們所以談及別的方面,只是因为下面的討論中,不要把这个城市的巨大工商业即它的財富所在,看成它的力量的唯一源泉。的确,除了我們必須予以相当重視的一个有利的攻守地位以外,还有其他因素,那就是在危急时期有出任艰巨的有才干的人以及皇帝在宗教制度中所占优越地位的重要性。象这个城市的軍事地位一样,这些因素是重要的。

那长城背后的权力,就是使帝国軍隊如此强大的权力、給这城市以軍餉和給以世界地位的权力,是从帝国的特別是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和工业的力量得来的。自从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的最有力量的和最輝煌的朝廷所在地后(这朝廷由于采取了东方的奢侈风尙,愈加輝煌),东方的商品和宝物集聚在它的城垣之內。从来不曾有过一个首都比君士坦丁堡占着更便利的地位,而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商业城市。君士坦丁堡不仅是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島屿的市場;而且利凡得是它的屬地;叙利亚和埃及繳納貢賦;它的商业

利益远布到中国 and 印度。那条在亚伯拉罕时代已有几百年之久的大商路是从亚洲而来越过波斯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原是以腓尼基人的太尔港为它的西方终点，而现在它是以君士坦丁堡为终点了。那位于三大大陆的十字路口的、红海商路顶端的亚历山大城也把奥马兹和印度的财富倒入了它的腰包里。东罗马帝国各城市人烟稠密。君士坦丁堡至少有五十万居民，甚至号称百万。它的收入预算证明它有数量庞大的资金。有人曾估计，帝国政府的收入在它的极盛时期，达到了现代法国货币三亿法郎，等于六千万美元。

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政府和一个社会组织得那么稳固或那么精密。“地方城市的进取心和主动性由于中央政府的全能性质而消沉下去；而且那中央集权化的教会制度引到同一的结果。各方面都向君士坦丁堡求得指示和保护。”社会组织被看作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里面每一个人有他的作用，即使不是同样重要的，也是同样必要的。各个公民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所提议的。国家对个人实行控制，指定他应站的地位，并尽力保持他站在这个地位。个人人格是不加考虑的；臣民只是在政府庞大机器里的一个齿轮罢了。个人由于必要和责任，甚至也由于宗教，不得不服从国家的管理。帝国的立法，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立法，都引到这同一的结果：把所有的社会活动集中于政府手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建立了各种机构，目的一旦实现后，则以不可更动的组织来保持这种情势。

这种制度是起源于政府的财政需要，在这一方面拜占廷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同于今天的那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后一种国家在它的活动里被看成是一个施惠的和开明的行政者。帝国为了获得必需资源来满足国库日益增加着的需要，为了祛除那由自由竞争所产生的生产和分配上的波动方程式，为了便利政

府的行政工作，把一个大民族所有的各种社会和經濟活动都縝密地管理起来。不幸，象柏立所說的那樣，“在古代社会的历史上任何方面，就現有的紀錄來說，再也沒有象它們的工业、它們的商业和它們的經濟使我們那么樣地如墜五里霧中。”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宮廷陰謀写了这样多，而关于它的文化和經濟却写了这样少，这正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第五世紀，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是一个劇烈的过渡时期，可是在西方，正当天平的一端向下傾斜的时候，在东方，天平的一端在一度急降以后，旋即上升了。

在狄奥多西大帝死后(395年)，帝国即告分裂，此后七十五年間，对东方各省說来是一个衰弱、腐敗和悲慘的时期。它們曾遭受西哥特人、匈奴人和东哥特人的蹂躪；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无能，政府的腐敗，对处理日耳曼移民政府未能守信，它那使乡村人口减少、使經濟破产的經濟政策以及它那依靠以蛮族制蛮族的办法。虛弱和腐敗是第五世紀大部分时期的特色。当时，政府不能擋住蛮族侵入的洪流，因而出現了象芬雷所描繪的那幅慘象。多瑙河南岸的农业和人口几乎都被消灭。色雷斯和馬其頓人烟稀少到这样地步，以致那里开始不用本地古代語言。一般人已很貧困，因而商业蕭条，甚至以前希腊富商的生活标准也相应降低了。在若干省內，上層階級已被肃清，因为在丧失奴隶和农奴后，他們就不得不放弃他們的土地，或者他們成为純粹务农者。由于普遍的貧困状态，城市也衰敗不堪。象公路和桥梁一类的国家財產，都是任其腐爛下去而已。

这些灾难固然很大，但在东方不象在西方那样地普遍流行着，从这里可看到东方帝国所以能有較大持久性的一个理由。特别是这些灾难的影响，不曾达到这样有力的地步，致使中等階級破产，并使大的階級形成起来。在第五世紀中，西方各省的工商业果然

已陷于破产,但地中海貿易还在希腊人手里,而从这项工商业以及从色雷斯矿业所集聚起来的財富,使皇帝常常能够賄賂蛮族,以求免除部分的侵犯。其次,在东方沒有象在西方那样存在着有势力的异教貴族来破坏政府。“在希腊人社会組織中,民間党派曾和基督教联盟,給社会灌注了那种挽救东方帝国的力量。”还有一个事实,也是有助于这项挽救工作的,就是在狄奥多西二世死后(450年)出现了两个主張改良的皇帝:一个是利奥一世(457—461年),他放弃了接受蛮族人参加军队的政策,并开始从帝国内招募刻苦耐劳的本地人当兵。另一个是阿那斯塔細亚(491—518年),他为了他的緩和的宗教政策,曾被宗教作家所歪曲;但是就他財政管理的成績來說,他是值得表揚的。他曾撤銷那对工业有破坏作用的金銀稅,減輕什一稅,并修改由市民团体負責收稅的麻煩制度^①。“在他的領土以內凡是遭受过敌人侵犯的城市,他常准予免除七年的全部稅款。”他曾拒絕“波斯王中之王”庫波德的訛詐,庫波德向他要求补偿那为反对“白匈奴人”保卫高加索山路而蒙受的損失;他声称,这项債務应由两个文明帝国共同負担,繼即发生战争,他虽然沒曾贏得光荣,但至少也沒曾带来恥辱。凡是要懂得历史和地理的人,必須注意这些山路,因为它们是属于历史上最著名的要冲一类。一条是达里厄尔山路或伊伯里安大門,通过高加索;另一条是德尔朋山路,位于高加索大山脉的东端,在山与海之間的狹路。在前一条路上,今天还可看到一个很古老堡壘的遺跡,据傳說这些堡壘是由大流士和亚历山大帝所建造起来的。阿那斯塔細亚的偉大建設工程,是那从瑪摩拉海到黑海五十多哩长的“长城”,这个城垣注定要在拜占廷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

当第五世紀过渡性时期的危險过了以后,帝国在查士丁尼

^① 从市民团体(curiae)負責征收城市稅制(The curial system)改变为由总督委派的稅吏(vindices)收稅制。——譯者

(527—565年)的长期統治下，重新获得了坚固立脚点。我們很可以把查士丁尼看作羅馬帝国的重建者；他对內曾規定帝国結構的性質，对外曾树立帝国边境政策的路綫；他曾賦予帝国以形式和精神，而帝国曾繼續保持着这种形式和精神，直到它在千年以后灭亡为止。

查士丁尼的政策是一个复兴帝国的偉大計劃，对外方面，它在西方采取了征服和扩展的策略，在东方采取了防守疆界的策略；对內方面，它采取了行政改革的措施以及对帝国各种資源采取行政奖励的措施。关于西方，我們已在叙述汪达尔、西哥特、特别是东哥特各王国的后期历史里講过。本章里我們將专講东方了。

东羅馬帝国是一个海洋性兼大陆性的国家。它包括有欧洲的巴尔干半島、亚洲的小亚細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及非洲的埃及和利比亚。它是一个橫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海上交通加上古代羅馬公路系統而成一整体。在这一切地区之內，帝国的政策是中央集权化政策，那就是要巩固它的行政制度，压制东方人民中民族的或宗教的地方分裂主义，并以鉄圈般的堡壘环绕边境，来防御欧洲的保加尔人^①和斯拉夫人，亚洲的波斯人。帝国的身軀和头部躺在欧洲，而它的四肢則伸展到小亚細亚和埃及。

埃及站在世界商业的十字路口。它位于紅海的頂端、东方和西方接触点上。它正是各大陆的大門，也是东方和西方的水陆交通綫的最密切連接的地点。境內有一条大河和規模宏大的港口，有平坦的原野和沙漠中的綠洲，足以招引游客商人来到那里。太尔的威廉論及中世紀埃及的时候曾說过，它是“两个世界的市場。”

到中世紀时期的开端，埃及已經受过五百年以上的羅馬帝国統治。在那里最重要的城市和港口是亚历山大城。在这时期中，埃

① 即保加利亚人。——譯者

及被波斯人征服(616年),不久被羅馬人重新占領(626年),最后被阿拉伯人长久占領着(642年)。阿拉伯人初以佛斯塔特为政治首都,而后来他們迁都于开罗。关于这些政治上的变革到时候再加論述。

从农业观点来看,埃及的地形有两个特征——那从尼罗河下游延伸到尼罗河上游的长约千哩的狭长条肥沃流域以及河口广大的三角洲冲积地。事实上,三角洲地带在早期曾向东西两方沿海伸展,虽然向西伸展还远得多。在整个中世紀里,从亚历山大城到施勒尼的整个地带是水利良好、土質肥沃、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地方。

这个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出产谷物,特别是在尼罗河流域。园圃蔬菜和园圃水果产量充足,所以园圃也列入拜占廷的和后来阿拉伯的地稅項目之内。上埃及的綠洲生产一些靛青,但它的价值不大。香膏树也許是从阿拉伯半島輸入的,在中世紀后期出产于下埃及的希力奧波力附近。尼罗河两岸及三角洲盛产着紙草蘆葦,而从它制造出来的紙張长久提供了埃及出口品中的一个重要項目。在中世紀的后期,三角洲上种植甘蔗,用以制糖,特别是在罗塞达和达米伊塔。糖是用牛拖的磨子来磨压甘蔗汁經過煎煮而制成的。埃及糖坚硬而透明,以整塊或碎粉的形式出售。在整个中世紀,麻布也是埃及的一項重要制品和出口物,但是关于亚麻的种植,我們所知的不多。牧畜是埃及农业經濟中的一个古老部門。馬匹出产于利比亚。息里內易卡是以它的优良馬种和专家騎师出名的。在寺院农場上可看到駱駝群和猪群;无疑地这是埃及农业的一項特征。

米倫在論述埃及在帝国統治的时期所发生的情况时采取了悲觀的看法。他說,根据稀少的記載可看出定額地租似乎增加得很多,而比例地租則依然不动,甚至下降着。他从閱讀所得的“一些

不很詳尽的資料”作出了“关于埃及在羅馬人統治的最后一世紀的一般情况的判断”；他所得的印象是一个“絕望的貧困”的印象。現有很多事实足資証明寺院团和教会是当时大地产所有者。帝国賦稅的負担越来越重地压在埃及身上。查士丁尼进行征服意大利和非洲的时候，曾千方百計地用各种賦稅的形式来吸取埃及的富源。虽然农业劳动者和租种农民一定受过苦，但埃及仍然是出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

埃及的出产富饒，使它对君士坦丁堡每年能輸出二十六万夸脫^① 谷物。610年时，当弗卡斯听到了埃及反叛的时候，他就捕拿停泊在港內的亚历山大城运粮船的大船队。亚历山大城曾运送大量麦子到阿拉伯半島，“未曾影响它每年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数量。”615年，由于尼罗河未泛濫而出現的严重情况（向来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埃及全境发生了毁灭性的飢荒。教会的两只船从西西里装运粮食到亚历山大城进行救济。在同一年，我們也看到記載說，“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約翰在波斯人侵犯之后，为了重建耶路撒冷的教会曾捐獻一千头騾子、一千袋谷物、一千条咸魚、一千瓶酒、一千磅鉄和一千个工人。”据說，他也曾派人护送去“大量黄金、谷物、衣服等等”。

亚历山大城在羅馬帝国的极盛时期曾是埃及的京都。就文化和工业來說，世界上所出产的最好东西都輻輳于此。貿易象流水般地通过这个欣欣向荣的大城市。游历家曾把拜占廷帝国統治下的亚历山大城称做“忙城”。那里，沒有一个閑着无事的。那里制造玻璃和紙，織造精致的麻布。这最后一項职业遍布埃及全境，除了农业以外，再也沒其他职业象那样普通的；但前两項职业大多限于亚历山大城内。其他职业也差不多，在各城市村庄里流行着

① 一夸脫，(quarter)，在美国等于二十五磅，在英国等于二十八磅。——譯者

那作为羅馬世界特征的行会制度。其中列出的有銅匠、烘面包工、啤酒商、油商各行会。作为帕諾波立斯的寺院所存在的工业而被提及的,除了直接有关农业的以外,有金匠、烘面包、木工、浆洗布匹、編籃、硝皮、制鞋和裁縫各种行业。在阿拉伯征服时期中所經營的工业中,有陶瓷制造、金飾制造、金屬上涂彩色和象牙雕刻各行业。在奧科倫喀斯存在的行会中,有养蜂者行会;而在同一市鎮里,我們看到了一份关于售蛋章程,由此可見飼养家禽技术在古代埃及还是重要的。

在整个中世紀,埃及的麻布織造业占着一个重要地位,而在那个时期,麻布始終还是地中海世界所爱好的东西。三角洲市鎮的織工,甚至上尼罗河村落的織工,是以制造紡織品出名的;不仅麻布,而且絲綢以及金綫綉品都聞名于西方和东方。有些市鎮,由于制造为特殊場合穿用的稀有而又昂貴的服装而获得盛名。行会制度和严密的組織,使經驗的交換和新式样的迅速傳布成为可能了。

另一值得提出来談一談的埃及地方工业是造船业。亚历山大港和克列斯馬都是坚固的海軍港。亚历山大港是拜占廷舰队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它的一个主要船塢。看来不是不可能的,阿拉伯人的征服“和下一事实的認識相联系:只在拥有一个舰队条件下才能长久保持新获得的領土,例如叙利亚沿海市鎮”。阿拉伯人曾繼續使用埃及作为一个海軍基地。

捕魚是个相当大的埃及地方工业,而咸魚是一种出口品。亚历山大运河的出海海道是“經常开放着的,不仅对那些从大海来的商船,而且对天天带着船貨到市場来的漁船”。据說,波斯人曾乔装着碼頭工人乘着漁船而潜入亚历山大城的。

无论如何,埃及决不可称为一个矿业国家,可是它也出产了几种至少值得指出的矿物。那画家和硝皮匠所常用的明矾,出产于上埃及和努比亚,而亚历山大城成为它的巨大集中港口。天然碱

或硝石十分重要，因而曾有一塊地方以它命名。上埃及有綠寶石矿，从古代起那里开发出綠寶石和綠柱玉，直到 1359 年时才被最后开尽。在埃及还可找到紅寶石，但在品質方面它們次于从錫兰运来的貨色。

在一切工业和技术方面，本地科普特人即古代埃及人的后裔似乎曾是那維持着埃及标准的阶層。做这工作的是他們，組織行会的也是他們。拜占廷人似乎一向曾占有着一个侨寓的、做官的上層地位，橫加在埃及社会之上。他們大部分在阿拉伯征服的时候就往他处去了。波斯人未曾长久居住在埃及，因而他們所发生的影响只是临时性的。

亚历山大城想必是一个很大而又很繁华的城市。它的美丽街道、它的灯光、它的公共大廈、豪华浴場以及很多其他景色，使到来的阿拉伯人不禁眉飞色舞，称羨不止。在三角洲上，还有其他几个城市，虽不太聞名，但却有很大重要性。达米伊塔和罗塞达位于尼罗河的不同出口处，是两个熱鬧的、兴旺的城市。有一个最著名的制造业市鎮，就是那位于滿剌拉特湖中一个島上的廷尼斯；它在第六世紀变为一片大洼地，当时海水突破堤岸，淹沒了三角洲上一个美丽的、最肥沃的部分，把許多小村落、大量农場、园圃和果园的土地完全毀了。廷尼斯到中世紀后期还是以紡織业出名，就它織品的精致來說，只有达米伊塔和沙塔的出品堪与倫比；而在十一世紀还以制造刀业馳名。沿尼罗河上行的路綫上有塞易斯、希力奥波力和底比斯，它們对商业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性。珀琉細安(科普特称之为珀勒摩)位于东面的苏伊士的狭长地峡上，是从东方进入埃及的鎖鑰。它距海約一哩半，近尼罗河的珀琉細安港湾，并有一个海港。阿斯旺、阿敦里斯、貝倫涅斯、阿达布及其他地方都位于辽远的南方，是上尼罗河和紅海沿岸穿越沙漠的各商路的必經之地。

从上文所說的看来，埃及商业显然有着两种类型——一起迄点都在埃及境内的商业和以埃及作为媒介或通路的商业。埃及的大宗自然貿易是谷物貿易，它是一种国内貿易，供应三角洲上大城市的粮食；也是一种国外貿易，運輸貢物給羅馬、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城市，并通过貿易商行供应許多地中海沿岸港口的粮食。亚历山大城和拜占廷帝国内其他城市一样，由于发放公粮的弊病而蒙受痛苦；当查士丁尼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总督霍比斯特斯为了增加帝国的貢賦停止发粮的时候，它已达到每年二百万斛的数量。进口貨中除了木柴、鉄及其他低級金屬和琥珀以外，只有很少是从西方来的。亚历山大城及其他城市的特点在于它們的貿易大多是出口貿易。在进口貿易方面，埃及人对通过他們境内的許多东方物品征收了通行稅。从古代起，生絲就是从东方輸入以供廷尼斯、达米伊塔及其他市鎮的織工所用的原料。

查士丁尼为了使亚历山大城对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不受街上每次民众暴动中暴民的劫掠和破坏的危險，曾以坚固的墙壁为亚历山大城腓利碼頭附近的谷倉設防。而且，因为船只常常停留在达达尼尔海口一个月等待順风，他在那里曾建造倉庫，以便需要船只另运谷物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船只就可立刻卸貨回到埃及去。

埃及的教会早已获得大量土地贈与，而在这个时候差不多把眼前任何別的东西都紧抓在手里。

教会有着自己的商船队。据說，其中有一只船載运着二万斛的谷物，途遇暴风，离开航路，远漂至不列顛，那里正在发生着严重飢荒。这只船載錫而返，后来，它的船长在彭坦波里斯售出了錫。另有一次，我們听到由三只船組成的船队，每只船載运着一万斛谷物，在亚得里亚海中它們遭到颶风，丧失了全部船貨。它們都是屬於教会的，除了谷物以外，还載运着白銀、細薄紗及其他貴重物品。教会曾参加那項亚历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間的大量谷

物貿易也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由查士丁尼縝密地改組了的貿易①。

埃及成为东方貿易通路的重要性,与其說是开始于羅馬时代,不如說是开始于查士丁尼时代以及在科斯洛厄茲統治下的新波斯帝国崛起的时代。到了第六世紀,地中海沿岸居民对远东奢侈品所形成的嗜好远甚于羅馬时代所流行的风尚。波斯所垂涎的正是这项龐大而又繁盛商业的控制权;而波斯处在这样支配的地位,不管那項商业是經過亚洲陆路而来的,或經過波斯湾和紅海水路而来的。拜占廷和波斯間的长期爭执基本上是貿易战争,其中絲綢貿易是它們爭夺的主要对象。

有一个波斯故事中說,第一只蚕蛾是从約伯的疔疮里出現的。但确然无疑,絲織工业是起源于中国的,也許在公元前 1000 年以前已在那里进行着。最古的中国史籍說,絲織甚至在那时已是一种古旧技术。这工业差不多带着一种神圣工业的性質。几百年中,它局限于华北各省,并为了朝廷的利益而被壟断着;凡是图謀洩露生絲制造的秘密或輸出蚕子的行为都为政府所严禁。只有制成品容許越过边境。中国人运絲綢到土耳其斯坦和印度的市場;从那里它沿着早在公元前 150 年前已熟悉的商路即“絲路”②到达地中海。亚理士多德是希腊作家中第一个提及蚕蛾的人。从亚历山大帝时代起,东方商人把絲織品輸入了欧洲。但是,在古代世界里它一向是珍貴的商品。当凱撒穿着絲服出現于戏院里的时候,他被認為是显示了聞所未聞的豪华;在提庇留时代以前,貴妇是不穿絲綢的。早期帝国也曾禁止过男人穿着絲綢服装。甚至在第三世紀,

① 蒲脫勒:《羅馬統治下的埃及》,第 49—50 頁。

② “‘絲地’(Land of The Seres)是西方人指称中国的一个最早的名称。‘Ssu’讀作‘Sz’是中国的名称,而蒙古人把絲称作‘Ser’,显然后一名称跟着这产品而进入了希腊和羅馬”。——苏特喜尔:《中国和西方》,第 8 頁。

絲綢的價格按分量是等於黃金的。

在運輸絲綢方面，中國商隊從來沒曾越過土耳其斯坦的西方邊境，雖然有些中國人的帆船曾行駛到錫蘭以西。從中國商人所達到的地點，各種商人繼續着絲綢的運輸工作。但是，不管絲綢從陸路或水路運來的，波斯人總是首先獲得它；他們疑忌地防范，使絲綢不致經過別人的手而只經過他們的手轉運到東羅馬帝國去。在陸地上以及在海面上，波斯人是東方貿易的主人翁。邊疆上的有些城市曾被特別指定為兩國間的絲綢貿易站，而且兩國稅局就設在那里，來征收它們所課的關稅。那些開始於第五世紀而後由查士丁尼重行制定的嚴刑峻法，以罰款和沒收財產的方法懲辦任何詐欺或走私行為。這些城市是：幼發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克斯、美索不達米亞羅馬邊境上的尼士比以及亞美尼亞的阿塔克薩塔。這樣一來，波斯人得維持陸上絲綢貿易的完全壟斷。他們在海上的地位几乎是同樣堅強的。他們的艦隊巡邏着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他們是印度的貼近鄰人，和印度王公維持着友好關係。有大批波斯商人在印度和錫蘭經商。在那里，他們享有免稅權以及很多特權，並建立了範圍大、勢力強的居留地。所以在查士丁尼時代，君士坦丁堡几乎是完全依靠着波斯來獲得那已成為它所必需的絲綢供應。按照羅馬經濟的突出壟斷性和集權化組織，在一個商業團體監督之下，一切進口絲綢都被收購。在這種絲中，有的已經是制成品，很多還是在原料的狀態，用以供給太爾和貝魯特的帝國製造工場。在這些城市里，也有一種經營重織和攙用中國絲綢的大規模貿易。

當 528 年波斯戰爭切斷了橫過大陸的絲綢貿易的時候，查士丁尼曾企圖同阿比西尼亞國王阿克蘇謨（530—531 年）締結同盟，來發展那紅海和印度間的商路。但是，希臘和阿比西尼亞商人發現：波斯人在錫蘭市場上由於享有特權，勢力已這樣牢固，以致他

們的地位已成为不可进攻了。而且，波斯舰队的巡邏阻撓着他們在阿拉伯海上航行的船舶。532年的和約，使情勢回复到旧有的基础之上。540年时，第二次波斯战争爆发了。东方商路的切断，又一次使工业陷入严重困难状态里。帝国政府曾用規定絲的最高关稅率方法来解决这困难，这项努力获得了应有的效果。私人制造者因无力支付那購買生絲所必須的价格，乃按法定价格出售。这法律是針對他們而实施的，而管理政府工厂的拉基塞斯伯爵却可以不予理睬。太尔和貝魯特两城的繁荣景象消逝了；它們的織絲工人不是餓斃便是逃到波斯帝国去，帮助敌人經營絲业。絲价飞漲到这样的程度，一磅紫色絲的售价在四千美元以上。在走投无路的状态下，皇帝查士丁尼在533年同意贈給波斯人一万一千磅黄金，名义上作为波斯人保护高加索山路来防止“白匈奴”侵犯所付的酬劳——那是以前阿那斯塔細亚所拒絕支付的——但是，实际上作为恢复絲綢貿易对波斯人所付的代价。此后边境上的商站又重新开放了。

但是和查士丁尼一样，波斯科斯洛厄茲大帝怀抱着帝国主义的和征服的野心；540年在哥特战争中，波斯人曾蹂躪叙利亚、占领安提阿、渡过上幼发拉底河，而进迫亚美尼亚，也就是进入小亚細亚的大門。542年时，貝利撒留从意大利被召回来，收复了失地，于是和約再度签订。然而，波斯人不遵守所規定的稅率，尽量征課絲綢貿易所可負擔的稅款，甚至还超过这个范围。君士坦丁堡遭到了尖銳的危机。私人工場关門，而政府工場是在亏本經營着。

在这个关头，中亚細亚的事变部分地拯救了查士丁尼。关于从中国到波斯的絲綢运输方面，索格狄亚那的商人原是最重要的中間商。但是在第六世紀，一个广大而疆域不明的突厥帝国开始在中亚細亚形成起来，并扩展它的势力于索格狄亚那。波斯因为害怕那和索格狄亚那的通商关系会被卷入和突厥人的战争，所以

停止了這項貿易，寧願經由海路從錫蘭和印度方面，來獲得它所需要的一切絲綢。結果是查士丁尼以前和阿比西尼亞人所沒能辦到的事情——繞過那波斯人所控制的東方商路——現在他和索格狄亞那商人可以辦到了。於是，第一世紀中羅馬和帕提亞〔安息〕的歷史重演了。那條古代商路，即從巴克特里亞下行阿姆河到達咸海，從那里繞過下里海越里海地峽到達黑海這條商路，重新開放。另有一條商路，也是上行阿拉克賽河，越亞美尼亞到達特勒比遵德，即希臘人所稱的特拉比左斯(Trapezos，所以這樣稱呼它，因為這個城的腳下的岩層，形狀奇突)，這是“屬於魔城一類的城，位於拉咸斯坦鋸齒狀山脊和突出的峭角之間，在這峭角頂上據傳說有‘萬人’紮營過”。在查士丁尼的最後一年(565年)，波斯人的控制就這樣地遭受了側面的攻擊。從這個時候起直到阿拉伯人在西亞崛起時止，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頭上時常可看到索格狄亞那商人和突厥商人。

我們可以用最後一件事來結束關於絲綢貿易的故事。552年時，歐洲倣倖找到了一種方法，至少可以部分地擺脫對中國絲綢的依賴性，也同樣地擺脫了波斯的殘暴行為。因為在那一年，有兩個曾在東亞住過的景教僧侶，把蠶蛾子放在竹杖內偷運到歐洲來了。又經過多年的辛勤工作，希臘的絲業建立起來了；在希臘，桑樹似乎長得很盛；但是西方絲業的開端，卻在於這一事件。到了十字軍東征時期，絲綢製造業已遍傳於希臘、南部意大利和里維耶拉意大利^①以及西西里了。

現在，我們必須轉到討論東羅馬帝國的內部情況：它的工業、查士丁尼的行政政策和徵稅制。在第六世紀的開端，東羅馬帝國的工業機構包括着在政府管理下的一大批排他性的貿易的和工業的

^① 里維耶拉意大利(Riviera Italy)，指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風景區。——譯者

团体。这些团体起初为了它們成員的經濟利益而自愿結合起来，后来发展成为国家的工具，按照它的利益，来管理工商业了；轉變的过程，历时在百年以上才告完成。早在第四世紀初期，国家已使一个团体中的成員資格成为世襲的和强制性的。拜占廷帝国的經濟組織，是一个最高度社会主义的組織；但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組織，因为它的管理方法是受統治者的和他政府的利益所支配，而基本上不是受社会的利益所支配的。工业是一項屬於国家範圍內的事务。

除了团体成員在私人地位上須付的賦稅以及他們工业上附带的捐稅以外，有些团体还須履行若干种有关政府职能的义务。那些大的即“批发”的团体，应監視某些稅款的征集，监督巨大公共工程的建造以及从埃及运输食粮的供应。这些負担，叫做“非常公役”。那些小的团体負担着“微賤公役”：包括繳付地方捐稅、看守桥梁、公路等等。若干种需要技巧或技术經驗的职业，如染师、制車匠、珠宝匠等等，享有着免除“公役”的权利。但是，他們的团体也是受政府管制的。最后，可举出一个团体組織的极端例子，甚至在公路上和桥梁上工作的奴隶們也是屬於奴隶“公会”的。

除了管理工商业团体的事务以外，政府还直接經營着若干种事业。其中最著名的是捕骨螺或螺壳业、軍械局以及国家織造工場。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业品都是从这国家工場（扩展到帝国的各港口）里制造出来的。

第五和第六世紀东羅馬帝国内的主要工业是制造絲織品、有光泽的陶器、用于鑲嵌細工的彩色石和十字架。最后一种是一項主要工业，所用的材料是黄金、白銀、宝石、褐炭和象牙。刻花是这工业的附带部門。叙利亚是以它的彩色玻璃、精制織物和綉品出名的。

帝国政府所經營的規模較大的专利事业是：矿場、采石場、盐

井、造币厂以及制造武器、軍事配备和兵士服装的各工厂。有一时期，政府曾企图壟断絲織品的制造，但是由于不能滿足政府的需要，私人工厂重新准予設立。政府的補助和壟断性的控制，在一个时期內有着鼓励工业的效果；突厥大使曾參觀查士丁尼国家工場，曾对机軸上的产品表示惊异。但是，查士丁尼的壟断政策也有着危險的效果，即迫使他的数以千計的最好絲織工人往他的商业敌人即波斯人那里去了。在他的沿海通行稅站上和边境城市里，他設置了那些叫做“商务專員”的官吏，他們的責任就是在私商有机会收購之前，以低价来收購全部絲綢。他也曾制定严格的度量衡制、沿海港口章程，并曾建立一种港口征稅制度；这种稅率后由他的后继者規定为 10%。奈斯波拉斯对那些住在赫勒斯滂海峡彼岸的商人所購的家庭奴隶，每人征收两个諾密斯麦塔^①的附加稅。采石場原来是依照契約出包于私人的，但是，由于条件的过分苛刻，承包人变为无利可图；因此，它們后来由政府收回經營。所有的其他工业都是私营的，但也受着国家的严格管理。国家对每一种工业都加以課稅，而且硬要一切职业，除学术性的职业以外，負担公役或个人劳务。政府的工业管理，因为各种职业都已組成为行会而变为容易办理了。

至于农业，它是按照由羅馬帝国傳下来的大农場制度組織起来的。农奴制广泛流行着，而农奴的状况是苦不堪言的。除了在山区以外，实际上再也沒有自由农，只有屬於租戶阶層的农民；他們的状况也不見得稍优于农奴的状况。在边境省区内，还有成千累万的隶农即边境农民，論身分和状况他们接近农奴，但他們負担的捐稅較輕。

埃及仍然构成帝国的大谷倉，每年供給君士坦丁堡食糧五百

① 諾密斯麦塔(nomismata)是拜占廷帝国的一种貨幣名称。——譯者

五十万摩底^①。这项供应当然是由政府缜密管理着的。大量食粮的供应还来自附近的色雷斯、小亚细亚和黑海地区。主要食粮是小麦、咸肉、鱼类、干酪、火腿、酒和蔬菜。大贵族地主阶层(“有势力”的人)继续着罗马的特权传统;他们不顾法律的规定,靠着牺牲无保障的小土地所有者和穷苦农民来扩大自己的地产。“地主不住领地制度”发生了各种弊端,一任土地上的劳工常常遭受管事或管家的虐待。这些“有势力”的人拥有武装的仆从,他们又富又强暴,在他们的地方上也是政府的大患;当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可发动一次革命。

那些构成国家收入基础的赋税是土地税、“金银税”(这是加在商品上的苛税,曾由阿那斯塔细亚取消,而后由查士丁尼恢复的)、人头税、房屋税、商业团体税、海关和港口税以及市场捐。除此以外,政府还征取旧罗马的“义务服役”以及那用以供应首都粮食并配备与维持军队的各种捐税。这些税款的征收,大多出自富裕市民阶层和大商业团体的。但是,因为这个阶层越来越穷,他们的责任也就成为空谈。收入最丰富的税是土地税,但是由于大土地业主的势力,土地税的负担大多落在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了。

戴克里先所采用的财政制度,已把那寺院土地上的农奴制扩展成为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制度。两百年以后阿那斯塔细亚以强制那些住在一块土地上满三十年的自由农永远不得离开他们土地的命令,创造了一个新的农奴阶级。拜占廷立法的目的,经常是要保证固定状态以不变为度。就这一场合来说,法律的目的是要防止弃田数目的增加。查士丁尼对农村财产无情地课以残酷的土地税,叫做“联保地税”(epibole),依此规定,附近业主当附近土地被它的所有者遗弃的时候,或所有者无力付税的时候,应

① 見第 2 頁譯注③。

負付稅的責任。在疫癘流行的時候，當城市中的幾條街的房屋和鄉村中很多的田莊變為無租戶或無主人的時候，這種徵稅方法造成了混亂局面。從理論上說，這項附近業主連帶負責制應對富人和窮人同樣地實施的。但是實際上，富人能夠拖延繳納，甚至逃避這項法律的實施，因為他們往往是宮廷或政府的官吏，無論如何有著崇高的社會地位和朝廷的勢力。這樣，這項義務就沉重地壓在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了，而政府對於他們的不滿，原是沒有什麼害怕的。

真正的問題是，從道德方面和技術方面來說，拜占廷的整個財政制度是不對的。正象柏立說過：

對近代學者來說，必要記牢兩個事實：它們在熟悉近代國家土地問題的人們所不可想象的一種形式下，有力地影響着那項發展……這立法是完全以財政的考慮為基礎的；而法律的直接目的，是要儘量減少國家方面的麻煩，來充實國庫：使國庫充實而不使帝國富裕的淺見政策；羅馬法上很不完備的信貸制度，即那阻礙了投資而使土地成為幾乎唯一投機對象的制度，在土地問題上，如上文所說，在一種特殊方式下……起着反作用①……

沒有疑問，查士丁尼時代的賦稅是很重的。他使國家財力枯竭的長期戰爭，他國內的龐大建設，他朝廷上的豪華風尚，消耗了千千萬萬的進款。而且賦稅的負擔由於強征勒索以及由於上上下下幾乎每個官吏的貪污腐敗行為而加重起來。查士丁尼不是一個守財奴；他的貪婪是為了鋪張浪費的。因此，在斂錢方面他是很少選擇手段的。他的官吏搜刮愈多，他的進款也會愈多；而且他還要留些不義之財在他們的腰包里。所以，我們可看到：卡帕多細亞·約翰或彼得·巴塞姆斯在主持一個龐大的蠻橫賦稅制度的時候，曾用酷刑敲詐勒索，迫付稅款，同時他們賣官鬻爵，做小麥投機勾當，甚至剋扣軍餉，以求獲得更大的收入。在各省內，我們也看到：約

① 柏立版，吉本，第5卷，第533頁。

翰·茲波斯在亚美尼亚曾实施商业壟断，他以低价購进一切商品，而后以高价强制居民买回它們。那綽号叫做“厚顎畜生”的約翰，曾使費拉得尔菲亚地方人財两空。这些例子并不是个別的。在新征服各省內，民众都是在賦稅負担和压迫之下呻吟着。无疑的，在查士丁尼的政府中也有良好忠实的人。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須获得金錢。查士丁尼的破坏性的帝国内政政策使外族易于侵入，远远地抵消了他为抵抗他們所作軍事努力的效果。阿那斯塔細亚的統治时期曾是一个帝国内部的复兴时期。他曾取消对工业有破坏作用的賦稅即“金銀稅”，并取消“市民团体征收城市稅制度”。但查士丁尼竟使新的征稅制度比起旧制度来成为还要巨大的勒索工具。为着首都和軍隊而征收的糧食稅比以前多了十倍。那人為的貨物缺少和高物价是由商业上的苛捐杂稅所造成的，而壟断制度的建立又使工业破产。政府已成为一个极端专制的和中央集权化的政府了。在查士丁尼統治的初期，市政机构还是有力量的。希腊城市在公共建設和学校方面还有地方自豪心理。但是他后来破坏了所有的这种地方自治权，剝夺了自由城市的收入和自由权，还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那占重要地位的希腊族的民族精神，因此，他把帝国的一个屏障撤除了。

“很难說，究竟是統治階級間对一切經濟和道德法則的藐視，还是中下層階級的无可救藥的愚昧无知状态，构成拜占廷帝国使人更可痛心的景象。”我們看到，帝国政府濫征各种賦稅和關稅，征取糧食来維持軍隊和首都，并强制運輸它們，以及发給專利執照（甚至面包）；到处是橫征暴斂景象。听任士兵領不到餉銀而变为毫无紀律，村庄变为人去樓空，而田野不毛；边境砲壘无人防守，蛮族因而侵襲帝国。于是，帝国就不得不用巨金来收买他們（以及波斯人）。地震曾使几个整个城市必須重新建造，包括安提阿在內。542年的疫癘又使帝国陷于瘫痪。558年时疫癘又出現了。当时，

查士丁尼不用削減朝廷的奢侈費用，而用削減軍事撫卹金和谷物補助費來節約經費。最后他还采用了貨幣貶值的办法。在他統治的末期，國內混亂、譁變、焚掠事件，層出不窮。帝國已陷于垂危狀態了。

查士丁尼時代所建造的大廈（其中聖索非亞大教堂迄今還是令人驚嘆的紀念品）、石子路、港口工程、燈塔、息德那斯河兩岸防止塔蘇斯水災的堤壩、達達尼爾海峽和亞歷山大港口的設防倉庫和小麥棧房、為着招待到耶路撒冷去的過路香客而設的半旅館半醫院性質的“公家接待所”，這一切建設，就事情的本身論，儘管是善良的，但曾消耗巨額金錢和千百萬人的強制勞動，所以，就建造它們所付的代價來說，則是得不償失的。象法王路易十四那樣，查士丁尼曾消耗精力於“好大喜功”的欲念，並為了追求“光榮”，他犧牲了不可計算的鮮血和資財。有一個拜占廷的學者認為：“他統治的主要缺點，在於財政管理上的腐敗。”

由於查士丁尼的不健康的財政政策和他的浪費行為，帝國從來沒能夠產生充分財源以滿足他的欲壑。如果沒曾有巴爾干半島山中的豐富銀礦以及亞美尼亞的金礦，他的政府也許已經垮台，象西班牙政府在十七世紀當秘魯和波多西礦業開始失敗的時候所遭的命運那樣。

在 565 年查士丁尼逝世後，帝國面臨着一個持續多年的危機。566 年時查士丁尼二世的一項詔令宣稱：“朕見國庫空虛，軍隊如此混亂，以致國家處在蠻族的不斷侵犯和侮辱的危險中。”然而，他由於沉迷於帝國主義的觀念，對帝國的慘淡景象視而不見；及至破產和垂危狀態迫近的時候，則以禪位了之。“分離的要素開始以全副力量起着作用；矯揉造作的制度已在垮台；現在帝國開始迅速而又明顯地變質了。”在一般分崩離析的狀態下，“不公平狀態在首都和在各省內到處存在：富人為他們的財產而惶恐，窮人為他

們的生命而担心；普通长官都是无知或貪污的；偶然的糾正办法，看来都是蛮橫而兇暴的，民众的不平之鳴不复能以一个立法家和一个征服者的动听名义平息下去了。”

正在这危急时期，由于受到亚洲突厥部落的压力，也許还由于受到巴尔干半島上肥沃土地的引誘，斯拉夫人进入帝国来找殖民地，象过去日耳曼人由于同样的形势所迫而进入帝国那样。

第四和第五世紀的蛮族侵入曾破坏黑海北岸希腊殖民地，但到了第六世紀，那早期游牧部族的地位已由斯拉夫族，即維尼德人、斯克拉維尼斯人和安特人所接替了。他們的原住地似乎曾是喀尔巴阡山和波罗的海之間的地区，但是他們逐漸散布于俄罗斯平原，最后南下尤克辛海和希腊殖民地相接触，因而和君士坦丁堡相接触；而君士坦丁堡的文明对俄罗斯曾在各方面发生过有力的影响。

关于斯拉夫族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定居于多瑙河南岸，这一問題还没有定論。斯洛文人的确在阿提拉时代之前，可能早在300年已开始渗入到那里。他們一定會参加过第三世紀的边境扰乱，而且由加理略所安插在米西亚和色雷斯居住的卡皮人，可能就是斯拉夫人。現有明确的資料可証明：斯拉夫人在第四世紀中是以隶农的地位居住于半島上的；在第五和第六世紀中有些羅馬軍官是斯拉夫人。在哥特人移入意大利之后，东方各省荒地上有斯拉夫隶农居住着。从这些事实我們发现一个和日耳曼人渗入西方帝国完全相类的事件。所有进入巴尔干半島上的少数日耳曼部落，都已轉移到西方去。斯拉夫人定居下来。因此，西欧洲成为日耳曼化，而东欧洲成为斯拉夫化了。

562年时，阿佛尔人对羅馬領土举行他們的第一次侵襲。斯拉夫人尽管好战，而却是寻求住所者，可是阿佛尔人，象他們的近族匈奴人一样是單純的掠夺者。不久，斯拉夫人和阿佛尔人的侵襲

变为越来越多,越来越狠;所以奥曼写道:在570和600年之間不是“夸大其詞地說……老的人口几乎消灭殆尽了”(在巴尔干山之北),而在馬其頓和色雷斯則大大地削減了。这样,拉丁語的省民几乎全被消灭,除了住在达尔馬提亚群島和山岭要塞中的,从那里他們后来出現为瓦雷契亚人。577年时,至少有十万斯拉夫人曾涌进色雷斯和伊梨里根省內,从那一时期起斯拉夫人可以認為是在巴尔干半島的人口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了。

皇帝摩里士(582—602年)曾拚命地抵抗那联合的敌人。他曾保住多瑙河畔的堡壘,但是在堡壘后面,只是“疏散地住着斯拉夫人的一片荒野而已”。羅馬居民向北移住,沒曾达到巴尔干山之外。然而,通商大路还是保卫着的。到了摩里士的統治末期,斯拉夫人已經定居在整个馬其頓和帖撒罗尼迦的周圍。至于他們在这样早的时期是否已到达希腊,这一問題还是有爭論的。柏立說現有一些資料可証明他們是到达的。

在这混乱局面里,皇帝摩里士是一个悲慘的而又是一个英勇的人物。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將領,战略論的作者,又聪明又有效能的行政长官。因为認識到絲业对拜占廷的重要性和突厥人支持的不稳固性,他努力和波斯取得妥協,因而給科斯洛厄茲二世援助,来干涉巴勒姆的叛乱。

但正是由于这位皇帝的聪明,就有了敌人。摩里士知道斯拉夫人和阿佛尔人的侵入威胁着帝国本身的完整,所以曾限制拉溫那总督軍队的餉銀,因而触怒了偉人格列高里;对后者來說,阿佛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入巴尔干半島,在和倫巴人侵入意大利相比之下,是一件无所謂的事情。此外,摩里士也曾遭受希腊教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禁止了寺院接受新的成員,而加入寺院原已成为一个逃避軍役的好方法。这种逃避行动已成为一項公开的弊端。在每一次发出召集新兵命令的时候,大批“逃避者”就涌到教会里,要

求接受寺院生活,往往出資来購買这项特权。的确,那些不顧廉恥的住持們竟做着这样性質的好生意。摩里士在財政上和軍事上的百般苛求,在国家危急的时期原是必要而又有理由的,可是,这种措施使他失掉民心,終于使他被篡位者弗卡斯(602—610年)所推翻;后者的統治是集放縱、殘暴和奢侈之大成。当非洲总督之子希拉克略把这僭主最后推翻的时候——因为在君士坦丁堡沒有一個人曾敢反对这僭主——他把所获得的不义之財尽沉入赫勒斯滂海峡,留下了一个空虛的国庫和一条血路。

希拉克略的統治(610—641年)标志巴尔干半島斯拉夫化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前进步驟。在他登极的时候,如上文所說,斯洛文人已定居在卡尼鄂拉,并在伊犁里根、色雷斯、馬其頓、米西亚,可能也在希腊,有着很多居留地。正在那个时候,他采取一个对半島前途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步驟了。希拉克略曾号召塞尔維人和克罗特人从喀尔巴阡山区移到达尔馬提亚和伊犁里根来。他們被給予的土地,也許就是由旧有的羅馬人和希腊居民所曾經放弃的土地,不过柏立認為正是在这时期,本地居民逃往达尔馬提亚海岸去建立了新的市鎮(拉古薩、加他罗、斯帕拉托等等)。

这些新部族,在德拉夫撒夫区的斯洛文人和半島上別地区的斯洛文人之間,插入了一把楔子。克罗特人散布在下班諾尼亚、伊犁里根,并向东达到德里納河岸;換句話說,散布在克罗地亚以及在部分波斯尼亚、黑塞哥維那和达尔馬提亚。塞尔維人占据了这三个地区的其余部分,就是“老塞尔維亚”(即諾威巴薩州)、北部馬其頓以及在亚得里亚海沿岸,那曾包括門的内哥罗在內的一个地区。这些人便是所謂“沿海塞尔維人”。

这些新斯拉夫集团只是松懈地从屬拜占廷帝国而已,它們从开始时起,就在自己政府之下保持着大量的地方独立性。所有的斯拉夫侵入者,在他們的进入时期是在低文明的阶段,但是他們有着

不可磨滅的愛好獨立和憎恨權力的情緒，因而他們沒有國王，但卻有部落酋長，叫做“統領”(zupans)。在危險的時期，各統領在會議上推選一個“大統領”——那是國王的萌芽。斯拉夫人組成公社，有着公有財產。公社首長是從主要家族中選出來的；他們形成了一個貴族階層。斯拉夫人是從事農業的部族，變成為“固着於土地，那倒不是由於農奴制，而是由於種田者和業主間的情感上的聯繫”。

另一個闖入巴爾干區的外族是保加利亞人，他們在678年勝利地建立了保加利亞王國。保加爾人〔保加利亞人〕是屬烏格羅-賓尼克族。他們是從伏爾加河和頓河沿岸“老保加利亞”來的。到今天在喀山附近我們還可看到保加利亞人古都的遺址，即巨大而不成形的泥邱；這些泥邱現在是比任何俄羅斯公侯國還古老的王國的唯一紀念物；王國興盛於第六和第七世紀，還在保加利亞部族侵入多瑙河流域使拜占廷皇帝寢饋不安之前的時候^①。

在希拉克略統治時期，保加利亞人叛離了阿佛爾人，把阿佛爾人從他們在老達謝所占的地區逐出；而後渡過多瑙河，征服了米西亞的“斯拉夫七部落”，並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君士坦丁四世同他們簽訂條約，把多瑙河和巴爾干山之間的領土讓給他們，並為了保全色雷斯向他們納貢。在那裡，微賤的斯拉夫人被降到一種類似農奴的地位，而斯拉夫貴族得准予參加政府。這兩個民族立即開始了血統的混雜，結果成為文化史上一個奇特的事實。那突厥系的保加爾人在語言和文化方面，在不滿兩百年時期，已完全斯拉夫化了，所以在今天保加利亞人，實際上（除了名義上和血統上稍微混雜以外）象任何其他巴爾干民族一樣，就可認為是斯拉夫人。至於保加爾人的語言，一點兒遺跡也沒留傳下來。這一事實可說明斯拉夫種族具有那令人驚異的同化力。

^①布賴斯：前引書。

然而，保加尔人比起斯拉夫人拥有一种优越性。他们有着一种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所得来的力量。他们的汗是一个绝对的专制国王，而以严格的东方仪式和人民隔离着的；他又是一支训练精良的军队主帅。这可说明他们为什么建立了一个强盛的王国并拥有伟大威力。直到中世纪后期，在纯粹斯拉夫人的国家中，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在疆土大小和力量方面堪与伦比的。

关于各部族移入巴尔干半岛的过程，还有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希腊的斯拉夫殖民地化问题。关于这项侵入和占领的范围，在历史家中曾有过讨论。有的人主张，在摩利亚和中部希腊的希腊人曾完全被根除，而近代的希腊人只是拜占廷化的斯拉夫人。这一理论是根据第九世纪君士坦丁合法继承人的说法的：希腊全国已变成斯拉夫人的和蛮族的世界了。芬雷说过，在希拉克略时代，斯拉夫人曾深入伯罗奔尼撒，不久遂占领它的大部地区，但那些设防的市镇还是留在希腊人手里。柏立认为到第七世纪中期，希腊的乡村部分已经斯拉夫人化了，而各市镇依然是完全希腊化的。他还以为斯拉夫和希腊人一定曾经混合过，因为我们没有听说过什么冲突。在第八世纪，一个出生于希腊的斯拉夫人曾担任君士坦丁堡的教长。

现在，我们讲到了第八世纪的开端时期，正是巴尔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仅从帝国的观点来观察，它是标志着拜占廷帝国异于罗马帝国的开始时期，而且从巴尔干地区部族移动的观点——本节讨论的特殊观点——来考虑，它也是标志着蛮族侵入和移入巴尔干区的终止时期。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帝国在四个世纪被蛮族侵犯之后，在欧洲方面的状况。它的实权，北以巴尔干山为限，西以斯特鲁马河为限，而帝国在希腊的势力是很不稳固的。名义上它在欧洲的统治权还伸展到旧有的疆界，除了保加利亚王国以外；但是实际上，它

在馬其頓、伊犁里根、达尔馬提亚和希腊的斯拉夫附庸国都是独立的。尽管希拉克略有很大才干，但他的統治时期却看到了这些領土的丧失。吉本說过，在希拉克略以后，“羅馬的名称已縮減到君士坦丁堡孤零零的城郊了。”甚至在第六世紀，拉丁的知識也越来越少了。400年时，約有1/4的省民說着拉丁語；620年时，不到1/10了。柏立說，到第八世紀的开始，“羅馬法，象拉丁語一样，在帝国内不复有人懂得了，帝国正在变为完全希腊化，当时它已經失掉叙利亚、非洲以及希馬斯半島^①上的北方各省”。

利奧三世所頒布的希腊文“法典”，使我們能够估价所发生过的一些經濟变革。隶农制已不可复見了。再也沒有人被束縛于土地；但他們不是自由租戶，便是屬於有着公有土地的自由公社的居民。农奴制已經消逝，因为它是和斯拉夫人的风俗不相容的，也因为老的隶农阶層已被扫除。斯拉夫人不象日耳曼人那样，没有什么符合于农奴制的东西，因而原在这里易于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沒有能建成。

第二个重要轉变是关于力量的比重，保加利亚王国扩展到一个可畏的程度，对斯拉夫人如此，对希腊人亦然。这一民族的人口至多不会超过三万至五万人，包括男人、女人、孩子在內。正是由于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他們才能統治着他們的斯拉夫邻人的，而从人种來說，他們自己是在被斯拉夫人吸收着。因为他們提供了政治統一的原則，所以“保加尔人的移入保證了半島上斯拉夫人的优势”。在整个第八世紀中，皇帝和保加利亚人进行战争，因而在第九世紀初期以前保加利亚人不能推进到巴尔干山以南。

保加利亚跟着它的基督教化，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商业发展了。它成为亚洲的很多产物和君士坦丁堡的制成品轉运到日

^① 就是巴尔干半島。——譯者

耳曼和北欧去的一个媒介。早在716年时，它和帝国已签订一项条约，规定保加利亚边境上所征关税的数额，这项条约在后来每一次战争结束时都曾予以续订。802年时，由于破坏这项条约的规定，帝国和保加利亚立刻发生了战争，而这一战争是在帝国对保加利亚所进行的战争中损害最大的一次。

其时，当帝国丧失巴尔干半岛上全部腹地和希腊的大量领土于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时候，它在亚洲和埃及所丧失的领土同样巨大，而且有更多令人惊异的景象。608年时，波斯人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蹂躏了亚美尼亚、卡帕多细亚和加拉太。619年时埃及陷落于波斯人手里。查士丁尼的并由他后继者奉行的严格正宗信仰，使帝国内各种基督教派都曾蒙受迫害；因而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对波斯人的进展，遂以纵容或至少漠不关心的态度来报复。为了理解这种基督徒同非基督徒敌人的合作必须注意，象上文所述的，这些东方民族已以敌对拜占廷统治的新的民族精神而骚动起来；拜占廷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是一个外人的压迫，在经济上是一个外人的剥削。他们自己的基督教特殊形式，原是表述他们民族独立愿望的工具。帝国统一和正宗信仰是携手并进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和异端教派合在一起的。“芝诺所颁布的策略性的‘统一诏令’^①为东方的统一铺平了道路；而查士丁尼的政策妨碍了和解，产生了分裂；那使波斯人以及后来萨拉森人的侵入变为轻而易举了。”

奇怪的是，君士坦丁堡居然还有力量度过这些重重的难关。拯救它的活力一定是从它的商船队得来的。城市的制造业还是继续着。它同西欧洲还有着稳步增长的商业关系。埃及西部是在很繁荣的状态中，里比亚出产大量麦、稻和枣椰。希腊人因为他们独霸

^① 芝诺是东罗马皇帝(474—491年)，曾颁布“统一诏令”(Henotikon)，以期终止宗教上一性论的争执。——译者

海上,能控制对地中海(或尤克辛海)任何部分的聯絡綫,在那里可能有着貿易,或可能获得必要的供应品。因此,大海和船舶挽救了这个偉大城市。610年时,推翻弗卡斯的力量,来自帝国中唯一的未曾呻吟于虐政和外患下的部分。商人阶層对希拉克略的出征可能是負着大部分责任的。后来,正是由于控制海上,他对波斯的出征成为可能。

希拉克略在击退帝国敌人和克复叙利亚和埃及方面,是获得成功的,但以鮮血和金錢以及領土的破坏付出了无量的代价。他之所以能够出征波斯,大多是因为教会給予了一笔借款,当时,教会已認識到这项危險,因而曾提供金銀器皿和宝物給皇帝。还采用了节约办法,例如取消谷物补助金。于是在紧张局面过去后,帝国安定下来,筋疲力竭,徐图恢复元气。一到有能力的时候,希拉克略要把教会的債款归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曾征收极其繁重的賦稅。当时,各省已經遭难,而国库空无所有。希拉克略愚不可及地曾对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論教会征取貢賦,为的要归偿希腊教会給他墊付的款項。同时他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进行了迫害,因为他們被控告是波斯人的秘密同盟——也許是真的。

希拉克略不曾亲見那在阿拉伯半島上空形成的穆罕默德教侵入的战云。那些还很少知道阿拉伯人名字的、也不害怕它們的各部族,不到五十年就匍伏在“信徒統帥”之前的塵埃中了。

波斯据它的內部情况而言,不見得比拜占廷好些。波斯国王从来没有力量能够消灭那里有勢力的帕提亞封建貴族;政府是殘暴的,它的征稅和查士丁尼的征稅一样地苛重,一样地恶劣;祆教僧侶靠着特权的保护,橫行不法地对待着那住在庙宇地产上的不自由階級;对于經常发生的地方居民的反叛,以极度殘暴的手段,以古代亚述人全部驅逐被征服者出境的方法来懲罰。象在下一章內所看到的那樣,穆罕默德教对埃及、叙利亚和波斯的征服,是一

件又快又容易的事情。

在第七世紀的末期，拜占廷帝國的情況已頻于無政府狀態了。從 694 到 716 年的二十二年之間，皇帝更換了六次。薩拉森人在亞洲已征服敘利亞、巴勒斯坦、亞美尼亞、喬治亞和卡帕多細亞；在非洲，已征服埃及、里比亞、的黎波里以及迦太基總督區；在巴爾干半島上，一個強大的保加利亞王國已建立於色雷斯和米西亞兩個舊省中；斯洛文人、塞爾維人及其他斯洛文部族已滿布於半島上的西部，從瓦爾達耳河和摩拉瓦河直到亞得里亞海岸；希臘的希臘化文化已逐漸被消滅，或者被外來的斯拉夫人同化了。帝國的真正權力已局限於君士坦丁堡，在它背後的亞得里雅那堡平原，薩羅尼加一類的港口以及小亞細亞、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在這最後兩個地方內，從巴爾干和伯羅奔尼撒來的成千成萬的難民以及從敘利亞、埃及、的黎波里和迦太基來的成千成萬的其他難民找到了庇護所。在這些土地上，從希臘和東方來的移民變為這樣地稠密，以致本地的文化和制度也改變了。

其次，象在百年前一樣，海權是使拜占廷帝國免于滅亡的起死回生的因素。海權保存了那政治統一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它保持了商業上的活動。可是，如果 717 年的革命不曾帶來一個能阻止無政府狀態的皇帝，帝國也許要早好多年慢慢地死去了。這位皇帝就是利奧，俗稱伊索立安（717—741 年）。他是一個主張改革的最偉大統治者和行政天才，是一個拜占廷帝國或任何別的帝國可引以自豪的人物。

實際上利奧是一個康瑪其尼的敘利亞人，不是伊索立亞的本地人。他系出帝國“邊防區”內一個耐勞的山區部族；這些邊境省區幾百年來原是帝國邊境上對波斯的防禦屏障。好久以前，最賢明的皇帝早已看到這些勇敢而自由的部族的價值，按照一種封建保有權，曾把他們分駐於沿東疆的世襲的、不可分割的、免稅的軍事

采邑上。在东方,那最后熄灭的异教是在小亚細亚的山岭地区內,在那里,由于以弗所的約翰即“异教徒中的使徒”的傳教活动,异教在查士丁尼时代終于被剷除了;約翰还在那里建立了九十九所教会和十二所寺院。利奧是一个名将,也是一个政治家。在他的統治的第一年,他就击退了穆罕默德教軍隊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三次大圍攻,而他的改組海軍还遏阻了在未来百年中穆罕默德教的海权成长,这样一来,帝国的統治和帝国的商业得以保持不墜。作为一个有力的立法家来看,利奧仅次于查士丁尼本人,而在公平和聰明方面則远胜于他。

利奧三世,在把混乱了一代的帝国复兴起来的时候,認為須有立法来适应当时变更了的情况。帝国各省內的外国人居留地——斯拉夫人的和瑪戴特人的——产生了一个土地問題,对这一問題他用他的“土地法典”来处理。斯拉夫人的和薩拉森的海盗行为的增長,使海上貿易需有更大的安全保障,对这方面他用“航行法典”来处理……对一般生活上的关系,他也用完全新的方式来制訂法律①。

我們可依下列各項来討論这位大改革家的工作:

(1)“法典”②,即民法和刑法的改革,反映出新穎而深刻的社会思想。

(2)土地改革和土地問題。

(3)商业改革——“罗得島航海法典”。

(4)教会改革特別是寺院改革③。

“法典”是在740年时頒布的,“可以称做一本基督教法律書。它是以应用基督教的原則来改变帝国法律体系的一項認真的企

① 柏立版本,吉本,第5卷,第525頁。

② “法典”(Ecloga)是利奧三世所公布的法典,也称“伊索立安法”(Isaurian Laws)。——譯者

③ 为了闡明其中很多困难而錯綜的問題,我將擅自使用引語,大多引自柏立教授版本的吉本所附的精辟注釋。

图。”罗马法由于它的刚性和无伸缩性,由于它的异教传统,已变为过时了,已不复适应于改变了的社会状况和帝国内新人民的需要了。所以,利奥三世企图以更动那些管理私产、结婚和离婚、监护人制、未成年人的权利、遗产等等的法律条文,来消除旧法律规定和新情况之间的矛盾。一般讲来,这些法律条文是宽大而又合乎人情的,举一例说,在婚姻关系上,承认夫妇共有财产权。

至于刑法上所作的改变,同样是不平凡的,可是恐有许多不妥之处。毁损身体第一次采用作为刑罚的一种方式,这办法在罗马法里是没有的。这种刑罚可能是受着巴尔干部族的著名残酷行为的影响的。另一方面,“法典”取消了那按照等级和财产的差别而量刑的恶习,从而对社会上一切阶级的人,就实行同罪同罚的原则了。

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阶级的状况,如果利奥三世的立法曾变为持久的话,那末后来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将要另编一章了。

斯拉夫人的侵入、财政的压迫以及有时把大批省民从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强制移到一个荒僻地区的办法,这一切曾使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很多农奴已经逃亡,躲在侵入的斯拉夫人中间。所以,土地法的修改曾是必要的。但是,利奥三世,由于那种如此突出表现在他全部立法上的激烈主义,已认为那完全取消农奴制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农业法”中表明以租种农民来代替农奴;租种农民缴付什一税,或按合伙制来耕种,即土地所有者供给土地和役畜而租户则供给劳动力的办法。当然,这些改革在世俗的和宗教的大地主之间,曾引起很多的叫嚣。富裕的业主和富裕的主教和住持曾站在同一立场,反对这些改革。这反动势力,在第九世纪后半期当巴锡尔一世(867—886年)的立法恢复旧制度的时候,遂取得胜利了。

拜占廷的商业,尽管数额大、种类多,但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由

于不良的信貸制度以及由于禁止希腊商人在帝国外部貿易的淺見政策而受了損害；这政策使所有和西欧的商业經營都落到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手里了。除了这些不利因素以外，还有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中海盜猖獗状况以及地中海中穆罕默德教海盜船的威胁。这些危險曾引导商人和船舶所有者来組織股份集团，他們共同分取了利潤，也共同分担了損失。意大利商人正是从拜占廷方面获得了那种組織股份公司的商业办法。

我們容易看出利奧三世許多关于土地的立法对教会土地上所产生的影响。教士階層，特別是那些富得多的僧侶們，猛烈攻击皇帝关于改善农奴制的措施。他們的政策原是对他們土地上的农夫实行殘酷剝削的。这项憎恨情緒由于重新实施旧的人头稅以及关于需要出生登記的法律而加剧起来；这项登記是为征收人头稅当然所需的条件。教会曾庄严地声明說，这出生登記的立法，是世俗权力对家庭团結关系的侵犯行为；家庭是一个神授的社会制度，而教会便是它的主要保护人。他們还曾說，利奧的征收人头稅是仿效着穆罕默德教徒的。僧侶最后一項不平的原因，是关于实施那阻止利用寺院保护逃避軍役的摩里士的法律。

寺院有力的宗教和財政影响，再加上它們所享有的豁免权和特权，使它們成为对政府的一种威胁。僧侶可經常依靠着下層群众的狂热支持；大城市中的穷人，由于被現象所蒙蔽，認為僧侶是群众的朋友，因为寺院是以粮食和衣服的补助形式来分发救济費給这批穷人的。他們竟忘了下列事实：僧侶对寺院土地上的农奴劳动进行了又大又殘酷的剝削；僧侶所享有的免稅权增加了別种課稅；僧侶所誇示的施舍，从他們的龐大財富看来，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利奧三世認識到这种不公平和危險状态。但是，他所进行的寺院改革，也只是暂时性的，直到东羅馬帝国历史的結束时为止，

这种寺院舞弊和腐敗的禍害繼續存在着。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能够实现过有效改革的。

看来倒是有趣味的,在利奥三世的有些立法里,可以看出那类似公債的东西。

一个小有資本的人,如果愿意的話可以購買一种“終生年金券”,另外再加一种官銜。当然是虛名的官銜,甚至高級官銜^①也拿出来出售,而虛名高位者有权領取一种年金,叫做“俸祿”,那給他所付款的10%。还有很多帝国朝廷中有薪給的小官位可以公然購買,而購買者可把它們轉售出去,或傳給他們的后嗣。这些投資可产生約占投資額2.5%^②的好处。

在几百年以后,西欧政府才从拜占廷获得了暗示,采用出售官职状作为政府債券的办法;而英国的“整理公債”^③今天还是在出售着。

利奥三世对旧賦稅制度的改革是和他别的改革同样地彻底的。恶劣的“城市团体負責征稅制”予以撤消,征稅事宜改为由中央政府直接担任。正是由于他的課稅制度的公平合理,賦稅的負擔变为可以負擔的了。跟着他的統治和他的改革,拜占廷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阶段。“无政府状态”过去了。政府已有充分力量来渡过各种难关。在749年的大疫癘里,死了百万以上的人口。这些缺口是以迁徙省区城市中和爱琴海島嶼上的居民来填补的。人烟稀少的村落,重新住滿了人。虽然被污辱为“破坏圣象者”——“破坏者”——但利奥三世却是一个历史上最有能力的和最勇敢的統治者,具有拿破崙的智慧和效能的統治者。

但是,他的改革中沒有一件是持久的。傳統,首先是教士和大

① 这里指 Prospathar 官銜。按拜占廷官銜共分十八級,本官銜是第八級。——譯者

② 柏立版本,吉本,第5卷,第534頁。

③ 英国整理公債(Consols)于1751年整理而成,年息为3%。——譯者

地主貴族的既得勢力，是太强大了。恶劣的“联保地稅”从来沒曾取消过。下文我們將回到这一問題，会看到它怎样影响了十字軍东征前的拜占廷帝国。

利奧三世于741年逝世。在此以后，“破坏圣象爭論”还是在变幻无常的状态下繼續着，直到842年由于情势所迫，不得不放弃这项政策时为止。毫无疑问，一大部分主教、軍隊的將領和上層階級是贊成那运动里体现出来的宗教和民政方面的改革的。但是，僧侶和民众都是拚命地反对；前者，是由于自己的利益，而后者，由于愚昧无知的原因。民众反对情緒在拜占廷帝国的欧洲各省內比在小亚細亚各省內还激烈。这一差別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为什么保加利亚人侵犯巴尔干半島比起穆罕默德教徒进攻小亚細亚較多效果。可是，那些主張破坏圣象的諸皇帝所作的努力，不是完全徒劳无功的。他們所作的民政改革，不是完全由反对派取消了的。僧侶所得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要是不然的話，那接下去的时期不会有那政治、軍事、文学和艺术复兴的特征；而馬其頓时期(867—1057年)之所以出名，即在于此。

第七章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要了解穆罕默德教的兴起和傳布，必須知道一些阿拉伯半島上自然地理。因为历史上也許再也沒有象阿拉伯族那样的一个种族，这样明显地是一个环境的产物，而有着由周圍自然条件形成起来的种族特征。

阿拉伯位于亚洲大陆的西南角的一个半島。但它是有着大陆大小的半島。从形状看来，阿拉伯是一个巨大的四边形，其中沒有两条平行着的边綫的。沿紅海岸約长一千五百哩，沿阿拉伯海岸約长一千二百哩，沿波斯湾岸約长九百哩，从巴士拉横过半島頂端到苏伊士約长九百哩。从紅海頂端到墨士卡特的长对角綫，約有一千八百哩。从表面的面积或平方哩的数目看来，阿拉伯半島大約占着美国的1/3大小或比俄国以西的全部欧洲还大。

从地理和經濟來說，阿拉伯真正是一个孤島，是和其余的世界由海岸或甚至更多隔离性的沙漠阻碍分隔开来的。在海岸，山脉逶迤；和叙利亚隔着移动的而又荒涼的沙漠地带，有一片广闊的荒野牧地向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延伸着。内部有更多的綿亘着的牧地，只在春雨之际，能生长东西；大山脉間有細长深谷；很少永远常青的綠洲盆地。也門除了交通不便以外，則显然不同，它位于半島的极南端，是一个古代文化和富饒的地区，也是河流众多、谷物丰收，具有城市和生活安定的地区。①

关于南部阿拉伯半島(也門)过去的繁榮景象，現在还有不少証明。所有的古典作家，如希罗多德、普林尼和斯特累波，以薩巴或謝巴这名字，常常把它說成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它依靠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53頁。

① 《民族》杂志，1917年11月8日，第505頁。

着大規模的水力系統，用笨厚的石牆來限制國內的水流。它有一個水庫周圍達十八哩，深達一百二十呎。在這條件優越的領土上，人口很稠密，有成百成千的城市和村莊；他們使農業發展到最完善的地步。巨商派遣他們的商船隊遠達中國，還派遣他們的商隊往來于敘利亞和非洲沙漠。他們為自己採購東西，也受別人委託做買賣。他們的貨棧堆滿那些來自各地方的物品——銀器、銅塊、錫、鐵、鉛、蜂蜜、蜡、絲、象牙、烏木、珊瑚、瑪瑙、麝貓香、麝香、沒藥^①、樟腦及其他香料。也門盛產谷物，它的產量可供三十年之用。棉樹、甘蔗和椰子樹，枝葉茂密地生長着。麥加的香油、阿拉伯樹膠、荊棘花樹^②濃汁以及出名的乳香是它的重要出口品；也有食鹽、黃金和珍珠出口。在一個包括幾百年而情況不詳的時期謝巴繼續處於繁榮狀態中。在此之後它轉向衰落，而它的全部居民遂向外遷徙了。過去的天堂轉為一片渺無人煙的荒野。至於它衰落的開始時期和原因，則湮沒無聞。

那些住在半島內地而後來征服過世界的粗野部族的情況，則迥然不同了。他們真的做一天吃一天，而食糧是他們的永遠存在的問題。他們主要依靠着他們在家內飼養的駱駝乳以及他們從沙漠綠洲和沙漠邊緣所得的枣椰來維持生存。沿海地區固然可貯藏麥子或稻子。以防無收入的季節或旱災，但是駱駝乳是不能貯藏起來的。它每天依靠着青草的供給，所以內地部族繼續在移動，由於生活所迫逐水草而居，沒有一定的住所。

由於內地阿拉伯人的艱苦的經濟生活，他們種族血統的自尊心更加强了，而這自尊心原是反映在阿拉伯政府和社会組織的民族性質方面的。綠洲的棕樹以及他們畜群所產的乳和肉，是阿拉伯人生存資料的唯一來源。阿拉伯半島，如果沒有棕樹的話，決不能

① 熱帶所產的樹脂，一般是琥珀色，氣香而味苦。——譯者

② 大多產於熱帶，樹葉作羽毛狀。——譯者

維持任何数量的人口。

为了經濟目的而組成部族組織……这种目的在于保卫他們产枣椰的綠洲以及他們牧地上的家畜，也是为了襲取他們邻人所有的同样东西……人口的人数太多，不可能由貧瘠的土地来維持……在不可計数的世紀中，那丧失了綠洲的部族可能在生活上遭受这样的困难，以致征服別的国家对它們來說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

沙漠是具有为人力所不能改变的性質的。甚至在順利的年头，那日益增加着的人口也常常尽力之所能来利用綠洲的地面以及它周圍的草原，而在不順利的年头，居民則將被迫去侵掠邻近的部族或侵掠沿海的村落。如果遇到一个綿长的旱灾时期，則整个部族会被飢餓所迫而迁移他去了。

在阿拉伯人自己中間：

尽管他們承認(甚至在穆罕默德时期之前已經承認)，按語言的統一，按生活和文学的类型，他們都是屬於阿拉伯族，但他們分裂为个別的而且常常敌对的部族，住在地理上由山岭或移动的沙土間隔的地区。这样，他們过着和他們牛羊群相同生活，跟着他們部族界限以內的牧場而移动，或者草率地耕种着各人所可得到的小塊土地。他們的历史是一个掠夺牲口因而常常发生流血斗争的历史，也是各种部族势力甚至霸权的消长、漫无止境的强凌弱的冲突的历史。但是在这历史的背后，一切都在培养着阿拉伯人的民族自觉心；而这自觉心是由一种奇异的、具体的可是主觀的力量（它是至少在一个时期曾升为世界上偉大力量之一）所激发出来的，而且正在等待时机，来投擲一塊新酵母于世界各民族之間^①。

这样看来，地勢曾把它的烙印盖在阿拉伯人的性質之上。由于情势所迫，他变成了不安定、浮动、漂泊和好战。也由于情势所迫，他实行杀嬰和进行战争。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吃飯的人太多，而妇女不是好战士。在穆罕默德之前好久，阿拉伯部族已逐漸滲

① 《民族》杂志，1917年11月8日，第505頁。

入边境上的綠野。早在公元 200 年时，阿拉伯人已开始窜入罗马帝国的远东各省內。在 420 年时，薩拉森騎兵曾出現于埃及的軍团中，而“狄奥多西法典”（439 年）中曾提及他們是駐在东方軍事采邑內的边防队伍。在这里，这种部队在查士丁尼时代还是存在的（《法典》，第 11 卷，第 59 頁）。所有近时作家都同意，在穆罕默德出現之前，曾有着一个严重的旱灾时期；各部族都处在极端骚扰的状态之中，它們特別容易接受任何一个新的領導，只要它替他們指出一条生路，逃脫那沙漠中的苦恼生活。

不管我們是否接受那“悸动性变动”的理論，但在穆罕默德出現之前已有大旱灾却是事实。瑟拉拉特部族的殘余現在住于紅海东北的大沙漠中，既很穷苦又很衰弱；不言而喻，过去他們在一个时期曾是一个又大又强的部族。在穆罕默德时期以前，那里发生了大旱灾，在七年时期中沒曾下过雨。因此，食糧和飲水奇缺，几乎整个部落終于不得不迁移他去。他們經過埃及，向西移动而定居于突尼斯。这次迁移和穆罕默德教是沒有有什么关系的。它发生在那新教出現之前，但却可証明那罕見的旱灾情势已这样严重，以致发生大批迁移和不安状态。第七世紀中的連綿的干旱証明了象帕尔迈拉一类的城市的甚至沙漠整个边地的完全破产。于是，阿拉伯人开始了从沒有过的迁移运动。不仅瑟拉拉特一个部族，而且很多部族开始感覺到貧困的压迫。他們的駱駝死于口渴，他們的羊群找不到牧場，于是空前規模的掠夺成为他們唯一的出路了。

必須注意，麦加城，即先知的誕生地，不仅是一个宗教的中心，而且是一个貿易和商业的巨大中心；那诞生于貿易环境里的新教，一定是会强烈地沾染着商业的色彩的。麦加城同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印度，有着商业联系，尤其重要的，它是叙利亚和也門間一条大商队路上的中間站，而这一条商路是东方和西方間国际贸易所经过的孔道。在穆罕默德出現前好久，麦加居民唯一的餬

口方法是經營商业。該城位于汉志的晒成焦土的地区,在那里,海岸一带多疫癘而平原含盐質。它是长不滿二哩、闊只有九百呎的一条狹窄地带,几乎是完全依靠貿易来維持的。商队的延迟到达就意味着城中居民的飢荒。由二千头駱駝組成的商队时常在街头上可以看到。每头駱駝平均載运着四百磅重量的絲綢、香料、象牙、金屬和香粉。在异教优势的末日,据說每年經過那里出口的东西,合一千五百万美元,其中半数是利潤。每年大商队出发到叙利亚去,滿載商品而归,麦加人把这些商品按高度利潤售給附近的貝督英人。阿拉伯人被迫使用商队来經營商业,因为他們容易碰到强盜的攔劫、容易陷入苦难飢餓的境地。所以,在阿拉伯人中好客是个自然美德。古兰經明白規定了招待旅途中的商人,作为信徒的一项义务;它还宣称在沙漠中建立并維持水井和蓄水池以及維持休息所或商队宿舍是上帝所喜悅的事情。多年以来,麦加城又是阿拉伯人的宗教中心。一个旅行者,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在卡巴庙里无数的神象中总可找出一个神象来献給他的礼品的。麦加城是朝圣者的集合所,也是商品的交換所,而且那些朝圣商人在庙宇內作为祭品而遺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也是一个很不小的財源。

伊斯兰教从它的开始时起就和工商业有着联系的。古兰經規定了鼓励并保护工商业作为所有信徒的义务。先知所出生的部族,是麦加城的統治者,也是神庙的保护人;差不多西阿拉伯半島的全部商业都是由这部族壟断着的。所以,先知当然也不会不認識到那一項职业的重要性;它是他部族人的文明和財富的来源。穆罕默德巧妙地調和了阿拉伯民族的两种傾向。对那些沙漠中的部族,他提供了进行战争和获得战利品的机会;而对那些沿海市鎮中的部族,他提供了經營工商业的机会。阿拉伯人对外征服也是为着商业而进行的。商队杂在他們軍隊中,毫无阻碍地来来往往;兵士尽力保护商人和他的商品,因为兵士誠心地相信,做这种工作就是履行一

种象粉碎不信神者一样神圣性的义务。

不管伊斯兰教可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宗教也可以,就阿拉伯和世界的关系上說,它却意味着阿拉伯人各部族从相互間的掠夺轉到对外地进行大掠夺的轉折点。从此之后不复有什么阿拉伯人部族,而只有阿拉伯人,即穆斯林人,非穆斯林人的对立;阿拉伯内部不复有很多血族的斗争,而只有一个对整个外界的血族斗争。在穆罕默德出現前和出現时,阿拉伯内部曾出現过一个經濟和种族的危机也是相当明显的。阿拉伯人至少在百年的时期中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外来的影响曾起着作用;內心的力量曾放出花朵;人口增加起来,正在冲破着各种阻碍。誰也不能正确地說,其中每个因素究有多少相对的价值;但可說,一切因素都是在起着作用。而且,在它們的影响之下,阿拉伯人有一时期曾是一个民族,不仅是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上的^①。

下面的說法并非夸大其詞:伊斯兰教所提出物質呼吁,就它的广泛的扩张來說,是和它所灌注的宗教观念起着同样的效用的。它对战斗者約許战利品,对死亡者約許物質的天堂。对沙漠中的野蛮部族來說,搶劫从远古以来就被認為是一种光荣的职业。所以我們不应指責他們热烈地皈依那种宗教;这宗教對他們約許了丰富的战利品,并使他們以他們那些只有可怜的生存資料的荒蕪、不毛、炎熱的沙漠区,来換取波斯、敘利亞和埃及的富饒繁茂的原野。

內哈汪德的战役(641年)决定了西部亚洲的命运,波斯归入了穆斯林統治之下。沿波斯边境上的阿拉美易卡农夫曾欢迎阿拉伯人作为救星。阿拉伯人在一个长久的时期中,已从沙漠地区輾轉到边境上的綠野里,而且其中很多人已变为基督教化。但是,他們也蒙受着苛重負担和压迫的痛苦。当阿拉伯人推进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时,有成千累万的本地的阿拉伯基督徒名副其实的前来会合,来帮助他們对波斯的富庶城市进行搶劫。特息丰开

^① 《民族》杂志,1917年11月8日,第505頁。

放了它的城門，神話式的战利品落入了他們手里。不久，他們占領了整个伊拉克。

最急切地欢迎穆斯林教义者是：城市的下層居民、手工业階層和手艺人；按祆教教义，他們的职业已使他們变为不純洁者……这样，从法律的目光看来，他們已是被遺弃者……因而热切地皈依了一种使他們在一个宗教团体中同时享有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宗教①。

跟着，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阿拉伯人同叙利亚一向是有着很密切的貿易联系的；叙利亚在阿拉伯征服世界的事业中是首先被蹂躪的国家。当时，它是世界上一个最富的国家；在那里，几乎无须耕耘就可产生麦子、棉花、大麦、稻子、桑树、橄欖、枸櫞和桔子。黎巴嫩山頂上复盖着最好的森林——橡树、条悬木、大楓树。它是一个景色奇异的国家；依据一个阿拉伯詩人的話，那里每一座山在它的頂上都帶着冬天景色，在它的肩膀上帶着春天景色，在它心胸里，帶着秋天景色，而在它的山脚下則帶着使人酣睡夏天景色了。如上文所說，在第七世紀前好久，貪婪和飢餓，已驅使阿拉伯部族离开沙漠而进入了东方和西方的边境，对波斯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弱到怎样程度，他們已很熟悉。他們既徹底地認識到这一点，所以他們以停止侵掠为条件，向拜占廷政府要求并获得了經常的補助費。对波斯战争也給东羅馬皇帝带来了龐大的債務；因而他被迫把財政的螺旋釘扭紧到极度。小亚細亚的居民負担着重稅，又由于宗教斗争而苦不堪言。在基督教和异教人民中間，已为一个新教义和政府的变更鋪平道路。所以当皇帝希拉克略以虛伪的節約为借口，来撤銷帝国边境上异教貝督英部族的補助費时，不仅它們同新兴的穆罕默德政权締結同盟并开始以侵掠来弥补自己的損失，而且甚至很多犹太人、被压迫的基督徒、附庸民族以及奴隶

① 亚諾尔德：《伊斯兰教的傳教》。

都轉到新信仰方面去了。犹太人大开城門，而被压迫派別的首領們以財帛和武器来助战了。

看来令人惊异的是穆斯林很容易地占領了安提阿、阿勒波和大馬士革，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很多其他城市。其中一个原因是，叙利亚的居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希腊化，但還沒曾充分地希腊化以致同化于拜占廷的制度。阿拉伯人和西亚其他民族間果然有着宗教上的分歧，可是正教的拜占廷人和“异端”的省民間的分歧更甚于此。而且在西亚方面，那些人数众多的犹太人永远不会遺忘羅馬曾使他們在过去时代蒙受着这样多的苦难；現在同一的羅馬，或者象他們所称的“以东”，在拜占廷的外衣下还在以基督教的名义對他們进行迫害。對他們來說，那些信仰一神的阿拉伯人在血統方面比起那些“企图以三位一体来劝說世界的坏以东人”当然还接近些。

穆罕默德教徒在征服叙利亚以后即进行征服埃及。波斯人的征服埃及虽为期甚短（616—626年），但已揭露拜占廷政府在那里的无力和脆弱情况，而這項經驗对阿拉伯人來說是不会忘了的。从远古以来，在埃及和阿拉伯之間已存在着商业关系。穆罕默德也許亲自到过埃及。当然，他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因为在古兰經里他說道：“阿拉伯和埃及之間从沒有过仇隙。这两个国家是姊妹国。”“阿姆尔·伊宾·厄尔·阿斯”即征服埃及者，过去原是一个在埃及經商的商人，对埃及的地理和居民已經熟悉。而且，象上文說过，在埃及边境上已有相当多的阿拉伯殖民地。616年时，在侵入埃及的波斯軍隊中还有着阿拉伯人和叙利亚人的騎兵，对这批人那些早已定居在埃及的阿拉伯人一定會予以积极的同情。还須記牢，埃及的本地人为了异端曾受到迫害，而在財政上还被拜占廷政府穷凶极恶地剝削着。因此，象在敘利亞一样，他們对阿拉伯人的征服不是漠不关心，便是积极贊助。對他們來說，改变主人可

能会好些，决不会更坏的。最后那丰富的战利品也引诱着阿拉伯人的侵入。埃及甚至比叙利亚出产更多的牛乳和蜂蜜，出产更多的麦子。这种谷物已成为麦加城内很需要并大量需要的东西，因为穆罕默德已把到麦加朝圣的义务加在一切信徒身上。因为埃及在几百年中曾是罗马的、后来君士坦丁堡的仓库，所以现在它成为麦加和麦地那的仓库了。经济的自利心、实际的政治和宗教的热忱，在穆罕默德教征服尼罗河流域时是互相结合起来的。那位可畏的埃及征服者曾向奥玛哈里发报告说：“埃及是一头产乳的骆驼，一棵绿叶的枣树，一粒白珍珠，一块黄水晶，一方绿宝石，一幅彩色的绣品。”

尽管这些征服是巨大而迅速的，但穆罕默德教的扩展和推进的力量远没有因此而耗尽。伊斯兰教新月旗，象大镰刀割草般地向西穿过里比亚、息里内易卡、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显然，在整个第八和第九世纪中，阿拉伯半岛上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它能够维持的数量。半岛上那自然的高度生育率，又以伊斯兰教早期军事成功所获得的财富和幸福而提高起来。但是，因为这些天外飞来的幸运不能显然提高它的内部生产，所以剩余的强壮人口，在两世纪中无间断地从边疆上向外流出，大部分向埃及方面去（因为抵抗力最少），直至于下尼罗河的狭长流域里充满着那些不法之徒为止……那不安定的群众，部分由于埃及统治者的勇气和手腕，部分由于他们自己要获得比起枯竭的尼罗河区域能提供更丰富掠夺物的地方，乃立即再向西推进，并以遥远的开温作为目的地。的确，先前有很多阿拉伯人已立脚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们看到那里的社会制度和风俗和他们自己的很相近，曾定居下来，并且部分地柏柏尔人化了^①。

穆罕默德教征服地中海的长距离海岸比征服波斯、叙利亚和

① 《英国历史评论》，第14卷，第783页。

埃及所費的時間長得多。其延遲的原因，部分是在新征服地上必須組織伊斯蘭教的政府，部分是需要時間來發展用以進攻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教海軍，因為阿拉伯人是不習慣於海面生活的。他們在 648 年占領了塞浦路斯，在 653 年占領了羅得島；在 654—673 年間，多次進攻了君士坦丁堡；在 667 年對它進行了第一次大圍攻；在 672—673 年再度對它舉行了圍困。其次，雖然非洲各省內本地居民，無論基督徒或異教的摩爾人、努米底亞人和柏柏爾人，都痛恨拜占廷政府，但有城垣的城市，特別是迦太基城，以及錯綜地布置着的砲台、卫城和軍用路網使征服的進展推遲了。因為當時阿拉伯人對圍攻戰術和襲擊設防城市還沒曾熟練。的確，塞普頓城曾維持到 709 年為止。

伊斯蘭教徒原是具有沙漠居民天性的，儘管在他們不習慣的海面上已表現出他們的威權，但對海洋還是不信任的，所以他們決定以開溫（建立於 670 年）作為非洲各省的首都；開溫位於廣闊而肥沃的平原上，從那里，阿拉伯政府的權力遍及非洲海岸和沙漠地區。當地居民雖屬於不同種族，但由於類似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共同之點；他們遂欣然接受了伊斯蘭教。開溫的位置，在突尼斯南一百二十哩，距加柏斯灣三十至四十哩；在埃及以西，北非洲再也沒有象它那樣重要的其他地方了。由於這沙漠中的地位（雖然不是沒有飲水的），它當然可完整地保存着它阿拉伯人的性質，而沿海各城市以有羅馬和拜占廷居民以及歷史上的聯系，是做不到這一點的。的黎波里、突尼斯、波那和修達各城因此成為同地中海對岸的比薩、熱那亞、阿馬斐等等進行貿易的沿海城鎮。不久，這些新征服者也冒險出海，而大海遂變為他們進一步征服的通路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各地都不能幸免他們的侵掠。他們對各島嶼進行侵犯，西西里遂被他們占領。他們原是海盜，可是不久也認識到經商的好處。意大利各港口不顧教會的禁令，開始和異教徒建立了

通商关系。我们将叙述在十字军以前中世纪商人怎样同薩拉森人做交易而常出现于他们的港口。

罗马人从来未曾能够粉碎柏柏尔和摩尔氏族，它们住在近代摩洛哥的难于跋涉的山地中。这些由本地首长统治着的氏族中，有五百十六个名字流传下来。这些山中居民虽然强悍，可是对伊斯兰教的武力降服了。

698 年时，大馬士革的奧米耶朝哈里发曾派出那个可畏的穆薩，不久他的声名遂震动了世界。一个又一个部族很快地屈服于他的武力之下。他在山岭中对柏柏尔的战役真是以人作野兽来打猎的。但是，在被征服以后，柏柏尔人成为所有臣服于伊斯兰教部族中的最狂热、最好战的部族。正是柏柏尔人在柏柏尔酋长统率之下，真正地实现了穆罕默德教征服西班牙的计划。酋长塔里夫·伊宾·馬力克·阿布左拉是于 711 年 4 月在西班牙海岸那和他的名字永远分不开的地点——塔里法登陆的。

政治腐败、经济压迫、社会不满以及对犹太人的蛮横迫害——这一切如上文所提过，在基督教西班牙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使西班牙民众象叙利亚和埃及的民众一样，把穆罕默德教看作救星了。另一方面，无限的战利品的前景对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也是一种引诱力。在西班牙有很多古城、富裕的教会、古老寺院，在那里几百年来积聚了财富。此外，它的平原满布着牲畜，它的矿产富饶得难于置信；安达卢西亚是个风景优美、土质肥沃的园地。

穆薩在热勒斯·得·拉·弗龙德拉的胜利(711 年 7 月)后，曾正式向哈里发报告关于征服的历史，指出他所得的掠夺品达到了怎样庞大的数量。他曾俘获成千成万的俘虏。穆薩写道：“我的营帐象在最后审判日各族人的大集合。”在开温市場上一个壮健的男人，只值几盎司胡椒。有挑选出来的基督教美女三万人被送到亚历山大城、安提阿和大馬士革的奴隶市場上去。教会几百年来所积聚

的財富都被占奪。猶太人從他們的壓迫者的災難中，特別獲得了丰收；他們利用着兵士的無知，以微不足道的款子購進了祭壇上的神器、裝飾宮廷美女的珠寶以及一切富麗昂貴的奢侈品。後來，猶太人在歐洲政治上和財政上所獲得的優勢，就是從薩拉森征服西班牙開始的，因為它使他們獲得了莫大財富。

薩拉森人越過比利牛斯山對法蘭克高盧的侵襲，由於732年時查理馬德爾對他們的勝利而告結束；這侵襲對法蘭克地區沒有什麼持久的影響。結果也沒有造成穆罕默德教的征服；的確，他們在埃波羅河外的出征，只不過是掠奪的侵襲而已。這一點可以下列有趣味的事實來證明，這些侵犯者是一貫地攻擊寺院的，因為他們象諾曼人在下一世紀所發覺的那樣，很快發現寺院是大量金銀器皿和珠寶等財物的貯藏庫，也是藏着錢幣和貴金屬的地窖^①。

在750年巴格達城建造的時候，穆罕默德教已控制着阿拉伯半島、舊波斯帝國以及除小亞細亞各省以外所有原屬拜占廷的亞非兩洲的領土。它擁有着非常富饒的地區，全世界貿易的中心，并統治着千千萬萬最勤勞的農民、精巧的手藝者和狡猾的商人。它是所知道的陸上海上最古老商路的主人翁。

可是，在日益推廣領土圈時，伊斯蘭教的擴展力量還沒有被它的第一批龐大征服而耗盡；它的光芒放射到那些從來沒曾落入羅馬或拜占廷統治範圍的土地上。自從亞歷山大帝時期以來，西亞從沒看到過象伊斯蘭教所進行的那樣一種變革。穆罕默德教依循那條從敘利亞越波斯而達中國的橫跨大陸的大商路，仿效那批景教徒的榜樣（他們被逐出於敘利亞，後避難於亞洲中心并在那里

^① 法蘭克人在都爾勝利以後，奧斯特拉西亞軍隊曾把大量戰利品分配給自己，但是很多落到寺院里。下文曾提及一大批純粹阿拉伯黃金的寺院寶物；見《論味達斯特因體的報告》，第4章(Sermo de Relat Corp Vedast C4)。載《德意志古文獻》，文藝編，第15卷，第402頁，第40—41行。

建立了基督教-东方文明)而达到并渡过了阿姆河,即亚历山大帝的“极东”。

奇怪的是,阿拉伯人在商业上所具有的大胆和敏感性以及他們的傳教热忱,在早期沒曾引导他們沿非洲东岸来伸展他們的勢力。這項扩展沒曾大規模地发动起来,直到十三世紀为止,虽然据傳說,在“徙志”节^①(622年)后不久,有一批阿拉伯移民队曾渡过巴布·厄尔·曼得海峡,深入阿比西尼亚,并逐步伸展它的勢力远达奈格耳河。然而,這項傳說很少根据,所以历史家們不予信任,而把穆罕默德教的深入西苏丹归因于埃及和努比亚的影响,并且認為这事件是在后来出現的。

現在,我們要討論关于穆罕默德教国家的內部經濟、殖民形式、对被征服人民的待遇、行政組織,特別是它的財政措施。那認為阿拉伯人是无情的剝削者和暴虐的稅吏这种广泛傳布的观念是錯誤的;这是基督教欧洲对穆罕默德教仇恨心理的遺產,而这仇恨形成于十字軍时期,更通过奥托曼土耳其人而流傳下来的。

我們必須从原始阿拉伯人講起。他們尽管有些恶习,可是具有几种高貴而严肃的美德。其中最突出的是:

他們的偉大榮譽观念,在战争里或在家內,在对被征服者的寬大,在对陌生旅客的保护,在对妇女的尊重或在对部族和邻人的忠誠都有表現,連在可怕的血緣报复方面也表現出忠心……对一个阿拉伯人來說如果拒絕給陌生人保护,那是对全部族的一个无穷尽的恥辱,可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現,是很可怀疑的……黑夜一到,阿拉伯酋长的蓬帳近旁就点起了灯火,来招引那些徘徊在沙漠中的旅客到那里获得阿拉伯人的款待和保护……另一种榮譽表現,是在恪守所作的諾言。一个有榮譽心的人決不自食其言的;当阿拉伯人由于和希腊人及波斯人接触变为道德墮落的时候,他們才采用了宣誓的形式。

^① “徙志”节(Hegira)另譯“黑蚩拉”是穆罕默德从麦加出奔麦地那的日子(622年9月15日),这一年是伊斯兰教紀元的开始。——譯者

在这崇高的榮譽觀念的基礎上，穆罕默德建立了一個新的阿拉伯社會；他是一個偉大宗教家，也是一個偉大社會改革家。古蘭經，象《舊約全書》在古代希伯來人中間一樣，是一本宗教書，也是一本法律書。因為在每一塞姆族中，政府已是一種神權政府。這是塞姆族的創舉。穆罕默德關於家庭、婚姻、父母和子女間的權利義務、禁止殺嬰、照顧孤兒、老人、窮人、病人、精神病者、奴隸以及關於財產的領有和遺產的種種立法，同“狄奧多西法典”及“查士丁尼法律匯編”的基督教和羅馬立法對比之下，在理智、公平和仁厚方面，當然是沒有什麼遜色的。一切穆罕默德教徒在法律前的平等地位，穆罕默德教社會里沒有對抗的階級差別，沒有什麼教士的等級——因為在伊斯蘭教里每一個人就是他自己的教士——穆罕默德教社會還擺脫了象拜占廷帝國內的主教和住持那樣的有野心而貪婪的教士階層所發生的弊病，——這一切品質使早期穆罕默德教蓋上了一個新的和興奮的活力的烙印。

穆罕默德教徒在戰爭中固然兇狠，但却是仁慈的勝利者。他們对被征服人民所提出的著名口號是“古蘭經、貢賦或寶劍”，使波斯人、敘利亞人、埃及人、猶太人（作為“被保護”的民族）得自由保留着他們自己的宗教、自己的風俗、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在繳付人頭稅的條件下，可獲得政府保護的保證。人頭稅是在對一切穆罕默德教屬民所征正規賦稅以外的一種附加稅。它是不信伊斯蘭教的成年男人所課的稅。富人每年應繳四十第倫（第倫“dirhem”如果不管匯兌價值的波動或近代購買力的差別如何，按重量計約值二十分美元），中等階層的人每年應繳二十第倫，窮人每年應繳十第倫。但是，婦女和未成年者、真正衰老者、真正貧窮者是可免繳的。

由於征服的結果，穆罕默德教繼承了那滅亡了的波斯的領土以及“基督教國”的亞非各省領土。它從這些領土上獲得了豐富資

源以及它們控制紅海、波斯湾和橫貫亞洲商路的地位；可是除此之外，它从隶属民族波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的稠密的人口中，还获得了甚至更大的资源；因为这些民族从远古以来就以經商本領和机械技巧而出名的。伊斯兰教采用了一項賢明的政策，即承認这些非穆罕默德教屬民是“盟約的人民”，准許他們保留他們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社会制度；这样一来，那些原来也許会倔强的屬民变为安靜而勤劳的公民了。阿拉伯权力之所以能均衡地发展起来，是可归結到这一政策的。應該指出，甚至当伊斯兰教本身的宗派主义使巴格达哈里发朝的政治統一破裂的时候，它的文化統一，無論物質的或精神的，还是保持着的。

那些曾呻吟于拜占廷帝国所实施的宗教迫害和財政压迫之下的千千万万人民，利用了这个新的宗教形式和社会自由，这是不足为奇的。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也得到好处。因为阿拉伯人需要农民阶層的心甘情願的劳动，基督教手工艺者的精巧技术以及亚历山大、安提阿、大馬士革、阿勒波各大城市中商人阶層的商业进取心。

为了免付人头稅，为了取得資格在軍隊中任职（文官职位是公开地对非穆罕默德教徒开放的），很多人轉信伊斯兰教了。基督教徒对穆斯林在人口比重上的优势也慢慢地下降了，而且越来越有利于穆罕默德教，因为穆罕默德教人口的增加率在速度上远过于本地的基督教人口。这是由于穆罕默德教实行多妻制度的緣故。原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在阿拉伯半島的貧瘠土地上，人口一向是对生存的一种压力，而飢荒是一个經常状态；所以曾用杀嬰方法来消除那人口过多的景象。可是，跟着那已知世界上最富饒土地落在他們手里以后，杀嬰已不再需要了。而且，如果阿拉伯人曾看到，象他們一定會会看到的那样，那在他們的人数和稠密的基督教人口之間所存在的大不相称情况，那么他們自卫的本能就要使他們贊成多妻制了。史籍里指出，穆罕默德教人口是在稳定地增加着；

而这一增加不可能完全以那些脱离基督教的皈依者的增加来说明的。在上層分子中，通常是有着很大的家庭的。富人們以希腊人的、科普特人的和波斯人的奴隶姑娘，作为小老婆。阿尔·摩吉拉·伊布·秀巴有四个妻子和七十六个小老婆，据说有三百个子女。到832年时，埃及穆斯林对基督徒在人数上的优势已确立起来，因为那时阿拉伯人开始定居于村落和乡村里，不象以前那样只住在大城市里了。

阿拉伯征服者一步一步地并经过相当时期后，同皈依信仰的穆斯林人混杂起来，而那些被容忍的“被保护者”成为另外一个非穆斯林人的阶層。当时有着各种原因使对貴族血統不如以前重視——其中对私生子的一般容忍也不是一个最小的原因——不久，这些原因把新皈依者的地位几乎提高到和原皈依者相等，而“被保护者”也逐渐获得了属于真正阿拉伯人的大部分权利。

現在我們来講穆罕默德教国家的課稅制度。如果可把一个大国的財政状况作为它的繁荣或貧困的尺度和証据来看，那末，埃及、非洲、叙利亚的居民生活在新月旗帜下比起在过去拜占廷統治下要快乐些。古文献証明，課稅的标准是公平的，是依照納稅人的能力和状况而分出等級的。姑且不談如上文所說的由非穆斯林人所繳付的人头稅，我們只就財政問題可以看到，国家的主要收入（除了很重要的战利品收入以外）是“則卡”（Zekah），就是規定的賑款稅；这是向极穷者以外一切穆斯林人所課的捐稅，有一定的比例，約占他們的駱駝、羊、金錢、土地上产物等等的2.5%；这笔进款用以发給軍队的餉銀、支付那些办理征稅官員的俸金以及救济穷人。最奇突的行政上的特点是，按照規定的比例把每年国庫的盈余分配給忠誠者。奧瑪尔曾命令就穆斯林的总人口作出詳細調查，把因出生或死亡所造成的每一增減随时正确地登記出来。国庫盈余的分配是从先知的家屬开始的。先知的愛妻阿适每年領取

一万二千法郎；他的其他寡妇領取一万法郎；那些曾参加过柏德勒战役的“助手”和“流寓者”各領取五千法郎；哈里发領取同样的数目。分配数目依次递减到每年三百法郎，那是給也門的某些平常人的。那些在穆罕默德出奔后离开麦加到麦地那的妇女們每年各得領六千法郎。那些在怀抱中的孩子們各得一百法郎；跟着他們的年龄可加到二百或二百以上的法郎；弃兒同样是由国家的公費来撫养的。这种財政制度对伊斯兰教帝国的統一和权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想而知了。

这中央集权制，是由驛站制度补充的，驛站网遍佈全国，使各地都和巴格达相联系着。在帝国一切最重要城市和首都之間都有驛使路綫，中間还有換馬站。有一时期，这些驛站的数字在全帝国範圍內达到了一千左右。当时，傳遞邮件的速度是真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們看到有一个驛使在三天之內走了七百五十哩。鴿子傳信的方法也曾使用。政府划出一部分公款建造道路和修理大公路。政府贊助——差不多替代了——私人热忱来挖井、建造旅館、設置里程碑以標誌路程的距离。哈倫·阿尔·拉希德的爱妻祖巴伊达曾建造从麦加到麦地那的巴尔-沙基路，即东方大道，并沿着巴格达到麦加的整个路綫开掘水井，建立旅舍。她为麦加城建造了十哩长的引水管。在这些建筑方面，她总共用去了两百万金币的巨款。

关于政体，阿拉伯人采用了拜占廷的行政制度。甚至希腊語在以后百年多的时期中仍然是埃及的官方語，直至阿拉伯人口和皈依者人数的增加使阿拉伯語成为大多数居民的自然語言。近三十年来，在埃及出土的大量的“草紙”——官方报告、土地登录簿、租稅卷册、丈量簿——对这問題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这些文件指出阿拉伯的征服埃及大部分是和平地进行着的；課稅是公平而又輕微的；行政舞弊是严密防止的；生命、宗教和财产都是受到保

护的。

埃及有一个特設的灌溉行政部，每年并委派稽查水閘堤壩的專員。地方水閘由地方村庄来管理和維持。吉本說：“曾撥出三分之一的貢賦作为常年修建水閘运河之用的。”藍-蒲尔說，“阿摩尔曾用灌溉方法来发展土地上的生产，并实施那从远古傳下来的劳役制度。在冬夏两季，保持着十二万劳动者在工作，来修建堤岸和运河。”偶然，象在 615 年时，尼罗河由于絲毫未发生泛濫，而产生了一向与此俱来的可怕后果。

亚历山大城固然还是一个富庶的城市，但它不复是一个埃及的首都了。阿拉伯人太害怕拜占廷艦队的攻击而失掉它，也許有着太多的沙漠地区，以致不願以海口作为他們政府的所在地。阿摩尔曾确定以弗斯塔特为新首都，位于图拉真所建造的古代羅馬砲台的附近。弗斯塔特繼續是埃及的首都直到 969 年开罗建立起来时为止。

英国的朝圣者阿基尔夫約在 670 年时会遊历亚历山大城，說它是全世界貿易的中心，有“无数的人”到那里来購買东西；在法提馬朝时代，亚历山大城曾被算作一个很繁荣的城市。就制造业來說，它們几乎完全是拜占廷統治下工业的延續。織布业也許由于西欧和哈里发的共同需要(为了哈里发曾織造許多华丽的織品)會有改进，而且在数量方面也大有增加。亚历山大城、廷尼斯和开罗都是又大又兴旺又富饒的城市。1047 年时，波斯旅行家那塞里-庫斯兰曾訪問廷尼斯，看到它的繁荣景象，大吃一惊。他說及那里的“一万片店鋪和五万个男居民”。在島上的港口內有一千只船停泊着，而該島并不生产什么东西，完全依靠着貿易来获得一切供应品的。尼罗河的漲潮冲去了那环繞着的鹹水流，并以淡水灌滿了地下“水池和水庫，够維持一年时期”。当时，科普特人所穿的好看的花布比以前要昂貴。在苏丹的織布机上所織造的布疋只是供他

自用的；一条头巾可值四万地那；但是这些織品是永远不拿到市場上出售的。除了这些王室专用的織品以外，織造一种叫做光滑緞(bûk alimûn)的綢緞，即光彩夺目的短緞，它織得这样精細，据说在白天每一小时内它会改变它的颜色的。廷尼斯的鋼刀业的出品和它的織机上的出品几乎是齐名的。

孜孜不倦的阿摩尔曾想用經濟和商业的带子把埃及和阿拉伯联系起来。他的第一項努力是开掘在紅海頂端从尼罗河到克列斯馬的古代运河，約有九十哩长；跟着，埃及的麦子可从尼罗河啓运无须換船而直达阿拉伯海岸。阿摩尔还曾計劃用一条运河来切断苏伊士地峡；但奧瑪尔禁止了這項計劃，因为他害怕这条运河将会使拜占廷人进入紅海来截断朝圣路程并干涉商业。不久，克列斯馬运河开始淤塞了；約在761年时，它实际上已被破坏，为的是要迫使反叛的麦地那因断粮屈服。然而，这一条运河曾是从紅海到地中海商品运输的經常道路。

可是，很多紅海貿易是通过紅海西岸的貝倫涅斯港的，从那里，用大篷車載运貨物越过沙漠而达上尼罗河，再把貨物装在木筏上，順流而下。这条經過沙漠的路程約需三十天時間。另一条，是橫过苏伊士地峡而达到珀琉細安(法拉米西)的通路，在此之前，珀琉細安早已是有些历史重要性和富饒的港口。这条路程可縮短陆运時間約四至五天，而且，如果上紅海的港口曾有所改进，它的用处还会大些。

在努比亚战争之后签订了一項条約，依据这条約，努比亚每年应进貢三百六十个奴隶給駐在埃尔-喀斯的埃及官吏；埃尔-喀斯距阿斯旺五哩，是埃及边境上的市鎮；另以四十个奴隶来交換小麦、大麦、扁豆和馬匹。条約和奴隶貢賦繼續有效达六百多年之久。

意大利和埃及之間的交通似乎从来没有完全断絕过，甚至在阿拉伯的优势时期也是如此。722年时，威力巴德曾看到一只从埃

及来的船停泊在那不勒斯港口內；在第九世紀，亚历山大城的織品确曾通过威尼斯人的活动运到意大利来，虽然其中很多是經北非洲来到阿馬斐的。827 或 828 年时，威尼斯人曾出現于亚历山大城，他們并携回了圣馬克的圣物，“他似乎已成为他們的守护神，因为他是基督教埃及的保护者，也是他們在到这个最早的远方市場去的又长又危險航程上的捍卫者”。

在查理曼时代哈倫·阿尔·拉希德曾派遣大使往法兰克皇帝那里去；大使所經過的旅程是先沿着北非海岸西行，然后渡海而到达意大利。当时，作为礼物贈給查理曼的一只象是由陆路牵到的黎波里，再从那里装船渡海而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港。即在那时，基督徒和穆罕默德教徒在对方的国家里显然都是可享有相互的安全保障的，也許商人們曾利用了这项机会。我們果然找不到条約来証明阿拉伯和基督教国家之間在早期已有着商业的关系，但我們不能援引这一事实作为那早在 800 年时沒有商业关系存在一說的辯解。象瑪斯·拉特立指出的，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很可能所有的协定都是口头的，而商人們做他們的生意是沒有什么正式协定的。直到进行規模相当大而需要保护的貿易时，才会意識到条約是必要的。

第八章 墨洛溫朝、喀罗林朝的法兰克

高盧和日耳曼,查理曼(768—814年)*

在上文講到日耳曼侵入的一章里,我們已經指出,法兰克人怎样慢慢地滲入并扩展于下萊茵河和索謨河之間的地区,当时他們沒有遇到什么阻碍,因为羅馬居民早已放弃这一区域。单就他們达到索謨河来講,法兰克人的移动是一个移民性質的移动。但是,到了486年时,他們达到了有人居住的領土邊緣;从那时起,法兰克人的扩展是一个征服性的移动了。他們迅速蹂躪了那名义上还在帝国統治下的北高盧、东南部的勃艮第高盧以及西南部的西哥特高盧。到567年时,法兰克人的統治在西方已达到比利牛斯山和大西洋,而在德意志,除了保持着在黑森的原有法兰克領土以外,他們还征服了阿勒曼尼人(496年)、瑟林吉亚人(532年)和巴伐利亚人(552年)。这样,不仅是那从日耳曼人侵入中誕生出来的最偉大而又最持久的国家建立了,而且是一个新型的国家形成了。因为法兰克王国是把羅馬从沒統治过的自由德意志和征服了的羅馬省分联合起来的唯一日耳曼王国。它是一个日耳曼-羅馬王国,和任何别的日耳曼王国不同而且远远地具有更大的意义。在法兰克王国内,两个基本种族成分即羅馬和日耳曼人的比重,勢均力敌,那是在以前任何王国内所未曾有过的。

在另一重要方面,法兰克国家也和其他王国有不同之点。它是天主教的,而不是阿利阿教的,象其他国家那样。我們已講过,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53頁。

宗教分歧怎样成了东哥特王国和汪达尔王国灭亡的一个因素；它怎样成了西哥特西班牙大大衰落的一个根源。相反的，在法兰克王国内，教会成了政府的支柱，而且——也許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在羅馬天主教居民和法兰克人之間，不存在对立的情况。这一事实产生了政治上的和諧和效能，也促进了两族人民間的通婚。一句話來說，从开始时起，法兰克国家沒有内部不和景象。这种統一性所产生的道德和社会效果的意义，我們便无須費詞來說明了。

在法兰克人到达之前，高盧主教区原是富饒的。当教会被承認为国教以后，它就已由立法保証享有承受遺产权，获得贈品权及領有土地权。它不倦地灌輸着現世慷慨解囊的人們将来在天堂上可得丰富报酬这一观念。它的口头禪是“施舍将有好报”。法兰克僧侶狡黠地利用了一般对圣徒的热誠崇拜，以求增加教会的基金，那是第六和第七世紀的一个突出宗教現象。正是圣徒，而且往往仅是一个当地的被崇拜的圣徒，成了真正的业主。当时所流行的强烈的人身和所有权观念，要求給精神的教会以一种具体的人身表現，即使保护神是一个看不見的人物。圣徒被看作精神上的教父和教母，而祈求圣徒的佑助成了一般的情况；因为圣徒会在天堂上为他們的被保护者說情的。一个教会施主的名字，是登記在教会登录簿上的。

施主可以分成为三类。那些越来越多的出身于地主貴族的主教把他們祖傳的土地獻給他們所管的主教座。法兰克历史家都尔·格列高里曾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其次，富裕的世俗地主是慷慨地捐給教会地产的。最后，法兰克国王是最慷慨的施主，竟使王家土地縮减到損害墨洛溫朝政权并實質上促使該朝衰落的地步。法兰克教会为了使这些資源永不减少，按照398年迦太基宗教大会的決議，禁止了教会土地的割讓。

教会法規曾規定：四分之一的进款将用作主教家庭的开支；四

分之一将用作救济穷人；另一四分之一将用作維持僧侶阶層；最后四分之一将用作維持原有的教会建筑物，或者建造新的教会建筑物。法兰克僧侶們曾是大兴土木者。也許在十一世紀宗教复兴之前，中世紀时期再也沒有別的世紀建造了这样多的新教会。当时，有些主教是有才干的理財家。据記載，有两个主教，在为教会用去了大量款子之后，死时庫存还有两万金币。

土地所有权，不仅提供了庄稼、水果、葡萄、木材及其他物質資源；它也提供了农奴作为这些庄园的耕种者。那領有三十所庄园的主教或住持，就是領有三十个村庄人口的人，因为每个庄园都有它的村庄；因而他就成为几千佃农的业主。其中每个庄园构成一个特殊的經济社会单位。在每个村庄里，主教或住持有着几座倉庫和谷倉、一所磨坊、一部葡萄汁压榨器或一間釀酒房。大部分佃农是从事农业的，但也有从事农业社会所必要的家庭工业、工艺和織布、硝皮、制革、制造木器、鍛炼金屬等业的。剩余的自然产物和超过需要的手工制品是拿到本地市場上去出售，而市場本身往往是在主教或住持控制下的。

以文明程度來說，法兰克人比其他日耳曼族野蛮一些。但是这文明尽管还显出野蛮的粗俗恶习殘暴，它比起哥特人的文明實質上还是健全得多的。的确，墨洛温朝諸王几乎都是殘暴、无信、恶毒的，而都尔·格列高里的《法兰克諸王史》（約在 600 年时）看来大部分是記載着战争、暗杀和謀杀事件的編年史。这些国王都是由幸运的征服慣坏了的不肖子；他們放縱了自己的野蛮恶习，同时还培养了他們所接触的那些沒落的羅馬社会的恶习。

但是这个国家的真正力量，不是在于国王，而是在于大地主阶級，它屬於高盧-羅馬或新日耳曼或混合的血緣和傳統。这个統治阶級必然包括着主教地主；在它的下面，是基本民众，即羅馬人和日耳曼人，包括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在內；由于都是天主教徒，他們

还有着混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由此可见，法兰克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由种族成分混合起来的社会，不象在其他日耳曼王国内，是一个由不同的而又敌对的成分结合起来的社會。

意大利、南高盧和西班牙的宗教矛盾曾使羅馬人和日耳曼人分隔开来。在法兰克高盧，这种敌对状态是不存在的。而这产生了重要得不可估計的結果。教会曾大力促进法兰克統治的稳固和扩展。教会从沒有对这統治权进行挑战，象在阿利阿教国家內教会所做的那样。它安然保存着它所領有的广大地产，并順利地抵抗了墨洛温朝諸王几次对它課稅的企图。主教們当然都是屬於高盧-羅馬世系的。直到第七世紀，我們才开始看到法兰克血統的僧侶。在高級僧侶中，很多是狂暴粗野的，因为他們也不能避免这时代的风气。可是，其中也有偉大而善良的教士，象法兰克最早的历史家都尔·格列高里那样。教会尽管縱容它的施主的犯罪行为，可是有时却成功地緩和了法律的殘酷性，特别是通过实现庇护权方法。尽管有很多僧侶放蕩不拘，盗用宗教进款，教会所做的实际慈善事业却是巨大的：在这內战几乎經久不息而下層社会遭受貧困和可怕灾难的时代里，它进行着救济穷人、維持医院和救济照顧孤兒寡妇的工作。教会作为社会机关來說，不是整个地不忠实于它的責任的。

至于高盧-羅馬貴族方面，他們由于安然拥有大地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压迫，已把法兰克的統治完全看作自己的統治一样。他們的行政經驗对法兰克国王來說，是无价之宝。墨洛温朝軍隊中有些最好的將領，是屬於高盧-羅馬世系的。

在羅馬省政府崩潰的时期，高盧的至少是南高盧的城市生活已获得新的力量。在第六世紀中，我們还可看到“市議會”、城市“两人共职制”和“保护官”。所有的大城市以坚固城垣环繞着，甚至小市鎮也筑有防卫工事。城市間的爭斗——看来是由羅馬長期統治

沒有完全抹去的古代凱尔特氏族間或各部族間的敌对情緒所产生的叛乱——加深了墨洛温朝諸王子間的冲突。

法兰克社会果然是殘暴粗野的，但它具有一种剛直性、一种力量、一种生活力、一种純粹性，而这些都是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所沒有的。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它是一个又自然又正常的社会，在性質上，不是一个造作的和变态的社会。为了这个原因，法兰克国家不仅是注定要成为所有日耳曼族中的最持久的、最有势力的国家；也是注定要成为最有建設性的国家，是在羅馬帝国廢墟上建立一个新欧洲的新生和团結的力量。所有其他日耳曼王国，是太脆弱、太易破碎，不能維持久远。只有法兰克人連同教会，才是注定要完成这古代世界和中世紀世界間的过渡工作的。有些历史家說，法兰克人对羅馬化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反抗力或阻碍力。我認为这种措詞不当的說法，是夸大的。在日耳曼制度同羅馬制度融合的过程里，無論在精神或职能方面，都有着为两种制度同时各起作用的余地。但是，要从墨洛温和喀罗林制度中挑选出什么例子來說，这是純羅馬的，或純日耳曼人的；倒是一个困难的工作。

如果我們来把法兰克社会研究一番，并把它同羅馬后期的社会对比一下，我們就可清楚地看出这一过渡。法兰克社会除了僧侶以外，还包括有四个阶層，而它們的地位，是以財富来决定的。最下層的是奴隶；在他們之上是农奴，按理論，农奴是自由的，而实际上，由于債務的牵累，已是固着于土地上的，自由人，即小土地所有者；最上層是大地主，叫做“貴族”或“显貴”。在法兰克人中間，沒曾有过种族的貴族。这貴族等級是通过做官和地主制度而兴起来的。法兰克政府曾是一个地主政权。由于征服高盧的結果，广大的帝国国庫領地，在法兰克人占領的領土之内的土地，以及也許在法兰克人已經定居而还未占領的一切土地，当然归屬作为征服者的国王或皇帝繼承人所有。这样，就把一个巨大的权力源泉，放入

国王手里。法兰克国王既然占有了帝国国庫領地，就成了一个大地主，的确，除了教会以外，是最大的地主。这些領地，不仅是作为进款的一个来源，而且是作为报酬他臣屬的手段。国王的賜給土地，在初期，看来簡直是贈与性質；但到后来，才完全認識到，王室土地在建立一个王室行政制度上，具有巨大价值，因而就发展成为一种封建式的庇护制度了。

我們有必要来談一談关于王国政府的支持者所屬的那些階級。一般講，这批支持者原是国王所熟悉的人；国王在登位之前，就已依靠他們的服务。国王有着自己的侍从或卫兵；也就是，由于密切的个人联系而附着于他的人們。这些人在他領導之下去作战，分担他的危險，也分享他的光荣。国王从他們中間挑选那些在他的新地位上为他服务的人們，并以他新获的土地来报酬他們。这方面的最好例子，便是那由国王的战士队所产生出来的法兰克“亲兵队”。另有一种接近国王的人是他的半自由和不自由的奴仆，特别是那些管理他家务的人。国王从这批人中間找得他所需要的熟練于服务的人。墨洛温朝宮廷大臣的官銜“宮相”(Major domus)、“家宰”(Senescalcus)、“元帅”(Marescalcus)、“大法官”(Camerarius)，都是原来用于不自由奴仆的头銜；这一事实可指明这些重要官职的微賤根源。但是国王的侍从和王族沒曾供应王国政府所有的新官吏。人数越来越多的別种人，特别是地主階級，認識到担任王室官吏所带来的益处，因而力图爭求那項职务；但是，在开始时，大多数的新官吏看来完全可能是从密切圍繞国王的人們中挑选出来的。

“庄园”或王室領地散布于全高盧和萊茵河区，总称为“国庫領”。其中有的是位于旧羅馬城市內的地产，象在巴黎、奥尔良、理姆、德里佛斯、麦次那样，但是其中大多数是大农庄，而国王所喜欢的是位于象克利奇、奇尔、乔济、埃皮內、馬倫海一类大森林附近的

庄园,因为法兰克国王是热爱打猎的。耕地、草地和牧场、森林、魚池、采石場、矿場可能都包括在一塊領地之內。庄园內的住宅区都有着一座高盧-羅馬建筑式的庄园大厦,一般是用木材建造在領地中最适合的地基上,兩側并附有寄宿国王官吏的小房屋以及馬房、倉庫、儲藏室和仆役間。当时,国王是沒有固定首都的。随便什么地方,国王临时駐扎在那里,就是政府所在地,因为他的官吏、随从、服役者、卫兵和家奴的整个队伍,是跟他一起从一个庄园移动到另一个庄园去的;的确,那在一个几乎完全是农业經濟的时代是必要的;当时商业和貿易既稀少,道路又窳敗,而現款稅又是很少的。国王正象俗語所說,是“吃着穿着自己的东西”的。地方賦稅,主要以实物来繳納,例如,繳納十五分之一的收获、十分之一的猪和牲畜,等等。所以,王室庄园成了国王收入的最重要的泉源。

墨洛温朝諸王曾以土地贈与来报酬他們官吏的服务,而后来貴族地主就領会到下列事实:王室服务可提供有利可图的职业;而且一个懦弱的或年幼的国王可被哄騙或威吓从王室領地內无条件地撥出土地賜給他的寵臣。因为男爵、宮廷官吏和軍隊指揮是以恩賜土地来維持的,自然而然地这些行政官員就会成为地主阶级;相反地,有势力者或大地主势必侵占行政官职。一种真正的封建社会結構、一种真正的封建政府形式,無論在理論上或形式上,还都是远在将来,可是以后的封建制度的根源,在墨洛温朝时代,可以說是已經存在了。政府大員即男爵,或多或少已是不可罢免的,他們的任期已漸漸成为世襲性的,而大地主,世俗和宗教的,也有着脫离王室政权的傾向。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大多是由于內战;在內战里,国王力图以撥給國庫領的土地来取得支持者。的确,那完备的封建保有权——采邑制——是在喀罗林朝时代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墨洛温朝的后期,王室土地的賜与已接近那种形式的保有权了。这种貴族地主的独立傾向,又由于給保有权者以特权的

这种成长着的慣例而加速起来。“特权”原来是只給予宗教貴族，主教和住持的，而这特权所发生的效果是使僧侶的庄园脱离地方男爵的管轄范围。国家官員往往是盛气凌人的，也往往是貪污受贿的，因而他們被禁止进入这样的庄园內去审理案件，或去征集稅款；这样一来，特权享有者就只对国王負責了。但是，因为国王常常是远在別处，或者是懦弱的或年幼的，貴族很快就看出从这特权里可获得使他們的庄园享有更大独立地位的手段，因而他們从王室强取了各种免除权。由此可見，由于这项慣例，王室的权威和王室的收入同样蒙受了損失，地主貴族的权力急速成长起来了。在第七世紀中，宮相便是这个跋扈阶層的代表。

宮相这官职，原是一个卑微的职位，甚至是由奴隶出身的人来担任的。当时，每个王室庄园的收支，是由一个管事或管家来监督的；因为朝廷是从一个王室庄园移到另一个王室庄园的，国王的首要官吏宮相遂查核这些所在地的庄园帳册，这样，按一种意义來說，宮相成了国王进款的控制者，也是他恩賜的分配者。于是，这官职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有政治势力的官职，所以如遇到一个懦弱的或年幼的国王統治时期，宮相会成为真正攝政者。在他的职权中，有着批准讓与王室領、給予或扣留王室恩賜、征集賦稅等各种权力。“王宮就是国家；誰在国王宮廷中势力大，誰在法兰克王国中势力就大”。由于这种情况的結果，613年时，地主貴族，采取使貴族領袖兰登·丕平永久占取宮相职位的方法，获得了王国的控制权了。

地主制度的成长，对自由人的状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第五世紀末期，当法兰克人进入高盧的时候，在他們中間可能有几千个日耳曼自由人，但是到了第七世紀，自由人的人数显然已大大地縮減了。地主階級的压迫行为、官方的胁迫、由偶然飢荒和疾疫所引起的“艰难时期”，首先那两次长期的內战時間(573—613年和674—687年)的混乱状态，使很多自由阶層的人降到了农奴的地

位。那些在国王、他的官吏和他的朋友手里的大地产,在相比之下,使那些在自由人手里的自由地成为微不足道;这种情况不仅使自由人看来显然比新地主低下一级,而且也提供了机会可把自由人降到依附他们的有势力的邻人的地位。后一项过程,徐徐发展着,直到墨洛温朝后期才成为普遍。普通自由地和大地产之间在早期虽已显然有着差别,但是,大多数自由人,看来还是保持着独立地位的。长期内战,一方面对弱者和无保卫力者来说,是有破坏性的,另一方面对强者和拥有自然的财产资源和私人扈从的人来说,倒是有利的。这种小自由地,在简朴的状况下,原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可是,现时在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在重税负担的压迫下(大多由于无数次战争的消耗而产生的结果),已不复能满足土地所有人的需要了。又当安全保障实际上已经消逝的时候,自由人遂需要私人的保护;因此,头脑简单的自由人不管什么条件,竭力取得有势力官员或富裕地主的庇护。由于屈服于这双重压力下,大批普通的自由人把自己的土地让与一个附近的地主,然后依“请求方式”再收回这些土地,或者领取那个地主的别的土地。这样一来,地主在附近的村庄社会内赢得了控制权,而且有时竟顺利地使整个一个村庄降到他的庄园附属地的地位。自由人所以这样地放弃了他的土地,也许不是经常出于自愿的。在国家官吏所提的他们属民所遭压迫的例证中,常常提及“强占别人的土地”的事件。

另一类成为地主的佃农的自由人,包括着那些原来自己没有土地的人。国王对未被占据的土地的要求,剥夺了农村社会向外扩展的机会。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或者把一块全部仅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自由地,分给几个继承人,或者是使居民中的一部分人没有土地。这些无地的自由人,在地主的大庄园上找寻雇佣工作而成了农奴。

在墨洛温朝时期，仍在使用“請求方式”的羅馬办法和羅馬名詞。其原因可在后期墨洛温王国内所存在的状况里找到。小土地所有者“委身”于大地主的保护之下，因而成了这个領主的佃农，正是在这一种关系中，我們可看到那封建时代的宗主和附庸間关系的开端；无地的人沉淪为农奴，因为不仅个别地而且整个自由村庄被大地主并吞了；这是第八、第九和后来世紀的庄园制度的起源。这批人遂和羅馬后期的隶农与“外来的隶农”相混淆了。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地主获得了一群忠心的随从以及一批管理他的庄园的職員，另一方面使那些沒有土地的人或者宁願以一种不安定的自由权来換取一种安全而更有利的依附地位的人获得了一个保护人和生存資料。自由小土地所有者之所以淪落到依附佃农的地位，可从墨洛温朝后期的經濟困迫的状况里得到正确說明。

有必要指出，地主階級在王国北部（在奧斯特拉西亞）比在任何別的地方都强大。村庄的名字一般地直到第七世紀才出現便是一个重要証明；那表明了从那个时候起，村庄和庄园生活才开始成为一个固定的經濟单位和社会形式。这些名字往往是从地主豪族的名字得来的。但是，在罗亚尔河以北，一直延伸到日耳曼地区，可以看到象-海姆（-heim）、-豪曾（-hausen）、-因根（-ingen）这一类地方名字的尾詞；这可以使人相信，在这地区日耳曼人占領的地方比起南部要多；的确，从很多其他資料我們也可知道这一事实，特别是从一种語言学性質的資料。在这些不自由的庄园村庄中間，插入其他日耳曼自由人的村庄，后者保存了古代日耳曼村庄社会的社会性質和經濟制度，直到被卷入封建制度圈子里为止。

在农奴階級的下面，还有着大量奴隶人口，他們是从羅馬文明遺留下来的，但也包含着一些日耳曼奴隶。这些奴隶的大部分，也和农奴一样，是田地上的普通劳动者。其余部分，是在富有的业主的田庄上和庄园住宅內的家庭奴仆。从这个时候起，农奴和奴隶

階級混淆起來了,或至少是界限不清了,而他們的命運也變為同樣痛苦的了。主人對他的奴隸有生殺之權; 儘管 643 年的夏龍宗教會議禁止了把基督教奴隸出售到王國以外去, 然而國內和國外奴隸貿易仍很興盛, 釋放奴隸的事情是稀罕的。在奴隸地位下降中, 幾乎只有一件事實, 是具有進步性的, 就是, 准許奴隸結婚, 以及不復把奴隸的子女認作私生子。從流傳下來的遺囑文獻里, 我們可看出這時代的社會態度: 在文獻里把農奴和奴隸並列作為財產, 雖然嚴格說來, 只是奴隸屬於動產範圍, 并把奴隸和農奴的子女象小狗或小猪般地混合在一起, 看作一窠之畜或一窠之雛。

撒利克法典, 即法兰克人的法典及教會的立法, 都指出: 墨洛溫時代是一個艱難而又強暴的時代。在 418 條法律中, 有 343 條是禁止犯罪的, 主要是在農業社會里一般侵害人身的罪行。在侵犯財產的罪行中, 盜竊牲口最為普通。刑事訴訟程序是按照下列三種方式之一進行的:

(1) 宣誓證明制。按日耳曼舊法律, 法律上的證明基本上是以用宣誓來証實的供詞的價值為根據的。被告無須提出証據, 說明他對所控的罪行沒有犯過; 但必須宣誓說, 自己是無罪的, 並必須獲得若干其他叫做“證明者”的人來共同宣誓, 不是因為他們知道他是無罪的, 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他所說的話是真實的。

(2) 神意裁判法, 即用熱鐵、沸水或投入深水的方法來審判。當宣誓證明還不夠的時候, 就採用神意裁判法; 理由是神力會暴露出被告的聲明是否真實。凡是拒絕受這項考驗的人, 當然, 就是承認有罪。關於冷水的神意裁判法的心理是極其奇特的。如果被告有罪的話, 水不會接受他, 因而他會浮起; 如果他無罪的話, 他會沉下去。這的確是一個左右為難的處境; 如果他浮起而免于溺死, 他將作為犯罪論而遭受處罰; 如果他溺死, 他被信以為無罪者, 而象正人君子一樣地永遠留名。當然, 事實上, 冷水的神意裁判法往往也

未曾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

(3)决斗法,即搏斗裁判法,有时叫做上帝的裁判法;理由是无罪者一定会获胜。这最后一项方法只应用于自由人和贵族中间;因为农奴和奴隶都是不准带武器的。

“蛮族法典”的一个特征,是贖杀金(wergeld)制度,即为犯罪而繳付罰金的制度,而这制度在法兰克人方面实行到过分的程度。这些罰款都分門別类地分成等級;对于一只手臂、一条腿、一只脚、一只眼睛、一个指头、一顆牙齒的損伤,各应罰付多少都有規定,这些都是古代日耳曼人的办法。对犯罪的类型,教会加上了瀆神罪、强姦(尼姑)罪、巫术罪;国王还加上了叛逆罪。在这些处罰里,社会特权是被慎重地保护着的。暗杀或伤害一个法兰克人比暗杀或伤害一个羅馬人处罰得要重;同样,杀害一个貴族比杀害一个自由人处罰得要重;杀害一个自由人比杀害一个农奴或奴隶处罰得要重。

由此可見,法兰克制度,在政府的形式方面和社会的結構方面,都包含着封建制度的要素;但这是初步的沒有常規化的封建制度。这些制度有的是起源于羅馬人的;其他是起源于日耳曼人的;虽然严格說来,它們产生于古代文明的政治、經濟、社会的衰落状态多于种族的根源,因而它們是过渡性的现象。

墨洛温朝諸王曾努力保持他們在高盧所見的羅馬課稅制度,但成效甚小。羅馬人所遺留下來的財政制度已逐漸消灭。無論在征收老的照例的賦稅或建立新的賦稅方面,都有困难。两种在殘缺不全形式下留存的賦稅,是土地稅和通行稅。由于豁免权的存在,征集稅款大多已被弄到无法办理的地步。羅馬“關稅”原来是按值抽2.5%的稅,而現在蜕化为对一切商业運輸差不多是任意加稅了;商品和運輸工具都須繳稅,象下列法律名詞所指出的那样:桥梁稅、車輪稅、徒步或小販稅、河岸或登陸稅。关于土地稅,法兰克人接收了那保存于城市档案中的羅馬土地丈量冊,但是它的征稅机构十

分复杂，以致法兰克人不能理解。从开始起，法兰克人自己已拒絕繳付土地稅，所以土地稅只在羅馬居民中才可征收。而且，当地主貴族不論羅馬人或法兰克人，变为更有力量的时候，他們就拒付这样的賦稅了。580年时，紐斯的里亚国王曾命令修改土地估价法，但是貴族起来反抗这项重新估价的企图；由于困难丛生的結果，契尔柏立克遂亲手把土地簿册付諸一炬。羅馬的土地稅不知不觉地蜕化为一种封建貢賦，那是由貴族以貢稅(taille)的名义对佃农的土地所課的稅；这样一来，它就轉入封建制度內了。这些古代的土地丈量册經過相当時間以后，失掉它原来的面目，以致它們和后来的寺院統計簿間有什么关系是可怀疑的。

关于商业方面，如果認為日耳曼人的征服高盧立即使商业归于破毀，那是錯誤的。羅馬帝国的物質文明对蛮族的影响，曾予抵抗。貿易、工业和城市生活慢慢地萎縮下去或变动了，可是，沒曾有过突然崩潰的情况。过程是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

在墨洛溫朝統治时期，高盧和东方的商业关系沒有中断。馬賽、那旁、阿利斯依然是南法的主要港口。东方和西方的商品交换看来还是相当頻繁。当时的資料指出，在重要城市里，还有相当多的商业活动。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延續着羅馬时代所存在的情况而已。法兰克王国政府毫无更动地接受了羅馬人的公路制度；我們知道在第六世紀或更早时期，阿尔卑斯山是經由大圣伯尔納德或小圣伯尔納德山路越过的；从馬賽到热那亚的全部沿海道路是經常使用的，虽然沒有疑問，当时的战争曾产生一些混乱。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和南高盧保持着經常的联系，并由于羅馬道路的存在，比利牛斯山可在两处通过。除了羅馬大公路以外，还有很多次要一些的道路，来联系各个城市。当然，这个时代的商业，不及高盧-羅馬时代那样活跃，有些过去活跃的商业中心在蛮族入侵时期已經毀灭；但是也必须指出各个地方情况的特殊原因。北法

比南法农业发达,而当时的工业主要是农业的附屬品。

我們有文献可証明:法国的南部和中部城市的商业是很繁盛的,因为来自东方的船只把那些远方国家的主要产品源源运入。意大利、希腊、叙利亚和埃及商人云集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里,他們甚至远达高盧的北部。很多大商业是在犹太人手里,而他們在法国的南部和中部的人数,是很多的。看来很奇怪,这批商人似乎是很愚昧的。有人告訴我們,他們不会写字,他們僱用抄写員替他們写信和記帳。主要的进口物是小麦、酒、油、枣子、香料、胡椒、生薑、沉香、象牙以及絲織品,而很多絲織品是由僧侶使用的。关于高盧的内部商业和工业,缺乏正确的資料。可能,在帝国时代,有些城市的重要工业已經消逝。我們还知道一些关于比哥尔的紡織品以及加奥尔的亚麻布。

地方市集把乡村居民吸引到城市中去,我們知道,其中有些定期市集有着很古老的起源。关于巴黎市集、特罗伊市集以及加奥尔附近的市集,在墨洛温朝文献里,已經說及。629年时,达哥伯特曾建立圣登尼斯市集。随着寺院数目的增加,市集也越来越多了。这些市集是在圣徒节日举行,有时还在紀念圣徒的教堂前面举行。由于道路不安全和各地通行稅激增,商业經營越来越困难了。在羅馬时代这类通行稅原是用以改进道路、建筑棧道、建造桥梁、修理公路的;但是,在法兰克时期,它們丧失了这些原有的特性,而公共收入归入了官吏或当地貴族的私囊。法兰克国王和貴族的无知与貪婪心理使这类課稅增加了。的确,偶然有过一个官吏曾提出抗議,而至少有一次,克魯太尔二世曾被迫取消其中若干弊端,并恢复了古代的征稅制度(公元614年时),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地方的篡夺行为和特权繼續增加;教会和寺院遂得利用特权来征集稅款。

由于盜賊橫行,路上往来很不安全,特別是当时散布在高盧的

很多森林邊緣的道路；这种不安全情况曾迫使商人們結队或在护送下旅行。可是尽管不安全，这些道路显然还有工人、手艺人和小販时常来往；他們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現款藏于挂在他們頸脖上的小袋里。他們在夜里寄宿于那时城市內、私人住宅內或寺院內所設立的旅舍，如果他們幸而走近一所的話。有一个奇怪的事实：旅行者宁願走羊腸小徑而不願走羅馬的康庄大道；其原因是双重的，一来可安全得多，二来可少受通行稅的勒索。这种說法可从发现古代遺物的路綫，获得証明。商人們喜欢走水道甚于陆路，而当时的商业使用着羅馬人所熟悉的船舶車輛，正象都尔·格列高里及福图內塔斯所說的那样。工业除了在南法以外，主要是那些附屬于农业的工业，象硝皮工、制革匠、木匠、織工、陶工各业那样，或者是附屬于宮廷的工业，象金銀匠那样。这些行业，都是用拉丁名詞标志出来的。文献还說及石匠和雕石匠。我們看到他們修理城市的牆垣、城中的引水管以及建造一所教堂。我們不能断言这些工人屬于那一阶級，他們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

在法兰克时代的早期，城市既不是象古代城市，也没曾披着象它后来所具有的特征的外衣。尽管它是萎縮，但在城市居民中，还有着很多社会等級。法律虽把所有的等級混合在一起，然而我們也有可能把他們区别开来。除了高級王室官員以外，还有地方望族以及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从事工商业的自由人。在旧羅馬商业集团中，有的是勢力雄厚的。600 年时凡尔登城的公司曾向国王借得七千金币。叙利亚人、东方希腊人以及很多犹太人还是在經营商业。奥尔良城的岡特雷姆入口处指示我們：在高盧中部，甚至在一个城市中，要說各种不同的語言。

甚至在这早期，我們已可看出那些注定要改变城市生活性質的重大象征。那在帝国的末期已进行的經濟革命，在第六和第七

世紀中还是在发展着。随着城内人口的縮減，我們开始看到市內有空地、花园和果园。文献証明了这些葡萄园、花园及果园和房屋同时并存。这一事实在战争时期，是一个严重的弱点。但是，在十一和十二世紀人口再增加的时候，这些空地必然是很重要的。

法兰克高盧的基本居民，屬羅馬世系的和从日耳曼起源的，是专门从事农业的。法兰克人大多从羅馬人方面获得了他們的农业知識；在庄园制度成立以后，在日耳曼村庄丧失了它們的自由并降到庄园的地位以后，我們看到庄园的耕种方法怎样影响了日耳曼村庄的耕种方法。羅馬的影响从植物、水果以及农具：犁、耙、貨車的各种名字方面，显然可見。葡萄是由高級奴隶来种植的，那保护他們的贖杀金，可資証明。牲畜牧养在法兰克人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尽管有豺狼为害，牲畜群还是很多的。香宾盛产羊，德意志盛产猪。乳酪的使用显出了一种拉丁的影响。德文 Cheese（干酪）一字是从拉丁文 caseum 得来的。“白脫”(Butter)也是从拉丁文派生出来的。几百年来，羅馬人遵守着耕种的“两田制”以及长方形田制，而日耳曼人保持着他們村社祖傳的田地“长条制”。甚至这些自由村庄退化到庄园村庄以及庄园制度的財政压迫都不能使这些历史悠久的耕作方法完全融合在一起或有所改变。

最专门性的、最精細的、最有利的农业形式，是葡萄种植。哥特人在第四世紀已从羅馬人学会了飲葡萄酒，并在他們占領西班牙和意大利时期发展了这种嗜好。法兰克人當他們进入高盧的时候，看到遍地都是葡萄园，特别是在罗尼河、瑪恩河、摩塞耳河和格罗内河各流域。

然而，在入侵时期，精耕細作在日耳曼人中間是非常少见的。据我們所得关于巴伐利亚人和斯瓦比亚人的资料，他們对葡萄园尙一无所知。“撒利克法典”曾提及那久已从事的葡萄栽培业，可是葡萄酒的釀造还是在低級阶段。羅馬人是法兰克人的导师。在

第四和第五世紀,当薩利安和河濱^①法兰克人住在萊茵河沿岸的时候,他們很少从事高級农业——只有少数花园和葡萄园。葡萄种植业,在河濱法兰克人中間,直到第六世紀当它在波恩周圍已变为重要的时候,仍不普遍;即在那时,薩利安法兰克人尚以为葡萄属于奢侈品一类;約在 200 年后,他們才从事葡萄种植业。起初,葡萄种植业只是被看作一般农业的一部分,到后来才認識到它的特殊重要性。

当时,有人曾想出各种方法,使当地所产的葡萄酒味道美好,如燒煮、加香料等,可是,沒有疑問,其中有很多一定是很坏的。因为外国葡萄酒日益昂貴起来,貴族,世俗的和教会的,曾想法把葡萄帶到他們的土地上种植。尤其是僧侶們,他們为了圣餐,需要葡萄酒;于是寺院象其他地方一样,变成了主要种植者。僧侶們开垦荒地,种植葡萄,并教导其他的人怎样去种植。凡是不用于自己消費的葡萄酒,便送往市場上去出售。不久,他們不但滿足了当地葡萄酒的需要,而且还給予商业以一种从来沒曾梦想到的刺激力。

从后期发展看来,萊茵河和摩塞耳河流域的葡萄种植业最为重要。但是,在中世紀时代,还有大批葡萄园在其他地区兴起;虽然为期不长,但这里也值得談一談。其中最重要的是多瑙河沿岸的那些在羅馬时代开始培植的葡萄园。在斯瓦比亚,最初有葡萄酒是在 716 和 720 年間。在巴伐利亚,第一批长成的葡萄,是在慕尼黑附近的加斯太堡;那是由弗萊兴主教在 724 年移入那里的。在瑟林吉亚,葡萄最初是在 786 年生长在多道夫地方。最受欢迎的是夏龙、馬康、第戎以及摩塞耳河区所产的葡萄酒。貝稷亚的葡萄酒,也是受人欢迎的。西班牙葡萄酒甚至在南高盧都很著名,而薩拉哥撒产的葡萄酒,最受欢迎。意大利,甚至东方,輸出稀有名

① 河濱(Riparian)法兰克人,指第四世紀移居于萊茵河畔者。——譯者

酒,例如加沙的葡萄酒;喝这种酒一般是要加水的。法兰克人在冬季,常飲热酒。都尔·格列高里曾提及酒和蜜的混合飲料。在北高盧和德意志,啤酒是更受人欢迎的飲料,在那里法兰克人消費了大量啤酒。我們不知道,什么植物曾用作酵母,因为忽布球果直到第九世紀,才輸入那里。啤酒中也混合着蜂蜜。当时的作家还曾說及用芬芳植物,如玫瑰花和水果一类所制成的飲料。这是一种永远保存下来的古法。

尽管受到羅馬的强烈影响,法兰克人的社会生活,依然是很象日耳曼式的。男人只留上唇的鬍鬚。大部分法兰克人繼續穿日耳曼式的服装。只有很少数的上層分子装出羅馬人的式样。甚至在富人中間,也很少有人能够买得起絲綢、金綫編帶和綉花的奢侈品以及叙利亚的紅皮鞋。在房屋建筑方面,富人采用或模仿羅馬人的別墅式样,有寬敞的房間,周圍有花园和草坪为邊緣,还有貨棧、馬房、谷倉、附屬房屋以及奴役間。这整个一組房屋叫做“田庄”(hof)。法兰克农夫住在树枝和蘆葦搭成的小屋里,但是羅馬血統的农夫一般是建造石头小屋的。孤单的石屋,往往用一条沟渠和木柵来圍繞着,构成一所“田舍”(curtis),那在整个中世紀仍是小业主住宅的普通形式。今天德文中关于造屋的詞汇,都是从拉丁文得来的;例如,窗戶(fenster)、石灰(kalk)、房間(kammer)、柱子(pfeiler)、阳台(söller)、磚瓦(ziegel)。

当高盧的商业繼續沿着羅馬的老路进行的时候,东德意志的商业由于法兰克人連接了高盧和德意志,扩展到了超出以前羅馬帝国的范围。当时还在野蛮状态的瑟林吉亚人和薩克森人經營着毛皮和皮革、蜂蜜和蜡的生意;直到第八世紀,他們才有高級的商业。瑟林吉亚人是以貂皮来繳付貢物的。当时,法兰克人的貿易甚至越过易北河及扎勒河而达德意志边境以外。

在这个时期,可以从亚得里亚海向北到丹麦划一条綫把欧洲

分为两部分,即斯拉夫人的东方和日耳曼人的西方。可是,尽管这两个种族互相敌对,看来从法兰克时代早期起,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間却存在着某种数量的边境貿易。日耳曼人希望扩大商业,这是他們向东扩展和征服斯拉夫人的一个重要动机。有人提及早在第七世紀上半期,已有冒險的法兰克商人曾深入斯拉夫人的荒野,来換取奴隶、琥珀、獺皮和貂皮。

在达哥伯特一世时代(629—639年),有一个被称为叛徒的法兰克商人,名叫薩摩的,同异教的波希米亚人、摩拉維亚人和克倫地亚人建立了商业关系;据說,他終于放弃了基督教,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蛮族国家;这一国家的領土从德拉瓦河和西利西亚起延伸到瑟林吉亚的边疆;势力强大,足以打敗法兰克軍隊,地位重要,足以使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来求它結盟。

从下一事件可以得知,法兰克国家和薩摩国家之間,在第七世紀中存在着頻繁的商业接触:631年时某些法兰克商人曾在波希米亚被杀死;于是,达哥伯特曾遣使到薩摩去,而这个不机敏的使者侮辱了薩摩,因而薩摩的确把他赶出了境外。此后,达哥伯特統率了由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甚至从意大利来的某些倫巴人所組成的軍隊,来討伐这个国家;但是,在伏加斯提勃斯一役,遭到了惨敗。薩摩曾完全把异国作为自己的家乡,据說,他至少曾娶十二个妻子;如果我們相信弗雷德卡的話,他有二十二个兒子和十五个女兒。他統治了三十五年。在他逝世后,他所統一的領土似乎又按原来的构成部分分裂了。

在下一世紀的《斯图密的傳記》里(他是邦尼非斯的門人,弗尔达的住持,死于779年),曾指出一条經常的貿易路綫:从扎勒河越瑟林吉亚森林而达馬因斯。然而,这种法兰克权力的东进趋势,主要并不是起因于商业上的冒險,而是起因于內部經济社会力量的扩展要求。因为地主制度日益发展,那些被剝夺和被驅逐的人

們曾避到森林中去，在那里开垦荒地，并建立一个新住所。森林成了穷人的家。但是，私有财产权的繩索也逐步纏繞着森林了。从勃艮第和西哥特的法典里，可以看出私人占有制侵犯了森林的痕迹。佛日山上的森林在都尔·格列高里时代(約 600 年)，亚尔丁山上的森林在第七世紀早期，都开始被侵占了。

那种有势力的地主貴族，即領主的兴起，是在墨洛温朝后期的一个发展，也是当时正在成长的封建趋势的一种表现。領主經常是某一地方的領主。这个階層在奥斯特拉西亚力量最强大，是属于法兰克族的而非属于高盧-羅馬族的貴族。564 年时，他們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当时奥斯特拉西亚的息泽柏特同他的弟兄紐斯的里亚的契尔柏立克作战，他曾請求萊茵河彼岸的部族来支援他，并以塞納河沿岸他已征服的城市贈給他們，作为酬劳；那将会等于又一次日耳曼人占领东北高盧的战争。但是，奥斯特拉西亚的貴族反对这样做，而他們的抗議获得了成功。在两个兇狠的女王，布伦希德斯和弗雷艮德斯之間的长期斗争中，地主貴族扩大了他們的权力。613 年时，地主貴族，由兰登·丕平代表，占夺了宫相职位的控制权，于是他們成了控制王室的力量。这种新形势等于一次政治社会革命，使奥斯特拉西亚的大地主获得了对王室的控制权。此后，墨洛温朝諸王居“統治”之名，而沒有治理之实。除了 656 年和 687 年間的一段时期外（在这时期反对宫相擅权的行动暂时得到了胜利），奥斯特拉西亚的公爵一直控制着法兰克王国。赫斯塔尔·丕平(687—714 年)、查理·馬德尔(714—741 年)和矮子丕平(741—768 年)依靠地主貴族并为了地主貴族，治理着法兰克王国；最后，于 752 年，矮子丕平廢止了契尔得立克三世而自己戴上了王冠；后来他的兒子查理曼使这个王朝非常光輝燦烂。

墨洛温朝的傾覆和 752 年矮子丕平的登极，不仅仅是一次政治和王朝的革命；奥斯特拉西亚族由于长期控制宫相职位，因而替

代了墨洛溫朝。那也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和經濟的变革，因为現在大地主貴族已經完全得势。法兰克的政府、社会和經濟，在精神上，在形式上，都已成为半封建式的，虽然当时还未曾想出“封建”这个名詞，来表明这种新形态。喀罗林时代是以政府和社会确立在那可以称之为封建貴族組織的一个基础之上而著名的。这项改变是奥斯特拉西亚巨头的权力逐漸增长而必然产生的。

如果我們把弗雷德卡的門人对第七世紀世界的陈朽情况所发出的悲觀論調和喀罗林朝早期历史家的証明作一比較，“我們就可認識到在第七世紀中欧洲达到了怎样的一个低潮状态，而奥斯特拉西亚的征服和改革带来了一个多么偉大的复兴”。

法兰克王国的真正权力泉源和重心是在北部，即在奥斯特拉西亚。查理·馬德尔依靠奥斯特拉西亚巨头的支持，曾把奥斯特拉西亚、紐斯的里亚、勃艮第和阿奎丹各分裂的王国統一起来。而且，北方——不是南方——是一个真正进步而有建設性的政策的中心。征服异教的法里西亚，贊助邦尼非斯在东德意志的偉大傳教和殖民事业，如創設弗尔达、赫斯斐尔德、阿莫尼堡各地的寺院以及建立弗萊兴、爱尔福特、弗里茨拉尔各地的主教区，都証明在第八世紀法兰克民族向外扩展和行政管理的力量都还很强大。

这过程由于薩拉森人的入侵高盧而加速起来；其中都尔战役（732年）和亚威农及尼姆的圍攻（737年），都是主要的战事。南高盧各省的罗曼語居民，特别是在布罗溫斯省的（那里的地主阶级不及北方的那样有势力），早就憎恶法兰克人的統治。在这种場合，种族和社会的矛盾发展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以致有些南方的主要貴族对穆罕默德教徒的推进，竟視若无睹。因此，查理·馬德尔的軍隊几乎全部是从講日耳曼語人数較多的北方，抽調出来的。752年的王朝和政治革命証实了法兰克地主貴族的胜利。使封建主阶级权力增长的另一原因，在于馬德尔运用了下列的軍事策略：征用

那些屬於教會主教區和寺院的大批土地，並把它們作為采邑來賜給他的支持者；這一措施保證了他們對政府的支持，也實質上造成了貴族的中央集權。這種行動是激烈的，但在緊急狀態下，却是可以採取的，雖然教會曾指責它是“掠奪行為”^①。

馬德爾所採行的這項措施，只不過是為了政府的利益而利用那教會久已使用過的辦法而已。這是一種出借或租借的制度，把土地租借給人，取租的或不取租的，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承租人耕種它們並占有它們的用益權。這叫做恩賜地制度，而所以授予承租人耕地是為了恩澤。如果把土地授予僧侶以取得他們的支持，那是不取租費的，而這樣贈與的土地叫做“農場”。如果租給俗人，那是收取租費的，叫做“恩賜地”，那成為後來封建采邑的起源。查理·馬德爾原作為緊急措施所採用的辦法，後來成為喀羅林政府的一個經常制度。王室以教會土地和王室土地分封出去，這樣，整個貴族階層，世俗的和教會的，由於這些封地所產生的義務而受王室的束縛。

另一與這政策近似而會產生更多流弊的辦法，是把教會官職從那時起越來越多地授給俗人——當然連帶授給他們處理所屬教會的收入之權，為的要把教會資產用於世俗的目的。這類“俗人”住持和“俗人”主教，只在名義上是教士；他們所有的想法和愛好都是封建式的。這樣一來，教會和世俗間的距離縮短了。教會封建化了，並且加入了當代的封建體系。作戰的主教和作戰的住持連

^① “看來查理·馬德爾在遭遇到困難局勢而做的事情，的確不是對教會財產一般地下令沒收。關於這點，他似乎曾受到不公平的譴責。但在許多場合，他曾使用那在理論上屬於王室的收回贈與的權利，為的要从這裡的主教區或那里的寺院取得土地把它們贈給勇敢的將領；他派遣這批將領去統治遼遠的省分，擔任郡守或抵抗弗里西亞人或薩拉森人。在這樣的許多場合下，土地的真正使用權並不會變更，但這‘恩賜地’租種者被指令不把他們的地租（用我們的名稱）繳給教會而應繳給郡守”。——霍治金，第七卷，第61頁。

同他們的扈从都被編入法兰克軍隊里；軍事艺术成了主教一項重要才下。随着這項新政策，“兼職制度”的流弊接踵而来了。查理·馬德爾的忠实朋友和支持者迈罗，“只因剃去头发而是僧侶，”曾充任两所寺院的“俗人”住持。他的侄子雨果甚至还不止于此，曾担任五所寺院的住持。

如上文所說，那在后期羅馬帝国和早期蛮族时代成长起来的庇护制度，在法兰克人时代，获得了以前未曾有过的一种形式和固定形态。在这时期，封建制度胜过一切，并渗透一切。地主貴族一心要在庄园牧师区内保持教职授予权。地主委派他們所需要的人充任牧师，正象他們指派他們的管理員和管家一样；他們控制牧师区内的收入；他們保留对牧师区财产的所有权完全象對他們庄园上房屋的所有权一样，他們出售、遺傳、或随意用別的方式讓与它們。对这种弊端，查理曼无力管理，更談不上取消了。他曾七次嘗試，而七次宣告失敗。所以，封建制度維持了多久，这弊病也繼續了多久。

但当法兰克国家这样地經受革命的变更，从而封建的政府形式、封建的社会結構、貴族的中央集权制替代了散乱而又无效能的墨洛溫朝制度的时候，一个性質上迥然不同的外部革命，一个不利于西欧“基督教国”經濟情况的革命，也在第八世紀中发生了。这是薩拉森人对地中海区的征服。759年矮子丕平曾占領那旁，并把薩拉森人逐出高盧境外。但是在697年薩拉森人征服了迦太基，711年征服了西班牙，于是他們获得了基地，来經常进攻西西里（664年、740年及以后常常进攻，直到831年占領巴勒摩、843年占領墨西拿为止）、撒地尼亚、科西嘉以及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带；由此而产生的結果，使地中海区的基督徒商业破坏不堪，直到十一世紀为止。最近西欧获得了一个写在埃及“草紙”上的文献例証，那是屬於787年的，从这例証，我們可推論：那个时候阿拉伯人阻

碍地中海交通的力量已日益加大。到了第九世紀中期，伊斯兰教成了一个强大无比的地中海强国。

与伊斯兰教对西方商业封鎖地中海的同时，喀罗林朝国家成为一个沒有外国市場即沒有过去繁盛的东方貿易的国家，一个由地主貴族統治的几乎全部是农业經濟的国家；这两种事件的同时发生，絕不是一种偶然事件。两者之間是有着联系的。从經濟观点看来，喀罗林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在墨洛温朝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講还有古代羅馬的商业和貿易习惯。在喀罗林朝，这些状况都已消逝了。到第九世紀，那原为高盧最富饒省的布罗温斯变为一个最貧苦的省了。在那里，叙利亚人的居留地已不复可見。科比的僧侶們曾长久享用从福斯港口所得的大量通行稅的收入，到716年，則錢袋里已是空无所有了。馬賽降为杂草丛生的港口，終于湮沒无聞約有200多年之久。除了貿易衰落以外，还有下列其他各种証据，說明法兰克境内經濟状况的显著变动：墨洛温朝的人头稅已經取消，城市已在萎縮状态，商品已不流通而具有地方性質。农业活动几乎已占压倒商业活动的上风，一种消費經濟已代替以前(至少部分的)交換經濟，关稅已蜕化到地方的、专橫的通行稅，造币厂和市場已合并在一起，而墨洛温朝的虛金本位已引人注意的轉变为实际的銀本位；因为，如果喀罗林国家和流行苏里德金币的地中海地区保持着一些联系，喀罗林朝諸王会把貨幣单位降低到它以前价值的三十分之一的。下一商业名詞的更动也足以表明喀罗林时代西欧改变了的經濟和商业情况。古典拉丁字“emere”（“購買”）已不可复見，而代之以“comparare”，意即“物物交換”或“討价还价”。“mercator”“購買者”变成为“comparator”（“商人”），“forum”（公共集会場所）变成为“mercatus”（“市場”）。

法兰克人的貨幣制度是一个复杂而又專門性的論題，这里无須深入討論，除非币制的改变反映出商业的逐步衰落和經濟的逐

步转变情况的地方。当法兰克人和罗马人接触的时候,他们熟悉了君士坦丁所制定的罗马币制;依据这币制,九十六便士合成一镑。十七世纪所发现的契尔得立克的库房证明了这一点。但这是货币史上的一件奇事:墨洛温朝诸王既然采用了罗马币制而又放弃它,恢复旧的克尔特金银货币制,象凯撒所曾改动过的那样;对于凯撒的金币,从莱茵河到喀尔巴阡山,远达多瑙河区的日耳曼人,在入侵之前,已经熟悉。对这种货币,法兰克人渡过莱茵河后,首先知道。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即墨洛温朝的苏里德币恰等于旧金币的一半价值,当然关于辅币的价值,也有相应的改动。必须知道,这变更不是一种货币的贬值,而是认为使用小货币作为购买工具比大货币要方便;换言之,这证明了在公元前第一世纪和公元后第六世纪之间的700年时期中,货币的购买力已大大地增加了——也许增加到50%。墨洛温朝政府已不是完全蛮族的,因为它能够察觉到在几世纪中逐渐发生的经济变革的性质,还能够实行这改变,并且使旧的日耳曼的赎杀金配合于新的情况。

撒利克法典里的和解费和罚款的等级表明白地指出,有一种旧的货币情况曾一度存在过;罚款在第七世纪中必须予以修改,使它们配合于新的货币情况。这说明了为什么经常重复这样的词句,象“六百地那(便士)合十五先令”,“二千五百地那,就是六十二先令,”以及“一百二十地那合三先令”。一百头牲口定价为二百金苏里德。银币是用以付小笔款子的。这种货币是银地那或银币,四十银币合一个罗马金苏里德。黄金对白银的比例是约一比十二。至于货币在第六世纪中的购买力,则难于作出估计。如果说罗马金苏里德约值五美元金币,而一头母牛,上文已提过,定价为二金苏里德,那末一头母牛在第六世纪的价值则将是十美元。今天甚至一头平常的母牛在市场上也许可售得一百美元。因此我们可作出结论:金钱的购买力在第六世纪比起现在至少要大十倍。

在墨洛温朝时代,黄金还是在流通,但是数量越来越少;部分因为它由于貿易而流到东方去了,部分因为时局的不靖引起了窖藏貴金屬的风气,还加上了有大量黄金“冻结”于神圣器皿和教会的飾品方面。到第八世紀,黄金不复出現于公众的眼前;这种情况一直繼續到十一世紀为止。关于这种改变的經濟上的倒退性質,上文已經提过。黄金完全不出現的情况使喀罗林朝采取了一种新币制。墨洛温朝的貨幣(苏里德),如上文所述,原是以四十便士作为一先令为基础的。矮子丕平发行了一种合十二便士的新苏里德,然而有理由可相信,这种贬价不象看起来那样剧烈,老先令經過腐蝕耗損,似乎实际上已經減值,而且,由于黄金流通量的縮減,白銀的經濟价值已經提高。尽管老苏里德合四十便士,新苏里德合十二便士,而真正的結果也許是:把新先令提高到老先令相等的价值或差不多相等。这第二次以白銀来代替黄金的币制变更,使改动“贖杀金”制成为必要,因而产生了法兰克社会上各等級地位的一个重要調整;而且,这改变証明了在貨幣購買力方面此时有些突如其來的增加;因为象上文所指出,西欧的對外貿易被地中海上穆罕默德教的領海权所破坏。試以目前的情况来作一比較,如果說金錢的購買力在墨洛温朝可作為一比十,它在喀罗林朝也許可作為一比十二或还少些。农业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工商业越來越趨衰落,“自然經濟”越來越占着優勢,所以罰款常常以实物即产品來繳付,虽然在帳上还記着实數現款。換句話說,一个人是用值多少先令的牛羊,用值多少先令的谷物等等,來繳清法院的罰款的。

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欧洲的著名币制是起源于第八世紀的經濟变革以及早期喀罗林朝的立法;这种币制是:十二銅便士合一銀便士(即先令),二十先令即二百四十銅便士合一鎊。但是鎊不是硬幣;它只是一种价值的标准。銀便士即先令是流通着的最大硬幣。

喀罗林朝的賦稅制度,和它的币制一样,反映出当代改变了的

經濟狀況。上文已說過，墨洛温朝已看出不可能再征收羅馬的土地稅。貴族拒絕繳納它，而僧侶享有它的豁免權。但是，貴族和僧侶把自己所拒絕繳付的稅，却向他們的佃農征收；到了第八世紀，土地稅已成為莊園化的稅，即由每個莊園主從他的土地上的住戶征收的稅。在同樣情況下，雖然在第九世紀以前還沒有達到同樣的程度，關稅或商業稅也已經成為一種莊園主所征的稅。簡言之，在喀羅林朝時代，幾乎所有的進款都由地方當局征集，也由地方當局用去。很多今天認為屬於公共性質的服務，象道路、橋梁一類的國內建設，當時不認為是國家義務而認為是地方義務，作為強迫性的地方服務即勞役來執行的，並且是由業主加在他們的佃戶和依附者頭上的。所有的軍役是由承擔者自己開支。政府什麼東西也不供應。“軍役稅”也許是人民所負擔的課稅中的最苛重者；它的重負壓得很多窮苦的自由農降到了農奴的地位。

19 世紀，當經濟史觀開始使用的時候，歷史家有一種風氣，即把歐洲商業的大復興以及政治的深刻變革都歸功於查理曼。但是，通過細密地、批判地研究文獻之後，我們知道，商業在和農業相比之下，在喀羅林朝復興里並沒起重要作用。的確，查理曼的立法對帝國內的商人表示關切。但關切所及的範圍是狹窄的。在查理曼時代，所有的獨立經營的商人都不是屬於法蘭克人血統。他們都是外族人；市場制度是由於他們享有特權而興起來的。建立市場原是屬於國王的權利，直到第九世紀，封建領主趁法蘭克帝國的分裂，篡奪了這項權利為止。除幾乎專靠商業謀生的猶太人和敘利亞人以外，很少有職業商人，直到法蘭克人征服了倫巴意大利並合併這羅馬國家於帝國版圖為止；這一事件看來曾使那些經營利凡得商品而富有冒險性的倫巴商人，越阿爾卑斯山來和北歐建立了通商關係。阿爾琴的一封信上曾提及一個“帶着商品的意大利商人”，這些商人不是做普通生意，而是以奢侈品供應宮廷、教會以

及最富的貴族家庭。其中有很多人是國庫或寺院的仆從或隨員，象下列公文程式老套語所指出的那樣：“為了某某寺院的应用和需要，”運輸地方產品和地方制成品往聖登尼斯、里昂、根特的聖巴伏和聖齊爾茲等地的市場和市集去，並在那里採購所需要的商品。寺院由於它們的財富和所享有的豁免權，是最活躍的貿易因素。它們的船舶往來于每一條通航的河流，它們的商隊在各重要公路上都可遇到。聖登尼斯寺院在符騰堡的埃斯令根、在亞琛和芒斯特、在塞納河盆地的德勒和愛丹普斯，都有倉庫和市場，還在羅尼河畔的里昂有一所堆棧和市場，在偉恩也有一所市場。

關於喀羅林朝的工業，除了關於象織布、制革、鋸木、打鐵、制皂、釀酒這一類的地方性或家庭需要的工業可資證明外，象商業一樣，其他證明是有限的。所有的高級手工業者象金銀匠、制玻璃匠那樣，受朝廷和教會僱傭，來做建築和裝璜工程，這些受僱者，大部即使非全部，都是意大利的或拜占廷的手藝人。可見喀羅林帝國內一定很少有精巧的本地法蘭克手工藝工人的。

近代歷史家以荒誕而宏大的經濟觀念套到查理曼時代；其實，這些觀念是近代的而非中世紀的商業企業的反映，向後投射于中世紀時代的反映。查理曼曾徒勞無功地企圖征服威尼斯，不是為了使法蘭克人可控制威尼斯的有利可圖的利凡得商業，而是要壓止威尼斯的奴隸貿易，要擴展他的統治權于威尼斯，因為它是倫巴的謀叛者和拜占廷的陰謀者的庇護所。408年時法蘭克人征服了阿佛爾人，那曾被夸大地說成是因為查理曼希望打通到達君士坦丁堡去的那條下多瑙河道路；這條道路從蠻族入侵以來曾被封鎖；但事實上他的意圖僅僅是要征服一個時常侵犯東日耳曼和北意大利邊境的可怕的掠奪性仇敵而已。同樣，查理曼和哈倫·阿爾·拉希德所建立的關係，是為了實現西方基督徒朝謁聖地和聖墓的要求，為了保護往那里去的朝聖者；在這些談判中沒有什麼促進東方和

西方商业关系的观念，作为推动力。至多可以说，朝圣者往往沿途做些生意，而小贩和走单帮者不时冒充朝圣者以求免付通行税；这种舞弊逃税在795年查理曼和奥法所订的著名条约里受到了谴责，其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对于为了敬爱上帝或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愿访问神圣使徒的出身地的香客，让他们安然通行，不受任何干涉；如果有人不是为追求宗教目的而是为图利，杂在香客中间，就让他们在适当的地点，缴付惯例的通行税。

查理曼立法中对公平交易和公平度量衡的注意，基本上也不是为了经济的理由，而是为了道德的理由。在794年，在“艰难时期”的一个年头，查理曼曾颁布他著名的限制最高物价的法律；这项法律的用意，与其说是为了经济目的，不如说是为了救济穷人的苦难，那是由教会制定的一种基督徒的义务。皇帝对于那些抢购小麦及其他食物而进行投机的商人的残酷行为，果然深恶痛绝，但那并不是以他的经济意识为出发点的。很多历史家还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这项限制性的立法是用一个教会会议决议的形式，而不是用颁布诏令的形式发布的。

关于查理曼的注意于维护道路和桥梁，我们也可作出大致相同的解释。他的诏令都是带有这种性质的。但是在这方面，他的基本目的，也不是为了促进商业而是为了保证他的军队又快又有效力的移动。有人异想天开地认为：建造那永未完成的“查理沟”（“喀罗林沟”），即那切断上多瑙河和上莱茵河间狭长分水岭（在弗兰哥尼亚柔拉山的威森堡附近）的运河是出于促进商业的意图。其实，它的主要目的是为设置一条由北到南，并在亚琛和累根斯堡之间由东到西的完整水路；而累根斯堡是整个东南日耳曼的军事基地。那在马因斯跨莱茵河上的大桥，基本上也是一项军事工程。甚至查理曼所爱好的居住地，即宫殿或大庄园宅邸的位置（象亚琛、赫斯塔尔、米尔森、英格尔亥姆、都尔内、狄顿霍芬、尼威根、基尔

賽)也是依据軍事急需而选定的。这些庄园都是沿着軍用大路,排列成为梯形,彼此間隔着适当的距离,在那里供应品的倉庫和馱物的牛馬,是經常准备好的。这些路綫沿着河流从亚琛以及从比利时的國庫庄园密集的地方輻射出去;人們按上述地点就可找出道路。

然而,我們不应因上面的概述而認為查理曼时代是沒有对外貿易的。一个包括高盧、日耳曼、意大利以及部分西班牙的大帝国一定会有而且确曾有过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那些关系自然是和邻近国家发生的,而所交換的商品是屬於有关地区間的自然产物。意大利同拜占廷与穆斯林領土的接触,使它成为利凡得奢侈品的唯一进口地,因为东地中海区由于拜占廷的舰队,而不象西地中海那样害怕穆罕默德教徒的海盜船。但是,南高盧和西班牙“駐防区”的商业則微不足道。高盧的比斯开湾各港口,如貝云和波尔多,是西班牙橄欖油和西班牙栗子的进口港;橄欖油象《圣腓力培伯特》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西南欧方面,在寺院里用作食料,而在教堂里則用作点灯油。东方貨物尤其是絲綢,尽管穆斯林和基督徒間有战事,还通过伊斯兰教西班牙而进入了高盧。奥尔良·帖奥度尔夫詳細地描写了他所亲見的絲綢外套,“染着各种顏色”,并有格外漂亮的式样;他还描写了来自哥尔多华的麻布、羊毛衣料和皮革物,白的、紫色的和大紅的都有。

布勒塔尼、波亚图和爱尔兰之間的貿易关系,上文已提过,早在羅馬帝国后期已經建立,而在第五和第六世紀爱尔兰接受基督教后,更增加起来了。圣科兰班曾搭乘往来于高盧和爱尔兰之間的航船,到达了南特,并带来了貂皮、提籃和陶器。查理曼时代对爱尔兰的外交和商业关系比在墨洛温朝时代密切得多。但是又有一件难事:要分別誰是沿路作生意的爱尔兰朝圣者,誰是真正的商人。这些朝圣者几乎总是和商人們結伴同行的。

当然，我們所知道的关于奥斯特拉西亚、法里西亚和德意志的貿易活动，比关于法兰克帝国任何其他部分的多，因为法兰克政权的总部是在奥斯特拉西亚。查理曼的首都亚琛对莱茵河和它的支流的整个地区来说，位置优越，处在北德意志（薩克森和瑟林吉亚）和北高盧間的交接点上。如果研究中欧的河流系統，我們可清楚地了解喀罗林朝及以后的各商路。因为几乎所有的大路，都是沿着河道的。

在第七世紀中，本尼狄克特派僧侶在法兰克王国的异教的边境上所进行的积极傳教活动，是后期墨洛温朝时代的一个破格，因为这一世紀原是有许多內战的混乱时期。当王国的本部已信奉基督教以后，异教还在边境上苟延殘喘着：在柔拉山和佛日山区，在上繆司河和摩塞耳河流域，尤其是在法兰德斯、不拉奔和法里西亚，在那里滿布着茂密的森林和廣闊的泽地。在这些辽远的地方上，在 600 和 680 年間建造了拉克斯厄、斯达維洛特、麦尔默第、圣巴伏、圣奥麦、圣柏坦、圣里奎尔、圣汪列尔各大寺院，还依次建造了新教会。这些傳教团的成功是与它們的世襲領地的增长密切有关的。农业、牲畜牧养以及有关农业經濟的技术和手工艺曾大踏步前进；寺院成了当地的市場，并从水陆两路輸出了它們的剩余产物給其他市場。在这一方面，不容置疑，后期墨洛温朝和早期喀罗林朝时代，是这些地方的一个物質繁荣时期；这种繁荣状态繼續到第九世紀北欧人再使它們蛮族化为止。在僧侶指导之下，当地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寺院的农奴）排干沼泽地，清除了森林，并把荒蕪地区变成了牧場或良田。

在喀罗林朝早期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經濟事件，是法兰克人的征服法里西亚。在羅馬帝国的盛世，这个地区，約于現在的荷兰南部，曾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商业活动地区。法里西亚人在盐沼地上放牧了成千成万头綿羊（法里西亚羊毛是出名的），他們曾是

下萊茵河和不列顛間橫過海峽貿易的中間商人，也曾是羅馬高盧省和日耳曼人間的中間商人。從第五世紀中期到第八世紀上半期，法蘭克人征服它為止，從商業觀點來說，北海幾乎是一個法里西亞的內湖。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征服不列顛使法里西亞與下日耳曼同舊屬羅馬的不列顛的聯繫，比以前關係更加緊密；並擴大了法里西亞商業的活動範圍。普洛科匹阿，一個第六世紀的歷史家，甚至說，法里西亞人曾參加過薩克遜人侵入不列顛的行動。當然，他們的商人在早期已出現於倫敦和約克城。

在同一時期，法里西亞人找到了斯堪的那維亞的國家，並深入了波羅的海。瑞典美拉湖畔的貝卡、瑞典大陸上面對哥特蘭島的邊谷、南芬蘭的貝基奧、威堡附近的邊谷、挪威脫倫典渡口的邊谷安、後來的卑爾根附近的比耳克羅恩，這一切地方都曾是法里西亞人的貿易站。愛爾蘭海被一個第六世紀的歷史家稱為“法里西亞海”。當法蘭克人渡過萊茵河的時候，在科倫和馬因斯，已有法里西亞商人。所有這種貿易的力量是從萊茵河支流上近後來的烏得勒支的杜爾斯特德，發揮出來的。

在邦尼非斯改變法里西亞人信仰的計劃里，兼有商業的野心和宗教的熱忱，因為查理·馬德爾和矮子丕平的寶劍支持着這種傳教活動。在跟着發生的戰爭中，法里西亞人作戰是為了自己的貿易自由而防止法蘭克人吞併它，在程度上相同於為了他們的宗教而作戰。他們很快就看出：法蘭克人的基督教意味着法蘭克人的商業征服。正是查理·馬德爾最先預見到這個問題，並以征服法里西亞的方法來解決了它。早在753年的一件公文里，可看到在聖登尼斯市集上已有法里西亞商人。我們還知道，在第九世紀里，法里西亞商人曾在摩塞耳河區及亞爾薩斯採購葡萄酒。養羊已成為法里西亞沼地上的一種有利的事業，而法里西亞羊毛曾是喀羅林朝時代的一種重要的原料。杜爾斯特德是這地區的主要商埠，它

的市場和造币厂是名聞远方的。稍遜一些的是发尔赫稜島上的威特拉城。这两地在第九世紀中都被北欧人破坏，結果使杜尔斯特德的貿易上行萊茵河，后退到提尔和科倫，即向內地退到伊塞尔河流域，在那里兴起了德文特城。法里西亚的征服和那里羊毛貿易的发展，跟着使法兰克人和英国人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比德提及在倫敦有过一个法里西亚商人。在795年，查理曼和麦細亚王奧法簽訂了一項条約，来互相保护在他們領土上的对方商人。具有重要意义，是喀罗林政府所征唯一真正的商业稅，是在布倫附近克旺都維克的“海峡”诸港口、在什留塞斯(斯类斯)以及在杜尔斯特德征收来的。所有其他象桥梁或道路的通行稅，仅仅是作为維持費的。

但是，报应是注定要跟着法里西亚“帝国”的傾覆而来的。法兰克人原不是善于航海的，因而那曾經由法里西亚人占領过的地方，在第九世紀就被“外侵团”^①占夺了。北欧人之所以能够兴起、扩展并表现出他們巨大的商业力量，是由于法里西亚人的勢力的毁灭。大北方的商业开发的遺业落入了北欧人而非法兰克人之手。

东日耳曼和斯拉夫人貿易关系的发展，上文已提过，早在达哥伯特时代便已开始，而在喀罗林朝还在繼續。在征服薩克遜之后，805年时（也許这年代是不可靠的），查理曼第一次制定了法律管理这边境貿易，并且沿着从易北河口到中多瑙河为止的斯拉夫边境，建立了一連串的設防商站。这些商站是：巴杜威克和瑟塞尔（靠近后来的汉堡）、薩克遜的爱尔福特、易北河大湾的馬德堡、哈尔斯大德（靠近后来的班堡）、在瓦尔德·那布河和普弗賴姆特河合流形成的那布河畔的普弗賴姆特（在后来的奥柏普法茨）、福察姆、罗耳士以及那布河口多瑙河畔的累根斯堡。

^① “外侵团”(Vikings)即北欧人，在第八至第十世紀时期，侵掠欧洲西海岸的海盜。——譯者

尽管法兰克史料除了提及被禁出口的兵器甲冑以外，沒有說到這項边境貿易的性質，但我們可从其他来源知道：这貿易主要包括有毛皮、蜡（大量的蜡用以制造教会用的蜡烛以及用以封文件）、蜂蜜、亚麻（斯拉夫人种植大量亚麻）、大麻以及奴隶。日耳曼硬币在斯拉夫人中間开始流通之前，亚麻布条曾当作货币，象在早期殖民地时代，美洲印第安人使用贝壳珠^①那样。織布、制陶器和木刻是他們的主要手工业。鹹水或淡水捕魚，是一种普遍的謀生方法。当时，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人是海盜和販賣奴隶者。爱因哈德的《編年史》（808年）說勒立克小港（靠近后来的威斯馬，这座城直到1237年时才建立起来）是丹麦商人所常到的地方。这些商人主要是什列斯威人。在东南日耳曼，巴伐利亚和“东方駐防区”很少有什么商业痕跡遗留下来。威尼斯商人努力穿过勃倫納山路，也許到过奥格斯堡，并冒險前行，远及累根斯堡，尤其是在阿佛尔人失敗以后。阿佛尔人的龐大宝庫，儲藏着两百年来从巴尔干和北意城市得来的擄掠品，数量惊人，象亚历山大帝所占据的大流士宝庫那样；当所有积聚的硬币和金銀器皿投入西欧的时候，它們的影响使法兰克货币的購買力暫時跌落下去并使物价上漲起来，直到这些金銀在貿易中被吸引到东方去，或再度被窖藏为止。有人估計，在779到799年間，鎊的价值比804年以后的价值，要多三分之一。据編年史家的記載，胜利的法兰克軍隊曾帶走十五貨車的黃金、白銀、宝石和絲綢。

有人認為查理曼統治下的欧洲复兴，是以商业和工业的大复兴为特征的；这是一种証据很少的夸大之詞。决不是这样的。当时，农业状况凌駕于商业和工业活动之上是証据确凿，无可爭辯的。喀罗林政府的整个体系，社会階級的各种类型，都是以土地占

① 北美洲印第安人以綫串着贝壳珠，当作货币；贝壳珠有两种顏色，一系黑色，一系白色，黑的比白的貴一倍。——譯者

有制为关键的,就是說,少数人拥有大量地产而多数人則陷于依附状态。这个时期主要地是一个农业状态和自然經濟的时代。欧洲的政体,欧洲的社会,都是屬于也产生于一种风行的土地制度,而查理曼最有建設性的經濟活动,是和农业相联系着的。甚至在这一範圍內,他的努力也是限于使王室領(国庫領)的行政系統化和制度化。他的立法对僧侶和貴族領地的管理,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領地的管理,完全和他自己的大庄园的管理相同,而且,其中有的比王室大庄园管理得更好;所以皇帝責成每个郡內的郡伯去考察这些庄园,以图改进他自己的土地。喀罗林朝的“盛世”是由于皇帝、僧侶和大土地所有者的頑强努力,他們在庄园管理方面采用了优良的制度。皇帝做了什么,主教、住持和貴族也做了;主教、住持和貴族做了什么,皇帝也做了。但是,关于王室領地的資料,我們所可获得的,远多于关于教会世俗領地的資料;而且,皇帝的立法重要得多,因为王室領在数量上既这样多,而在分布上又这样广。

有一个苦心研究的学者曾估計說:喀罗林朝的王室領包括有一千六百十五个单个的領地;其中很多和“县”甚至和“州”同样大小,村庄星罗棋布。它們包括无数的广大农場(庄园或村落),“宮殿”、葡萄园、森林、矿地和采石場。“領地”是由許多村落或庄园集合而成,組成为一个行政上的經濟单位,每一个庄园或大农場受一个地方管事的监督,而地方管事则受地方郡伯的监督。这些領地中,有的是很大的,包括三十、三十五、六十三甚至七十所庄园。这个龐大遺產的核心,是奥斯特拉西亚公爵的家族領地(在近代的比利时)。由于喀罗林朝合并墨洛温朝的王室領,它大大地增加起来,而其中大部位于下萊茵河和摩塞耳河流域以及东北法。这一地区的面积可在地图上划出下列一綫来表明:从喀罗林朝旧都赫斯塔尔起,下行瓦茲河到它和塞納河的合流处,上行塞納河到瑪恩河口,上行瑪恩河到維特列·勒·法兰西——差不多是彭提昂的所在

地。即在墨洛温时代奥斯特拉西亚公爵的一所庄园——从那里到摩塞耳河的狄頓霍芬,下行摩塞耳河到科不林士,从那里下行萊茵河达烏得勒支,于是又回到赫斯塔尔。在这广大的梯形領地里(今天包括大部比利时、盧森堡、东北法、洛林和萊茵日耳曼),是最大的、最富饒的、最密集的王室領。在和这一片广大的世襲領比較之下,其余的国庫領則是相隔很远地分散着的——在德意志、在意大利、在高盧的其余部分,而它們的收入也較差。后一类的庄园是用作維持当地官員的,而在遇到这些地区发生战争时,則用作軍事供应地。上面所指出的那一片广大土地的中央地位、接連的性質、土壤的肥沃、如此适宜于种植葡萄的摩塞耳河和下萊茵河狹长温暖的流域、渾斯特列克的金屬以及可航行的河流网——这一切条件互相匡济,使这块美好的地区得成为法兰克王国的核心。我們知道这区域内約三百所大庄园的名称和地点,还有更多的庄园現在已无从稽考了。

所以,显而易见,管理大庄园对查理曼象对中世紀其他的国王一样,是一件主要事情。查理曼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有才干的統治者,对他的财产,事无巨細,都亲自监督。每所庄园放在一个管事或管家的管理之下,管事負責保持它,还須作出资产和进款的常年报告。有大批这种庄园的帳册,流傳到今天。作为这些管事的指南,查理曼(他是方法的首倡者)亲自制定了一种庄园管理手册,叫做“庄园詔令”。这詔令包括有七十节,其中有的很长,使人惊异地得以窺見当时的农业經濟情况。但在摘引这有趣味的文件以前,应先描述查理曼到他的一所庄园时所住的“庄园大厦”。它是由排成四方形的几幢房屋集合而成,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一層楼高。它聳立在用木柵来保护的广场的中央。入口道路的兩側,种着树木。人們穿过外門后,再穿过內門,就立刻进入了寬敞的居室。在这叫做大“厅”的背后有別的房屋排成四方形,环绕着一塊种着花

的草坪；各幢房屋的外边用象迴廊那样的繞着方場的圓柱廊接連起来。在后边，但和建筑物的主要部分相連接的，是其他的建筑物，即廚房以及仆役与随从的房間。距这些房屋最远的是倉庫馬棚。

在廣場之內有別的建筑物，象谷倉、畜栏和廂房等，还有一塊菜圃。高的木塔內包括有最好的臥室。它的阳台，在夏天是一个凉爽的地方。各种东西都是用木头制造的。在十二世紀之前，石头建筑物除了教会大厦以外，是罕見的。在1100年前磚头是很少見的。羅馬人原是出名的制磚者，但是这制磚的技术在“黑暗时代”已經失傳于北欧，而在好久时期內，沒有复兴起来。

在大厅的内部，摆着一張大桌子及几条櫈子，但是最舒适的坐位，是靠室內周圍牆壁放着的箱子，这些箱子用作保藏东西的。它們的上面盖着熊皮、狼皮和鹿皮的外罩。墙上挂着麋鹿的有叉角的头，或野猪的或熊的头。地板上在夏天鋪着沙土，或盖着柳条。唯一的爐灶装在廚房里（廚房靠近餐厅），廚房在冬天充作臥室之用。各种东西，除了面包外，都放在无遮盖的火焰上，在罐头里、在平鍋內或烤、或煮、或煎。烤东西是用鉄釵，由廚司把鉄釵轉来轉去，使各面同样受到火炙而不致有一塊地方被燒焦。爐灶很大，足以烤整个一头牛或者一头野猪。烘面包有时是在装着出烟管子的火盆里进行的。然而，在大多数場合下，烘面包的火盆是放在戶外的。木柴或炭是唯一的燃料。沒有火爐的房間，有时用燒旺的炭盆取暖，但是那时必須小心地注意通风。

一个法兰克貴族在大庄园住宅內的生活，果然是粗陋的，但并不有别于十七和十八世紀美国弗吉尼亚的大农場主的庄园住宅生活。差不多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就地生产出来的。制服装用的羊毛，剪割、清洗、梳刷、紡織都是在庄园宅邸內进行的。兽皮由农奴鞋匠来硝制并制成鞋子。兽肉是用盐醃、火燻、醋漬的。各种家庭和农业工艺都是由庄园上的农奴来做的——制鞋匠、硝皮工、染工、

織布工、鐵匠、制車輪匠和木工。但应注意，沒有說及在領地內存在着什麼市場，就是說，商業還未曾高度發展。在“莊園詔令”內，只有第五十四節內提到了市場，命令管事应注意“朕的農奴不得遊逛市場或市集”。

下面從查理曼的真實訓令中引來的摘要，大部分是不言自明的。如果看來有需說明的地方，我加上了幾句話：

每個管事應編制關於朕一切進款的常年報告；應記入：由朕的耕夫所趕的牛來耕種朕的土地，由朕莊園上佃農所耕種的朕的土地；應記入：豬、森林、田地、橋梁和船舶、葡萄園和應繳葡萄酒給朕的人、干草、木柴、火把、木板及其他類型的木材；荒地的範圍；蔬菜、玉米、高粱；羊毛、亞麻和大麻；樹生的果實；栗樹；接枝的樹木；花園；甜菜根；魚池；皮革、毛皮和獸角；蜂蜜、蠟、牛羊油脂和肥皂；桑實酒、蜜酒、醋、啤酒；新谷和陳谷；母雞和雞蛋；鵝；金屬匠和金屬工人的數目、制劍者和制鞋者；櫃、箱和量器；小牡馬和小牝馬。管事應在聖誕節時，把上列各項分門別類，有條有理地報告給朕，使朕得知朕所有的東西以及每種東西的數量。

在朕的各莊園里，朕的管事應具備儘量多的牛舍、豬圈、羊棚和山羊舍，而且他們決不得缺少這些東西。加之，他們應保有由朕的農奴為了他們的服务所提供的牛只，這樣我們的牛舍和耕犁無論如何不致由於朕莊園上的工作而短少起來。

朕的管事必須極端仔細地供應那些用手製備的東西：脂油、熏肉、鹹肉、葡萄酒、醋、干酪、白脫、麥芽、啤酒、蜜酒、蜂蜜、蠟、面粉；這一切，應製備得極端整潔。

查理曼曾想把他的大莊園變成為活象一個紳士的鄉村別墅一樣，請看下文：

每個管事在朕的每個莊園里，為了點綴園景，應經常保有鵝、孔雀、野雞、鴨、鵠、鸕鶿和雉鳩。

詔令中有下列一項條文：

為使朕的婦女工作，應按照所指定的適當時間，來給予她們材料，如亞麻布、羊毛、大青染料、朱紅、茜草根制的顏料、理羊毛梳、起絨草、肥皂、潤滑油、器皿及其他必需的東西。

关于房間設備的条文規定：

在朕各莊園內的房間里，应具备床被、坐墊、毯子、枕头、床单、桌布和襪布；銅的、錫的、鉄的和木制的碗盞；鉄架、鏈子、鍋鈎、手斧、斧头、螺鑽、小刀以及其他一切种类的工具，使无須到別处去拿或向邻人移借。

上面所引的詔令，尽管是这类規程中的最完备而又最重要的，但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在很多場合，这位皇帝显出他是重視王室莊園的有效能管理的，尤其是在指令开出詳細的帳单方面。很幸运的是其中一个帳单保存得完整无缺，还保存了另一張片断的帳单；这些都是中世紀統計文献中的最有价值的例子。

那流傳下来的关于查理曼的一所莊園的清单如下：

阿斯那帕領地莊園上有一所石头造的王家大廈，式样极好(显然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地方)，有三間房間(大厅、餐室、廚房)；整个大廈四周，都有阳台，有十一間妇女臥房；下有一間地下室；有两条柱廊；在廣場內另有造得很好的七所木房，还有同样多的小屋和附屬建築物；一所馬房、一所磨坊、一所谷倉、三所棧房。庭院用密密的籬笆圍繞着，有一个石头大門，还有一个阳台。有一个內庭，也用籬笆圍着，种着水果树。

下面分別列举室內用具和工具的数目和类别；农产品計有大麦、小麦、裸麦、雀麦、大豆、豌豆、蜂蜜、白脫、猪油、脂肪和干酪；最后，列出牲口头数，包括有五十一头大牲口，五头三岁的、七头两岁的、七头一岁的、十头二岁的小馬，八头一岁的、三头牡馬，十六头母牛，两头驢，五十头带小牛的母牛，二十头小閹牛，三十八头一岁的小牛，三头公牛，二百六十头公猪，一百头猪，五头野猪，一百五十头綿羊，二百头一岁的小羊，一百二十头公羊，三十头带小羊的母山羊，三十头一岁的山羊，三头公山羊，三十只鵝，八十只小鷄，二十二只孔雀。从这项清单里，我們可看出家具以及家庭設備方面多么貧乏，而食粮与牲口的儲备多么丰富；这种对比明显地指出农业經濟已达到一个高度发展的阶段。其次，对于貨幣，沒有提及什么，这一事实也說明在查理曼帝國內，流通的貨幣是很少的。

除了建立国内的普遍和平外，查理曼还在两个方面促进了葡萄种植业；和平对葡萄种植者来说一向是重要的，因为葡萄不能象小麦那样在一个年头里成熟。第一，查理曼在自己的庄园上有很多葡萄园，在那里，种植葡萄和釀葡萄酒，是在他亲自指导下进行的。他对所有的地中海区人民用脚踏葡萄来榨酒的老方法，采取很自然的反对态度而命令以手压方法来替代它。他委派特别管事，接收葡萄园作为他们自己的，来培植它们。他从没把制造葡萄酒当作王室的专利事业；相反的，他采用了各种方法传播它。第二，他以很多土地、赋税权与通行税豁免权，赐给教会和寺院。因此，在这时期，教会和寺院的土地上的葡萄园就大大地增加起来。很多僧侣地主包括正规的和世俗的僧侣^①致力于深耕细作的葡萄种植业。所有的阳面斜坡都成了葡萄园。僧侣甚至把葡萄种植到那些收成不会很好的地方去，象巴伐利亚高原、瑞士以及瑟林吉亚的腹地。皇帝的这种榜样影响了世俗贵族；后者对葡萄种植业也感到兴趣；在这时期，还兴起了一种办法，即划出庄园来专种葡萄，并实行更精细的耕种方法。当时有一个阶层成长起来：他们尽管是不自由的，并向庄园主缴纳他们的大部产物，但还是在租户而非农奴的地位上种植他们的小块土地或葡萄园。

由皇帝保护的犹太人，是在南法经营葡萄酒的大中间商。794年法兰克福的宗教会议通过决议，来防止壟断或抢购葡萄酒，并在葡萄收成不佳时防止葡萄酒出口。在查理曼和哈倫·阿尔·拉希德间的交往中，法兰克商人带回了那些用以釀造葡萄酒的香料，从而法兰克葡萄酒开始输出到东方去。查理曼的征服开辟了到东北欧去的新商路；因而商人往斯拉夫边疆去做生意，以法兰克葡萄酒来换取从波罗的海来的琥珀和毛皮。

① 世俗僧侣，指非修道院出身而不出家的僧侣。——译者

勃艮第葡萄酒是經過塞納河運到巴黎和盧昂的。萊茵河和摩塞耳河上屬於行會的船夫，以萊茵和摩塞耳葡萄酒來交換法里西亞羊毛，生意很興隆。法蘭克高盧境內一切河流上都大量運輸葡萄酒，這種運輸大多是在寺院控制之下。由於它們享有大量特權和免稅權，也由於它們擁有各中心地點的許多碼頭和貨棧，它們成為過去羅馬時代“海員”的真正繼承人。寺院的代理人和猶太人分享葡萄酒貿易的近似專利的權利。

在上述的查理曼手冊里，我們可看到大莊園上的農奴、農民和租戶農民之間的區別。按日耳曼法律原來的規定，每個自由人應有一塊自由地。但是，一般趨勢迫使他失掉這塊土地。每個自由人必須服軍役，而戰爭又是常有的；又因為這些戰役經常是在春夏兩季進行的，所以當他的田地最需要他的時候，他被召而離去了。如果他因此來不及耕種，或因為他的收穫失敗，他這個自由人就要負債了。起初，他被迫抵押出他的土地的一部分，最後也許全部。一般來說是附近的地主或教會接受這個抵押品。同樣的過程在古代羅馬曾發生過，現在又重演了。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當抵押的土地被取消贖回的權利時，那自由人就必然要淪為佃農。如果他還是不能清償他的債務，他將失掉他的自由，而陷入農奴地位。當查理曼在世的時候，自由莊園的數目——所謂自由莊園，就是莊園內份地的權利由自由租戶所保有——似乎是大于不自由莊園的數目。到第九世紀中期，在查理曼的孫子時代，這項比例就倒轉過來了。

“軍役”即強制軍事服役這一項毀滅性的負擔，強有力地迫使大寺院和大貴族土地上的自由人降到依附地位，甚至農奴地位；因此，那也成了毫無辦法的人們往邊境去謀生的原因。詔令中三番四復地指責自由人以自願淪為農奴作為逃避軍役的一種救濟辦法。

自由人委身于奴役，因為他們不再能維持自己；他們不是一兩個人這樣做，而是集團地或全村庄都這樣做。約在 820 年以前的時期，在紐弗勒特有十四個自由人把他們的土地送給聖澤門寺院，而自己作了農奴，“因為他們沒有能力來滿足國主要他們為戰爭服務的要求。”^①

非常明顯，“小自由人的確獲得了他們勞動的新出路，但是這種出路必然要和他們地位的降低相聯系的。他們以獨立的地位來換取一個更有利的而又更好地被保護的依附地位。”莊園制度的擴展、採用更為完善的農作方法，特別是在國庫或教會莊園土地上，慢慢地使自由小農陷入原屬自己土地上的佃農或農奴的地位，這些土地的所有權從他轉移到某一個附近貴族或高級僧侶的手里；要不然的話，那改變了的情況也會把他從他祖傳的土地上逐出使他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一個浪人”。小土地所有者在當時正在進行着的經濟社會的轉變里，是不能和大業主相競爭的。有些歷史家主張：一個比軍役更大的苦難，是喀羅林朝官吏的壓迫和詐財行為。果然這是當時一個公認的弊病，可是對虐政的怨言，自從政府開始時起即已存在，可不必要予以重視。

多柏特在他所著的一篇出色的專論《巡閱使》里，說得好：

我們有丰富的資料，可證明法蘭克貴族的貪婪性質。我們看到他們無止境地靠着犧牲皇帝或者那些還殘存的自由平民，來擴大自己的財富……只有“巡閱使”才能夠對這種趨勢進行鬥爭……貧苦的獨立自由農沒有比當時的實際情況消滅得快，也許必須感謝這“巡閱使”的制度。

關於這種情況，查理曼晚年的立法是很清楚的。803 年的《蘭哥巴第詔令》中有下列一段話：

朕聽到：伯爵的官員以及有些屬於他們的有勢力的附庸，不僅從教會的奴仆（就是，住在由教會所賜給的采地上的人）方面，而且從其餘的老百姓方

^① 庫爾敦：《中世紀的村庄》，第 108 頁。

面,征收地租并強制使用勞動力,如收穫、犁耕、播種、拔樹根、裝貨于馬車上等等;所有的這些弊端,必須予以停止,因為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在這樣情況下已被壓迫得苦不堪言,以致很多人由於耐不住他們的命運,背離他們的主人或保護人而逃亡,因而土地復歸于荒蕪狀態。

811年時在亞琛公布的《關於出征隊的詔令》里,查理曼感慨地說:

窮人憤恨不平地說,他們是從自己的土地上被逐出來;他們受主教與住持以及其代理人的驅逐,也同樣受伯爵及其“百戶長”^①的驅逐。他們說,如果一個窮人不願交出他的土地給主教、住持或伯爵,這些大人們就捏造出某種借口把他拖入法院;要不然,他們繼續命令他充任軍役,直至這可憐的人完全破產,不得不交出或出售他的土地。而在这同一時期,他的鄰人由於已經交出他的土地(因而成為一個農奴而非自由人了)得准予安居在家而不受煩擾。

這種小自由人和窮苦農民的逐步降低身分的過程,是和法兰克人向帝國邊境的擴展密切聯系着的。

我們看到,法兰克人的“東進政策”或向東挺進的政策,在墨洛溫朝時代已經開端;而到了查理曼時代,這項政策加速推行起來了。小土地所有者和被剝奪的自由人逐漸向東推進,到達扎勒河及上美因河那里的地曠人稀的盆地;為的是要逃避那些數目和範圍越來越大的大莊園對他們所加的压力(這些莊園包括世俗的和教會的,位於萊茵河以西及中萊茵蘭)。而且,在第九和第十世紀,在下摩塞耳河和萊茵地區,已出現土壤枯竭的跡象。當然,關於中世紀時代的人口,是不可能有的準確的統計的。但是,近代學者已作出一些相對的論斷。在喀羅林時代,條件优越的地區象摩塞耳流域那樣,似乎曾有相當稠密的人口。的確,沿着那些作為重要的貿

^① 百戶長(*centenarii*)是隸屬於伯爵的小地方官,在最小的地方單位即百戶區內,主要辦理司法事務。——譯者

易大道的河流,尤其是沿着謬司河,地名的数目那时比现在似乎是要多。从后期墨洛温时代直到北欧人的侵入时期,在塞納河和萊茵河之間,人口密度据估計,曾达到每平方哩三百人之多。在喀罗林朝后期,东法兰克王国,即日耳曼的人口据估計,有二百五十到三百万人。800年时,上摩塞耳河、西格河和上美因河流域开始被日耳曼移民渗入,象扎勒河流域在查理·馬德爾时代曾被殖民化那样(这种移殖主要是由邦尼非斯派寺院进行的)。看来,沒有任何大量法兰克人跟着薩克遜的征服而涌到那里。

794年时,巴伐利亚独立地位的倾覆使东南欧空前地开放給法兰克殖民,主要是僧侶和貴族的涌入。他們爭先恐后地夺取土地,要想奴役当地居民来开发那里的土地。在多瑙河区,殖民化的特征就是在于僧侶和貴族的性質。

显然可見,这傳教兼殖民的混合运动,是直接受着法兰克朝廷的鼓励而进行的,比起北方来,是一个較少民众性和較少自然性的扩展。从亚琛入巴伐利亚的道路是經美因河穿上法兰哥尼亚的天然的一——而非軍事的——道路;在那里,由邦尼非斯在741年建立的符次堡主教区,是喀罗林朝傳布福音和征服东南欧的基地。在这些教会农場上的艰苦劳动都是由被征服的和“皈依基督教”的斯拉夫人担負着。早在这个时期,“斯拉夫”(slav)这个名詞已等同于“奴隶”(slave)这个名詞;而教会以征收什一稅对那个种族来进行有系統的剝削,也已成为一个陈規了。

在未被占据的土地上的斯拉夫人的村庄維持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存地位,它們四面被新成立的寺院和来自辽远西方的日耳曼移民的居留地包圍着;日耳曼移民在森林中砍除树木,为自己开辟新土地。然而在这些日耳曼人中,很多不是自由人,而是隶属于大业主的农奴;这批大业主把他們全部从人口拥挤的法兰克領地上迁移到他们的边境的新領地上。毫無疑問,同这些农奴混居杂处

的，還有喀羅林朝社會中人數相當多的下層分子，也就是789年《偉大詔令》第75條中所說的“客人”、“外人”和“乞丐”。他們被經濟困難和社會壓力逼迫得東飄西蕩。這批人由於沒有家庭或村莊的聯繫，樂於在某一個大地主領地上的茅舍里獲得棲身之所，即使要喪失自由和付出艱苦勞動的代價。791年的大荒災可能增加了這一階層的人數，因而它可能成了促使日耳曼人向東南歐移殖的一個因素。因為薩克遜還未被征服，居民向那里東進的任何顯著趨勢還沒有表現出來。

從亞得里亞海的頂端到易北河口這一條邊境上的斯拉夫居民，在日耳曼人征服和殖民的浪潮里，不是被驅逐，就是被淹沒。因此產生了不可遏阻的衝突，其中種族的優勢、宗教、語言、貿易、風俗以及生活所靠的土地都成為爭執的問題。在日耳曼人方面，這鬥爭變成一系列龐大的傳教運動和殖民征服。僧侶傳教師深入斯拉夫人的荒野，致力於和平的或強制的改變汶德族^①的信仰，而且伸出了半神權王政的寶劍來保護教士或替被汶德人殺死或逐出的教士復仇。但是，種族和宗教仇恨心理的背后，還有着居民渴望土地的強烈要求；他們爭取田地來耕種，以求餬口；因為在那時所實行的農作的原始狀況下，欲求飽暖是一件不易的事情。所以，憂郁的汶德族農民清除了寺院周圍的森林，耕種了這土地並飼養牲畜；因為這些邊境上的寺院資產從經濟觀點來說，只不過是邊界上的牧場而已。查理曼看出了在邊境上尋找新住所的墾荒階層所具有的意义。在他的詔令里，他曾兩次指令他的官員說，“無論在什麼地方找到有氣力的人，就給他們森林地來開墾吧。”

但是，所有向東南歐的進展曾受到阿佛爾人阻止，甚至很多被他們破壞了。而在第八世紀末期之前，日耳曼人占領的範圍已經

① 起初居于日耳曼北部及東部的斯拉夫大族。——譯者

远达恩斯河畔。在791、793和796年，查理曼曾三次征討这些兇猛的劫掠者。以后还在803和811年两次討伐阿佛尔人，终于征服了他们。803年在累根斯堡會議上，皇帝曾正式組織“东方駐防区”（那在好多年后将成为奥地利公爵領），并把它同从易北河口到亚得里亚海頂端的保卫东境的一連串“駐防区”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对阿佛尔人，象对剛被完全征服的薩克遜一样，行使了强制改变信仰的办法并加上了什一稅的重負，为的要使他们完全屈服。

当从人烟稠密的奥斯特拉西亚各省来的居民这样地泛濫于东日耳曼边境上的时候，南高盧的居民也在“西班牙駐防区”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出路，即在比利牛斯山和埃波罗河間的領土上；这領土由查理曼征服并建成为一个緩冲省，来保卫帝国西南側，以防止伊斯兰教侵犯。但是，在半島上，条件与政策基本上是（和东日耳曼）不相同的。东日耳曼的殖民运动本質上大多是自发性的，又是个人主义的。但是，在西班牙，法兰克的殖民运动是政府的一个周密考虑的政策。这領土，在711年以来穆罕默德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間的战争过程里，几乎被蹂躪得一片荒蕪；这一征服地，全部被看作王室領，而按封建和庄园的条件，仔細地分配出去。这些封地，在数字上虽不多，而在范围上一般却是广大的。它們大多是賜給法兰克的文武官員，但也有一些是賜給哥特貴族的。法兰克人移入西班牙而願永留者，人数不多，因为距他們的故乡实在太远了。但是查理曼切心要有一个有势力的貴族小集团，住在“駐防区”內来代表法兰克政权的統治。所以，为了获得这样的一个集团，他把土地封給了在那里作战过的他的将士。这批受封的法兰克附庸召来了他們的部下士兵，也把土地封給后者作为亚封地。这些土地是按領主制度，由农奴来耕种，或者出租給佃农的。

另有一种賜地的形式是賜“宅地”(adprisio)，即賜一种自由地的特种形式，有些象美国过去的“住宅”慣例那样。同样的土地讓

与形式,在法兰克帝国的别的一部分,可能也曾流行,但是这个名词似乎是独一无二地用于比利牛斯山区的土地让与的。

接受这种赐地者,并不都是西班牙人,但是其中大多数是西班牙人。诏令指出“为西班牙人”、“关于西班牙人”的字样。谁是这些西班牙人呢?有些人在阿拉伯人进入时,曾逃入山区而后来又回到他们在平原上的老家;这种“驻防区”内的居民,就是西班牙人吗?初看起来,这一种说法似乎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较多可能的是,他们是从法兰克征服地南方来的基督教西班牙人;他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基督教政权已在他们的邻近地区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就逃出穆罕默德教统治而到了那里。这批西班牙人的移入不仅是为了政治和宗教的目的,而且是由于加达鲁尼亚、鲁息雍和塞普替美尼亚的富饶土地以及法兰克国王的宽大条件所吸引而来的。其中也有阿拉伯人中间的不满意分子。812年时,这一类的土地所有者曾派遣四十人的代表团去觐见查理曼,在那一年的训令中列举了他们的名字。这一张姓名表是有趣味的,因为它指明了住在“驻防区”内的几个民族的性。其中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可分成为两类,即用罗马化名字的本地人和哥特人。但是,我们还可看到所举出的其他民族的性:伦巴人卡则勒拉斯,加斯科尼人亚达里克斯,左赖曼(可能是个摩尔人)。虔诚的路易曾说,这批西班牙人自觉自愿地接受了法兰克王国的保护。所以,他在赐他们土地时,曾给以良好条件。

除了这批拥有许多不自由的劳动者和自由的居民的大地主以外,寺院也成了在“驻防区”内广大土地的集体所有者。在这里和在东德意志一样,寺院是文明的开路先锋。正是在这一时期,建造了下列基督教西班牙的大寺院:阿尼尔、科尼斯、拉·格拉斯、阿尔兹·苏·德赫、蒙托留、提比里、圣喜拉尔、塞普替美尼亚的普萨尔蒙第以及里柏利、柏舍琉等等“驻防区”内的寺院。这些寺院组织很

快地蔓延开来。当一所寺院建立得很好以后,移民云集,于是僧侶們分散到新地点上去,建立了一所小圣所,在那里起初只有一所小礼拜堂和一所招待遊历者的旅舍。但是,这些小圣所不久便吸引了移民来耕种它們的土地,馬上这些地点成为一个小社会了。在魯息雍和加达魯尼亚的村庄中,很多是起源于寺院的。

关于西班牙穆罕默德教徒和南法人民进行貿易的最早的証据,是在812年时。在这一年,奥尔良主教帖奥度尔夫由于一个重要使命往法兰西的极南部去,參觀了那旁和阿尔茲。在阿尔茲,有人为了报答某种恩惠曾献給他水晶和珍珠;有人曾送給他那些面上刻着阿拉伯文的金銀硬币,他曾看到有些人有雕刻着人象的花瓶以及“来自兇狠阿拉伯国家里”的染料和布匹、还有宝剑、哥尔多华皮革、珠宝以及各种显然由阿拉伯制造的布匹。必然要得出的結論是:除了战争以外,在阿拉伯人和那个地区居民之間,还有着其他的關係。在这两个民族之間,尽管有着宗教分歧,但通商关系还是存在着;除非因为要交換貨物,阿拉伯錢币和阿拉伯貨物不会在那里出現的。当然也可能,这些东西是从掠夺穆罕默德教領土而来的擄掠品。

查理曼大大地增加了世俗僧侶的地产,但对修道士來說,他不是一个大朋友。在779年,他使什一稅的征課合法化(以前什一稅是由信徒們自願捐助的),虽然老早在585年,馬康宗教會議上已决定,凡拒絕繳付什一稅者,将受到驅逐出教的处分。这样一来,他使教会在它固定基金及从供献得来的浮动而又不确定的进款以外,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收入源流。查理曼又以被征服的薩克遜、倫巴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大量土地,分配給僧侶們。甚至最卑微的牧师区內的傳教士,也被給予一个完整住宅和男女农奴各一。在他811年执行的遺囑里,他把他所有財產的三分之一遺留給法兰克帝国内二十一个大主教,并命令:每一个大主教应保留那分配

給他所轄省的總額的三分之一,而把其餘的部分,分給他的副主教。然而,查理曼對法兰克僧侶的慈善行為和忠實,並不懷着什么幻想。正在他寫遺囑的同一年里,他對主教曾發出一個詢問形式的詔令,他問主教們:出家的僧侶和沒有出家的僧侶有什麼區別。他諷刺地問道,“凡是沒有停止千方百計地想法增加自己財產的人——以天堂來約許,以地獄來恫吓,誘使老實人放棄他們的財產而變為貧苦,剝奪他們的合法繼承人的繼承權,以致他們不得不靠着搶掠過活——,是出家的嗎?凡是貪得無厭,竟至賄賂証人的人,是棄世絕俗嗎?”皇帝還譴責地主僧侶們所干的勒索勾當。他說,“窮人們大聲叫罵那些剝奪他們的財產的人。他們埋怨主教、住持及他們的代理人,和埋怨郡伯及他們的部屬一樣。”查理曼所譴責的這些弊病,注定要在封建時期越來越變嚴重。

教會對法兰克帝國的經濟社會生活所發生的影響和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喀羅林朝比在前朝,還大得多。教會的會議上也討論過世俗事務並就世俗事務制訂了法律;若干有勢力的俗人代表也曾出席會議;查理曼任用主教和住持充當外交官、巡閱使、甚至戰爭中的司令官。但是,教會的最大影響——除了宗教以外——是通過它成長着的封建勢力而表現出來的。上文已說過,教會曾獲得大量的土地贈與,它並把這些土地租給人耕種,要不然,直接由住在教會地產上莊園村莊里數以千計的不自由居民來耕種。此外,還有很多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經濟困難和社會壓力之下,為求教會的保護,放棄了他們的獨立地位,並把他們的土地“委托”給教會。有條件地把土地讓給主教區和寺院的這一項慣例於墨洛溫朝時代已開始出現,但到了喀羅林朝時代,它就成了一個有組織而又有系統的制度;這制度的精髓,按性質和傾向,都是封建式的。在上述的“請求讓地”的交易中,很多是以贍養貧窮、疾病和無保護的人為目的的;它們有些象近代的“終身贍養費制”;依此,所投的資

本,在受惠者死亡时,归于发给赡养费的机关,使他的继承人受到损失。其他很多类似的交易,对教会财产的增加与巩固是有帮助的;因为教会由此得拥有数目庞大的依附农田。社会方面也获得了利益,因为这种制度使它有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穷人救济的办法;另一方面,这种制度给教会带来了一种危险,即教会变得注意财产和世袭领的事务,多于注意宗教事务。而且,僧侣所得的土地捐赠迅速地增加着,那激起了世俗贵族的憎恶。从这时期以后的几百年中,我们看到高级僧侣和高级贵族间的冲突事件层出不穷,而这冲突的根源是属于经济性质的。甚至僧侣阶层也分成为两个敌对部分。因为世俗僧侣憎恨修道士的较孚众望,后者的寺院通过信徒的捐赠和遗产一般拥有更丰富的基金。查理曼的同情显然是寄于世俗贵族方面。他似乎已害怕寺院势力的过分强大。因此,他合并了许多寺院及它们的财产于国库。他从来没有鼓励过寺院制度,的确,在他统治的时期,很少寺院曾由别人建造起来。

这样地变为封建化的不单是宗教中心,象主教座和寺院等。而且,乡村的牧师区和地方教会也卷入了这种过程。由于流行的庇护制度,因而几乎不可能在脱离地主贵族的庇护下来建立乡村牧师区。一个当地的业主,在他的土地上建立了教会之后,就以庄园主的地位,要求有权选择教士来为那里的教徒执行宗教事务,而这些教徒一般都是他的佃户。此外,这保护者也控制着牧师区内的收入,甚至从送给牧师区教会的捐赠和遗产里,也取得利益。一个业主之所以建立一所当地教会的动机,往往远不是无私的或虔诚的。在封建时代,投资建造一所教会或创立一座寺院是最为有利的。

那建造一所教会或小礼拜堂于自己土地上的业主,就成为那所教会或小礼拜堂的所有者。他可指派一个奴隶或一个农奴去担任职务(叫做“牧师职”)。他可征收殯葬费和洗礼费。他可强制他的农奴去做礼拜。他可出售

或者讓与这所教会。他可罢免这牧师,或鞭撻他,或在指派他时,要他贈送礼物。他可使用他充当書記、管事或种田的仆人。他可使用他侍奉膳食、养犬、牵引地主太太的馬匹或看守羊群。①

“依靠祭壇生活”成了地主阶级尽力使用的一种剝削形式。

① 斐西尔:《中世紀帝国》第1卷,第254頁。

第九章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

(814—912年)*

第九世紀中的最重要历史事实，是法兰克帝国的瓦解。瓦解的真正原因是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一种經濟和社会力量。大地主階級原是查理曼政府所建立的基础，但在第九世紀中它获得了支配王室的力量。即在查理曼的統治时代，那瓦解的要素和过程，已可看得出来。在这样早的时期，他所建立的行政机构，已开始被地方地主的利益滲入而受到了侵犯；而且，地主的权力，由于吮吸着帝国的血液，迅速地变为日益强大。“恩地”①、采邑和免除权的制度終将引导帝国到毁灭的結局。

虔誠者路易(814—840年)的懦弱、父子間的斗争、弟兄間的战争(結束于843年瓜分帝国的凡尔登条約)、男爵們的謀叛作乱；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封建分裂主义的特殊表現而已。各种事情已变为地方性的了，沒有全国性的事情了。

那么，封建制度是什么呢？封建制度即由个别私人在或大或小的領土范圍內，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代表或占有，夺取或行使公共权力的制度。它是由地主貴族，俗人或僧侶，男爵或主教或住持在一定的領土范圍內，对那里所有的居民办理行政、执行司法、征收賦稅的制度。在这样的一个政体里，政府的實質是分裂的。王座只保留了一个空洞的宗主地位(宗主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权力，而国王被縮成为一个阴影而已。在第九世紀中封建制度的办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56頁。

① “恩地”(precaria)是由于請求而賜予的土地，即一种有条件的占有地。——譯者

法,还在萌芽状态,还在酝酿的过程里。这是潜在的封建制度,注定要在以后两百年間成长得更更有力量,并随着它的成长,愈益巩固;終于形成了那封建时代的欧洲,而它的权力在 1150 和 1250 年間达到了最高峰。封建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形式,一种社会的結構,一种以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經濟制度。

喀罗林帝国的封建性清楚地表現在虔誠者路易 817 年时把帝国分給他的三个兒子的事件。他們是罗塞耳、路易和不平。从这一項文献的序言里,显然可見,那分裂帝国的要求是由地主阶级倡議的。为什么? 因为按当时流行的土地保有权制度,在国王死亡后,所有的“效忠”和“委身”契約都立刻失效,必須予以續訂。只有自由保有地(自由地),不在此限。換句話說,所有屬於“采邑”的土地,都失掉产权。新王可依自己的意見,决定同原来业主重訂或不重訂契約。尽管习惯上有成規,法律上却没有强制国王續訂契約的办法。显然,当整个业主阶级想到这样多的土地所有权或土地的財產会晴天霹靂般地破裂了时,他們自然会感到惴惴不安,因而为了避免这种灾难,他們請求皇帝立刻解决这未来的問題。因为法兰克帝国是由采邑和保护权集合而成的一个又广大又复杂的国家,所以,一旦皇帝去世,混乱状态必然会接踵而起的;除非是防患于未然,立即把領土分配給那些应繼承他的諸子之間。皇帝理論上的不可分裂性和实际上的統一性,遂因封建階層的必然的利益而牺牲了;这一階層遍布帝国境內,而它的忠誠当然也分裂在三个王子之間。法兰克帝国分成为几个王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幸的。

这一事件是封建制度的胜利。虔誠者路易諸子之間的殘酷斗争即由此而发生。而且,每个貴族竭力以公平的或骯髒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产业。为了获得新的土地贈与,他們哄騙、威吓、或者背叛他們的宗主,为了剝夺邻人的土地,他們进攻他們。他們还强求別人承認自己对土地的世襲占有权。而另一方面撤回封地的权

力，是公共权力为防止私人篡夺政权和政府的瓦解的唯一保证。

但是，諸王子之所以互相仇恨，还有比这残酷的領土竞争和争夺“忠诚者”更深一層的原因。各王子都拼命迫使皇帝分配喀罗林王室的世襲領，即国庫領，并为自己争取其中最大的可能部分。国庫領本身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物質财产；而且国庫領还可用以賜給采邑、分发荣典、換取“忠诚者”的支持以及增加政治权力。这些王室領分散在帝国全境，从比利牛斯山到多瑙河弯曲处，从羅馬城之南到法里西亚；在面积方面，它們的大小不等，从小农庄或庄园到由成千成万农奴住着的广阔无限的可耕地带。从这些土地上得来的进款构成了王室最大的、最实質的財源。喀罗林国庫領的广布性質，連同其龐大的进款（由于查理曼所采用的有效能的管理方法的结果），使国庫領象广阔的网一般地籠罩着帝国。国庫領的分隔和分散的情况对法兰克帝国的解体所起的作用，比地主貴族的地方政治野心还要巨大。帝国的連續多次的瓜分，以凡尔登的瓜分（843年）和米尔森的瓜分（870年）为頂峰，根本上就是国庫領在皇帝諸子之間的分配。

国庫領的中心位于中欧这一历史事实，可說明第九世紀中欧分割的原因，并使这些地区成为諸王間的战場，这一战場后来就是那些从法兰克帝国廢墟上終于出現的各民族国家間的战場。未来法国和未来德国間的分界綫，在第九世紀已經划出，因为国庫領的最大的一塊，是位于它們之間的。东方和西方的国王都垂涎于843年創立的中間王国的領土，希望获得那里的富饒王室土地，因而分裂了这領土并瓜分了这战利品。如果喀罗林国庫領位于另一地区，或者从来沒曾分散过，欧洲那个历史上遺留下来的战争，可能已經避免了。

有人說得好：“如果喀罗林朝諸王曾能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們将会永远放弃了帝国的观念，退入米尔森条約所規定的广大

疆界之內,并在他們的世襲領上建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公国;他們將在事实上为自己要求了那正在出現的封建体系中的主要地位。”

查理曼曾清楚地看出,保存国庫領的完整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保存奥斯特拉西亚大中央区的国庫領的完整。在那里,他“实际上永远沒有”讓与过一塊領地。在他长久統治的全部时期中,只曾讓出九塊領地。他所贈送出去的領地——而它們的数目是很少的——都是从那些孤单的庄园中贈出的。他坚决保持着所有的沿軍事路綫或河流的領地,或在各省中形成了一片接連的領地。在和这富饒而又广大的一片中央王室領相比之下,其他的国庫領都是相隔很远地分散在日耳曼、意大利、南高盧和西高盧,并且在收入方面也較差,由于距离太远、位置太散漫、管理也太难,这些領地是沒有多大价值的。它們的用处,在于維持当地的官吏,并在这些地区遇到战争时,作为軍事供应地;可是从經濟观点来看,是不能和中欧洲的一塊領地相提并論的。国庫領是虔誠者路易的諸子所垂涎的对象,也是封建貴族所眼紅的东西。国庫領的瓜分是帝国分裂的基本事实;破坏国庫領的完整,就是毁灭帝国的統一。因为法兰克帝国的基石,便是国庫領。国王权力的丧失与封建貴族权力的获得,是以国庫領的分割或分散为比例的。国庫領的完整維持了多久,封建集体就維持了多久,即对王室的封建反叛被阻止了多久。因为貴族的領地在数字上少得多,而在連接情况上也差得多。

但是,王室土地只是喀罗林朝又广大又富饒的領地的一部分。中欧这一地区有許多寺院,而这些寺院也都是大土地所有者。这些寺院有很多是喀罗林朝建造的,因而是隶属于王室的。王室享有授予僧职之权;所以它不仅控制着这些“王家”寺院的管理,而且也染指于它們的进款。还有别的寺院,是从墨洛温朝落入喀罗林朝控制之下的,因此,很多寺院,在中欧肯定超过半数,同国庫領打成

一片了。这些寺院的土地和王室財產沒有差別。主教区也是这样的；主教的职位是在皇帝的庇护之下，而从主教的采邑方面，王室抽取大量进款。郡伯职位也是同样地授予的。总之，帝国政府是一个龐大的地主組織，而皇帝由于他的双重地位，即最大的地主兼地主政府的首脑，成为一个权力无限、財富无限的地主統治者。

上面所說的龐大財產包括有喀罗林朝的王族土地、王室土地、等同于國庫領的教会土地，由土地基金支持的政府和宗教官职（土地基金不仅提供进款，也构成保护关系），这一切对諸王子和那些支持他們要求的地主貴族來說，是值得爭取的。这一階級的欲念在前一世紀里，是被查理·馬德爾所激起，当时他曾夺取大量教会土地并把它們分配于貴族之間；而在第九世紀中这种欲念获得滿足的机会了。

虔誠者路易的掠奪成性的諸子，各受一群渴求土地的貴族和高級僧侶的煽動，后者希望获得采邑，或获得一个賦予基金的教会或政府职位。主教和住持巧妙地以請求“恢复”那些曾由查理·馬德爾在732年所沒收的教会土地为借口，提出了这类要求。这位皇帝，好心腸而又懦弱，不能抗拒这压力。他的用意原是要保持國庫領的完整，可是，他的傳記的作者写道，在他統治的早期，他已这样地濫贈王室土地，“無論在古代史上或在近代时期（应注意‘近代’这詞是指第九世紀的），王室都从沒有这样慷慨”。

一而再，再而三，进行新的而永远不会滿意的領土瓜分，可以說是分配封建化的土地——在829、831、833、834、836、837、839年。疆界的交叉、臣服关系的混乱以及由这些連續多次的瓜分所激起的封建的和个人的憎恨心理，这一切，終于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一种局面，以致只有走上內战的道路。在所有这些瓜分中，不容置疑的是王室土地經常散失。主教区、寺院和各郡的分配办法都是一样的。經濟因素已成为这問題中的唯一因素。（“大家都了解：要分

配主教区、寺院、郡、国库领以及一切在上面所说的规定范围内的东西，连同附属于它们的全部东西。”)^①两个兄长不平地说，幼弟查理获得了最好和最肥沃的部分（的确，给了查理以最肥沃和最优良的部分）^②。到839年这斗争的经济性质显然可见了。在进行瓜分以前的会议上，初次使用了关于王室土地、主教区、寺院以及各郡的进款清单。但是，这些“财产统计文件”，对这个目的来说，是太少和微不足道了（因为缺少地方资料）^③。

下一年(840年)，虔诚者路易逝世，那就成为各派党徒发出暴动的信号。罗退耳决意要获得并保持在莱茵河和塞纳河间的和在阿尔卑斯山和法里西亚间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室领的大中央区；路易决心要获得在莱茵河流域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富饶的产葡萄酒的土地（……莱茵河两岸的几个城市以及附近盛产葡萄的地方）^④；秃头查理着眼于获得位于塞纳河和缪司河间密集的王室领（……在缪司河和塞纳河之间……给查理的……主要地区……他自己将坚决保持）^⑤。三兄弟都“赶快以武力或以赐给采邑来拉拢忠臣”。很多人，或者由于希望获得更多的东西，或者由于害怕丧失已得的东西，急不及待地委身于这个或那个弟兄。罗塞耳宣布，一切附庸，无论在帝国的什么地方，除非支持他否则就要丧失土地。有些谨慎的人观察形势，等待潮流的趋向，决心际会风云，飞黄腾达。在这微妙复杂的形势里，所有种族、乡土、语言以及旧臣属关系的区

① Omnes videlicet episcopatus, abbatias, comitatus, fiscos et omnia intra praedictos fines consistentia cum omnibus ad se pertinentibus in quacumque regione consistebant, etc.

② ad Carolum vero plus fertilem et optimam largivit partem.

③ propter ignorantiam regionum.

④ ...nonnullae civitates cum adjacentibus pagis trans Rhenum propter vini copiam.

⑤ ...inter Mosam et Sequanam...ad Karolum ...potissimam regionem ...sibi debeat vindicare.

別,都弄得模糊不清。我們难以断言,在这混乱局面里,高盧大多支持查理,或者日耳曼大多支持路易,或者“中央地区”和意大利主要归順罗退耳。几乎全部阿奎丹都反对查理,东倫巴第拥护路易,萊茵兰——或者說是那里的附庸——分裂于路易和罗塞耳之間,一切都在个人利益或地方观念支配之下。在派系之中,再也看不出地理的或民族的決定因素了。僧侶阶層和封建貴族都分成派系。沒有一个社会阶層,象沒有一个国家一样,在它的臣服方面,是一心一意的。所有的喀罗林帝国旧时偉大統一的观念,都已化为烏有;只有少数失意的政客对帝国的瓦解,还感到伤心。无论什么地方,找不出分裂的直綫。欧洲是在混战的状态里。

对这项难解的糾紛,除战争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于是,发生了封特內战役(841年),在那里罗塞耳对他的弟兄路易和查理英勇地作战——編年史家描写他怎样乘馬冲入战場,昂然站在馬鞍上,揮舞宝剑象舞打禾棒。因为丕平^①現已死去了,弟兄中沒有一人肯承認他的兒子丕平二世对他父亲阿奎丹“王国”的繼承权。有一个当代的历史家一語道破了这大規模战役的封建性質。他說,“在这战争里,每一个人或者为了扩大自己的領地,或者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搏斗。”封特內战役是一场派系之战。弟兄互相敌对。郡伯尼塔尔(从他的笔下我們看到这冲突的最清晰的历史)站在查理方面作战,而他的弟兄安吉尔伯特却站在罗塞耳的旗帜下。据說,在所有的繼承都依循男系的时代,香宾却有准许女系繼承的风俗,其原因是貴族在封特內战役里屠杀已尽。

可是,不到一年,罗塞耳同意了談判和平条件。在耶穌复活节时(842年),两个弟弟会集于凡尔登,长兄罗塞耳的使节也来到那里,当时罗塞耳已有傾向談判的意思。两个弟弟同主教們經過四

① 丕平是查理、路易和罗塞耳的弟兄,死于838年。——譯者

天的商議之后,做出一項答复,即罗塞耳可保持他的旧領土,意大利、罗尼河流域以及“中区地”(但这最后一地不包括查理所要求的亚尔丁和喀波那里——“炭林”在內)連同那里的一切王室領,主教区、寺院及州郡。但是,罗塞耳拒絕了,他說这不够报酬他的党徒,特别是因为他必然要补偿一切在別的王国内丧失了采邑的人。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在这一点上讓步了。

瓜分的一般性質,現在已經拟定,因而初步条約于842年6月15日,在梭恩河上近馬康的一个島上签了字。至于解决办法,委托給一个委员会进行。路易到薩克遜去鎮压那里的农民起义,查理侵入阿奎丹,来压制他的侄兒丕平,而罗塞耳則往亚尔丁山的森林去打猎了。委員們也把他們的會議地点迁移到科不林士的圣卡斯特教会去。他們早就知道他們沒有掌握十分完备的資料来作出公平的分割,因而在夏季时期他們派出了許多“調查員”去搜集有关的統計資料并作出有条有理的报告。可是,這項調查所花的时间,超过了預計的时间。的确,“調查員”和委員們在整个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里,共同进行了編輯資料的工作。正是这个季节的严酷气候,减弱了貴族們的貪婪欲念,再也沒有一个人叫囂新战争了。

讀者当听到中世紀政府、中世紀教会、中世紀业主是精明的帳房时,也許会发生惊讶之感。他們的档案櫃內塞滿地租簿、賦稅表、收支紀錄簿、丈量冊、財產清單等等。这全部管理技术可追溯到羅馬帝国时代,而中世紀僧侶和封建貴族就是从那里获得了这种技术的。上文已講过,偉大的格列高里所掌握的統計資料,一定非常完备。当日耳曼人定居于羅馬各省并建立他們的王国时,他們利用了各省政府档案中的土地丈量冊来在他們自己和羅馬业主之間分配土地。据都尔·格列高里在580年关于契尔柏立克的記載,墨洛温朝曾企图修訂这些賦稅冊,使之符合于当时的情况,但沒有

成功。契尔得柏特曾派遣官員往波亚叠去登記当地居民的资产。到了第六世紀已用“多頁簿”(“polyptichum”)这个名詞来称呼这类統計文件。查理·馬德爾在頒布他著名的《还俗令》之前,已作出教会土地的“估計”。邦尼非斯曾要他所建立的寺院保持詳細帳册。751年当丕平把他父亲所沒收的教会土地部分还给教会时,他在事先已做好规划書。765年时麦次·克洛杜岡进行了他的主教区內的戶口調查。查理曼的各项詔令和《庄园詔令》指出了,大皇帝曾是一个多么精明的管事員。对每一个派出去的“收稅吏”,都发給一張征稅表;他所征收的不得超过那張表上所認可的稅款,違者将加以罰款和免职的处分。这类表册中,有些片断一直流傳到今天,特别是《簡明实例》。

有充足的証据来确定下列事实:喀罗林时代的盛世是以国家和教会方面力图整頓它們庄园的管理为特征的。喀罗林朝的复兴产生了大批规划,要把王室庄园以及从它們分出去的采邑的行政管理系统化起来。关于王室行政所作的这些努力,对安排宗教机关,不会是沒有影响的。兰普勒赫做得对,他以《簡明实例》和《普律姆租簿》相比較,来表明这两个領域間的联系。查理曼在777年曾命令进行薩克遜人的戶口調查。在他的妻子喜尔得加德去世后,在783年編造了关于她的財產清册。在787年还編造了关于圣汪列尔寺院的財產清册。在803年,对全部应服軍役的法兰克人,进行了戶口調查。808年时,进行了另一次戶口調查,調查所有領有少于三所庄园的法兰克人。812年时,对一切采邑,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在內以及国庫領,进行了一次詳細登記,“使朕得知朕有多少財產。”在这調查册內列出了个别庄园、建筑物、住宅房屋、家具、谷物、牛羊、馬匹、家禽以及按职业分类的人口。在第九世紀,这项統計資料的卷册大大地增加起来。829年时,虔誠者路易曾命令全帝国进行軍事戶口調查。846年时,主教們在摩城會議上曾向秃头

查理請願，“編造”(当时所用的術語)“一張表冊要列入您祖父和您父亲时代屬於王室的領地以及那些作为采邑而保有的土地”。不幸所有这些世俗財產清冊，已經失傳，但是还有两种寺院清丈冊的实例：一种是在圣泽門寺院于811和826年間所編的《財產統計冊》內，另一种是在圣勒米寺院的《財產統計冊》內(約870年)；它們都是第九世紀的两种无价之宝的統計古文献。我們知道，有很多这类寺院清丈冊曾在这个时期編制出来。秃头查理，看来是由于貧困所迫，对这类財產清冊，是頗感兴趣的。

从上面的証明看来，842年时派出委员会来登記一切有关行将分割了的王室領和采邑之举，不是一件空想的事情。亚琛的王宮各局以及地方档案局当然掌握着一切必要的資料，而每一个宗教机关也都知道它所有土地的范围、从这些土地上所得的資財以及在这些土地上工作居民的人数和等級。

在843年夏季的后期，委员会又在凡尔登集会，在那里，委員們有着一切由調查員所搜集的統計資料，因而于8月10日簽訂了最后解决条約。非常明显，在这領土的分割里，經濟利益是占着最高地位的。土壤的肥沃、产物的种类、人口的多少以及地位的接連，都是主要考虑之点。这分割是把主教区、寺院、州郡和王室領划作三份来分配，对于它們的面积和它們的資源，也曾特別予以注意。路易曾坚持要法兰哥尼亚的富饒葡萄园，并曾以放弃科倫周圍的下萊茵河領地来換得了它們；而这下萊茵河土地給予了罗塞耳。这样看来，路易为了經濟的利益，不惜牺牲了原来所主張的“語言区别”的原則。

显然可見，这样一种分割領土的形式，就是，把主教区、寺院、州郡和王室領象一把紙牌般地分出去，漠視了也違犯了任何关于自然疆界、关于种族、关于語言的区别，連經濟的安排，也因此有所不便。王国間的界綫形成了一张杂乱无章的网；有的符合有的不

符合于种族和語言的區別，有的依循几哩的自然界綫，象河流那样，但多半是穿过河流、越过山脉的。每种財產，以那时所使用的話來說，是放在天平上权衡过的。如果一份財產証明是太大，不能作为单一的分配物，那末，把它弄碎或分裂开来。以二十世紀眼光去看，这样的办法似乎是令人惊异地不公平的。但是應該記牢：那时既沒有种族感觉又沒有民族情緒存在。王国只不过是封邑的集合体。封邑是庄园的集合体。政治思想是完全屬於地方性的——屬於一省、一郡或一塊封邑。两个統治的集团，即僧侶和貴族是屬於同一階層，屬於同一等級，在各王国内都是相同的。农民，即农奴和賤农，也是屬於一个等級，可是屬於一个微賤的階級，被束縛于他們的地主的領地上。在各王国内，他們的身分和状况也是无分軒輊的。这样看来，人們的政治观念，是沿垂直綫起作用的；下面的人，無論貴族或农奴，仰視在他上面的人；上面的人，也無論貴族或农奴，俯視在他下面的人。当时既沒有关于社会或領土幅度的意識，也沒有民族的或国家的情緒。

如果有人对第九世紀內战的經濟性質还有怀疑的話，870 年的事件可完全証明这一点。不顧他們的侄子路易二世对洛林王国的权利，也不顧教皇的抗議，两个叔父于 870 年 8 月 8 日，在米尔森竟簽訂了分割条約，按照“分裂而征服”的古老办法，把“中間王国”瓜分了。我們确切地知道，这次分割是怎样实行的，因为我們掌握着詳細的文献，而这些文献表明了过去在凡尔登是怎样做的。整个王国曾被認作“領地”。843 年的經驗还没有忘掉，統計的清丈册和地图也沒有遺失。“那次分割是十分精密的，表册上列举了所有的点滴，象立契約者做的一样。”条約条文，先为路易，后为查理，列举出所有的主教区、寺院、州郡来归入各人所有。关于国庫的庄园，沒說出名字，但也包括入主教区和地方表册上，象一句老話常說的那樣：“連同在它的範圍內的一切庄园，領主的和附庸

的。”^①路易获得了两个大主教区、四个主教区、四十三所寺院、三十一个郡、四个“半郡”及两个“区”(郡的片断地区)。查理获得了三个大主教区、六个主教区、三十三所寺院、三十个郡以及四个“半郡”。里面,沒曾提及天然疆界,也沒曾說到人口的血統和語言的差別。就尽量努力分割得公平这一点上看,米尔森条約比843年所进行的有損害的領土分割已前进了一步。因为两个国王实际上各被授予了完全包圍于其他王国領域內的領土。封建制度真的胜利了。

到了喀罗林朝諸王历史的末期,他們在东方和西方浪費了他們的世襲領,因而把自己的立脚地挖松了。甚至当他們幸而获得了新土地的时候,他們也把这些土地消耗淨尽。例如,906年时,有势力的巴本堡尔族从法兰哥尼亚被逐出而它的广大領地归国庫所有了。当时,这些土地就分配給朝中受寵幸的貴族,而教会由貪婪的馬因斯·哈托为代表,也取得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财产和土地……归国庫所有而作为王室贈与分配給貴族”。^②到了911年,日耳曼龐大的国庫領,除了分散的零星小塊土地外,什么也沒有了。国庫領在法兰哥尼亚有八十三塊,斯瓦比亚有五十塊,巴伐利亚有二十一塊,瑟林吉亚有十二塊,薩克遜有五塊,佛里斯兰有五塊。这些中萊茵的产葡萄地是最富饒的部分——“因为这些地方盛产葡萄。”^③就这一方面看,西方喀罗林朝比东方喀罗林朝更貧困。

但是,瓦解的过程还没有跟着帝国的分裂和国庫領的分散而达到終点。封建制度和瓦解的势力,同样在各王国本身,也起着分

① cum omnibus villis in eo consistentibus, tam dominicatis et vassalorum.

② facultates et possessiones... in fiscum redactae sunt et dono regis ad nobiliores quosque distributae.

③ propter vini affluentiam quae in his locis exuberabat.

裂和分解的作用。因为帝国曾变为一个广大而无定形的封邑集合体,所以各王国势将分解为个别的封邑,而由于各省内地地方上有着人种、語言和风俗的历史残余,这种分解的速度就更加快了。这一过程在法国和在意大利比在德国,更走极端;其原因是:在“罗曼”語地区内^①,两种偉大而不相同的文化,即羅馬文化和日耳曼文化,虽互相混杂而尚沒有徹底融合起来,而在日耳曼方面,人种、語言和制度的單純性較强。

当时,有組織的强盜帮会——而强盜們也是貴族出身的,編年史家称这批人为“邪教徒”、“盜匪”、“暴徒”,而称他們的帮会为“匪党”(herizuph)——橫行全国,在国王、教会及其他貴族的土地上,进行掠夺。这批“惡魔党徒”,象大主教欣克馬尔有一次曾称呼他們的那樣——理姆教会的土地上曾遭受他們可怕的劫掠——結成了一个帮会,其中成員以永不互相叛卖、經常共同行动的誓言团結起来。但是,所有的这些暴徒不是完全屬於俗人。若干主教正是一样貪財,一样强暴。主教凡尔登·哈托在封特內战后,变节投降了罗塞耳,由于他的肆无忌惮和貪得无厭的扩充主教領,变为臭名昭著。主教和住持之間存在着永恒的仇怨,他們象貴族一样地为爭夺土地而互相搏斗着,而且象狼吃狼一样地互相厮杀着。欣克馬尔的胞侄及同姓名的主教隆城·欣克馬尔,曾受秃头查理的委托来管理若干王室領,不料他們把这些王室領并入主教領內,并且竟以武力来抗拒国王收回它們的企图。

在这样互相攻击的状态下,并由于这种使用暴力的方法,喀罗林朝时代旧有的大土地占有制已漸漸地縮減为小土地占有制了。查理曼时代的广大領地四分五裂,分成为較小的領地,因而出現了一群小业主貴族。連农庄和庄园在这压力之下,也趋于瓦解。庄园

^① 指拉丁語系地区。——譯者

分成为小塊地,即以前单一庄园的零碎部分。在第九世紀历史的紛乱實驗室里,喀罗林国家的要素分解为分子,而分子再分解为原子。各种东西——政府、法律、制度、社会——都是有着几乎无限的地方分化和分裂主义的傾向。第九世紀的分裂主义不是一个种族或血統的問題,而是一个家族的問題,因为这些家族的利益已变为地方化了。

然而,我們会犯錯誤,如果認為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只是一个破坏性的过程。一个改变和轉变的时代在历史上很少是一个完全衰敗的时期。第九世紀经历了新欧洲即封建欧洲的分娩的痛苦。按这个偉大意义來說,这是一个醞釀的时期。喀罗林朝的各种制度已不复适合于正在前进着的新时代,因为它们既沒有必要的活力,也沒有必要的伸縮性来在发展了的新条件下保持它們本身或帝国。封建制度的胜利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第九世紀中期,法兰克帝国已成为一个龐大无比的过时貨了。新的势力正在与腐敗和分化的旧势力并肩而同时起着作用,就是說,它們在一个更为符合时代条件和时代精神的新基础上,起着重行团結政府和社会的作用。从腐烂的旧东西所造成的土壤上,注定要成长出新的更为繁盛的封建欧洲。尽管大封建主掠夺王室領地和王室特权的行为是自私自利的,尽管他們的策略往往是殘暴、貪婪和不公平的,他們甚至干着篡夺和搶劫勾当,他們甚至常常使用暴力,可是封建制度的本質却是不差的,这从长期历史上看可以得到証明。

看来,有系統地使用主要从下級封建主募来的武装队伍,可归功于塞普替美尼亚·本哈特。可是,前途将是掌握在这些暴徒手里。他們将成为法国的貴族、附庸、十字軍队伍的祖先、公爵和显貴。国王柔弱,这批人强大,所以当地社会自然而然地傾向集結于强有力者的周圍。帝国制度往往和地方制度格格不入,并且往往压制它們。而地方男爵却懂得它們,反映它們,而且应用它們。

但是,这种地方自治的新精神,不一定是集結在最大的地方巨头和世襲領主的周圍。这类巨头多半屬於法兰克人系統,因而不足以代表当地的情緒和矛盾。其次,小封建主、低級貴族以及那些害怕自己的自由地被强大貴族并入封邑内的自由人,有时还有那嫉妒地方上俗人优势的地方主教或有势力的住持;这批人是反对大貴族的企求的。他們了解:这些野心貴族是披着“公共福利”的外衣,爭取他們自己的利益。他们对高級貴族抱着嫉妒和怀疑的态度。所以,当高級封建主努力反对王室或互相反对的时候,低級封建主和自由人則努力反对高級封建主。低級貴族不时贏得胜利,因而国王由于害怕大貴族的权势,常常以他的势力,来支持小貴族,甚至来支持一个地方上既孚人望又有力量的本地人,尽管他完全不是貴族出身的。法兰克老貴族,由于多次內战、“北欧人”的侵入以及薩拉森人在南法沿海岸劫掠的結果,已經可怕地縮減;这一情况使这新的男爵阶層更加容易抬头,而封建制度遂按照新貴族生根于土壤的程度而成长着。

在第九世紀,这批“白手起家”的草莽英雄的成长,是一个有趣味的政治社会現象,也是一个实例,可說明“补偿律”在一个紊乱的无政府时期,对挽救社会瓦解所起的作用(“这样,群众以习惯法来遏阻我所反对的盜劫和掠夺,好象依法行事一样”——給“汇合处”^①的通告,860年)。^②坦尼描写了这项过程:

在查理曼以后,各种制度都沒有了。但是在这时期,从国家的瓦解里培养了尚武好战的一代作为补偿。每个小首領穩固地立脚在他所占据的或他所保持的領地上。他保有这領地,不再在受托的地位或在使用的地位上,而是作为财产和遺產了。那成为他自己的庄园、自己的村庄、自己的郡邑了。

① “汇合处”(Confluentes)指科布林士城,因位于摩塞耳和萊茵河的汇合处而得名。——譯者

② “Istas rapinas et depredationes quas iam quasi pro lege multi per consuetudinem tenent”—Adnuntiatio ad Confluentes, 860.

那不复属于国王；他要求它是属于自己权利范围的。在这个时期，保护人，即保管人，就是一个能够战斗或能够保卫别人的人……贵族按当时的语言，就是战士即士兵……他的世系是无足轻重的。他常常是一个喀罗林朝的郡伯、一个国王的受封者、或新近无主人的领地上的一个强硬业主。在一地，他是一个尚武的主教或者一个豪勇的住持；在另一地，他是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一个退伍的匪徒、一个发达的冒险家、一个粗暴的猎人……无论如何，这时代的贵族是勇猛的人，有权势的人，善于使用武器的专家；他不逃走，不付赎金，在队伍的前头挺出胸膛稳固站立，以他的宝剑，来捍卫寸土尺地。为执行这种服务，他无需乎贵族祖先的①。

必须认识到，由于封建制度的成长，欧洲人感觉到从后期喀罗林时代的愁苦状态里获得了转机。尽管有弊病，封建制度比频于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总是好些；在男爵的法院里，连农奴也有了地位。“所以我们看到欣欣向荣的状态和成长着的文明，在野蛮、无秩序和暴虐政治的混乱局面里，酝酿起来了。”

老贵族对这些“暴发户”的憎恶，可以说明当时贵族的倾向。当虔诚者路易提拔一个农奴子厄波充任理姆大主教职位的时候，高级贵族和高级僧侣都大声抗议；因为随着教会越来越封建化，主教也日益从封建家族里遴选出来。反宫廷派对塞普替美尼亚·本哈特所控的罪状之一是：他本人虽属高贵出身，但靠摧低微身分的贵族，甚至靠庸平民出身的人们。844年当秃头查理为了他被控叛逆而把他恶毒地杀死的时候，他的犯罪行为，事实上不见得比很多别的贵族要坏；他们也力求建立地方政权。但是，他犯了一个不可宽恕的“破坏等级”的罪行，因而大封建主把他彻底毁灭了。而在日耳曼，斯瓦比亚贵族仇视胖子查理的首相刘特华，并驱逐他下台，因为他是出身微贱部族的。当朱狄司公主和法兰德斯的鲍威尔淫奔的时候，康边宫廷大为震惊，因为在贵族的目光中，那是一

① 坦尼：《旧制度》，第6页。

件下嫁的醜事。“有些大貴族无疑是从老根上生长出来的嫩枝,或者是老树干上的接枝,但大多数是不談,不注意,也不知道这种世系的。”在两三代之内,这些暴发貴族的地位就和旧貴族不相上下了。当法兰克旧貴族逐漸从地面上消亡的时候,新的白手起家的貴族遂取其位而代之了。王座不仅对土地巨头丧失了它执行司法、征收賦稅和征集軍役之权,而且对封建等級制之外的农民和手艺人,也丧失了控制权。它在这种社会和政治退化的状态下,依靠社会的有机性而获得了拯救。社会安排的新形式、政治权力的新形式遂应运而发展了。

为使旧庄园体系維持久远,一种象查理曼时代所流行的秩序是必要的。可是,当欧洲被北欧人、薩拉森人、匈牙利人所騷扰而又被內战弄得四分五裂的时候,則情况已經改变了。战争破坏并分裂了領土。战争已使人口移到設防地点、城堡庇护所或者有城垣的寺院去。这过程产生了重行分配土地的需要。村庄已被破坏或改变面貌。社会生活集中于村庄的或市鎮的集团,因而把它們联結起来的重要性也增加起来了。城堡和砲壘、設防的寺院和有防御工程的庵堂,替代了旧式庄园,作为庄园組織的中心。城寨成了領主的住所。領主的隔离状态需要以分封土地的方法来分裂領地,就是分裂旧領地并构成新的封建的和領主的“权利”。結果是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城堡的建造,最鮮明地表現出这个新时代的暴力和地方权力强大的性質。在查理曼时代,当治安权可以有效地行使时,当帝国全境有法律和秩序而只在边境才有战事时,业主階級曾住在不設防的乡村住宅上而农民也住在空曠的村庄里。但到了第九世紀这项情况已经改变;当时的帝国境内战争頻仍,盜賊橫行。安全,即保护生命和财产,是社会最急切的需要;当政府——特別在法国——显得无力保障安全的时候,大地主貴族階層的成員就自行处

理事情，建造了城堡来捍卫他們的領地以防止北欧人的侵犯或防止他們周圍的强盜搶劫。可是，这种措施不一定是由于政府的疏忽所引起。貴族自然而然地認識到：替国王建造城堡将要加强王室，而这是他們所不愿干的。秃头查理曾不止一次地被迫中止那些为防御北欧人侵犯王国所必需的砲台工程，因为他不能获得守卫砲台的人。貴族是太爱疑心了。当路易三世在安得那赫战役之后企图在喀姆布萊附近建筑城堡，以防止北欧人侵入的时候，因为这个理由，他不得不放弃了这项計劃。

建造城堡的权利，是一项主权，也是一项王室特权。現在这项权利被封建主篡夺了。在法国和意大利——但尚沒有在日耳曼，因为在那里国王的权力还强——这些建筑物开始兴起，那是封建制度的一个真正表現。人們可以想象，这种建筑物無論在北方或在南方的沿海，都有需要的正当理由：在北方海岸，北欧人一年比一年更加猖獗起来，而在南方海岸法国和意大利的沿海城市遭受着薩拉森海盜的擄掠。但是，实际上城堡的建造也在国境的正中心进行着。因为随着領土的封建化，每个封邑都有它的边疆。連微小的地形差別，象一个小山脊、一条溪流那样，也成为一条界綫了。每一塊形勢有利的地点，象一座峻峭小山、一个悬崖絕壁、一个两河合流的河湾（在那里成了一个自然可資防御的三角地带）那样，都被占夺而設防了。而在沒有这些地勢的平坦空曠的原野上，則采用了粗笨的工程；堆起一个人為的土山，在山上建造城堡，而挖出了泥土的渠，正好成为城堡周圍的壕沟。

国王向这新的无可奈何的形势屈服了。862年时，秃头查理曾頒布一道著名的詔令；他先在序言里描写了令人可悲的混乱状态，然后在正文里承認了自己对保障安全的无能为力，因而指令：每个地主貴族应以建造城堡作为社会义务。这是一項多余的《罪己詔》，因为在他周圍，这些阴森森的建筑物已經高插云霄。“保护”多半

是一个空洞的借口。这些城堡成了强盗男爵的巢穴、匪帮的集合所；他們劫掠周圍的乡村，赶走农民的牲口，拦劫商人和旅客，敲詐主教和住持。无防御的自由人和农民，被劫的僧侶、香客和商人大声抗議。他們很古怪地捧着聖經說：北欧人的侵入是偶然的，在掠奪之后就走了，但是这批强盗們象穷人一样經常纏繞着他們。因此，在864年秃头查理命令拆毀城堡，而这些城堡正是两年以前由他認可而建造起来的。這項命令只是說說而已。国王对他提倡建造城堡的行为果然自認不当，可是，他沒有破坏它們的力量了。封建制度已到了可以不理睬国王而站住脚跟的程度了。

然而，建筑这些城堡，从当时的需要来看是有正当理由的。在設防寺院的牆垣周圍，在上面造着城堡的山脚下，不自由的居民集結起来，感激領主的保护，即使它是殘暴的、蛮橫的。封建早期的急切需要，是保护和安。那是以付出自由的代价来获得的。农民的屈从农奴制，不是全部出于男爵的强暴；常常有乐于接受的。自由人的归入封建体系，也不是完全由于强者对弱者恐吓的結果。封建世界的委身制和附庸制，庄园世界的农奴制和賤农制，都曾是社会的需要。它們遏阻了无政府状态，它們保护了生命和財產；正因为这样，它們代表着社会进步的現象而非社会衰退的現象。

在小說里，这些城堡被說成是石头造的建筑物，有城垣、城塔、吊桥、城門的格子吊閘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是在城堡建筑的后来的远为进步的时期所发展起来的。欧洲的这些早期城堡，是用木料建造的，形式上很象美国早期边疆上的砲台，例如芝加哥的皮特砲台、文森茲砲台、第耳本砲台以及后来的“远西”^①堡壘。它們仅仅是四方形的木头防舍，有寬闊的屋簷，陡峭的頂，还有几个洞口；如果使用浸着松香水的发火箭头使屋頂着火，或者敌人迫近城堡周

^①指美国的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区。——譯者

圍的木栏或木柵放火燃燒牆垣时,可以从这些洞口,把水傾入。城池仅仅是一条沟渠,有横过它的吊桥。窗戶是窄狹的裂口。在由城池和木柵圍着的广场之内,有几所房屋,当警报发出的时候,有逃入城堡以求領主保护的农夫寄宿在那里,并且可以寄放牲畜群。每个城堡的不可缺少的附屬物,是一口水井。在第九世紀,城堡除非建造在平地上,必須依靠蓄水池和雨水。在一百呎或二百呎或三百呎高的山頂上,穿过坚硬的岩石来挖出一口水井,需要几百个农奴好多年的辛苦劳动。

城堡的兴起和它們的遍布欧洲,在生活方式和文明性質方面,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变革。它們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軍事占优势的时代,就是封建时代。在第九、第十、甚至十一世紀,即在封建制度已自觉有力并发展成为一个巩固的政体之前,生活对社会上一切階級來說,是又困难又粗野的。只在封建制度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制度的时候——至少达到象人类政府在任何时代所可办到的合理管理程度——城堡里的生活才变为又文雅又舒适了。到那个时候,軍事建筑也已进步到这样的程度:城堡不复仅仅是木头防舍而变为寬敞甚至雄壯的石头建筑物了。坦尼生动地描写了第九世紀这种頹廢文明的情况:

在这战争連綿的时代里,只有一种統治是合适的,即以一群人的統治来面对敌人,而封建制度便是这样;我們单从这一特征,就可判断它所防御的危險以及它所要求的服务。西班牙《編年通史》上說,“在那些日子里,国王、伯爵、貴族和武士,为了隨時作好准备,把馬匹放在房間里,在那里他們和他們的妻子一同睡。”伯爵在他的塔楼里保卫着一个谿谷的入口处或一个渡头的通路,边境上的郡伯絕望地奔赴漫天烽火边境去,枕戈达旦……他的住所仅仅是一个篷帳和躲避所;草蓆和树叶鋪遍大厅的地板上,这里,他同他的武装騎兵休息着,如果有睡覺的机会,他便卸下靴踵鉄;牆垣上的槍眼几乎連日光也不能透入;主要是防止被箭头的射中。

由于这些勇士,农民得享安全。他們不再被屠杀,不再被牽去作俘虏,

他同他的家屬不再被趕在牛羊群里走着，頸脖被架入叉耙里。他敢于出門犁田、播種并依靠自己的收穫；他知道萬一遇到了危險，他和他的谷物、牲畜能够在砲台腳下的木柵圈內找得避難所。由于需要，主塔^①的軍事首領和曠野的早期居民之間，逐漸有了默契，而这就变为一个公認的習慣法了。他們替他工作，耕種他的土地，代他運貨，付他報酬，付若干房屋費，若干牲畜費，若干繼承或出售費；他們被迫維持他的部隊。但是当他享受了这些權利之后，如果出于驕傲或貪婪心，他还收取超出他所應得的东西，他就錯了。至于游蕩的可憐人在普遍混亂和破壞狀態下懇求他庇護時，則將遭受更苛刻的條件。土地是屬於他的，沒有他的准許，不能居住在那里；如果他指給他們一方土地，如果他准許他們單純住在那里，如果他要他們工作或以種子供給他們，那么，按照他所規定的條件行事。他們將成為他的農奴……

當我們清楚地想象在那些日子里人類生活的狀態之后，我們就能够了解為什麼人們願意承認最可憎的封建權利……人們生活于或可說開始生活于粗魯而又殘酷的統治之下；他們遭受粗暴的待遇，可是獲得了保護。領主，即主權者兼業主，在這雙重名義下，為自己保持沼地、河流、森林、一切野獸；這倒不是一個大害，因為當時的原野差不多是一片荒地，而他在空閒的時間進行打獵來撲滅大的野獸，尤其是狼。他獨自擁有這些資源，只有他才能够建造磨坊、爐灶和釀酒坊；設立渡口或購買公牛，并為了取得補償，他征收使用它們的捐稅，或強制人使用它們。如果他是聰明的善于管理人們的人，并且要從他的土地上取得最大的利潤，他會逐步放鬆或者准予放鬆那個網眼，因為網拉得太緊，賤農和農奴在里面工作，反而不能生利。由于習慣、需要、自願的或強制的順從性所發生的效果，領主、賤農、農奴到底各自適應了他們的地位，由共同利益而團結起來，構成了一個社會，即一個真實的團體。領主領，伯爵領，公爵領，成為世襲領；由于盲目的本能大家愛護這世襲領，大家對它效忠。領地同領主以及他的家屬遂混淆起來了，在這一關係上，居民引領主以自豪；他們樂于講述他的武功；當他的馬車隊通過馬路的時候，他們拍手歡迎他，由于同情，他們為他的闊綽豪壯而歡欣鼓舞。如果他變為鰥夫而無嗣的話，他們將派遣代表團去請求他再娶，免得在他去世以後，國家將陷入因繼承權而戰爭的局面，或受鄰人侵犯^②。

① 即中世紀時代城堡中之主塔或主樓。——譯者

② 坦尼：《舊制度》，第8—9頁。

正是在这世襲領文化和領主情感的基础上，中世紀時代的物質和道德文明建立起來了。

历史上罕有某种进步而不伴随着某种衰敗的現象的。关于喀罗林帝国灭亡的整个历史，便是这项真理的明証。在第九世紀，北欧人的侵入破坏了布勒塔尼的农奴制，虽然也可公平地說，封建制度从沒在那里有力地流行过——倒不是因为在那里凱尔特人的心里对封建制度，有什么种族反感，而是因为那里土壤的多岩石、大森林和广闊的沼泽地和象封建制度那样的以土地为基础的政体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在塞納河流域（在那里封建制度已是最根深蒂固的），北欧人的侵入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农奴制，另一方面削減了农奴制。懦弱的农夫退縮到城堡的庇护之下，因而接受了奴役，作为获得安全的代价；勇敢的农夫以逃亡并参加北欧人的队伍而摆脱屬于土地的农奴地位。那著名首領哈斯丁斯不是一个北欧人，而是一个逃亡的法兰克农奴。

如果有什么方法能够确定資料的話，那么，关于第九世紀人口减少的历史是有趣味的，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由于資料这样少，除了概述以外，沒有別的办法了。然而，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在意大利、法国和日耳曼，都有严重的人口低落現象，也許在日耳曼人口减少得最少。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和北高盧，情况最严重，前者遭受薩拉森人的蹂躪，后者遭受北欧人的侵犯。可是中高盧和意大利內地，虽然逃过了这些盜匪的擄掠，但由于男爵和男爵間的冲突以及当时的混乱状态，也受灾深重。

第九世紀人口的移动，如果有可能追究的話，也是有趣的。这里，再一次可看出靜的和动的趨勢。当成千累万的自由人落入农奴地位时，坚决而又耐苦的农夫，逃入森林深处居住，以避乱世；而在百年以后，当最混乱的时期过去以后，教会和封建主在那里发现了这些森林里的小村庄，于是它們又把这种居民抓入什一稅的圈

套里和庄园制度的罗网里了。象这一类的移动，是太难捉摸而不易追根究底的。但从下列两个例子里，我們可获得較多資料，來說明整个区内的居民从他們旧地方移到或被移到一个新地方去。在法兰德斯，大批居民部分由于北欧人的騷扰，而更多因为低海岸上遭受海水泛滥，离开了那里；关于他們的流亡記載，我們还可看到。烏得勒支的匿名編年史家早在第九世紀，曾描写这种居民說，“差不多象魚一般地在水中生活着，水从四面八方包圍着他們，所以他們除非乘船，很少同外界接触。”圣柏坦的編年史家曾記述339年的一次洪水，說洪水冲破了当地的天然堤岸——他称之为“堤壩”，溺死了很多人并驅走了更多的人。有的难民被赶到日耳曼去，有的溯萊茵河上行，另有人渡过海峡到英国去。

大批居民从一区到另一区的移动是殖民，虽然“殖民”这个名詞多半是用在比此更加严格的意义上。中世紀殖民史上著名的一章，是关于早在虔誠者路易时代对“西班牙駐防区”的殖民。查理曼战争（在西班牙北部对穆罕默德教徒的战争）曾使比利牛斯山和埃波罗河間的大塊領土，变成一片荒蕪。这荒蕪地带甚至蔓延到塞普替美尼亚。为使这破坏了的地区再有人居住，虔誠者路易把这些荒地賜給寵臣，而后者使用了不自由的佃戶来开发他們所得的土地。但更有意义的是按寬大条件发放大量自由地以利移民。在第十世紀，当罗尼河流域薩拉森人被逐出以后，所遺留的人口稀少地区，也行使了这同一的殖民方法。

在人口移动方面，战争、盜劫、洪水和飢荒是四个最大的因素。单纯飢荒，除非很严重而又为时很长，是不会迫使人口迁移到别处去的。然而，农夫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所遭受的痛苦，远非我們所能想象得到。一个长久的寒冬可以冻死他們的苗芽，一次旱灾，一个多雨的春季，一次谷象虫或蝗虫的灾害可以毀坏他們的收获。有的荒灾是地方性的，其他的荒灾范围較大。我們看到，在第九世紀

中,有六十六次这样飢荒的記載。这一世紀是多灾多难的世紀。这种灾难对破坏社会禁忌的风俗、对疏松人和土地的关系、对增加无业游民、对恶化农奴的地位所产生的种种效果,是可以想象的。当然,这种灾难,即使在較小的程度上也使地主阶级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从耕地上汲取他們的生活費用的。至于这种情况和不满状态如何影响到貴族阶層的渴望土地,甚至他們的反叛和盜劫行为,我們只能推測,但可断言,决不是沒有影响的。我們确切知道:842—843年的严寒冬季曾影响凡尔登条約的簽訂。

在第九世紀,犹太人問題初次出現于中世紀的历史上。看来,在此之前,他們大部分曾住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但到了第九世紀,他們向北散布,而进入了高盧。显然,在法兰克人征服北西班牙和薩拉森人侵犯法国南方海岸时,是有一批犹太人随着他們去的,当时,薩拉森人从海岸曾深入罗尼河流域。犹太人掌握着大部葡萄酒貿易而他們又是利凡得商品——絲綢、香粉、香料等等——的轉运巨商。他們在法国的人数又因罗塞耳一世在意大利驅逐犹太人而增加起来,其中很多似乎是来到高盧避難的。里昂·阿哥巴曾发表一篇著名的《論犹太人的傲慢》的論文来反对他們,那是在中世紀文学里最早的一次反閃族主义^①的表現。

但是,这大主教^②的行为不是单纯地一个固执人的行为,而他之所以进行爭論的动机,也是完全光明正大的。他正面反对一个罪大恶极的风俗,而这一风俗是由帝国中犹太人即大奴隶販子所独有的。他曾禁止他所屬主教区內的基督徒把奴隶售給犹太人來輸出到西班牙阿拉伯人方面,而且还力图用种种方法限止这两个种族間的接触。然而,因为皇帝支持犹太人,所以阿哥巴只能向宫廷上的大臣以及主教們热烈呼吁,以期使事态符合于教会原则……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在虔誠者路易时代,特別在他續娶第二位皇后

① 犹太人屬閃族(另可譯塞姆族),反閃族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譯者

② 指里昂·阿哥巴。——譯者

朱理司以后，犹太人的地位可以公平地說，已达到威脅基督教的程度。查理大帝曾容忍犹太人；而路易还加上了他个人的偏爱；所以在他的統治下，他們享有在漫长的中世紀时期中无与倫比的繁盛地位。他們在他的保护下成为一种特殊人物，同貴族和教会站在平等地位；他們的特权还由一个皇家大員，即犹太人的总监来保障着；——后者竟僭用犹太人国王的称号。他們不負担軍役，他們是帝国商业不可缺少的商人，又由于他們长于理財，普通以包稅任务委托他們。凡是足以滿足他們民族的或宗教的偏見的事情，样样都做到了。他們享有基督徒不得享有的权利，完全的言論自由，每周一次的市場延到星期天，使外族人得举行礼拜式^①。犹太人建造他們的教会并保有他們的土地与牧場；他們完全安全地种植葡萄园并建立磨坊。在皇帝宮廷上，他們以特殊隆重仪式被接待。他們攜帶妻子到那里，在人丛中只以他們的特別漂亮服装而引起注目。皇后朱理司對他們非常亲近，而朝臣也学时髦，竟出席犹太教集会，并贊揚犹太教傳道师的布道甚于自己僧侶的布道。然而，犹太人在法国，不能按照普通法律程序来收回債款。所以，他們必須上訴于皇帝^②。

奴隶貿易，差不多全部在犹太人手里。奴隶是战俘，大部是从日耳曼边境上捕获的丹麦人和斯拉夫人。但是，在薩克遜的斯特林加的动乱被殘酷地平服之后，可能提供了一些薩克遜人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十世紀，古典拉丁文“奴隶”（“servus”）一詞不再意味着一个作为动产的奴隶，而意味着一个农奴了；当时另有从日耳曼东部边境俘获的斯拉夫人（Slav）得来的“sclavus”这一名詞，成了指奴隶的通用名詞了。据十世紀的两个史学家的記載，我們知道，这些犹太奴隶贩子的总部設在凡尔登，在那里他們有一个筑着圍牆的广场来圈禁奴隶。从凡尔登把这些奴隶装船，上行謬司河，而后他們上岸步行，橫过陆地低分水界达梭恩河，再装船下行梭恩河达里昂，从那里下行罗尼河达亚威农，在那里把奴隶从船上卸

① 犹太人以一周之第七日（星期六）为礼拜日，基督教以一周之第一日（星期日）为礼拜日。——譯者

② R. L. 蒲尔：《中世紀思想史的实例》，第 47—48 頁。

下,再走陆路前行,过卡卡遜、那旁、珀皮南和巴塞罗纳,最后到达穆罕默德教西班牙。有时把奴隶从馬賽由海路运出。但是第九和第十世紀地中海中海盜很猖獗,所以这种海运是罕見的。这些奴隶的数目(其中包括有很多妇女,特别是斯拉夫妇女)一定是很大的,而这項貿易一定是很賺錢的。从西班牙史料,我們知道,哥尔多华的閨房用語是斯拉夫語。哈里发的卫队,也是由斯拉夫人組成的。我們有理由可怀疑皇后朱理司的寵臣塞普替美尼业·本哈特从贊助奴隶貿易而获得了利潤;阿哥巴的敌对他,可能除政治原因以外还有人道主义的原因。

但是,奴隶貿易不是第九世紀中法兰克高盧的唯一商业。有人說过,法国的盜风和混乱状态已經普遍存在,使商业的經營不复可能。可是,秃头查理时代的商业活动和商业幅度有力地反駁了这項說法。甚至北欧人侵入的破坏性,也无疑地曾被夸大。

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細节,我們愈深入研究便愈觉得必須以保留态度来对待十八世紀本尼狄克派学者所得出的总括性的旧論断;他們說,“至于文化、政治和商业方面很少有古文献可以教导我們。”資料虽然少,时代虽然艰难,但第九世紀所保留下来的文明遺跡,多于一般人所設想的。海上商业,由于地中海上穆罕默德教海权的阻撓,果然已經消逝,可是內地貿易还繼續保持着,在規模上比过去所猜想的要大。在下文,我們將看到連北欧人的侵入也不是完全对貿易有損害的。

有些著名史学家常常主張:在第九世紀——甚至在第十世紀——商业和貿易差不多已完全停頓,而这种說法曾广泛被人相信。但是,查理曼帝国的商业繁荣状态不曾跟着他的逝世而立刻消灭。他所創立的良好海防制度,只是逐漸衰落下去。一直到838年时,我們还可看到虔誠者路易恢复海峡舰队。在841年以前,北欧人对法国的侵掠还不算兇猛,而在秃头查理时代之前,薩拉森海盜船也

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危險。法里西安布匹貿易，在虔誠者路易時代（814—840年）里繼續進行着。甚至在北歐人入侵的整個時期，這項貿易還得維持下去。下謬司河畔的馬斯特立希、提羅安尼的聖汪列爾寺院以及亞貝威勒附近的聖里奎爾寺院，都是布匹織造業的重要地點。甚至在第九世紀的晚期，雖然杜爾斯特德曾五次被北歐人侵犯，而兩次被焚燒，可是法里西安布匹貿易還得存留着。829年時在瓦牧可以看到法里西安商人的居留地；886年在馬因斯發現了另一居留地，在那里輻集着多瑙河商路及從倫巴意大利來的貿易大道，而在喀羅林朝和薩克遜朝時代馬因斯是萊茵區的商業中心。威特蘭，位於謬司河口，重要性雖次於克匡都維克，但還被稱為一個“商埠”，是一個小安特衛普^①。

下萊茵河、謬司河和謝耳德河的地區，從羅馬時代以來一向是一個轉運的重要地點，就是，以北歐、不列顛、斯堪的那維亞的商品來交換南歐和東方商品的一個地區。可資證明的是有大量從別的地方來的貨幣曾在這個地區發現，或者是有大量在“低原國家”造幣廠製造出來的貨幣曾轉運到別的地方去。第六世紀的法里西安貨幣是模仿拜占廷貨幣的。在墨洛溫時代，在杜爾斯特德、在馬斯特立希、在赫伊、在第南特所造的貨幣，比在高盧本地法蘭克造幣廠所出的貨幣，並不見得少。杜爾斯特德造幣廠所出的貨幣給瑞典和波蘭提供了最古的錢幣類型。虔誠者路易時代是以船為國徽的；克旺都維克貨幣上也刻着這一圖案，而克旺都維克是法蘭克帝國的主要海峽港口。在第九世紀後半期，馬斯特立希被稱為一個刻在它的錢幣上的“港口”；都爾內和瓦崙西恩的情形，也是這樣。

布勒塔尼的半島形狀，在早期已使它容易遭受北歐人的侵犯；北歐人一定有時曾阻斷下羅亞爾區同布勒塔尼、加斯科尼與愛爾

^① 即尼德蘭的大商業中心。——譯者

兰之间的贸易关系，而这种关系从查理曼时代之前起已是相当深的。可是，波特芬沿岸的食盐贸易、比斯开湾渔业，甚至布勒顿—爱尔兰贸易，在整个第九世纪中，仍继续下去。显然，布勒塔尼同南法海岸的海路贸易一定会存留着，至少直到第九世纪末期为止。圣加尔的“高僧”不会是无缘无故地说，那些侵入那旁港口的北欧人船只曾被误认为布勒顿船只。但是，要引述在后期喀罗林时代布勒塔尼商业的很多细节，是不可能的。最有关系的资料，是848年的一项特许状，规定在公爵诺米诺斯时代倍因斯的领主对商人以及运输商人在乌斯特河上的权利。勒敦附近的巴隆寺院的僧侣及緬因的巴索林姆寺院的僧侣都要求那港口税的一部分；这港口税是根据一个早期赐给的而提不出证明的特许状对商人及乌斯特河上运输征收的。公爵因为没有书面证据，曾召唤四个有关牧师区的最老居民来证明，他们宣称：从很早时期以来，航运权是属于倍因斯的领主，而不是属于巴隆和巴索林姆的住持的。难道不可假定其他布勒顿港口和“闹壩”（而它们在数目上是很多的）有类似的商业活动吗？

对南特和下罗亚尔区的商业来说，北欧人的偶然侵犯的确是个不幸，但更大的不幸，倒是法兰克人和本地布勒顿人为争夺那里的统治权所进行的残酷斗争。伯爵蓝伯特和布勒顿公爵伊立斯波各向北欧人乞援。这冲突当然把教会捲入了漩涡，公爵支持南特主教区的一个候选人，而国王支持另一个人。结果，国王的被保护人另外给予都尔的大主教职位（885或886年）。而那胜利的主教阿克太得到南特港口税的一半，但后来他被伊立斯波的继承人撒罗门逐出。他在被逐以后，进行报复，竭力破坏南特的商业名誉；造謠說該城在853年已被北欧人全部毁坏，并說它在868年还完全是一片荒凉，但事实上，北欧人在853年的占领仅仅是一个暂时现象，而868年时南特已恢复它过去的商业繁荣状态。布勒顿商

业的真正遭受破毀,是在 907 年偉人阿郎死后才發生的。

对北欧人阻塞橫渡“海峽”交通所發生的怨言,最早見于 846 年时盧普·得·菲利厄所写的第七十一封信里,在信上他抱怨說,“担心海上交通的中断”^①。他所指的,是香客旅行的中断,但这同一怨言也可适用于商业方面。但是,直到 840 年度誠者路易去世时为止,法国内地貿易,确是很少受到北欧人影响的。841 年 3 月 21 日,秃头查理曾率領軍隊,乘着二十八只商船,渡过塞納河出征,这次出征終于引起了封特內战役(841 年 6 月 25 日);当时,这些商船曾从塞納河口上溯到盧昂,而逃出了其他一切河上船只被罗塞耳的手下人破坏的命运。喀罗林朝諸王子內战的爆发,是在北欧人深入王国腹地的同一时期,在此之前,法国中部各城市大部还过着它們在查理曼时代享受过的生活。法尔康所著的《圣斐立柏特傳》写于第九世紀,書中說波亚叠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甚至在十世紀的起初二十五年中,沙脫尔城据說也是这样。圣登尼斯的住持喜尔杜因死于 842 年,在他所写的一篇圣徒的《傳記》里,有下列一句話,当然,他所描写的主要是他那个时代的巴黎,而不是皇帝多米蒂安时代的巴黎:“京都巴黎城……人口稠密,商品富足,街衢縱橫,河流环繞”^②。弗勒里城的修道僧亚得里瓦尔德死于 878 年,說得同样生动:“巴黎城是多么著名的首府,过去它以荣誉、财富、土壤的肥沃、最安靜的居民而光輝燦爛;称之为富饒的城市与商业中心,是很适当的。”圣泽門·得斯·普勒斯寺院的一个修道僧爱蒙,在巴黎第一次^③被拉格涅·罗德布洛克占領之后,曾描述巴

① “Intermissa transmarinorum cura”.

② “Parisiorum civitas, ut sedes regia...constipata populis, referta commerciis ac variis commeatibus, unda fluminis circumferente”.

③ “Quid Lutetia Parisiorum nobile caput, resplendens quondam gloria, opibus, fertilitate soli, incolarum quietissima pace, quam non immerito regum divitias, emporium dixero populorum”.

黎說：“在过去人口稠密的……最出名的巴黎城內。”^①在上述两句引語中都有“过去”字样，証明該城已受到損害。可是，甚至在北欧人侵犯的高潮里，尽管有四次侵襲和一次又长久又猛烈的圍攻，巴黎的商业还是存留着。北欧人只有一次曾穿入城內。在845、856、861、865、885—886年，巴黎近郊曾受到严重損害。但是巴黎人向来是遵循同一战略的，即讓河的两岸遭受蹂躪而逃避到島上去。这里僧侶和教士、商人和手艺人都在寻求避难所。从下列情况，我們知道，城內商业并没有完全被破坏：861年1月中，北欧人在立足于下塞納河維塞尔小島上之后，突然在隆冬之际，发动了侵掠，擄走了若干商人。战争和对北欧人的貿易是携手并进的。在《圣柏坦編年史》关于865年这一年的記載里，有一段奇怪的消息，指出了这一点。在那一年，塞納河两岸有騎兵队巡邏。左岸的队伍执行了它的职责，把一支五百名北欧人的队伍逐出了盧昂，后者是正沿着旧羅馬大道向沙脫尔挺进。在右岸由于伯爵阿拉德的疏忽，有一支二百五十人的队伍穿入巴黎周圍，搜寻葡萄酒，可是失敗而返。巴黎近郊的居民主要是手艺人和小商人，其中大多数也許是依附于下列寺院的：圣宅未、圣麦利、圣泽門·勒·瑯、圣劳郎各寺院以及圣馬丁·得斯·香普教会。可是在法国，还是有一些自由工人存留着。皮特里詔令(864年)指出了这一点，虽然这些工人无疑地在递减着。

差不多所有講述秃头查理时代的作家，似无理由地主張：国王的立法到处証明了政府的腐化和社会的瓦解。可是，有重要意义的是862年以前关于桥梁的立法，是純粹屬於商业性的，而无关王国防务的。查理关于市場、貿易等等立法，难道不可認為是商业复兴的标誌嗎？的确，僧侶阶層——特別是寺院——是这项复兴的主

^① “Urbem quondam populosum... opiniatissimam Parisiorum civitatem”.

要受益者，因为大部市集和市場都是授給它們的。但問題是：法国在商业被一般說成是几乎全部破坏了的时期，还有活跃的貿易。

查理象他的祖父一样，認為商业是屬於王室的資產。可是，实际上，他們兩人都曾賜給教会权利在他們的領地上建立每年一次的、每週一次的或別的市場。在第九世紀，这些市場数目上曾大大增加，但我們不知其詳。僧侶們的貪財和男爵們的图利野心与掠夺行为，当然阻碍着商业活动，可是这些新的小市場的激增却標誌出：一种經濟上自发自生的过程，假定可以这样說的話，是在起着作用。从一方面看，王室的特权贈予可認為是王室对商业控制权的衰落象征。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贈予証明了一个进步而非退步的过渡，因为它使社会适合于新的社会經濟条件。第九世紀的突出現象，是城堡、木柵和墙垣的迅速增建；如果說仅仅是为了防禦，是不能完全說明这种新的現象的。

我們必須經常注意到：在中世紀社会里，各种有机的因素——宗教、軍事和商业的——在形成城堡和寺院周圍的这些“集团”里，曾起相互影响的作用。在十一和十二世紀里，关于政治組織和社会結構上的巨大变革，有很多根源。但是，这种丰饒多产的社会过程的开端是可追溯到北欧人入侵时期以及第九世紀的暴力时期的。对这两世紀的历史，我們愈深入詳細研究，我們愈多发现：这个时代就社会变革的起源、社会对新条件的适应、新制度的进化各方面來說，是丰饒多产的。如果說有关的資料少，那不是因为时代不开化所以不曾留有紀錄，而是因为紀錄已被毁灭。然而，还算幸运，我們有足够的紀錄来証明那个时代的有机性的生活。关于这些“新市鎮”的著名例証，可在法国的东北部找到。法兰德斯、布魯日、柏基、伊泊尔都是由于地方社会集中于一个城堡的周圍而产生的。但是，在很远的南方也可看出同样的情况，例如，在魯息雍。

然而，在这改变着的社会秩序里，教会，特別是寺院，所得的利

益，比城堡要多。在它们的城垣之下举行重要市集。商人们在它们的疆界之内并在它们雇佣之下作为经商代理人，往来于法国各河流上，进行活动，这些活动是早期中世纪和十一与十二世纪城市社会兴起时期之间的一个联系环节。卢普·得·菲利厄曾经描写有关制造寺院所使用的这一类船只的情况（在851—852年间的冬季）。这种船只往来于罗因、塞纳和瓦兹各河流上。为了建造船只，他从松斯主教区内玛纳地方运来了二十棵大树。铁似乎曾是最难得的东西。因为水运多于陆运，所以在沿河的适当地点上，这些主教区的和寺院的团体设有存放商品的仓库或储棧，叫做“庇护所”、“小舍”（希腊文“Kasela”）或“祭盆”（“Patella”）。甚至在北欧人入侵期间，寺院还在急切地申请沿河港口的特权；这一事实指明了法国内地贸易还是有利可图的。843年时，准予科米里寺院被免交罗亚尔、塞纳、玛恩、萨特各河上及“朕领土内其他河流上”的一切通行税；852年时，给与都尔附近的圣幸福林寺院这河流两岸的各一港口；859年时，免除圣泽门·得·奥舍耳寺院的各种通行税；同一年，免除标力修道僧的通行税，并给与他们“在叔尼克街上”的一个市场权；860年时，赐给乌耳赫尔教会从这主教区商业上所得全部进款的三分之一；862年时，圣乌尔班寺院获得国王的批准，建立了一个每週一次的市場；864年时，圣登尼斯寺院获得了彭他兹的市場权；867年时，圣瓦斯特寺院获得了“海峡”沿岸的并非不重要的柏尼瓦尔港。但是，圣汪列尔寺院似乎曾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原则，推行到最极端的地步，因为863年时这寺院实际上获得了塞纳河下游的科德柏克作为储貨港口，而这港口正是位于北欧人入侵的道路上。

商业情况如此，工业情况亦然。工业大部在寺院护翼之下繁荣起来。这里，我们无需讨论这一麻烦问题，即罗马帝国后期的工业团体，在蛮族入侵时期之后，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有助于中世纪

行会的起源。我們看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第九世紀里，有大批手艺人的集团附屬于寺院，而附屬于世俗庄园的是較少的。有时，关于建造一所新寺院的消息吸引去大批这类工人，那里需要僱佣工匠、砍石工、木匠、制革匠、染工、染布工等等。第九世紀里，关于这种工业集团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圣里奎尔寺院的集团，但也有关于其他类似集团的例証如在苏瓦桑寺院、在圣登尼斯和它的附屬寺院以及在圣柏坦寺院的集团。

关于圣里奎尔和圣柏坦寺院方面，有詳細的資料可以表明：各种行业是集合在寺院周圍的“各街区”的——据圣柏坦寺院《編年史》記載，是“依行业集聚的”。在圣里奎尔，我們看到有馬具匠街、面包工街、皮貨业街、鞋匠街、葡萄酒商人街、漂布工人街等等，总共有十一个“街区”。这一文献表明了第九世紀一个市鎮的整个工业組織的情况。應該注意：虽然各行业看来是分得很細的，但沒有例証說明圣里奎尔手艺人間会社的内部联系。然而，关于苏瓦桑鞋匠这个例証中，我們曾发现一句令人捉摸不定的話：“鞋匠保护同盟”（“Clientala sutorum”）。但这句話也只不过是指出一个同业人結合的会社而已（也許是起源于日耳曼人的？）。那是喀罗林朝立法所力求取締的会社，也是欣克馬尔的著名条文法所提及的会社。

上述法国第九世紀里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例証，可駁倒当时的修道僧們的悲憤之談，所以我們必須以保留态度来看他們所描繪的那种可怕的混乱景象。当割讓諾曼底給洛尔夫的时候，盧昂还是有一小撮商人的。无可否認，寺院的困苦状态往往故意描写得过分，为的要說服国王来增加它的財產。当然僧侶們常常忍受艰难和愁苦，但这是在完全相对的情况下而言的。他們受的苦比老百姓少，而且他們因此而获得了大量的补偿。布尔乔亚尖銳地說过，“僧侶們借助于伪造的証狀，一般所得的比所失的要多。”

关于法国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我們可从“丹麦金”^①的历史,获得其他有价值的例証。商人曾好多次繳納这种捐税。860年时“国王查理对教会的倉庫以及一切商人住所,也对穷人征收了捐税”^②,在下一年,这些商人(或其他象他們一样的商人)象上文所說,突然遭受了北欧人对巴黎近郊的侵襲。866年时商人再次为了繳付什一税而被估产。然而,关于那时法国的商人阶層,877年的康边大《征税令》以及同年后来不久在基尔賽所頒布的对这命令的补充条例,都提供了最詳尽的資料。在前一項命令里,行商和坐商按照他們的财产都須繳納“丹麦金”。但征集这项捐款的手續証明是麻煩的,所以六週以后,在基尔賽于877年6月14日从王国的其他商人另征收一項規定的款額——从卡皮人(也許是叙利亚商人)和犹太商人征收十分之一(他們資本的十分之一?),从基督教商人征收十一分之一。

弄清楚上述的商人集团的来历,是很有趣的。877年法令所提及的坐商一定是有关860、861和866年所提及的那些商人;他們以巴黎作为基地,利用河流作为交通大道,經過法兰西島和香宾,进行貿易;并且也許在塞納河上游察柏斯进行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貿易。在1121年路易六世所发执照里第一次正式承認了“巴黎水上商人”;他們是否就是这种水上商人的先行者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們这里得到了証据來說明巴黎商人公会从第九到十二世紀已有一貫的即使是模糊的历史。

还应弄清楚基尔賽詔令里所提及的那些行商的来历。今天业已証明,在中世紀早期法德两国商业发展的历史里,这些“候鳥”^③

① “丹麦金”(“danegeld”)是为防御或进攻丹麦所課的捐税。——譯者

② “karlus rex exactionem de thesauris ecclesiarum et omnibus mansijs ac negociatoribus, etiam paupertinis fecit”。

③ 按季节迁徙之鳥;这里是指行商。——譯者

从时间和重要地位来看,都走在坐商之前。在第九世紀,城市生活还未曾充分发展,市場权利很不明确,地方管理很不稳定;所以各省貿易不能同更有利的东方奢侈品的“过路”貿易竞争。甚至迟至十一世紀,法国的情况似乎依然如此,如果我們可从“上帝休战”作出推論的話;它的条文旨在保护商人的人身,而沒有一句話說及固定的市場。試把康边的《征稅令》(那是向在巴黎設着店舖的商人們征稅的)同基尔賽詔令第三十一条对比一下,就可看出有三种行商——基督徒、犹太人和卡比商人。其中关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已經周知,无須再事論述;也許只要指出在那个时期法国犹太商人的人数看来比平常要多,因为罗塞耳在855年曾把犹太人从意大利逐出。但誰是第三十一条所說的基督徒商人呢?那当然不是指巴黎的“水上商人”,因为他們已按康边《征稅令》付过稅。尽管沒有人敢于提出,但我敢說,这里所指的是意大利商人,虽然沒有特殊資料來說明这批人就是他們。

当然,這項信念的論据,是从推論得来的,但我認為是有可能性的。那有一部分是以秃头查理晚年时代法意两国間存在着很密切的政治关系为基础的。这种关系比一般所認為的更接近,更亲密。修道院院长度申当論及教皇約翰八世的困难时,曾中肯地說,“一个意大利人或羅馬人处之泰然地住在阿尔茲、偉恩、里昂,甚至象理姆、松斯圣登尼斯和都尔一类城市,对他來說,也不見得完全陌生。他在自己的語言中,已經熟悉它們的地方名称和风俗習慣了。”

第九世紀里,意大利人,特別是威尼斯人,是西欧最著名的基督徒商人,而在这一时期(877年),意大利和法国間的关系特別有利于两国的接触。罗塞耳一世和路易二世都在不久之前,同威尼斯簽訂了条約,規定威尼斯商人在繳納慣例通行稅后得在水陆两路自由往来于他們的領土上。皇帝路易二世在854年还曾特別努

力保护到羅馬去的商人和朝圣者(从阿尔卑斯山那边?)使之不受騷扰。海德曾大胆推测:意大利商人可能早在这个时期,已經轉運利凡得商品到阿尔卑斯山之外,但他所援引的唯一論証是:在达哥伯特时代有人曾提及在圣登尼斯寺院市集上已有倫巴商人;那对第八、第九世紀來說是沒有道理的。849年时,盧普·得·菲利厄曾出使羅馬城。我們不知道他曾走什么道路,但他的書信(第六十六封信)是有趣味的。他帶着几匹日耳曼麻布作为贈給教皇的礼物,并預先写信給意大利边境上一个主教,要替他准备好一些“意大利銀币”。舒尔茨說明了在第十世紀后期,阿尔卑斯山路在商业上的使用情况,并指出了威尼斯商人曾独占斐拉腊和巴費亚市集上的东方貿易。

但是克里尼·鄂多所著奥里腊克·吉拉尔德《傳記》第二十七章中的一节文字是涉及894年的。在那一年吉拉尔德为了他要建造一所修道院,曾往羅馬城去覲見教皇福馬薩斯。在回来时,他停留在巴費亚,即旅客走过圣伯尔納德山路的經常出发地点,在那里他碰到了几个威尼斯商人。这段文字是有趣味而又有結論性的例証,說明第九世紀在巴費亚市集上,已有經營东方商品的威尼斯商人。舒尔茨对威尼斯商人在这样早的时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这件事,有所怀疑。他認為法德两国商人在倫巴城,特別是在巴費亚和斐拉腊,找到了接触地点;理由是,“一般講,商品过手的人数,从古代以来,已大大增加了。”但据我看来,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貿易,与其說是由法兰克商人經營,不如說是由意大利商人經營的,而察柏斯是意大利人同法兰克人交換商品的地点。察柏斯的地位和它对商人的异常重要性,似乎証明了上項意見是不錯的;而基尔賽詔令特別指出这些商人,是明显地不同于康边《征稅令》里被課稅的法兰克商人。

應該記牢:在这时期,阿尔卑斯山路是开放着的,还没有被薩

拉森人騷擾，并且至少在政治和軍事事務方面是常常使用這條山路的。從意大利入法國的常走的道路，是由巴費亞、伊甫里阿、阿俄斯塔，越過大聖伯爾納德山路；從那里再分出兩路：(1)經由聖摩里士和瓦雷達到里昂；(2)經由日內瓦湖、奧勃彭太里爾以及舊羅馬路達到貝藏松並從那里到隆格耳和香賓。另一條到里昂的路，是經由聖約翰·得·馬里安和錢伯里的。

可是，在禿頭查理統治的最後幾年里，法國與意大利間的聯繫是很密切的。那不久將在羅尼河流域建立勃艮第王國的波索，876年時，是查理的最有勢力的附庸；查理曾娶他的姊妹黎契爾德為王后。870年時，國王曾賜給他聖摩里士·恩·瓦雷寺院、偉恩域的產權以及利奧納省；871年時授給他在羅尼河流域羅塞耳的全部遺產的管理權；876年時查理稱帝後，把意大利政府付托給他；877年時他得收回布魯日郡。從戰略來說，波索的地位，是無與倫比的，因為他在意大利與法國之間擁有兩條要道——經由瓦雷和經由聖約翰·得·馬里安的两條大道，是阿爾卑斯山兩側的主人翁。此外，他還占有羅尼河和羅亞爾河流域的兩個重要地點，就是，里昂和布魯日。在他的最近的領土內，有阿列爾河和羅亞爾河的匯合處以及梭恩河和羅尼河的匯合處，那從交通觀點看來，是法國由南到北、自西至東的焦點地區。

阿爾卑斯山兩條主要山路和法國河流系統的中心都集合在一個人手里這一事實，一定便利了意大利和法國之間的商業交往。情況一定是這樣的。在香賓市集達到它們的極重要地位之前好久，這地方的商業在第九世紀，已預示着這國家的未來命運。上塞納河察柏斯的重要性，已可看出。但摩城在這個時期也有一個商人居留地，那里的居住區是在862年被北歐人破壞了的。的確，早在第九世紀，香賓未來市集的輪廓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所以著名的小說《加林·得洛厄倫》（“Garin de Loherain”）里所描寫的已經一半

是历史,一半是故事;它把那里市集的建立归功于秃头查理。这些市集比过去所设想还要古老得多。963年时,佛罗杜尔曾明白提及瑪恩河畔夏龙的一个市集。

在第九世紀,察柏斯曾是香宾的主要商埠。今天,它是奥布州塞納河畔巴尔区内的一个穷苦村庄,約距特罗伊两公里。近代的历史研究不仅发现了这地方的巨大历史重要性,而且发现了察柏斯的真正所在地,那是这种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例証。直到近时为止,只知道察柏斯是十二世紀中屬於香宾伯爵的一个城堡区,但它在這個家族的采邑中已是一个“看不見的星座”,因为它的地位已不为人所知。到了十二世紀,关于它早期商业上的重要性,已被忘得干干净净。

但是,察柏斯的商人是哪一类的商人呢?他們当然不是法兰克商人,因为后者如上文所述,在康边《征稅令》里已被課稅。也不是“基督徒商人”(見第三十一条)和犹太商人,因为“卡比人”(“Capipi”)和这两种商人有区别。“卡比人”可能是在法国的叙利亚商人。希腊字“Kapelos”从希罗多德直到安娜·昆尼那时代是通用的。这个字傳入叙利亚,成为“Kapila”,意即“商人”;从那里这个名詞通过西欧的叙利亚商人,又收入在法兰克法律的詞汇里。

从史料来判断,到了第八世紀,那些原在墨洛温朝时代人数如此多的叙利亚人,已經减少,而在第九世紀,对他們竟沒有直接提及,除了一个例子,即一个叙利亚学者曾帮助虔誠者路易閱讀《新約全書》这一事。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間为了破坏偶像問題所发生的破裂以及查理曼和东羅馬帝国的磨擦,可能对叙利亚人的貿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查理曼时代,东方貿易的数量是不很大的,至少他和巴格达的商业关系是不密切的。然而,难于置信:叙利亚人在几百年中在西欧已成为东方貿易的主要代表人,竟会在这个时期完全被关在門外。說叙利亚商人在第八世紀以后不再常到西

欧这一論点,只是“从沒有記載得来的論点”。当然,法兰西国家的东方貿易已經縮減,但在查理曼以后并不是完全沒有的。

有当代的資料,可証明利凡得貨物在法国流通的情况。阿波描述北欧人圍攻巴黎(885—886年)的著名叙事詩里尽量譏諷了那些被东方奢侈品、豪华服飾、太尔紫衣、宝石及安提阿皮革腐化到精神萎靡的人。此外,我們还可获得圣加尔寺院高僧的証明,那是大家所熟知的;他表面上是在論述查理曼时代,但实际上是更多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文明。

上面指出第九世紀后期法国可能有叙利亚商人之后,就有一个問題发生了:他們是經過什么道路来的?他們是否象从前一样,取道海路,經過馬賽和罗尼河三角洲上的馬利亚納港而来呢?在那里,科比在716年曾被授予征收香粉和香料的关税之权。从查理曼时代到十字軍时代,在高盧著名城市中,再也沒有比馬賽的历史,更加模糊的了。848年时薩拉森海盜船曾劫掠馬賽,此后几百年中它被一塊紗幕遮盖着了。可是,尽管这些海盜在海上出沒以及多年中意大利和布罗温斯沿海遭受他們的騷扰,我們还找出了資料可証明基督徒船只运输能順利地冲破这些危險关头。因为844年时秃头查理在給圣登尼斯寺院的特权証状里,豁免了屬於僧侶或僧侶商业代理人的貿易船只的一切捐稅。“他們(商业代理人——譯者)代表那些人的利益……不論通过什么不同的港口……为了經營貿易,来到馬賽。”^①其次,878年时,教皇約翰八世經由海路曾来到阿尔茲,从那里还旅行到里昂和特罗伊。然而,在这些年代里,关于罗尼河三角洲上商业的最饒趣味的叙述,是920年国王布罗温斯·路易給阿尔茲大主教馬拿西的一件特許状,內有一处直接提及希腊商人,也有一处暗指叙利亚和犹太商人。

^① “qui pro eorum utilitate ad Massiliam... seuper diversos portus... mercatus negotiandi gratia advenissent”.

叙利亚商人之所以被逐出西欧，可能是因为威尼斯人日益激烈的竞争；威尼斯人逐渐把他们从商业领域内排挤出去，虽然他们至少在整个第九世纪中，还能在察柏斯立住脚。因为，如果威尼斯人早在这个时期已经经营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贸易这一论点可以站得住脚的话，那么，他们的大部分商品一定是从利凡得得来的。象上文所述，威尼斯商人在查理曼、罗塞耳和路易二世时代已享有异乎寻常的便利，而且在第九世纪后半期，大部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由于萨拉森人在南意大利的侵掠，教皇约翰八世和皇帝路易二世都和皇帝巴锡尔一世签订了盟约。

从上文所引的例据看来，显然，北欧人的侵犯不仅没有象过去所说的那样，破坏了商业，法国在第九世纪商业的数量和种类反比过去所曾想象的还要大。虽然西欧和利凡得间的商业关系，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败而垮下去了，可是叙利亚人在高卢维持他们的商业传统，比以前所设想的要长久得多。也许连在中世纪时代中最艰难的时期，法国也没有完全回复到一个纯农业的社会组织。有些经济史家认为，所谓庄园制度的“自给自足”是一种幻想；这项意见甚至从第九世纪的很少的资料里，也可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在本章结束时，我们可略为谈一谈关于第九世纪法国境内的旅行。毫无疑问，公路上的情形已经恶化，除了交通上大不便利以外，还有盗贼横行，使陆上旅行比水上旅行更不安全，而且水路运货比陆路要便宜。可是，不可能相信，不安全的状态竟会严重到象编年史家所描写的那种程度。虽然，如果一个有高级社会地位的人或携带贵重物品的人要旅行，途中保卫几乎是必要的。可是那时，即使在和平的时期，显贵人员和富裕商人也一向是在保卫下旅行的。在卢普·得·菲利厄的书信里，可找到一件关于旅行的危险的出奇的例子，生动地反映了第九世纪的生活状况。这封信是他写给他的朋友理姆·欣克马尔大主教的：

我害怕把比德著《評注》一書送給你，因為書很大，不能藏在大衣內，也不能安放于手袋里攜帶着；而且即使能夠用這種或那種方法，還須害怕路上碰到流氓，他們看到這手抄本如此漂亮，一定會起貪心的；這樣我和你就都將失掉它了。所以，最妥當的是我親自把書交給你，承上帝佑助，只要我們能夠安然在某處會面，我就這樣做。

第十章 北欧人的扩展和殖民*

第九世紀北欧人——瑞典人、丹麦人和挪威人——的扩展,是中世紀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課題。正确地來說,它是一个向外迁徙、征服和殖民于新土地的运动;它和后来十六世紀欧洲人向海外扩展是相类似的。而且,象后来的那个运动一样,北欧人扩展的根源和动力,在于經濟利益、社会条件以及冒險和发现的精神。

为了理解这些强悍的人們在第九世紀所以大批向外迁徙的原因,我們必須知道一些关于他們所住国家的性質以及他們原始性的生活方法。因为他們所处的自然环境,对他們的移动,曾起巨大影响。

丹麦半島,即丹麦人的老家,差不多是一片有沼地和茂密的山毛榉树林和橡树林的沙洲。只偶然在森林的空隙处,有一些可耕的地带。丹麦人住于海濱,住于海湾畔和通海的紫色水小河口畔的村落里;他們主要靠捕魚和海盗行为来維持生活。至于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也不适合于居住,情况和丹麦差不多。試翻閱地图就可看出:縱貫半島軸心是一条層巒起伏的山脉;沿海湾峡众多,形成了鋸齿状的缺口,外緣还有岩石島屿;瑞典号称“千湖地区”;瑞典和挪威的可居住部分,都是一条窄狹的海边。这种貧瘠而又多沙石的土壤,这个面积窄狹的耕地,即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够維持当地的人口的。但是,在几百年以前,对一个从历史时期的銅器时代剛出現的部族來說,那不足的程度要有多大呢?当时,他們在制造武器和造船方面虽已有显著的技能;可是从物質文明观点来看,还

* 地图:本章沒有合适的地图以資說明,但可參閱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45, 58頁。

是在一種簡陋狀態里。

從古代以來，北歐人一定會是以航海為業的民族。他們好戰成性，一遇機會，便很自然地放棄了捕魚和捕鯨事業而轉向海盜行為。起初，他們也許會互相打劫，但當他們熟悉海上生活之後，他們就沿海下行，越走越遠，終於冒險渡過波羅的海和北海，因而發現了新地。第五世紀，“下薩克遜人”、猶特人、盎格魯人在不列顛所建立的殖民地，預示了第九世紀丹麥人在英法兩國所進行的事情。

戰爭和海上劫掠是自由北歐人的職業。據一種古史的記載，他們讓村夫鄉愚去“訓練耕牛、製造犁頭、建築房屋、鑄金屬器皿、造運貨車以及耕耘土地”。至於自由人，則從事航海、捕魚、追捕鯨魚、貿易、戰爭以及在需要時還干海盜行為。但是，北歐人並不是經常以野蠻的海盜姿態出現的。他們常常也是和平的經商者，只在必要情況下，才採用戰鬥方法。這些商人不是海盜；他們購買東西，或者以物易物，可是他們一向是很有力量來保衛他們的貨物的。當時，在戰士等級和商人階層之間，還沒有劃清界綫。我們看到，酋長本人也享受商業利潤，並不以此而覺得羞恥。

英國的東海岸與海峽沿岸以及法里西亞與法国的海峽沿岸，是最先遭受北歐人侵襲的地區。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東部和法国北部與西部的自然地勢，使它們特別容易受到這批海盜的攻擊；因為在英國，恒伯河和泰晤士河的灣口以及瓦士大海灣，在法国謝耳德河、塞納河、羅亞爾河各河口以及吉倫特河灣口，都把國家的腹地開放給北歐人掠奪。在法国，除了格羅內河以外，各河流象輻從軸心一樣地放射出來；在它的中部，上塞納河、上羅亞爾河、上謬司河以及上梭恩河各水流彼此之間相距不多幾哩；在這些地區，北歐人幾乎可随心所欲地移動，深入河流的上游，甚至把他們的船隻拖過陸地，從一條河上行，從另一條河下行。

按这些侵袭的激烈程度，可明显地标出各个阶段；而这些阶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们表明一个进步性的转变，即从纯粹掠夺到永久居住和最后大批殖民的转变。在英国，这转变出现于851年，当时，丹麦人第一次在涅特过了冬。879年的韋德摩条约把英国划分为两部分，从泰晤士河口到提兹河的整个东英格兰部分，割让给丹麦人，以求和解；这就是丹麦人从侵犯到殖民的转折点。

当“外侵团”的侵袭不复是英国海岸上的灾患以后，跟着“外侵团”龙旗而来的，是载货的船只以及船上的和平商人。这些船只载运着挪威的毛皮和冰岛的鱼类来交换英国的羊毛、蜂蜜、麦芽和麦子。支斯德尔、布里斯多、雅穆斯、伦敦同丹麦、挪威和冰岛的交往遂发展起来。这种交往一定曾是相当频繁的，因为冰岛曾制订一种法律来处理死亡在那里的英国商人的财产。据《遗民史话》的记载，约在公元1000年时，有一只船从都柏林驶到布洛德斐司城的斯诺斐尔尼斯港；船上人员，有厄尔斯人、南岛人以及少数北欧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来自赫布里底群岛的叫做索尔比那的妇女，她带来的铺盖“都是精制的”——英制被单、一条丝棉被、床上挂帐、床上装饰物；这类的东西，在冰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在丹麦占优势时期，到英国的丹麦殖民有助于促进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间的商业联系。因为是主要商人，所以他们对于把新城市建立于适合商业的地点方面，也有着影响。卡纽特大帝（1000—1035年）和外国签订了各种重要的通商条约。我们看到资料，可说明斯堪的那维亚商人在英国几个城市里特别是在伦敦的势力，无论在他们的人数方面和重要地位方面；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教会、市场和法院。在约克城他们也有巨大势力。约克城的几条街道的名称，是以“迦特”（“gate”）作为尾词的。在约克城，过云至少约有二十条这样名称的街道，几乎不可能曾有那么多的“迦

特”(門)。所以,“如果說‘迦特’不是从老的斯堪的那維亞的‘迦太’(gata意即街道)這一名詞得來,那倒是一個問題了,尤其是當它出現于複合詞時,象彼得迦特(petersgate)、曼麗迦特(marygate)、斐雪迦特(fishergate)等等。這些名稱和斯堪的那維亞街道名稱是有顯著的相同點的”。

在法蘭克帝國內,丹麥人在850年第一次永久定居于法里斯蘭。但是在此之前,他們曾兇猛地掠奪過法蘭克高盧,比在同一時期掠奪英國更加兇猛。835年時,杜爾斯特德化為灰燼。836年時,安特衛普——第一次在歷史上被提及——也被燒毀。845年時巴黎被劫,而857年時再次被劫。實際上,在第九世紀,所有法國沿海岸或沿大河的重要城市都被北歐人搶劫過;其中有的好多次被劫——例如,亞眠、盧昂、巴黎、南特、都爾、沙脫爾、布腊、波尔多;連那旁、馬賽和瓦倫斯也是這樣。因為他們的船隻已繞過西班牙而駛入了地中海。860年時,意大利的比薩城也被襲擊。

然而,在法國,北歐人的侵入有另一方面的影響:看來奇怪,法國貿易曾被北歐人刺激起來,因而有新市場開設着;法國商業非但沒有縮減,反而進步了;北歐人的侵入還產生了深刻的經濟和社會結果。丹麥人是法里西安人商業上的老顧客,他們以毛皮和蜡來換取日耳曼鐵、法里西安的布匹以及萊茵蘭的葡萄酒。安斯卡是到丹麥人中間去的第一位北歐使徒,所以他的《傳記》是富於這類資料的。“北歐‘外侵團’不單是野蠻的海盜,他們也是有企業心的商人,他們力圖在各方面獲得財富……雖然關於這一時期的歷史資料是很少的,但我們卻可從中看出,在第九世紀還存在強大的商業活動。”

現在我們還要追尋北歐人歷史上關於下列重要事態的綫索:這綫索好久以前,曾由諾曼底第一位歷史家達多所指出;當時,他借口于諾曼底第一位公爵洛爾夫,說出一句有意義的話:“我們爭

取貿易与和平的代价。”^①

前一章里，我們已說過：在秃头查理时代，法国境内所进行的貿易总額比起平常所想象的要大。在有些地方，這項貿易看来确是被北欧人的侵入刺激起来的。查理的詔令曾多次而徒劳地禁止同北欧人交易，特别是关于出售軍火和馬匹的交易。冒險的小販和流动的商人尾随着他們的軍隊来做生意。我們看到关于一个小販的例子：“他帶了一头驢跟他們走着，从一城到另一城；不管什么东西，他在一处購进的，就以更高的价格，在另一处售出了。”

有时，北欧人的商业关系上所显出的文雅气味，大于海盗和掠夺的作风。例如，873年当路易日耳曼人駐在瓦牧附近的步尔斯塔特的时候，西格夫里，即丹麦国王，与他弟兄哈夫丹都是統治者——两人都是丹麦王霍里奇二世的兒子——亲自到那里去，“为的是要媾和，使彼此王国的商人可以和平地进行买卖。”^②同一年內，罗亚尔河的北欧人同意：如果其时他們的市場不受騷扰，他們将在一个規定的日子秋毫无犯地从南特撤退，而882年时，在胖子路易圍攻埃耳斯盧后进行談判的时期中，北欧人的营帳曾开放大門，而有些法兰克人为了做生意竟冒險进入。

看来，侵犯者所获得的大量贓物，常常使市場好象睡了一夜即跳跃起来。864年的《皮特里詔令》第19条內指出了这一点。在这一条文里，查理力图确定：什么市場过去已經存在，曾否获得王室的批准，什么新市場在近时期已开放出来。有一件关于一个兵士的事情：他占夺了村民为求安全而存放在教会里的葡萄酒，并在那里開設了一片酒店——“好象在这教会里建立了一片店，他同自己

① “Vendendi atque sequestram pacem petimus”.

② “pacis faciendae gratia... et ut negotiatores utriusque regni... mercimonia... emerent et venderent pacifice”.

的伙伴开始出售它(酒)。”^①显然,在法国,不是到处的商业都受损害;相反的,在许多地方,一定曾被刺激起来的。北欧人当然严重地扰乱了秩序,可是他们常常把他们的战利品在当地出售。由于旧市场的衰败,或者在旧地方太易遭到危险而转移位置时,新市场一定会兴起的。关于这类事情,我们看到下列一个特殊例子:秃头查理曾以都尔附近罗亚尔河右岸的大量土地,赐给罗柏特“强人”,其中包括有布立加,在那里后来兴起了圣巴塞洛繆市集和圣幸福林教会,还有一个港口。那里的市场和港口税曾是一个有利的收入源流。这是861年的事。

其次:北欧人以“丹麦金”形式从教会和贵族的资产里所勒索得来的数量无限的钱款,有时对于贸易也一定会起补药的作用。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高卢和全部西欧一样,曾感到流通货币数量上的大大缩减。大部货币已被抽调到东方去,要不然,已被窖藏起来。现在,它又被迫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了。很多货币果然已被剪去边缘,可是它似乎还刺激了贸易。法国还有自由工人存在着。《皮特里诏令》证明了这点,虽然他们在数量上正在递减。

我们可把862年作为法兰克人开始认识到北欧人侵犯的严重性的日期,这一年秃头查理曾命令他的北方全部省区,普遍地建造城堡。在那个时期,北欧人事实上已占有整个海峡沿岸,从那里法兰克地主阶级一定已被逐出,虽然有很多不自由农民一定还留在那里。“塞纳河左岸,居民几乎已经放弃,因而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侵入者,有广阔的空地来移殖;看来,当地居民,特别是农夫对他们不一定是憎恶的。北欧人果然进行了抢劫和破坏,但是向来有很多人没有什么东西可被抢劫破坏的。”到912年时,政府和教会都已看清楚:不能用武力来打退北欧人的日子已经来到,也不能用缴

^① “quasi tabernam constituens in eadem ecclesia, paribus suis illud vendere coepit”.

納“丹麦金”来买走他們。他們正是为了可移住的土地以及为了他們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进行自由貿易的权利而斗争。在那一年,老实人查理讓給洛尔夫全部海峡沿岸地,从索謨河延伸到布勒塔尼边境上为止。这些土地按照北欧人的量地法,用繩子丈量出来,并分配給移民。諾曼底大封邑就这样地建立起来了。北欧人曾經建立的最大殖民地开始了历史的一章,从此,諾曼人的势力北越海峡而达到了英国,南至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而创立了王朝;在西班牙和“圣地”上,諾曼人还深深地留着影响的痕跡。

在整个第九世紀中,北欧人在越来越大的圈子里,扩展着。不仅法国和英国,而且苏格兰和法罗、謝特兰、奥克兰各島以及爱尔兰和冰島,都感受着哈夫尔斯湾战役(872年)的反冲影响,在这战役里,美髮者哈罗德粉碎了那些竞争首領的权力。“很多酋长逃奔出国,携带妻子兒女、奴隶、自由人、臣屬、家具和飾物,也就是,一切可装在船上的东西。”在爱尔兰,他們早在830年已定居在亚尔馬,随即在都柏林建立了王国,而这王国延續到1014年为止。爱尔兰人称他們为“东方人”(Ostmen)。北欧人之所以能保持并伸展他們的势力,是由于爱尔兰在两百年中,氏族和氏族間互相殘杀的斗争所造成。他們对芒斯特进行劫掠,直到“閔斯德全境,沒有一个港口,沒有一个登陆碼頭,沒有一个丘阜,沒有一个砲台,沒有一个要塞,而不見丹麦人和海盜的船队为止”。然而,尽管他們这样活动,他們从来沒有能够把爱尔兰变成一个“諾曼底”。

北欧人是爱尔兰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商业动力。由于不能征复全島,他們自然而然地退守沿海岸来发展貿易。都柏林、瓦特福德和里摩黎克,即使不是由北欧人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們的重要地位首先是从东方人方面获得的。这些市鎮不仅和象布里斯多与支斯得尔那样的附近市鎮,而且和遙远的国家进行着貿易。它們和法国南部产葡萄酒区,有很密切的联系。这项葡萄酒生意是如此

重要,所以 900 年时在芒斯特定有管理它的法律。在都柏林,有很多外国商人。挪威和冰島同爱尔兰都有密切的交往。早在第九世紀一个冰島人叫做旅行者拉丰·里摩黎克,因为他常旅行于冰島和里摩黎克之間。《史話》中还提到其他的冰島商人也到过都柏林。爱尔兰商人到过冰島这一事情,从《遺民史話》里获得了証明:“与基督信仰在冰島成为合法的同一夏天,有一只船渡海而来,駛到斯諾斐尔尼斯,那是一只都柏林的平底船。”

860 年之前,文明世界实在还没有知道冰島,虽然爱尔兰傳教士已先于北欧人到达了那里。870 年时,有一个挪威人名叫英哥尔夫者,在冰島住过一个冬天后,为要料理他的财产,回到挪威;后来在 874 年,他定居于現在叫做雷克雅維克的地方,即今天冰島的首都。

这新地不久成了那些在美髮者哈罗德胜利下的牺牲者的避难所。但除了这批因流亡在外而侨居冰島上的失意酋长之外,据《狡猾的鲑魚野史》(“Laxdaela saga”)所告訴我們的,还有人受下列傳說吸引而来的:“那里可自由揀选土地,也无須購買牲口;”那里“有大量飄浮到海灘的鯨魚、鮭魚漁場、捕魚海灘,四季都好”。

不是全部冰島都由挪威人来居住的,試閱維格佛遜和鮑威尔合著《島民起源論》第一卷中所举出的殖民地表面,就可知道移民是从多少不同的国家来的。除了从挪威来的以外,也許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不列顛群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移民,它們提供了人数較多的移民。赫布里底、奧克尼、謝特兰和法罗各島也提供了它們的人口;法兰德斯、丹麦和瑞典也是如此。不是所有从这些国家来的移民,都是屬於他們所移出的国家的国民。有很多是来自“西方海外”的挪威人;他們曾在一個很短时期內逗留在奧克尼或謝特兰或爱尔兰,然后再轉到冰島上的。例如,深思者奧特,挪威的凱提尔·法拉特尼布的女兒,都柏林王“白人”奧拉夫的妻子,曾住在凱司涅斯

若干年，“她請人在森林里祕密造了一只商船；当船造成以后，她装备了这只船，携带了动产財物，”终于在892年时，駛往冰島。奧特的弟兄东部人边恩曾从挪威到达赫布里底群島，住过两个冬天，又于886年时航行到冰島。那些从西方島屿上来的人們，大多定居在冰島的西部、北部和西北部。

殖民地一旦建立以后，它就迅速发展起来，到了930年时，島上大多可居住部分，都已被占据。在900年时，島上的优良地方已由移民居住着。“在那些日子(900年)里，布洛德斐斯全境都已住着移民了，”很多其余的地方也是这样。

在早期，当冰島还大部是一个无人地区的时候，是从船上抛出椅子腿的方法来进行选择土地的。这些椅子腿飄浮到哪里的海岸，就在哪里設立殖民地。后来，这种慣例改变了；于是占取土地采用了某种契約形式。一般講，酋长“按照尊严的地位”占取土地，虽然有时也使用抽籤的办法。取得土地的所有权，是使用火炬来“祝土地屬于自己”的方法；就是，一个人手里举起火炬轉繞自己土地一週的慣例。为了防止一个人占取过多，国王哈罗德不久就制定了一項規則：占有的土地不得多于他和他的船員帶着火炬能在一天之內所走过的范围。显然，酋长占取了很广大的土地，而很有势力的酋长所占取的，包括着闊大无边的地带。酋长們把这些地带作为贈品，分給他們的亲戚朋友；这样一来，酋长和他的后裔就成为这土地的世襲首領。一旦占領土地以后，跟着就将建造房屋和庙宇；那是每个酋长的必要建筑物。

在建造房屋之后，甚至在此之前，移民必須努力为漫长的寒冬准备食粮。所以我們应来談一談島上的食粮和产物。主要的食品是肉类和奶类。所說的肉类，一般是魚肉和兽肉。魚肉包括有嘉魚、风干魚、鲑魚或鯨魚肉。冰島上并不盛产野猪，所以兽肉是羊肉、牛肉或馬肉。在奶类中，干酪和牛奶是最普通的。去壳的燕麦

是老百姓的主要谷物食料。

魚是冰島的最有利的產品。四面皆水，島民自然而然地成了漁民。海灣和海口眾多，特別是在冰島的西部；它們給從事這項漁業的人提供了廣大機會；有時，為了進行捕魚而使其他的職業遭受了損害。舉例說，在第九世紀後半期，弗羅基人駛入瓦特尼斯海灣時，看到了灣內這樣“充滿魚類”（魚、海豹和鯨魚），以致“為了捕魚，他們對割草毫不介意，因而他們的牲口在冬季餓死了”。捕魚是家庭婦女為維持她們的家庭所從事的職業；也是有利的實業；有好多冰島人曾靠此致富；在第十世紀上半期，釣鱈魚者索爾斯坦因便是這樣獲得了成功。據《遺民史話》里所說，他“成為一個最大的富翁；他經常有六十個自由人伴隨着；他是一個家庭用具的大搜集家，而且還一直繼續捕魚。”還有一個更加好的例証：奧德·烏斐格孫在十一世紀中期，離開家庭時只帶了“一條釣絲……一組捕魚具以及十二厄爾^①的羊毛粗布，向瓦特尼斯地方上的漁夫公司賒購了一副捕魚用具；經過三冬三夏後，他還清了所有的欠款，同時自己還有好多營業本錢”。於是，他開始了轉運事業，購買了一只“平底船”的使用權，後來取得了這只“平底船”的所有權，而且，以捕魚及經營彌德斐斯和“海濱”之間的運貨生意而富有起來。最後，他擁有幾只運貨船，能夠航行出國，不久被稱為冰島上的最大富翁。

除了捕魚業之外，最普通的實業似乎是養羊業。每個大酋長都有若干數量的閹羊；在夏天這些羊群被放出在山側草地上吃草，而在收穫季節，由那些專管尋找它們的人趕回到低地和盆地的牧場上，在寒冷的幾個月內可把它們飼養在畜棚里，或者，如果冬季冷得太厲害，把羊群趕到南方去，以便在荒地上獲得更適合的牧場。約1000年時，比德人的羊群就是這樣的。然而，那些管理羊群

① 厄爾(ells)是量布疋的尺名。——譯者

的人不一定能够把全部羊群赶回来。常常有很多只羊失踪，为了追寻它们，将劳累好多天。邻近酋长之间也常常为了丢羊而发生争吵，一方怀疑对方应对羊的失踪负责。

畜养牲口一定是普通的，虽然《史话》里很少提及它。岛上到处都有各色各样的马匹。有的在收获季节被宰杀，用作食品；有的用于驮载干草；有的叫做“木马”，因为它们驮运象干草一样多的浮木。在早期，冰岛上没有大路，但是有很多马走的小路，在陆地马匹实际上构成唯一的交通工具；所有的陆上旅行，不是徒步，便是乘马。家畜除了马、牛和羊以外，主要还有家禽和小鹰。在野兽中，驯鹿和熊在数目上也较多。

岛上种植若干种谷物，但主要产物是干草。干草是一切牲畜所绝对必需的东西，特别是在冬季；又因为夏季很短，更加需要及时收割青草。收获时期一般是在八月中。如遇干草歉收，象有时在湿季中所遭到的情况那样，牲畜就将面临饥饿的灾难。在困难时期，藏着干草的人一般被迫售出干草，租户当然是以干草付租的；在歉收时，把若干数量牲畜宰杀了。

上文讲过，冰岛商人曾到过英国。在十二世纪后半期，他们在赫布里底群岛上的圣大地方，曾建立一座灯塔。在一个冰岛主教的传记里，我们看到记载，说冰岛同英格兰的林尼及其他港口进行贸易。1224年时，曾有冰岛船只停泊在雅穆斯港口内。

挪威人在冰岛从事贸易的外国人中，占大多数，并越来越多地控制了冰岛的出口物；而冰岛对挪威的这种较大的经济依附性，引起了1262—1264年间两国的政治联合。那时卑尔根已成为冰岛产品的市场。挪威到冰岛的最短路线，是从斯特德角到冰岛东岸上的霍恩，但最通常使用的路线是从谢特兰和法罗群岛之北的卑尔根，绕过冰岛的西南岸而进入它目前首都所在地的河湾那一条路。

《史話》所引关于北欧人和他們所移住的各国之間的联系，在这早期內，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史話》不止一次地只提及“那个夏季有一只船开往拉发哈佛穆斯去，另一只船开往达米尔尼斯去”，而沒有說出它是从哪里开出的或誰是它的駕駛者。可是，尽管《史話》的叙述不一定都正确，但却是够多，使我們得以了解北欧人商业上射出的光芒如何广大。看来，在斯堪的那維亚世界里，每一个港口是有市場的。

在第九世紀早期，在瑞典人（他們的港口貝卡現在叫做边谷，西距斯德哥尔摩十八哩）和什列斯威的哈德比及法里西亚的杜尔斯特德之間，已建立商业关系。在虔誠者路易时代，北欧使徒安斯卡同杜尔斯特德的几个商人曾旅行到貝卡，那里据《安斯卡傳》講，“有很多富商、大量貨物和金錢。”汉堡和哈德比商人常常来到貝卡那里。

瑞典向外扩展的天然路綫，是越过波罗的海，而不是向西方去。《安斯卡傳》还告訴我們，瑞典人曾征服“科立王国”（近代的庫尔兰）內的五个市鎮，其中提及都納河畔的塞列堡以及温达瓦河畔的比尔登两个市鎮。在这里，也可看到“基督教商人”；他們也許是从杜尔斯特德或哈德比来的法兰克人，搜購毛皮和琥珀。

然而，瑞典人进入广大而界綫模糊的斯拉夫人領土之大門，是通过芬兰湾的；在第九世紀中期之前，“罗斯人”（“Rus”是个芬兰名詞，意指“盪槳者”，芬兰人原用以称呼瑞典人的，而后来由斯拉夫人采用了）已定居在伊尔曼湖畔霍姆加尔德；这就是后来叫做“老諾夫哥罗得”或“大諾夫哥罗得”。

諾夫哥罗得和下第聶伯河畔的基輔成了瑞典人在俄羅斯的軍事和貿易殖民地，象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和在法国的盧昂一样。这些都是强加在斯拉夫人方面的軍事商人殖民地。从諾夫哥罗得到黑海，开放着一条天然水路，即經過那由罗斯人不久發現了的伏尔

科夫河与第聶伯河的水路——这就是著名的“发兰琴路”^①。虽然“发兰琴”这个名词的意义相等于北欧人或斯堪的那维亚人，但它获得了一个经济的含义。发兰琴路成了北欧和东方之间的巨大环节。由于这条路线，不仅拜占廷而且巴格达哈里发同波罗的海区连接起来了。因为伏尔加河把諾夫哥罗得的这批冒险商人，向下运送到里海顶端伊铁尔（近代的阿斯脱拉罕）；在那里，他们同从巴格达来的阿拉伯商人建立了商业联系。罗斯人不久又发现了黑海北岸拜占廷商人的殖民地，并对它们进行了残酷的劫掠。在865年夏季，他们甚至威胁了君士坦丁堡，当时东罗马皇帝正在同薩拉森人作战。由于向南扩展的结果，他们认识到諾夫哥罗得和尤克辛海之间有建立中间站的必要性，而这一需要由于北欧人在852年(?)的占领基辅而获得了解决，当时基辅是喀扎尔人的附庸。这日期作为俄罗斯建国的开始日期，看来是重要的。因为俄罗斯是瑞典征服者在斯拉夫世界的中心区建立起来的另一个“诺曼底公国”。

北欧人对中世纪历史的影响，是不可胜计的。他们把整个北欧从不知道的境界提高到知道的境界。他们在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连接了南北两方，并建造了一个比前更广阔更巨大的欧洲。尽管这些殖民地是彼此独立的，并脱离了产生它们的母国，然而有一个紧密的文化统一性在整个北欧流行着。人们可搭渔船、贸易船、商人的内河木船或乘马自由往来于这广大的北欧人帝国内，从格陵兰直到里海和黑海为止。丹麦人、挪威和瑞典人的语言是差不多相同的，所以凡能说斯堪的那维亚语的人可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商人和军事冒险家结队旅行，因而他们的人数和威力足够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丹麦、瑞典、挪威、英国、北法、都柏

^① “发兰琴”(Varangian)意即“北欧漂泊者”，特别是指约在第九世纪那些蹂躏波罗的海的北欧人。——译者

林“王国”、冰島、奧克尼、謝特兰、法罗、庫尔兰、俄罗斯——甚至格陵兰——都可認為是屬於十至十一世紀中一个空泛而广大的北欧人帝国的省分；这帝国有难于捉摸的統一性，象今天的英帝国那样。

統一性中最具体的也許是商业的統一。自从羅馬帝国衰落以后，从来没有看見过可与倫比的国际商品交換。北欧的毛皮、鯨魚和海象牙是在黑海口岸、基輔、諾夫哥罗得、阿斯脫拉罕出售，来換取东方的絲綢、糖、香料、碧玉、軟膏、化粧品以及各种奢侈品。从冰島来的魚类和从格陵兰来的鯨魚油都是在比斯开湾港口和西班牙港口出售。

阿拉伯海权封閉了西地中海区这一事实，如上文所說，阻碍了南欧的利凡得貿易，所以意大利西海岸和南法海岸港口市鎮象比薩、热那亚和馬賽那样，在街道上，变为杂草丛生，而它們的港口也凄絕无人。在很多年代中，威尼斯是西欧同利凡得直接联系的唯一港口。所以，龐大数額的东方商品乃由那些橫渡里海和黑海并越过里海地峽的路綫而入俄罗斯，从那里把商品分配于波罗的海和北欧地区。这俄罗斯-北欧人的商业繼續是中世紀历史上的基本商业，直到十一世紀末期野蛮的庫曼人蹂躪南部俄罗斯而中断了这貿易为止，直到同一世紀意大利沿海城市肃清了地中海区穆罕默德教海盜船为止，直到1099年后十字軍为了拉丁和日耳曼西方，确立了“門戶开放”政策，并对西欧商人开放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港口为止。在十一世紀，基輔有八所市場，它是一方面巴格达哈里发国、埃及、叙利亚、拜占廷和另一方面中欧、北欧与西欧之間的大中間商人。波罗的海和北海似可說成是一个北方地中海的双重盆地，而倫敦、不来梅、布魯日、汉堡、律伯克、斯德丁、維斯比、但泽都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区。那条經第聶伯河、伏尔科夫河和伊尔曼湖的发兰琴商路，是同那穿过欧洲腰际的莱茵河与罗尼河的南欧

和北欧間的老商路相竞争的。諾夫哥罗德是北欧的一个威尼斯。成千成万的拜占廷、阿拉伯、埃及、庫斐克^①、甚至印度的各种钱币，连同英国、丹麦、諾曼和日耳曼钱币，的确在这些路上已被发掘出来了。

还須指出，北欧人在商业冒险方面所具有的海員和航海家的技巧和大胆行为。他們的长型船和地中海大划船型的船，是不大相同的。这些船是按照情况，用帆或用槳来推进的，而它們的船主对气候和水流比南欧海員要熟悉得多。一个北欧海員能从海水的顏色、潮水的流动、甚至一陣順风，說出海岸可能是多么远并在什么方向。他們不肯从事那种胆小的航行：即从地角到地角，从島到島徐徐行駛，唯恐迷失了航行方向，或者在夜間拋錨停泊，象地中海水手所做的那样。重霧和暗礁使他們小心，但并不能吓倒他們。他們的技能也能够和他的勇敢精神媲美。南欧水手沒有一個人能知道搶风轉舵的技巧，象北欧人所知道的那样，虽然后者也許早在第九世紀还没有发现这项方法。后来由英国和汉撒同盟的船舶在北方海上所发展起来的海权、海上法和航海技术，都是导源于北欧人的傳統。这是一种可貴的遺產。

① 即幼发拉底河畔的庫发城。——譯者

第十一章 薩克遜和薩利安德意志 (919—1125年)*

在封建德意志，經濟向上發展很自然地成了一條曲綫，其中每一段大約相當於三個皇朝中一朝的統治時期。薩克遜時期(919—1024年)幾乎是完全屬於農業和土地經濟時期。關於德意志在薩克遜時期的繁榮狀態，是有許多具體証據的。其中之一是人口的增加；人口在第十世紀增加得慢，而到了十一世紀就增加得快了。另一個是河道交通的重要地位，特別是萊茵河上的交通。沿着這條河流，從阿爾卑斯山到北海，有一長列古代主教區城市，排成了梯形，象巴賽爾、斯特拉斯堡(它的主教埃肯巴德在965年制定了一項著名的法律，里面管理貿易的條文占着一大部分)、瓦牧、斯拜爾、馬因斯、科倫(著名而又富饒的城市)和烏得勒支。就經濟重要性論，堪與這些主教區城市相比擬的，是王室領的城市，象科不林士、波恩、安特那赫、威斯巴登。西方沿摩塞耳河，東方沿涅克河和美因河的其他貿易從特累甫、法蘭克福和符次堡也流入萊茵河流域。重要的貿易品是 忽布花、亞爾薩斯的木器、法里斯蘭的法里西安布疋；後一種生意，如此重要，以致在美因斯有一條街叫做法里西安人街。科倫是以鐵的貿易中心出名的，鐵塊是從瑟林吉亞礦山里運下來的。

在講到德意志薩克遜時期的一般經濟社會歷史之前，我們應當來談一談捕鳥者亨利為薩克遜本土所做的事情。因為薩克遜是法蘭克人的最後征服地，所以，它在德意志王國內是最新的又是建

* 地圖：鮑倍德：《歷史地圖冊》，第62—63頁。

立最晚的公爵領。從薩克遜人放棄崇拜叨爾神和倭丁神^①而皈依基督教到這個時候，剛剛是一百年。法蘭克政府原來是嚴峻殘酷的，然而沒有能剷除古代薩克遜人的風俗、制度和傳統，也沒有使封建制度在薩克遜土壤上根深蒂固。當那由土地而產生的農奴制在教會的大莊園上或最高級貴族的大莊園上流行的時候，法蘭克或半法蘭克血統的貴族的地位在薩克遜，和以前一樣還是一個社會等級，並不包含也不具有世襲領占有權的意義。很多薩克遜貴族耕種着自己的田畝而生活，象朴素的鄉紳那樣——薩克遜人認為：在虔誠者路易時代，瓦拉的做法是可嘉的——他們受到那些不及他們富裕的鄰人的尊重和景仰，可是並不被他們害怕。

薩克遜族的基本群眾，是自由人，以自耕農或者租戶的身分耕種田地；他們對天氣所感的興趣比戰爭要多。除了愛爾福特以外，很少有市鎮。直到查理曼時代為止，歷史上沒有明白提到過薩克遜的什麼市鎮，雖然有理由可以設想，象巴度威克和麥則堡，甚至帕得鮑恩，是可以算作城市的。甚至主教區和寺院的所在地，也只不过是過度發展的村莊。漢堡、巴度威克、馬德堡、哈勒、愛爾福特原是對付汶德人的防禦地點。自由農民象以前他們的祖先那樣，住在沿河的或廣闊平原上的散漫而空曠的村莊里。他們是農業人口，他們最引為驕傲的出產是馬匹，而薩克遜即由此而出名。查理曼為了防患於未然，曾破壞幾個古代薩克遜砲壘，象霍亨士堡、斯塔特堡、伊勒斯堡（威突金的最後一個要塞）那樣，而這些建築物除了遺跡以外，已沒有別的東西留下了。

896年時，馬扎兒人，即古代匈奴人與後來阿佛爾人的近族，已在台斯河兩岸定居下來，他們遍佈在多瑙河三角地帶的大平原上。此後五十年時期，他們對東德意志和北意大利所進行的掠奪，都是

^① 叨爾神(Thor)即雷神，倭丁神(Woden)即斯堪的那維亞的主神，星期四(Thursday)從前者得名，星期三(Wednesday)從後者得名。——譯者

恐怖行为。他們侵入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完全象北欧人在前一世紀侵入法国所曾发生的影响一样,就是,引起城堡的建造和市鎮加筑墙垣的活动。900年时,巴伐利亚的恩斯堡,是用旧羅馬的卡斯特拉·巴太瓦(巴苏)城垣的石头建造起来的。在德意志喀罗林朝的最后几年时期中,馬扎兒人的掠夺是限于南德意志地区,他們橫行于南德的因尼河和萊茵河之間,而多瑙河盆地成为他們侵入的一个天然通路。于是德意志采用了建造堡壘方法来保卫自己。原来当这侵犯开始的时候,在萊茵河和多瑙河区的古代羅馬城市的城垣早已頹廢,所有寺院的各种房屋,都是散乱无章地集合着,国王和貴族的領地都是空曠的田地,而各村庄也都是可以随意出入的田舍。

在又突然又普遍的灾难里,累根斯堡、奧格斯堡、喀姆布萊和麦次赶快修葺了羅馬旧城垣,成了第一批避难所。由于这些措施,以及由于重复搶劫使德意志旧省內所可获得的贓物数量越来越少,馬扎兒人逐漸把他們掠夺的矛头从萊茵河和多瑙河区轉向薩克遜了。可自由进出的村庄、无城垣保卫的主教区市鎮和寺院以及薩克遜人原有的一切堡壘已經毀坏,使薩克遜受到馬扎兒人的可怕进攻。而且,薩克遜人象原始日耳曼人那样,还是用密集队伍徒步作战的,而这些入寇者則是乘馬作战的。薩克遜人尽管是勇敢的,但对这样的一种敌人却没有战胜的可能。

亨利一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并迅速地采取了行动。这与高盧在查理·馬德爾时代当薩拉森人侵入时,或第九世紀在秃头查理时代当北欧人蹂躪法国时,所遇到的問題一样。但是,其結果是不相同的。在法国,王室已衰弱不堪,它不得不讓私人倡議去建造堡壘,而这批建造堡壘的人不久就脫离了王室权力的控制。德意志的情形則相反,亨利一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王。虽然他統治的方法,象封建时代里的一般方法那样,在形式上是很封建的,但他的封建政府却是有力的。亨利一世曾批准并監督建造这种堡壘。为

了這项目的，他以納貢九年的代價來獲取馬扎兒人的和平對待，而在这期間，他在瑟林吉亞和薩克遜建造了那些著名堡壘來保卫扎勒河和維拉河之間的一條防綫，由于这一行动，他享有了盛名。

这些德意志的堡壘不是象法国的城堡那样的。它們不是建造在貴族私人土地上的孤单城堡。它們基本上不是屬於一个家族的砲壘，象在法国的那样，而是旨在保护全社会的砲壘。这是在不同的名詞里反映出来的。在法国，我們所看到的名詞，是“城堡”(castellum) 和“砲壘”(castrum)，很少看到“市鎮”(oppidum) 这一名詞。但是，在德意志，所用的名詞是“市鎮”(urbs)、“城市”(civitas) 和“市府”(municipium)。这样設防的社会单位，是王室領地，往往是一所寺院或主教所在地，而它已成为它周圍人口的中心。由于这类社会性职能，德意志的这些堡壘既不同于法国的城堡，也不同于边境上所建造的防舍。它們不象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它們既不是城堡，也不是防舍，而是有城垣的社会。因此，魁德林堡、孟勒本、赫斯斐尔德、科維各寺院，曾經設防，而主教区城市：麦則堡、民登、哈伯斯塔特、凡尔登、不来梅、帕得鮑恩、喜尔得珊、瑞謨堡、馬德堡、瓦牧、科倫、喀姆布莱、利格，在薩克遜时代，都曾以城垣圍繞起来。有的主教区域，象諾德豪森、波厄尔德、杜德尔斯特德、格洛那，都是在公爵領上筑造了城垣的地点。这些城垣不是象所設想的那样，用石头来造成的。在第十世紀，中世紀的德意志切石和石工技术，还很落后，不能建造石头的建筑物。連教堂也是用木料建造的。所謂城垣就是木柵，由豎立于地面上的树干来造成的，牢固地联結在一起，在各个角上还有木头塔樓。有时，木柵是双重的，在外圈之內，还有一所更大的塔樓或卫城。

每九个自由人中，必須有一个人担任軍役一个年头，他是駐在堡壘戍兵的一分子。人民大众，和旧时一样，依然住在空曠的乡間，可是为了更加安全起見，每一地区出产品的三分之一是貯藏在

堡內的；在堡內，也舉行一切會議、大會和宴會。亨利一世，即使沒有建立“市鎮”，但由於在這些被保護的地方集中貿易和進行社會活動，有力地幫助了它們後來的發展。因為這類地點自然地成為大家願意居住或住在它們附近的地方，從而在早期發展了商業的重要性。結果，過了不久，在有城垣環繞的窄狹土地範圍之內，人口就很稠密了，所以我們看到有過多的人口移住在靠近城垣的郊區。邁仙和麥則堡成長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在鄂圖一世時代已有一個郊區。可是在第一位薩克遜國王的兩代之前，漢堡已有郊區人口，而麥則堡，從它另一個名字阿爾騰堡（Altenburg 意即“老城”）來判斷，在亨利一世時代，一定也是一個老城，而在它的旁邊，發展了一個新城。

在亨利一世、鄂圖一世和亨利二世時代，象一陣驟雨般地賜與市場^①，通行稅和造幣各種權利，証明了薩克遜時代的商業和貿易的發展。連在赫洛茨威撒^②的一首詩里，我們也看到關於一個鄉村市集的敘述。亨利二世（1002—1024年）似乎曾賜給寺院以市場權利，作為他把它們的土地沒入國庫的補償。還有六個主教獲得了在下列主教區內建立市場的權利：薩克遜的不來梅、奧斯那布律克、哈伯斯塔特；法蘭哥尼亞的符次堡、瓦牧、斯拜爾。穿越森林和山嶺的大路把那些有利於貿易的地点連接起來。這項貿易輻集於作為城市特征的市場上。很多市鎮每年有一次市集，並有規模較小而次數多的市集來出售生活上的日常必需品。在每周或每天的市場上，肉類和谷物的買賣占重要部分。那些規模較大的每年一次的市場是經營工業出品的。單幫小販則在鄉村里走來走去做生意。在大城市里，那些經商為生的猶太人，擁有貨棧和倉庫。在薩

① 在中世紀，拉丁文“*mercatus*”起初指“市場權利”而後來指市場地點，但很少指抽象的商業。

② 赫洛茨威撒（Hroswitha，約932—1002年）是一個修女、詩人。——譯者

克遜時代，整個德意志的地方貿易是活躍的，可是在古老的西部比在新的東部，它的意義要大得多。

關於範圍較大的貿易的明顯特徵，在於貿易由職業商人來經營。儘管有各種社會根源，它的基础無疑是猶太人。到處都需要並歡迎這些商人設立居留地。他們的最好保護人是國王。家庭所需的主要商品是：谷物、牲口、食鹽、葡萄酒、魚類、布疋、馬鞍、武器、羊皮、鞋子、干酪、黃銅、蠟、烹飪用具和麵包。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是：烏爾穆、累根斯堡、多瑙河畔的巴蘇、馬因斯和萊茵河畔的科倫、不來梅、巴度威克、馬德堡、麥則堡以及薩克遜的哈勒·科倫，即德意志的大海港，早在十一世紀已有六百個商人。馬因斯，即“王室的黃金泉源”^①有一個大市場，在那里歐洲各國的產品進行交換。甚至在第一次十字軍以前，可以說，有些地方的商業生活已勝過農業生活。

萊茵河上征集通行稅，是中世紀的一種措施，而在羅馬行政上是沒有先例的。羅馬人之所以征集賦稅是純粹為了財政目的，而不是為了經濟目的。他們沒有征收過河道通行稅，而萊茵河是一條自由河道。但是，這一切情況已一去不復返了。從第八世紀起，通行一項課稅原則，即通行稅是為了經濟的理由而征收的，目的在於改進和維護航運。發給市場執照和控制商業的權利，原是屬於帝國的一種特權。薩克遜皇帝依據這項“關稅通則”，設立了萊茵河沿岸的通行稅站。這些收稅處一般位於河流上難以通過的地方，在那里船舶必須徐行或停駛。象其他的職位一樣，收稅的職務也是作為采邑恩賜的。通行稅一般是以實物繳付的；就是，以船貨的幾分之幾來繳付的。最普通的征費是一斐特^②葡萄酒，因為葡萄酒是貨運中的最普通的东西。在薩克遜和薩利安時期，這種稅收

①“aureum regni caput”。

② 斐特(fuder)為量器名。——譯者

是有益于萊茵河商業的，因為那些進款是用在維持萊茵河的航運；但在亨利四世以年幼而未執政的長久時期中，這些通行稅站有很多被主教們及其他領主占奪，而它們的收入遂被歸入私囊了。後來，亨利四世追還這些稅站，他一方面獲得了萊茵城市的愛戴，而另一方面引起了萊茵主教（特別是科倫·安諾）及住在萊茵河兩岸的封建貴族的憤恨。

德意志的對外貿易，是集中在邊境城市：對匈牙利、波希米亞和波蘭的貿易，集中在累根斯堡；對波羅的海區的貿易，集中在哈勒和馬德堡；對北歐國家和英國的貿易集中在漢堡和不來梅。在鄰近國家內，象在匈牙利、波蘭、俄羅斯，商人是德意志人。在南德意志，多瑙河是商業上的自然動脈，而這裡奧格斯堡和累根斯堡最出名。我們可以證明累根斯堡貿易是從羅馬時代繼續下來的。那里的商人殖民地似乎從來沒有消滅過，而在第十世紀，這殖民地變為強有力了，那是因為德意志國家的雙重領土擴展：向多瑙河（特別是在955年打敗馬扎兒人以後）以及向意大利擴展。在第十世紀我們看到，它已被稱為“商人城市”了。954年在巴伐利亞公爵反叛的時候，鄂圖一世曾使用這些商人的河上木船來進行運輸。在1000年時馬扎兒人皈依基督教以後，君士坦丁堡和德意志間的貿易，在數量上大大增加。累根斯堡，由於它的幸運地位，曾成為中歐和拜占廷之間的一個分配站，並從這早期貿易，獲得了它早期的繁榮地位和財富基礎。在十一世紀末期，薩爾斯堡大主教愛柏哈特，論及累根斯堡時說，它是德意志城市中最富庶的一個城市，而歷史家君士坦士·伯諾爾德誇大其詞地說，1094年時在十二周內那里有九千人染疫而死。奧格斯堡早在第六世紀，已筑起了城垣，而城垣建造者的行會正是最早的手藝人行會。在第九世紀瓦牧也有一個行會。

關於十和十一世紀德意志的工業，我們所可說的，比關於商業要少，倒不是因為工業較不重要，而是因為它在創造性和廣泛性方

面差一些。工业几乎全部限于一种基本上是农业人口所从事的手工业职业。妇女們从事紡織、縫紉,即在王室家庭內亦然。在世俗的和教会的庄园上,存在着各色各样的手工艺工人。有鉄匠、車輪匠、馬鞍匠、鞋匠、肥皂工、啤酒工、葡萄酒工、編結网及其他工具者、鋸木者、木匠、盾牌制造者、硝皮匠、刻木匠、刀劍匠、漂布者、箍桶匠,等等。在每个庄园的貯藏室里,可以看到床架、床墊、羽毛被褥、罩单、棉衣、坐墊、青銅、鉛、鉄和木制容器,鍵、鍋鈎、鉋、鑽、斧、刮刀、手斧及其他家庭制造的工具。在教会的大庄园上,或在大領主的有些大庄园上,設立了“工場”,由职工来制造东西,这些职工与其說是农奴,不如說是手工艺奴役。这些制品的剩余部分,是拿到市場上去出售的。例如,我們知道,关于主教君士坦士·革布哈的下列一件事:有一天(993年)他召集他的仆人,选择其中最好者,指派他們分別充当廚司和烘面包者、店員和漂布者、靴匠和园丁、車輪匠以及各种行业的技师。所有的盐場原来都屬于国王,而現在他还保留着其中的大部分。著名的盐場,是位于哈勒、薩尔斯堡、賴肯哈尔、倫涅堡、图耳、弗尔达和哥尔茲的。玻璃广泛地使用在教会建筑方面。

在工业部門中,需要象工厂那样管理的,是磨坊、啤酒酿造厂、葡萄酒厂和盐場。在那里,工人是依附者。管理人有較多的田地来維持他們的生活;工人有分塊的土地和茅舍。这些土地的产权逐漸由原来所有者移轉到管理人或依附工人。工业工人在他們工作的时候,給予原料和一定数量的食品 and 飲料。在剩余的时間內,他們依靠他們的田地(工业田地)来維持他們的家庭;这些田地比一般份地(田地)要小。

然而,三种工人是有高級技术的,当然也是自由手工艺者。他們是矿工、金屬匠和刻石匠。班堡和喜尔得珊的羅馬式大禮拜堂以及十一世紀早期城垣,是他們手工艺的例証。喜尔得珊大禮拜堂的

精致的青銅門最明显地表明了从技巧手艺过渡到薩克遜时代所完成的真正艺术的过程；这大礼拜堂是为主教伯华德(死于 995 年)而建造的。它的設計模型者,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德意志人；但是它所用的金屬是在德意志开采并冶炼出来的。造屋匠的艺术以及有关宗教建筑的装璜艺术在十和十一世紀中使人惊异地发展起来。論及伯华德时,有人写道：“以又精致又漂亮的图案,裝飾着牆头以及天花板。”^①在这方面,班堡的亨利二世的大礼拜堂是一个历史性的紀念物。从記載的事实,我們可窺見那时曾閃現出一种近代式的微光,就是,建造这大厦的工人們曾“要求”較高的工資；那再一次表明了这种工人一定曾是自由人。

在整个这几百年的时期內,一个經濟上突出而意义又日益增长的影响,是意大利的商业和貨幣对德意志的重要性。阿尔卑斯山路,以前主要是为軍事和朝圣而用,但从 962 年德意志和意大利联合組成日耳曼民族羅馬帝国^②以后,这些山路获得了商业上的重要性,那和倫巴城市的兴起是有关系的。意大利是德意志黄金供应的一个来源。越来越多的与东方的貿易,使黄金源源不絕地向阿尔卑斯山外流出。意大利的一位編年史家索拉克特·本尼狄克論及日耳曼人时,伤感地說,“薩克遜人把他們在意大利所可找到的一切黄金白銀囊括而去了。”由于阿尔卑斯山路——大圣伯尔納德和小圣伯尔納德、斯普呂根、塞普替默、勃倫納各山路——落入德意志的控制,它在欧洲享有一种商业上和財政上的无限利益；而这一切山路是条条通倫巴平原的。

中世紀德意志有四条和东方連接的路綫：(1)經由威尼斯及其他意大利城市,(2)通过君士坦丁堡,(3)通过俄罗斯,或經由“发兰琴

^① “exquisita ac lucida pictura tam parietes quam laquearia exornabat”.

^② 腓特烈一世加上了“神圣”这一称号。

路”或經由累根斯堡到基輔，(4)經過穆罕默德教西班牙。這一切路線都給德意志提供了東方的消費品。在第九世紀晚期，聖加爾寺院的修道僧敘述說，查理曼朝廷上的貴族習慣于在巴費亞從威尼斯商人購買價值昂貴的利凡得布疋。他也許把他那個時代的風尚，套到查理曼時代了。908年時，主教奧格斯堡·阿達爾柏曾贈給聖加爾寺院修道僧們以價值昂貴的太爾紫色長袍。鄂圖一世曾派遣一個德意志富商，叫做琉特法力德者，往君士坦丁堡去，而在973年有一個拜占廷使節來到魁德林堡。科維寺院的一本市場帳簿提供了一張應用的香料表冊，這帳簿也許是從十世紀開始的。里面的數字，可使我們了解中世紀時代對香料需要的情況。帳冊中列出：蠟六百磅；胡椒和小茴香籽各一百二十磅；生薑七十磅；肉桂十五磅；丁香、薑根、大黃、香油膏、霍香、香樹脂、乳香、沒藥和百里香各二磅。伊克哈德四世(死於1060年?)寫道，聖加爾寺院曾在君士坦司采購過香料。

數量和種類日益增加的東方貨物以及大量黃金源源流過了阿爾卑斯山路。阿爾卑斯山區的寺院和主教區，是這項貿易的特殊受益者和管理者。它們征收通行稅，維持沿路的“站”，供給運輸工具並保護道路和橋梁，儘管關於它們的勒索和疏忽方面，還有很多怨言。胖子查理給聖加爾寺院以位於馬格其奧湖畔的盛產葡萄和橄欖地區內的馬西諾禮拜堂。賴赫瑙寺院，除了它在科摩區所有的地產外，在朱理爾—塞普替默路上有倫茨以及在盧克馬尼埃路上還有塔明斯和特林斯。狄遜提斯寺院在馬格其奧湖區也有土地。這些土地的贈與可追溯到丕平時代，雖然在十二世紀之前，記載是缺少的。普非斐斯寺院在契維那附近有土地，並且早在998年時，據說“在靠近塞普替米山腳^①處便已有哥登第宗教聖所”。鄂圖

① “ecclesiam sancti Gaudentii ad pedem Septimimontis”.

一世賜給聖加爾寺院以君士坦丁堡湖畔羅爾瑟赫的市場權利。現有一張約 960 年時亞俄斯塔的稅率表。

但是，德意志也從新開放的下多瑙河路綫，獲得了商業利益。這路綫幾百年來由於“蠻族”即哥特人、匈奴人、阿佛爾人、保加爾人、馬扎兒人的連續侵犯，而曾被閉塞。在 1000 年，匈牙利國王史梯芬正式皈依了拉丁基督教，於是在 500 年時期中多瑙河路綫第一次開放，並直通巴爾干半島。幾乎立刻有大批商人和朝聖者開始涌到這一條到君士坦丁堡和“聖地”的最近路綫上。“貝占”，就是拜占廷的金幣，偶然曾由史家和詩人提及，現在，有的已從埋藏的地窖裡被發掘出來了。

但不是所有的希臘和東方貨幣都是經由多瑙河而來的。因為如上文所說，“發蘭琴”貿易路，也使德意志通過波羅的海和東方取得聯繫。有一個穆罕默德教旅行家塔屠塞在 973 年到達德意志，在馬因斯看到出售的絲綢、香料及其他的東方貨物以及看到從撒馬爾罕來的若干貨幣時，感到驚奇。波蘭的美士谷曾送給鄂圖三世來自基輔市場的一頭駱駝。

德意志-西班牙的貿易大部是奴隸貿易。我們已說過，遠在第九世紀，在德意志和穆罕默德教西班牙之間，已存在着一種奴隸貿易，而凡爾登曾是猶太奴隸販子的基地。溫德族奴隸是這項貿易中的最重要的貨品，但也有其他的東西，象非洲的象牙、羽毛漂亮的鳥類、豹皮和獅皮、活潑的猴子。從西班牙來的路綫，是渡海到羅尼河口，從那里再向北行。鄂圖一世一心要終止穆罕默德教海盜船對意大利海岸的掠奪；為此，他派遣了洛林區哥爾茲寺院的住持約翰出使于哥爾多華。我們不知道這項出使的效果如何。但是，在 1000 年之前，奴隸貿易已趨萎縮，也許因為薩拉森人被逐出于布羅溫斯，而猶太商人曾與他們狼狽為奸。在薩克遜時代，德意志對外貿易的另一擴充，是從科倫渡北海到英國的貿易。這些商人

是經營德意志的鐵和銅以及東方商品。英王厄特爾勒德(978—1016年)曾給予他們在倫敦經營商業的特殊權利。

就金屬——白銀、銅、鐵——和食鹽而言，中世紀德意志是歐洲的最惠國。當地中海區居民必須辛苦地在海岸上用蒸發方法在鹽盆里來製造食鹽時，當其他北歐的國家被迫從南歐輸入食鹽時，德意志有很多天然鹽井。薩爾斯堡^①這一名稱，說明了這一事實。德文“哈爾”(“hall”)這一綴音，作為字頭或字尾時，是用以指示當地鹽場的一個地方名稱，例子有：哈勒、哈爾斯大德、賴肯哈爾。洛林產鐵和鹽；瑟林吉亞產鐵、銀、銅和鉛；上斯瓦比亞的諾立坎產鐵；薩爾斯堡產銅和鹽。在十世紀之前，士的里亞、提羅爾和薩爾斯堡的礦產已經開采。但是在十二世紀後期之前，正當波希米亞的礦產，尤其是厄爾士山脈的礦產，開始開發的時候，哈茨山脈是歐洲金屬蘊藏最富的地方。不可能確定在羅馬和德意志的開礦事業之間有什麼關係，因為現有的關於墨洛溫和喀羅林兩朝的资料，實在太少了，我們不能依據它們來作出什麼論斷。

關於中世紀礦業的歷史，實際上可以說是從開發哈茨山脈的礦產開始的。因為約在960年，當哥斯拉爾附近的蘭米爾斯柏山大銀礦被發現的時候，開礦事業里發生了一種類似革命的事情。德意志就因此一躍而居西方國家的前列，此外，它已享有由於銅、鐵、鉛的出產所獲得的經濟優勢。在十世紀後半期，貨幣使用的顯著增加已可看得出來，而這些貨幣除了上述的礦產以外，很少有別的來源。對於這些貴金屬的生產，還須加上波蘭人和波希米亞人的貢獻；因為這些貢獻象易北河斯拉夫人所納的那樣，是以金屬而不是以貨物來繳納的。

可是，必須記住：儘管有商業和工業，封建德意志，象當時的全

① 薩爾斯堡(Salzburg)是從“salt”(鹽)這一字得來的。——譯者

欧洲那样，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种田、种葡萄园、种花园、种果园，是通常的职业。中世紀日耳曼人爱好果园、葡萄园和花园。詩人瓦拉弗里特·斯特累波所列举的賴赫瑙寺院園圃內的蔬菜和花卉种类，几乎和《庄园詔令》^①所列举的相同。种田主要是按三田制进行的，但这項更好的、更多产的办法，还没有完全代替那种旧的耕种和休耕交替的两田制。历史家的証明（他們常常仔細地叙述气候条件，象严寒的冬季、干旱的夏季、潮湿的春季）、寺院庄园纪录簿的資料、薩克遜时代的刑法，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一事实：薩克遜德意志按它的經濟活动說，最大部分是屬於农业經濟的。甚至累根斯堡，虽然它的位置适宜于商业并有羅馬的商业傳統，但在鄂图一世时代，它之所以重要还大部在于它是周圍地区的牲口市場。

到那个时候，萊茵区的葡萄园开始起重要作用。过去，摩塞耳流域比它重要得很多。在第六世紀威南塔斯·福图內塔斯曾以荒野的萊茵土地和耕种較多的摩塞耳土地相对照，后者是盛产甜葡萄的。在这个时期，只有安得那赫在萊茵河沿岸有重要的葡萄园；在那里葡萄种植是从第九世紀开始的。

摩塞耳沿岸的葡萄种植业，是从古代傳下来的；而萊茵河沿岸的葡萄种植业，是在中世紀时代傳入的。摩塞耳河由于它的許多弯曲、它的向阳斜坡、它的肥沃土壤等这些良好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德意志葡萄的最早起源地。从德里佛斯到科不林士一带，葡萄园很多。德里佛斯的大主教，在麦提奧兰納斯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葡萄园。奇怪的是今天著名的盛产葡萄的地方，在第九世紀还是未开垦的地方。霍克海默、策尔廷安和約罕涅斯柏安这些地方，那时連名字也还不知道。当时所选择的地点，是天然的斜坡。今

^①指查理曼的《庄园詔令》。——譯者

天的大葡萄園，種植在峻峭的泥土岩的台地上，而在早期那里太不易攀登或太不方便。這些土地，直到十一世紀，隨着薩利安時代人口的增加，才被占據，而直到十四世紀，才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十一和十二世紀，人們不得不去開垦泥土岩地；很可能，他們偶然發現而不是預先見到這些土地對葡萄種植的特別適宜性。從十一世紀起，我們有越來越多的資料，證明這些土地作為種植葡萄之用；那逐漸轉變到了更合乎科學的“山岩地耕種方法”(Terrassenbau)。耕種得最精細的地區，是在阿爾河流域，那里的河流起於愛斐爾山，下流五十五哩後在辛西格地方注入萊茵河。在萊茵河畔，最早的葡萄園通常是在舊羅馬城堡的地基上或在城市的周圍，甚至在城內。遲到十二世紀，在馬因斯的城垣之內還有葡萄園和耕地。

由於自然地勢的關係，業主的葡萄園土地不是單一的打成一片的廣闊地帶，而是許多零塊的土地；如果要把它們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來管理，象管理莊園制度下的普通農場那樣，那是有困難的。而且，修剪葡萄藤工作在農作中幾乎是一種精細的技能。這種工作者可以說是勞工中的貴族。因此，出現了下列情況：在摩塞耳河和萊茵河的產葡萄地區，農奴制不象在德意志的別的地方那麼流行，而園地是由付租的而非由不自由的租戶耕種的。葡萄園有時出租給一個種葡萄人的集團，有時出租給一個人，園內產品按一定比例給于地主作為地租；但是經常訂明這項數額不是勒索而是地租。

然而，在萊茵河和多瑙河盆地之外，當時的經濟狀況較為落后。必須記住：這兩地區獲得了羅馬文明的益處；在那里，羅馬的精神和物質的傳統都還沒有完全消滅。但是，在美因河上游的符次堡附近，在弗爾達河流域（那里有弗爾達和赫斯斐爾德的邦尼非斯教派寺院），在多瑙河最高點上的諾高區，在那布河流域，在黑森和瑟林吉亞，還可看到新開的土地和農業情況。弗爾達和赫斯斐

尔德寺院是从事于牧畜业的修道僧会社。美因河上游的渡口的名称,“牲口津”(Ochsenfurt)和“猪津”(Schweinfurt)就表明了:那里的养牲口和养猪事业是一项重要活动。在瑟林吉亚森林里,农夫饲养几千头猪,它们吃山毛榉等果实。在这里,兴起了一个新的边境市镇,即瑙谟堡,在那里温德人同日耳曼小贩交换货物,那是查理曼所建造的一连串边境防御站的一个新环节。

鄂图时代的立法,大多是要防止有关土地的罪行,象盗窃牲口和侵占罪那样;由此可见,德意志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商业大部限于两大河流及其支流的范围。工业几乎是完全不自由的,由庄园上和寺院里手艺人来从事的。在德意志的西部和南部,象造币厂和铸币权的赠与所表明的那样,一定有货币经济通行着,而在那些较落后的地区,一定仍常常使用实物支付和物物交换的办法。

萨克逊德意志有这么广大的森林,看来,圈围和私人占有它们是不可能的。在夏秋两季,牛羊和猪群差不多随便在那里奔走,牛羊群象鹿一般地吃着树枝,而猪群吃着散落在地面上的山毛榉实、橡实或槲实。森林也供应了穷人们鲜肉(因为牲口太贵,非在必要情况下不宰杀),它的湖沼供给他们鱼类。木柴和木材在森林里垂手可得。可是,虽然森林的确是带来好处的,但它仍经常被看作是一种讨厌的东西。它藏匿着豺狼,它占据了原可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它切断了村落和村落间的联系;在森林里要指出一条羊肠小道,已有困难,更谈不上康庄大道了。因此,到处的森林都被视若仇敌,被无情地削平了。在1147年,当康拉德三世批准赠给路恩林根寺院森林地带的时候,他另给一块广大无边的王室森林地作为赠品并附着指令说:“这一寺院的僧侣们,应借助于他们的农奴拔除它(森林),砍倒它,使它的土地可以耕种,并把移民引到那里去,直到它完全被砍掉,连根拔出为止。”在德意志,森林的迅速伐除,是一个可悲而突出的事件。在十一世纪,圣特罗杜寺院曾有十三处

森林；而在十二世紀中，一處也沒有了。即使在還留有森林的地方，象在公地上那樣，它也終于被大貴族圈圍起來；在那里他們確定了他們的領主狩獵權利，出售木材和租出牧場的權利。

在萊茵河和摩塞耳河領土範圍以外，大部德意志是一片很廣的森林和寬闊的沼澤地，人口稀少而又很分散。在三百年的期間，勤勞的農民一代又一代地斬伐着森林，弄干涸洼地，直到十三世紀薩克遜和中多瑙河地區克服了荒野狀態為止。即在那時，還留存着大森林地帶，其中“黑森林”和奧登森林只是萎縮了的殘余而已。我們需要以相當的理想力來想象封建時代后期德意志自然外貌的大概輪廓。麋鹿、野豬、熊常常來到茂密的山毛櫸、橡樹林里；有多至包括着三百只強壯的狼的狼群，在一個隆冬時期，象在845—846年的冬季那樣，使村落陷入了恐怖。與森林相提并論的，還有捕魚業。有趣的是在萊茵河和摩塞耳河上，存在着人為的養魚業，它是導源于羅馬人時代的。為了養魚的目的，池塘、河流和湖沼到處被使用着，而有時還特別建造了池塘。捕魚所用的工具有：網、圓簍和魚梁。

總而言之，關於德意志在薩克遜時代物資繁榮狀態的歷史例証，是廣泛的，也是一致的。在諾曼諸王使英國安定之前好久，在法國的卡佩朝王政開始擺脫混亂局面之前好久，德意志薩克遜諸王不僅在中歐已建立有秩序的政府，而且也已把堅強而又有力的手伸到北意和中意方面，使那個富饒而多戰爭的地方初次嘗到真正和平和繁榮的味道。而那是意大利從東哥特王國在第六世紀滅亡之後從未享受過的。德意志不需要教會以“上帝和平”^①的形式來行使警察權的干涉。因為德意志的王室能使法律和秩序通行無阻。德意志僧侶們游歷法國時，看到那里的強盜男爵和无政府狀

^① “上帝和平”另稱“上帝休戰”是在1027年由教會所制定的；規定從星期三晚到星期一晨以及在若干宗教節日，軍隊間及個人間不得有敵對行為。——譯者

态,感到惊异;而这种混乱局面构成了沿洛林的法德边境上糾紛的一个永存的根源。

在一百二十年的时期——从 955 年打敗馬扎兒人到 1075 年“授爵权战争”爆发为止——德意志外无敌人的侵犯,内有封建时代后期无与伦比的和平和繁荣的状态。

在薩利安时代(1024—1125年),我們看到关于德意志繼續繁荣的两个肯定的例証:人口的显著增加以及市民生活初次活跃的表现。当然,绝对的統計数字,連想都不要想,可是近代学者已作出相对的估計。在喀罗林时代,象摩塞耳河流域那样特別良好的地区,似乎已有稠密的人口。在第九世紀,据估計,德意志人口是在二百五十和三百万之間。在薩克遜統治时期,人口一定會增加到三百万甚至三百五十万。在薩利安統治的世紀中,尽管有着从 1075 到 1093 年間所进行的长期內战,人口却繼續大大地增加着,可能在十二世紀的开始已增加到五百万。在薩克遜朝国王登极的时候(919 年),可以称为城市(这是在自由城市之前)的地方不超过三十处。二百年以后(1125 年),有一百五十个城市,有的是自由的或部分自由的。其他有关人口增加的例証是:居民繼續移入新地方去^①;乡村教长职位,跟着人口从乡間流入城市的趋势而衰落下去;而城市本身也扩大郊区和組織新教士区来适应伸展着的城市面积的需要。这些新城市中,很多是在王室土地上兴建起来的,因为这些土地往往在有利于商业的地点上,象法兰克福、亚琛,哥尔馬耳、哥斯拉尔那样,而且,在那里国王的保护比別处要坚强。其他的新城市是在主教所在地,居民或者通过緩慢的解放过程获得了市民自由权,或者由于反叛而取得了它們。例子有:馬因斯、科倫、瓦牧、斯

^①茨威发尔登(Zwifalten)的編年史說及居民称牧場为“Alb”,意即山側或山坡上的高地牧場。在南德意志,直到今天,还可听到“往高地牧場去”(auf die Alb gehen)这一句話。

特拉斯堡和馬德堡。

德意志和意大利間的越来越亲密的商业关系和作为貿易地点的市鎮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以及市民階級的兴起，无疑是在薩利安时代德意志历史上最重要的經濟、社会事实。萊茵城市当然站在領導地位。就先进城市地位說，科倫由于它接近法兰德斯，胜过馬因斯，它的財富在那个时期，一定是巨大的。我們确知：它在1074年有六百个商人。它的力量已够强大，在五十年时期中两次反叛了大主教，一次在1074年，另一次在1125年。在两世紀中它两次被迫扩大它的边界，并入了新的外圍村庄并建造了新城垣。馬因斯位于美因河和萊茵河在法兰哥尼亚中央的汇合处，在繁荣方面，稍微相形見绌。科不林士的1104年的通行稅表，是按照商人所来的城市排列着的，列举了君士坦士、巴塞尔和苏黎支。而在五年后的稅率上又包括了遙远的羅馬城在內，并为羅馬人制定了一种特別稅率。亚琛和喀姆布萊发展得很快。不来梅在賢明大主教阿达尔柏統治下，成为整个北欧的大商埠，在那里德意志、俄罗斯、丹麦、冰島、英国和法兰德斯各地商人进行着貨物的交换。巴登的弗賴堡，是1118年时由扎林根族建立起来的，成为“黑森林”的商业中心，也是巴塞尔和符茨堡之間的、哥尔馬耳、斯特拉斯堡、奧格斯堡和紐倫堡之間的分界点。哥斯拉尔的发展是惊人的。它的靠近哈茨山矿場的位置再加上它优良的地勢，把它提高到这么重要的程度，亨利四世如果不曾有1075年的薩克遜大叛乱和授爵权战争的爆发，也許将永久定都在那里。就东西和南北的交通來說，哥斯拉尔的地位确是幸运的。通过它的有那条旧喀罗林朝公路，这条路从利普河口的杜易斯堡起，过帕得鮑恩，渡威塞尔河，再过哈伯司达而抵馬德堡，而它的支綫延入勃兰登堡。無論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容易和这条大路相連接的有：多特蒙德、威尔、索斯特、德的摩尔、喜尔得珊、民登、布倫斯威克、魁德林堡。其次，哥斯拉尔是縱貫中

德意志大路上的一个分界点,这条路从奥格斯堡起向北经过紐倫堡、班堡、爱尔福特、哥斯拉尔、布倫斯威克、倫涅堡、巴杜威克而达汉堡或不来梅。在多瑙河流域,累根斯堡,就重要地位說,赶过了奥格斯堡。那里有一个倫巴侨居商人的殖民地,在1038年初次見于文献里;多瑙味特出現于1030年。而最重要的,是在王室領地上的紐倫堡,于1050年时提升到一个城市的地位,虽然它在1163年前,还没有領得特許状;它发展得这么有力量,在1105和1127年,它能够抵抗霍亨斯陶芬族的两次圍攻。它的貿易,胜过了班堡的貿易。

保护商人和奖励貿易,成了薩利安諸王,尤其是亨利四世的主要目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公安条例》(“landfrieden”)及1093年的《巴伐利亚和約》保証給商人們特殊保护。授爵权战争和薩克遜叛乱(1075—1093年)几乎使国家破产,但在和平恢复之后,繁荣景象接踵而来了。亨利四世傳記的作者,告訴我們說,“現在,船夫在河流上可安然无恙地划过那些强盜貴族的城堡,而他們以前原是靠掠夺財物而自肥的;公路上不复充斥着劫人的匪帮;森林不复成为盜匪出沒之所;公路开放給商人旅客,使他們安全地来往;于是以劫掠为业的匪徒也陷入潦倒貧困状态,象他們曾这么长久地使別人遭受的那样。农民、手艺人 and 商人都歌頌国王,而他們从他的德政,获得了这种寶貴的安全;因为現在,土地的耕耘者、勤勞的手艺人、節約的市民,有些把握可以想望将来享受他們从劳动所得的成果了。”烏拉赫·伊克哈德在1104年写道:“到处安宁。和平和繁荣同时存在。①”

亨利四世确应获得市民所給予他的軍事支持。一本編年史里說,“他的軍隊的最大部分是从商人方面来的。”②在亨利四世和

① “Undique terra satis quievit, pace simul et fertilitate”.

② “Maxima pars ejus exercitus ex mercatoribus erat”.

格列高里七世冲突的时期中，德意志市民和手工业者階層有着左右局势的力量，他們成了特殊宣傳的对象，無論在教皇党人或帝国党人方面。貿易利益影响了主教們在这冲突中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决定。巴塞尔主教的情况，正是这样的。

当我们看到：哈森堡·柏嘉特主教在1080年占有了布緯根的时候，試一翻地图，就可知道，他因此获得了对两条山路——哈汶斯坦因山路及由亚尔入奥尔騰的山路——的控制权；那使他可抵达那給巴塞尔城和阿尔卑斯山区間交通路綫的瑞士大道。主教为爭取普非斐斯寺院，曾进行长期的斗争；当我们想到这一寺院給主教利用塞普替默山路一个机会的时候，这一斗争遂具有一个完全新的意义了。主教还从国王取得了柔拉山路，作为对塞普替默山路的支撑点。这一切表明了：他的一切努力都朝向使他的商业賺錢的目标。这些贈与的重要性告訴了我們，主教在拥护帝国政策方面所获得的代价。由于想要获得阿尔卑斯山路的控制权(对他商业的成功，多么必要)，柏嘉特遂成了皇帝亨利四世的一个最忠心的支持者。正是由于他的經商精神，再一次他参与廢黜格列高里的阴谋，他同那些被选把命令送往倫巴各主教那里的人们站在一起，他也不得不伴隨亨利四世往卡諾沙去，并反对皇帝的竞争者。所以，皇帝給主教的贈与，經濟方面的重要意义越大，主教对帝国的政策也越多显出它的商业性質，就是說，这政策构成了他的商业計劃鏈条中的一个环节①。

低級階層、在領主的封建压力下激憤的小貴族、市民、甚至农民(薩克遜以外的，薩克遜的情况完全特殊)②，对亨利四世的忠心是个显著的事实，那指明了在十一世紀，德国的社会机构和經濟状况已有深刻的改变。

①基林：《巴塞尔城的貿易和工业》(1886年)。

② 薩克遜人反对亨利四世的根源，在于薩克遜人反对德意志其他部分的封建制度推行到薩克遜。因为在薩克遜，封建制度尚屬很初步的性質。在那里，差不多没有什么“軍人等級”，“帝国官員”也是很少的。宗主和附庸的关系在薩克遜，不象在巴伐利亚或斯瓦比亚那样正式，而劳役也不那么繁重。虽有許多貴族，但也有大量自由农民。而且，在这些貴族中，大土地所有者人数也不多。他們有少数附庸和比較少的庄园。他們的显貴身分，是一个社会地位，而非政治的优越地位。薩克遜貴族与其說是一个大男

理財的能力是薩利安王族的一種特長。它的創始人康拉德二世，在這方面，是卓越無比的。康拉德的孫子亨利四世在這方面表現了真正的人才。關於這項才幹，再也不能比他在管理王室土地方面表現得更好了。他培養出一群有訓練的官員，即“帝國官員”來管理它們，規定須有詳細收入帳冊，企圖用貨幣經濟來替代實物支付的老方法，改革稅制，改進荒地，恢復——或者用法律術語，“追還”——大量國庫財產，這些財產在他未成年時期被貪得無厭的主教和貴族們非法地奪去了。但是，他追求效能的欲望，不止於此。巨大森林和廣闊荒野是王室土地，然而，在此之前，王室從來沒有利用過。亨利四世企圖把這些土地併入國庫，開發它們的資源，他圈圍它們，停止在那裡濫伐樹木和燒炭的行為，禁止沒有執照而在那裡漁獵，並且以出租磨坊基地等等，來使它們成為政府收入的一種來源。這些措施所引起的反對是很激烈的，因為這行動違反了一切傳統。過去幾百年中，森林曾是窮人的住所。可是，自由農民階層，從這些新辦法所遭受的損害不象封建主和僧侶——主教少些——所遭受的那么多，因為後者曾侵占公家土地。所以，從這些“特殊利益”階層所發出的抗議，比從民間來的抗議多得多。亨利四世的政策包含着某種近代性的氣息。他的政策至少有些象羅斯福的政策，後者曾努力停止礦業和石油公司和經營畜牧場主開發

爵，不如說是一個富裕業主，他使用租戶的勞動力來耕種他祖傳的田畝。他的生活是簡陋的，而他的活動是屬於鄉村性的。他以他的階級而驕傲，但並不穿貴族服裝。薩克遜貴族憎惡亨利四世，因他要採行新式的封建法律和封建制度，如象領主和附庸間關係的硬性規定，相續稅——繼承采邑的遺產稅——新的司法程序、新的賦稅種類以及國王對森林禁令的擴充。他們是剛直的保守者，而農民和他們也有同感。他們以最粗暴的薩克遜法律自豪，憎恨那要剷除古老的血統復仇制的努力，反對“上帝和平”；他們拘泥於法律屬人主義的舊法觀念以及他們的舊風俗，恪守薩克遜社會的等級差別，可是同時在階級內部有民主；他們嫌惡任何種類的外人——斯瓦比亞人、巴伐利亞人、佛萊銘人等等——而且，他們仇恨亨利四世的“帝國官員”，因為這些官員既是出身微賤，又是外地人。自由農民的憤恨，主要是由於亨利四世的圈圍大荒地所引起的。

美国西部的政府土地的行动。我們現代的“男爵”是商业和工业巨头；在封建德意志，他們是貴族、主教和住持，也是大土地业主，有扩充他們地产的野心。“我們知道貴族的怨言和薩克遜农民的怨言以及薩克遜种族要求独立的果断精神，是糾纏在一起的。”

正是屬於这一富裕的、有势力的而又貪婪的階級的人們，趁着亨利四世幼年未执政的长久时期，使自己发了財；而格列高里在他和亨利四世的冲突里，千方百計地想取得他們的支持。教皇有些惶恐地看到：国王受到市民和平民的爱戴，同时大住持和大貴族憎恨他的又廉洁又有效能的整个行政綱領。他成功地遏阻了王室官吏的勒索行为，他曾使他的公爵、伯爵、軍事长官（边境上的守备軍官和知事）以及貪得无厭的辯护士或宗教基金的保管人对他們自己的行为負責。他改革了司法，改組了賦稅制度以及限制或取締了几种最恶劣的封建慣例。这一切改革、追还、强制賠償制，激起了犯罪者的狂怒，而教皇正是向这一个有势力而又有野心的階層呼吁求助。

地理上的地方性和由授爵权战争所产生出来的社会分裂与矛盾，在德意志造成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跡，并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民族精神和它的物質条件。所有日耳曼生活中的要素，象在一間沸騰的實驗室里那样，在斗争的火焰中都已融解，并按新的比例化合而成了一个新的混合物。政府更动了，社会結構改变了，不习惯的社会和經濟情况出現了。从物質方面看，德意志几乎已陷入破产状态。全国已被各党派扫得空无所有。王室庄园、教会和貴族的土地、农民的田庄都再三被蹂躪。盜賊橫行。早在1078年，薩克遜与其說象一塊人住的地方，倒不如說象一片荒野为妥。主教班堡·魯伯特在1093和1095年之間說過，在薩克遜有大片土地寂无人烟。敌对双方及一切派系都以占夺王室土地、教会土地、貴族土地，并把它們分贈出去来收买自己手下的人。地方情感和集团利

益的魔掌紧握着国家的命脉 城堡开始在一切山头上竖立起来。瓦特堡在 1030 年初次被提及。波克海姆的城堡在 1105 年出现。十二世纪的一个作家说道,城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象在十一世纪的教会那样。在这些堡壘中很多是强盗窠。

的确,薩利安王朝从这反对教廷和惩罚反叛封建貴族的斗争里,赢得了胜利,并使德意志又一次恢复了和平秩序。但是,在十二世纪中期,霍亨斯陶芬起来統治的德意志,是一个变了样的德意志。十一世纪,正是薩克遜德意志从畜牧业和物物交换制过渡到一个更加安定的农业制度和一個觉醒起来的貿易的时期。教皇和皇帝間的战争,給了薩克遜这么严重的打击;它开荒的質朴状态与单纯的社会結構都已改变了。薩克遜按照法兰哥尼亚、斯瓦比亚和巴伐利亚的式样,变为封建化了。结果是:有刻苦耐劳精神的人们向东“流散”到新地方去,讓那些替代了薩克遜自由农的教会和貴族的大庄园由佛萊銘和荷兰殖民来更細密地从事耕种。这批殖民在“低地国”的硬土地上原本习惯于深耕的。他们是由獅子亨利和霍耳斯敦·阿多夫移往薩克遜的。

第十二章 十字軍前的法国

(877—1095年)*

法国喀罗林帝国衰亡以后,到处还遗留着它的行政、社会和經濟制度的遺跡;就在这廢墟上,那些强暴而有势力的地主貴族,使用武力、篡夺和詐騙的方法,逐漸建立起完全属于封建类型的新的政体、新的社会状态、新的經濟制度,这是合乎时势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第十世紀开端,法国瀕于混乱局面。在查理曼帝国領土範圍內,再也沒有一个国家象法国那样接近瓦解。喀罗林朝末代帝王已成为无力而庄严的幻影,力图苟延殘喘,在有势力而粗暴的貴族面前,仅居于有名无实的統治地位;这批貴族已到处建立了地方王朝政权。法王在 110 年时期的有名无实的統治之后(从 877 年秃头查理逝世到 987 年查理五世逝世为止),終被休·卡佩族接替,因为在一个只容忍大領主存在的封建国家里,他們既沒有土地来統治,也沒有土地来分封。

关于封建法国的历史,我們必須从它的大省分的历史,甚至从它的小領主的历史里来找寻。法国的政治地理原来沒有象一个蜂巢般的对称形态,可是它的結構倒是有些象一个蜂巢那样;因为它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州,大多独自过着和邻人不同而又分隔的生活的。人民的整个政治、經濟和社会生活在这些封建蜂房里并通过它們起着作用。到处流行着封建的和庄园的双重統治制度。封建

* 地图: 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69 頁。

國家經過分裂再分裂後，成為一大批間隔地區，而居住在那里的人們不是統治者，便是被統治者。

在這些紊亂狀態之下，法國的文化情況在第十世紀退到衰落的最低程度。布勒塔尼和加斯科尼已瀕于野蠻狀態。這是一個粗魯、艱難而又好戰的時代。據說，柏立((Berry)省的名字，是從那意指“荒地”(beria)的一個古詞得來的。除了這些隔絕狀況和貴族經常私鬥的災禍以外，還有就是：道路不良（因為古代羅馬的公路已經毀壞，很少修理，而有很少建築新路）、各地對外來人的懷疑甚至敵對，以及流行種類繁多的語言和方言。甚至在十二世紀中，聖伯爾納德對語言上的不便還發出怨言。

這種地方分裂的情況，還由於種族成分的複雜而大大地加劇了。布勒塔尼差不多純粹是由凱爾特人居住的。海峽沿岸是由北歐人占領的，然而，他們因為在與當地血族和當地制度同化方面有特殊能力，很快就成為法國人了。在法蘭德斯，有兩個當地的種族：日耳曼血統的佛來銘人以及瓦倫人；後者在血統方面，和佛來銘人雖然沒有多大的不同，但在語言方面是屬於羅馬語系。加斯科尼的居民，主要是巴斯克人；南法和羅尼河流域的居民，基本上屬於強壯的羅馬血統，夾雜着日耳曼血統，即勃艮第人和法蘭克人。塞普替美尼亞的本地人口是哥特人，稍微夾着一些外來血緣。在第十世紀中，法國人口中血統最純粹的是在塞納河盆地——法蘭西公爵領即法蘭西島。這塊領土位於從奧爾良到波未一條直綫和從理姆到沙脫爾一條橫綫的交叉點上，恰在王國的中央；而它的中心便是巴黎城。這一切自然地形和文化與歷史條件，都有助於使法蘭西島成為封建法國的核心，並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王國的首都。

但還有比上述各種地方分歧更廣更深的分歧，就是那區別整個北方和整個南方的文化上特出的二元性。羅亞爾河構成了北方和南方之間的分界綫，這一條界綫，甚至在十三世紀當法王已征服

了南方各省,破坏了它的文化,消灭了它的政治独立地位,因而南法的破碎地区已可被北方政府同化的时候,还是没有完全被抹去。

在第十世紀,法兰西島的这种同国家的其余部分隔离的状态,通过下列两种新势力的活动,具有了一种有力的新焦点地位。一种力量,是卡佩王朝崛起于巴黎;另一种力量,是理姆的宗教和文化的优势。从宗教的观点来看,格伯特有理由把理姆說成是“法兰克王国的首府”。塞納河和瑪恩河流域的主教区:巴黎、盧昂、沙脫尔、松斯、波未、瑯城、夏龙、奧东、奧舍耳、甚至里昂和布尔日,在整个混乱时期中,仍然象蜜蜂般地紧密地依附理姆,把它看作法国教会的母亲和头脑。在这样情况下,法国公爵領和从那里出現的王朝,享有双重的重要地位。在政治上、宗教上和文化上,法兰西島是所有那些破碎、分裂、散漫省分中的最健全而又最有力量的地区;而这些省分集合在一起的空泛关系总起来說,就是第十世紀的法兰西“王国”。

上述隔离状态由于环繞这区域的自然条件而加剧起来。封建冲突的混乱局势和北欧人的侵犯,实际上曾使这公爵領在北方和西方被一片荒蕪地带环繞着。彭替安、安如、下布勒塔尼、拉·馬士都是荒涼的,以至几乎渺无人烟。在頹廢的寺院和城堡的断垣裂縫里,荆棘丛生,村庄已不可复見。那些受惊和破产的居民,紛紛逃到中心地区,以求安全,逃入了塞納河的盆地,在那里还可找到一些安全,还有公爵、住持或主教来維持一些法律和秩序,虽然可能是粗暴的——佛罗杜尔德的《編年史》里常常提到理姆大主教的民兵。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法兰西島因它的邻省的遭难而获得了利益,从而在物質和精神生活方面,能够显出活跃的力量。甚至早在第十世紀中,我們已可看到关于法兰西島、香宾和勃艮第範圍內的物質繁荣的資料。当时,巴黎还局限于島上,在富饒和人口方面都比不上瑯城和康边;可是我們已看到它被說成是“紐斯的里

亚和勃艮第王国的头和口”^①。未来香宾大市集的輪廓，可在夏龙看得出来；麦郎在巴黎上面的塞納河弯曲处，是一个内河港，扼守着香宾-布里和罗亚尔河之間橫渡塞納河的渡口；弗勒里和費里厄寺院的船只，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寺院的船只，往还于河流之上；弗勒里寺院甚至有羊群，那在森林茂密豺狼众多的时代是一种稀有的财产；葡萄种植几乎到处都在进行；在平安的寺院周圍集結着农业劳动者的村庄，在有些寺院里，尤其是在圣里奎尔寺院里，象織布、硝皮、制木器和制肥皂这类工业技术已是这样大規模地进行着，以致手艺人在寺院的周圍集成了街区。

在一个普遍从事农业的时代，法兰西島公爵領、香宾和勃艮第在和王国的其余部分对照之下，是比較繁荣的，只有諾曼底可作为例外。塞納河和瑪恩河流域，那时和現在一样，是欧洲一个最丰富的产麦区；厄坦普周圍的地区是一个完善的谷倉；勃艮第和香宾富于葡萄园和牲畜；除了从洛林輸入盐鉄以外，这三个毗連的省分几乎是自給自足的。教会所需要的、富人所渴望的少数利凡得商品是通过阿尔卑斯山路，主要經過日内瓦或里昂运入的。那插入諾曼底和法兰德斯之間的小港口，即海濱蒙特里伊尔港，是通海峡的出路，也是卡佩王朝唯一的海口。在萊茵河湾近烏得勒支的杜尔斯特德被北欧人破坏以后，并在盧昂复兴之前，蒙特里伊尔在第十世紀中是北方沿岸的最重要的商业据点。它的商业規模是相当大的，特別是和英国的商业，而它的港口收稅很重（因为有很多运输船只发出了怨言）^②。

必須指出：在从謬司河延伸到罗亚尔河并由塞納河和瑪恩河所灌溉的領土內，就是，法兰西島、勃艮第和香宾这一範圍內，第十世紀的生活状况比法国别的地方要好过得多。的确，封建貴族的

① caput et introitus regnorum Neustriae et Burqundiae.

② eo quod ex navium advectionibus inde plures questus proveniant.

斗争和家族的冲突是数见不鲜的,但是它们所发生的影响,不象我們所設想的那样大,是只限于一塊地方的。991年时,黎舍尔曾經长途旅行,从理姆到沙脱尔,只有一个童子伴随着,他所遭遇的没有什么比不良的道路、破坏了的桥梁和簡陋的旅舍更坏的事情了。

諾曼底公爵在他們的領地內,早曾建立有力量而又有效能的政府。这些侵入者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接受了基督教和封建法國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在两个世代的时期之內,北欧人变成成为諾曼-法兰西人了。洛尔夫給外来的移民开放了他公爵領的大門,使人烟稀少的地方重住滿了人。大批破产的自由人、被第九和第十世紀早期的混乱逼得离乡背井的难民以及逃亡的农奴都紛紛投奔海峽沿岸的公爵領內,那可証明“諾曼和平”的效能了。当时在諾曼底,法律就是公爵的法律,附庸們不得橫行无阻,而私爭也是被严房地取締的。

在十字軍之前,封建法國与地中海一带断絕了貿易,而它同日耳曼和意大利的联系也很少。但是,它和外界有一項注定要有巨大經濟重要性的接触,虽然很少历史家曾注意到这事件的政治意义以外的意义。这就是諾曼人的征服英格兰,因此,英格兰被拖出“它的独立地位而和大陆国家取得了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事件发生前的百年,978年时,厄特尔勒德二世对来自科倫的日耳曼商人居留地以及来自盧昂的商人居留地都曾賜給貿易特权;后来,懺悔者愛德华还扩大了盧昂人居留地的特权,以倫敦丹尼门附近一塊地方,賜給他們,专作儲貨之用。

大批商人,主要是佛来銘人和諾曼人,跟着威廉的胜利軍隊渡海登陸,定居于英吉利海峽各港口和倫敦。有一个近代作家把征服者威廉描写成“一个为征服英国而組織的巨大股份公司的總經理”。一本編年史上說,“有些人是为土地而来,有些人是为金錢而来。”“那个时候,在英国的城乡市集上,可看到法國商人和商品。”

威廉敏銳地意識到貿易的價值；這種貿易曾使他的諾曼祖先出名，并使“外侵團”成為海盜兼商人。英國的征服在全部諾曼底，也在全部海峽各省刺激了商業。盧昂的“資產階級”成為一種力量。關於貨幣經濟和活躍的匯兌，有着種種資料遺留下來。在渡海之前已經開始建造和配備船隊的工作，把成百成千手藝人吸引到諾曼底，其中很多人一定是自由手藝人；大批冒險者和要發橫財的兵士（他們作戰不是由於封建服務的需要而是由於僱傭的關係）獲得了大量必要的現款。諾曼底的財富不久便為安茹、法蘭西島、畢加第、法蘭德斯鄰近各省所嫉妬。隨着橫跨海峽的貿易的大量增加，海峽兩岸的盎格魯-諾曼統治者的收入也擴大起來。那些來自巴黎、畢加第、奧爾良、沙特累因和波亞圖的貿易，都是通過盧昂的（雖然很多波特芬貿易經過拉·洛瑟爾出口）。但是，盧昂不能處理這一切新的運輸，所以在諾曼海岸，僅僅是漁村也發展成為新的海峽市鎮，那是我們所看到的一種有趣味的現象。其中最著名的是第厄普，威廉在1067年回到大陸時，曾在那里登陸。這城市是由於和英國通商而建立起來的。其他的例子是彭特-奧德麥、厄塔普爾、索謨河畔的聖瓦勒里。甚至象科德柏克（聖汪列爾寺院的舊港）一類的內河港口，也有欣欣向榮的景象。沿英國南部海岸也可看到同樣的發展情況。“五港”^①、溫契爾西和掃桑普敦成為熱鬧的港口。在掃桑普敦和盧昂之間的葡萄酒貿易早已打下了基礎。

通過亨利二世（1152年）和亞奎丹·埃利安諾爾的結婚而獲得了法國省區之後，英法商業史上揭開了更大的一章。那個時候，控制泰晤士河、恒伯河和塞汶河的河口的國王，就是控制塞納河、羅亞爾河、格羅內河和阿杜爾河口的國王。大量貿易管理章程表明，

① “五港”(Cinque ports)指多維、散德維區、洛謨尼、哈斯丁斯和亥司；因為它們的位置是在英國最接近歐洲大陸的部分，所以在很早時期它們已被稱為“王國中五個最重要的港口”。——譯者

甚至早在十一世紀，扫桑普敦已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中心，在它的进口貨表上法国葡萄酒已占极其显著的地位。普里穆斯原来被称为“骯髒地点，漁民的住所，”而在十二世紀里，已成为西南英格兰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了。我們知道，盧昂在这两方面的商业，是多么繁盛，“商人的帳册上沒有一頁不是写得滿滿的，商人象諾曼底的領主一样地有势力。”这是亨利二世时代的情况。当时，法国的主要出口品，是葡萄酒和明角石磨石；它的大宗进口物，是皮革、鉛、鉄、錫和羊毛。盧昂和都柏林間商业上的密切关系，使人有趣地忆及往昔“外侵团”时期的情况。实际上，所有爱尔兰的出口貿易：貂皮、筐籃、著名的爱尔兰猛犬、咸鮭魚，都是經過盧昂的。諾曼底西部的岡城在采石和輸出造屋石方面，享有特殊有利的貿易。那里的采石場是出名的，使很多有技术的自由工人获得了职业。所有用于建造“战役紀念寺院”的石头（这寺院是1066年由征服者威廉建造在戰場上的），都是用船下行奧綸河渡海峡达哈斯丁斯，从那里再轉运到内地去。岡城的大量石头也运往法国的其他各省去，因为当十一世紀宗教热忱的浪潮正在横扫欧洲的时候，大批教会的建造工程极需要这种石头；在这种建筑的高峯上，起初兴建了羅馬式的教会，而后来还兴建了精致的哥特式教会；迄今我們还可在北法和英国南部看到这种壮丽的建筑物。

海峡两岸港口的大宗貿易品是魚类，包括干魚、熏魚和咸魚。第厄普有一个“养魚池”，屬一个住持所有（这事实本身是很有意义的），而在同一城里青魚是以盐醃的。在附近城市有醃魚場；第厄普、彭特-奧德麦和菲坎普各城是以醃青魚場聞名的。在十二世紀后半期，盧昂出口的魚是：海豚、鱈魚、海鰻、鯖、緋鯢、鯉、鰈，最多的是青魚。后一类魚是諾曼底工业中的主要原料，也是在海峡及在別处的商业中的主要商品。捕魚和醃魚业是盧昂最重要的地方实业。盧昂还以硝皮业出名。有大批諾曼寺院，位于海峡港口地

区；僧侶們一定是对捕魚和醃魚业很感兴趣的。研究寺院位置的結果，揭露出寺院在海岸附近多于在內地这一事实。在塞納河口，不滿五十哩的距离內，寺院多至十七所；在布勒塔尼极西端和俄斯坦德之間的海峽沿岸，有五十多所寺院。

醃魚用的盐所占的重要地位，与寺院也是有相当关系的。寺院进款的一部分，是用盐和魚来繳付的。亨利二世接受用青魚、鯖及其他魚类所繳的稅款，并以此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北法用的盐大部分是从下列各地的盐井运来的：第厄普、阿夫勒、翁夫勒、罗尔、科德哥特、土克、奥达尔、奥舍尔和瓦拉維尔。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和通达盧昂的大小商路連接着的。諾曼領主經常把这些盐井看作他們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盧昂商人是以盐来繳付塞納河上的通行稅的。

諾曼貴族在海峽兩岸所占有的地產，設在英國境內的大批法國寺院（所謂外來的修道院），貴族和主教的時常往返，朝聖隊的此往彼來，英國人往羅馬城或康波斯提拉去，法國人和佛來銘人往格拉斯吞柏立寺院去（這寺院在聖托馬斯·阿·柏刻特墓沒有出名以前，是英國的最受尊敬的神殿）；這一切對於貿易都起了促進作用，并使金錢在海峽兩岸之間無阻礙地流通着。下列兩事，可資證明：1114年，瑯城大禮拜堂的某些修道士，為要募款修建他們的教會，渡海旅行，“因為英國又富又繁榮。”他們在威桑搭船，在船上碰到幾個佛來銘商人出國去採購英國羊毛。在英王約翰時代，有一個諾曼人，叫做布里奧茲·威廉，“管理着一個大型商業機關，它的分店散布在英國、愛爾蘭和諾曼底……他的小船從法國各地下行羅亞爾河，而他的大船往來于英國和諾曼各港口之間”。

在英國，佛來銘人幾乎和諾曼人一樣地多。其中很多人是在1066年跟着威廉的軍隊去的。威廉的王后是法蘭德斯·瑪的爾達；這一事實也許可部分地說明他們人數所以多的原因，但是更加有

力的影响是貿易。在征服英国之后不久，佛来銘沿海岸的一次大水灾驅逐了大批居民往英国去避难。法里西安人的古老織羊毛业在第九世紀北欧人侵犯时期，看来差不多已被破坏，而現在，法兰德斯接替了法里西亚的織布业。原来，这批难民定居于林肯郡，但是由于民众的坚决反对，亨利一世把他們的居留地向下迁移到威尔士边境上的彭布魯克郡去。然而，英国和法兰德斯間的这项經濟联系还是經常保持的。

在十二世紀早期，法国息斯脫西安教派出現于英国。在这时期，英国最肥沃的耕地久已被两个古老的寺院团，即本尼狄克派和克里尼派所占去。他們所可以获得的土地，只有在諾森伯兰的一片广闊荒蕪地带內，就是，由“征服者”的殘暴“掠夺”所破坏的廢墟。息斯脫西安教派就来到这里，并不是十分不愿意的，因為他們的教規命令他們要在人跡罕至的地方找寻居留地。在他們从事养羊以代替耕种之后，塞吐^①的僧侶們馬上发现了：灾难是象隐藏在蟾蜍头里的珍珠一样。不久，这地方羊群密布，滿地雪白；羊毛之对息斯脫西安教派，正象牲口、谷物和葡萄酒之对古老寺院那样。但是，英国当时只是出产羊毛原料。为了織成毛布，必須把羊毛打捆运过海峡到根特、伊伯尔、喀姆布萊及其他佛来銘城市去，这些城市到了十二世紀末期，都是欧洲著名的織造业中心。我們早已窺見一些关于英国和法兰德斯間这项羊毛貿易的重要性。因为在英国的长期內战时期(这內战在1135年后曾使英国分裂)，即在布腊的史梯芬和金雀花朝亨利爭夺王位的时期，史梯芬的拥有东部各州，使他能够控制这项跨海的羊毛貿易，并使他获得了經費的供应。这还可部分地說明他为什么在英国使用了佛来銘雇佣兵。

在第十世紀，由于封建的混乱局面，西法的全部省分，从布勒

① 塞吐(Citeaux)是息斯脫西安教派的創立人。——譯者

塔尼到加斯科尼,都是情况恶劣。在布勒塔尼,关于經濟生活复兴的最早象征,出現于阿郎·巴布-多尔特时代(938—952年)。《南特編年史》里指出,在第十世紀中期,南特还保持着它同爱尔兰和西班牙貿易的旧关系。沿海貿易还由那些往康波斯提拉去的朝圣者所进行的交易补充着;这些人是在南特搭船的。罗亚尔河口和吉倫特河之間的整个海岸,是一片沼泽地,直到十二世紀,才有人在那里垦荒。在北欧人侵犯、封建战争和寺院土地强制“还俗化”的时期,基恩和加斯科尼存在着野蛮状态,直到十一世紀为止。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上帝休战”最早出現于利穆威省。1004年,当弗勒里的阿波恩参观卡塞伊尔(即虔诚者路易的出生地,在拉·利奥尔附近)的时候,他看到它是一片荒凉。

总的來說,法国南部,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在制度发展和文化方面,比法国北部落后一个世紀。法国地中海沿岸各省和意大利的全部西岸一起遭受了薩拉森海盗的蹂躪与实际占领,与北欧遭受諾曼人和东欧遭受馬扎兒人的破坏同样严重。穆罕默德教侵入者终于被逐出,而諾曼人和馬扎兒人皈依基督教并且加入了日耳曼-拉丁欧洲的国家里;这一事实曾使我們遺忘在第九和第十世紀他們侵犯的兇惡性質。810年,薩拉森人立脚于科西嘉和撒地尼亚。820年,他們蹂躪从尼斯到土倫的里維耶拉地区。到842年,他們穿过布奇杜倫进而劫掠了阿尔茲。有一个穆罕默德教徒軍营在若干年內駐在下罗尼河的伊得卡馬克,从那里它威胁着阿尔茲、奧倫治、亚威农、尼姆。幸而,这些城市原来是羅馬所特別注意的城市,因而它們富于羅馬遺跡、城牆、引水道、拱門,从这些廢墟里容易取得石头来建造城垣。这样一来,它們不久便能够捍卫自己,象北欧城市为防御諾曼人所做的那样。但是,馬賽似乎沒有能够及时地这样做。虽然也許沒有被薩拉森人长久占领,象芬提格里亚、尼斯、海耶耳、弗勒查斯、土倫那样,然而馬賽已經破坏不堪,并和水

陆交通隔絕,所以,它繼續留在湮沒无聞的地位,直到十字軍东征时期才成为地中海沿岸的大港。

在第九世紀后半期,布罗温斯历史上的黑暗状态,由于魯息雍的杰腊德和阿尔茲的罗兰的半历史性、半故事性的功績,而被部分地消除了;其中一人,在阿尔茲附近的“大山”上,打敗了薩拉森人,另一人,在卡馬克肅清了他們,并在那里建造了堡壘来保卫下罗尼河。穆罕默德教徒的兇猛侵略,可能是促成 879 年組織波索的勃艮第“王国”的一个因素;如果历史对波索象对魯息雍的杰腊德那样有詳細的記載,那么关于他,我們就可以比現在知道的更多更透徹。波索的死在 888 年,正是穆罕默德教徒侵入布罗温斯的最兇狠的扩展时期,不是沒有意义的。在那一年,他們的占領弗累克塞納特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布罗温斯統治的开端,这統治繼續到 972 年为止;在这时期,他們的侵襲向北推进,远达格勒諾布尔。他們只由于格勒諾布尔和西斯特倫的两位主教的英勇抵抗,才被阻擋住,而这两位主教还获得了下列人員的支援:布罗温斯的威廉伯爵及他的弟兄拉特波尔德、卡斯特兰的邦尼非斯伯爵和格里馬第的吉巴林伯爵,后者的家族迄今还存留在里維耶拉地区。看来很使人惊奇,薩拉森人在好多年內占据了从地中海到日内瓦湖的每一条阿尔卑斯山路。他們甚至橫越阿尔卑斯山,洗劫了皮德蒙特意大利的城市。苏薩薩流域变成了一片荒地。原来,商人和朝圣者从北欧越阿尔卑斯山而达意大利;这时这条交通路綫已告中断,情况严重,以致所有的旅行都須轉到日耳曼山路去。我們从奥热丹麦人的故事,可領会到薩拉森人的恐怖行为。故事告訴我們說:他怎样成为摩赫寺院的一个修道僧,并把他的战馬交給寺院的石匠用作馱馬;薩拉森人怎样来圍攻摩赫;他怎样挺身而出,領導群众来抵抗他們;他所乘的每一匹馬怎样在他的巨大重量之下,不支倒下,直到把他的老战馬牵来給他,以及他怎样終於冲散了薩拉森人。

最后，972年，弗累克塞納特的薩拉森人的巨型砲壘被攻克，而里維耶拉地区摆脱了穆罕默德教徒的占领，虽然地中海还是在他们手里。接着，在布罗温斯全境发生了在中世纪移民史上一个最有趣味的运动。那些逃亡到山区去的残留下来的本地人逐渐下山，回到故乡，开始在荒地上进行那艰苦的复兴农业工作，他们连那里的山和水的名字，都已忘掉。其时，当地贵族擅自占取了大片的领地，作为他们奋勇抗敌的代价，往往毫不顾及过去所有人的权利；他们招募外地人移入。这样一来，以前为下布罗温斯几乎不知道的封建制度，现在就建立起来了。于是，地主贵族和地主僧侣、主教和住持在以前是自由小土地占有制流行的地方，在庄园制度还没有根深蒂固的地方，撒下他们的罗网。直到今天，布罗温斯的农民还时常用犁头或尖锄掘出薩拉森人精制的砖瓦片，而且在居民的面貌上、在房屋的建筑式样上、在地方甚至教会的节日上，还可看得出当年薩拉森人占领的痕迹。

从上面看来，在第十和十一世纪里，法国的经济图景象一件拼凑补缀的棉衣，里面每一省是一方分隔的块子。一省和一省的情况，都是不相同的。

可是，第九世纪法兰克帝国的灭亡到十一世纪末期（就是，随着十字军的开始，新日子的曙光出现于欧洲的时期）这两百年的时期中，法国的物质进展不是不大的。物质生活情况和社会经济惯例编成为法律了，这些法律在我们看来虽属粗鲁并带有野蛮性，但对第九世纪和十世纪早期所存在的混乱状态来说，必须认为这是个前进步骤，并且应该看到证明其进步的例子很多而且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看到一项较之其他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农业繁荣的指标。在封建时代，葡萄种植和酿造葡萄酒传遍法国的大部地区这一事实，也许就是它经济发展的最明显的证据。葡萄象橄榄一样，需要多年的培植，需要精细适当的经营和防止战争的破坏；它是一

个相当重要的文明的指标。葡萄对中世紀一切階級的人來說，連最低下階層的人在內，是飲料，也是食品。北歐人和馬扎兒人很快地学会愛飲葡萄酒和種植葡萄園。885年，公爵哥得弗立德，即法里斯蘭的征服者要求查理胖子應把科不林士、安得那赫、辛西格以及在下萊茵區的其他國庫莊園讓給他，“因為那里盛產葡萄，而法里西亞的地方不會產生用以制酒的葡萄。”有人反對說，葡萄不得認為是測驗進步的適當尺度，因為它要依靠某種氣候和土壤的條件。這項反對的意見，只在很有限的範圍內才是正確的，因為中世紀的人們不懂得葡萄的性質所以毫無顧慮地到處種植葡萄。而且，在高度封建時期的社會隔離狀態里，一個人必須種植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又因為每個人需要葡萄酒，而教會還必須有它，所以在法國和日耳曼，種植葡萄的地方比今天還多。在第六世紀，聖本尼狄克可能勸慰那些由於當地土質而不能獲得葡萄酒的僧侶們說，“祈禱上帝，不要埋怨，”可是不久，僧侶們就不復讓什麼當地的土質來干涉他們的行動了。

在法國，正象在日耳曼一樣，種植葡萄園傳布到各種不適宜的地方去；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缺少商業和普遍隔離的狀況的結果。在第九世紀后期，尤其是在第十世紀的社會不安定的局勢下，貴族很不願意把葡萄酒運出他們的領地，並採取了強硬措施來禁止運出葡萄酒。因此，葡萄園出現於象諾曼底、布勒塔尼和畢加第那樣不適宜的地方上。巴黎周圍種植著一些葡萄，因為聖澤門·得斯·普勒斯寺院所征收的部分地租（在800和826年之間）是用葡萄酒繳付的，可是在這寺院的土地上的葡萄園是例外。

然而，到十一世紀中期，隔離狀態大部已告破裂，商人可平安地來往於各省之間，而貴族停止窖藏他們的葡萄酒，開始在這項貿易上謀取利潤。一旦良好葡萄酒在市面上流轉以後，北方的這些葡萄園大部就荒廢了。可是，這時，在條件較優的地方上仍有很多

葡萄園，它們繼續繁榮着。在第十世紀波尔多以北的地方，現在叫做美多克，開始了它的葡萄生產的著名歷史。900年，基云好人波尔多伯爵，以布朗克福附近聖喜拉爾教會的土地和葡萄園贈給聖克拉·得·波尔多寺院。在十一世紀早期，據記載，還有其他贈與，而古文獻也證明在英國統治的整個時期，在那個地區的很多寺院里有葡萄園。977年的聖利奧爾的“習慣法”提供了關於種植葡萄的詳細情形、關於種植葡萄的指示以及關於繳給住持的實物租。980年時，在扎斯，982年時在拉·利奧爾，各有一個葡萄酒市場。

葡萄酒，在法國和在日耳曼一樣，成為一種主要的消費品，甚至在下層群眾間也是習慣的飲料。船主們必須供給他們的水手葡萄酒。田地勞動者常常領取若干數量的葡萄酒，作為他們工資的一部分。在第十、十一和十二世紀，香賓、勃艮第、摩塞耳和萊茵地區的編年史里，常常提及葡萄園和葡萄酒，那表明了对葡萄種植的重視。理姆的佛罗杜尔德写道，“就在这一年(976年)，七个德那^①可購買一摩第^②葡萄酒……就在这一年(977年)，葡萄酒的產量如此豐富，所以賣者出售每一摩第葡萄酒只能從買者收取五個、四個或三個德那了。”^③再也沒有別的丰收象葡萄丰收那樣受到如此歡欣地慶祝。葡萄的荒年或者甚至收成縮減是一個災難。葡萄是人們樂於生產的東西，並且經常支配着國內或國外市場。而且，由於河流網的分布和船舶在河上的往返航運，運輸葡萄酒也很容易。

十一世紀在諾曼人征服亞浦利亞和西西里(1016—1090年)之後，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葡萄酒輸入了法國。高盧葡萄酒輸送到東

① 德那(denariis)是古代銀幣，也可譯作便士。——譯者

② 摩第(modius)是古代量器，約合英國的兩加倫。——譯者

③ “Ipso anno (976) septem denariis emebatur vini modius... Ipso anno (977) magna fuit copia vini in tantum ut non amplius pro uno vini modio venditores nisi aut quinque aut quatuor seu tres denarios ab emptoribus accipiebant”。

方去。热那亚人把希腊和西班牙葡萄酒运到作为分发中心的法兰德斯；他們是那些轉运南法葡萄酒到那里的許多代理商中的一部分。波尔多商人經由海道运送他們的葡萄酒到法兰德斯和日耳曼去。事实上葡萄酒是法国輸入法兰德斯的主要商品。据說，阿努尔和罗多尔弗斯弟兄，在巴坡謨城堡，以拦劫那些往阿拉斯去的酒商而变为富翁。

然而，法国葡萄酒最重要的是輸往英国。的确，那运到法兰德斯的大量葡萄酒，是轉运到英国去，因为佛来銘人和法里西亚人都是這項貿易的大中間商。盧昂也同倫敦保持着經常的商业关系，以勃艮第和法兰西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商品。在 1152 年后，大量葡萄酒从法国西南各省，經由波尔多港，直接运到英国去。英王賜給法国商人特权；直到亨利二世时代，才賜給日耳曼商人和法国人平等的巨大貿易特权。

法国葡萄酒的另一市場，是在斯堪的那維亚国家里。在第九世紀，严格說来，這項輸出不能算作貿易——它所采取的形式可以說是繳納战利品和战争賠款，其中葡萄酒向来是一个主要項目。但在这个时代以后，就有某种数量的交易，即以北方的毛皮来交换法国的葡萄酒，而在十一和十二世紀，它变成了一种兴盛的貿易。

环绕着葡萄酒商业，形成了一种賦稅、通行稅和捐款的复杂制度。关于葡萄酒生产所征的捐稅如下：一定的“地租”，即实物稅，是交給領主的：这种稅叫做“葡萄稅”或“葡萄园稅”。“劳役”是农奴每年在領主的土地上（在这場合，就是在葡萄园里）做若干天的工作。“酿酒稅”是迫使領主土地上所有的居民使用領主的酿酒机和量器；这种稅是以实物繳付的。“葡萄酒稅”是由領主土地上的一切酒店主或其他售酒商人付給領主的一种稅。領主保有“禁售”的特权；就是，当他們的葡萄酒已經准备好的时候，他們可以禁止任何別人在他們領地上售酒一个月。然而，由于這項專利而可抬

高的价格,比别人的酒,不得超过每甕两便士。領主有一个总管替他照管所有这些权利和捐稅;总管不領工資,但分享利潤。这种方法也可能导致相当大的舞弊和压迫。

領主特別提倡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設市場,从而获得大利。他們可从来往于市場的商人征稅,并从出售的葡萄酒征收一种“市場稅”(每桶約六便士)。大量捐稅加在葡萄酒的运输上。国王所有的古老的“捕获”权,是港口、市集和市場通行稅的根据。这权利原在捕获葡萄酒的形式下保持着,但后来逐渐改变为規定的数量或現款支付。在路上和桥头,还征收通行稅。“車輪稅”是对进出巴黎的葡萄酒所征的稅,每車两便士。在巴黎,还有一种面包和葡萄酒稅,每隔三年課征一次——每出售一大桶,征收一便士,不論批发和零售。塞納河上和瑪恩河上“运酒稅”是对每船葡萄酒征四鎊的稅。法王在葡萄收获时期,对每船葡萄酒有权征收六十个苏^①直到路易六世时代为止;他在1121年以这权利賜給巴黎商人公会作为一种永久的特权。

巴黎有一种古怪的风俗(也許当时酒肆主并不認為是古怪的),就是雇佣葡萄酒叫卖人的风俗。这批人組成了公会;每个酒肆主至少必須雇佣公会中的一个人来叫卖他的酒。他們打着皮鼓走来走去,給路人看葡萄酒的样品并喊出它的价格。

^① 苏(Sou)是古代法国的銅币。——譯者

第十三章 十字軍前的意大利 (887—1095年)*

第九世紀中意大利和法国与日耳曼相同，已成为一个地理名詞。半島已分裂为大批封建公侯国，它們經常从事战争。

王室呈現了破坏性最大的浪費景象。敌对的国王不仅把土地和官职分封出去，而且把今天我們所称的“公共财产”范围内的几乎全部东西——街道、桥梁、广场、公共建筑物、城垣、城門、城塔、砲壘等等——都讓与出去；这批国王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收买支持者或获得經費。891年，貝倫加对維罗纳的旧羅馬圓劇場的处理，就是这样。

最健康的政治生活是在城市里，而“城市”这个名詞意味着不仅大城市，并且也包括多斯加納小山上的市鎮和倫巴平原上的大村庄。在意大利，封建制度和庄园制度，除了在某些地方以外，从来没有获得象在欧洲其他地方那样的势力。总的說，我們可把甚至早在第九世紀的意大利，看作比西欧任何別的国家較少封建化的地区。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性的差別。当意大利封建制度达到高峯的时候，倫巴第遍布着大庄园网，偶然在这里或那里被农村公社冲破。“每一庄园看来是一个自足自給的整体，同时也是各种較小的經濟单位——奴隶、半自由人或自由人的保有地——的一个集合体。在这里，一塊保有地中的可耕地帶也不是构成一个孤立的整塊地，而大部分是分散于田野中間的。然而，在多斯加納，大庄园以及它們所征的劳役和租款是比較少見的，因为城市市民运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54頁

动的活力已把封建制度压倒。在塞亚那附近,的确有大庄园,但在佛罗倫薩周圍,則土地的占有权已操在城市手里,而农奴已轉化为根据自由契約或租賃关系的农民了。”

意大利的城市精神,比欧洲其他各地,出現較早,而且更有活力。自由人与不自由人的比例在那里高出于阿尔卑斯山之北。下列三种影响有助于这种公社現象的保持:公地的經濟影响,倫巴人血統的活力(屬於这血統的阿列曼人是意大利自由农民階級的祖先)以及后期羅馬帝国遺留下来的制度。在欧洲各地的城市运动初次出現之前好久,意大利社会的公地的存留——必須記牢,公地不仅包括村庄內的“草地”而且包括大量森林、牧場和荒地——以及村民对这公地的管理,已产生了北意大利的农村自治公社。世俗和教会的地主階級,也不知不觉地助长了这种精神;因为他們对那些願意清除荒地的垦荒者,給与自由保有地的条件。一般說,他們把一半土地或一半产品給与垦荒者。因此,北意大利比法国、日耳曼或英国,有着更有活力、更多独立性、更自由的农民階層。这种自己靠自己的精神,还由于城垣所提供的安全感而加强起来。

貴族間的战争和馬扎兒人的掠夺,曾迫使城市修理它們的古老羅馬城垣或建造新城垣。这样做的城市是:摩德拿、貝加摩、格里摩拿、巴費亚,特別是米兰;对米兰城斯波勒陀的藍伯特曾圍攻八个月而不得逞(896年6月—897年1月)。924年被馬扎兒人焚燒的巴費亚,在下一年就能抵擋住馬扎兒人的又一次圍困。在同一年,摩德拿能从它新建的高城垣上抵抗馬扎兒人,后者破坏了周圍的乡村而去。到第十世紀中期,有一个意大利历史家說过,北意的大部城市是有城垣圍繞着的(确实,还有几个最坚固設防的城市)^①。甚至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的难民也避难到这些意大利城市

① oppida vero cum nonnulla cum munitissima.

里。这些普通的市民,早在第十世紀里,已表现出市民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就是說,他們要求波河及其支流上的貿易自由权,在那里,封建主教設立了木柵、鉄鏈和关卡。他們在那些深受大封建主压迫的小附庸以及自由农民中間找到了支持者。1036 年,这些集团一起发动了反对大貴族的起义,声势相当大,以致皇帝康拉德为了它們进行干涉。

因为意大利沒有达到象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的高度封建化,所以它的商业和工业也活跃得多。的确,羅馬在几百年中对商业和工业來說是一个死城,但是,威尼西亚、倫巴、利古里亚、南方諸省和西西里,都是商业活跃的地帶。至于这种商业优势之所以形成,第一,因为意大利拥有活跃的商船队和海軍力量,尤其是象威尼斯、热那亚、比薩和阿馬斐那样;第二,因为意大利拥有大量資金,这些資金是从意大利的从未完全停滞过的貿易里积累起来的;第三,因为意大利和拜占廷、埃及与叙利亚港口之間的密切而又有利的联系,从那里运入东方的名貴商品;第四,因为在工业方面,它繼承羅馬帝国时代的工业技术遗产和傳統。

意大利半島是地中海的鎖鑰,从希腊时代起这“地中之海”,已是商品的巨大分发站。埃及、腓尼基、希腊、迦太基和羅馬都是由于位在它的沿岸而变为富饒。薩拉森人在好多年中曾控制西部地中海地区,但是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从来沒有被他們封鎖过。因此,威尼斯、拉温那、大兰多、巴利、布林的西以及波河流域的倫巴人城市,經常能够維持和东方的接触。至于意大利西岸的城市,則情况有所不同了。在这里,热那亚、比薩和阿馬斐的商业的发展被堵塞住,直到諾曼人在罗哲尔二世时代(他死于 1090 年)把在阿拉伯人手下的西西里征服为止。当时,意大利的資本主义較為发达;这一情况,可从下列事实看得出来:意大利是在欧洲反对犹太人經濟势力的第一个国家,而且,在德意志和法国反对犹太人之前

好久，它已这样做了。早在 855 年时，皇帝罗塞耳一世把意大利的犹太人驅逐出境，其中很多人迁移到法兰克高盧去，在那里，上文說过，他們在虔誠者路易的朝廷上享受恩寵，因而获得了巨大好处。

这里，在談到意大利的区域經濟史时，我們必須从威尼斯开始。威尼斯的起源，在于阿奎里亚和巴士亚难民建立的殖民地；他們在第五世紀中为逃避蛮族的侵犯而来到亚得里亚海中的礁湖島上。威尼斯人开始依靠捕魚和煮盐过活，在 600 年前，他們已从事航海和貿易，起初在亚得里亚海，后来在愛奧尼亚海，不久还冒險到拜占廷各港口和亚历山大港去。象天然运河般的亚得里亚海，位于东西方的中間，又通地中海，弯弯曲曲，使南欧海岸呈現鋸齿状；它就是决定威尼斯历史的最大的单一因素。在亚得里亚海上，从外面深水来的潮水，在海岸和沿达尔馬提亚岸的一长串島屿之間向上流，而后再折向南，沿意大利海岸下流，复注入地中海；这一水流对向外和向内的船只，都是有幫助的。

威尼斯人的商业和航行史上的一个重要点，是他們和君士坦丁堡的联系与交易。从刚开始时起，他們已看出从这关系所可汲取的利益。他們曾大胆进行那些有利的冒險企业，而情势也帮助了他們。在狄奥多理时代，卡息奥多拉曾談到威尼斯船的长距离航海。由于缺少历史文献，我們几乎不可能正确断定：威尼斯和拜占廷的商业联系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并怎样建立起来的。威尼斯发展成为利凡得商品輸入地；这一地位，早在 715 年盧易特普藍同威尼斯和科馬奇奥所簽訂的通商条約里，已可看出。这项条約是后来查理曼及其繼承人所訂条約的根据。依照这些条約，威尼斯得在帝国各城市中享有貿易的自由，只須繳付正式批准的通行稅。威尼斯由于它在島上的安全地位以及它和拜占廷的密切关系，能够压倒它的竞争者科馬奇奥，后者衰亡于第九世紀。毫無疑問，威尼

斯和東方貿易的開始,比所知的最早記載還要早,因為屬於第十世紀末期的記載上(992年)說,這是一件久已存在的事情。有一個與查理曼同時代的編年史家說:當皇帝駐在弗利河里的時候,那些從巴費亞來的他的隨從人員,穿著五色繽紛的豪華絲織服裝,並披著各種珍奇的毛皮,因為威尼斯人新近曾從海外把一批東方寶物運入了巴費亞。這一記載証實:威尼斯人和君士坦丁堡已有貿易關係,因為在那個時期君士坦丁堡是獨占絲綢貿易的。而且,兩國間的政治關係和相互需要,對巩固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的聯繫也有不少幫助。威尼斯人為了避免象查理曼那樣的西方征服者的統治,為了能夠抵抗薩拉森人海盜船,力求東方皇帝的支援;而東方皇帝也毫不輕視威尼斯人的聯盟,因為威尼斯的強大海軍,大可幫助他們來反對阿拉伯人。在第九世紀初,東羅馬口吃皇帝邁克爾,曾向威尼斯人求助來反對共同敵人。

查理曼曾企圖征服這個新興島國並把它併入他的倫巴王國,因為威尼斯是倫巴難民和拜占廷反法陰謀者的總部,同時他也想要制止威尼斯和埃及間的奴隸貿易;但查理曼這項徒勞無功的努力促成了共和國的團結。在日耳曼-斯拉夫人邊境上不斷進行戰爭的時期中所獲得的大部分戰利品和一半被捕捉戰俘,都被集中到威尼斯去了。“威尼斯販子在供應穆斯林世界的閨房婢妾和奴隸方面,看來優越於所有的競爭者。有人提及伊斯的里亞的波拉城是他們交易的基地;我們還知道,在第十世紀,哥爾多華的哈里發有一隊匈牙利奴隸的衛兵。”

雖然威尼斯沒有正式脫離東方帝國,我們卻可認為它已構成一個獨立國家。威尼斯的財富和獨立地位,由於它的商業和君士坦丁堡與穆罕默德教地區的關係,由於它的地位構成東方帝國和西方歐洲間的中間站,大大地增強了,尤其是在第九世紀法蘭克帝國分裂以後。當西歐的其餘地區正忙於衝突和侵略而不復想到大

量貿易的時候，威尼斯却灌注全副精力於貿易方面。匈奴人、阿佛爾人、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後來馬扎兒人，當他們侵犯多瑙河地區中部或者巴爾干腹地時，封閉了多瑙河的通路，這樣，所有的利凡得貿易都轉入威尼斯人手里。當下多瑙河和撒夫河通路，在匈牙利人皈依基督教（1000年）和巴錫爾二世征服保加利亞人（1018年）以後重行開放的時候，威尼斯在通東方的海路上已立腳很穩，不在乎新的競爭者了。所以，這些蠻族的入侵中多瑙河區，對北意大利產生了商業革命的影響。威尼斯從來沒有企圖發展陸上運輸的貿易。

968年，格里摩拿的盧易特普藍在被鄂圖一世派往君士坦丁堡時，曾看到威尼斯商船停泊在“黃金角”^①內。992年，巴錫爾二世曾賜給威尼斯特權，並証實它已遺失的早期特權狀；這樣一來，威尼斯幾乎完全壟斷了從君士坦丁堡與小亞細亞港口向西方運輸的貿易——這是一項極其有利的貿易，因為其中大部分是東方的奢侈品，象絲綢、貴重的木材、染料、香料、香粉、藥膏、寶石和珠寶這一類。而且，為了報酬威尼斯供給船隻把軍隊運到仍在拜占廷勢力下的南意各省去的這項諾言，東方皇帝准許威尼斯商船繳付低於其他船隻所付的港口和碼頭捐稅。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居住區是在斯坦波爾。這居住區是所有君士坦丁堡商站中的最古老的一個（商站是在外國土地上享有儲棧特權的商人殖民地）。管理這殖民地的長官，是由威尼斯的統領^②委派的。在這城內，威尼斯後來至少有四所教堂和一位教士。由於這項條約的結果，威尼斯船隻實際上常常往來於希臘、小亞細亞和黑海的一切優良港口。

摩爾孟提說道，在君士坦丁堡從威尼斯人和從搭乘威尼斯船的倫巴人所收到的出口稅，比在同一時期所收到的進口稅，要多八

①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譯者

② 威尼斯共和國的元首。——譯者

倍。他認為威尼斯商人可能是依靠信用來領取貨物，然後把它們在威尼斯、倫巴及其他歐洲國家里出售。當君士坦丁堡的出口數量這樣大的時候，在君士坦丁堡東方商品的“轉裝出口”的重要性已屬顯然。在十一世紀，諾曼詩人亞浦利亞的威廉曾以雄壯的聲調歌頌它，“威尼斯的商業洪流已這樣壯闊。”當時，熱那亞和比薩在拜占廷帝國內，沒有獲得什麼立腳點。

威尼斯早已和法提馬朝埃及組成一項有利的商業聯盟。我們看到，828 年在亞歷山大港已有威尼斯商船，從那里運回了聖馬克的遺骨。和埃及進行的主要是奴隸和武器貿易。東方皇帝和羅馬教皇都反對這項貿易，認為這是供給基督教國的敵人的貿易；儘管如此，它卻幾乎毫無間斷地進行着。這貿易的利益實在太大，因此捨不得放棄了。利潤大得驚人，因為除了奴隸和武裝以外，威尼斯商人還經營別的東西：他們把達爾馬提亞和士的里亞的鐵和山坡上砍下來的木材出口到沒有金屬、沒有木材的埃及去，把那里的絲綢、香料及其他“豪華東方”的奢侈品運回來；這些東西的價格很昂貴，而所占的地位卻很小。據估計，一只商船往返一次，有時可獲得多至 1,200% 的利潤。這樣看來，威尼斯人是在君士坦丁堡和在亞歷山大城，通過中世紀世界的兩個最富饒的首都來和東方接觸的。

直到十字軍東征時期為止，威尼斯和拜占廷一直保持友好關係，這對雙方都有利。威尼斯艦隊不時補充帝國海軍的不足，特別是在 1082 年，當時，威尼斯前來支援皇帝亞歷修，在都拉索港口消滅了羅伯特·基斯卡的艦隊。羅伯特是下意大利的諾曼統治者，抱有征服拜占廷帝國的宏圖。由於這項功績，威尼斯獲得了酬勞：在全帝國範圍內，威尼斯商人的一切營業，都可免進口稅、售貨稅、港口稅和船塢費。

威尼斯滿足於成為西歐利凡得貨物市場的地位；至於轉運這

些貨物到內地去，它自己不干而依靠別人，起初，主要是依靠猶太人。他們是威尼斯和它的最自然的市場日耳曼之間的中間商。在860年的嚴冬里，當亞得里亞海結冰的時候，我們看到這批商人越過堅冰而到了威尼斯。1017年，有四只載運香料的船到達威尼斯的時候，麥則堡主教第特馬把這一消息記入了他的《編年史》。然而，對非洲阿拉伯人的貿易方面，威尼斯卻落在巴勒摩、那不勒斯、阿馬斐後面。根據穆拉托里的話，在第八世紀中期，威尼斯商人曾在羅馬城開設市場來購買大量奴隸，為的要把他們販運到薩拉森人那邊去。

現在我們從威尼斯轉到拉溫那的歷史。它是羅馬帝國在西方的最後首都，早期也是一個主教區的總部和狄奧多利克東哥特人的首府；所以拉溫那的歷史，比任何其他意大利城市，除羅馬城以外，表現出更大的歷史繼續性，而較少支離破碎情況。在威尼斯賽過它以前，拉溫那是北意的主要商業中心。在西歐，再也沒有別的地方在第九和第十世紀這樣早的時期就有了工業行會，就是有也不會象拜占廷與後期羅馬帝國的行會有這樣明白的聯繫。從沒有記載而得出的論斷，長期以來一直否認在十一世紀以前西歐存在什麼行會，而從拉溫那工業歷史看來，使用這項論斷似乎是有危險的。

對波比奧大寺院，即北意最富的寺院，倫巴國王和喀羅林朝諸王在第八和第九世紀都曾慷慨捐贈基金；這寺院對工業情況給了有趣味的闡述，同時也指出了這些工業團體不一定是出于一個根源的。波比奧的住持華拉（834—836年）的記載里，詳細地告訴我們關於監督和使用那些附屬寺院的很多不自由的手藝人如象裁縫、鞋匠、木匠、皮革匠、刷毛工、織工等等的訓令。所有這一批人按他們的行業技術來分門別類；他們都住在寺院牆垣周圍的“各街區”內。

北意大利的这些大寺院給我們提供了关于經濟方面的有趣的資料。从土地制度,可看出羅馬丈量法的殘余,丈量单位是从羅馬“百畝制”得来的。例如,在波比奧,寺院位于領地的中央,由它的农业和工业的不自由的依附者環繞着;这一形式很清楚地是与古代羅馬別墅相同的。領地的其余部分划分为小塊土地給自由租戶耕种,繳付庄园稅;但按性質論,这种关系是契約性的并可重訂。自由农民的地位当然优越于純粹农奴,这一阶層的广泛存在表明:或者在第六世紀,倫巴人的征服沒有象一般所設想的那样起降低农民身分的效果,或者是北意大利从那时起已出現巨大的經濟社会复兴,二者必居其一。

北意大利的城市和寺院,至少在第十世紀中期以前,似乎大多經營农业,而且几乎是自給自足的;它們生产谷物、牲畜、羊毛、皮革等等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波河及其支流,同平原上很多运河相連接;它們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運輸路綫。很少城市或寺院不是位于这河流网道范围以內的,而这些水路比陆路重要得多。因此它們猛烈地爭夺水道,就是,占夺課征象通行稅、碼頭捐一类河流捐稅的权利。在喀罗林朝后期,寺院曾是这些特权贈与的主要受惠者,包括市場权利在內。但当城市随着馬扎兒人的侵犯而建造城垣和貴族为了保护自己而建造堡壘以后,它們也开始設立市場并課征商业稅。最可获利的是盐稅,盐是在波河三角洲上,特别是在科馬奇奧周圍的沼地上,用蒸发方法制成的。盐販子是屬于一个特权階級的;从倫巴国王时代起,已是这样;他們是商人中的驕子,因为在文献中他們被称为“武士”,好象他們几乎已屬于武士階級那样。

倫巴第的良好水道系統、接近阿尔卑斯山路中的地位以及稠密的人口(可能在第九和第十世紀它的人口超过西欧任何别的地区的人口),引起了不平常的商业竞争。内地商人和从亚得里亚海岸

来的商人相竞争；寺院（它们的船只来往于每一条河流上）、主教和贵族，是这些世俗商人的劲敌。如上文所说，甚至早在第十世纪，已有资料可说明城市对世俗的和教会的封建主横加在商业上的苛捐杂税进行反抗；这是十一世纪伦巴第城市起义的先驱。

有人说得对，伦巴城市的兴起，就是“一个民族的传记”。这民众运动的根苗，不是象曾经设想的那样，在于什么古代罗马市政制度的残余，因为没有这些残余存在；也不是在于什么日耳曼起源的有机的结合；也不是在于商业或工业行会。行会是在城市出现以后形成的。伦巴城市的真正起源，象欧洲别处很多其他城市一样，在于农村或城市的牧师区。中世纪的牧师区，远远超出一个宗教单位。它是一个有机性的邻人组织；这些邻人具有共同的社会水平、共同的经济生活；对于牧师区内地方性的、微小而并非不重要的事务，象审理邻人间的地界争执、修建道路、取締小偷等，他们都很感兴趣^①。

在这类城市社会里，这些集团后来很自然地落入工商业分子手里，于是，较雏型成熟的城市政府就出现了。

那些密布在富饶的伦巴平原上的大批城市，由于 962 年鄂图

① “在牧师区内所结合的小集团，渐渐认为自己已构成一个实际的社会单位。那些爱护他们牧师区教会的简朴老百姓……将讨论有关道路、牧场、牲畜、河流这一类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至于城市里，街道与牧师区的邻人，也将同样地注意于有关水池、泉源、公共卫生、教堂的维持和修葺等各项问题。从牧师区成员中所选出的正直人士，审查那些交给他们的各种乡邻问题，并可能甚至立刻被召来充当判官来解决有关同一牧师区人中间的纠纷。这种平凡的、几乎看不见的自发活动，在几百几千个小中心里，在城市里，也在乡村里，到处出现；又由于中央权力的衰败而加速展开；还因为这种活动实在健全，能够满足最急切的而又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它不仅注定要存留下来，而且要成长并从当地推出……封建制度……到十一世纪，我们看到有选举的代表，叫做‘好人’；他们同封建地主签订契约；审判他们的同胞，很象一个常规法院；还同其他‘好人’开会讨论毗连牧师区，甚至更大地区的共同事务。至于城市里，人口住得较为稠密，必须依靠互相合作；所以，共同行动的需要甚至比在乡村更加迫切。”摘自什维尔：《塞亚那志》，第 48—50 页。参阅法·司乃得：《意大利城市和乡村的牧师区》。

一世的統一日耳曼和意大利而獲得了極大利益。薩克遜朝和薩利安朝諸帝從開始起就看到：城市的友誼是有助於制止封建主的敵對的。雖然在十一世紀之前很少把皇室特權狀賜給它們，但皇室的态度是毫無問題的，因為所有的特權狀都提及並認可以前的慣例。

日耳曼的統治有雙重影響。第一，它建立了意大利和日耳曼之間的密切聯繫，給那些扼守阿爾卑斯山路的意大利城市以新的軍事和商業的重要地位，因為它們變為——特別是米蘭城——東方貿易和日耳曼之間的重要中間站。第二，日耳曼的統治，由於在那里建立了強固的政府而終結了在倫巴第、多斯加納和羅馬納百餘年來的封建混亂局面。在薩克遜朝和薩利安朝統治者給倫巴城市的保護里，在給它們的特權里，可以看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後來促使倫巴城市發展市政制度的因素。巴費亞、帕馬、阿克奎、羅地、諾瓦拉、格里摩拿、勒佐、波倫亞、巴土亞、科摩、貝加摩和佛羅倫薩各城市，從鄂圖一世，或者獲得了不受伯爵管轄的特權，或者獲得了它們原有特權的批准。米蘭、阿奎里亞、拉溫那和皮斯托雅的特權，都是從鄂圖三世取得的。鄂圖諸帝系統地推行了一種在未來將有巨大成果的賢明的投機的計劃。全部上意大利，由於這變更而改變了面貌；因為即使很多城市的情況已經沒有證據可資證明，但結果還是証實了事實的真實性。

倫巴商業，主要是中間商業。倫巴城市是利得貨物的“清算所”，這些貨物從東方輸入，由米蘭、巴費亞及其他城市的商人轉運並分發給北方諸國。

如果不注意到倫巴第的位置和地勢，是不可能來研究它的經濟史的。關於地理對歷史的影響，再也沒有比倫巴城市的興起更為明顯的例子。倫巴第是位於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之間的一個肥沃的沖積平原，約略地說，是波河及其支流的大平原。在中世紀

时期,欧洲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象倫巴第那样密布城市和村落的。其理由是无須远求的。理由在于那供給城市食粮的大平原的肥沃土質,在于那交通便利的河流网,在于波河流域通亚得里亚海的出口,在于阿尔卑斯山南側的水道是东西欧往来的天然公路这一事实,最后在于一項并非不重要性的条件,即差不多全部越阿尔卑斯山到法国或日耳曼去的山路都在倫巴第控制之下。塞尼山及小圣伯尔納德山路,使倫巴第連接多非內和罗尼河流域;大圣伯尔納德山路,即向西北方的唯一山路,使倫巴第連接日內瓦、里昂、香宾市集和巴塞尔;或者可走另一条道路,即从圣摩里士繞过日內瓦湖东端,上溯罗尼河以至終极处;意大利的湖沼还提供了其他的通路。馬格基奧湖通到新普倫山路;盧加諾湖通到圣哥特哈特山路(然而,这一山路直到十三世紀才开放);科摩湖通到斯普呂根山路。东倫巴第,包括它的最主要城市維罗那^①和孟都亚,主要使用着勃倫納山路,即最低的一条山路。果然每一个倫巴城市都从阿尔卑斯山路获得了好处,但米兰是所有山路的集中点(除勃倫納外),是一切跨越阿尔卑斯山貿易的自然焦点。阿尔卑斯山路象手指头一样,从米兰的手掌伸出去。米兰掌握着全部北欧的商业鑰匙。虽然勃倫納山路在所有的阿尔卑斯山路中是离中部最远的,但它却是最出名的;因为它是最低的一条山路,也是在1387年塞普替默山路放寬之前,唯一的寬闊可通馬車的山路。在所有其他的山路上,必須使用騾馬來馱运貨物。在950和1250年間,德意志軍隊曾有四十三次通过勃倫納山路。而在德国帝王們一百四十四次越过阿尔卑斯山中,有六十六次是取道勃倫納山路的。

倫巴第爭取市民自由和貿易自由的斗争是和对貴族、封建和乡村的势力的斗争联在一起的。在这斗争里,城市巧妙地挑撥主

① 維罗那隸屬日耳曼,是附于巴伐利亚的一个“边防区”。

教和男爵之間互相敌对,从而坐收漁人之利。当时,有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正在形成;有一大批从前压在底下而现在翻身起来的群众,决心要从封建統治階級爭取政治和社会的地位。这项漫长的斗争,也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旧财产形式和以工商业收入为基础的新财产形式之間的斗争,就是,不动产和动产間的矛盾。城市的财富对封建城堡的财富进行斗争,而在这斗争里,封建制度失败了。市民战胜貴族,城市战胜乡村,动产战胜不动产,工商业战胜农业。早在 1106 年时,佛罗倫薩城曾招請它周圍村庄的全部农民离弃他們的領主而来到城内。有些城市为了吸引农民移入,允許在几年时期以内,从一年到十年不等,給予市民自由权;有些城市允許他們在某一期間內享免稅权。在意大利,乡村农民流入城市这项趨勢,特别是在十字軍开始震动全欧社会之后,是一个极其突出的現象。封建主曾企图限制他們的农民移出,但他們都是枉費心机。領主在被他們的农奴遺弃以后,就沒有人来耕种他們的土地,所以他們除了也移入城市外,沒有別的办法了;要不然的話,他們只有在荒蕪的土地上,过艰难而凄凉的生活。在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使人口从田野流入大工商业中心之前,我們在欧洲沒有看到过一个与此类似的运动。这种从乡間移入城市的人口,到十三世紀已这样众多,以致很多城市变为人口过多。1247 年波倫亚頒布法律,禁止新的移民入城。

关于多斯加納和多斯加納的城市佛罗倫薩、塞亚那、勒佐、費勒拉、摩德拿、帕馬的历史,在偉大女伯爵瑪的尔达的时代(1046—1115 年)之前,我們知道得很少。就后来佛罗倫薩和塞亚那的重大經濟地位看来,这事实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是容易說明的。古代羅馬人曾破坏那里的伊特拉斯坎文明,而沒有在它的廢墟上建成一种羅馬文明。在羅馬帝国时代,多斯加納是意大利的一个最落后而未发展的省分……“由于違反經濟原則的地主制度,那里的人

口一向是稀少的”。这种落后状况和这地方的山区性有很大关系。封建制度在多斯加納生根需要很長時間，因为封建制度显然是农业制度，它只在廣闊的平原或肥沃的流域，象塞納河盆地、摩塞耳河与萊茵河流域那样，才容易达到高峰。在中世紀早期，多斯加納的土地，落在它的很多寺院手里，大多是用在养羊和种植葡萄。又因为这些寺院是自給自足的，所以，多斯加納和外面世界很少有經濟接触，直到十二和十三世紀由于欧洲对内和对外的大規模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发生的經濟革命为止。在此之前，多斯加納城市仅仅是个大村庄而已。甚至佛罗倫薩的历史，在十一世紀之前，也还是湮沒无聞的。上述的偉大女伯爵似乎是这領土上的第一位要改变現狀的統治者，也就是說，使多斯加納摆脱它的經濟昏睡和隔离状态。但甚至她的企图，也显然局限于改进交通方面；她建造道路、桥梁，并在佛罗倫薩的阿諾河上建造水壩来防止春汛。当意大利的其余地方已感觉到新活力的时候，多斯加納还是处在經濟落后的状态里；我們从沒有发现过一个女伯爵瑪的尔达的貨幣这一事实，就是明証。

在第十世紀前的中世紀史上，几乎沒有提到过利古里亚湾沿岸城市，热那亚、比薩和盧加，而在十字軍开始之前，它們没有什么經濟重要性。比薩在 860 年遭受那些地中海上橫行的北欧人的劫掠；热那亚及其整个海岸在 931 和 935 年两次惨遭北非穆罕默德教海盜的洗劫。甚至 972 年，在薩拉森人被逐出于布罗温斯之后，沿海城市还是繼續遭难。因为科西嘉、撒地尼亚和巴利阿利群島还是在穆罕默德教徒手里。比薩在 1004 和 1011 年又两次被搶劫。此后，1016 年，当热那亚和比薩的联合艦队进攻撒地尼亚的时候，它們从历史的黑暗里一跃而进入光明的历史了。在这壮举里比薩是更为大胆的。这是有意义的，比薩的最古編年史是从这一年的胜利开始的：“比薩与热那亚和摩吉多（摩吉德·易宾·阿

达拉,海軍司令,瑪約喀的穆罕默德教總督)在撒地尼亞作戰;承天佑助,戰勝了他。”^① 1050年卡格利亞里港內的海戰終使穆罕默德教徒從島上撤退。跟着,科西嘉和撒地尼亞也被征服^②。此後,比薩和熱那亞兩個城市成為西地中海貿易的激烈競爭者,它們的船隻和商人雲集在布羅溫斯、西班牙以及非洲北岸各港口。

有一個中世紀詩人,在1063年寫作時,描述比薩說,它是“一個富饒的城市,它的船隻航行到西西里和非洲各港口;在它的街道上,可看到許多國家的商人,基督教徒和異教徒都有”。但在十字軍開始之前,熱那亞和比薩似乎都沒有冒險進入東方的更富地區。讀者應該注意下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在十一世紀中,熱那亞、比薩和阿馬斐在西地中海日益增長的海權,開始推翻了伊斯蘭教在那里曾稱雄二百五十年的優勢。歐洲從莊園狀況和幾乎完全農業的生活中覺醒過來的時期,恰恰正是它再向東方開放商路和在地中海恢復海權的時期。比薩人和熱那亞人首先是商人;他們所有的戰爭和他們所有的航程,歸根到底都是為了經濟理由。

羅馬城的历史,從第九世紀末期到十一世紀教廷復興時期,無論在政治或經濟方面,都是沒有重要性的^③。

在1084年諾曼人搶劫并焚燒羅馬城之後,“羅馬公所及其周

① “Fecerunt Pisani et Januenses bellum cum Mugieta in Sardiniam et gratia Dei vicerunt illum”。

② “撒地尼亞富於牲畜群、谷物和奴隸;它的沼澤提供了實際上取之不竭的鹽源。它的山嶺藏着貴金屬礦苗,而它的海岸多海綿和珊瑚。比薩和熱那亞都想在商業上利用它。兩雄不并立,當薩拉森人被打敗之後,勝利者立刻就掉轉武器,來互相攻擊了。”黑胡德著:《比薩志》,第23頁。

③ “社會和經濟情況”[布賴斯說道]“已是這樣;新制度只有在宗教的體系之內才能興起……市民分為三個等級:軍事等級,包括留剩下來舊貴族在內;僧侶等級,即隸屬於不可勝數的教會和寺院的一群教士、僧侶和修女;以及所稱為平民,即無職業、無手工藝的貧困群眾……在喀羅林帝國瓦解之後,羅馬城陷入一種放縱野蠻的狀態,甚至在那個時候,歐洲也無與倫比;它承襲了文明的缺陷,而沒有承襲它的優點。”

圍的東西完全不可復見，幾乎也不復存留于活人的憶念中了。”所有殘留下來居民，都聚集在利奧奈因城垣之內^①。從歷史上看，羅馬向來是一個消費城，而不是一個生產城。有趣的是在北意大利城市中，我們可看到商人和工業行會，而在羅馬城，只有園丁、畜養牲口者和種植橄欖者團體。在十二世紀以前，我們看不到關於手藝人的記載，而就是在十二世紀，也只有關於編草鞋者和制革者的記載而已。

然而，教皇通過征取“彼得便士^②”和朝聖者的禮物，獲得了金錢來縱欲于利凡得奢侈品，象絲綢、香料、珠寶這一類。阿馬斐人和尼亞波利人是這項貿易里的主要中間商。因為奧斯替亞港已經破壞，台伯河口的港口工程已經毀壞，所以，這些進口物大部須經由基泰港口而運到羅馬城，而基泰名義上是象阿馬斐和那不勒斯那樣的沿海小共和國，而實際上在教皇世仇塔斯邱蘭男爵的統治下，因而使羅馬付出巨大代價。直到1153年，教皇才能擺脫塔斯邱蘭的負擔，當時這一有勢力的家族，由於財產的分裂、債務和家庭仇怨，已陷於貧困。當他們把他們的土地出典的時候，尤金三世就聰明地購進了這抵押品。

但是在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金融和銀行業方面，羅馬教廷在十二世紀中掌握到勢力。從十二世紀以後，喜爾得布蘭的改革以及由此而來的教皇權力的增長，使黃金源源流入聖彼得教會的錢櫃里。此外，教廷的教使制度，通過勒索的方法，經常也使教廷發財，或者使教使本人發財。教使的視察往往很象古羅馬總督的巡視。“教會隱匿它們的財富、埋藏它們的寶物，或者致送賄賂，以求免除檢查。”聖伯爾納德關於控訴大主教的教使約但·得·厄息尼的勒索的一封信，生動地闡明了教廷的財政政策；對這些舞弊，

① 羅馬城的一部分，在台伯河西岸。——譯者

② 中世紀北歐諸國繳給羅馬教廷的年稅。——譯者

教皇除了間接負責以外，不一定負什麼直接責任。中世紀教會的橫征暴斂政策，是從十二世紀開始的。在金融和匯兌方面，羅馬和威尼斯或熱那亞相匹敵。羅馬最富的銀行家，是一個猶太家族，姓彼爾利奧尼。這個杰出家族的創始人，是彼爾，他在利奧九世時代曾任過類似教廷銀行家的職位（1049年）；利奧還說服了他皈依基督教。他的兒子為了紀念教皇，把“利奧尼”加到姓名上，因而叫做“彼爾利奧尼”；在“授爵權戰爭”時期，他是教廷的熱烈支持者。他的孫子彼爾利奧尼是中世紀羅馬城的革拉蘇^①，因娶羅馬貴族的女兒而成為貴族。他是古老的馬塞拉斯戲院的所有人；他把它改成了——一個砲壘。他死於1128年。他的墓上碑銘迄今還保存着，讚揚他是“一個舉世無匹的人物，財物無限，子孫滿堂”——那確是猶太人的特點。烏爾班二世死於這個中世紀教皇的債主和朋友的宮殿里。彼爾利奧尼的一個兒子曾任教皇，另一個成為“羅馬元老”，據說，有一個女兒曾嫁給西西里王羅哲爾二世。

有人說得很對：南意大利是“注定要從南方接收文明而要從北方接受主人的一塊地方”。關於文明方面，它是一張羊皮紙。古代希臘人、羅馬人、哥特人、倫巴人、拜占廷人、最後諾曼人，先後蹂躪過那里，並在它上面蓋下了烙印。西西里的歷史，除了日耳曼的影響以外，和南意的歷史有很多相同之點。在幾乎三百年期間——九、十和十一世紀——下意大利是由四個不同的種族居住着，由四個不同的法律體系統治着，並且在它的疆界以內，除伊斯蘭教外，還有兩種不同的基督教形式。希臘人、拉丁人、倫巴人和阿拉伯人分割了它的宗教和統治。從政治上說，自從第六世紀以來，南意各省屬於拜占廷帝國，其中最重要的，是亞浦利亞和喀拉布里亞兩省。

① 羅馬最大富翁。——譯者

拜占廷帝国通过亚浦利亚、喀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同西欧洲取得了直接的接触，而且，从这一源流有不少物質和精神文化經由意大利傳到日耳曼、法国、甚至英国去。在封建时代，西欧文学和艺术生活上所有的一些希腊文化的色彩大多是从拜占廷意大利来的。

在第九世紀早期，从开温总督区（近代的突尼斯）来的薩拉森海盜开始騷扰第勒尼安海，使意大利处于危險状态中。利奧三世，即为查理曼加冕的教皇，被迫于羅馬沿海地带建造守望塔。813年，維奇亞城被攻。在827和895年間，整个西西里曾遭受阿拉伯人、柏柏人以及亡命的西班牙穆罕默德教徒的蹂躪。846年，羅馬被攻，所以，后来不久，利奧四世在圣彼得大教堂周圍筑造牆垣来保护它。這項危險十分严重，以致南方海港如阿馬斐、基泰和那不勒斯（所有这些海港都是靠着和君士坦丁堡的貿易而兴盛起来的）組成了同盟，并在849年，在奧斯替亞港口外贏得了一次海战胜利。薩拉森俘虜被用来建造梵蒂岡城。876年，坎帕納遭受了可怕的破坏。其时，薩拉森人，虽然在海上被英勇的教皇約翰八世暂时遏阻，但却已从西西里渡海到意大利本土；象北欧人在法国那样，薩拉森人不久发现：寺院是財物的主要貯藏所；所以殘酷地搜劫希腊和拉丁寺院。使事情更恶化的是，教皇垂涎南方諸省而計劃兼并它們于教皇世襲領內；他們的這項陰謀策略以及那里的倫巴居民对拜占廷的潜在的敌意，使伊斯兰教的傳布获得了便利。当时，拜占廷的統治机构集中在巴利，在經濟上，是橫征暴斂的，在行政上是貪污腐敗的。因此，在希腊人、倫巴人和海港之間，經常有冲突。

然而，尽管处在上述的不利条件下，南意大利生活中坚定的經濟社会因素：喀拉布里亚尤其是亚浦利亚的肥沃土質（今天这两地已一半被瘴气破坏了）、广闊的牧場、茂密的栗树林、葡萄和橄欖园、喀拉布里矿产（从那时起已經枯竭）、居民的辛勤工作（当时这

些省內的人口比今天也許要稠密)、大批航海和刻苦耐勞的人員;這一切使那里的居民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以至兴盛。在十一世紀之前,西欧在經營東方進口貨的種類和規模方面,除了威尼斯以外,再也沒有其他城市堪和巴利、阿馬斐、那不勒斯、撒列諾、大兰多各城并駕齊驅。因為這些城市里的商業人口,由于牟利心重,不容宗教偏見來阻礙他們的貿易行為。利奧·馬塞坎那斯,即蒙特·卡西諾的編年史作者,在第九世紀中曾痛罵阿馬斐人和撒列諾人,因為他們把營業放在宗教之上,而同穆罕默德教非洲進行貿易。

在南意所有的這些沿海商業城市中,阿馬斐最富於企業精神;它和威尼斯競賽,并趕上熱那亞和比薩。它是非洲和穆罕默德教西班牙之間的貿易的主要仲介。早在第十世紀,阿馬斐商人在亞歷山大城與開羅、在敘利亞、在君士坦丁堡已建立他們的殖民地。當巴錫爾二世潰滅保加利亞人勢力的時候,阿馬斐和威尼斯商人都在都拉索开辟了競爭性的貿易區。研究一下阿馬斐的繁榮怎样受拜占廷繁榮的影響,并怎样反映出拜占廷海陸權力的興衰是很有趣的。拜占廷金幣作為地中海地區交換的媒介這一優勢,又是一個顯著的經濟事實。在十和十一世紀,除銅便士外,不復有倫巴人的地方貨幣。只有阿馬斐和撒列諾還有自己的貨幣;而耐人玩味的是這些貨幣上面刻着阿拉伯字;顯然是為了便于在埃及和北非穆罕默德教國家內進行貿易而制造出來的。當西欧,包括除威尼斯和南意以外的一切地方,還用銀幣計算的時候,伊斯蘭教西班牙和非洲、西西里、南意大利、拜占廷帝國、敘利亞和埃及,是按金本位來交易的。這一事實雄辯地証明了:和東方國家對比之下,西欧在經濟發展方面是落后的。

西欧長期的經濟落后,很大部分是因為穆罕默德教占着地中海地區的優勢。熱那亞和比薩、阿馬斐和撒列諾的興起,部分地彌補了這種逆差。可是,只要薩拉森人一天占着西西里而控制了地

中海的“海腰”，基督教歐洲的航運和商業就要仰伊斯蘭教的鼻息。西歐的經濟解放要依靠基督徒推翻伊斯蘭教的海權并征服西西里，即地中海的鎖鑰。

至于阿馬斐和撒列諾，它們同西西里、突尼斯的薩拉森人訂立了一項“臨時措施”，使雙方互有利益；因此，西西里在穆罕默德教手里，對它們來說，是没有什么關係的。相反的，它們甚至因此获益。但比熱那亞更前進的比薩，在第十世紀后期，曾企圖推進到東地中海更富饒的地區，以求擴展貿易；對這項企圖，拜占廷，甚至威尼斯，表示歡迎，因為阿拉伯人對屬於拜占廷的南意各省，是個經常威脅。975年，拜占廷和比薩的聯合艦隊進攻墨西拿。1006年，在勒佐港口外拜占廷在比薩的幫助之下，又對阿拉伯艦隊進行了一次大海戰，而贏得了勝利。為了酬勞比薩，拜占廷給予在東方帝國各港口內自由貿易之權，這一贈與惹起阿馬斐和撒列諾的深刻嫉妒，因為它們痛恨對抗性的競爭。1011年，阿拉伯人為了報復比薩在1006年支援拜占廷，而劫掠比薩，這是他們最後一次進攻意大利。

上述南意和西西里的複雜的政治、宗教、商業競爭，在十一世紀由於諾曼人的征服亞浦利亞和西西里，一定變為簡單化了。諾曼人的寶劍斬斷了這一癥結，並在地中海中部建立了一個統一政權的強大優勢。諾曼人的征服南意和西西里，原來是作為冒險行為開始的，但轉化為象後來1066年的征服英國那樣的殖民運動了。他們終於建立了一個有創造性的光輝燦爛的文明國家；這一國家歷時兩百年之久。

這些諾曼“騎士”並不是那些由扈從圍繞着的發財貴族。1016年第一批騎士離開他們的本土諾曼底而到南意，因為他們勞苦——據編年史家杰弗里·馬拉特勒的話，他們在諾曼第看到：由於各子平均繼承遺產的法律，他們所可獲得的土地太少了。而且，

在他們中間，還有很多因為違犯禁止私戰的國法而被放逐的男爵。事實上，這些想發橫財的士兵只不过是冒險傢伙和匪徒而已。為求勝利，他們不擇任何手段。他們從山頂城堡沖下，劫掠平原；背信棄義，破壞城市；引誘敵人陷入埋伏陣地——這些就是關於意大利第一批諾曼人首領，即湯克勒德·得·豪特維爾的諸子及其伙伴們的家喻戶曉的故事。在第一批諾曼隊伍到達意大利之後，他們占有了城堡；為求分享一份戰利品，新的隊伍源源而來了。

這些冒險傢伙在下意大利的富庶省份內所得的財產，是數量驚人的。他們之間有一個人向他的伙伴們說：“你們可以統治這些肥沃平原的時候，為什麼還要象老鼠那樣在洞里過活呢？”關於這塊良好地方的消息傳回了諾曼底，此後的五十年間，諾曼騎士貴族源源不絕地湧到南方去，最後，這個中世紀里進行征服和殖民的最大種族，在地中海地區創立了另一個諾曼底。這一個意大利諾曼底是在1053年由這批冒險傢伙中的最勇敢者，可畏的羅伯特·基斯卡（“狡猾者”）所創立。1063年的一次戰役使諾曼人占有全部西西里，除巴勒摩以外；後者在1072年被占領。到1090年，羅哲爾一世（基斯卡的最幼兄弟）把諾曼人對西西里的征服全部告成。

諾曼人的征服南意和西西里，使地中海地區發生了一次經濟革命。就是說，穆罕默德教徒的商業霸權已轉入基督徒手里，現在後者扼守着地中海上交通綫的軸心。諾曼人的征服西西里，給基督徒的商業開放了墨西拿海峽。基督教海權替代了穆罕默德教海權。現在有一個賢明而又有力量的政府在商業上監督並指導几百年來素以經商著名的人口的活動，其中包括有希臘人、猶太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所有過去競爭的敵對港口：阿馬斐、撒列諾、巴利、大蘭多、巴勒摩，都聯合在一個統一政府的治理之下。巴勒摩成為一個商業輻射的中心；它的活動路綫，向西遠至加的斯，向東達到亞歷山大城、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

但是在打敗伊斯蘭教以後，勝利者自己之間不久便開始了激烈的商業鬥爭。地中海局勢的轉變對拜占廷、威尼斯、比薩和熱那亞，仍是一個很大威脅，象過去阿拉伯人的海權和商業冒險對它們的威脅那樣。因為雄才大略的諾曼國王在商業上和在領土上與政治上一樣是有野心的。他們以“最惠國”特權給予開溫商人。諾曼國王由於扼守意大利和非洲之間的航路，計劃迫使比薩和熱那亞以及後來馬賽和巴塞羅納的一切船隻與貨物在通過這航路時，不論向東或向西，都須繳付通行稅。為要使威尼斯降到商業附庸的地位，羅柏特·基斯卡在1081年企圖自己占有都拉索，從而控制亞得里亞海入口處，即僅五十哩寬的窄狹海峽兩岸的橋頭堡——俄特蘭陀和都拉索。但由於諾曼人艦隊被威尼斯艦隊所毀，這項大計劃終告流產。諾曼人對威尼斯和拜占廷帝國通商的威脅，使兩國締結了密切聯盟。希臘人把羅柏特·基斯卡及其兇狠的兩子，波希蒙德和羅哲爾，比成毛蟲和蝗蟲：這個沒有吞掉的東西，那個來了就一掃而光。基斯卡並不因為他的早期失敗而灰心，在1084年又認真準備去征服君士坦丁堡本城。這項大胆計劃使人有些困惑不解。如果這計劃能成功的話，南歐和地中海地區的整個商業會落在他的控制之下。經過三次海戰，又遇風暴和疾疫，他的大計劃終告失敗；結果威尼斯獲得了從這事件所產生的一切利益。因為“亞歷修害怕再被攻擊……從威尼斯共和國求得一項重要援助；包括有三十六隻運輸船、十四隻大艇、九隻大帆船，即特別堅固的巨型的船艦。為酬報威尼斯人的援助，亞歷修慷慨地賜給他們營業執照，即貿易專利權，還贈予豐富的禮物，即君士坦丁堡港口上的很多店鋪和房屋，還給聖馬克寺院一份獻禮；最後一項是最受威尼斯人歡迎的，因為這是從他們的競爭者阿馬斐人所征的一種稅款得來的”。

這些海陸軍的出征、這些意大利人、希臘人和穆罕默德教徒海

盜船的冒險行動、這些激烈的商業競爭，都是準備十字軍運動的象徵，而且每種對那個大運動都會起它的作用。歐洲地中海港口，特別是意大利港口，在十一世紀末期，雲集着形形色色的冒險人物，他們來自好戰而又擾攘不安的社會的各階層——依長子繼承法被剝奪了繼承祖傳土地的封建家族的幼子們、想發橫財的士兵、商人、小販、走私者、貪圖名利者、游僧、逃亡農奴、逃犯、碼頭夫役、犹太高利貸者和收受贓物者。從所有這些人看來，利凡得的穆罕默德教地區似乎是一個黃金世界。十字軍將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混雜在一起的，各自抱着不同的動機。

第十四章 十字軍前东羅馬帝国 (802—1096年)*

从 802 年主張改良的偉大愛索立安王朝的終止,到 1096 年十字軍使帝国受到致命打击这一时期的东羅馬帝国的历史,是一个国运起伏不定的历史;有时瀕于破灭,有时声势煊赫;其間还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宫廷革命。在这时期,我們看到下列事件:第一保加利亚帝国的兴亡,罗斯对拜占廷的威胁,拜占廷对薩拉森斗争的延續和它在曼西克特战役后(1071 年)丧失亚美尼亚及全部小亚細亚于新兴而强大的塞耳柱土耳其人。可是,在这多事之秋,帝国一直是照常过去,它的不知不觉而緩慢的变化起于内部有机的改变,倒远多于外部事件的影响。

奈斯波拉斯一世推翻女皇愛里尼后即位。他的統治(802—811 年)是以財政和賦稅的强硬措施而著名。这新皇帝不是一位不做事的國庫長官。他精密地修正田賦制度,使大地产也包括在內。为使国内土地不致荒蕪起来,他迫使大地主負責耕种他們附近的土地。愛里尼曾豁免寺院和教会財產繳納那代替人头稅的爐灶稅;而教会由于這項寬大待遇,便肥壯起来。現在,奈斯波拉斯强制教会繳納爐灶稅并使用强硬措施来征集欠稅。他还恢复 5% 的死亡稅(象近代的遺產稅那样)。对不劳而获的增值,也課以賦稅;那是近代拥护单一稅論者会觉得滿意的一种稅。

还有有关商业的措施:修改收入稅,比旧稅提高 $\frac{1}{12}$;对取道赫勒斯滂的家庭奴隶,課以新稅。那些做生意的小亚細亚居民被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59,67 頁。

迫購買地產。在各項法律中，最令人沮喪的——也是極其奇特的——是禁止收取利息的法令。當然，貿易會受損害。為了補救這項情勢，奈斯波拉斯貸出國庫黃金，每份十二鎊，利息從 $16\frac{2}{3}\%$ 到 20% 不等。

在奈斯波拉斯時代，賦稅是繁重的。常常有人企圖暗殺奈斯波拉斯這一事實，證明他是不得民心的。而且，當代的历史家竭力把他描寫成爲一個貪得無厭的殘暴流氓，以昭示後世；因為他的措施打擊了曾由愛里尼豁免爐灶稅的寺院；也打擊了那些已經富裕而力能付稅的大地產和大商業利益。如我們所預料，教會對他特別痛恨。但除了禁止利息這項不吉的法令之外，奈斯波拉斯的措施是計劃得好的。他需要現款，而且的確迫切地需要現款；但他是把賦稅盡力加在有負擔能力的人們的頭上的。近代研究拜占廷的最偉大學者寫道：“奈斯波拉斯是一個賢明的國君、一個有才干的理財家，即使他不得不占奪教會的財產，也是為了彌補國庫亏空的目的。”

總的說，第九和第十世紀是東羅馬帝國的外患嚴重的時期，直到巴錫爾二世(976—1025年)扭轉局勢為止。小亞細亞，由於阿拉伯人的侵襲，經常處於不安靖狀態；還加上了農民反對大地主壓迫的零星而無效果的起義——象821—824年的起義——這些起義使亞洲的小土地所有者消失了。巴爾干各地遭受保加利亞人的侵入；他們在半島的腹地建立了一個強大帝國，而這帝國繼續存在到1018年。諾曼人征服南意大利。薩拉森人蹂躪西西里。羅斯人征服黑海殖民地，並多次威脅君士坦丁堡。

可是，儘管拜占廷遭受這些外患，但在這一時期，它的商業卻是很繁榮的。以前或以後，從來沒曾有過世界上這樣廣大地區的商业這樣集中於一個城市里，象在第九世紀集中於君士坦丁堡那樣。可以看出，帝國的財富在於它的貿易。當時，關稅率是適中

的，特权是被譴責的。有一个皇帝，甚至禁止他的朝臣从事貿易，免得他們奢侈成害。拜占廷貨幣，价值稳定，声誉卓著，以致它成为全欧洲的貨幣标准。我們看到，第九世紀拜占廷商业，經過陆路，远达东方各地；同阿拉伯人的貿易很繁荣；同北方罗斯人的貿易也日益增长；同时，在西方，拜占廷的商业也达到这样的繁荣状态，使它的統治者得积聚大量現金窖藏。在浪費的提阿非罗（829—842年）时期和在他節約的妻子提奧多拉为兒子攝政的时期，国库除开支之外，还积儲了二千五百万美元巨款（其中也得助于若干新矿的发现）。試把这数字同英国王室在1431年亨利五世征服法国之后的收入，比較一下，可看到英王每年二十五万美元的收入是小得可憐的。当时，拜占廷的海軍和商船队称霸于世界。对商人发給措詞审慎的特許状，使他們在指定地区內进行貿易。皇帝的政策是要維持貿易路綫的現狀。提阿非罗禁止他的朝臣从事船运事业，因为害怕他們使交通運輸离开老路綫。这样一来，商人在他們經營貿易地区內所得的利潤，大到象壟断的利潤那样，即使在那里壟断是不存在的。我們看到希腊商人的記載；他們曾到过保加利亚和多瑙河地区、赫尔遜以及伏尔加河和里海地区。君士坦丁合法繼承人曾繪制一幅地图，指示下第聶斯德河的航行路綫，并标出罗斯人拖运他們的小船繞过急流的地点。

当我们研究君士坦丁堡的工业制度的时候，我們就可看到：对于一切商品，無論制造的或进口的，都有精密的監督。第四世紀由羅馬政府加以仔細監督的行业团体制度，在君士坦丁堡还是維持着。那里有很多行会，象絲业商人、紫色染工、香料商人的行会；它們控制着大量原料并在政府監督下进行制造。皇帝制定关于一切商品买卖的詳細規程，而国库收入的大部是从征收行会的捐稅得来的。《总监便覽》一書是由[聪明人]皇帝利奧（886—912年）所編

訂的,表明拜占廷工业組織得如何精密^①。

这种組織看来可能是麻煩透頂、甚至干預过多的限制。但應該指出:在两点上,它比过去的工业情况,已有进步。第一,对于行会团体,不再課以公役。第二,行会的會員資格不再象在羅馬帝国那样,是强制世襲的。

在君士坦丁堡,叙利亞人、阿拉伯人、罗斯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都可进行貿易,但他們的往来和交易須受到严密的監視。一个外国商人在城内逗留的时期,不得超过三个月。在三月以内,只要付了进口稅以后,就可随意自由交易,不需要再交付別的捐稅。

① 君士坦丁堡的工人組織有城市总监作为它們的头脑。凡关于新會員的加入、職員的推选、各行会团体間的关系、团体的整个有机生活,事实上,都是掌握在他手里,由他决定。他处在行会和政府之間,在大多場合下还站在行会和外侨之間。正是他,审判并处罚一切違犯規則的行为……《总监便覽》所显露的君士坦丁堡,乃是壟断、特权和家长主义的乐园。不仅不同行业間的通路为法律严密地封閉着,而且任何一个团体的活动都須受千百条款的限制。国家干涉一切;控制一切;随意进入什么地方,店鋪和儲棧,并查核帳目。它規定工人的工資、每一种貨品出售的日子、地点和价格、制造者不得直接採購,甚至选择他所需要的原料,对于存貨的質量,甚至数量,也从来不能有何煩言。在有原料运入城内时,購買本行业所需要的原料,是制造者所屬的組織的事情。他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付出在总成本中他所占的比例数,和領受社团分配給他的部分。各种行会成員的增加,遭受极严厉的限制;僱主无权支配他和工人所簽訂的契約,甚至也无权支配他們認為必要的学徒人数。国家的干涉还不止于此。为了保持城市对某些工业技术的独占地位,把陌生人看作間諜;严格限制他們的居留的时间。他們被幽禁于旅館內,由警察在外看守;如果他們採購的商品价值超出規定的最高限度,就要受到重大处罚。一般人只准經營一种行业不得兼做其他行业。他們必須在指給的地点上营业。僱主預僱工人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預付工資也不得多于三十天。凡違犯者即将其超出部分沒收。所以,这制度对个别技工还很妥善;但是这批人必然是为数有限的,而且当西地中海区日益发展的城市吸引职工的时候,也不可能留住他們。这一詔令所規定的精密偵查办法,需有大批官員在总监指揮之下进行工作。总监的代表、他的官員、他的稽查員、他的下屬不停止地往来查察,而所有行会的会长,必須尽力予以援助。总监还利用一大群輔助人員,包括君士坦丁堡所有的工人和商人;关于这方面,他应用很简单而又很便宜的方法——互相告发方法。事实上,法律把“互相告发”作为城内每个行业团体的每个成員之强制性的义务。法律的条文規定得越严密,处罚就越多而越严厉。大量罰款、沒收財產、放逐、鞭打、削髮——这一切总监都經常使用,借以提醒在他管轄权下的那些人注意自己的缺点,尊重他的权威。最后两种处罚方法,鞭打和削髮,尤其是家常便飯。

但是他的貨物，當售給行會採購員時，必須經過檢查。他所收取的貨價，可能不合乎自然的市場價格，因為皇家官吏掌握平衡主要商品價格的辦法。不論運入的谷物數量多少，價格必須一律。在市場上銷售的數量，是按照現貨供應的情況和規定的價格來調節增減的。

阿拉伯人和希臘人間的宗教反感，不久化為烏有。基督教的朝謁“聖地”在阿拉伯統治下還在進行。象阿拉伯人和希臘人這兩種這樣愛好貿易的人民，而又住得如此靠近而不進行貿易，那是難以想象的。利奧五世（813—820年），因為伊斯蘭教徒對“聖地”有一種褻瀆行為，曾禁止希臘船隻駛往敘利亞或埃及去。但是宮廷需要埃及的織品，而在第九世紀宮殿里已有很多阿拉伯制品。我們把希臘-阿拉伯商業的興盛時期放在第十世紀中，那是不會錯的。皇家工場所製造的絲綢，在數量上不夠供應宮廷中的需求，因而其他精緻的織品須從東方輸入。由於需要這些華麗織品以及香料、胡椒、醫藥品和香粉，希臘人突破了一切政治和宗教的障礙，同穆罕默德教徒進行直接的貿易。海德指出：在第九世紀初，已有關於這項貿易的第一批明確的資料；而到第十世紀，希臘人和阿拉伯人間的商業獲得了巨大發展。

但是，因為阿拉伯人已完全控制紅海、波斯灣和橫跨大陸的亞洲商路，而巴格達和埃及的穆罕默德教哈里發又使這有利的運輸貿易盡量負擔苛重的捐稅，從而西方消費者付出高價，所以，拜占廷帝國努力使那條經過中亞細亞而不受阿拉伯控制的北方商路開放着。這一條商路，起自特勒比連德，越過里海地峽，繞道里海南岸，從那里穿過韃靼汗領土：麥爾夫、撒馬爾罕、布喀拉等等達塔什干，再從那里前往印度或中國。

歷史再一次地重演了。因為這是和在波斯薩薩尼朝時代羅馬帝國的策略，在科斯洛厄茲大帝時代查士丁尼的策略相同的。這

样，黑海的东方口岸在第九和第十世紀中恢复了它們商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勒比遵德，除君士坦丁堡外，是拜占廷帝国的最大商业城市。这边疆城市成了亚美尼亚人、穆罕默德教徒、希腊商人間的交換商品的中心。在第十世紀，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斯特拉第写道，“特勒比遵德是希腊人的边疆城市，我們商人都往那里去；所有希腊制的精美布匹、所有輸入穆斯林領土的錦緞，都是經過特勒比遵德的。”

然而，这条特勒比遵德橫跨地峽的商路，也有它严重的不利的地方。亚美尼亚，在拜占廷和巴格达冲突时期，一直是个緩冲省份，象过去它在羅馬和波斯冲突时期的地位那样。亚美尼亚人自己强烈地希望独立，常常挑撥那两个竞争的帝国互相冲突；此外，高加索和埃耳柏茲山区的野蛮部族，象庫尔德人那样，动辄劫掠商队。所以，后来我們看到，人們便逐漸地使用另一条比第一条更北的北方通路。这条路綫，来自印度和中国，沿阿姆河順流而下，到咸海，繞里海頂端，过烏拉尔河口的薩拉坎谷达伏尔加河口的伊鉄尔或阿斯脫拉罕，从那里上至薩来，于是，下行頓河到亞速夫海的罗斯托夫。这里，在大草原陡峭的斜面上位着克勒諾伊 (Kremnoi) 或“悬崖”；这名词是希罗多德用以称希腊商人的貿易中心的；几百年前，希腊商人也曾到过那里，同西徐亚人进行貿易。这条路除了不受穆罕默德教徒的阻撓，并能避免山区野蛮部落的搶劫之外，还另有一項优点，就是它几乎全部是水路。

这条新商路的开辟，使一个叫做喀扎兒人的古怪部族在商业上有了突出的地位；他們原来住于德尔朋上面的里海大草原上，并一般被認為是同突厥族有血緣关系。早在第八世紀，君士坦丁五世曾娶喀扎兒族的一位公主，就是著名的皇后爱里尼。那时，喀扎兒人已經放弃游牧生活而成为定居的部族；他們經營魚类、毛皮、奴隶、羊毛、蜂蜜、蜡、脂肪等相当数量的貿易。他們的首都，是在

伊鐵爾(阿斯脫拉罕),但是“他們王國的領土範圍是从高加索起向北到伏尔加河并远抵該河的下流;它包括頓河盆地,西至第聶伯河兩岸,达屬叨立克族^①的刻索人的地区”。

喀扎兒人采用犹太教作为他們的宗教这一个特殊的事实,比一个韃靼部族的迅速吸收文明,更覺奇怪。但这是一項聰明的措施。因为喀扎里亚位于巴格达的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和基督教拜占廷之間,它遭受双方根据利害关系发出的巨大压力;它就用这种妥協办法規避它們;同时,还有另一种利益,即吸引犹太商人到阿斯脫拉罕市場来,以便特別促进喀扎兒人的商业。阿拉伯历史家易宾·庫尔达达巴在第九世紀告訴我們說:甚至西班牙犹太商人也經常来到阿斯脫拉罕;当然,他們途經薩罗尼加和君士坦丁堡时,一定会停留的。但是拜占廷和西班牙的商业,不都是单方面的。《阿欣麦茲編年史》告訴我們說:在第十世紀君士坦丁合法繼承人曾派遣使节到哥尔多华的阿布的拉曼三世那边,以求促进穆罕默德教西班牙和东方帝国間的貿易关系。“因为当亚历山大城对西方哈里发国的商业开放停止以后,它的臣民从君士坦丁堡經常受到欢迎,而获得了巨大的补偿。”

刻索的古代希腊殖民地上的商人,現在开始惹人注意了;刻索是北方和克里米亚居留地商业的中心。关于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刻索、狄奧多西亚、欧巴托里亚、番那哥立亚、坦納、索尔德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阿哥远征队”的故事^②。这些地方在第四和第五世紀的大混乱里曾遭受严重的破坏,而在查士丁尼时代,曾部分地恢复;在第二次亚洲蛮族即阿佛尔人和馬扎兒人侵犯的高潮里,它們再次被蹂躪;到第九世紀,正在它們第三次开始繁荣的时

① 叨立克族(Tauric)是古代克里米亚半島上的穴居人,可能就是克里米亚人。
——譯者

② 希腊神話:哲孙(Jason)率其党徒,到科尔奇斯(Colchis)求金羊毛。——譯者

候,侵入俄羅斯的瑞典人又使它們遭受了危害。

現在我們必須相當詳細地追述羅斯人和拜占廷帝國間關係的歷史。第聶伯河是羅斯人國家(現在的俄羅斯)的主要經濟動脈和最重要的商業通路。第聶伯河的源流接近那通波羅的海的兩條最重要的水路,就是西德維納河和伊爾門湖的整個盆地;而伏爾科夫河則將俄羅斯中部和拉多牙湖接連起來。

斯拉夫人的居住區大部分在中第聶伯河的盆地上,特別是平原的多樹林的地區。這個地區給他們提供了貿易的商品,因為他們打獵可以獲得生皮,養蜂可以獲得蜂蜜,而新開墾的森林地能出產穀物和大麻;這地區迄今還是俄國著名的谷倉。所以,從早期起,生皮、蜜和蜡就是俄羅斯的主要出口物;而且從那個時候起,斯拉夫人就開始集中地開發森林的富源;一直繼續了幾百年之久,對俄羅斯的民族性格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古斯拉夫人沒有貨幣,而代之以獸皮,特別是貂皮和松鼠皮。所以,古代俄羅斯貨幣“基尼”(Kunic)這名詞是從貂的名稱“基尼察”(Kunitza)得來的。他們以獸鼻或小塊獸皮作為小輔幣。某種數量的獸皮被作為一個“格里夫納”(Grivna);但這數量是按照市場情況而波動的。

斯拉夫人居住在互相隔離的宅院內,周圍挖溝,並在附近森林里設置蜂房和陷阱,並開墾小塊田地。這些宅院起初分布於第聶伯河及其支流地區,到後一時期,斯拉夫移民才開始住到伏爾加河上游流域。他們常常把宅院圍以矮牆,以求自衛,並保護牲口免遭野獸侵害。城市就是從這些宅院逐漸形成的,其中最早聞名的是基輔。

俄羅斯經濟生活的最早類型是獵人、養蜂者和商人,由於商業可以提供巨大的利潤,斯拉夫人直到第十世紀末期,才發展農業。他們侵掠周圍的部族,因而積聚了大批奴隸;他們便把大量奴

隶輸出到“东方帝国”，因為他們农业很缺少，不需要这些奴隶的劳动。

罗斯的貿易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当时的外面局势的帮助。約在斯拉夫人移居第聶伯河流域的同一时期，住在黑海和里海之間的喀扎兒人已成为波罗的海和西亚間的重要商人；因而他們大有助于阿拉伯与俄罗斯之間的貿易的发展。从第聶伯河盆地所掘出的大批阿拉伯“第倫”币，就可看出在第七和第十世紀之間這項貿易的范围了。

斯拉夫商人在第聶伯-伏尔科夫商路上的繁荣状态，使設防的宅院变成了貿易站，并有很多城市建造在第聶伯河及其支流沿岸。关于基輔、佩里雅斯拉夫尔、斯摩稜斯克、諾夫哥罗得及很多其他城市之起源，沒有可靠的記載。时常有捕鳥兽者和养蜂者来到这些地方，以求交換他們的兽皮、蜂蜜和蜡。其中有些地点或村庄市場成了其他工业地方的分配站。

一般把瑞典人在 852 年(?)立足于基輔这一件事，作为俄国历史特别的开始日期。但是有資料可以說明，流动的罗斯人——因为侵入者这样地称呼自己——实际上远在第八世紀已經深入罗斯中部。有一种模糊不清的証据說，約在 787 年諾夫哥罗得的罗斯人曾企图占夺克里米亚；这比以前所知关于罗斯人要占有黑海領土的企图要早。在法兰克高盧的《圣柏坦寺院的編年史》里，保留下来一件有趣味的事情，也許稍可闡明这一問題：839 年那一年的紀录談到罗斯人国家的某些使节来到君士坦丁堡，他們的目的是重訂一項通商条約。但是，他們害怕比瑟尼格人，所以不願再循原路回国，这时，比瑟尼格人已征服和罗斯人友好的喀扎兒人。皇帝便派他們帶了一封給虔誠者路易的信返国，結果路易发现：他們是斯堪的那維亞人，即发兰琴人。

这些罗斯使节是誰，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問題。第聶伯地区

城市和拜占廷帝国已有一項通商条約,可能是历时很久的条約。他們所代表的是这些城市的斯拉夫人呢,还是他們自己的国家呢?可能是代表前者,在那种情况下,他們之所以被选为斯拉夫人使节,可能是因为发兰琴人对于水路具有优越的經驗和知識的原故。

上文已經說过,比瑟尼格人的侵犯大大阻碍了喀扎兒人对斯拉夫人在第聶伯河貿易的保护,并切断了基輔同黑海和里海的商业中心的貿易关系。因为喀扎兒人不复能够保护商人,第聶伯盆地上的重要商业城市認為必須由自己起来保护商路。所以,从那个时候起,那里的商人就开始在他們的城市設防,并派遣雇佣兵来武装护送他們的船只。这样一来,那些貿易中心和原料堆儲所便成了設防的城市。而且,对雇佣兵的需要也更大;当时的发兰琴人的在軍事上的优良品質与这项工作正是十分适合的;因而他們大批受雇于部落酋长来护送商船。此外,还有那么多的罗斯人,以商人的地位定居于城市中,以致这些城市人口的性質往往由斯拉夫人的变成发兰琴人的了。所以,据古代編年史所載,諾夫哥罗德城起初是斯拉夫人的,但后来,由于罗斯人特别是在842年路列克統率下的罗斯人之大量流入,它就变为发兰琴人的城市了。在阿斯科尔德和狄尔抵达基輔之前,那里住着的斯堪的那維亚人是那样的多,所以,这两个首領一到那里,就感到从当地斯堪的那維亚人中就可募集一支充分有力的軍隊从喀扎兒人手里夺取这个城市。后来,他們竟敢于用这支軍隊进攻了君士坦丁堡。

所以,显然可見,第一批来到俄罗斯的发兰琴人,或者是到拜占廷富饒市場去的路过的武装商人,或者是在第聶伯地区城市营业的商人,或者是自願充当雇佣兵的人。从下列事实,可說明:发兰琴人一般是被看作商人的:直到今天,“发兰格”^①的意义还是小

① “发兰琴人”(Varangians)这名词是从发兰格(Varyag)得来的。——譯者

販或者跑單幫的商人。但是，不久以後。發蘭琴人便由斯拉夫人同行商人，或者為斯拉夫船隻充當武裝護送隊的地位，轉變為統治者的地位。在第九世紀後半期，在諾夫哥羅得的路列克的領地、在比洛奧塞羅（白湖）的息尼厄斯的領地、在易斯巴斯克的特魯伏爾的領地、在基輔的阿斯科爾德和狄爾的領地，就這樣地形成了。

然而，在上述各個羅斯人的領地中，享有卓越地位的並不是諾夫哥羅得城，而是“羅斯城市之母”基輔城。這是大部因為基輔在商業上的便利較之其他一切城市有一定的優越性。因為它是俄羅斯的商業交匯之處；從伏爾科夫河、從德維納河、從下第聶伯河及其支流來的船舶都雲集於此。這樣看來，俄羅斯城市在經濟上依靠着基輔來進行南方的貿易；而這項貿易則占國內總貿易的極大部分。誰能統治基輔，誰就享有對俄羅斯商業的卓越控制權。這可說明：為什麼俄羅斯王公為奪取這個最重要的中心而進行衝突。關於這一點，還應順便注意：當奧列格進行從阿斯科爾德和狄爾手里奪取基輔的時候，他冒充為一個發蘭琴商人；顯然因為經商是羅斯人的最普通的職業，因而不會引起絲毫懷疑的。

阿斯科爾德和狄爾，還占有基輔的時候，在 865 年對君士坦丁堡進行第一次進攻。涅斯脫和總主教福細阿斯（後者曾目睹這項進攻）告訴我們說：羅斯人趁着皇帝邁克爾三世離京的機會，確曾深入博斯普魯斯海峽，圍攻了君士坦丁堡。我們對這進攻的詳細情況，雖不感興趣，但卻應注意這一事實：據福細阿斯說，這項出征的原因，是為了有些羅斯商人遭受侮辱因而進行報復。這侮辱可能是起於希臘人企圖賴掉他們所欠的債款。這次進攻是一系列衝突中的第一次；羅斯人企圖用衝突來迫使希臘人恢復他們與希臘人的通商關係；顯然這種關係大約由於希臘人的主動而不時中斷。所以，這一次進攻君士坦丁堡，是一個最早的历史資料，可說明：甚至在 866 年之前，在這有關的兩國之間，確實有通商關係，而這種

关系是由一項外交条約来建立并保障的，其中基輔是条約的当事人之一。

当奥列格接替阿斯科尔德和狄尔的基輔王位之后，他繼續保持前人对拜占廷帝国的貿易的政策。我們知道：奥列格在巩固基輔的防务以后，进行另一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征伐；結果签订了另一次的商业条約。显然，前次的进攻所建立的关系，早又被希腊人置之度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斯科尔德和奥列格两人之下，参加进攻的都是第聶伯河沿岸大商业城市的代表人；就是，那些对东方帝国的貿易有着切身个人利益的人們。举例說，906年奥列格用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军队中，有諾夫哥罗得人和基輔人、白湖的芬兰人、罗斯托夫人、克力維奇部族、賽維立安族、波力安族、拉提米奇族、杜力伊比族、科尔瓦提族以及提維尔茨族，当然还有发兰琴人的队伍。奥列格拥有两千艘輕快船；每只船除一队騎兵外，还配备着四十个步兵。奥列格使用这种兇猛的军队而赢得了一次大胜；因此，帝国政府被迫同胜利者进行媾和。結果，两国签订了一項和約。然而涅斯脫告訴我們說，有两項条約：一項条約是907年当奥列格军队还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时签订的，另一項条約的日期是912年，由奥列格的特別使团所签订的，这两項条約的关系是含糊的。907年的条約本質上是完全屬於通商性質的，包括下列各款：

I. 除付賠款給一切奥列格所統治的城市之外，还应对胜利軍中的每一个士兵付給賠款。

II. 每一个罗斯客人或商人到君士坦丁堡后，希腊皇帝必須供应他們面包、酒、鮮肉、魚类和水果，为期六个月；他們也得自由进出公共浴場，并可領到归程所需的各種食品、船用絞纜、捲索、帆以及其他一切必需品。

希腊人虽然是失敗者，但仍能要求作了若干的修正，而将修正点同样地載入条約。他們的要求如下：

I. 凡是非为經商而为其他目的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罗斯人，无权領取按

月補助費。

Ⅰ. (俄罗斯)公爵应禁止他的臣民損害希腊地方和城市的居民。

Ⅱ. 罗斯人得居住在城垣和博斯普魯斯之間的聖馬馬斯区，他們必須向市政府报告他們的到达日期，向市政府登記他們的姓名于登录簿上，并按下列順序发給他們每月補助費：基輔、徹尔尼谷夫、佩里雅斯拉夫尔及其他城市。他們并且必須由靠近帝国港口的一个城門出入，不得携带武器，而每次結队入城的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然后，他們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城內自由經商，不付任何捐稅。

912年的条約是关于两个国家間的关系，但是除下列第Ⅶ和第Ⅹ两条規定以外，对貿易关系，沒有特殊的意义。

Ⅶ. 如在希腊購買的奴隶中找出任何罗斯人，或在俄罗斯購買的奴隶中找出任何希腊人，这种奴隶将按商人为購買他們所付的原价，予以贖回。战俘付二十苏里德贖金后得回祖国。然而，那些自願为皇帝服务的罗斯人，应准予留在希腊，他們愿留多少時間，就留居多少時間……

Ⅹ. 如在希腊境內的罗斯商人或其他的人中，发现有国内緝拿的犯人，即使其本人反对的話，基督教皇帝也須遣送其返国。关于在俄罗斯境內的希腊人，应实行同一程序。

所以，从这些俄罗斯和东方帝国間的早期通商条約中，我們可看到国际公法的发端。

奧列格不仅貫徹了一种有利的对外貿易政策，而且他的成功对俄罗斯的内政上，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們已提过，第聶伯流域的商业城市曾帮助他进攻君士坦丁堡，因為他們貿易利益和奧列格計劃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現在，由于奧列格的卓越战功，使所有的这些城市都入于基輔統治者的領導之下。这不是一种強制的征服，而是一种自願的臣服；从而把基輔提升到第一个全俄罗斯政权的地位。所以，把路列克的短命的諾夫哥罗得侯国作为俄罗斯国家的开端，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俄罗斯斯拉夫国家的政治統一的光芒不是从諾夫哥罗得而是从基輔放射出来的。而这个結果

是由于共同的商业利益通过自然而和平的团結方法产生的。

另一促成斯拉夫各部族团結在基輔主权下的因素，是需要防止比瑟尼格人的侵犯。这些掠夺者盘踞在通黑海和里海的各商路上；所以俄罗斯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来阻遏他們。正是基輔如此有力地承担了这一角色，所以其他商业城市認為接受那个侯国的控制，是对己有利的事情。

現在，不仅职业商人和販子，而且首先公爵本人都在經營商业，因为商业通过奥列格条約已在稳固基础上建立起来。由于向来是半商半兵的罗斯人，掌握政权之后沒有放弃其經商性質，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他們还是繼續經營商业。事实上，他們几乎是由于必要而不得不然，因为公爵对臣民征集的貢賦都得用实物支付的。在冬季，公爵带着卫兵，从一省到另一省，征集这种貢賦，而在夏季，則以这些征集来的实物进行貿易。这些卫兵从这貢賦里領取了一部分实物，作为工資，因而他們也被卷入商业圈子里了。

皇帝君士坦丁合法繼承人(905—959年)^①曾描写罗斯船只每年航行到希腊的情况如下：

他們是从諾夫哥罗得、斯摩稜斯克、琉比契、徹尔尼谷夫和維希哥罗得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在罗斯人統治下的斯拉夫人——例如，克力維奇族、盧察安族及其他部族——在冬季从他們的山上砍下树木并建造船只；我們称之为“独木船”，因为它们是用一顆树干造成的。在第聶伯河不結冰的时候，斯拉夫人来到基輔，把这些船只售給罗斯人；后者从他們的旧船上取下的橈架和划桨来配备它們。在4月中，整个罗斯船队集合在維提奇夫，从那里船队前駛到急流。当商人們抵达第四急流处(叫做涅雅西斯提亚，那是最危險的地方)的时候，他們便把貨物全部卸到岸上，牽引被牢固地鎖着的全部奴隶上岸，并沿河步行走去，大約要走六千步左右。比瑟尼格人，則按照他們的慣例，在急流之外，在那叫做克拉立斯基渡头的附近，埋伏等待着(在这地点，刻索希腊人从俄罗斯回来时会渡过第聶伯河)。击退了这些盜匪之后，

^① 君士坦丁七世合法繼承人的在位时期应是913—959年。——譯者

他們前行到聖格列高里島，在那里獻祭他們的神；此后，他們脫離了危險，直到他們抵多瑙河的支流薩利納河。在那里，如果偶然被暴風迫上岸的話，他們再一次須同比瑟尼格人戰鬥。于是，最后他們通過卡諾普、君士坦查；在渡過保加利亞的伐那和狄茲那兩河口之后，他們達到麥森布利亞，第一個希臘城市。顯然，他們的貿易一定是俄羅斯人的一個大財源，因為他們冒着這樣多的危險，並且費了這樣多的勞動；又因為他們同帝國所簽訂的一切和平條約，也都是為了這一目的的。

這些大胆的商人冒險家，並不以和保加利亞、希臘和喀扎兒區進行貿易為滿足；但是，如果我們相信君士坦丁的話，他們曾冒險遠行，到敘利亞，到地中海沿岸某些地點，甚至到達西班牙。他們的船舶經常來往於黑海上，所以黑海獲得了俄羅斯海這個名稱。至於希臘商人，他們卻從未到過第聶伯急流之上的。看來，只有刻索希臘人可能曾經在基輔經商；在基輔之上，似乎沒有希臘商人的足跡。

羅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貿易，與其說是一種現款交易，不如說是一種物物交換。他們以俄羅斯的生皮、蜂蜜、蜡、奴隸來交換絲綢和紫色衣料、豪華裝飾的服裝（然而，從伊哥爾條約以後，在數量上，不得超過買價五十金蘇里德的限度）、麻布、皮革、黃金飾品、酒、香料和水果。

伊哥爾在繼奧列格登上基輔王位之后，又進行出征帝國（在935年）。雖然他的武裝部隊人數很多，結果卻遭受了慘敗，尤其是因為遭受“希臘火炬”的攻擊。為了進行復仇，兇狠的伊哥爾召集了另一支軍隊，而在944年發動了另一次出征。這次出征非常成功，伊哥爾獲得了另一項通商條約，945年的條約；這條約進一步規定並加強了兩國之間的商業關係。與這問題關係較密的規定，有下列條文：

- I. 羅斯人的大公爵及其衛兵，可自由派遣他們的搭乘使節和客人的船

只进入希腊境内。客人象过去所规定的那样，应携带银印，而使节则应携带金印，但从今天起，他们还须随带一封公爵的公函，以证明他们的来意是和平的，并证明船队所包括的人数和船数。如未携带这种公函，他们将被扣留看管，直到我们把这事情通知俄罗斯公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抗拒我们因而丧失生命，俄罗斯公爵不得归罪于我们。如果他们逃到俄罗斯，那么，我们希腊人把他们逃亡的经过通知公爵；至于如何处理他们，公爵得酌量办理。

关于俄罗斯人到君士坦丁堡后居住地点及其每月补助费的规定，是和奥列格条约内的条文相同的。然而，也有若干附加条件，内容如下：

俄罗斯客人将由一个皇家官员随行保护；如与希腊人发生争执便由他们解决。凡俄罗斯人所购买而在数量上超过五十苏里德价值限度的所有的丝绸，必须交此官员验看，由后者在丝绸上盖印^①。当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将按本条约所规定，供给他们各种食品以及他们船上所需的一切东西。但是，他们不得在圣马马斯区过冬，而必须在保护之下返国……

I. 如果有俄罗斯人偷窃希腊人的东西，或有希腊人偷窃俄罗斯人的东西，这类罪犯，应按其本国法律处罚；他须归还所窃的东西，并须照它的价值加倍偿还。

VI. 如果俄罗斯人把希腊战俘带至君士坦丁堡，他们每带来一个强壮年轻男人和女人，可领到十苏里德，带来一个四十岁的人可领取八个苏里德，带来一个老人或少年人可领取五个苏里德。如果希腊人将俄罗斯人购作奴隶，如属战俘他们可以领取十苏里德，如系贩卖来的奴隶，所有人须宣誓声明原付的价格，然后照这一价格领款……

俄罗斯人对在第聂伯河口捕鱼的刻索人[希腊人]，不得加以损害。而且，俄罗斯人没有权利在第聂伯河口过冬，也不得在比洛、贝里格[白海岸]、在圣爱特立厄斯[现在第聂伯河口的贝利赞]过冬，而应在秋季来临时，回到他们的国家俄罗斯去。

① 这表面上奇特的条件可由其他证据来证实：例如，卢易特普兰本人在获准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必须把他的行李呈验，某皇家官吏即未批准他保留某种特别贵重丝绸衣料，而偿还给了他原付的货价。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希腊人在财富和智慧方面，胜过其他民族；所以他们在服装华丽方面，也应胜过他们”（见《卢易特普兰教使传》）。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約提及一些过去的办法（“象过去所规定的那样”），依这些办法，客人应呈驗一顆銀印，使节应呈驗一顆金印，以取得合法的地位。所有流傳下来的条約对任何这样的办法都沒有提及过。是否在《編年史》所紀載的以外，还有其他条約呢？看来，根据上面的引述，至少还有一种这样的条約，而这条約的条件，已如此明确地知道，所以只要提及它，就認為已經足够。这样，我們可以作出結論說：俄罗斯和东方帝国間商业关系的发展情况和它們用条約所规定的明确关系，在程度上超过我們一向希望从保留下来的史册所可找到的消息。

在伊哥尔时代之后，还有一次出征帝国的事件（972年）；那是由好战的斯維雅多斯拉夫进行的。但是，結果他被有才能的皇帝翰翰·朱密斯克斯击潰，并被迫簽訂了一項条約；从我們的观点来看，这条約并未包括什么重要的东西。1043年，因为有几个罗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遭受虐待和毆打，其中甚至有一人被杀，雅洛斯拉夫派遣其子率領舰队，进攻希腊人。然而，在这两国之間，并未再訂任何条約；或者至少沒有关于任何条約的記載流傳下来。可是，在立法者雅洛斯拉夫的时代（1016—1054年），尽管有上面所述的軍事出征，俄罗斯和希腊人的商业来往，显然大有增加。

在此之后，还有几种关于通商情况的記載；它們都可作为商业活动的証明。每年有商船队从君士坦丁堡到达基輔；这些船队对整个国家的福利和公爵的私人財源，都是如此丰富，如此重要，以致公爵慣于派遣兵士远至卡涅夫，为的要保护这些船上的名貴船貨，以防止波洛夫茨之类的搶劫部族的掠夺。从基輔到黑海这一段的路伯河，当时俗称为“希腊通路”。除了上文說过的商品以外，俄罗斯人还扩展他們的营业活动范围；他們在陶里斯購買食盐，把它轉运到苏达克（克里米亞半島上的索尔德亚）——連同他們旧有的大宗商品——来换取絲綢衣料和东方香料。

这样，对外貿易使基輔接触了外国文明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文明。当时，货币大量地流通着。到十一世紀末期，据記載，有一个小貴族从他的斯摩稜斯克省，收到了一笔巨款，不折不扣地等于今天的十五万盧布。基輔显出了一个世界都市的性質，因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日耳曼人、摩拉維亞人、威尼斯人在那里并肩杂处着。这些外国商人之所以被吸引到那里的，是因为这城市提供了极其良好的貿易条件，还因为俄罗斯人有着好客之风。麦則堡·提特馬在 1018 年認為基輔确有四百座教堂和八所市場。

从雅洛斯拉夫去世到基輔灭亡(在 1169 年)为止，出現了一个混乱、內战和逐漸衰敗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商业状况，沒有特殊文献可資稽考。但可以妥当地說，尽管在这混乱的时代里，貿易还是繁盛的。

上面对俄罗斯历史的討論，已使我們的叙述超过了拜占廷历史的范围。

在 962 到 968 年間，皇帝罗曼納斯二世和奈斯波拉斯二世弗卡斯，对西里西亚和北叙利亚的薩拉森人，进行着几乎連綿不息的战争。这战争純粹是侵略性的。在东方偉大哈里发国家分裂为大批軟弱的总督区以后，皇帝看到机会，可以收复失去已久的，特别是叙利亚方面的領土。傳統和偏見使他們閉眼不見这一事实：越过托魯斯山脉之后，他們是在走出一条优良的軍事界綫，去攻取一塊絕难防守的領土。因为这地区滿布着設防良好的城市，所以战事必然拖长；又因为它远离供应基地，战争的消费是非常浩大的。結果是：获得一些光荣和占有安提阿（它的一部分商业希腊人已經享有），另一方面，消耗的軍費一定是可怕的。

叙利亚战争是一个不必要的行动；而俄罗斯战争和扑灭保加尔人的危险的战争，則是为保卫帝国安全上所必需的。这些战争

都是劳民伤财的。在前一次战争里，为弥补军事预算已不得不增收税赋；又因遭到严重的饥荒（927—932年），事情便更加复杂化。最后，甚至采用了可耻的办法，把优良的拜占廷货币贬值。后来接着的战争（除了巴锡尔的亚美尼亚的冒险行动以外），则更为必要，但亦无法比第一次战争消耗的少。这些战争没有经费是不行的。

而且，正在这一时期，土地向一小撮大地主手里集聚的长期过程，却进行得很快，尤其是在小亚细亚方面；在那里，自由小农沦为租户、甚至农奴，而农业也衰落。柏立教授在他出版的吉本著作所附的一篇精辟论文内，描述了这项过程：

小农阶层的衰落，包括以下的两种原因：修道理想的影响和当时经济条件的缺陷。寺院生活的吸引力诱导了很多地主参加寺院，并以他们的土地赠给那些接受他们的寺院；或者，如果他们是十分富有的话，就建立新的寺院的或教会机构。这样，土地就移转给教会，因而这些土地的耕种，也从自耕业主转到租户手里了。健全信贷制度的缺乏（因为不懂政治经济学）以及从而产生的商业萧条，使土地成为唯一可靠的投资资本；结果，那些拥有资本的土地所有者，便经常力求获得更多的土地。因此，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来引诱左近的穷人，那些做一天吃一天毫无积蓄的人在窘迫的时候抵押或出售土地。农民这样地出售土地以后，往往成为他们自己原有土地的租户。政府对大地主的生长，是抱着不赞同的怀疑的看法的。922年，罗曼纳斯一世开始了反对大地主的运动；当时，他在规定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里，禁止大地所有者土地购买或接受小农的任何土地，除非有亲属关系。还规定：凡如此获得的土地，只在占有十年之后，才可永远成为他自己的财产。但是，几年以后，巨头碰到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因而他们不能抗拒那利用这机会的诱惑力。在长时期中庄稼继续歉收，又遇着严寒冬季（927—932年），因此整个国家陷入大灾难状况。小农贫困万分，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为了自己和家族购买面包，除抵押他们的小块土地给富裕邻人以外，别无办法。因为抵押土地是他们唯一可以得到放款的条件。在罗曼纳斯的时代，这些年代的饥饉构成了农民所有制历史上的一个纪元。显然，那些把自己土地抵押出去的农民，在十年期限之内，没有机会来赎回他们的土地，而在十年期满后，他们的土地将是不可赎回的。小农阶层将来势必整个消灭，所以，罗曼纳斯又企

图以直接立法来預防这项灾难。他在934年頒布《附律》說：在过去几年中对农民不公平的处理,应予以糾正;而在将来也不准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后繼的皇帝遵循了罗曼納斯的政策。他們力图阻止小农阶層の消灭,禁止富人从穷人取得村庄和农田,甚至禁止宗教机关接受土地的贈与。关于这个问题,曾公布一系列法律(947年、959—963年、964年、967年、988年、996年的法律);这些法律表明:地主因为他們的利益遭受危險,对帝国的政策,曾进行过頑强的抵抗。虽然这项立法从来没有廢止过,除了有关教会利益部分以外(由巴錫尔二世撤消),虽然廢止发财地主取得农民的土地这项条文,仍然是帝国的法律,但毫無疑問,这项法律等于具文,而在帝国的末期,自耕农的土地确已成为凤毛麟角。在十一世紀,小亚細亚大部已是大庄园的地区。

上述过程,經過相当时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下列情况:由农奴耕种的大庄园制、城市人口的急剧縮减、工业和制造业的萎縮和經濟的停滯。这样一种极端情况,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情况。然而这项发展不得不由于出征时期的消耗和重稅而加速起来了。

巴錫尔二世在他反时代趋势的斗争里所获得的成功,只是暫时的。当时要有一个品質非凡的和有經濟观察力的人物,才能把帝国恢复到健康状态。这一情况可充分証明:国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已走下坡路了。而登帝位者,是无能而又放蕩的查士丁尼八世。他把各省交給他的貪得无厭的寵臣,并貪婪地征集已由巴錫尔取消的賦稅欠款。

但是,尽管有各种損害,拜占廷的經濟磨盘(当然特别是首都,它比各省所受的損害較少)还能很好地轉动;所以在那二十九年时期中(在这时期中的統治者都是从和君士坦丁的女兒們的婚姻关系而得来的皇位)社会还能够“酣睡于繁荣状态里”。这是酣睡,虽然是危險的貧血症酣睡。

只要一考查东羅馬帝国的經濟政策,就可看到,如上文所述,它对政治經濟的愚昧无知的状态几乎令人难于置信。財政立法几乎完全基于財政的理由和国庫的急需,而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其

次，帝国信貨制度的缺陷，对商业必然要起不利的作用；同时如上文已述，它的危險影响也加强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

帝国政府的盲目性，即自滿于一种“消极”性的商业和准許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如威尼斯、阿馬斐、比薩、热那亚来壟断到西欧去的运输貿易的政策，不仅剝夺了帝国臣民那原来自己可获得的利益；而且激起西欧人貪得无厭的欲望达到一种危險的程度，这一欲望由于十字軍东征而激增，并注定要在 1204 年毁灭帝国才能求得滿足。

当 1081 年諾曼人围困都拉索时，威尼斯人已控制亚得里亚海并对利凡得商业深感兴趣。皇帝亚历修为了获得威尼斯人的援助，把帝国内不下于三十个港口，包括君士坦丁堡本城在內的免稅权利贈給威尼斯商人。无怪乎这一行动被說成是“經濟癡狂”的行为。

希腊教会也須对帝国的衰敗負担一部分責任。在譴責东方帝国时，在說明它毁灭的原因时，历史可公平地把很大部分的責任归于希腊寺院制度。在东方宗教史上，再也沒有一章比它更令人鄙視的了。964 年奈斯波拉斯·弗卡斯曾禁止建造新寺院，并諷刺地提醒僧侶們注意：寺院理想和它們的規程所教导的，是禁欲主义和貧困。这禁令不久就有明文規定了。巴錫尔二世虽曾征服过保加利亚人，但既沒有勇气又沒有力量来取締寺院制度的弊端。988 年奈斯波拉斯的受人反对的詔令被正式廢止。在十一世紀的緊張局勢时期，伊撒克·昆尼諾斯和后来他的兒子亚历修·昆尼諾斯有一时曾大胆夺取寺院的剩余財物；但是由于瀆神罪和破坏圣象的呼声，他們不得不停止进行。在 1158 年，麦紐尔·昆尼諾斯又重申反对新寺院的詔令；結果，城市由于瘋狂群众的搗毀而破碎不堪，乡村由于被僧侶煽动的一些暴怒的农民的掠夺而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們燒毀皇室領上的田庄、倉庫、干草堆和谷物。东羅馬帝国在十字軍前夕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十五章 巴格达哈里发国家和 伊斯兰教的擴張*

在上面的一章里,关于东方穆罕默德教文明的历史,我們曾講到750年巴格达的建立为止;現在再从这个时期起,接續講到1096年十字軍的开始。

巴格达哈里发国家,在它的最盛时期,領土辽阔,从阿姆河到非洲的黎波里,从阿拉伯沙漠到高加索。可是它的核心是在阿薩西德和薩薩尼波斯。埃及、里比亚、的黎波里、巴勒斯坦、叙利亚、亚美尼亚和乔治亚,都可認作藩屬,因为这些地方的主要的人口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罕默德教徒。这些地区可以說构成一个外圍,构成西亚穆罕默德教世界和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間的一个屏障。当然,我們將按照这项差别来叙述哈里发国家的商业和工业;然后討論它的对外貿易。

哈里发国家的核心包括八个省(几乎每个省可称为国家): (1)美索不达米亚,即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它的地面上“确实散盖着古代所遺留下来的瓦礫……屬於巴比倫时代的碎磚……穆罕默德教还正在孩提时代所燒成藍色的瓦片”。在这历史性的低原省内有下列主要城市:巴格达、瓦塞特、庫发、巴士拉、摩苏尔和勒卡。(2)阿达尔拜疆。它的主要地区是:塔布里士和阿达貝尔。(3)米太,阿拉伯人称之为阿尔·朱巴尔。那里的大城市是:柯尔曼、哈馬丹、雷和伊思巴罕。(4)庫昔斯丹位在阿尔·朱巴尔之南,有塔斯太和阿瓦茲两城。(5)法斯,即“古代波斯和波斯王国的搖籃”,綿亘

* 地图:錫培德:《历史地图册》,第53,102—103頁。

于庫希斯坦之东,瀕波斯灣。法斯的最重要城市是:歇拉茨、栖拉夫和雅茲德。(6)法斯的东面,即柯尔曼的一片荒蕪地区,有柯尔曼和赫尔馬茨两城。(7)塞斯坦省跨越沙漠,对着柯尔曼。(8)哥拉森,即“波斯的东方大省”位在塞斯坦的西北。这里有4个重要城市:尼沙普尔、麦尔夫、赫拉特和巴尔克。

每个省有着某种形式的地方企业——农业、紡織业和制造业,使它获得經濟的重要性。下美索不达米亚以地上天堂著称;因为土質肥沃而又有很多灌溉运河。易宾·霍卡尔是一个商人,也是第八世紀中的一个旅行家和作家;他說过,那里有着多至十万条灌溉运河,其中有两万条运河可航运的。巴士拉城周圍,是富饒的牧場,牧場外还綿亘着枣椰树林,这里生产的枣椰子就其重要性來說,占到哈里发国家出口物的第二位。枣椰子收获的时节,好象乡間的节日,所有邻近的农場上都是采集熟枣椰的人。有些人对捕鱼有兴趣,有些人从事于編席,还有些人在玻璃工場做工,制造那些嵌着藍色裝飾和題詞的雪白玻璃灯之类的东西。在巴格达,制造出彩色玻璃和花紋玻璃,昂貴的散金框子是用这种玻璃造成的。其他出品还有:水壺、碗、杯、碟以及各式各样的玻璃瓶。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勒卡有着优良的市場,是大量貿易的中心。它是以木瓜、橄欖油、肥皂和制笔蘆葦著名的。阿密德是以它的羊毛和麻織品出名,而首府摩苏尔,是以棉織品(薄棉紗布)、谷物、蜂蜜、炭、干酪、奶油、水果和鹹肉聞名的。阿达尔拜疆富于水果园,并有出名的养羊牧場和葡萄园。然而,主要貿易在于馬匹和牛羊和制成品,而在制成品中,有絲綢、綿羊毛衣料、麻布和羊毛。这些东西染成深紅色,然后制成为腰带、起稜的被单、毛毯、地毯、椅墊和幕布。

在通过米太或阿尔·朱巴尔的哥拉森大路上,有以干酪和番紅花,也以狐皮和貂皮、錫和造船著名的哈馬丹。在这地区內,棉花紡成紗,然后染成藍色;雷的条紋外套,是出名的;針、梳和大碗

是为出口而制造的，后两种东西是用塔巴里斯坦森林的細紋硬木来制成的。雷还以桃子和甜瓜、干枣椰和鹹肉出名。另有很多其他物品，例如，大衣、皮囊、射手用的弓、馬勒、踏蹬和挂鎖是从那里出口的。

庫昔斯丹的土壤，特別适于种植甘蔗。在第十世紀后期，穆卡达塞写道，在他的时期，唯一出口的糖是从这个省内运来的。其次，在这个时候，阿瓦茲有着大型儲棧，从內地城市来的商品，在轉运到巴斯克最后出售和出口之前，堆儲在那里。塔斯太周圍有着园地，在那里盛产葡萄、桔子和枣椰子。本城出产世界聞名的錦緞、地毯和精致布匹。庫昔斯丹的运输甚为簡便，因其河流和运河均可航行船舶。还有起自巴斯克及其他附近城市而集中在阿瓦茲的陆路。

法斯省一向是以玫瑰油精出名的。易宾·霍卡尔說过，玫瑰水从这里运到印度、中国、哥拉森各地去，也运到非洲西北部、叙利亚以及埃及。棕花水、香油以及用芹菜、睡蓮、水仙、素馨、桃金娘、甜薄荷、甜瓜和桔子各种花所制成的軟膏，輸出到东方去。此外，法斯还以出产毯子、綉品和錦緞衣料著名；这些东西是专为供苏丹使用而制造的。这些产品上織有代表苏丹的縮写花字。另外还有用金綫織成的、綉花的孔雀藍和綠色的毛織品，也是专供王室使用的。从首府歇拉茨运来的有：薄紗、錦緞和生絲原料以及制外套用的細布。波斯灣上的栖拉夫城，在商业上和巴士拉城相竞争。据說，在第十世紀，它曾是波斯的主要港口。它制造品質优良布巾和亚麻幕布。作家伊斯塔克里說过，法斯最富的商人是住在栖拉夫港口。他們用从森杰地区运来的麻栗木所建造的那些巍峨大厦便是一个証明。有一个商人甚至用了三千第那建造他的住宅。

在商业方面，柯尔曼的地位远逊于法斯，虽然当地有棗椰子輸出哥拉森，靛青运銷法斯，谷物运往波斯灣上的赫尔馬茨。关于塞

斯坦的出产,穆卡达塞只談到棗椰子簍(Zanabel)、棕繩和蘆席。庫希斯坦以毯子、跪拜墊氈及棉麻織物商品著名。易宾·霍卡尔說过,哥拉森最著名的出口貨是来自尼沙普尔和麦尔夫的,后者尤其是織造一切絲綢、棉布及各种幕布的地点。在那里的市場上,还可看到綿羊、駱駝和突厥奴隶;那里也制造象头巾料子、麻布、呢絨、錦緞、羊毛布、外套、細綫这一类的东西。来自尼沙普尔的藍寶石是很有名的。

为了維持这些产品的交換,阿拉伯人曾設置出一种从大商路分出来的精細道路系統。这些道路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到麦加进香的便利;但是,阿拉伯人把貿易和宗教結合得十分密切,所以对其中一項的改进便等于改进了另一項。各省中最著名的道路,是哥拉森大路。这一条路以伊拉克的巴格达为中心,向东北到赫尔文,向东到柯尔曼沙,前行到东朱巴尔的雷,越沙漠到尼沙普尔,經塔斯和麦尔夫,再經布喀拉和苏格第亚那的撒馬尔罕到印度和中国边境上。上面所提的几个城市——柯尔曼、雷、尼沙普尔、麦尔夫和布喀拉——是通达其他城市的支路之交点。

关于巴格达哈里发国家的工业,柏吞写道,“各种行业在各自的首領(政府对于他們是管制不多的)之下,分为若干行会和工业集团。它們……管理各个行业,奖賞勤勞者,处罚狡詐者;正象今天我們在开罗还看得到的那样,他們有作为个人为其成員申辯的义务。”

巴格达哈里发国家的工业活动,和它的农业生产与商业企业,并駕齐驅。对于制造金屬和紡織花样繁多的織品,它具有特殊的专长。各地的棉花产品以及摩苏尔、阿密德和尼西柏所制造出来的麻布,聞名于全世界。高价的紅色和黃色“摩洛哥”皮革,也同样出名。巴格达城以珠宝、金銀花瓶、陶器、綉品、絲綢等产品著名。东北方的斐加那輸送大量生鉄到巴格达来。从柯尔曼,沿着波斯湾,运

来熟铁以及武器和盔甲，而这些东西有着很大需要。宝剑是从叙利亚运来的，但大马士革的宝剑在较后期才出名。现在，从所找出的遗迹来看，穆罕默德教徒在炼钢方面曾达到高度的优良技术。

关于织布业，各省有着自己的特征。在伊拉克，有很多东西，用羊毛、棉花和驼毛制造出来的。柯尔曼出产很精美的布匹、头巾料子以及边饰美丽的头巾。巴格达在织品方面变为这样出名，以致其他省分制造赝品，来冒充巴格达丝绸或棉布出售。南阿拉伯半岛，象在后来的时期那样，以锦缎、麻布和丝绸出名。在亚丁，制造并输出外套。棉花、丝绸或麻布用在缝制漂亮衣服，而羊毛和驼毛大多用于制造粗糙的外套、大衣、毯子、帷幕和被单方面。

缝制这些服装的料子总是很美观的；阿拉伯人之所以重视精巧手艺，是因为古兰经推荐它作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在这方面，东方的成就是卓越无比的。阿拉伯人对这种美观衣料的需要，起于亚洲人爱好文雅和仪表漂亮的旧风俗，起于波斯人嗜好闪闪发光的颜色、漂亮衣服和黄金色；所有这些风尚，阿拉伯人在和这些民族的接触中感染了这些喜好。这项需要的另一原因，是宫廷中奢侈风气的日增。衣服越来越昂贵，而当时还流行着那种波斯旧风俗：统治者在举行隆重典礼时，应以皇家衣袍赐给王公大臣，而这些衣袍的价值应相称于王公的官位；此外，赠给大使的礼物一般也是奇珍而又昂贵的。不仅对于哈里发本人，而且对省长和他们的女眷，也赠送礼物。为了使礼物更加珍贵，执政的哈里发把他的名衔用金线绣在或织入所赐的衣袍上。这类事情如此重要，以致设立特别店铺来办理，并委派一个最可靠的王公主管其事。库昔斯丹的一个省长设立了这类店铺达八所之多。

有钱有势的阿拉伯人，不仅穿着昂贵的服装，而且用真正的东方奢侈品来布置他们的住宅。所以，除了织造服装料子外，织机上还需出产大量帷幕和毯子之类的笨重产品。库昔斯丹的塔斯太城

出產有特別藝術性的掛布和帷幕，綉着金綫人物象。據說，塔斯太城曾供給麥加城卡巴廟的帷幕。

關於東方毛毯編結的歷史，我們知道得很少，除了它在穆罕默德教興起之前已經存在這一事。在第六世紀，波斯薩薩尼朝諸王已有這類毛毯，象在特息斯科斯洛厄茲王宮里那一條毛毯那樣。

然而，伊斯蘭教由於嚴厲禁止一切偶像畫片的緣故，毫無疑問使藝術的表現集中在這個特殊領域里，而又加強起來。它鼓勵在毛毯編結上表現自然界的形象。這些花樣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部族和種族里，逐漸成為常套。有些部族嚴格模仿它們原來的模型發展圖案，另外一些部族轉向純粹幾何畫的形式。後一種，主要在於原來和蒙古人血統強度混雜的部族，而雅利安族則保持常套的花卉草蔓的模型，早些時候，還保持走獸形象的模型……

毛毯編結的藝術，在它傳入城市之前……已在游牧部落中興起。這種工作起初是由婦女兒童們來做的。漂泊的牧人在荒野上牧放牛羊，在帳幕下躺在空空的土地上時，欣賞着到處遍開有如毛氈的花草；這自然風景在春季的幾星期中，形成了一幅奇異的鑲嵌細工；但好景不長，在夏季烈日之下，它們迅即消逝，只剩下一片枯草和塵埃。這一單調的風景，沒有別的景色可以調節；其他的季節中，不是滿地布着干枯褐色，便是一片白雪。可是，這短暫的開花季節，在漂泊於亞洲大草原上的部族的理想里，不失為難忘的一段日子。他們渴望把這風景永遠保持下去，使它在乾燥風塵的日子里，在霜雪滿地的日子里，也能够留在他們的周圍；由於這一願望，他們就用他們周圍沙漠植物，煎出色水，染出五彩的綫，裝飾那些黑駝毛帳幕的粗席……

中世紀阿拉伯作家，盡東方幻想的能事，淋漓盡致地描寫了波斯薩薩尼朝國王科斯洛厄茲的著名“冬毯”。“冬毯”的目的，是要使國王在嚴冬的幾個月里忘掉滿園春色的消逝。當時，他的園丁致力於編結這條毛毯，模擬春季的花壇、潺潺的溪流、紆曲的小路和青枝綠葉的樹木。我們看到後來的毛毯還竭力模仿有溪流、花樹、花壇和小路這一種花園圖案。由此我們可略知這類毛毯的起源。城內居民象草原游牧人一樣，也渴望春天的回來。他們企圖使那轉眼即過的嫵媚季節永遠存在，長駐左右不離。所以，很自然的，中世紀具有高度文明的波斯人逐漸改進了毛毯的編結藝術，直到它們成為手工藝上的真正奇跡，而對後來的一切圖案影響很大。這類毛毯表明了：藝術

和文明同登了最高峯这一事实^①。

制造幕帳跟着挂帷和毛毯的編結而发展起来。幕帳对东方人說是必需的，因为他們常常去麦加城旅行，而且在漫长的旅程中，他們很少宿处。幕帳可用以避日光和风雨；而且輕便而易于携带。其中有的是很奢华的。哈倫·阿尔·拉希德在旅行时所携带的幕帳，是用黑緞制成的。柱子是鍍銀的，环圈是黄金的，繩子是用各种顏色的羊毛或絲綫編成的。幕帳的内部鋪有昂貴的肩巾布。有的幕帳是圓形的，有的是方形的；穷人常用的幕帳有一个頂和两个側面；还有一种式样非常简单的幕帳，仅仅是一方帆布，張在两根柱子之間，作为避日光和风雨的場所。

阿拉伯人随着他們奢侈风尚的增长，逐漸注意珠玉宝石；波斯湾内有采集珍珠的地点，而波斯的山区里出产宝石。他們还使用粉刷术来装璜牆壁和屏风。馬克立西告訴我們，在斯拉的有一所繪图学校，还有两个住在宰相巴苏里家里的画家，他們的作品表明繪图和粉刷术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哈里发国家本土上这些工业的活动，大大地受到外来思想的鼓舞，而这些思想是从有交通联系的外国傳入的。珍珠和宝石来自錫兰；用亚麻造紙的思想自中国傳入。这种工业最早在撒馬尔罕发展起来的。有一时期，东方的麻造紙和西方的棉造紙有着很大的竞争，虽然麻造紙直到十三世紀上半期才輸入欧洲。当然，在很早的时候，关于桑树和养蚕的知識，已从中国傳入。桔子、檸檬、甜瓜、稻子和靛青，最初是从印度来的。

哈里发国家另一种自然产品是香水，那是用阿拉伯和波斯的香草、花朵和水果制成的。还有玫瑰油和芹菜、柳兰花、素馨和甜瓜等油。阿拉伯以产乳香和沒药出名。穆罕默德教徒还以他們的

^① 《活的时代》杂志，1925年11月14日。

蜜糖、蜜漬果脯出名。其中最基本的是农业——种植甘蔗、番紅花、指甲花(专供制造化妝品的)、棉花、亚麻和桑树。棕树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为阿拉伯人把它看作上帝的一种礼物,而这种礼物只賜予信徒。这些地方的居民很喜欢种植葡萄、花草和果树的花园。他們知道怎样生产各种品种的水果、香味葡萄、形状异常的桔、梨。他們懂得怎样接枝和接芽。他們通过玫瑰和扁桃树的杂交,长出稀奇美丽的花卉。而且,他們知道怎样訓練良馬、飼养小鳥、鴿子和家禽。

“巴格达繼承了巴比倫、塞琉息亚和特息丰各古城的光榮傳統。巴格达看来真象一座地上天堂:它位于阿巴斯帝国最富庶地区的中央;由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及其无数支流很好地灌溉着;四周有花园环绕着,在那里既有自然风景又有巧夺天工的设计;此外还有水陸两路与外界密切地相联系……在城中之城内住着数以千計的王公大臣;哈里发宫殿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庭院寬广,寺院聳峙;周圍林立着那些依靠供应宫廷奢侈品来維持的各行业街区。河东岸上,有时髦的住宅区,埃耳·馬第所造的宫殿,巴米賽大族的宅邸和花园。数不清的寺院尖塔象高高的塔心草般地高插云霄。”^①

巴格达历史,从那豪华放蕩、揮金如土的王家浪子哈倫·阿尔·拉希德时代(763—809年)到蒙古人劫掠巴格达城止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記載着几乎神話式的富饒和非常繁荣的状况。

由哈里发亲自督察而管理良好的进貢和納稅的程序,国内河流和灌溉运河网的密布、附有棧道、桥梁、商队宿舍的公路系統以及使用乘馬信使的驛站制度;这一切使它(巴格达)能够把外界的財富源源不絕地吸收进来……在鉄一般的行政管理下,农业和商业,即国家繁荣的两个砥柱,必然会欣欣向荣的。由于科学的运河制度和从古代留傳下来的灌溉工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成为“凱密”,即“黑地”(埃及)的競争者。在那里种田的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获得利潤,不象那些純粹靠天吃飯的人們,必須依靠变化无常的雨水。

^① 柏吞:《天方夜譚》,第10章,第167頁。

广大矿场的遗址证明：公共富源没有被忽视；航运法律鼓励了运输和交通；捕鱼的命令，旨在发展阿拉伯人的一项新的实业部门。黄金从世界各地的源源流入、豪华奢侈宫廷的存在，以及那样一个文明所需要的新艺术和新工业曾给予贸易和商业、制造业和手工业，以实际的鼓励①。

在萨第的《花园》一书里②，我们看到一幅出色的图景，描写在哈里发国家盛世一个巴格达商人的广泛兴趣。

我认识一个商人，他有一百五十头驮货的骆驼，四十个跟从的奴隶和仆人。有一天晚上，他在波斯湾凯希岛上他的住宅内招待我，我们接着谈了一整夜；他说：“在土耳其斯坦，我有这样一个货栈；在印度斯坦我有那样一批货物；这个某某大庄园的抵押契单；那个是某某个人商号的债券。”接着他说，“我想到亚历山大城去，那里的空气，对健康是有裨益的；但不能办到，因为地中海并不安静。啊，萨第，我想再作一次旅行。这个愿望实现以后，我就从此退隐，不再经商了。”我问道：“什么旅行呢？”他答道，“我准备把波斯的硫磺运到中国去卖，据我所知，硫磺在那里，可以售得高价；然后我再把中国的陶器运到希腊；把希腊的或威尼斯的锦缎运到印度；再将印度的钢带到阿勒波；把阿勒波的玻璃器运到也门；然后带着也门的条纹衣料，回到波斯。此后，我将放弃国外贸易而退居于一所大商店里。”

叙利亚和埃及一样，主要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披着伊斯兰教文明的外衣，这一件外衣在叙利亚内地比在沿海岸要厚得多。叙利亚所感受的政治上的变迁——十世纪叙利亚在一个地方王朝统治下脱离巴格达国家而独立，十一世纪埃及法提马王朝统治它，继在1086年塞尔柱土耳其人推翻法提马朝统治而占有它——对它的商业繁荣，影响很少。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东方或内地叙利亚和西方或沿海叙利亚；在沿海区叙利亚人口比较稠密，还加上了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在内地，主要城市有：北部的阿勒波和南部的大马士革；在沿海还有安提阿、太尔和的黎波里各重要城市。

① 柏忒：《天方夜谭》，第10章，第173—176页。

② 萨第是波斯诗人，生于1134年。《花园》(gulistan)是他的最著名的作品。——译者

阿勒波位于一个众山环抱灌溉充足的平原上,濱沙漠边缘;从远古以来,它就是从波斯湾到幼发拉底河的商路,和来自中亚队商路之集合点;貨物都从那里轉运到地中海各港口。十世紀中叶以前,阿勒波隶属于巴格达哈里发国家,但在948年,被一个地方王公所占夺。他的竞争者請求拜占廷干涉;因而在961年,在短期内它被羅馬帝国占領。但甚至在帝国退出之后,拜占廷商人在阿勒波仍保有商业上的特权。在双方所簽訂的条約里,有一項条文規定:保护那些在阿勒波經商或偶然經過阿勒波城及其領土的希腊商人。希腊商人在阿勒波境內不受騷扰;希腊队商从希腊領土轉入穆罕默德教領土后,給予充分护卫直到他們抵达阿勒波城为止。列在应課稅貨物表上的有黄金、白銀、希腊絲、生絲、錦緞、棉布衣料、麻布、宝石、珍珠、牲口等等。从这一条約,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为商业中心的阿勒波的重要性。它是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也是队商从小亚細亚和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巴格达、波斯和印度的一个集合地点和在地中海和亚洲內地之間的一个停留站。阿勒波在十二世紀曾三次被毀于地震(1114、1139、1170年),而三次重行建造;在十三世紀它曾两次被蒙古人破坏(1260、1280年)。

大馬士革比阿勒波更大,位于叙利亚灌溉最充足的平原上。的确,它是这么富饒,这么秀丽,以致初到那里的阿拉伯人看来,它几乎真象一座地上天堂。大馬士革正象阿勒波一样,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重要商路縱橫交会之处,而且从辽远的历史时代以来就是一个大商业城市。如上文所說,它是穆罕默德教政权在阿拉伯半島以外的第一个首都;甚至在哈里发国家的首都迁到巴格达以后,大馬士革还保留着它的重要地位。它很早脫离了巴格达而落入埃及手里。大馬士革的鋼在十字軍时期馳名于全世界,但大馬士革的布匹的名气也不遜色。大馬士革与埃及的貿易很盛,尤其

是在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的时期。它也有自己的聪明而又辛勤的工人。他们织造各类的丝绸；所出产的金线绣缎织造得非常好，仅次于伊斯巴罕和尼沙普尔的出品。它的蜜餞和染料也是著名的。它是为到麦加去的队商而设的主要供给站。在这一方面大马士革胜过了近东任何其他城市。

阿勒波和大马士革作为内地城市来看，是面向东方的。但安提阿和的黎波里是地中海城市。安提阿，位于风景秀美、土质肥沃的奥伦梯河平原上，它不是一个海口，但邻近海岸。它位于两条商路的交叉点上：一条是从幼发拉底河到海岸的重要商路；另一条是在黎巴嫩和安替力巴那之间广阔盆地上的商路，经过西里西亚大门而达小亚细亚。安提阿是拜占廷和伊斯兰教间争夺得最激烈的一个城市。

从 638 到 969 年的时期，安提阿是在穆斯林统治之下，从奥米耶朝经阿巴斯朝到法提马朝，直到 969 年皇帝奈斯波拉斯·弗卡斯卡克服它为止；而在 1081 年，正在十字军开始之前，它又落入塞尔柱土耳其人手里。在这四百年时期中，安提阿的历史，是一段衰败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地震破坏了城市，而拜占廷和波斯间以及拜占廷和伊斯兰教间的长期战争，又使它周围的乡村遭受蹂躏，程度十分严重，使得农村居民回到半野蛮的状态。匪徒，甚至狮子，侵扰了道路，以致它和阿勒波与幼发拉底河的交通路线受到损坏。另外，必须记住：安提阿不在沿海岸，只依靠着圣西缅小港，所以它从来没有从地中海沿岸贸易获得了多大利益。

在阿拉伯占优势的整个三百年时期中，两帝国（阿拉伯和拜占廷帝国）间的和平时期是很少的，因而交通是困难的。事实上，在较早时期，是有一条宽广的备受破坏而无人占据的地带，通过阿拉伯属叙利亚和“拉谟区”即小亚细亚之间。拜占廷船只驶入罗马海的沿岸的几个协议的港口……在这些世纪中，由于安提阿的从属地位，我们不可能作出任何有关的叙述。历史

家很少提及它，我們的資料大部是从阿拉伯地理家和旅行家得来，而他們所描写的是这地方的自然形势、它的貿易和物产……商业是相当活跃，也有少数新工业傳入。甘蔗从波斯傳入，种植于沿海岸上；在十世紀，桔子也从印度傳入，桔树林种植在安提阿周圍及其他城市里……紡織业在全境內都很活跃，因而阿拉伯文“安提阿”（Antakiya）这一名詞，获得了“被单”或“毯子”的意义。織造絲綢及其他貴重衣料的技术，已經有了高度的发展；并已能制造棉造紙，此外，在戴克里先时代已首次提到过的一所兵工厂，还繼續存在……不論对阿拉伯和拜占廷文明各自的优点所抱的見解如何，几乎无可置疑，它的地位，由于一个稳定政府的建立（969年），已有所改进，因为在前些年代里这个城市曾遭到各部族的冒險傢伙輪番的劫夺。然而，从人口的性質（利凡得人种族混杂，他們略知希腊文，但更熟悉阿拉伯文，他們信奉基督教，但浸沉于粗俗的迷信和聖跡的崇拜）来看，也談不上有什么复兴的①。

十一世紀后期，当阿馬斐和威尼斯商人开始常到圣西緬港口的时候，安提阿开始复兴。到了十字軍东征的时候，安提阿又变为一个重要市場了。

太尔位于突出海面的峻峭地角上。因此，它在穆斯林統治时期較之安提阿繁荣。在它的旧工业之外，又添加了制糖业。但它的商业因有海盜的騷扰而遭受損失，直到奈斯波拉斯·弗卡斯在十世紀后半期，由于征服克里特和塞浦路斯而恢复了拜占廷海权为止。在下一世紀，阿馬斐、威尼斯和比薩商人的来临，进一步帮助了太尔的复兴，而在十字軍的前夕，它已是“一个风景优美、工商业兴盛而財富富足的城市”。正是在叙利亞港口，西欧人首次接触到砂糖。砂糖在出口品的地位上，几乎和絲綢相匹敌。絲綢制造业，由于获得种类繁多的染料而有所提高；紫色染料来自海里，而茜草根和靛青植物則在奧倫梯河流域培植。

亚美尼亚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之北，向北延伸到高加索和黑海南岸，向西延伸到小亚細亚和希腊帝国。阿拉伯人和这一地区，有

① E. S. 鮑徹：《安提阿簡史》。

着广大的貿易。境内虽多山岭,但它的河流盆地是很肥沃的。山中出产木材和金属。养羊是一项重要行业,而貿易上对亚美尼亚羊毛的需要是很大的。象在古代那样,亚美尼亚一般通过幼发拉底河,来供应美索不达米亚的食粮。得比尔是亚美尼亚省的主要地点;它所产的大部羊毛,是在那里进行加工的。著名的紫色地毯就是用这里的羊毛制成的。这种颜色是从常见于阿拉拉特山周围的一种虫得来的。

兰恩省,即现在的乔治亚,位于亚美尼亚之东,靠近里海。它的首府是梯弗利斯。在这里,大规模地进行养蚕。这一省通过伏尔加河与里海北岸的斯拉夫居民貿易——主要是同喀扎兒人及保加尔人(他们住在喀扎兒地区之外)貿易。这些部族是独立的,但受到阿拉伯人的商业影响。他们有着几个城市和某种政治組織,从事农业,同北方和东方居民并与波罗的海区有广泛的貿易。

埃及在 866 年脱离了巴格达哈里发国家;在 969 和 1171 年之間受法提馬朝的統治。从阿拉伯征服后 330 年时期中,埃及人口的混合过程进展迅速,产生象今天这样的埃及人;穆斯林占人口中的大部分。在早期良好国君的統治下,埃及的人口和商业都有所增加。

《地方志》(雅庫比所著的一本地理書,約在 891 年出版)告訴我們說:在那个时期法斯塔特約占亚历山大城面积的 1/3;亚历山大城是埃及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上埃及的阿士曼納,以大规模織布厂著名,提尼斯以織布和金綫綉花著名,亚历山大城、达米伊塔(达馬亚特)和沙塔以錦緞和金綫綢布著名,法雍以帆布著名,息烏特以毛毯著名,阿克民以草席和皮制品著名,大哈以陶器著名。在那个时期,象在古代一样,埃及的大宗出口品是谷物(麦子),主要是运往汉志去的。①

这新王朝的权力,在十年以内,扩充到叙利亚;现在埃及的版

① E.W.雷因:《中世紀时代的阿拉伯社会》。

图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細亚延伸到巴尔加^①。这新政权的創始人，阿默德·易宾·图倫是一个賢明而又有才干的統治者。“尽管需要大量經費来支持他的宏偉計劃和豪华建筑以及他的宮廷浪費，他不仅沒有提高賦稅，反而取消新稅；他提倡农民占有土地制，用近代術語來說，即自耕农制。所以他的进款与其說是从勒索，不如說是从改进农业得来的。他給国庫遺留下一万第那。”埃及所达到的富饒和繁荣程度比以前要大。然而，这种繁荣表現在商业方面的比在农业方面的多。阿拉伯人，作为农民来看，从来沒有有什么了不起，但作为商人来看則一向是出色的。这一事实，我們从他們农业的衰敗上看得出来；阿拉伯人对农业以及农业亟需的灌溉制度的毀損，是漠不关心的。地稅的减少，也可說明这一点。

但是，埃及这种农业的衰落，从法提馬朝时代的商业和工业的大量发展，获得了部分的补偿。国家的物質財富增加得駭人听闻。有一位埃及公主，死时遺下五袋綠柱石，其他宝石不在其內，此外，她还遺下三千只銀器、三万方西西里綉品、九十只水晶瓶。另有一位公主，临死留下一万二千件絲綢衣服。埃及的織品、玻璃和陶瓷品傳遍全世界。福斯塔特所制的陶器的透明程度，使一个人能透过它看見自己的手。开罗和亚历山大城所織的絲綢如此細密，以致整个一件衣服可以穿过一只指戒。阿塞厄特織造头巾布，貝特尼薩制造白色呢絨，达米伊塔成为斜紋布的名称。

然而，法提馬朝不能长久維持在868年和969年間所获得的優勢；在这时期，埃及舰队把西西里和非洲沿岸控制在它的勢力之下，甚至侵掠摩尔西班牙的沿海岸。但在此之后，埃及的商业和造船所都衰落下去。埃及和非洲各地間的联系瓦解了。叙利亚企图叛离。965年的时疫已使埃及受到大損害。而在埃耳-哈金时代

^① 巴尔加(Barca)在北非洲，位于的黎波里之东。——譯者

(996—1021年)尼罗河又連續三年沒有泛濫。另一灾难,是国王的瘋狂行为,他的暴政竟至封閉市場和驅逐商人出境。1025年,尼罗河又一次沒有出現泛濫,所以国家在貧困和暴政的夹攻之下,走到毀灭的邊緣。“公牛价格漲到每头五十第那,还必須严禁宰牛,以防灭絕。馱物駱駝很少,而作为埃及人普通食物的家禽,却連找也找不到了……老百姓由于飢餓而生病以至死亡,壮者变为盜匪,搶劫队商,甚至朝拜圣地者;道路上盜賊充斥……国庫空虛,賦稅拖欠,奴隶暴动。”^①

后来,埃及从虐政和天灾里获得了轉机。1046年,有一个旅行家,在埃及看到繁荣和安宁景象。有魄力的宰相厄尔-雅苏里(1050—1058年)大胆采用了改进农业的措施:他禁止小麦的投机交易,取締高利貸者的可恶行为,即买进谷物青苗与屯貨居奇勾当。不幸,这些措施遭受阻碍;1050年,尼罗河的汛信又未至,而时疫和飢饉还接踵而来。1055年埃及政府曾企图从克里米亚購買二百万蒲式耳谷物,但拜占廷政府坚持要和埃及簽訂攻守同盟来反对巴格达哈里发国家作为一项条件,因此,这計劃作为罢論。这正是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巴格达得勢(1058年)的时期,也是十字軍东征的前夕。但是,更大的灾难,方兴未艾。在七年的长久时期中(1065—1072年),尼罗河沒有出現过一次泛濫。于是,1025年的混乱局势重演起来,并延續了好多年。土耳其和黑人队伍喧变起来,它們的散兵参加了普通股匪;沙漠中的貝督英人又来侵扰边境。开罗和福斯塔特的接济被割断。水壩坍倒或被破坏。飢饉到处流行。乡村中已看不見一头家畜。在哈里发可容万匹馬的厩舍里,只剩三匹馬了。街上行人时遭暗杀而被吃去;人肉甚至公开出售。連最富的富翁也变为穷汉;他們出售珠宝、家具、房屋以换取

^① E.W.雷因:《中世紀时代的阿拉伯社会》。

食物。当时有三个总督充当浴室堂倌。宅邸和宮殿遭受洗劫；所有珠宝、器皿、絲綢、家具、貨幣都永远散失。藏書十万卷以上的王家圖書館被毀，而这圖書館是代表伊斯兰世界的智慧的。這項損失，仅次于第五世紀亚历山大圖書館被毀的損失。埃及居民紛紛流亡出境，那些最富的家族都迁往巴格达。

最后，在 1073 年，尼罗河回复了慣常的泛濫，因此得到了一次丰收。哈里发因为被土耳其人卫兵逼得走投无路，召来了一个前亚美尼亚奴隶并委派他为宰相。这个人在叙利亚戰爭中已升登高位，并以敌对土耳其的压迫而出名。他恢复埃及的法律和秩序，修建水壩和公路，于是开始征討黑人和沙漠部族（1076 年）。“农夫在他的强大、公平和仁慈的統治下，不久就享受到好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安全和繁荣。1090 年的一个賦稅报告里指出：埃及和叙利亚的稅收，从通常的二百万或至多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一十万第那。”所以，当十字軍开始东征的时候，埃及在政治上是有力量的，而在經濟上是繁荣的。隶属于埃及这样长久的叙利亚，初被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領，后被十字軍占領。這項損失，对埃及來說，实在是“塞翁失馬”。

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和埃及的开罗是穆罕默德教世界的商业首都的时候，正象有关伊斯兰教早期扩展的一章里所提及的那样，商业的企业曾把阿拉伯人帶到天涯海角去。阿拉伯人在他們征服的过程中，接触到希腊、羅馬世界的地理論文；这些論文激起了他們对地理发现和商业冒險两方面的兴趣。阿拉伯人的地理著作是中世紀文学的一个重要部門。但是，更可奇怪的，是阿拉伯人竟然和古代希腊人或諾曼人一样容易地熟練了航海事业。过去阿拉伯航海家还編写了关于紅海和非洲、阿拉伯半島、波斯、印度海岸的許多引水手冊。

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出现了一类新的探险家……他们寻找新的商业航路。现在，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关于这批探险家及其商业冒险活动的奇异成绩。在海上主人翁甚至陆上主人翁中，所有曾经指挥各民族命运的海陆军优势，再也没有象阿拉伯人的优势那样，在地理探险领域中，如此遍布着的。全世界就是他们所探险的全世界。他们的船只远涉重洋来寻找新航路，甚至象他们的哈里发在陆地上开辟新通路一样；而他们所有这些活动的根源，在于闪族的商业本能……伊斯兰教的宝剑威力，只是为奴隶主和商人打通道路来跟随着走而已……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阿拉伯人在亚洲、非洲和西欧迅速展开的征服，更可令人惊异的事件了。甚至在英语中，至今还存在着阿拉伯海员所使用的航海名词。我们的“海军司令”（“Admiral”）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海上司令”“Al-mir-u1-bahr”的来源以外，或者我们的“船舶”（“Barge”）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战舰”（“Barija”）的来源外，还有什么来源呢？①

下面我们将开始综述穆罕默德教在北非领地的状况。

第十世纪，法提马朝在占得北非沿海岸上优势之后，再向西推进，而到了公元991年，所有北非沿岸，远至摩洛哥止，都并入他们的版图。在进行征服的时候，西方的阿拉伯领土，包括北非海岸和西班牙在内，叫做“马格勒布”或“西方”。后来，“马格勒布”这一名词，用以指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而“伊夫力基亚”用以称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为了方便起见，非洲领土可分成为：（一）非洲本部，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直到塞替斯；（二）摩里得尼亚，包括费兹和摩洛哥两省；（三）内地。

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商业是尾随宗教而到的，因而非洲能恢复它古代的繁荣状态。内地是一片炎热的沙漠，但沿海地区是肥沃的。牲口饲养业到处兴盛，因而埃及从这一地区，每年获得大量羊、马和牛。巴尔加输出小麦。再向西并在亚特拉斯山脉之北，位着伊斯兰教的最富饶地区之一。农业伸展到辽远的南方，上至亚

① 霍耳狄奇：《印度的大门》。

特拉斯山脉雪水所灌入的河流盆地。农田通常种植着甘蔗和棉花，到处都种植枣椰子；在这地区内，用力少而出产多。山岭出产木材，还蕴藏着银、铁、铜各矿。阿拉伯人比伽太基人更懂得怎样利用这地区；后者因为在那里找不出矿苗，曾往西班牙去寻找贵金属。

到了第九世纪，非洲的穆罕默德教徒，因占有西西里、撒地尼亚、科西嘉各岛，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商民族；他们发展了海权，并希望使地中海成为穆罕默德教的内湖。跟着，发生了他们和意大利与南法沿海城市之间的激烈战争；在阿马斐、比萨、热那亚各城舰队的兴起之前，在诺曼人逐出阿拉伯于西西里（1060—1090年）之前，优势属于穆罕默德教徒方面。非洲沿岸上的突尼斯、波那、布吉亚、奥伦、修达和丹吉尔各港口，有着相当大的进出口贸易。这些港口，是非洲产品的仓库，也是转运到西欧去的亚洲商品之集散地点。在这里，叙利亚和埃及商船以它们的船货交换西班牙和西西里商船的船货。伊伯里安半岛被卷入阿拉伯文明和商业圈内，而摩洛哥是深切感受到这项密切关系的好处的。它的首都费兹，对那些从西班牙放逐出来的人们，提供了避难所。这批难民把塞维尔和哥尔多华的各种工业技术传入这里，其中包括把羊毛和皮革染成红色和黄色的技术；因而费兹成为很兴盛的皮革市场。那叫做“费兹”的无边红色帽子，就是在这里起源的。费兹的染色、肥皂和香油是闻名的，它的金属器也同样闻名的。

在以后几百年中，由于政府统治的稳固，很少发生战争，因而在非洲和意大利与南法城市之间存在着互相友好的关系。柏柏尔人需要欧洲的很多产品，而欧洲国家也是他们很多剩余产物的销售市场。所以，通商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南法或意大利城市，时常同北非和西班牙的统治者，缔结了这类的条约。

海盗行为，在非洲国家所订的通商条约里，一向是明文禁止的；然而，海盗行为照旧继续着，而基督徒所干的最为顽强。希腊人、撒地尼亚人、马尔

他人和热那亚人，象条約本身所証明那样，是海盜帮会中的最坏的傢伙。在十字軍的刺激下，商业的增加引誘了这种冒險行为①。

在 893 和 911 年之間，非洲各省脫离埃及統治，象埃及本身曾脫离巴格达的統治那样；它們組成了独立国家——巴尔加、的黎波里、突尼斯(开温)和馬格勒布(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古代努米底亚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是驍悍成性而不受羈絆的。甚至他們的宗教，虽然在形式上还是伊斯兰教，但实际上已脫离了正宗的穆罕默德教。从来沒有过一个哈里发，有足够力量来統治这整个区域的。其中以开温为最强。

开温位于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緣上，那时住在沙漠边緣上的人口比今天要密，所有的綠洲比現在还多。阿拉伯历史家易宾·卡尔頓的著作是“在阿拉伯文学中独一无二的历史杰作”；書中記載說：在穆罕默德教征服的时期中，“茫无边际的丛林，散布在的黎波里和丹吉尔之間的广闊地区上，在它的蔭影之下，兴起了互相接連着的小村落。”但今天，这块土地已变为沒有树木、几乎沒有青草的平原，在那里常可看到，古羅馬油坊的殘破遺址，而現有人口不到从前它所能維持的人口的 1/10 了。

阿拉伯宗教和商业影响之从东海海岸滲入非洲的中心，是很緩慢的。但是，这些影响从地中海滲入时却并不緩慢。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伽太基曾同撒哈拉沙漠的黑人地区和奈格耳河区，建立貿易联系。但我們不能断定：伽太基商人曾否越过沙漠到那里；这些商人是不是来自乍德湖地区的本地人；努米底亚人和柏柏尔人是不是中間商人。据布尼克人的傳說，有过一个叫作加拉曼德的部族，帶了一些馱着东西的公牛，穿过了撒哈拉大沙漠；我們还有公元第二世紀的一段羅馬銘文，指出碎金、象牙和駝鳥羽毛从中

① 兰·蒲尔：《巴巴利海盜船》，第 7 頁。

非洲輸入了羅馬屬非洲省。但是，我們关于撒哈拉和苏丹历史的真正知識，是从阿拉伯对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馬格勒布的征服以及駱駝的来到开始的。

阿拉伯人在征服地中海沿岸后不久，就开始伸入沙漠腹地。斐贊王国^①是在徙志节后五十年內征服的。我們有确实的資料知道：斐贊人在第九世紀后期，和科华进行貿易；不久商路从科华延长到乍德湖。但是开温因有过通突尼斯与波那达地中海的出路很快在乍德湖商路上和的黎波里相竞争，而且，在第九世紀末期前，还在更西的地方，开辟了一条新路，穿过撒哈拉沙漠达奈格耳河弯曲处的桑盖。

开温成为阿拉伯人軍事、宗教和商业扩展的主要基地；他們深入并穿过撒哈拉沙漠，和中苏丹人有了接触。这项成就，按重要性說，堪与諾曼人把北欧国家提到历史舞台上之功績相提并論。阿拉伯人第一次把中非洲(苏丹)和地中海与欧洲取得密切联系。只要記起：撒哈拉沙漠連同它的火热的沙上、山脉、多石高原和分散綠洲在內，按面积比美国还要大这一事实，我們就可領会这项功績的偉大性。我們看到：在第十世紀，另有一条跨越沙漠的道路，即“西方大路”，从摩洛哥經奧杜卡斯特达廷巴克图。这样，就有三条穿过撒哈拉的貿易动脉了。东方和西方两条路标志着沙漠的最狹部分，因为在每一条路上，那肥沃的沿海地象长舌般地伸入这干燥地带內。但那从开温起点的中間一条路是很长的。这些商路的路綫，几百年来都是由綠洲和水井的位置来决定的。甚至战争也沒有把它們抹去。在綠洲上，有着商队寄宿所，同时也有休息所和儲藏所。这些沙漠大路的长度真使人吃惊：約有一千五百哩、一千八百哩和二千哩。貨物从乍德湖或廷巴克图运到海岸上，需时九个

① 斐贊王国，在北非的黎波里之南。——譯者

月。貿易的項目包括：奴隶、碎金、树胶、兽皮、象牙、天然碱、鸵鳥羽毛(使突尼斯奇怪的是有一次竟运来一头长頸鹿)，用这些商品来交換食盐、棗椰子、珊瑚、絲綢、香料和沙糖。在十字軍东征时期，还有由阿拉伯商人从巴勒斯坦运来的鎧甲衬衫轉运到苏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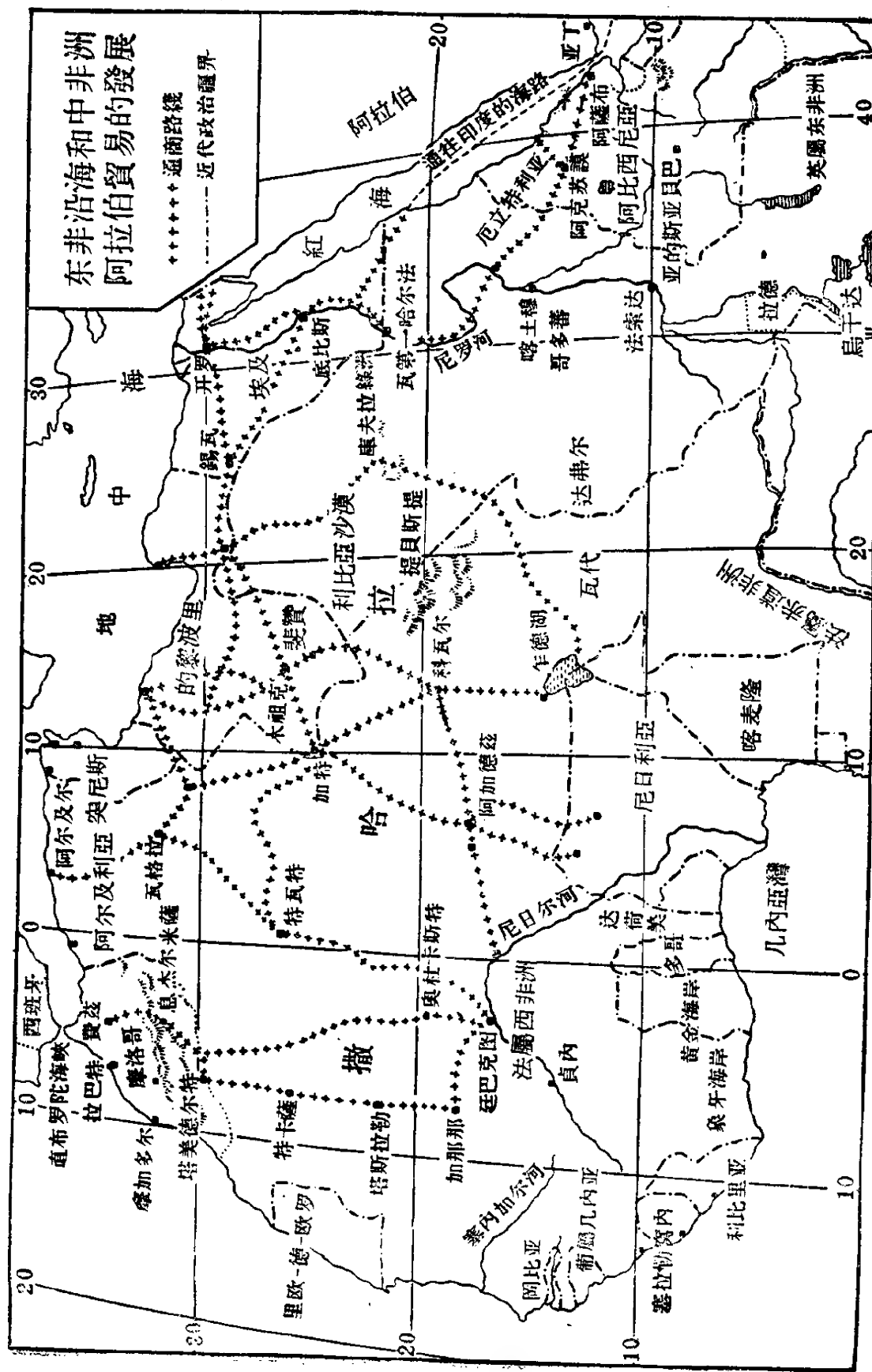
必須清楚知道：苏丹过去不是，現在也不是沙漠地。苏丹的气候分为两个季节：七个月的干季和五个月的湿季。在湿季里，下降的雨量充沛，注入当地的河流：奈格耳河、巴勒加扎尔河、沙立河和塞內加尔河。在这广大无边的地面上，黑人和似黑人的居民，那时和現在一样，也不同于住在更南的較低級的种族。豪薩族人^①住在用泥牆圍繞的市鎮里；他們基本上是牧人；他們的工业，是基于牧养牲口和山羊业的，例如，硝皮和制革业(为了这項目的，他們使用一种本地产的植物紅染料)。他們也織造一种粗糙而优美的布匹，用本地产的靛青来染色，在的黎波里、費茲、突尼斯和开温各市場上出售。“当穆罕默德教商人約在公元 1000 年来到苏丹时，他們看到一种井井有条的商业制度”——豪薩文化——阿拉伯人把自己的文化盖在豪薩文化的上面。“自从有历史記載的任何时期起，苏丹的北方一带已由比似黑人較高級的种族所占据着。当阿拉伯人在公元第八和第九世紀，經由西方路綫，第一次达到黑人区的时候，他們看到加那黑人国王正是在他們的极盛时期。”^②

阿波的·哈金死于 870 年；他是第一个提及“黑人区”的穆罕默德教作家，但是他沒有关于黑人区的知識。約在一百年以后，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易宾·霍卡尔，关于黑人区还是知道得很少；这足以証明：阿拉伯人的滲入那里是在公元 1000 年以后。

易宾·霍卡尔死于 968 年。他逝世一百年之后，在 1067 年，有人写出了

① 豪薩(Hausa)族，住在尼日利亚北部的似黑人种族之一。——譯者

② 威加德女士：《一个热带屬国》，第 84 頁。



一本書，書中的描写生动，和易宾·霍卡尔的枯燥描写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書名一般譯作《道路和王国》。他叙述整个北非，但关于“黑人区”，叙述得特別詳細；所記載的直接的知識足以指明和苏丹交接的发展……埃耳·貝克里出生的正确日期是可疑的，最权威的說法是在 1028 年……埃耳·貝克里的記載，显然可見：苏丹和西班牙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貿易，在长时期內都是重要得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兴趣的……塔非勒特，即阿拉伯人所知道的并經常說及的“息傑尔米薩”，是在到苏丹去的道路上离开摩洛哥肥沃領土的最后一个站……据埃耳·貝克里所說，这市鎮是在公元 757 年建造的。他說，它位于平原上几条溪流的交接点上，在那里，土壤充滿着食盐，而且非常肥沃。居民种植谷物，其中有“中国麦”……那里还盛产葡萄、枣椰子以及各种水果，此外，它还以制造葡萄干出名。有着一种金币，很奇特的是息傑尔米薩金币的收付，是按照数量而不是按照重量的……息傑尔米薩……是許多条道路的汇合处：这些道路，有的来自瓦吉倫以及巴巴利国家內苏丹貿易的市場所在的其他地点；也有来自摩洛哥、特倫坎和沿海岸的。这市鎮由于有着这些道路的交通綫，成为到沙漠去的最西入口处。在“黑人区”，从息傑尔米薩到加那止，需要約两个月的跋涉，来横过实际上渺无人烟的沙漠……他說，沒有市鎮……除了距息傑尔米薩有五天路程的瓦德·特拉①。

在渗入中非洲的同时，阿拉伯人也沿东海岸經由海路，从大陆的海湾，扩展他們的势力直到哥連德角（南緯 24 度 4 分）。紅海与波斯湾都是入印度洋的出口；它們成为这项扩展的基地。波斯湾內的巴林群島以及那些引入紅海的亚丁島与湾內的索哥德拉島都是路上的重要海軍和商业站。馬加多克索、布拉瓦、索发拉、最重要的啓尔窩（就是，后来葡萄牙的魁罗阿）、蒙巴薩、彭巴、馬飞阿、哥摩罗以及莫三鼻給都因此而建造的。貿易的項目是：奴隶、碎金、象牙、树胶、龙涎香。阿拉伯人向內地推进到多少深，是一个可疑的事件。有些作家把建造罗得西亚的神秘遺迹，归功于阿拉伯人。馬达加斯加是否由阿拉伯人发现，也是一个問題。在那里，找不出什么中世紀居留地的証据。莫三鼻給海峡的激流及哥連德

① 盧加德女士：《一个热带國》，第 16—17 頁。

角外的可怕波浪，也許阻止了阿拉伯航海家这样远距离地出海航行。

阿拉伯人伸入亚洲大陆和伸入非洲一样，从陆路（中亚細亚和印度）也由海路进行；他們的双重热忱，宗教的和商业的，引导他們几乎到天涯海角去。

我們將先叙述阿拉伯人由陆路伸入中亚細亚的历史，而后再描写他們由海路向远东的扩展。上文已說过，阿拉伯人在征服波斯与叙利亚以及建立巴格达哈里发国家时，已控制橫貫亚洲的大商路，而这商路的最初历史在古代已經散失。早在亚历山大帝时代，通印度的产棉区和中国的产絲地之道路，已經开辟。这一条路以美索不达米亚为起点，越环繞西波斯的崇山峻岭——拔海五千呎——經雷、尼沙普尔、麦什特以及麦尔夫的富庶綠洲、布喀拉、撒馬尔罕，达喀什噶尔；最后两地在711和714年由伊斯兰教征服的。这一地区在中世紀比在今天灌溉得好些。从第八到十五世紀，这些地区是在阿拉伯統治下的繁荣都市。它們的衰敗是从帖木兒时期开始的。

从麦尔夫或撒馬尔罕起，这条商路就分成两条了，干路通往中国，支路折向东南往巴尔克和喀布尔，續往印度去。在撒馬尔罕和喀什噶尔間，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商路穿越两座大山脉而后进入“天朝帝国”，沿和闐（当时富庶的地区，而現在一片沙漠）的南边，緣喀拉科隴山脉的峭壁而行，經喀什噶尔与和闐（城）而达肃州，即中国的极西城市，从那里起黄河流域流入了中国中心地带①。

中国在第七世紀时期，正在极盛时代，由于627年登极的唐太宗皇帝的寬大而又有野心的政策，它和西方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

① 从中国到西方，有着三条路綫：（1）西北路綫，（2）經過西藏的路綫，（3）經過肃州或四川和云南的路綫。第一条路綫，由于游牧族的搶劫，是危險的；第二条路綫，由于需越过高原及无数山岭，是困难的；第三条路綫是最安全又最便利。

以前的时期更为密切。他的首都长安开放给景教徒和穆罕默德教徒。基督教于 634 年由一个景教徒传入了中国；638 年第一所基督教会在中国建造起来。使节源源不绝地从印度、尼泊尔、波斯和拜占廷来到中国；因为在波斯和拜占廷两个敌对国家间的最后搏斗中，双方都曾向天朝皇帝乞援。最后，哈里发奥玛和哈里发鄂斯曼也派使节到中国来。

薩拉森人善于利用中亚细亚的政治局势来扩展他们的版图。在瓦利德统治时代(705—715年)：

在德兰索西阿那，住着伊朗人和白匈奴人(嚙嚙人)的混合种，他们也被突厥人征服……在庫太巴的征伐时期，在德兰索西阿那，出现了穷人对富人的反叛运动。薩拉森征服者，极其巧妙地利用了这两派的分裂……征服法加那所费的力量比征服索格狄亚那要多。这里，薩拉森人和西藏佛教徒相接触，后者新近反叛了中国的皇帝。这些西藏人的队伍越过了南部大山路，来在阿姆河和查克薩提地区掠夺。他们和薩拉森人结成友谊关系，而薩克逊人也在喀什噶尔侦察形势。对薩拉森人来说，控制中国的南部大门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能扼守住一条由东方到西方的新商路。但是那将夺去突厥人的买卖，因为突厥人以前已是中国和西亚间的中间商人，控制着北方大门，并阻止任何别人来控制南方大门。因此，突厥汗遂进行干涉^①。

但是，在这突厥人抵抗的背后，还有中国政府；它决心不让穆罕默德教部族窜扰中国西部省区，象他们涌入波斯、埃及和叙利亚那样。可是，中国不能关闭西方门户。到第八世纪中期，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师从德兰索西阿那、布喀拉和撒马尔罕，大批流入中国西部诸省。到 742 年时，陕西省会建起了一所伊斯兰教寺院。

但是，进入远东的真正“大门”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在海上。象前面一章里所谈到的那样，波斯和中国间商业关系早已存在；在巴士拉港口，常见从中国经过馬六甲海峡、錫兰和印度的馬拉巴沿海

^① 吉本：《羅馬帝国衰亡史》，柏立版，第 5 卷，第 414 页。

而来的帆船。但是，如果中国帆船能冒險航行这么长距离的海路，阿拉伯帆船当然也能这样航行的。

在阿拉伯海岸上，有着一种出海的商人；从古代以来，这种商人已經熟悉印度西岸的港口。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内的西拉夫和赫摩茲开船，沿海而行，达印度河口，再前行抵薩皮拉和卡貝；要不然的話，他們甚至从他們在奧曼的加尔哈特和庫拉雅特的港口，大胆直航到科利庫特及其他馬拉巴海岸各港口①。

他們沿馬拉巴海岸航行到錫兰，从那里他們橫渡孟加拉海湾达馬來群島，并在安达曼群島、新加坡、婆罗洲、爪哇、苏門答腊及中国建立了殖民地。

我們有理由相信：早在公元 300 年时，阿拉伯商人已在广州建立居留地。到了第五世紀就肯定有了，而在第八世紀，这个包括阿拉伯人和穆罕默德教化的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团体是龐大而重要的。700 年时，广州对外商开放，在外商中阿拉伯人一定是首領。758 年时，阿拉伯人和当地叛徒联合一起，燒毀了城市。在 795 年的中国革命之后②，他們主要通过坎富港即現代的杭州③，进行貿易；但为謹慎起見，把他們的主要基地移往馬來半島的喀拉。

在九、十、十一和十二世紀的整个四百年中，坎富的阿拉伯殖民地和中国人間的政治关系，除了将近第九世紀末期一度微有裂痕外，繼續保持着和睦状态。在第九世紀中，阿拉伯在东方的貿易达到了它发展的最高峯。关于这方面，商人索来曼提供了最好的証据。从这个商人的記載里，我們可获得关于中国情况和貿易性質的很多消息。索来曼清楚地指出了—一个事实：中国内地貿易和

① 罗灵逊：《帕提亚帝国》。

② 指黃巢起义。按黃巢起义的爆发是在 875 年，不是在 795 年。原文誤。——譯者

③ 按关于坎富之位置，有两說：一說，是在广东广州，一說是在浙江杭州。孰是孰非，迄无定論（參閱桑原鷺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馮儀譯，商务印書館 1929 年版，第 16 頁）。——譯者

商业在这些年代里是很安全的。他說,除了在国内从每个人按照他所有的财产課稅外,并不从土地征收什么稅;阿拉伯人及其他外人的納稅,和本地人相同。在中国境内,内地来往是不禁止的,但在严密监督之下的。凡是要从一省旅行到另一省的人必須取得护照;护照上注明旅行者所要走的路綫,詳載他本人及其他随从者的情况,并标出他的职业和所携带的現款数額。由于这种精細的办法,商人或旅客的人身和貿易受到了保护;毫無疑問,那是有助于东方和其他国家間的商业关系的。而且,穆斯林人在中国是受皇帝所委派的一个“番长”即法官的管轄,而这法官的权力很大。关稅章程,虽然严格,但公平而又寬大。当商人的貨物到达中国之后,貨物立即提到貨棧內并在那里保藏六个月。其时,对每种商品課以3%到30%的稅,其余的貨物概还給所有人。皇帝一向是保留优先購買权的,但是他付給“最高的代价”,所以“交易立即办好,沒有絲毫不公平之处”。在索来曼的时期,广州的穆斯林居留地的重要性,可从下一事实来判断:“中国当局委派一个穆斯林人負責維持他的教友間的秩序并执行伊斯兰教的法律。在斋戒日子里,他唸禱告詞,背誦古兰經,并为哈里发祝福。”然而,在875年,在中国发生了一次叛乱,商业关系因此大受阻碍。当中国皇帝恢复了政权之后,地方官吏仍橫行不法;由于这种事态的結果,阿拉伯人把他們的总部迁往喀拉。这里,他們运入印度支那的产品,象樟脑、丁香、沉香、苏木、檀香、椰子、豆蔻这一类。在这一世紀里,輸入中国的主要商品,据索来曼所說,是:鉄、乳香、黄銅、龟貝、樟脑和犀牛骨。

在以后的五世紀中,我們看到很多关于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間关系的記載。在十四世紀,易宾·巴托塔詳述:他在中国的极东部分,会見了他的一个少年朋友;这朋友出生于广州而是做生意的。

与此同时,阿拉伯商人也由陆路到达印度。我們看看亚洲地图,就可知道:曾由英国統治过的俾路支斯坦是波斯和印度間一个

联系的环节。这海岸的沿海貿易,也許比陆上的队商貿易要早,但是水陆两路的貿易都是在古代亚述与波斯时代开始的。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块領土,正确地說,它的沿海地带,叫做馬克蘭,而它的內地被称为塞斯坦。这一条从波斯到印度的陆路在穆罕默德教历史的早期,已經开辟。因为商业的推进在公元712年历史性的入侵印度之前,一定已經存在。阿拉伯商人云集在馬克蘭,那里有着良好道路、良好旅舍。河流是用小船搭成桥梁来摆渡的。在同一时期,阿拉伯和叙利亚侨民也居住在塞斯坦。我們可看到:它的古都扎林治的遺迹,散布的面积很广。在平原上,密布着一片雪白的棉花;遍地盛开着紫紅的罌花。山側鋪設阶石,直到山岭;而現在已經消失的运河灌溉网,当时是从山上分配水流的。“有着数不清的运河,并經常有着风和风車。”塞斯坦的貿易能够找得通路;不是通过沿海道路,便是經過橫断陆路;这陆路,虽多困难但可通行,向西北延伸到波斯的麦什特为止。

今天,几乎所有关于这当年的偉大文明的遺迹,都已不可复見。它的破坏,与其說由于战争(虽然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曾干过破坏工作),不如說由于后来季节风向的奇怪轉移;这轉移使这一地区喪失了从印度洋吹来的雨水,使它陷入半干燥状态,即使不是真的沙漠地^①。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穆罕默德教权力在亚洲这种大擴張,阿拉伯地理学家提供了大量原始資料,可資稽考。第一,他們有着引水手册、旅行记、战役記、商人和朝拜圣地者的記載。第二,他們引用了埃及人、科普特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的資料。而且,航海家本身也

① 那些不受人注意的港口,象厄馬拉、格瓦达尔(属于穆斯喀特)、沙巴及查斯克,都曾盛极一时,但是,它們的时代老早已經过去。現在,它們只是印度一波斯間的电綫站或漁村而已。那里的居民是混血的部族,他們依然保存那在尼阿科斯时代以食魚为生的习惯——霍耳狄奇:《印度边疆志》,第315頁。

从过去文明中汲取了很多关于航海的知識。地理学家伊德里西写道，“船主常常坐在船尾楼上，装备着很多有用仪器的船只的船尾”——这些仪器中間一定有观象仪、測深錘、也許还有罗盘針。

穆罕默德教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写了大量著作，叙述阿拉伯人同印度、非洲和中国所进行的貿易情况。《辛德巴德史話》是根据《两个穆斯林旅行家》的遊記和类似的記載，例如米薩·阿尔·杜拉夫(他于 942 年到中国)的記載，編写而成的；还以希腊神話、亚历山大帝的傳說、印度故事以及波斯野史作了补充。那是欧洲《約翰·孟第維尔奇聞录》^①的一个东方形式。辛德巴德所举的地点，已証明为日本(?)、中国、婆罗洲、苏門答腊、錫兰、卡魯滿德海岸和馬达加斯加(?)。阿布·泽伊德的記載，較多可靠性，他叙述 878 年时坎富的遭劫。在第九世紀，易宾·科尔达柏記載印度、錫兰、东印度、中国的坎富、揚子江口和黄河口，似乎还有关于高丽和日本的一些消息，也許从中国商人方面得来的。在同一世紀里，易宾·霍卡尔知道非洲和印度，但还不知道远东。在十世紀中，馬庫第也是这样；他知道波斯、印度、錫兰、从斐加那到里海的中亚細亚、北非和西班牙，但还不知道馬六甲海峽或中国。在十二世紀，偉大地理学家伊德里西，遊历了很多地方并作了广泛的研究之后，定居于巴勒摩的罗哲尔二世的宮廷里，編写了一本关于已知道的阿拉伯世界的有价值的地理書。

但是，在阿拉伯旅行家中，易宾·巴托塔最为著名；他是十四世紀的人，出生于摩洛哥。甚至馬哥波罗也不能和这位不倦的旅行家相提并論。他无間断地旅行了三十多年；两次从大西洋穿过非洲到紅海；四次朝謁麦加城；到过埃及、“圣地”、叙利亚、小亚細亚、君士坦丁堡、俄罗斯——在那里他走到辽远的北方来看午夜的

^① 孟第維尔(John Mandeville)是編写一本著名游記者的笔名。这游記出版于 1357 和 1371 年之間，原文系法文，曾譯成所有的欧洲文字。——譯者

太阳；他在往中国的路上，經過巴格达哈里发国家的大多数省分，远至喀什噶尔；越过兴都庫什山的可怕山路而入印度；遊历印度、錫兰、馬來半島、婆罗洲、爪哇、苏門答腊；住在中国若干时期——在那里，各种工业，特别是制陶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碰到一个他在德里認識的老友；他搭船往阿拉伯半島，第四次到麦加去朝拜；然后渡紅海，第二次走过苏丹，遊历廷巴克图和奈格耳河地区；在苏丹的中心区，他碰到他的胞兄弟，他兄弟告訴他，父亲已在十五年之前去世。这样，他便回到費茲的故乡，用其余的岁月写了一本在任何語文中最令人惊异的旅行記。他的著作，是关于穆罕默德教徒的世界貿易的知識宝庫，也是关于穆罕默德教帝国偉大性的文献証明。“旅程上的危險，比可能想象的要少。虽然易宾·巴托塔偶然陷入危險的境地，但一般看来，他的旅行是悠閑而舒服的，而且，穆罕默德教的一种可佩的互助精神，就是使一个穆罕默德教徒从直布罗陀到广州止受到欢迎的精神，給他（易宾·巴托塔）保証了一种衷心的款待，只要他是在伊斯兰教流行的地方。”

中世紀时代，在整个东方，穆罕默德教的流行和阿拉伯語的傳布等于是商人和小販的通行証。阿拉伯語在中世紀东方的地位，象今天英語在那里的地位那样。阿拉伯人，是中世紀东方世界的英国人。吉本說得对：“阿拉伯偉大势力的一帆风顺地伸展，必須归結到这个民族的精神。”他們是一个商人的民族。在中世紀时代，所有那时已知道的非洲，就是，从地中海到赤道止，所有的西部亚洲、印度的一半和大陆的整个海岸以及印度洋上各島屿都在穆罕默德教权力和文明之下，那是一个可惊异的事实。历史上除了近代大不列顛帝国外，再也沒有象它一样的帝国，而两者都主要地是商业帝国。

穆罕默德教商人甚至侵入了罗斯，而阿斯脫拉罕、薩里、基輔

以及黑海港口，都是他們所熟悉的地点。阿斯脱拉罕的商业来自河流和海上，就是，伏尔加河广阔流域的进进出出的貿易；此外，它还和更远的地区，有着貿易联系。罗斯南部的产品——水果、酒、香料、細布、香粉、奢侈品——交换罗斯北部地区的产品——主要是，奴隶、毛皮、皮、蜜、蜂蜡、脂肪、大麻、繩索和木材。在鄂图大帝时代(936—973年)至少有一个野心的穆斯林旅行家塔西佗到过日耳曼；他在那里因見到在馬因斯所出售的东方香料和絲綢而感到惊异；还有人曾拿撒馬尔罕的貨幣給他看过。

在巴格达哈里发国家的領土和罗斯与波罗的海区之間，高加索地峽是天然的桥梁，而里海是天然的水道环节。高加索外的喀扎兒人成了阿拉伯貿易的中間商。伊鉄尔是喀扎兒人的首府，但阿拉伯商人對伊鉄尔市場上从第三者採購东西并不完全滿意。所以，他們搭船上溯伏尔加河，前进到保加尔城即旧保加利亚的首府，但他們不敢再向前行。在保加尔城，阿拉伯人从来自諾夫哥罗得的罗斯人直接購買他們为东方朝廷所竭力爭求的价值珍貴的毛皮：主要是，貂皮、銀鼠皮、黑貂皮、海獺皮、黑狐皮；而这些东西是东方宮廷所急需的。此外，罗斯人还以奴隶和黃色琥珀售給他們。

現在已經从下列地区发掘出印着阿拉伯国王肖像的大量貨幣：在伏尔加河上游和中游、在第聶伯河上游地区、在波罗的海的北部沿岸以及在芬兰灣畔、在芬兰和瑞典之間各島上、在挪威的南岸、在丹麦的各島上。在日德兰和什列斯威境內，也已經发现从第七到十一世紀阿拉伯国王所鑄造的很多貨幣。其中最多的，是属于第九世紀末到十世紀中期的貨幣。这些古錢的标本，总数达一万三千多枚，耐人寻味地証明了阿拉伯的貿易范围如何广大。連在梅喀稜堡、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魯士，也已发掘出一些阿拉伯古币。

第十六章 十字軍(1095—1291年)*

在十一世紀之前,西欧人大部过着一种农村生活,每一地区和它的邻近地区分隔着。他們同穆罕默德教徒很少发生关系,除非遇到他們的侵入或者冒險的基督徒参加对东方的战争。穆罕默德教徒所占領的是那些保存最高度的古代文明、工艺和科学的地区。地中海地区和西部亚洲的穆罕默德教国家走在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前面。十世紀阿拉伯文明在东方和在西班牙发展的最高峯,正是西欧最野蛮而又最貧困的时期。但是到了十一世紀末期,这种隔离状态結束了:这两种人民間已建立恒久的接触,主要在下列三个地区:十字軍所建立的公国、西班牙和西西里。

十字軍是最有趣地也最偉大地表現那在十一世紀中覺醒着的集体意識,或集团心理的运动。这种意識已如此多样地显示出来:集体进香、圣迹崇拜、教堂建造、教会命令暂时停止私斗、农民騷动、經濟上的不滿、商业冒險、异端集团、共产精神最早时期的鼓动。十字軍运动鮮明地印上集体性質的烙印。对这一点,当代的銳敏作家已經看出。曼茲柏立·威廉写道(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不管多么辽远,多么偏僻,沒有一个国家未曾出过力……土地荒廢,无人耕种,房屋无人居住,竟有整个市鎮一起迁移的。”也許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象这种暗示作用傳染性的例証。从心理来看,十字軍表明了大批群众怎样在强烈的情緒刺激的压力下,竟会一起染着神經錯乱症或癲狂症的。

十字軍象任何其他偉大历史运动那样,是由于好久以来起着

* 地图: 錫培德:《历史地图册》,第 66—67,70—71,73 頁。

作用的复杂力量所产生的結果，也是由許多个别运动逐漸汇合而成的頂峯。十字軍的根苗已深植于中世紀的历史土壤里。其中最長而又最深的根苗，是朝拜“圣地”的慣例，这是早在第四世紀已經开始的慣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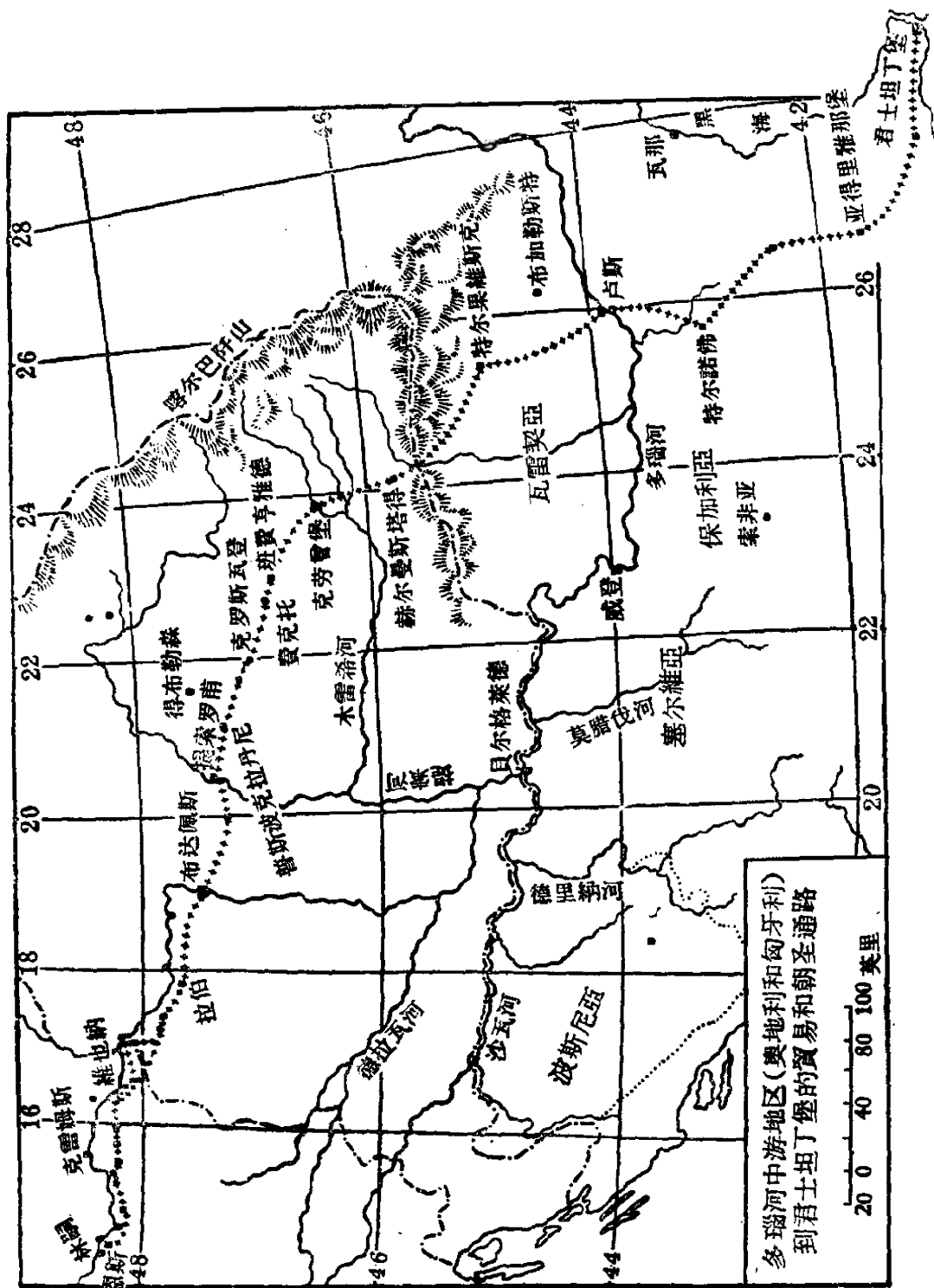
教会也要求以朝拜圣地作为懺悔某种罪行的行为。因为朝拜圣地是一个路途遙远、艰苦、用費浩大、有时还冒着危险的旅程。关于这种贖罪行为，有着两类方式。大朝圣，是到羅馬城、康波斯提拉。圣詹姆士寺院以及耶路撒冷圣地。小朝圣，是到距离較近地方的神殿去。可是要从象漫遊僧侶、逃亡丈夫和私奔妻子、托鉢僧、走江湖者这一类的遊蕩者中区别出忠誠香客，向来是不易的。747年，圣邦尼非斯向坎特布里·卡司柏特訴說，“臉蒙面紗的妇女們正在往羅馬城去；”跟着他还說，“在倫巴第、在法国或在高盧，很少城市沒有一个屬於英格兰族的娼妓。”未婚的妇女以及沒有丈夫陪伴的已婚妇女都被禁止出去朝圣。其他一些离奇的社会道德糾葛也发生了。有时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朝拜圣地的人出門已久，妻子認為他已死去，因而再嫁，但后来那个远遊的丈夫回来了。即使那个朝拜圣地的人不會回来，在那个时代也难于証明他是否已經死亡，特別是因为出門朝圣本来是一个遺弃配偶的好方法。我們可看到一批諾曼妇女在1068年写給她們离家丈夫的一封信，里面說，如果他們不立即回家，她們就要另嫁了。

朝拜圣地者数以千計地来来往往，所以大路上的寺院里早已附設旅舍和招待所，特別是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各山路上寺院里。弗尔达的寄宿所是出名的。哈德良一世曾向查理曼恳切地說明关于阿尔卑斯山中需要旅舍；虔誠者路易在塞尼山路上曾建造一所旅舍。855年皇帝路易二世曾下令修理所有阿尔卑斯山中的旅舍。在十世紀中，薩拉森人和匈牙利人的掠夺破坏了很多

旅舍，可是下一世紀的建築狂和朝聖熱使這些旅舍很快地修葺起來，而且有新的旅舍建造起來，例如，著名的聖伯爾納德旅舍。在匈牙利人接受基督教（1000年）後，當到東方去的多瑙河路綫開放的時候，有很多寺院和旅舍，象麥爾克旅舍，為了接待香客而出現於沿途了。

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在近代是落後的，但我們不該就認為它們在過去一向是如此的。奧托曼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紀中幾乎破壞了世界上一個人口最密、條件最優的國家——敘利亞。它在希臘人、羅馬人和早期拜占廷帝國的統治下，在工商與農業方面，是一個繁榮的省。正是由於這項財富，使它成為哈里發國家和拜占廷帝國的一個戰場。在那裡，小地主的數目比別處多得多。帝國法律說明：在十和十一世紀，皇帝曾竭力保護小地主防止大地主和教會的兼併過程。大莊園是由農奴和奴隸勞動來耕種的，但是大量土地卻由實際的所有人，就是，自耕農、橄欖和葡萄種植者來耕種的。

第七世紀阿拉伯的統治，在風暴過去以後，尤其是在阿巴斯時代，是和緩而又公平的。的確，教會和大地主曾喪失他們的土地；而這些土地歸於穆罕默德教國庫、伊斯蘭教寺院以及高級文武官員所有。但是，當地的基本民眾很少遭受騷擾。阿拉伯政府所課的土地稅和人頭稅，和過去拜占廷帝國所征的，沒有什麼不同之處；新的變更是所有的貢稅都由非穆罕默德教臣民來繳付的。可是，敘利亞人的繁榮和工業的發展足以使阿拉伯人的課稅不成為一種負擔。敘利亞的自由農和農奴，在穆罕默德教的統治下，都沒有感受過什麼過度的痛苦。我們可以適當地說，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在阿巴斯朝統治下的內部和平與繁榮，優於在拜占廷統治下的情況。在耶路撒冷曾由奧米耶朝所建立的年市集，吸引了大批西歐商人和朝聖者雲集東來。在《聖阿丹南傳》里，對下列情況表示了驚訝：“來自各國的無數商人群眾，常聚集於耶路撒冷來互相進



行买卖。”^①

給圣地送去定期的捐款,早已成为西欧的慣例。在这方面,法王虔誠者路易实现了他父亲的愿望;他从王室領土的每一庄园征收少量捐稅来支持圣地;他还同耶路撒冷主教长通过信。在 870 年,約翰八世趁着耶路撒冷三个修道士来到羅馬之便,贈送一笔捐款;他还抱歉地說:因受“异教徒的破坏”,捐款的数目微小。另一方面,耶路撒冷教长也沒有錯過机会来請求这种帮助,他所派遣的代表“遍走欧洲”。他們走到英国,又走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們領取了君士坦丁“合法繼承人”的礼物。881 年,教长赫力阿斯三世曾給“查理曼世系的全体国王和西欧僧侶們”写信,介紹吉斯柏特和雷拿德两个僧侶作为收取補助金的代表,为的是要弥补耶路撒冷教会由于重建很多圣殿而造成的財政亏空。十世紀中,在西欧捐贈基金給圣地寺院的慣例已經风行;耶路撒冷的僧侶們从这些基金里获得了收入。下面就是 993 年时多斯加納侯爵休格和他的夫人朱丽德所捐給圣墓的礼物。奧微亚托、索瓦那和阿奎彭登特三州中的岁入,用来維持耶路撒冷的圣馬利拉丁寺院的僧侶們以及他們所招待的朝圣者們。在这时期,查理曼所建立的教会还存在着。諾曼底公爵理查二世也把类似的礼物贈給圣墓,也給賽那的几个寺院。每年有几个僧侶从巴勒斯坦来到盧昂,他們帶着礼物而返。在十一世紀初期,圣墓的教会在意大利和南法拥有大量土地。

从上述的事实,可看出:在十一世紀之前,阿拉伯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沒有遭受騷扰。耶路撒冷教长狄奧多西,在 869 年写給君士坦丁堡的同僚易格那提阿的信里,讚揚了薩拉森人的寬

① “diversarum gentium undique prope innumera multitudo... in Hierosolymis convenire solet ad commercia mutuis venditionibus et emptionibus peragenda.”

大政策，因為他們准許基督徒建造教堂并依照他們自己的法律過活。信里說，“他們是公平的，因而我們在任何方面沒有遭受到壓力。”那些朝謁聖地的西歐人只要經常注意承認當地的法律并向所路過的城市當局呈驗通行証后，可無阻礙地繼續通行。高僧伯爾納德從 866 到 870 年曾住在東方，他的記載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離開意大利之前，他和兩個同伴曾到巴利去（從 840 年起它已隸屬於薩拉森人），領取了一張正式通行証；証內載明他們的情況以及他們旅行的確定目的。他們從他林敦搭船啓程，到達亞歷山大城，在那里，他們為了登岸必須繳納六個奧萊。他們每次進入一個新市鎮后，必須調換新通行証，為此每人須付十三便士。如果遺忘或昧于這種規矩，他們將在“巴比倫”（開羅）受到短期禁錮的處罰。這種征稅果然是苛重的，但比起在同一時期西歐所征的稅要少；由此可見那里是事態正常的。在下面一段文字里伯爾納德盛稱旅客在這些國家里所可享有的安全。

如果那只馱載我疲瘠身軀的租來的馬偶然死于路上，又如果我把行李拋在那里無人看管而到附近村庄去找另一只乘馬，在回來時，我會看到一切東西都完整無缺。這就是他們所維持的太平狀況。但如果有人在城內、在海上或在路上無論夜里或白天遊蕩着而沒有一張蓋着那里某王公或某長官的印章的証件或通行証，他就要被禁錮，直到確定他不是一個間諜為止。

從十世紀初期起，到聖地朝拜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史家所記載的，只有世俗的或教會的大人物。這些行動是和封建社會的冒險精神相符的。有的是由于在危險情況中起誓許愿的結果；其他是由于想要瞻仰聖徒的遺迹；有時，他們想看看東方國家的好奇心里夾雜着宗教的考慮；有時，他們把朝聖作為必要的贖罪方式。試把這一時代的重要香客列舉出來，那當然是乏味的，但足以表明西方和巴勒斯坦間接觸頻繁情況。約在 920 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康拉德曾三次朝謁聖地；965 年，北方大侯爵格洛的姊妹，斯瓦比亞女

伯爵喜尔达,在朝圣的时期,死于耶路撒冷;970年,鄂图大帝的弟妇朱狄司也作过同样的旅行。帕馬·圣約翰到过耶路撒冷六次;阿利热摩斯的弟兄、卡西諾山寺院的住持利奥,从圣地携回了一个真十字架;貝尼温敦的約翰,后来是这同一寺院的住持,也参謁过圣地;阿梭斯山寺院、斯达維洛特的住持波波在990年到圣地去朝圣;凡尔登伯爵腓特烈在997年去;可畏的安如伯爵佛尔克·涅拉的第一次朝圣是在1002年;非基克寺院住持罗哲尔的第一次朝圣是在1005年。所有这些朝圣者的旅行似乎都很順利而沒有遇到什么大的阻碍;他們也沒有組成大队,但只結合着几个同伴偕行而已。所以在十世紀末期在穆罕默德教国家里,那使高僧伯尔納德感到惊奇的安全状态,依然存在着。当时,很多西欧人的脑子里縈繞着到圣地朝圣的思想。那些无力作长途旅行的人們采取下列办法聊以自慰:閱讀全欧风行的遊記,瞻仰由耶路撒冷带回来的圣物;在按圣墓圓型教堂式样所建造起来的欧洲教堂里做禱告。朝圣运动,連西欧的极远地区,也被波及。在十世紀末期,我們看到第一批从斯堪的那維亚来到圣地的朝圣者,其中还有来自冰島的。

在十一世紀中期以前,朝圣行动是屬於个别朝圣者的,至多是小集团的性質。然而,在这以后,情况改变,我們所看到的,不是少数人的朝圣集团而是几百甚至几千人的旅行集团。1011年当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間关系还是和睦的时候,安如伯爵佛尔克·涅拉随身只帶由教皇写給拜占廷皇帝的一封介紹信,作为他的全部安全保証。在君士坦丁堡,那里供給他向导来引导他到达圣地;在耶路撒冷,他必須繳付捐稅,那是穆罕默德教徒对那些愿意进城的基督徒所課的貢賦;他还援助了一批穷苦的朝圣者;他們因为缺少現款进不得城。約在同一时期,特累甫的大主教迈因哥尔德,只由一个人伴随着到耶路撒冷去,那个伴随,就是隱士圣西緬;他是一个西西里希腊人,由于常到东方,成为一个优良向导。在十一世紀中

期，烏尔立喜，后来担任泽耳寺院的院长，同他的仆人往“圣地”去，两人同乘一馬；每天他在上馬之前，背誦一首讚美詩。1058年，編年史家赫斯斐尔德·藍伯特曾不告住持而离开了他的寺院。他横越大陆，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回到原地。

匈牙利人在圣史梯芬时代(997—1038年)皈依基督教，經由多瑙河的一条路对朝圣大为便利。因此，未来十字軍所穿越的大陆道路，已經开放；在这条路上已有許多显貴为了供給朝圣者的休息所建造的旅舍。奧得里克·維塔利斯举出一所这类的建筑物，位于“巴伐利亚人和匈牙利人之間的边疆上”，据珀茨的話，位在奧地利的摩尔克，由一个已受圣职的諾曼騎士掌管，名叫安斯哥特；他是托厄尼·罗哲尔的一个亲戚。所以，到耶路撒冷的朝圣已开始有了一种新組織。

但是除了上述个人个别所作的旅行之外，我們还看到开始組織远行队；这些队伍横越欧洲和东方，有时已被卷入同当地居民的敌对行动里。第一批这类朝圣队之一，是圣瓦内寺院住持理查所率領七百个朝圣者的朝圣队，其中包括很多諾曼騎士。这一队伍是在1026—1027年間出发，由諾曼底公爵理查二世出資；而后者对有关圣地的一切事情，都是很热心的。同一年，安科賴伯爵威廉，由很多西法兰西住持和一大批貴族跟着，經過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到达了耶路撒冷；这批朝圣者曾受到匈牙利国王的款待，并順利完成了他們的旅行。下一年，若干西欧貴族，由于受到他們例子的鼓舞，进行了一次新的旅行，波亚蒂尔和里摩日主教以及安如伯爵佛尔克·涅拉又一次前往圣地去。据劳伊尔·格拉伯的話，1033年时，圣墓上朝圣云集，人数比起以前所可看到的任何朝圣群还要多。各階級和各等級的人，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老百姓都有人参加“那是从来沒曾有过的事情：有些貴族，大批貧民，同时进行这种旅行；其中有許多人宁愿死去而不愿回到他們的故乡去。”若干

年后,在1035年,著名的諾曼底公爵罗柏特魔鬼,在湊集为置备礼品所必需的金銀以后,啓程到巴勒斯坦去,“带着他的大群臣民”同行。他在返国途中死于尼西亚并埋葬在那里。但在所有这些远行队中,最著名而又最重要的,是1065年南部日耳曼的若干主教和騎士在班堡的主教岡瑟领导下所进行的远行队,人数达一万一千多人。为了这大队的旅行,曾在事先准备好寄宿所。

显然,在真正的第一次十字軍前的二三十年中,我們已可看到一个新的現象。統計数字还会使这一事实更加清楚。第八世紀有六次朝圣,第九世紀有十二次,十世紀有十六次,十一世紀則有一百一十七次了!这些都是有記錄可查的。到了十一世紀,圣地从作为一个朝圣地点来看,已經开始代替康波斯提拉城古老的圣詹姆士圣殿和羅馬城。巴勒斯坦旧的遊覽指南,数量激增,而新的指南書也編写出来,以便利旅行者,甚至也为便利来自冰島的朝圣者們。很多朝圣者把做生意和宗教連在一起,沿途做着买卖。扎克·得·維特里曾写道,“有些人为了做生意,別的人为了宗教热忱与旅行;”^① 太尔·威廉也說过,〔他們〕“具有宗教热忱或商业动机,或两者兼有”^②。十二世紀的歌曲和記事詩,“并不象人們一度所曾設想的那樣,是依据中世紀早期的詩歌和英雄故事而来的,当时的文学,大部分是为了……在朝圣大路上的旅行群众,即朝圣者和市集常客而編写的。既然是由旅行者并为旅行者而編写的,所以,它們必須就羅馬城和康波斯提拉城的情况,予以解釋;同时,原来被認為显有差別的社会阶層,在旅途上却表现出极其密切的合作精神”。

这些远行队,还不得算作十字軍。它們除了参加者人数較多

① “Alii causa negotiationis tracti, alii causa devotionis et peregrinationis.”

② “Devotionis aut commerciorum aut utriusque gratia.”

之外,同普通朝聖没有什么不同之点。然而,它們在十字軍起源的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因為它們使西欧人熟悉到巴勒斯坦路上的各站;那有助于决定后来十字軍所采取的路綫;它們还鼓起了欧洲人对圣地的狂热心理。

但是,我們看到另有一批把宗教和貿易紧密联合着的朝聖者。他們是意大利商人;其中最早的是阿馬斐商人。在十世紀末期,阿馬斐商人利用拜占廷帝国給他們的保护来建立了他們同埃及与叙利亚的商业关系。摩里和判塔里奧尼的两富族,在意大利同拜占廷的經濟关系上起着巨大作用;从它們在安提阿和在耶路撒冷建造旅舍方面看来,它們已表现出对圣地的热忱。在1080年,它們曾建造圣約翰医院,那就是后来十字軍救护騎士团^①总部所在地。这医院不加歧視地接待所有来自西欧的朝聖者。西欧的捐款或多或少定期地送到巴勒斯坦去,而在1083年后,东方的这类新組織在南部法兰西,尤其是在阿尔比的主教区,获得了固定的土地贈与。

在同一时期,地中海上海权的比重已有轉变,过去将近三百年間伊斯兰教国家的海上优势,現在由于热那亚和比薩艦队的海战胜利而失掉。这种形势,又由于諾曼人征服西西里(1090年)而肯定下来,因此意大利沿岸各共和国的商业野心受到了有力的刺激。烏尔班二世在第一次十字軍队伍出发之前,已向热那亚呼吁使用它的船舶,这不是沒有意义的。

已經說过,虽然这些运动还不是十字軍,但应指出:在第一次十字軍之前,即在十一世紀中,欧洲事实上已有过三次具有十字軍性質的行动。在前面几章內已經提过:卡斯提尔的反摩尔人战争(1072—1099年)、諾曼人征服亚浦利亚和西西里(1016—1090年)和諾曼人征服英国(1066年),这些都是真正的十字軍;它們的动机

^① 它是在十字軍东侵时期所組織的騎士团;它的主要目的,是看护十字軍兵士中的患病或負伤者和接待从外地来的朝謁聖墓者。——譯者

和后来促成大规模的正式十字军的动机大部是在程度上的差别。这三件大事,以它们的榜样和影响感染力,曾刺激西欧民族的好战精神和经济欲望。有大批参加过上述事件中某次远征的冒险分子,后来也参加了十字军的东征。

在十字军兵士的行为里或他们的信件里,很少可指明,他们已经一般地放弃那些其他中世纪战争里所反映的动机和欲望。诚然,他们的幻想由于朝圣者的艰苦景象和神圣地点被污辱的情况而燃烧起来;可是他们也热中于下列传说(似乎是更起作用的一点),东方神话式的财富、黄金、白银、美女正在等待掠夺者的手,诸如此类的事情……人们愈加乐于接受这项号召,因为欧洲人口尽管有时疫和战争,却已增加到这样的程度,收获递减律已开始使人们遭受痛苦。那成为以后五百年中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幼子问题①……已经出现。在土地继承权已经确定而又没有荒地可开辟为新庄园的地方上,幼子被迫用他的宝剑来寻找生路了。在实施土地再分割惯例的地方上,封建主所保有的土地,越来越小,以致他们不再能维持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加紧压迫农奴,使农奴贫困化来弥补自己的亏空;但尽管如此,许多封建地主还是负债累累,陷于绝境。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发生了社会骚乱和不靖状态;于是,无土地的和贫困的各阶层的人们,准备干着任何危险的事情,只要有希望免除苦难的话。对所有这些人来说,十字军看来确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号召了②。

皇帝亚历修在曼西克特惨败之后,向法·兰德斯伯爵请求西方援助的“呼吁书”,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伪造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重视其中所说的“爱好金银和喜欢美女”的诱惑力③。

在产生欧洲好战精神的这项过程里,我们不该忽视停止私斗运动对十字军精神发展上的影响。当这个运动力图抑止私斗恶习的时候,那些提倡的僧侣们同时也认识到:封建社会对战争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把战争完全压制住。为使战争的矛头转向于

① 按当时的法律,长子享有继承遗产权,而幼子没有继承权。——译者

② 《政治学季刊》第15卷,第600页。

③ “amor auri et argenti et pulcherimarum feminarum voluptas.”

外，教會，尤其是克里尼教派，把反對伊斯蘭教戰爭理想化為正義戰爭。西班牙是這種新性質戰爭的第一戰場。“吉拉特·得·魯恩雍”歌曲清楚地指出了在十一世紀思想上的這種變化。十字軍運動由於給貴族提供了無可限量的前程，會做到停止私鬥運動所未能做到的事情。

早期教會曾反對一切戰爭。從羅馬帝國和教會結合之後，它承認了：那些保卫國家和財產的戰爭是合法的。但從查理曼征服薩克森人時期起，反對異教——不信上帝的——人民的戰爭，也被認為是正義的。在封建制度發展的時代，歐洲是一個內戰的世界，而停止私鬥以及對西班牙和對聖地的十字軍運動，大有助於它擺脫這種局勢。十字軍把戰爭看作神聖的，而這觀念最後約在1150年的格累細亞“詔令”里確立起來，“當時，軍事精神和宗教狂熱混淆在一起，僧侶和軍隊匯成為宗教-軍事團，而上帝戰爭代替了上帝休戰了。”而且，遲至第二次十字軍時期，聖伯爾納德還抱怨說：“根據什麼任性的決定把我推選為這次出征的將領和領導人呢？我為什麼竟來負責一營，走在武裝兵士的面前呢？”

把封建貴族中大批最殘暴偏強之徒轉到外地去，使西歐社會免于劫掠，那無疑地是僧侶們之所以提倡十字軍的一個動機。為了這個目的，在十字軍開始前的好多年，西班牙半島上的戰爭曾受到一種靈巧而又有組織的宣傳的支持，而這宣傳方法，當十字軍興起的時候，也得到更巧妙的利用。

剛在十字軍之前和十字軍時期中，宣傳品泛濫歐洲；其中包括有教皇的訓諭、傳閱文件、外交文件、官方布告、十字軍戰士的信札、記事、傳說、詩歌，數量龐大。這些宣傳品很多是純粹虛構的、臨時捏造的，旨在鼓起興趣；例如，教長西緬寫給烏爾班二世和西歐諸王公的信件，敘述污辱聖墓和對朝聖者的暴行，又如，所謂關於發現神槍的故事。所有這一切，不管真偽如何，都屬於所謂“鼓

动文学”这一类型,并且是富于詞藻的文章。

从西欧到东方的朝圣者们,对于所受到的待遇,没有正当理由来发出怨言。在969年前,他们也没有发出过怨言。在那一年,由于战争的变化,叙利亚再度转到拜占廷统治之下,于是帝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朝圣者课征了特别捐税。在这以后,直到1071年土耳其人占领叙利亚和耶路撒冷为止,所有西欧人的诉苦,都是完全针对着拜占廷的。

在塞尔柱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地位,没有多大变动。他们主要的新负担,就是加在土地上的新税,以维持土耳其驻防军的经费,而这些军队是用以保卫国土,以防御拜占廷从小亚细亚或从海上来进攻的。正在十字军运动爆发之前,关于朝圣者在东方遭受土耳其人虐待的痛苦之大部分流行的传说,是由于反伊斯兰教的宣传而起的;这种宣传利用了群众的轻信心来煽起群众的狂热。的确,小亚细亚的基督教居民受苦深重,但那是因为拜占廷帝国还在和土耳其人争夺那些省区的控制权的缘故。在那里,连绵的战争和劫掠状态继续存在,直到曼西克特战役惨败之后拜占廷在小亚细亚的权力崩溃为止。但是在圣地和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土耳其的统治,已是一个既成事实。

塞尔柱苏丹以极其宽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统治他们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见的拜占廷历史家,也隐约谈到: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宁愿受苏丹的统治而不愿受皇帝的统治……在塞尔柱统治下的基督徒比在拜占廷帝国中部的基督徒,要幸福些,而最苦恼的,是拜占廷边境上的居民,在那里他们蒙受继续不断的侵掠。至于宗教迫害,在塞尔柱时代,没有一点痕迹……我们也不可能不作出结论:许多基督徒已成为穆罕默德教徒①。

我们来分析研究一下,第一次十字军的开始时,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所发表的演说,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表明了教皇怎样

① 拉姆塞:《弗里加的城市和主教区》,第1卷,第27页,《当代评论》第90期。

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可以鼓动的动机。教皇的演說，是由四个听講的人記錄下来的，所記的不是教皇原来的話，而是他所講的大意；我們还有其他沒有直接听講的人所記的演說詞。演說中所引基督徒在东方的痛苦、土耳其人的“暴行”以及狂热的語調和完全赦罪的允諾，当然可打动一切人的情緒；冒險的爱好、战争的希望以及采邑的前景，感动了封建主階層；商业的机会和貿易的扩展，虽然在演說中沒有談到，但在教皇为請求海上援助写給热那亚人的信里，却是明白地說出了。最有意思的，是教皇在講到法国的領土時說：它“太狹窄不够容納它的稠密人口；它的財富也不多；連它所产的食糧也几乎不够供应它的种田的人們。因此，你們互相廝杀吞噬，你們进行战争”。

在第一次十字軍时代的历史家中，不止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曾觀察出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动机；宣傳者花言巧語，是瞞不过他們的。

因为有些人由于好奇心而到东方去；其他的人由于家中生活窘困而需要打仗，不管是反对基督教的仇敌也好，朋友也好，以此来終止他們的貧困状态；还有別的人要逃避他們的債務，要逃避他們應該履行的义务，或要逃避为了他們的罪行而应得的处罰。只有少数人，沒有屈服于流俗所崇拜的东西，而是由一个神聖目的所激动起来的。

十字軍，对欧洲的尤其是法国的农民，在經濟上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大批平民以非常的热情，投入了运动。基柏特·得·諾根特，一个目睹的人，在下面一段精彩的文字里，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法国人在这时期遭到飢荒；接續而来的歉收，使谷物价格飞騰上漲。唯利是图的商人們，按照他們的慣例，靠着一般人的苦难，还在进行投机买卖。食糧又少又昂貴，穷人吃树根野草来充飢。十字軍突如其来地喊声一起，立刻到处得到响应，倉庫的大門打开了。于是，原来价格貴得不得了而无人能买的食品，而現在当大家被激发起来而要出发远征的时候，就不計什么价格出售了。我們曾看到七头羊只售五便士。飢荒情况消逝，富饒景象接踵而来

了。因为大家都急切要走上十字軍的道路，大家赶快把旅程上所不需要的一切东西轉換为現款；于是出售的价格，不是由卖者而由买者来規定。最值錢的物品是旅程上所需要的东西，但其余的东西，則不計什么价銀而卖掉了。

在分析这一段記載之后，我們清楚地看出：法国这种飢荒情况，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而是由于粮食商投机行为的人为原因所引起的；十字軍的号召打破了这项壟断居奇行为，因而价格暴跌；那使行将要离去的人們受到严重損失，而使留下的人們获利。在这一时期奧拉·伊克哈德住在德意志，他写道：法国农村遭受着私战的痛苦；国内发生了飢荒，而与此同时，德意志在亨利四世有力而又賢明的統治之下，則是繁荣的。他还扼要地說，“他們〔指法国封建主——譯者〕荒廢了自己的土地来貪得无厭地爭夺別人的土地。”基柏特·得·根特在他的《圣战史》里写道，“在这个时候，騷乱使整个法兰西王国四分五裂；到处有盜劫、交通阻断和放火行为。”在西欧，尤其是在封建暴力最强橫的法国，当看到这批穿着盔甲的搗乱分子向东方馳騁而去的时候，人們一定会立刻深为庆幸的。好战的本能，已由停止私斗运动部分地压制下去，而現在又找到了新的活动场所。关于这种庆幸情緒，我們从苏哲尔簡洁的信里，获得鮮明的証据；他是法国的宰相，当路易七世为了第二次十字軍东征而长期留在东方的时候，他写信給国王請他返国。信里說，“亲爱的国王陛下，我必須請您听听全王国的呼声。当您王国的男爵和貴族們已經回来，您为什么还逗留于野蛮人〔穆罕默德教徒〕中間呢？您王国的搗乱分子又进入了王国，而应捍卫王国的您，反而象放逐般地逗留在外。您把羊群交給了豺狼，把領地交給了暴徒。我們恳求陛下，我們本着对您的忠誠提請您注意，我們祈求您憐惜，我們請求您恩寵。請勿逗留在外。請即返国，要不然的話，您在上帝的目光中，将犯有破坏您登极时的宣誓之罪了”^①。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27期，第767頁。

第一次十字軍空前地需要現款，這一點終於打破了这个时代的“自然經濟”状态。当然，对一个要到东方去的十字軍士兵來說，完全不可能把足够的物品隨身携带来在路上維持自己的生活。結果是那窖藏了好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貨幣，由住特、主教、貴族、甚至农民，拿出来得重見天日；数量可觀，足以駁倒西欧貨幣的缺少是由于貨幣外流到东方去之論点。真正的原因，是随着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和早期封建的不靖状态所发生的混乱局勢，曾使人們把他們的貨幣窖藏起来。

参加十字軍須先准备現款，也就是說用抵押财产或用出售财产来获得現款。“神聖道路”不是供穷汉走的。为此，很多貴族、很多自由人負債重重，无以自拔。凡愿参加十字軍的人，貴族也好，农民也好，無論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必須获得行装和現款；所以，他們出售或抵押财产，或掠夺犹太人。基柏特所描写的十字軍士兵出发前的情况，表明了經濟上的明显混乱。

当时，出現了一个奇特的經濟現象。凡在路上可以应用的現款和动产是“高价的”，而不动产和不可搬运的财产，尤其是土地，是“廉价的”。因为十字軍兵士的财产几乎全都是土地，所以他們必須用不动产来换取現款。因此，地产的价值跌到远在它的通常水平之下。在十字軍热忱最高的地方，房屋和田亩几乎售不出去。普通貿易陷于停滯。那些有現款的地主，特別是寺院，在有利的抵押条件下，攫取了这种财产。福伊克斯伯爵把他的部分土地讓出来以应付开支；黑諾特·鮑尔文把他的大批庄园抵押給利格主教。摩雷斯姆寺院所做的交易例子，有意义地表明了領主为了到耶路撒冷去怎样获得必要的經費。有一个地主出售他的土地給僧侶，获得二十七鎊，两个弟兄出售他們的财产，一个获得一头騾，另一个获得三十先令；另有一个抵押他的庄园，获得十六鎊。我們很有趣地注意到：在这种财产的轉移中，有很多是和小土地有关系，完全

是自由地的範圍。“我們不致作出結論說：宗教機關依靠十字軍兵士的需要來大發其財，或十字軍運動使土地變為市場上的滯銷貨。但是明顯的，十字軍造成了對現款的新需要，富裕的人們由於擁有多餘的錢，得從這運動里獲得利益。”法國腓力一世以一千五百銀馬克，從布爾日伯爵那里購得布爾日郡。羅伯特·柯托斯把諾曼底抵押給他的弟兄，英國威廉·魯佛斯。

很多農夫利用空前需要現款的機會來從農奴制中贖買他們的自由，或者想法使麻煩而變化無常的莊園租稅改成為固定的貨幣租；許多村社整村整村地受到團體精神的鼓舞，從它們的領主那里購取了特權狀。

這些交易對於那些手中有現款，又够聰明而留在家內的人們，是有利的，因為他們利用犧牲他們鄰人的宗教熱忱來獲利。可是這變動對猶太人是不利的。在這以前，猶太人曾是社會中被輕視而又受到寬容的成員。在十字軍之前，大部商人可能都是猶太人，而猶太社會，在很多城市里，尤其是位於象萊茵河和羅尼河商路上的城市里，是富裕的。因為法律禁止猶太人住在鄉村里或購置土地，他們曾完全依靠貿易和放款來過活。所以，在十字軍開始的時候，猶太人是歐洲唯一出名的有相當數量現款的階層。由於這個緣故，在這以後，西歐猶太人成為經濟上廣受妬嫉的犧牲品，因為這種妬嫉心理，由於當時的宗教狂熱，更加厲害。反閃族主義是在十字軍運動里誕生出來的，起於經濟的妬嫉多於宗教的仇恨。於是猶太人到處受苦深重。群眾痛打他們，屠殺他們，都成為家常便飯；我們可把這個時期作為中世紀城市里猶太人區的開端。

烏爾班二世原來計劃：第一次十字軍隊伍完全由歐洲武裝騎士來組成。但是，他沒預見到下層群眾在這運動里已經大大地覺醒。教皇委派一批正式傳教士到歐洲各地向騎士階層宣傳十字軍運動，但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自告奮勇的、無知而又狂熱的馬路演

說家，象臭名昭著的彼得隱士那樣；他們跑來跑去，在市場上，在十字路口，向農民鼓吹十字軍運動。結果，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法蘭德斯及萊茵蘭，出現了農民的自發隊伍；而他們原來是順服地忍受着農奴的命運的。當十字軍的号角一聲響起，成千也許上萬農民群眾離開了他們所附着的土地，擺脫了他們所負擔的莊園義務，離鄉背井，走上了十字軍道路。由於這自下而來的壓力，封建社會的陳腐外殼迸裂了。基柏特·得·根特以下面的話，生動地描寫了這些組成所謂“農民十字軍”的可憐而又受迷的徒步旅行群眾。他說道：“再也沒有如此令人傷感的事情，象我們看到這些可憐人的情況那樣：他們以牛羊當作馬用，沿途拖着雙輪小車，車上堆着破碎行李和他們的孩子們。每經過一個堡壘，一個城市，孩子們伸出他們的手問道，這是耶路撒冷嗎？”在中世紀社會下層群眾間這種大騷動中，古老的民間傳說、旧日耳曼的異端邪說、法國古老的督伊德教迷信^①又重新出現了。有人告訴我們說：農民無目的地走來走去，尋找聖地；他們除了用繩牽着的山羊或雌鵝（條頓神話中的神聖禽獸）作為響導外，再也沒有別的響導；農民還把燈籠挂在橡樹枝上來占卜吉凶；那是導源于督伊德教崇拜橡樹的儀式的。

然而，對於農民隊伍混亂狀態的描寫，可能有些夸大其詞。必須記牢，幾乎所有的編年史家都是僧侶或貴族；而他們無例外地是敵視任何農民的行動表示的。那些跟着彼得隱士和華爾特勞漢走的群眾，在開始時一定會帶着現款，因為保加利亞人曾在尼西附近，劫奪彼德隱士的錢箱。當這隊伍不復有錢來購買食品而開始沿途掠奪田舍農莊之後，紀律遂蕩然無存了。這些農民“軍隊”沒有一隊曾經到達耶路撒冷那里。這隊伍由於貧困、疾病和毆鬥，在到達君士坦丁堡之前，已死傷很多。這些可憐隊伍的殘余分子，又

^① 督伊德教是古代高盧人的信仰。教徒認為五點花樣（Druid's foot）具有奇效；現在歐洲咒語中還使用它。——譯者

由于飢餓和土耳其人的進攻，大部死在小亞細亞。

在農民隊伍出發幾個月之後，武裝貴族和騎士也走上了征途。但他們一到君士坦丁堡，就以貪婪和妬嫉心理來注視这个大城市。的確，在西歐方面，再也沒有一個城市，如此寬廣，如此富饒，如此富於壯麗的宮殿、教堂、廣場、街道、浴場象君士坦丁堡那樣。沙脫爾·富耳奇驚歎地喊着，“多么偉大的城市，多么華麗，那里有這樣多的寺院和富麗堂皇的宮殿。這城內的製造業，使人一看就感到驚奇。如果我把城內一切好東西，黃金、白銀和貴重衣料怎樣豐富的情況敘述一番，那會令人吃驚的。它的港口時時刻刻有船進口，滿載着一切為人類所需用的東西。”這些情況使十字軍兵士油然而想起：這樣的一個首都竟落在宗教分裂派的希臘人手里；從而他們很快就對這些人顯露着輕蔑的態度；另一方面，希臘人也把西歐人看作可怕而粗暴的野蠻人。法國人的饒舌，還使他們感到驚訝。波希蒙德是那個曾陰謀占領黃金角畔城市^①的可畏羅柏特·基斯卡的兒子。他最垂涎欲滴地注視着這偉大首都，並在六年之後曾白費心機地企圖完成他父親的未竟之志。

關於十字軍軍隊在小亞細亞的進軍以及圍攻安提阿（1097年10月20日—1098年6月28日）時所遭遇的艱難情況，我們無須論述。但在这里應提及十字軍兵士第一次嘗到甘蔗這一回事。曼茲柏立·威廉寫道，“在圍攻過程中，淫雨連綿，困苦突增，很多可憐人凍死，因為他們沒有衣服可換，又在連續好多天里不能找得避風雨的地方。當時，帳幕和木頭都感缺少。但他們為了稍減飢餓，經常咀嚼他們叫做‘蜜莖’的甜蘆，即甘蔗。”亞斯·艾伯特還說道，“這一類草，是每年費了巨大勞力來種植的。在成熟以後，他們把它放在石臼內搗碎，絞出它的汁液，再把汁液倒入鍋內使它凝結而硬

^① 指君士坦丁堡。——譯者

化，直到狀若白雪或白鹽為止。他們把它的碎屑調入麵包內或溶解于水里。這種莖，他們稱之為“蘇克拉(zucra)”。

十字軍相繼蹂躪了敘利亞、以得撒和巴勒斯坦；1099年7月在占領耶路撒冷之後，即成立了耶路撒冷王國。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歷史上我們第一次看到歐洲封建制度擴展到它本部以外，而在很古老東方的領土上建立了一個基於封建原則的國家。在那里輸入了古怪的官銜，象安提阿親王、的黎波里伯爵、以得撒伯爵，半寺院性半軍事性團體，象聖殿騎士團和十字軍救護騎士團；外國封建制度的政治組織，外國法律、外國風俗、外國習慣、外國語言等等。

從地形上看來，耶路撒冷王國是地中海東岸的一條又長又寬的地帶；它原來是一系列有古老歷史的省分（現在叫做男爵領或封邑）。它最寬闊的地帶，是在北部，在那里以得撒連接着上幼發拉底河；在南部，它的保護權擴展到賽那的寺院和紅海畔阿利亞小港那邊。但在東方，十字軍兵士始終未能占領阿勒波、哈馬，尤其是大馬士革；後者象矛頭一樣，對着拼湊成的王國領土中最脆弱的環節。附屬於安提阿侯國的，有西里西亞，即小亞美尼亞。耶路撒冷王國所處的危險地位，從來沒有被解除過。在東邊，有一個敵對的穆罕默德教世界；在南邊，埃及不斷地進行威脅；在西邊，拜占廷帝國一向對它抱着半敵對的態度。

從經濟社會史的觀點看來，十字軍的利益和重要性，在於它是歐洲國家第一次向歐洲境外的擴展，是歐洲人在外國土地上和外國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試驗，也是一次又龐大又複雜的商業冒險行動。關於這些方面，十字軍在歐洲史上引入了一個新的運動。後來在地理大發現時期及其後，即在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中，歐洲更大規模的殖民和商業的海外擴張，只不過是跟着十字軍開始的運動之延續。

諾曼人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英国所獲得的經驗和那些支援西班牙基督徒而定居在那里的几千法国人所獲得的經驗，作为先例看，对十字軍解决叙利亚和圣地的殖民問題，都是沒有多大帮助的。因为情况是大不相同的。諾曼人及其他法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居留地，迥然不同于南意大利和英国的諾曼殖民地，也迥然不同于1204年巴尔干半島上和希腊的法-意殖民地。因为在这些地方尽管在种族、語言、风俗和文化上分歧很大，但所有被征服的居民，总是基督徒。然而，在东方則不同，穆罕默德教和基督教的欧洲文明沒有有什么共同之点。它是敌視西方文明的。至于他們所看到的当地基督教居民，主要是叙利亚人，虽对十字軍士保持外表的中立，但实际上他們和穆斯林人是友好的。

上述封建政府的建立，使土地的原主遭受剝夺。在封建等級制里，穆罕默德教地主和叙利亚地主都沒有什么地位。这项措施的不智和不公平，注定要成为耶路撒冷王国在不到百年期內归于毁灭的一个基本原因，因为这批被剝夺的地主(其中很多是基督徒)被迫投入穆罕默德教陣营，而成为十字軍的死敌。十字軍使这种敌对情緒更剧烈化，因為他們把本地基督教居民和“异教徒”相混淆，一概加以屠杀。这种殘暴行为，注定要在叙利亚种下禍根。有一篇論文里說，“的确，异教部族逃到山上和荒野里，离开住宅、茅舍与充滿各种財物的堡壘。”^① 富裕的叙利亚財主，是主要的受难者。小土地所有者在新地主的土地上淪为农奴，或潜伏于港口城市內，在那里他們設法充当夫役和手艺人以求餬口，直到征服的初次风暴过去为止。

农奴不是叙利亚人，便是阿拉伯人；但其中极大部分是叙利亚人。农奴的境遇比西欧的还要困难，因为在西欧，到了1100年时，

^① “Pagana vero gens fugiebat in montes et in valles et dimittebat domos et casales et castella plena omnibus bonis.”

由于租稅的規定、实物租改为貨幣租及有关农奴的法令和农奴的釋放，使农奴的生活状况达到可以容忍的地步。农奴不复是一个“可任意被課稅”的人。但是在东方，我們看不到这种減輕負擔的特征，这一事实自然使叙利亚的不自由階層回想到拜占廷或阿拉伯时代是个黄金时代，并使他們成为东方边境外穆罕默德教政权的秘密朋友。而且，教会土地上的叙利亚农奴的命运也不見得比世俗土地上的要稍微好些。教会在亚洲和在欧洲一样，是硬心腸的稅吏。

基督徒和阿拉伯人通婚所生的子女，被称为“杂种”，象印度的“欧亚”人或半种姓的人那样。“法兰克語”是一种混杂語，包括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象中国的洋涇浜英語一样；它是商业用語。在非本地人和非奴隶的人們中間，希腊人系最低階層。十字軍輕視希腊人，因为害怕他們同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有所勾結。但他們的营业技能、他們的熟練語言、他們的和藹态度，使他們成为有用之人。亚美尼亚人的地位較好。小亚美尼亚还保持着它的独立地位，它的国王又是十字軍的同盟者。亚美尼亚人善于做官，而且經商也是非常成功的。在整个王国内，有着好几千亚美尼亚人；他們的望族和十字軍的望族互相通婚。叙利亚和圣地的犹太人，人数不多，但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差的；和这个时候他們在西欧所經受的待遇相比，有天淵之別。这批犹太人是商人、手艺人 and 手工业者(染色业几乎完全在他們手里)、貨幣兌換商、征稅員、庄园的管帳員和管家。他們保存了他們的宗教集会和学校。犹太人虽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但是也得到容忍。

王国的东境上的貝督英部族是很活跃的；他們飼养无数的牲口群，馬匹、羊、駱駝；他們不断地从一个牧場移到另一牧場；碰上他們敢于或能够行动时，他們对基督教領土进行掠夺侵襲。他們当中有少数部族比其他部族較少遊牧性，但它們都是“强悍而冒險

的部族”，并对基督徒的敌人，有默契的傾向。薩拉丁在1187年舉行大進攻時，善于利用這些部族；因而占領了耶路撒冷。

歐洲人的源源流入，對耶路撒冷王國的軍事力量，是很少裨益的。因為其中大部分是朝聖者、旅行家、僧侶、商人。王國經常急需要有力的軍隊；軍隊力量不足，顯然是十字軍為什麼未能征服敘利亞內地、占領大馬士革和阿勒波的主要原因。在占領“聖城”之後，很多十字軍士，認為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而遯返本國了。還有更多的人，離開那里，因為他們的幻想已經破滅，或者因為他們在大規模的占奪土地中，運氣不佳。因此，不多年以後，只有一小撮貴族留在那里。如果這支軍隊不是不時地由十字軍的新隊伍來補充，耶路撒冷王國的軍事效能將會十分減弱，連征服加黎利和那普魯斯也將成為不可能了。除在非常緊張的時期，象在1146—1147年和1187—1190年穆罕默德教的威脅達到頂峯的那樣，真正十字軍對固定人口的增加，所補無多。他們和朝聖者一樣時常來來往往。真正移入境內而永久居住的人，是從地中海沿岸港口來的商人階層。因此，商業興旺起來，但這是唯一的繁榮象征。政府無能，政治腐敗。然而，另有一批人，蜂涌而來，而他們是最壞的分子；就是，西歐社會的渣滓：碼頭流氓、海岸上拾荒者、陸上小偷和水面小偷、乞丐、走江湖者、亡命之徒、得到假釋許可狀的犯人、逃犯、釋放犯。扎克·得·維特里曾寫過一篇精彩文章來描寫這一批傢伙。

為了移民于受到破壞的地區，國王鮑爾文一世曾力圖吸引一部分住在約但外部的基督徒移入。在1182年，馬倫教派^① 雖在安提阿教長面前宣誓要放棄他們的舊信仰，但拒絕離開他們在黎巴嫩山上的要塞。在耶路撒冷王國內，亞美尼亞人、查科拜派^②、希臘

① 由敘利亞僧侶馬倫(Maron)所創立；這一派基督徒住在黎巴嫩山側。——譯者

② 即一性派，由查科布斯(Jacobus)所創立。——譯者

人和叙利亚人消极地接受了拉丁統治，但是他們沒曾宣誓要放弃他們原来的基督教宗教形式。这些居民在城市里构成了又活动又聪明的中等階級；他們享有保持財產之权，并在他們自己长官(叫做“雷斯”)的管理下，享有行政自治之权。

叙利亚的基督教殖民地在十二世紀时，尽管它們的政治組織是不稳固的，但还是欣欣向荣地发展着，这一状态对欧洲的一般文明是有貢獻的。主要是因为大批意大利移民从事于經商的活动。在占領的初期，港口各城市民階層被禁止占有土地。但这項禁令不久廢止了。要阻止聚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法兰西人、意大利人、佛来銘人、日耳曼人、英国人在城市中獲得小塊土地作为花园、葡萄园、果园和住宅，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东方形成了一个专心致志于貿易而不能作战的市民社会，这一社会很快地抓住太尔、西頓、凱撒利亚、亚克、貝魯特、扎发、亚实基倫各城的商业。这里，由于需要和环境关系，还不得不撤銷封建法律，因而不事战争的人口日益成长起来。貴族階層，尤其是在軍隊任职的騎士，由于高傲的习气，不愿同平民軍隊并肩作战；而在同一时期，西方的市民軍隊在作战方面已表現得很好，象倫巴城市的市民軍隊，1176年在累格納，1214年在布文所表現的那樣。

連被輕視的叙利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到后来也象从西欧来的有錢者那样，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在这一类的居民中，有着甚至比意大利人更为銳敏的商人，因為他們是本地人；但是他們在軍事方面，比西欧商人更少有影响，因為他們被疑是同情于敌人的；他們固然不愿意去作战，即使他們愿意去的話，在戰場上，也不会被信任的。这个市民階層在东方頗有勢力。当十字軍隊到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时候，他們已看到拜占廷政府的大批民法依然有效，因为阿拉伯人曾很聰明地保留它作为臣服基督教徒的法律。这种法律后来大量地并入一种特別法典，叫做“市民法院法令汇编”，这

是在 1173 和 1180 年間編訂的。這一法典值得一提，因為當這類法律在西歐方面，還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時，它已是一部完備的市民法典。當時，在西歐所有的少數城市憲章，還遠不能認為是市民政府的完備組織法。只有 1183 年倫巴城市的大憲章最為近似。

十字軍的侵入“聖地”，原來是經由陸路的，所以必須獲得海口來維持通往歐洲的交通綫。意大利城市的艦隊之所以幫助他們這樣做，不是由於什麼宗教的觀念而是由於要獲得商業利益的動機。對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來說，十字軍似乎是替它們“開放門戶”。它們從開始時起，即抓取這種機會；當十字軍使用它們的艦隊，不論用在戰鬥象在進攻太爾城那樣，或用在西歐的運輸時，它們就要索取大量報酬。意大利城市艦隊曾給予很多極其有效的幫助。1101 年 4 月 25 日，鮑爾文一世曾和熱那亞人締結了條約，規定熱那亞在每個由於他們援助而占領的港口城市里，可獲得一個“居住區”和 1/3 的战利品。於是，十字軍立即開始對敘利亞海岸港口的進攻，而且城市一個接一個地被占領——1101 年占領阿蘇夫和凱撒利亞，1106 年占領阿帕米亞，1109 年占領雷奧狄西亞，1124 年占領太爾。甚至還在征服之前，他們已對這些土地作了瓜分！熱那亞首先援助了波希蒙德，即當時的耶路撒冷國王，來占領的黎波里；因此，它在安提阿、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各獲得一個“居住區”。比薩因援助耶路撒冷國王而獲得了扎發的一個“居住區”。威尼斯也曾幫助過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

拉斯金在《聖馬克墓》^①一書里，生動地描寫威尼斯在有力的總督多米尼谷·邁克爾領導下，怎樣在太爾獲得了最大部分的战利品：

^① 拉斯金（1819—1900 年）是英國藝術家與文學家；他所著《聖馬克墓》（“St. Mark's Rest”）是敘述威尼斯的歷史的。——譯者

總督留他的兒子負責國政，自己率領四十只大艇及二十八只有鐵嘴的戰艦，啓程往“聖地”去……每只有鐵嘴的戰艦各有一百支槳……它們引誘薩拉森艦隊出海，而後予以猛攻……在這次戰役之後……跟着召開了軍事會議，會上激烈辯論：應圍攻太爾，還是應圍攻亞實基倫。因為意見紛紜，莫衷一是，這事情提給上帝判斷。他們把這兩個城的名字放入一只籤筒內……太爾中籤……當時，它尚是一個光榮的城市，尚是海上財寶的王后；它主要以玻璃和紫袍出品而出名，它控制一個富饒的平原，水量充足，灌溉完善；它也以出產甘蔗而著名……為了援助這次大圍攻，威尼斯人提出條件：在每個隸屬耶路撒冷國王的都市里，威尼斯人應獲得一條街道、一塊廣場、一個浴場、一所烘面包房……以及飲水和麵包的適當控制，全部免稅；他們應使用自己的天秤和度量衡……於是，法國十字軍士和威尼斯人就分段圍攻太爾城；前者從陸上，後者從海上進攻……其時，他（總督）所帶發給水兵的餉銀，已經用盡。但他並不想要依靠匯款來接濟。他製造一種革幣，上面蓋着聖馬克和他自己的盾牌印章。他允諾他的士兵說：每個這樣蓋着印章的革幣將來在威尼斯可換兌一個金幣……這樣，圍攻繼續進行，直到太爾人絕望而乞降時為止。於是太爾人獲得人身和財產的安全保證；但這使基督教兵士深為憤怒，因為他們原來想要劫掠太爾城的。後來，太爾城分為三部分，其中二部分給予耶路撒冷國王，而第三部分則給予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在他們所得的部分內指派了一個文官來管理民政，一個武官來負責軍事……這樣一來，威尼斯國家在亞洲建立了一個穩固的殖民地……而殖民地同薩拉森人能保持着和睦的關係。

在十字軍之前，馬賽似乎已是在南部法蘭西富有商業冒險精神的唯一城市；它名副其實地是意大利城市的勁敵；它把十字軍早期的部分貿易拉到自己的港口。歷史沒有告訴我們關於馬西利亞人^①在拜占廷帝國內有過什麼機構的遺跡，我們也找不到有任何馬賽商人在君士坦丁堡獲得特權的記載。但我們有着各種資料，說明馬賽在巴勒斯坦所獲得的成功以及它參加十字軍的情況。1117年，鮑爾文二世曾認可馬西利亞人在耶路撒冷組織一個由他們單

^① 即馬賽人。——譯者

独居住的“居住区”。国王鮑尔文的繼承人佛尔克，因为他們对他服务有功，准許他們在耶路撒冷王国全境內豁免捐稅。1152年，鮑尔文三世賜給他們巴勒斯坦各港口的商站，連同慣例特权在內。在“圣城”失去以后，在1190年，盖羽·得·拉西格南回复了馬賽人的所享有的特权；他們的船只，不論大小，一概豁免港口稅；他們在圣貞德城設立了自己的法院。这些事件，說明馬賽在亚洲的商业里所有的活动和所有的利益了。1190年，馬賽已有充分的海上权力，能够運輸大批跟着獅心理查到东方去的十字軍隊。

在所有的王国港口內，意大利城市获得了大量的完全特許的租讓权和封建义务的豁免权。这些权利表現在“居住区”贈与方式上，“居住区”是母国在“圣地”領域內一塊脫离王国管轄权的領土。每个集团有着自己的官吏、郊区、貨棧、浴場、教堂，并使用自己的度量衡。在这些西方商人集团中，有的甚至还撈到一批地方稅收。例如，热那亚人在太尔、亚克、雷奥狄栖亚和圣西緬，征收1/3的港口稅。馬西利亚人在1117年得到耶路撒冷的一塊“居住区”，后来，在1152年得到太尔的一塊“居住区”；在这兩塊“居住区”內，他們享有征收捐稅之权。意大利商人殖民地，太忠心于它們的母国，太不信任耶路撒冷王国政府的封建性質，太愛錢若命，因而他們不容許它們的丰富收入被課稅。它們要求完全脫离王国政府終于如愿以償，因为十字軍极需依靠它們的舰队，所以不能拒絕這項豁免权的要求。这样一来，在叙利亚和“圣地”港口上出現了独立的“商站”即外侨居住区(Fondachi)，北京的使館区和上海的租界区，就是这些商站的近代抄本。“Fondaco”(单数)这个名詞从希腊字“Pandocheion”(意指一个貿易地点，或者象东印度公司所使用的“商站”的旧意义)得来；这个名詞阿拉伯人改为Funduk，而意大利人改为Fondaco。

“商站”是一个基本上为了商业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社会，但它

在外国領土內保留着它的居民在母国所享有的社会利益和活动。在圍牆內，往往占有面积很大而經常沿着河边的地方，有一所教堂、一条街道或一所市場、一塊廣場、几所浴場、烘面包房和釀酒作坊、一所办公室以及其他住所，还有几所儲藏貨物的大儲棧。这种居留地有时竟包括一个市鎮或一个城郊的整个地区。外国商人在他們自己法律的管轄下住在那里。這項治外法权經常載入特許狀里；有时还有一項条文：凡本地人和外人間的訴訟案件，概归外人法院并按外人法律审理。意大利商人依靠这种特权的保护，易于壟断利凡得的商业。除經營商业之外，殖民地上的行政，是由母国政府派專員来掌管，叫做“領事”（热那亚人和比薩人），或叫做“監督”（威尼斯人）。这些职位由意大利最大望族来充任，在尊严和財富方面，堪与近代英屬印度各省的总督相等。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港口上，“三巨头”——威尼斯、热那亚、比薩——不是完全勢均力敌的，但象在太尔和亚克这一类的最重要海港上，它們都有“居住区”，其中亚克城最为重要。威尼斯人在爱琴海、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細亚各港口的商业活动，比在“东方”还要大；在叙利亚和“圣地”內，热那亚占第一位，比薩占第二位，而阿馬斐占第三位，直到馬賽赶过它为止。利凡得港口是古代商路的終点；这些来自波斯灣一端、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商路，自古代以来，都輾集于地中海沿岸。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两地构成一种类似亚洲和地中海間的緩冲国，經過这里，它們和欧洲維持接触。从海岸向后，有两座平行的山脉，两山之間是又深又寬的盆地。这双重的屏障，有时被橫截的山路所切断，主要是在阿勒波和安提阿之間、在霍姆斯和的黎波里之間、在大馬士革和太尔之間；商路就是通过这些地点的。象哈馬和波斯特拉这一类的內地城市，因为成为从穆罕默德教腹地来的商路上的中途站而获得利益。后来，无孔不入的意大利商人，滲入这些內地市場；甚至在阿勒波

和大馬士革也設立了支店。我們也應談到有些象米丹和伊布林那樣的季節市集。在拜占廷和阿拉伯統治時代很出名的耶路撒冷九月市集，仍由十字軍繼續舉行。從香賓市集來的商人們都會集在聖貞德城里。

東方流通的貨幣，和人口的複雜情況一樣，種類繁多。當十字軍征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時候，他們看到那里不僅使用着拜占廷帝國貨幣，也使用着穆斯林人貨幣，為的是使貿易關係不致中斷。此外，十字軍也從西歐帶來了各色各樣的大量貨幣。耶路撒冷國王和王国的大男爵不久也建立他們的造幣廠。但市面上最流通的貨幣，還是拜占廷和阿拉伯貨幣。主要金幣，是希臘“貝占”幣（值一百八十銀便士）和阿拉伯地那幣。銀幣中，有希臘銀幣、法國圖爾銀幣、的黎波里銀幣以及安提阿銀便士。十字軍國家沒有鑄造過銅幣，只把自己的圖案刻在拜占廷和阿拉伯銅幣上面。“耶路撒冷憲章”列舉“貝占”、“地那”、“銀馬克”、“蘇”（即蘇里德，等於十二便士）各種貨幣；還有小輔幣：阿拉伯第倫（dirhem 從希臘文 drachma 得來）、卡洛布（kharoub 從希臘文 cheration 得來）以及拉波因（rabouin）。銀馬克不是一種貨幣，而是一種計算價值的標準，象今天英國的基尼^①那樣。貝占、地那和法國聖路易金幣是差不多等價的金幣，它們的實價約合十先令或美元二元五角，但它們的購買力在中世紀時代遠超過這個數額。銀幣折合美國的五角幣，或者約合英國的半皇冠幣（二先令，六便士）。但是，也須注意到購買力方面的差別。在十三世紀中，威尼斯和熱那亞百合幣^②和佛羅倫薩百合幣出現於利凡得。為了便利內地貿易起見，曾鑄造出一種特別貨幣，叫做“薩拉塞那”（sarracenat），一面刻着基督教象徵和文字，另一面刻着穆罕默德教象徵和阿拉伯文字。這種

① “基尼”的價值規定為二十一先令。——譯者

② 百合幣（florin）是表面上印有百合花紋的金幣。——譯者

湯克勒德^①所发行的貨幣，今天是最稀罕的一种貨幣。

这种东方貿易中所包括的商品，有当地产品和进口貨两种。叙利亚在农业方面出产橄欖、葡萄酒、食糖、枣子、无花果。黎巴嫩的杉木提供有价值的木料。叙利亚棉織品和絲織品是很珍貴的。生絲出产于安提阿、的黎波里、托托薩；安提阿的錦緞、太尔的玻璃器和金屬器、灯盞、杯盆、陶器、瑱瑱品，都是出名的；金綫布和帷帳在亚克制造；有很多染坊，設在的黎波里、拉塔奇亚、薩基塔、希伯倫和耶路撒冷；太尔是一个制糖业中心。在約但河出口处气候近于热带的冲积平原地，我們还可看到十字軍制糖厂的遺址，但現在已荆棘丛生。肥皂在安提阿、托托薩和亚克制造；甘露酒、果浆到处都有；耶路撒冷有一所制造一种叫做啤酒的酿酒坊。食盐是在死海沿岸煮炼的。

利凡得商品，主要是屬於奢侈品的貿易。关于这一点，有保留下来的稅册可資証明。这些商品中包括有棉織品和絲織品、金銀綫織成的衣料、太尔玻璃、陶瓷器、錫兰珍珠、印度宝石、象牙、染料木、葯材、阿拉伯香粉、香料、香味及香料酒。还有裝飾品、香粉、調味品等等。这些产品除在利凡得外，不能从任何別的地方找到。象胡椒、丁香、麝香、肉桂和生薑这一类的东西所可获得的唯一地方，是巽他群島。所以和利凡得进行貿易是必要的；所轉运的商品，容量小而价值高，但可有巨大的利潤。

在交換方面，西方国家除了下列原料之外，再也沒有什么別的东西可以出口：谷物、奴隶、羊毛、皮革和毛皮。所以，所有貿易上的差額，經常用金銀的出口来抵消。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十二世紀中引起了現款的巨大需要，因而刺激了貴金屬的流通。由于这个緣故，封建欧洲的自然經濟遭受破坏；而它的地位开始被貨幣經濟所

① 第一次十字軍中諾曼人的領導人。——譯者

接替；这样，在十二世紀中，歐洲的整個生活上發生了複雜的革命。

我們容易看出：什么东西需要最大，而這種需要的動機是西歐對那些有吸引力的奢侈品之慾望。但是，我們不能很容易地確定：這種慾望在十一世紀末期是否完全是新的，即是否是由十字軍所創造並刺激出來的。換句話說，歷史家在討論這一段重要歷史並企圖就有關的力量作出相對的估價時，茫然不知：什麼是原因，什麼是結果。十字軍是造成這種慾望呢？還是這慾望刺激了十字軍呢？對於這個不能理解的問題，沒有明晰的答復。

我們很驚异地發現：耶路撒冷國王沒有好好利用他們周圍的這些財富而獲得了利益。他們所擁有的物質財源，確然比當時西歐君主所擁有大得多。從本地人用阿拉伯文字所寫並保存着的關稅章程看，各港口所課的關稅，似乎已給他們很龐大的進款。還有向隊商征收的通行稅，以及按拜占廷先例而在工業方面所實施的很多專利事業。鑄幣權完全屬於國王、屬於安提阿親王、屬於的黎波里和以得撒的伯爵。國王有權訂立或撤銷賦稅，他占有港口最有利的關稅（亞克的關稅包括一百十四項東西）；他課征船稅和隊商稅；他收集穆斯林人和猶太人的人頭稅；王室領地，範圍廣大，包括森林、葡萄園、果園、礦產、采石場。可惜國王不善于使用這筆大財產，而把它浪費於教會和軍事寺院團方面；不使用它來僱傭兵士保卫王國而讓它從他的手指間落到貪官污吏手里；甚至讓唯利是圖的資產者也分沾其中一部分。

教會在東方所得的利益最多，而所給予社會的報答却最少。當十字軍進入巴勒斯坦後，希臘教會被推翻。希臘教長逃亡在塞浦路斯島上。新建立的寺院收到大批土地贈與，因而在東方和在西方早已存在的情況那樣，僧侶也成了大地主。他們甚至在歐洲也擁有龐大數量的地產。1178年時，耶路撒冷的郇山寺院所擁有的財產包括：郇山及其附屬地，城內的一個完整的“居住區”和開放一

个城門的权利,叙利亞、亞實基倫、扎发、那普魯斯、凱撒利亞、亞克、太尔、安提阿的乡村地产,太尔的若干房产和一所教堂,西西里亞的阿达那河上航行免稅权。此外,在欧洲下列各地区內,都有教堂和房产:西西里的格尔真提和喀大尼亞主教區內,意大利的亞爾巴諾和巴費亞的主教區內,法国的奧爾良、布尔日、波亞疊、瓦倫斯等的主教區內。

几乎所有的东方寺院以及軍事寺院团在西方也有規模很大的領地,这是在十字軍首次热潮里象陣雨般地贈給寺院的捐贈;拉丁圣馬利寺院、郇山寺院和約瑟发特圣母院所收到的特別多。那为保护朝圣者而建立的意大利圣雅科波·达尔托帕沙寺院团,在巴黎拥有財產。关于这种領地的巨大規模,我們可以十字軍救护騎士团的例子來說明。它們在西方所占有的土地,数量上这么多,以致把欧洲划分为七省,叫做“方言区”,再分成为修道院区。这种按方言的划分法,不是沒有意义的。遺留下来的文献資料包括产权証、租簿、什一稅簿、登录册、地产帳簿等等形式以及关于这些財產的管理,数达几万件之多。单就奧汾涅“方言区”來說,这些文献有四万多件。在这些卷册內,列滿着騎士团的采邑表。下列事实可說明对軍事寺院团的热潮达到了多么高漲的程度:亚拉崗和納瓦爾国王阿尔凡索一世在 1131 年逝世时,把他的整个王国留給圣墓教会、神庙騎士团和十字軍救护騎士团;这一贈予由于国内各等級的反对而未曾实行。

与其說教会是王国的一个砥柱,不如說它是王国的一个弱点。教会的財產,包括土地、葡萄园、果园、市場权利、港口特权已这么多,后来虽欲用法律来限制給教会的贈与亦屬徒然。这些財富激起了貴族和軍事寺院团的貪得无厭心理,因而王国的統治力量比前更加分裂而互相敌对。而且,教会采邑在“圣地”不象在西欧那样,是不負擔軍事服务的。这些土地租給小农、园丁等等,或者由

不自由的劳动力来耕种。教会的領地日益靠着牺牲貴族和国王的領地而增长起来,但男爵与国王是王国的当然捍卫者。

軍事寺院团,虽是王国外部穆罕默德教敌人的可畏仇人,但它們却也是一个內部衰弱的根源。它們完全脫离政权而独立,只对教皇負責,好象純粹的寺院团那样;它們保有土地而不負擔軍隊服役义务的。实际上,軍事寺院团和教会一样,已构成国中之国。它們的財富是龐大的——整区的領土、廣闊的領地、城市、堡壘、要塞、葡萄园、果园、羊群和牲畜場、矿場、采石場、市場权利、港口豁免权;此外軍事寺院团在基督教欧洲每个国家里还拥有类似的贈地。然而,据說,它們的土地比僧侶的或男爵的土地管理得好,耕种得精細。它們从欧洲土地上的收入,大部送到东方去,来建造宏大的城堡;这些城堡的遺址,今天在耶路撒冷王国的旧邊境上,还使遊客們惊羨不止。

其时,当东方出現上述的事情时,在西欧方面,第一次十字軍也产生了一些奇怪而又出乎意料的效果。封建欧洲的整个社会被投入了一种流动的状态里。旧的情况开始迅速消逝,而新的事物也接踵而来。普遍浮动状态滲入所有的階層,部分由于宗教的激动,但大多由于新的不习惯的經濟和社会条件所引起。自从羅馬帝国时代以来,欧洲从沒看見过有这么多貨幣在流通着。成千上万的农奴已得到自由,而那些仍被奴役的人們則滿腔不滿而有貳心。騎士和貴族繼續押出他們的土地以求現款;寺院以及那些窖藏現金的狡猾之徒因此获利;高利率到处流行;抵押期滿还款拖延;因而債主拒絕承認贖回权而占取了抵押品。城市正在要求特許狀;市民階層成长为一个人数众多而突出的階級。僧侶階層勢力膨脹,世俗君主大为震惊,因而对教会改革者所竭力提倡的“教会自由”,比前更加側目而視。参加十字軍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因为热心的亲戚朋友往往以金錢、馬匹和盔甲等礼物,慷慨地饋送

給行將出發的十字軍戰士。

在上述的影響和因素里，所謂“十字軍的特權”產生了一種又新又不調和的狀況。烏爾班二世對十字軍曾允許消除罪孽，也許還會允許物質利益。確然，物質利益不久就給予那些參加十字軍的人們；可是這也發生了不得人心的反射作用。這批人在離開的時期，不得因為債務而受到控訴；他們終身或在某一時期內豁免付稅；他們無須領主的同意可轉讓他們的土地；他們不得被傳喚到世俗法院去受訊，而在法律程序方面，獲得僧侶特權。十字軍戰士的妻子、兒女、財產和所有物，受到每個主教區主教的保護。這使封建主階層深為憤慨；他們認為：他們的監護權遭受了侵犯，而這監護權對他們來說是有利可圖的。在十字軍戰士返國前，或在死亡未証實前，對他們的財產，不得提起任何訴訟。教會曾宣布一項十字軍戰士延付債款的命令。1145年尤金三世曾發布命令說，“如果任何欠債的人愿誠心走上神聖旅程，他們得不付已經到期的利息；又如果他們或別人曾宣誓過付利息的話，我們以我們使徒的權力來解除他們的誓約。如果他們的親戚或他們所住土地的領主不能或不願供給他們必要的現款，他們無須獲得他們領主的同意，得把他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典當給教會、僧侶或其他的人。”

當然，教皇這種高壓手段的立法會觸怒世俗王公的，因為那是對宗主的封建特權，進行了大膽的侵犯；而且，這種立法從經濟觀點來看，也是不公平的，因它剝奪了債主階層的合法進款和收入，也沒有按法定程序而取消了債務者階層的義務。准許附庸沒有獲得他們宗主的同意得處理他們的土地這一辦法，動搖了封建政府本身的基础。除這些怨言之外，還有農奴要求自由作為走上十字軍道路的報酬，如果受到拒絕，他們就走了一走了事。

腓力奧古斯都，剛在1190年第三次十字軍離國之前，制訂了法律來取締這種債務上的流弊；規定未來的十字軍戰士可展期兩

年清償他們的債務；但附有一項條款：1/3 的債款必須在出發前交付，1/3 在一年後，最後一批在第二年底。凡有土地的債務人，可把土地轉交給他們的債權人；領主對此行為，不得加以阻撓，除非他們已和附庸的債權人親自協商妥當。僧侶和騎士，沒有土地或其他財物作抵押者，在出發往東方之前，必須提出保證人。在債務人離開的時期，債主不得對他提出訴訟，除非訴訟在債務人參加十字軍前，已經開始。如果有任何十字軍戰士抵押或轉交他的土地，定期若干年，債務人在第一年應收取土地上的產物或收入；但債權人為了取得這一年的補償，在這抵押或轉交的產業滿期後還可繼續保持一年。然而，如果債權人耕種這抵押的土地，他得收取收穫的一半作為勞動的報酬。

可是，教廷繼續恪守那早期不公平的和破壞性的政策，即照顧債務人而損害債權人的政策。1215 年時英諾森三世規定：所有的十字軍戰士概將豁免捐稅、關稅及其他的賦稅；如果有人對十字軍戰士的財產進行訴訟，將處以宗教譴責的處分。到期的利息積累，連利息的欠款在內，都被專橫地取消。“如果有債權人勒索利息，應以宗教懲罰方法迫使他退還所收的利息。”猶太人當然由於這不利的教會立法而倒霉。“我們命令：世俗政權應責成猶太人退還利息；在他們退還利息之前，一切忠實基督信徒不得和他們來往，違者將處以驅逐出教的處罰。世俗政府為無力歸還猶太人債款的人，規定一個有效的延付時期；使他們在啓程之後不將為了付息而蒙受不便，直到對他們的死亡或回來已經確實知道時為止。還應責成猶太人在扣除必要開支之後，把其時從抵押的財產所收到的進款算作歸還的本金，因為這一種偏袒，即延緩歸還而不撤銷債務，看來不會產生多大損失的。”

毫無疑問，教廷所頒布的這種橫暴而不合商業常規的立法，使歐洲的統治階級、擁有產業的階層以及愛錢若命的中產階級對教

廷的不滿情緒大大地加劇起來。教廷所採取的措施，就是那項聲名狼藉的財政政策的一部分，後來流弊叢生，以致較穩健的分子都起而反抗。1303年，邦尼非斯八世的垮台，是這些弊端的累積所引起的。教皇的財政政策對歐洲有產者和債權人是不公平的，對商業又是有破壞性的，但窮人，負債者階層當然是歡迎的；因為這批人樂於一筆勾銷了他們的債務或減去了他們債務的一半。教廷以這種措施來獻媚於群眾，但它對商業的穩定性和任何穩固的社會來說，是有破壞性的；所以教廷終於收穫了它淺見的、詭詐的、不公平的政策的水果。

其時，在十二世紀後期，東方的形勢，更為惡化。1144年，以得撒的喪失加速了第二次十字軍的東征，但完全失敗了。只有在聖伯爾納德到過的地方，才對第二次十字軍有著狂熱。他的火焰般的激烈演說，使成千上萬的聽眾陷於情不自禁的狀態。當他講話的時候，聽眾從他身上撕下布條，做成十字架。他寫道，“我張口講話後，城市村庄頓變荒地。大家到處只看到寡婦，而她們的丈夫還活着。”情況更惡劣的是，在大馬士革有一個新的可怕的穆罕默德教國家形成起來，在那里總督努勒丁脫離了巴格達哈里發國家，自立為一個獨立的統治者並不久控制了巴格達勁敵埃及法提馬朝國家。阿拉伯敘利亞和埃及的這一聯合使耶路撒冷王國陷入老虎鉗口當中了；因為過去當埃及和巴格達互相敵對的時候，聖地可獲得某種程度的安全保障。努勒丁的繼承人，是庫爾德族酋長薩拉丁；他是十字軍時代最偉大的穆罕默德教首領；在1187年他占領耶路撒冷，並蹂躪了“聖地”；但對基督教敘利亞沒有進攻。他是一個公正而又崇高的人物。

薩拉丁在占領耶路撒冷的时候，准許基督徒携走他們所有的財產，并給予四十天期限使他們揀選所願意拿去的东西。阿拉伯作家舉出例証來說明這項准許曾被利用到什么程度。易賓·厄爾·阿提爾說道：“法蘭克人的大

教长离开城市的时候，携带教会的财宝数量惊人，只有上帝才知道这财宝的总值。”伊馬德丁当看見教长带走基督墓上的金銀飾物时，向薩拉丁諫諍說，墓上“現有价值二十万金币以上的东西。您給基督徒的安全是为保障他們的财产的，而不是为保障他們夺去教会的飾物”。薩拉丁回答道：“讓他們去吧。要不然的話，他們会指責我們的背信。他們不懂得条約的真正意义。讓他們有机会来讚揚我們宗教的寬宏大量吧。”

为要了解耶路撒冷王国的不幸的来由，我們必須从比王国内部衰弱和分裂更远的根源来寻找其原因。王国的保卫，不仅依靠軍事寺院团、騎士及其他軍事附庸的力量，而且依靠那由十字軍所产生的海权之維持与完整。但这項海权，是分裂的而不是統一的。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在商业上是激烈的竞争者。

显然，沒有充分的財富可滿足所有这些貪得无厭的商业城市的；它們各想要求壟断地位；結果，比薩人对威尼斯人开战(1099年)；比薩人劫掠阿馬斐城(1135年)；阿馬斐的商业权力从此垮台；热那亚和比薩在叙拉古作战。圣伯尔納德在第二次十字軍前对热那亚和比薩的冲突的調解，暫時得告成功，但不久以后，它們之間又爆发敌对行动。1155年比薩人和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打过一次仗；在1156—1158年間，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薩之間在亚克打仗。参加这些冲突的还有：加达魯尼亚人和圣約翰騎士团，他們是支持热那亚的；布罗温斯人、教长、圣殿騎士团和条頓騎士团，他們是站在威尼斯方面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是主要竞争者。威尼斯享有最大部分的对通过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廷帝国各港口的貿易，而对埃及的貿易几乎获得壟断的地位。太尔的威廉說过，亚历山大城是“两个世界的市場”。重要性次于亚历山大城的是达米伊塔，也在尼罗河三角洲上。

威尼斯在埃及多年来所享有的壟断地位，不能持久。在十二世紀后半期，热那亚人和比薩人渗入了亚历山大城和达米伊塔，在

那里，他們也获得了商站。至于个别的商人，他們从各地蜂涌而来。西班牙犹太人杜德拉·本杰明(死于1173年)，遊遍东方各地，他举出有二十八个国家或城市的商人出現于亚历山大城的商站和商場上。由于商业竞争的緣故，海权国家間互相分裂对峙；这就是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大弱点。威尼斯和埃及秘密勾結，来阻止亚实基倫的占領；这一事件表明一个基督教国家多么严重地背叛了十字軍的事业。

耶路撒冷的陷落加速了第三次西方对东方的大出征。英国理查一世、法国腓力奥古斯都和德王兼神圣羅馬皇帝紅鬍子腓特烈这三位国王联合行动。可是，虽沒有象第二次十字軍那样遭到大失敗，第三次十字軍也未获成功。皇帝溺死于西里西亚。法国腓力不久返国，理查在表現惊人的勇敢以后，即使不是失敗而归，也是狼狽返国的。所有第三次十字軍所真正完成的，只是克服亚克而已。

在第三次十字軍的历史里，我們得窺見一种屬於經濟性質的有趣味情况。叙利亚、小亚美尼亚、小亚細亚和君士坦丁堡，对于“圣地”的丧失，并不和西欧一样地感到遺憾，因为这事件使貿易稍微移轉到它們方面。威尼斯过去对于亚克的丧失，曾庆幸热那亚所受到的打击，因为在那里热那亚比它更有势力，現在亚克的克服使它感到憤怒。其时，威尼斯在太尔的势力比热那亚要强。至于拜占廷皇帝，在这个时期由于很怕威尼斯人在黄金角的傲慢态度，1189年同薩拉丁进行談判。在第三次十字軍里，十字軍隊勢力的集中点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沿海岸城市，因為它們对意大利城市是很需要的。由此可見，城市的經濟自利心超过十字軍宗教动机。克服“圣墓”和“圣地”，不复是主要的目标了。

据一个阿拉伯史家的記載，当腓力奥古斯都和獅心理查来到圣貞德城的时候，圍攻已进行了两年之久而未有結果，虽然在那里集結着六十万大軍。在基督徒軍隊中，紀律和統一指揮一向是缺

少的。在盖羽·得·拉西格南和蒙斐拉侯爵之間，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他們各想把新来的人拉入自己方面作战。另一方面，十字軍营陣，以其全部长度，已成为一个大市鎮，建造得几乎象一个永久性的城市一样，有教会并有陈列着一切东方商品的市場和商場。按兵不动是对軍隊紀律的一个致命伤。在初冬，那完全經過海道送来的軍糧供应中断了，因而对十字軍隊來說，开始了一个飢餓受苦时期。在1190—1191年冬季，他們不得不宰杀軍馬作为食物；有些基督徒甚至逃入土耳其人营陣，而成为穆斯林，以求一飽。他們搜集树皮草叶来作湯羹。当时有两个中士所有的財產，只剩一个安泽芬便士；他們商量好久之后，决定用它来买一些蚕豆；商人給他們十三粒蚕豆来換取他們的便士，他們发现其中一粒是虫蛀的；一个中士不惜走了很长的路程来調換它。还有疫疾，跟着飢餓而来；冬季雨水泛濫营帳，并引起了流行病。“每个人开始咳嗽而变成声啞，两腿开始浮肿，而头也如此。牙齿脫落。”最后，到了春季，有几只运粮船开到，而在下一天，麦价就从每担一百貝占猛跌到四貝占了。

在这长期圍攻里，获得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就是在战斗間歇期中，穆罕默德教徒和基督徒之間建立了几乎是亲密的关系。他們彼此懂得尊重对方，有时他們还互相开开玩笑。“圣战史”的作者，尽管害怕薩拉森人的宗教，但情不自禁地讚揚他們。商业关系也依然繼續着；貴重的奢侈品，經過双方協議，得通过战綫；这一交易使穆罕默德教徒和基督徒都得到好处。

在一次停战时期，薩拉丁同理查一世約定：商业契約和商业应繼續进行。1191年7月13日，亚克被圍的穆罕默德教守兵覺得没有什么希望乃投降。依照下列条件，守兵获得自由出城的权利：薩拉丁应付二万貝占贖款，归还“真正十字架”和釋放基督徒俘虜。关于条約执行，規定四十天的暂时停战期；被圍者交出二千人質作

为执行条約的保証。热那亚人和比薩人恢复了他們原先的“居住区”。一个当时代的历史家写道,“兌換商人及其他做生意的人,在城內公开市場里获得了营业所;这些营业所是在他們每年繳付适当租金的諒解下,由国王官吏配給他們的。”

显然,到这一时期(1190—1192年),十字軍已有深刻的变化。基督徒的进攻,不是針對耶路撒冷,而是針對意大利城市所殷切需要的港口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的商业利益和商业競爭已成为左右局势的最高力量。

在十字軍隊中間,新的不睦不断发生,使进军耶路撒冷的每次企图成为不可能。比薩人和热那亚人互爭霸权,而蒙斐拉侯爵和勃艮第公爵之間还公开打起仗来。

在这个时期,业已迁到亚克城的耶路撒冷王国又延长了寿命,并經歷着“海上的又丰富又奇异的事物的轉变”。理查一世在他的前进途中,已占領塞浦路斯島,在那里有一个叛乱的拜占廷省长曾建立政权,而自称“皇帝”。这项占領,在理查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把这个“地中海上的产銅王后”售給圣殿騎士团,换取十万金貝占,其中四万貝占当即支付。但圣殿騎士团无力續付其余的款子,因而理查按同一条件再度出售这个島給盖羽·得·拉西格南,即那被逐的耶路撒冷国王。他約定:支付六万金貝占給英王,并归还四万金貝占給騎士团。

盖羽·得·拉西格南頗有見識,在塞浦路斯島努力吸引殖民来到島上;他用慷慨贈与土地和賜給封建性与商业性特权的方法,成功地吸引了那批被薩拉丁的征服而弄得无家可归的移民。太尔的威廉的門人說道:“我們看到穷苦的制鞋匠、石匠以及那批只依靠代書謀生的公共代書人,突然在塞浦路斯島上成为騎士和大业主了。”不久,法国殖民遍布島上,他們在本地居民中間,构成了关系紧密的集团。法文成为整个島上的通用語,甚至上層希腊人也

說法文，而希臘文反而降到一種土語的地位。法國建築師把他們的地方性的建築式樣，傳入塞浦路斯島上，而教堂和城堡似雨後春筍地出現島上，這些遺跡今天還可證明西歐人的影響。

十二世紀中，使意大利顫動不已的激烈、複雜、競爭和商業的生活，到了下一世紀，精力充沛地表現出來了。那是從它過去一切活動自然地產生的一個給人印象極深的高峯。在十三世紀，教廷正在極盛時代；當它對半個歐洲政治命運揮舞威風凜凜的大棒時，威尼斯控制着大部分意大利和利凡得的商業命運。

1187年“聖地”的喪失和第三次十字軍恢復“聖地”的失敗，對意大利沿海共和國的商业，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威尼斯、熱那亞、比薩都受到了損失。但威尼斯很現實，並不徒然悲傷，因而它鼓足勇氣要取得比以前更大的利潤來回復元氣。於是它着眼于征服拜占廷帝國，因為皇帝亨利六世，於1190年兼任西西里國王後，重溫起羅伯特·基斯卡和羅哲爾二世的大膽夢想，要征服黃金角的城市，它就更加興奮；這項計劃差一點就實現了(1197年)。

拜占廷帝國，在一個又無能又腐敗政府下，又在叛亂時起的狀態下，急劇地趨于瓦解。海軍已衰敗，貿易已落在意大利人手里並遠比以前大大萎縮了。因為敘利亞、小亞美尼亞和“聖地”在第一次十字軍後所經歷的“繁盛”已把君士坦丁堡的商業拉去了。西歐商人，寧愿通過利凡得的較多特權的港口來進行貿易。據估計，在十二世紀，君士坦丁堡的商業比原來數量跌落了 $\frac{1}{3}$ 到 $\frac{1}{2}$ 。拜占廷貨幣的貶值，也與此有重要關係，而且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因為拜占廷貨幣自從君士坦丁時代以來，是歐洲和世界上最穩定的錢幣。由於它的貶值，威尼斯和熱那亞的金币和後來佛羅倫薩的百合幣逐步取其位而代之。昆尼諾斯朝末代諸帝不是很弱就是很壞。這皇朝的權力原來是依靠着地主貴族和威尼斯的友誼的支持。但安德洛奈卡皇帝(1183—1185年)改變了政策，轉而依靠那

些憎惡威尼斯商業優勢的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和商人階層。更壞的，他殘暴地削減封建貴族的力量，而建立了恐怖統治。安德洛奈卡曾企圖改革行政，象制止官場的賄賂、整頓各種賦稅、採用省長定額俸祿等；但這些改革所產生的良好效果，都被他所樹立的敵人打消了。甚至當他由於害怕諾曼人的攻擊再度向威尼斯人請求締結聯盟並給予新特權的時候，威尼斯對他尚未釋然於懷。威尼斯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計劃在它的實行之前二十年已經制定。

另一方面，儘管帝國政府又衰弱又腐敗，但帝國內有些省區城市還是興盛的。底比斯在諾曼人劫掠之後，已恢復元氣，它的絲綢製造業又恢復了重要地位。哈爾米洛斯，是一個大商場。薩羅尼加位於瓦爾達耳河口的海灣，是在多瑙河貝爾格萊德和愛琴海之間摩拉瓦-瓦爾達耳河水道之終點，它的重要性不見得亞於君士坦丁堡本城。拉里薩出產無花果和葡萄酒；帖撒利平原是首都的谷倉。地峽上的科林斯和阿克洛科林斯，以靠交叉貿易而興盛起來，而科林斯還是出產生絲和小葡萄干的中心〔小葡萄干（currants）就是從科林斯城（corinth）這名詞得來的〕。在伯羅奔尼撒的西岸上，佩特拉斯的商業相當發達，並有範圍很大的猶太人殖民地；它的重要地位可從下列事實獲得證明：威尼斯人在同希臘帝國最後簽訂的一項商約里，曾要求那裡的貿易便利。斯巴達附近維發那六月市集，每年吸引著希臘和巴爾干半島上大批人到那裡。威尼斯垂涎於黑海和愛琴海的有利貿易。當時拜占廷帝國困難重重：新保加利亞政權被英諾森三世所煽動威脅著它；威尼斯越來越多地要求商業特權，剝削著它；內憂外患同時並發；在這樣的情況下，看來它已瀕於瓦解。在所有的希臘省內，在各島嶼上，在小亞細亞區內，地方權力繼續擴張，對於它們，中央政府已束手無策。

按照教皇所擬定的計劃，第四次十字軍的目的地，原來是在埃及；通過征服埃及，西方國家希望獲得軍事基地來對占有“聖地”的

穆罕默德教徒进行战斗。但威尼斯,关于它所要扮演的角色方面,有着自己的秘密打算。在1201年,有六位使臣来到威尼斯同总督亨利·丹多罗谈判运输条件,其中包括有第四次十字军未来历史家维里哈道在内。我们知道,丹多罗又瞎又老,但狡猾得很,他迫使法兰克人接受苛刻条件,“如此不利于我们方面”^①。他无需乎取得“资本家的精神”,或从任何人吸取剥削的经验。依据1201年3月签订的条约,威尼斯政府同意运送四千五百骑士、九千骑兵和二万步兵连同九个月的军粮到东方去。而十字军承担对每匹马付出四马克,每个人付出二马克的费用,总共八万五千马克,并把所有未来可能征服的领土的一半移交给威尼斯。但十字军的人数比预计的要少得多。因此,不能付出条约上所规定的总额。于是,威尼斯总督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他提议“延期支付三万四千银马克的欠款,直到上帝保佑我能靠征服来获得这笔款项时为止”。他的意思是:十字军应帮助威尼斯克服扎拉;这是在亚得里亚海上威尼斯的竞争对手,位于达尔马提亚沿岸,属于匈牙利王国的。于是签订了条约,1202年11月,远征队乘船出发。扎拉遂被征服。

十字军的征服慾,由于这次胜利而加剧,因而他们成为威尼斯诡计的顺服工具。威尼斯急于要使原拟定的出征改变方向,不往埃及去,因为在那里它和穆罕默德教徒有着巨大商业利益与和平交接。正在这一时期,它为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很感焦虑。君士坦丁堡新近所发生的革命,已严重地损坏了威尼斯在拜占廷帝国内的優勢。亚历修三世袒护比萨人;他不仅限于違反和威尼斯所签订的条约条款,还对威尼斯商人課以新稅。另一方面,威尼斯支持一个皇位觊觎者^②来对抗他。

① “tant con nostre compaignie durra.”

② 指亚历修·安澤拉(Alexius Angelus),爱撒克二世的兒子,他从獄中逃出到西欧請求援助,以求爭夺拜占廷的皇位。——譯者

威尼斯与十字軍間的合同,直到征服扎拉之后,才正式簽訂。陰謀家公然不顧教皇要把进攻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人們驅逐出教之警告,加紧进行他們的計劃。十字軍总司領蒙斐拉的邦尼非斯,虽未参加出征扎拉之役,但不久就到达那里的十字軍营幕里。于是,威尼斯舒展了巧妙的手腕。它使皇位覬覦者允許付給十字軍士二十万銀馬克巨款,亲身参加十字軍以求恢复“圣地”并在那里維持一个五百騎士的队伍。这种安排是聪明的,因为威尼斯可披着十字軍的外衣来掩盖它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計劃,虽然教皇已識破這項陰謀,并断然禁止了十字軍进攻希腊帝国的行动。

1203年6月12日,艦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口外。維里哈道在他的出色一章里^①,描述帝国首都对西欧人所产生的深刻印象。1204年4月13日,这个大城市成为十字軍的牺牲品。搶劫情况,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君士坦丁堡原来是基督教国家中从古希腊时代以来一脉相承古代高度文化和物質文明的一个大城市代表。現在,几乎全部珍奇遺產都被破坏无遺。我們知道,在这以前,大部分古代希腊文学和很多希腊艺术品还是存留着的。物質的毀坏虽比不上人类所遭受的文学和艺术上的损失,但也是令人痛心的。圖書館、宮殿和浴場化为瓦礫場所。維里哈道是一个目睹者,又是一个軍隊的指揮官;他写道,“所得的战利品,多得不得了,沒有人能够告訴你究有多少。黄金、白銀、器皿、宝石、錦綉、銀綫布匹、长袍、灰鼠皮、銀鼠皮以及各种最精致的东西,散乱在地上……。自从世界创造以来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城市,可获得这么多的战利品的。过去的穷汉,現在又富又豪华了。”

在1204年3月,剛在第二次圍攻之前,威尼斯和男爵們間所簽訂的合同上,有着下列的規定:在占領之后,战利品将平均分配;

^①指他的名著《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內的一章。本書敘述1198—1207年的事件。——译者

由六个威尼斯人和六个法国人所組成的选举团将推选一个新皇帝,而新皇帝将获得 $1/4$ 的征服地和君士坦丁堡的两座宮殿。在分割的拜占廷帝国内其余 $3/4$ 的土地中,威尼斯将获得一半,所剩下的部分,将按照西欧的模型,用封邑的形式来分配給军队的将领。后来“拉丁”皇帝获得了君士坦丁堡城的 $5/8$,威尼斯获得了 $3/8$ 和圣索菲亚大教堂。蒙斐拉的邦尼非斯获得了帖撒罗尼迦和馬其頓;法兰德斯的亨利成了阿德拉米兴的領主;布腊的路易成了尼西亚的公爵^①,勒尼尔·得·特列茨成了菲利波波利的公爵;圣波尔的休格成了迪狄摩太春的領主。小块封地,按照每个指揮官的等級和隨員的人数,分成 100 个、60 个、50 个、40 个騎士封地等直到十个騎士封地来分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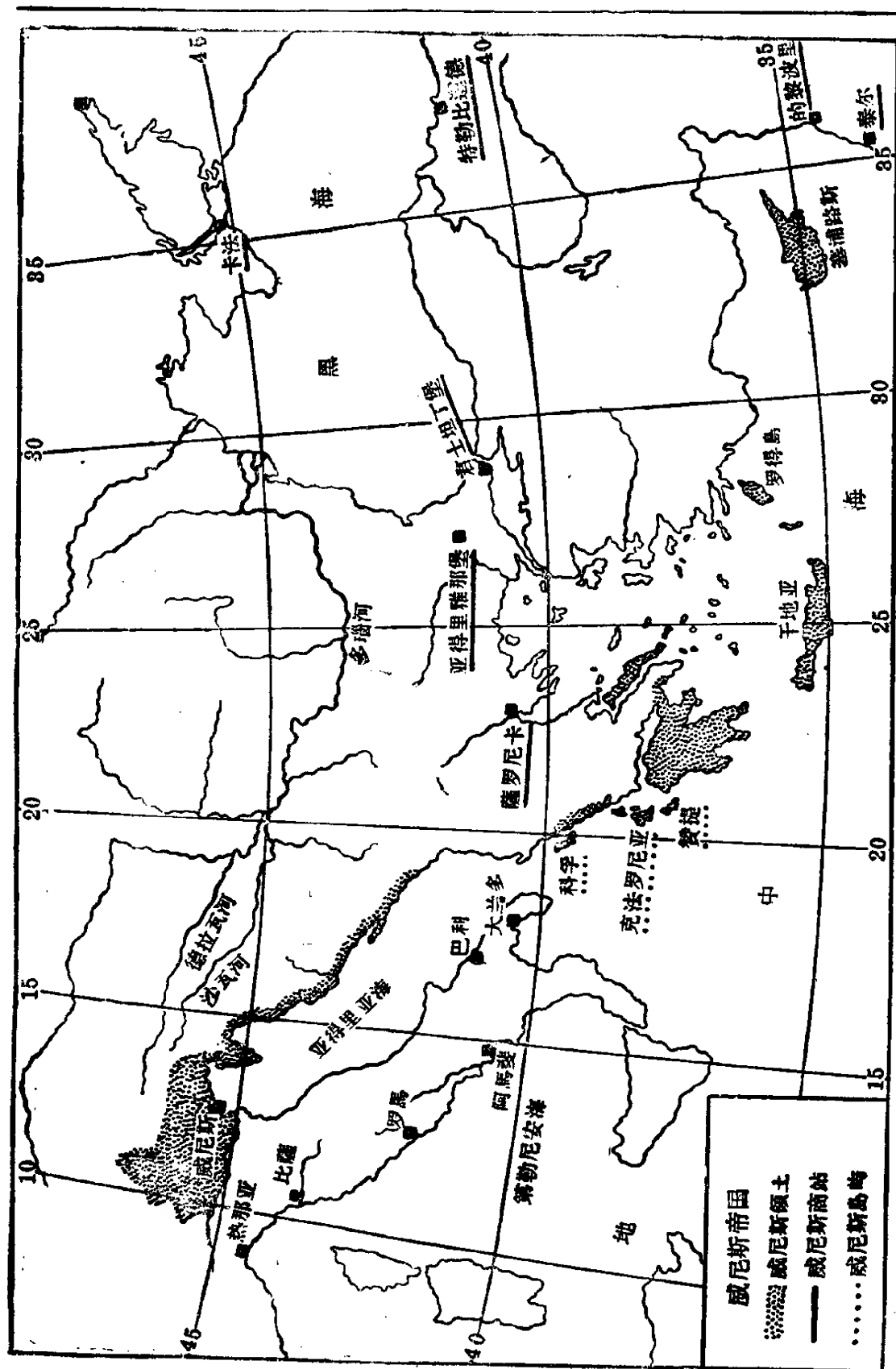
威尼斯人为自己的共和国,保留了那些可保証它的海上优势的部分領土——摩利亚半島上的摩敦和科隆港(以洋紅出名)、伊庇魯斯、阿卡內尼亚、爱奥尼群島、伯罗奔尼撒、爱琴海中島屿、科孚、过去叫做优卑亚、現在叫做涅格勒滂的大島、色雷斯港口(就是,加利波利和罗多斯陀),連同內地的亚得里雅那堡。根据 1204 年 8 月和蒙斐拉的邦尼非斯所簽訂的祕密条約,威尼斯还获得了将要占領的克里特島的产权。

威尼斯人由于他們商业上的狡猾成性和由于他們較多熟悉地方情形,在瓜分条約里,曾获得所有利凡得的最优良港口、島屿和市場。几乎沒有一只战艦,沒有一只商船,在駛入“多島海”^②、黑海或亚速夫海时,不被科隆和摩敦港口上的威尼斯守兵所看到的;这两港很合适地被稱為“共和国的眼睛”^③。

① 他从未获得过这块領地。

② 即爱琴海。——譯者

③ W. 密勒:《拉丁人在利凡得》。



在伯罗奔尼撒半島之上，象百年前在巴勒斯坦那样，施行着拉丁的封建統治。法語成了宮廷上的談話用語和法律用語。在希腊所建立的“新法兰西”（用教皇霍挪留三世写給王后布兰奇的信里所用的确切說法，和威尼斯政权并肩而立。鄂图·得·拉洛士夺取了雅典；赭弗理·得·維里哈道曾征服了摩利亚。威尼斯的優勢增加了。它从“禁海”里逐出每个商业竞争者，尤其是热那亚。它对本地居民所进行的徹头徹尾的剝削行为，需要武力的支持；所以它利用了往东方去的十字軍士和軍事冒險家，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209年，威尼斯借口教皇已批准十字軍出征克里特島，征服了它。馬立諾·薩紐杜自己出資組織一次海盜式出征来征服昔加拉第群島；他夺得那克索斯并充任該島的公爵；他把邻近島嶼以封邑的形式分給他的战友們。优卑亚起初是以蒙斐拉的邦尼非斯的名义获得的；但威尼斯却派遣一个官吏去統治。

十二世紀，是中世紀希腊在商业上非常活跃的时期。帖薩罗尼迦几乎堪与君士坦丁堡爭雄。它在10月市集里，最为熱鬧，届时，在它的街道上拥挤着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看来，这些人在城内可能是保有财产的。克里特和罗得西亚島的港口，是到东方去的路上的半途站，它給一切国家的船舶提供避风暴所这就更不待說了。

从罗马衰亡到1498年到印度去的航路的发现之时期，第四次十字軍对利凡得貿易史上进行了最重要的革命。因为它使威尼斯成为近代第一个殖民帝国。意大利沿海共和国，在叙利亚和“圣地”，已形成这一种制度的要素，但一个商业帝国还需要更深更广的基础。

威尼斯所获得的新領土，对“共和国”來說，似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元老院竟想要总督迁居到君士坦丁堡去。对比薩，而非对热那亚，准予保留它的旧“居住区”以及在希腊皇帝統治时期所

享有的權利。阿馬斐殖民地在拉丁帝國時代也勉強維持着。倫巴人、丹麥人、布羅溫斯人、西班牙人和安科尼坦人也去補充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但所有這些人，都靠着威尼斯的恩賜而留在那里，現在它的一句話等於皇帝的一道詔令。威尼斯是城內的支配權力，它享有絕對的貿易自由，並收取從這些商業區所得的 $\frac{3}{8}$ 的進款。

威尼斯人由於佔據堅固設防的加利波利，由於占有博斯普魯斯海峽和君士坦丁堡的 $\frac{3}{8}$ 面積，獲得了黑海航行的壟斷地位。到1223年時，他們在克里米亞半島上已建立若干“商站”。

那些濱黑海北岸的地區，是君士坦丁堡的谷倉。而且，還有一部分印度和亞洲的貿易達到尤克辛海（黑海）。威尼斯人熟悉黑海地區的資源。他們的航海家有的已侵入那里，因為1196年威尼斯曾派遣一個艦隊開到亞密蘇斯；在克里米亞半島上，它也設立若干商業機構。他們的國旗飄揚在多瑙河、頓河和法息斯河各河口上。他們在頓河口曾建立一塊殖民地，命名為塔那，這就是今天的亞速夫。這塊殖民地成為亞洲商業的一個主要商埠。商隊轉運印度商品，從恒河口橫穿廣大無邊的大陸，達奧克斯河（即阿姆河）岸，從那里貨物用船裝運到里海，在阿斯脫拉罕卸下——因為在十三世紀奧克斯河流入里海，而不是注入鹹海的。從阿斯脫拉罕，貨物用駱駝轉運到塔那，從那里把貨物分散到黑海各港口去。威尼斯和亞洲內地的蒙古族王公所簽訂的條約使威尼斯人得和這些遊牧部族進行有利的貿易。

但當威尼斯人舉杯飲勝利酒的時候，杯中有着一滴苦酒。他們還沒有占領小亞細亞。拜占廷帝國的殘余分子在下列兩地建立了政權——在君士坦丁堡對面的亞洲尼西亞和在黑海畔的特勒比遵德。征服尼西亞，為在陸路上取得和敘利亞的交通綫是必要的，而特勒比遵德把一大部分橫穿亞洲的貿易拉到它的港口去，這樣，使威尼斯共和國在尤克辛海上本來可完全壟斷的貿易受到了阻

碍。正是在1215年，当拉特藍宗教會議禁止基督徒和穆罕默德徒通商时，威尼斯同爱科尼安苏丹签订了同盟条约来反对狄奥多·拉斯卡立斯。1219年同爱科尼安苏丹阿拉丁签订了另一项条约，依这条约，威尼斯商人在苏丹所有的省内获得了一般的安全保证，并对某种物品所征收的关税也明确规定；而且特别指出：珍珠、黄金和精细羽毛不在此限。

威尼斯虽然不能占领特勒比遵德，但它成功地壟断亚美尼亚商业也可作为部分补偿。据史载，亚美尼亚国王和威尼斯之间签订了两次通商条约：一次在1201年，另一次在1245年。亚美尼亚的葡萄酒贸易是相当大的。亚美尼亚首都陶利斯，是一条通东方商路的终点（这一条路经过伊思巴汗、巴尔克和布喀拉），也是那些沿底格里斯河折向南方商路的终点。1229年，威尼斯还同阿勒波苏丹签订了条约；由于这项条约，它得吸取横贯亚洲大陆的队商贸易。这项条约还赋予威尼斯人在阿勒波享有一个商站、教堂和领事裁判权的权利。

威尼斯在获得君士坦丁堡和壟断爱琴海和黑海贸易的辉煌功绩，使热那亚的仇恨达到疯狂程度。这两个海洋国家为争夺利凡得的贸易控制权而起的冲突，是十三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突出的商业事件；几乎所有大海沿岸的国家，都被卷入漩涡。

教皇的野心、路易九世的十字军、安茹·理查的成功或亚拉冈诸王的成功，都是依靠并集中在这两个大海军国家身上；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是地中海的主人翁。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作战的时候，要进行十字军的出征，是不可能的，因而教皇费了无穷的时间、加以耐心劝解和恫吓以求和平的实现。路易不能从亚格-摩特开船，除非获得这个或那个竞争者的帮助。亚拉冈国王的登陆以及同理查的冲突是依靠热那亚的帮助的。可是，对于这些事情，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毫不介意。它们各专心致志于遏制对方，如属可能，还要粉碎对方。什么能使它们真正感到兴趣的是：它们的海军司令，象它们所曾做过的那样，将携回亚克的热那亚塔上的石头到威尼斯来，携回君士坦丁堡

的威尼斯宮殿上的石頭到熱那亞來。達達尼爾海峽口，對它們來說，比“聖墓”還要寶貴得不知多少倍。

熱那亞痛恨威尼斯，因為它被擠出于黑海之外。威尼斯也極其擔心于喪失那項貿易的可能性，所以盡其全力來維持它。這兩個國家的競爭震動了每個港口。在這鬥爭里，比薩因為和熱那亞在利古里亞沿岸有着商業競爭，成了威尼斯的同盟，因而熱那亞對它憤怒的程度，幾乎和對威尼斯不相上下。可是，威尼斯畢竟是更可怕的仇敵，所以熱那亞就以戰爭來迫它。

1255年，在聖貞德城，情勢發展到一個危急關頭。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競爭占奪那里的一所宮殿和一所教堂。熱那亞人在戰鬥里，擊沉了幾只威尼斯船，并占領了一座屬比薩人的塔。威尼斯艦隊不久即出現于亞克城前。它們燒燬了三十二只熱那亞船。熱那亞人遭到慘敗而被迫退到太爾城。十字軍救護騎士團站在熱那亞方面，而聖殿騎士團站在威尼斯方面。據說，有二萬人死于這次戰爭里。亞克被看作一個征服的城市；从那里所奪取的戰利品，不可勝計。教皇進行干涉，也無效果。最後，1258年6月24日，熱那亞艦隊在亞克停泊處全部毀滅，而被俘的熱那亞人被迫宣誓：三年之內不回到敘利亞。亞克的熱那亞“居住區”，分給威尼斯人和比薩人。後來，這兩個交戰國繼續苦戰；這項戰爭扼殺了十字軍運動并終於使“聖地”完全喪失。

1261年1月，熱那亞晴天霹靂般地反攻威尼斯。尼西亞的皇帝邁克爾·巴列奧洛哥欣然接受熱那亞所提關於簽訂反對威尼斯同盟的建議；在奈法昂條約里皇帝允諾：如值拉丁帝國推翻，熱那亞人得享有威尼斯人1204年前在拜占廷帝國內所曾享有的一切權利和特權。當威尼斯艦隊正在圍攻黑海畔的一個城市的時候，邁克爾的將軍亞歷修·斯特拉特哥波洛，在1261年7月25日，進入了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魯斯，威尼斯的權力被推翻，邁克爾實

行了條約上所規定的條件；給予熱那亞人聖母教堂、威尼斯人的衛城以及他們在君士坦丁堡的墓地。熱那亞人得意洋洋地拆毀這個衛城，把它的石頭作為戰利品運到熱那亞去。熱那亞人還在下列城市內獲得了“居住區”：士麥拿（因為土耳其人的侵入，存在不久）、阿德拉米興、卡散德拉、凱奧斯、列斯堡、克里特和涅格勒滂。直到1267年邁克爾和他的同盟間發生了齟齬之後，熱那亞人才獲得加拉塔^①“居住區”，那里的塔樓事先被毀壞，作為一項預防措施。1303年以後，安德洛奈卡·巴列奧洛哥二世，擴大了這個“居住區”。邁克爾只給熱那亞人以通過達達尼爾海峽的商業自由。從這個時期起，熱那亞在君士坦丁堡占着優勢，而威尼斯則永遠不復能恢復它以前所享有的最高權力了。熱那亞繼承了黑海的貿易，雖然它沒有能夠維持象威尼斯所曾享有的嚴密的壟斷地位。從這事件開始，标志着熱那亞在利凡得的優勢。

通過1317年的法律，我們還可看到關於熱那亞人在加拉塔“居住區”城垣內所過生活的大概情況。由熱那亞所指派的長官，對所有住在希臘帝國境內的熱那亞公民和領事，有着最高的管轄權。他對皇帝舉行宣誓，並參與宮廷的活動，好像他已是一個大使。他的行政責任，由一個大會議和一個小會議分擔着。除了特殊少數案件外，他對所有的熱那亞公民間所發生的糾紛，進行判理。對貿易是有限制的，因為黃金和白銀不能輸出。熱那亞人在帝國境內不得經營食鹽或乳香的貿易；從1304年起，麥子的出口也被禁止。他們得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在“考古家”時代，其他參加君士坦丁堡貿易的城市有：安科納、巴利、特拉尼、阿馬斐、拉古薩、巴塞羅納、馬賽，也許還有蒙特皮列和那旁。

在黑海，熱那亞的主要基地是在克里米亞半島上古代羅馬狄奧多西亞城旧址的附近；在那里他們曾建立卡法殖民地。這殖民

^① 在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譯者

地后来是很兴盛的。它建立的准确年代，已不能确定，但可以断言：那是在希腊人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不久的时期，也许是在 1266 年时。起初，卡法只不过是用木柵圍繞的一个市镇，为了建造它，非得韃靼汗的特殊准许状是不行的。后来，用城垣和城池来圍繞它以防当地部族的搶劫。它隶属于以一个領事为领导的市政府；領事从热那亚派出，任期一年。从这一地点，热那亚人把他們的商业活动扩展到利凡得去。卡法成了外国产品的交易地点。在那里有皮貨市場，也出售波斯制造的絲綢和棉織品，也出售經過阿斯脫拉罕运来的印度产品。热那亚人甚至在高加索地区，也建立了商站，那里的丰富矿产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即在今天，我們还可看到他們在山間所設立的工場遺跡。据称这些工場，在卡法于 1475 年被穆罕默德二世占領之后，还繼續了三百年之久。

关于黑海上冒險、探險和殖民的荒誕而浪漫的故事，有乘阿哥船远航覓金羊毛者的故事的情調。在这地区，热那亚和威尼斯繼續着它們的冲突，它們也許甚至認為这是它們的主要戰場。在这一地区，除了特勒比達德帝国以外，大部分是在希腊势力之外，和韃靼人保持接触。世界上很少地方的历史，能比黑海北岸的这些港口的历史更激起人們的幻想。这些地方从前是古代希腊人的殖民地，他們称之为克索尼薩斯；后来它們是米斯理帝国的首都所在地；再后，它們落入羅馬手里，后来又落入拜占廷手里，而在查士丁尼时代，它們成了重要的貿易地点。在第九世紀，基輔和諾夫哥羅得的瑞典人占領了它們；此后，它們轉入比瑟尼格和庫曼蠻族之手，后来由拜占廷帝国克服，而在 1204 年，帝国对那里的貿易又丟給威尼斯，而在 1261 年热那亚又从威尼斯夺得了那里的貿易。在克里米亞半島上，这些古代世界的很多地点还有留存，虽然它們的名称已經改变。例如，近代的巴拉克拉瓦是热那亚的塞巴洛和希腊的帕拉开昂；英克曼是古代的狄奧多罗；俄国的非奧多西亞是古代

希腊的狄奥多西亚；近代的克契是中世紀的伏斯波罗（或博斯普魯斯），也是希腊人的帕第克比姆。第聶斯德河口的塔那以及塞科，是在中世紀建立的。在所有这一些地点或在它們的周圍，今天还可找出热那亚人的城墙、堡壘和塔的断垣殘碣。

几乎在它丧失君士坦丁堡的优势的同时，威尼斯赶快同埃及苏丹馬列克-厄尔-阿达尔簽訂了一項新条約。这类性質的許多条約也跟着产生了，但加上了各种补充条文。所有以前条約中所确定的主要条款，也都予以重申。在这类条約中，第一次条約所注明日期，是在1262年，正是威尼斯被逐出于君士坦丁堡后的下一年。这项条約包括二十八条款，給予威尼斯人关于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証，关于他們享有房屋、貨棧、教会和浴場的权利；还規定他們所应付的各种賦稅。后来的一项条約，在1303年簽訂，扩充了这些規定条文。在威尼斯人方面，他們保証不再騷扰苏丹的运输。关于在这个时代埃及和威尼斯間商业的状况和性質，在馬立諾·薩紐杜所著的《忠实信徒的私議》一書里說得最为清楚；該書是獻給教皇，作为克服埃及和“圣地”的計劃的。在其第一部分里，作者以一个目睹者的身分，詳細敘述了亚历山大城及其他港口的貿易情况。从印度，由海道运来胡椒、生薑、白桂以及一些絲綢和棉織品，虽然大部分絲綢是由陆路运来的。还有从馬拉巴沿岸和錫兰島运来的珍珠、香木等等。其他大部分香料、香草、豆蔻实、毕澄茄，似乎是經由巴格达运来的。紅海口的亚丁，是印度貨物的第一貿易站。特別有一种作香料用的珍貴树脂，是从阿拉伯半島运来的。威尼斯船只把这些貨物以及谷物、枣子、糖和棉花从埃及运往欧洲；而威尼斯方面运去生鉄、来自达尔馬提亚的建筑木材以及来自德意志北部的而不象从前那样来自罗斯的毛皮，作为交換品。

威尼斯在不断找寻新貿易和新貿易路綫的过程里，甚至侵入巴巴利沿海港口，而这些港口是几百年来为热那亚和比薩商业活

动的特殊場所。而且，这些大胆的威尼斯商人还不以这些港口上的商业为滿足。他們的商队曾冒險冲入內地；在 1320 年同突尼斯王馬索斯所簽訂的一項条約里，他們获得了下列权利：他們的商队得自由出入境內，如遇劫掠可获得賠償，他們的牲畜可得免費牧場，任何威尼斯的信使不得被扣留或耽誤，此外，还約定：穆罕默德教政府依据他們領事的要求，對他們的商队給以保护。关于这些商队所經過的路綫，我們只能作些推測，因为没有什么正确資料。意大利城市对巴巴利海岸的這項貿易，至少可以說，是十字軍的一項間接后果。

現在我們必須回到叙利亞和“圣地”来研究它們在十三世紀的历史。所有上述的龐大无比的商业，是十字軍的喪鐘。教廷咆哮如雷地曾頒布禁止同穆罕默德教貿易的命令，但无效果；它終于廢止了禁令，除了那項絕對禁止的奴隶貿易以外。然而，連這項禁令，也是具文。到了这个时候，十字軍已蜕化为單純的冒險行动，或者成了悲慘的出征，象“兒童十字軍”那样；或者在絕望的冒險中，一敗涂地，象圣路易在埃及的十字軍(1245—1248 年)那样。由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之間的商业竞争和海軍战斗(在这些战斗里，比薩最后和威尼斯結成同盟)，每次为进攻伊斯兰教所作的軍事努力，变成无效。当时，太尔是在威尼斯的控制下；馬西利欧·佐哥在 1240 年充任全叙利亞的威尼斯行政官；他留下关于威尼斯在太尔周圍所占有的二十四個庄園的帳册，这些产业从海岸延伸到高地，呈現一片廣闊无限的田野、菜圃、葡萄園、橄欖園、无花果园以及大塊甘蔗地。这些土地是由叙利亞人来耕种；他們取得 $\frac{2}{3}$ 或 $\frac{3}{4}$ 的收获——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此外，所有太尔港口捐稅的 $\frac{1}{3}$ ，也归于威尼斯所有。

但是，亚克还是占着太尔的上风。在这里，安科納似乎第一次在东方有着一塊独立的居留地，包括教堂、貨棧和宮殿。在这里，在

十三世紀也可找到佛罗倫薩人、盧奇塞人、塞亚那人的居留地。亚克的商业,非常兴旺,所以欧洲銀錢业在那里設立了分号。在这个国际性城市里,馬賽和蒙特皮列各有自己的居住区和教会,并享有豁免納稅之权。这个城市还庇护一个英商的居留地。从下一事实,在这个时期从基輔到大馬士革,到处都有亚克商人的足跡,可見亚克势力之大。在安提阿,热那亚和比薩,他們仍保持着“居住区”,1264年的一項文件表明:热那亚人还控制它周圍的地区。約在1222年时,热那亚人由于比薩燒毀他們在亚克的居住区而未能获得賠償,憤而离开該城往貝魯特去;后者在1197年已由基督徒重行占領,并注定要比亚克和太尔維持得更为久远。而且,腓特烈二世和他的兒子曼夫勒德給热那亚人在西西里的許多特权,他們在島上享有最惠国的待遇。甚至在威尼斯势力很强大的希腊,热那亚人在雅典和底比斯也有“商站”(1270年),在那里他們有一个公所,受自己領事的裁判,并經營絲織制造业。

法兰西南部諸城市在十二世紀中在叙利亚已得立脚点,而在十三世紀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馬賽在布罗温斯伯爵統治下很繁盛。“紅皮書”(1255年?)內容包括有該城的法律,它談及不仅和叙利亚而且和非洲的貿易。在利凡得的各城市里,它没有什么巨大“居住区”,只有貨棧。虽然关于馬賽情况我們所知的很不够,但似已看清楚,只要叙利亚繼續在基督教統治下,馬賽在那里的財產和特权,能够維持下去。次要的城市是圣齐尔茲、那旁和亚格-摩特。

西班牙人很少参加十字軍,但在十三世紀中巴塞罗納的商人却在太尔出現。然而蒙特皮列甚至比巴塞罗納更加重要。在这个时期,它受亚拉崗国王的統治,而亚拉崗的商业是很大的。在亚克和的黎波里,它享有特权并委派一个領事;虽然它来得最晚,但它可与任何竞争者并駕齐驅。

远在十三世紀中期以前，已可清楚地看出基督教东方搖搖欲墜征象。甚至早在1201年，耶路撒冷的救护团团长在写给英国的騎士团采邑区的信里，說道：“我們由于薩拉森人的无限資源而感到战慄，当他們財富又由很多商人运来的商品而增加起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这一情况使我們异乎寻常地感到震惊。”

当十字軍的失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欧洲哀訴式的宣傳达到歇斯底里的状态；荒誕无稽的“殘暴”故事到处流傳。在1245年，連一个最博学的历史家馬太·帕理斯，也記載了那种謠言：“薩拉森人在运到西方的胡椒中放置毒藥，因而很多法国人被毒死。”另一荒誕的謠言是：商人自己捏造反对新运来的胡椒的傳說，因为他們的貨棧里还堆儲着尚未出售的陈胡椒的。1245年时，里昂會議枉費心血地繼續咒詛一切同穆罕默德教徒做鉄、造船木材、战争机械等禁品生意的人們，或咒詛一切象很多基督教兵士那样替穆罕默德教政府的舰队和陆軍服务的人。會議的命令說：“教会的怀抱，不会給这样的人們敞开，除非他們以从这种該死的貿易所得的全部利潤，再加上他們自己的財產的相等数量来援助圣地。”

在这个时期叙利亚的各个公国，实际上已被西欧抛弃而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它們越来越加危險了。沒有西欧的支持而它們再能繼續半世紀之久，只是因为穆罕默德教政局的动盪。大馬士革的苏丹同埃及的曼麦琉克朝发生冲突。后来，蒙古人在征服巴格达(1258年)之后，跟着又征服阿勒波和大馬士革(1260年)，于是，蒙古人在这斗争里，构成了第三种势力。在阿勒波和大馬士革的陷落之后，小亚美尼亚国王就承認蒙古人的宗主权。如果利凡得的其他基督教公侯也表示同样慎重的政治态度，情形将会好些；因为蒙古人对基督徒是容忍的，而曼麦琉克朝則反是。

在蒙古人和曼麦琉克朝的战争里，“圣地”的港口和叙利亚的城市腹背受敌。下列事件是对它們的不幸：旭烈兀，即巴格达、阿

勒波和大馬士革的蒙古占領者，由于大汗逝世的消息，被召回到远东去。旭烈兀留守的将官被埃及曼麦琉克朝指揮官俾巴斯击潰杀死。俾巴斯出身蒙古族，作为奴隶出售到埃及；他成了一个狂热的穆罕默德教信徒，后来也成了一个兇猛的軍事首領。在蒙古将官失敗之后，俾巴斯成为叙利亚以及阿勒波和大馬士革的主人翁，于是他夢想把东方基督教国完全推翻。凡是薩拉丁由于智慧和容忍态度所未做的事情，这个可怕的狂人企图予以完成。他以勒索性的关稅橫加在通过亚历山大城的地中海和印度間的貿易身上，因而汲取了龐大无比的进款。

俾巴斯完全明白基督教国家的弱点；剛在統治埃及之后，他即准备进攻它們。1261年11月，他离开阿勒波，对安提阿的領土加以蹂躪。次年，波希蒙德的舰队塞琉細亞港口被焚毀。此后，年年有着一次新的侵犯。1263年，圣貞德城被攻击。热那亚原拟援助俾巴斯来挫折威尼斯，但毕竟不敢这样去做。基督徒向小亚美尼亚的海敦及蒙古人乞援。俾巴斯在1267年占領凱撒利亚和阿苏夫作为报复；海敦企图以禁止羊毛、鉄及其他必需品从西里西亚出口来打击埃及，結果哈馬总督侵入境內，大肆燒杀。1267年太尔进貢埃及一万五千金幣。1268年扎发被征服，俾巴斯不久出現于安提阿城前，在两天之內即攻陷它。于是的黎波里、西頓和亚克互相分隔了。

1277年，俾巴斯的逝世，使这种危險的局勢化为烏有。屬曼麦琉克朝的大馬士革省长，原来由俾巴斯委任的，現在反叛埃及的新苏丹，而向蒙古人求助了。1281年埃及軍和蒙古人在奧倫梯河两岸上的埃麦薩地方进行决战；蒙古人慘敗。“圣地”上基督教殘余領土在被西欧遺弃的情况下，面临着埃及人的暴怒。在这个时期耶路撒冷王国已只剩下列領土：亚克城及七十三个村庄、西頓城及十五个村庄、凱法斯与卡麦尔及七个村庄、貝魯特的領地、馬加特

的城堡以及的黎波里郡。1291年5月28日在一次英勇抵抗之后,圣貞德城被埃及的穆罕默德徒占領。1291年7月,凱法斯、太尔、西頓、貝魯特或被占領或被放弃。“耶路撒冷王国除了一段光榮的史跡外,沒有留下什么了。”

可是,誰也不需要为叙利亞的基督教国家的复亡而哭喪。即使有理由来为十字軍作辯护——那是有問題的——欧洲由于愚笨、由于虛伪、由于不公平,失掉了对东方要求任何权利的根据。由十字軍带来的移民在物質和精神方面墮落的事实,已是无可爭辯的。最偉大的近代英国历史家写了下面一段周詳的文字:

腐化和瓦解的过程,由于地方的和偶然的情势而加速起来。首批移民在他們的新土地上,生活的時間不长,而他們的在这地方出生的孩子們,是一个退化的种族。在十二世紀中,耶路撒冷共有十一个国王。头四个国王都是出生于欧洲的,在他們的时代,国家是在創建和巩固的过程中;后四个国王都是出生于巴勒斯坦的,在他們的时代,气候的影响和东方习俗的沾染,已很明显;在这四个国王中,三个人在未成年时即位,另一个还是麻瘋病患者。貴族家族,象王室一样,沒有从欧洲吸收新成員来补充,他們老早已陷于柔弱腐敗的深淵。在当地出生的法兰克人的一般性格,就是他們欧洲祖先的缺点与那些和他們共同生活的民族的缺点相結合而形成的。虽然从个人來說,他們是勇敢的,因为在下一世代里,緒弗理和波希蒙德的遺风尚在;可是,一般講,他們既殘酷又柔弱,既狂暴又无信义,既奢侈又貪婪,所以,他們的榜样所产生的影响是:誘使新来的朝聖者陷入不名譽和墮落的迷途,可能远多于指导他們走上胜利的道路,或使他們朝气蓬勃的精力納入正軌;在这里,他們理应以自己的經驗来教导他們說:西方国家的方針,如果是有真實性的話,必須使之实行……生命的短促和朝不保夕的情況,是不可救藥的病源,而它的效果,也是无法补救的……。在王國內,唯一健全的因素,是軍事寺院团的組織。它們从欧洲經常获得新鮮而又健康的血液的补充;它們的成員,都是年壯力強,沒有未成年者来充数;它們的私利同王国的強大是分不开的……。如果巴勒斯坦曾采用这种組織,它可能繼續留在基督

徒手里,或者至少能和塞浦路斯王国①繼續到同样长久。甚至那后来用以統治利凡得国家的威尼斯制度,也可能保証王国的一个較长寿命;因为这制度可获得新血液的注入,而可避免巴勒斯坦历史上足以垂戒的禍害;事实上利凡得也沒有灭亡,直到威尼斯已十分衰老无力再来支持它为止……但是,还另有一个原因,……十字軍軍隊的龐杂成分:它們缺少共同的或統一的組織,在队伍中夾杂着大批非战人員的大群朝聖者;这批人只要有工資,愿为任何主人服务;他們靠着十分不穩定的收入来糊口。他們衣食不周,而又无所依靠,所以,成为十字軍的一个經常負担,又是一个經常飢饉和疾病的来源……[它是]一个內部互相敌对的王国,在一个毫无权力的外国人統治下,充滿着封建貴族;而这批貴族对欧洲基督徒的畏恨心理比对穆斯林还要厉害……它被一般衰敗过程压碎了……当地居民,不是被歼灭,便是互相敌对……世襲的貴族既墮落又分裂,注意于他們的私利远多于注意于他們的國家或他們基督徒的品質②。

在这以后,小亚美尼亚和塞浦路斯,是基督徒在东方的碩果仅存的据点。小亚美尼亚維持它的独立地位,直到 1375 年被穆罕默德徒征服为止。塞浦路斯王国持續到 1489 年;它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間商业爭霸的牺牲品,它也受到埃及和奧托曼土耳其人的威胁。1489 年,威尼斯完全占有塞浦路斯島,并繼續保持着該島,直到 1571 年它被土耳其人占領为止。

在叙利亞和亚克丧失之后,塞浦路斯法馬古斯塔港成了西欧人在利凡得区最大商埠。在这里,意大利城市有着商站,附有教堂、貨棧、浴場和烘面包房,完全象我們在叙利亞所看到的那樣。热那亚起初所享有的特权,比威尼斯要大。它的一个全权代表保护热那亚人在全島上的权利(从 1329 年起);它的执行官吏甚至有权审理有关死刑案件,而且它是不繳付关稅的。1306 年,亨利二世也免

① 在 1291 年十字軍在东方的最后基地亚克城被占領后,塞浦路斯国王改称为耶路撒冷国王;在十五世紀末期,王国被并入威尼斯版图。——譯者

② 斯达布斯:《案卷丛書导論》,第 343 頁及以下。

除威尼斯人繳納一切商業稅，並在購買土地而不建造砲台的條件下，允許他們在島上三個主要城市里，建立貨棧、教堂等等。在意大利城市中，安科納、比薩、佛羅倫薩和墨西拿同法馬古斯塔港有着貿易關係；在那里，法國是由那旁和蒙特皮列，西班牙是由巴塞羅納、塔拉哥納和薩拉哥撒等城市代表的。

十字軍失敗的各種原因，從剛開始起，已經蘊藏在內。所有跟着而來的困難，東方移民的不公正，統治階級的利益分歧，激烈的商業競爭，蜂湧而來的歐洲僑民所表現的輕浮、圖利或腐敗作風和歐洲血統移民的德性淪喪（他們喪失西方習慣的、傳統的禁忌）；這一切都是失敗的基本原因。而且，那如此長久地煽起了十字軍火焰的狂熱，已經衰退。最後，只有教廷還保持着這種熱情。

但是，十字軍所從出的西歐情況，也是有着影響的。歐洲的幻想已經破滅。新生的世俗文學——不是浪漫派的抒情詩人和彈唱詩人的文學，而是諷刺家和寓言家的文學——損傷了十字軍士的動機和行動了。律特柏夫所寫的《一個十字軍士和一個騎士的辯論》可作為一個例證，作者是十三世紀的一個平民出身的朱未那爾^①。

到了十三世紀，那由英雄歌曲所激起的高度熱忱和第一次十字軍的狂熱已冷下來了。單純感情的呼吁已不行了。僧侶們必須說服聽眾。除了靠象“國王的軍旗”歌和“再會吧，神聖十字架”歌這一類的煽動尚武精神的歌曲以外，還必須同聽眾爭辯一番。於是，出現了一批偉大的辯論家：扎克·得·維特里、埃田·得·波旁、羅曼的杭柏特，他們的演說詞是經過精密準備好的而又富于爭辯性的論文。這些演說家特別企圖駁倒那些以各種借口和遁詞來逃避教會所加的義務的人們。這些借口包括有健康的和財產的理

^① 律特柏夫是法國的彈唱詩人，生于1230年；朱未那爾是羅馬的著名諷刺詩人。
——譯者

由、或家庭关系或缺少現款的理由——因为到了这时期,如上文所說,十字軍出征已变成资本家的事业似的,需要大量金錢来予以維持;同时,那在早期贈給十字軍士現款、馬匹和行装的热潮也已退落。这些怀疑的听众甚至对宣傳者戏弄譏笑——“他們以碎布做成的十字架成为各色各样的可笑資料”^①。

因此,教会对那些愿意去的人們添加恩惠,并增加了宗教的和世俗的利益,而对那些拒絕去的人們加重了所加的处罰。教会广泛賜給完全的和特殊的恩惠,精神处罰的撤銷、过去所加的驅逐出教处分的取消、財產稅和人头稅的豁免以及契約或其他約言的解除等权利。

这些出征的开支是浩大的。我們有很完备的統計資料,可大概算出 1248 年圣路易的十字軍使法国所消耗的經費。国王的开支达一百五十三万七千五百七十“图尔鎊”^②; 我們就貨幣購買力的今昔之差別来折算,这一笔巨款約可折合三千五百万美元。跟隨国王去的大貴族和騎士所花費的,可能和国王所花費的相等; 所以,这次十字軍使法国总共消耗了大約七千万美元。不难理解:这类性質的一次出征怎样損伤了法国財富,并怎样使很多人貧困化。而且,这些数字,並沒有包括全部費用。因为它們还没有包括那笔为贖回国王所付的巨款,也沒有包括那笔为贖回在曼苏拉战役里被俘的法国俘虜所需的数目。柏格尔估計,贖金的总額按照現代貨幣計算,約合四亿美元; 他說,在曼麦琉克王朝手里約有一万二千个法国俘虜。有一船現款,由卡斯提尔的布兰奇送出,沉沒海中。法国僧侶受到譴責,因為他們把原来可用以援助法王的金錢,輸送到羅馬去。教廷曾懲誡这次十字軍的出征; 但現在,他要粉碎腓特烈二世比帮助路易九世更为殷切。王后布兰奇抗議: 英諾森四世

① *derisiones multimodas faciunt de assummentibus crucem.*

② “图尔鎊”是图尔城所鑄造的貨幣,值十便士。——譯者

在法国宣傳組織十字軍来反对康拉德四世；因为当时法王还在东方做俘虏。

乔伊維尔是圣路易的最忠心的臣仆，在他所著的《圣路易傳》里，有一段出色的文字，反映这种幻想的破灭和理性的回复。他写道：

法王恳切地劝我去参加十字軍出征（这是关于 1270 年法王的第二次十字軍出征），走上朝聖的十字道路。但我回答他說，当我以前在国外替国王服务的时候（1246—1250 年），国王的官吏对我族人如此勒索压迫，使他們穷到这样地步，我不能想象无论他們或者我将会从这損失里恢复元气。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我再一次走上十字軍的道路，我可怜的人們将会整个地完蛋；而且，我已听到很多人說，那些倡导十字軍的人們犯了大錯，并造了大孽。

其时，欧洲的旧商路已經扩展，許多路加以修整，象在阿尔卑斯山中的那样，还有許多新路，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的，也已开闢。海上力量已变得很重要。对一切階級來說，旅行已变成普遍事情，而且，比以前要舒适些。正式的海上航路已經規定出来，而某种定期的航行已經建立。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建造了各种类型的和大小不等的船只。普通类型的船舶是帆桨并用的。只在順风行駛的时候，才利用船帆。航海技术已有很大进步，而最灵便的船只，采取直綫航路，来代替沿海岸航行，或从一角到一角、一島到一島的航行。在气候良好、海面平靜的条件下，帆桨并用的船只从馬賽到亚克，需时十五天。“船舶法”建立了海員和乘客中間的紀律。

关于十字軍对商业的影响以及关于所轉运的商品种类，上文已講过。这项貿易在开始时，原象一条小溪那样，而后来汇成一条寬闊的大河；商品源源不絕地流遍全欧，連冰島也被波及。例如，在扫桑普敦的市政录里充滿着关于同威尼斯通商的資料。进口貨

物，原来是奢侈品，而現在变为必需品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标准。新織品，象棉布和絲綢一类，新食品，象砂糖、香料、胡椒、生薑、东方的蜜餞水果一类，至少改变了欧洲的上層階級的卫生和飲食，也有助于居民物質享受的提高。浴池的使用（一个东方的习俗），虽然永未普遍化，但至少对于富裕階層已更加尋常化了。

十字軍虽沒有建造西欧的城市，但他們刺激了城市的生活，使城市扩大并富裕起来。

十字軍的一个重要創造，是关于营业方式的发展。拜占廷商人象意大利城市的商人和銀行家那样，是資本家。威尼斯、热那亚、馬賽的出口商人、圣殿騎士团以及一切宗教团体也都是如此；犹太人也不例外。有重要意义的，亚历山大三世在 1176 年給热那亚城大主教的一項訓諭里，禁止高利貸并特別談到香料一項；当时，热那亚正在同比薩爭夺地中海的商业霸权。中世紀的兌換商由于营业的发展，成为銀行家；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銀行营业的方法和規程，当时已被采用。兌換商在設立現款存儲所后，經過相当时期，就发展成为真正的銀行家了。起初，他們經營象收付錢款这一类的單純商业营业；后来，他們兼营倉庫业，代替他們顧客間汇划帳款，代收錢款等等。于是，銀行家变为交換商品的中間商；他們接受那些存在保稅倉庫內的貨物，并把它們轉运到其他的国家去。早在十二世紀銀行营业上发生了类似革命式的改变：就是，以象征移轉来代替真正移轉，以收据来代替真正貨幣；这种收据，就是汇划票。佛罗倫薩人和大部倫巴人專門做这类汇划生意。倫巴人是法王和英王的財政代理人。在十三世纪，銀行家开始效法犹太人，收取利息，經營放款和貼現营业。

因为高利貸被禁止的，所以不得不采用权宜的办法。放款人以一个团体的名义出面，来掩盖自己的身分。这办法是有危險的，

但它可保护个人。这样一来,遂出现了股份公司。在十五世纪,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便是一例。简言之,在近代商业生活中,我們所看到的制度,象領事、商业法院、海上法、汇划票、銀行、股份公司以及后来商业公会这一类,都是在十字軍时期或不久以后从意大利商业城市中产生出来的。

意大利銀行家,成了国王、大王公和教皇的不可缺少的財政顧問。十三世紀末期,在法国腓力四世和英国愛德华一世的政府中,我們可看到这类官員。关于这种“新財政”对政治史的影响,还有待于研究很多史料。例如:

愛德华一世,在从“聖地”返国途中,到奧微亚托訪問教皇;然后他又前往波倫亚和佛罗倫薩,他在有一处获得了一个大法学家,因而他能够进行司法改革,在另一处,获得了一项充分的財政支援,这大有助于他的冒險事业,尤其是对苏格兰的战争。貴族們当然憎恨任何使国王无须依賴他們資助的事情,起来反对愛德华二世,并立刻逐出多斯加納的財政专家;而他們后来由于急欲恢复他們的优势,再資助愛德华三世的远征;后者帶領大部从黑諾募来的外国佣兵,渡海到法国。①

在十字軍开始时,沒有貿易习惯法的。商业法的制訂和編纂,是由十字軍迫出来的。在这种发展上,象在銀行与財政方面那样,意大利人也是先驅。他們在西欧首先編訂管理商业来往的习惯法。其他国家采用并模仿他們的法律。于是,商业法院和通商法出现了,而商业法的大部分,是从拜占廷法律和出名的“罗得西亞島法典”得来的。

为了管理它們国外的商业殖民地,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派遣了叫做領事的官員;領事同时受命管理它們在外国的臣民并代表国家同駐在国的元首办理交涉。今天的領事还保留着这两种任务,但

① 《曼特斯图亚特·格兰特·达夫的日記》,第1卷,第306頁(同历史家J. R. 格林的談話記錄)。

是这种任务的重要性已倒置了。在中世紀时代，一个領事的主要責任是管理和执行法律，因为殖民地就它所在地区的範圍內說，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在近代，領事已失掉这项权力；他的主要地位，是一个代表者的地位。所以，最先的制度，是領事館制度。为了判理商务案件，設立了特別領事法院，它的程序，它的法律是异于封建法院的；角斗、神意裁判和宣誓証明制都沒有；裁判是根据証据的；每个意大利城市都派遣它的商务領事，他享有一种特殊管轄权。这项制度，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都予以采用。到今天，还有称为領事法官的官員。

还有一种国际慣例的体系逐漸建立起来；这些慣例，是关于公海上冲突事件的，或关于各国的船主間或其他官員、水手、商人之間的冲突事件的。海上貿易所需要的法律与規程稍稍不同于陆上貿易的法律与規程；又因为海洋主要是屬於国际性的，所以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从海上法发展出来的。最早出現的海上法典中有：比薩的“习惯法”（1160年）——它的前身可能是阿馬斐的簡直象傳說的“表法”——特拉尼的“法典”（1183年），蒙特皮列的“习惯法”（1223年），馬賽的“习惯法”以及威尼斯的“航海条例”（1255年）。比这些法律出現較后而內容更加完备的（虽然大部从它們得来的）是：很出名的加达魯尼亚（巴塞羅納）的“海上管轄权”、“鄂列倫的案卷”以及再后来，在十四世紀里北欧的最早商业和航海法典：律伯克、不来梅和維斯比的“法典”。

在对所謂十字軍的結果作出評價时，我們所感困难的，是區別哪些事情似乎是起源于十字軍的；哪些現象是在十字軍時出現，但它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十字軍所产生的。換句話說來，有时不可能确定什么是前因，什么是后果；也不可能确定哪种力量占优势和断定它們之間的关系。西欧人对东方奢侈品的嗜好——這問題上文已提过——激起东方的商业呢？还是东方的貿易关系

激起这种嗜好呢？

下引两段話，可以表明：历史家在解釋方面的意見，有多么大的分歧。

“我們几乎不可能找出一个政治的、軍事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艺术的、甚至宗教的生活領域，沒有从东方获得某种影响而丰富起来的。”（庫格勒語）

“毫無疑問，十字軍对基督教社会果然有些一般影响，但对所有这些結果，西欧人自己中間，却有着更积极、更有效力的原因。”（塞諾波斯語）

十字軍的間接刺激，似可說由于变换了欧洲的空气，比十字軍的直接影响，可能具有更大的积极效果。也許引用下面的說法，会更接近真实性：与其說“十字軍的后果”倒不如說“阿拉伯和拜占廷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来区别：什么文明是从十字軍产生的，什么文明是在十字軍时期发展起来的。

还有其他的——也是較少关于物質方面的——改变，这些改变是有关历史上不可衡量的东西的，一句話說，它們就是使西欧人的智慧和道德方面改換面貌，产生了新的社会理想。东方人原来有着一种不同的宗教、各种不同的礼节、不同的风俗；西欧人同他們接触以后，必然会睜开眼睛看到这一真实：东方存在着有智慧而又有文化的民族，而且有着一种等于甚至超过封建欧洲文明的文明。十字軍創造了一种新的看法。

除了旅行和广大接触所产生的扩展眼界的效果之外，十字軍也把成千累万的西欧人带来同异教徒和不信神者直接会面；这批异教徒，按正宗教义的說法，一概不能获得灵魂的救渡；因为只有在真正“教会”的範圍之內，人們才可获得救渡。但在君士坦丁堡，西欧人看到了一种他們从来没有想到的財富、权力和豪华景象以及一种文化和文明比他們自己的还优越得很多。他們又看到，甚

至那些被鄙視又被憎恨的異教徒，在許多方面，也是屬於惡魔的藹然可親的孩子們。在巴勒斯坦，至少也有若干人，認真地聯想到當年基督和使徒們的生活和服務，想到他們的貧困和微賤地位；這些都是和現在西歐教會上層的財富和驕矜態度截然不同的；人們就會奇怪：怎樣會有這種情形呢？伊斯蘭教不僅使人感動，而且使人改變信仰。因為我們看到對基督教“叛徒”所提的控訴說，他們竟拋棄十字架來換取新月；連僧侶階層的成員，也有這樣做的。有一個被派到非洲去的法蘭西斯派傳教士，變成了穆罕默德教徒。此外，穆罕默德徒和基督徒之間的又龐大而又有利的商業關係也促進了宗教容忍態度的成長，因為國際商業需要宗教的容忍。宗教狂熱是不利於貿易的發展的。

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可以看到：即歐洲人怎樣在東方會忘掉他們過去的宗教狂熱和他們反對穆罕默德教徒的種族的與社會的偏見。政治的仇恨果然還有，但這些觀感已經消逝。烏爾班二世會感到傷心的，只要他知道了下列情況：在占領“聖城”後的一世代之內，穆罕默德教商人在耶路撒冷王國境內到處自由來往；伊斯蘭教寺院依然存在；在安提阿和的黎波里，古蘭經還在伊斯蘭教學校里講授。十字軍士的第二代說阿拉伯語，象他們說本國語一樣地流利；他們穿着東方服裝，他們模仿阿拉伯人的禮節，他們用東方的家具、挂帷、地毯來布置他們的房屋和別墅，他們還用阿拉伯和波斯的艺术品和圖案來裝飾這些地方。

東方的燦爛文明，在基督徒看來，是如此新鮮，如此不同於他們在西歐城堡里所過的窄狹而又單調的生活，所以，不久他們向它屈服了。東方的寬大服裝，在他們看來比他們的民族服裝似乎更適合於氣候。在他們的頭上，他們纏着阿拉伯頭巾，即一種防禦日光的繞頭巾；他們力求穿用金綫或珍珠來裝飾着的絲綢衣服，着彎曲足尖的鞋子；他們對於精細的烹飪、對於奢侈的室內布置以及

对于东方人的豪华宴会，也已习惯而成自然。总之，西欧人已知道自己适应于他们新的生存条件。

在这种半东方化的服装下(除修道士外，連僧侶也如此)，那些属于军事寺院团的留鬚而戴帽的騎士，一定会显出一种严肃的神态：圣殿騎士穿紅色十字的白色外套；救护騎士穿白色十字的黑色外套；在 1190 年建立起来的条頓騎士，穿黑色十字的白色外套。

封建式的而又好战的西欧之粗魯方式讓位給东方文雅态度了。战士典型的好斗的男爵轉化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有优良的(虽非典雅温柔的)风度的紳士。貝魯特老翁就是这些在第二代里文明化的貴族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个叫做約翰·提柏林的著名作家称之为他的“老伯伯”。这个文質彬彬的老貴族，是伊柏林、阿苏夫、扎发、兰勒各封邑的所有人，也是貝魯特港的領主；他研究艺术、爱好文学，又是一个大法学家。不象英国人在印度那样，这些貴族东方化、叙利亚化了；而跟着时间的进展，他们成为一个簇新而又特殊的貴族阶層，他们是本地人而非外人，是容忍异教的基督徒，而又是熟練世故的文化人；在他们看来，辽远法国内的堂弟兄似乎是陌生人，正象那里的堂弟兄也把他們当作陌生人那样。

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由于十字軍在东征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識和經驗而活跃起来。对东方的兴趣以及东方的商品引起旅行家的东遊，象馬哥孛罗那样。科学研究也获得了一大刺激。西欧人对于奇异的植物和走兽，发生高度趣味，因而他們設立了植物园和动物园。十字軍导入了一个航海和发现的时期，那终于导致新世界的发现。总之，十字軍增加了欧洲人的知識，扩大了他們的兴趣，刺激了他們的思想。如果没有十字軍，文艺复兴不会蓬勃发展，不能象它所表現的那样的。

甚至教会也受到影响：欧洲人对它的尊敬已經丧失，而对它的畏懼也开始下降。当欧洲的其余部分已轉向于一个更寬大的容

忍态度时,教会和教廷却依然是旧的宗教狂热的堡壘,还在策划組織更新的、更銳利的不容忍形式。教会一倍一倍地增加恩典,并允許提高报酬来鼓起人們作进一步的努力去反对伊斯兰教,教会竟然对献金的人和对投效参軍的人都一样給予赦免权;由此可見教会注意于搜集資金多,而注意于提倡新出征則少。更恶劣的,教会竟掉轉它的狂热和武装队伍来反对发尔多教派、亚尔比教派及其他异端教派,把十字軍完全糟蹋、污辱了。郎基多克的擄掠和土魯斯与貝稷亚的大屠杀,多密尼克教派的瘋狂宣傳以及宗教裁判所的采用——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字軍的不良后果。历史的諷刺,再也沒有比在这些事件里表現得更为明显了。教廷一向是十字軍最热心的提倡者,而現在亲眼看到它所提倡的运动反过来竟然打到自己头上了。

譯名对照表

三 划

大馬士革	Damascus
大流士	Darius
大伽图	Cato major
大兰多	Tarento
大哈	Taha
士麦拿	Smyrna
士的里亚	Styria
士魯斯	Toulouse
士克	Touque
士伦	Toulon
凡尔登	Verdun
也門	Yemen

四 划

尤金	Eugene
尤西比阿斯	Eusebius
尤克辛	Euxine
巴塞罗纳	Barcelona
巴隆	Ballon
巴本堡尔族	Babenbergers
巴勒摩	Palermo
巴伏	Bavo
巴塞洛繆	Bartholomew
巴登	Baden
巴苏	Passau
巴度威克	Bardowick
巴特里克	Patrick
巴納特	Banat
巴門梯尔	Parmentier
巴錫尔	Basil
巴拉斯特勒	Balastra

巴古达	Bagaudae
巴布·厄尔·曼得	Bab-el-Mandel
巴格达	Bagdad
巴斯克人	Basque
巴克特里亚	Bactria
巴塞姆斯	Barsymes
巴勒姆	Bahram
巴伐利亚	Bavaria
巴利	Bari
巴斯塔尼亚	Bastania
巴庫	Baku
巴塞尔	Basel
巴塔維亞人	Batavians
巴登威勒	Badenweiler
巴斯特尼人	Basternae
巴叶	Bayeux
巴比伦	Babylon
巴索林姆	Bussolium
巴特勒	Butler
巴土亚	Padua
巴費亞	Pavia
巴士拉	Basra
巴尔克	Balkh
巴勒加扎尔河	Bahr el Ghazal
巴苏里	Bazury
巴米賽族	Barmecides
巴扎斯	Bazas
巴坡謨	Baparme
巴拉克拉瓦	Balaklava
巴巴利	Barbary
巴林群島	Bahrein Islands
巴利阿利	Balearic

巴尔加	Barca
厄赛那斯	Ursinus
厄尔士山脉	Erzgebirge
厄尔斯人	Erse
厄波	Ebo
厄息尼	Ursini
厄馬拉	Urmara
比尔登	Pilten
比耳克罗恩	Bierkeroen
比德	Bede
比斯开	Biscay
比哥尔	Bigorre
比特	Bitter
比瑟尼格人	Pechenegs
比利牛斯山	Pyrenees
开温	Kairwan
开罗	Cairo
什留塞斯	Schlusis
什列斯威	Schleswig
什維尔	Sch vill
丹多罗	Daudolo
丹尼門	Dunegate
文森茲	Vircenens
文得力科伦	Vindellicorum
日内瓦	Geneva
日德兰	Jutland
方坦那	Fontanas
方坦	Fontaines
太尔	Tyre
不来梅	Bremen
支斯得尔	Chester
“五港”	“Cinque Ports”
扎克·得·維特里	Jacque de Vitry
扎林治	Zarinje
扎拉	Zara
扎勒河	Saale
扎林根	Zahrigen
扎发	Jaffa

韦德摩	Wedmore
韦尔柴姆	Welzheim

五 划

尼斯特洛姆	Nystrom
尼科坡力斯	Nicopolis
尼西	Nish
尼卡篤	Nicator
尼罗河	Nile
尼尼微	Nineveh
尼奥波利斯	Neapolis
尼特里亚	Nitria
尼西亚	Nicaea
尼門河	Nimen
尼祿	Nero
尼姆	Nimes
尼尔华	Nerva
尼哥米底亚	Nicomedia
尼薩	Nyssa
尼士比	Nisibis
尼森	Nicene (Nice)
尼斯	Nice (Nicene)
尼沙普尔	Nishapur
尼西柏	Nisiber
尼阿科斯	Nearkos
尼亚波利	Neopolis
尼日利亚	Nigeria
尼威根	Nimwegen
尼塔尔德	Nithard
尼日尔河	Niger
加斯科尼	Gascony
加斯太堡	Gasteiberg
加沙	Gaza
加奥尔	Cahors
加拉曼特人	Garamantes
加納	Ghana
加利波利	Gallipolis
加拉塔	Galata
加尔哈特	Kalhat

加尔达	Garda	卡諾普	Kanop
加他罗	Gattaro	卡涅夫	Kanev
加列特	Ghariat	卡散德拉	Cassandra
加达美斯	Ghadames	卡法	Kaffa
加拉提亚	Galatia	卡則勒拉斯	Cazereilus
加力古拉	Caligula	卡斯特拉·巴太瓦	Castra batava
加尔西頓	Chalcedon	卡斯特	Castor
加黎利	Galilee	卡佩	Capetian
加尔	Gall	卡卡逊	Carcassonne
加力伊那斯	Gallienus	卡諾沙	Canossa
加第斯	Gades	卡拉卡拉	Caracalla
加的斯	Cadiz	卡匹托来	Capitoline
加柏斯	Gabes	卡尼克	Carnic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布里斯多	Bristol
加薩尔	Cassal	布洛德斐斯	Broadfirth
加达尔几維	Guadalquivir	布腊	Blois
加里西亚	Galicla	布立加	Briga
加森基	Guthungi	布伦希德斯	Brunhildis
卡利尼克斯	Callinicus	布勒頓	Breton
卡皮	Carpi	布伦斯威克	Brunswick
卡尼鄂拉	Carniola	布魯日	Bruges
卡貝	Cambay	布伦	Boulogne
卡西諾	Cassino	布綽根	Buchogan
卡提林	Catiline	布罗溫斯	Provence
卡拉里斯	Caralis	布拉替安	Brutium
卡格利亚里	Cagliari	布勒替安	Brittium
卡息亚那斯	Cassianus	布勒塞尔	Bresal
卡息奥多拉	Cassiodorus	布魯特	Brutus
卡尔息斯	Chalcis	布尔日	Bourges
卡尔斯堡	Carlsburg	布林的西	Brindisi
卡伯林納斯	Capellanus	布尼克	Punic
卡紐特	Canute	布里昂	Brehon
卡帕多細亚	Cappadocian	布勒塔尼	Brittany
卡嫩敦	Carnuntum	布累根茨	Bregenz
卡魯滿德海岸	Coromandelcoast	布哈拉	Bokhara
卡麦尔	Carmel	布朗克福	Blanquefort
卡塞伊尔	Casseuil	布拉瓦	Brava
卡斯特兰	Castellane	布里奥茲	Briouze
卡司柏特	Cathbert	瓦塞特	Wasit

瓦伦斯	Valens	圣贞德	St Jean d'Acre
瓦德·特拉	Wad Dra	兰米尔斯柏	Rammelsberg
瓦内	Vanne	兰登	Landon
瓦兹河	Oise	兰普勒赫	Lamprecht
瓦特堡	Wartburg	兰哥巴第	Langobardium
瓦拉	Wala	兰恩	Ran
瓦斯特	Vaast	兰勒	Ramleh
瓦尔德伦	Waldalen	兰伯底阿	Lampadius
瓦伦丁尼安	Valentinian	兰·蒲尔	Lane-Poole
瓦勒里安	Valerian	弗雷德卡	Fredegar
瓦鲁	Varro	弗雷德良第	Fredegundis
瓦尔达耳河	Vardar	弗里茨拉尔	Fritzlar
瓦伦第诺波立斯	Valentinopolis	弗伦提纳	Frontinus
瓦雷	Valais	弗里加	Phrygia
瓦伦斯	Valence	弗洛拉斯	Florus
瓦拉弗里特	Walafrid	弗勒里	Fleury
瓦勒里	Valery	佛罗杜尔	Flodoard
瓦拉维尔	Varaville	弗赖堡	Freiburg
瓦利德	Walid	弗勒查斯	Frejus
瓦崙西恩	Valenciennes	弗累克塞纳特	Fraxinet
瓦那	Varna	弗雷泽	Frazer
瓦特福德	Waterford	弗利阿里	Friuli
瓦特尼斯	Waterness	弗卡斯	Phokas
瓦士	Wash	弗斯塔特	Fustat
瓦尔德·那布	Wald Nab	弗卡斯	phocas
瓦吉伦	Wargelan	弗洛登堡	Freudenberg
瓦伦人	Walloons	弗薩拉	Fussala
瓦雷契亚	Wallachia	弗日	Vosges
瓦牧	Worms	弗斯特尔	Fustel
圣泽門·得斯·普勒	St. Germain-des-	弗罗基	Floki
斯	Pres	弗尔达	Fulda
圣馬丁·得斯·香	St. Martin-des-	弗莱兴	Freising
	Champs	以弗所	Ephesus
圣泽門	St. Germain	以得撒	Edessa
圣大	Sanda	左賴曼	Zoleiman
圣大非	Santa Fe	本尼狄克丁	Benedictine
圣雅科波·达尔托	San Jocopo d'Alto-	本尼狄克	Benedict
帕沙	passo	本都	Pontus
圣哥特哈德	St. Gothard	本哈特	Berhard

本杰明	Benjamin
布奇杜伦	Bouches-du-Rhone
布文	Bouvines
布吉亚	Bouchier
布尔乔亚	Bourgeois
布賴斯	Bryce
布兰德斯	Brandes
布林的西	Brindisi
布兰奇	Blanche
汉撒同盟	Hanseatic League
汉志	Hedjaz
汉堡	Hamburg
他林敦	Tarentum
皮德蒙特	Piedmont
皮斯托雅	Pistoia
皮特阿斯	Pytheas
皮西底亚	Pisidia
皮特拉	Petra
皮特	Pitt
皮图	Pettau
皮克特人	Picts
皮阿扎	Piacenza
皮特里森	Pitres
宁发尔	Nimphal
台維斯特	Theveste
台斯河	Theiss
台伯河	Tiber
史梯芬	Stephen
外侵团	Vikings
北欧人	Norsemen
民登	Minden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乍德	Chad
卢加諾	Lugano
卢加	Lucca
卢加德	Lugard
卢察安	Luchane
卢奇塞	Lucchesi
卢普·得·菲利厄	Loup de Ferrieres

卢克馬尼埃	Luxmanier
卢索維姆	Luxovium
卢赛威尔	Luxeuil
卢易特普蓝	Liutprand
卢昂	Rouen
卢佛尔	Louvre
卢森堡	Luxemburg

六 划

伊·得·卡馬克	Ile de-Camar- que
伊馬德丁	Emadeddin
伊西多	Isidore
伊庇魯斯	Epirus
伊斯的里亚	Istria
伊斯塔克里	Istakhri
伊拉克	Irak
伊夫力基亚	Ifrikia
伊特拉斯坎	Etruscan
伊尔門湖	Ilmen lake
伊斯特拉第	Istradi
伊布林	Iblin
伊哥尔	Igor
伊思巴罕	Ispahan
伊柏林	Ibelin
伊德里西	Idrisi
伊鉄尔	Itil
伊甫里阿	Ivrea
伊塞尔河	Yssel
伊泊尔	Ypres
伊立斯波	Erispoe
伊勒斯堡	Eresburg
伊克哈德	Ekkehard
伊里	Ely
伊塞克	Ezsek
伊塞格	Ezseg
伊逊左河	Isonzo
伊里連	Illyrian

伊斯的里亚	Istria	亚勒索	Arezzo
伊特鲁立亚	Etruria	亚特拉斯	Atlas
伊梨里根	Illyricum	亚克兴	Actium
伊里诺斯州	Illinois	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伊斯库里亚	Iskuriah	亚诺尔德	Arnold
伊撒克	Isaac	亚浦利亚	Apulia
伊伯里安	Iberian	亚得里雅那堡	Adrianople
伊利里亚	Illyria	亚琪雷厄	Archelaus
亚密苏斯	Amisus	安极乐	Angelo
亚格·摩特	Aigues-Mortes	安提阿	Antioch
阿尔比教派	Albigensians	安提阿姆	Antium
亚斯	Aix	安科纳	Ancona
亚达诺	Adano	安敦·庇护	Antonius-pius
阿尔巴诺	Albano	安布洛兹	Ambrose
亚丁	Aden	安那格拉特	Anagrates = Anagray
亚特拉斯	Atlas	安东尼那	Antoninus
亚伯拉罕	Abraham	安密亚那斯	Ammianus
亚理士多德	Aristotle	安泰奥卡斯	Antiochus
亚美尼亚	Armenia	安东尼	Antony
阿尔萨斯	Alsace	安蒙	Ammon
亚实基伦	Ascalon(Askelon)	安达卢西亚	Andalusia
阿尔马	Armagh	安布立亚	Ambria
亚达	Adda	安吉尔	Alger
亚基拉	Aquila	安如	Anjou
亚平宁	Apenines	安泽芬	Angevin
亚述	Assyria	安德洛奈卡	Andronicos
亚速夫	Azof	安斯哥特	Ansgot
亚琛	Aachen	安科赖	Angouleme
亚俄斯塔	Aosta	安达曼	Andaman
亚列尔	Allier	安科尼坦人	Anconitans
亚尔	Aar	安吉尔伯特	Angilbert
亚得里瓦尔德	Adrevald	安斯卡	Anskar
亚达里克斯	Ardaricus	安得那赫	Andernach
亚贝威勒	Abbeville	安娜·康尼那	Anna Comnena
亚尔丁	Ardennes	安特卫普	Antwerp
亚威农	Avignon	安诺	Anno
亚浦利厄	Apuleius	安替-黎巴那	Anti-Libanus
亚诺比厄	Arnobius	伏德	Vaud
亚基列	Aquileia		

发兰琴	Varangian	米利都	Miletus
发尔赫稜	Walcheren	米尔森	Meersen
发尔多教派	Waldensians	米薩·阿尔·杜拉夫	Misar-al-Dolaf
西西里	Sicily	米斯理	Mithridates
西塞罗	Cicero	米丹	Medan
西姆馬朱斯	Symmachus	吉斯柏特	Gisbert
西加拉第	Cyclades	吉拉特	Girart
西提奥	Citeaux	吉巴林	Gibalin
西利亚	Coelia	吉伦特	Gironde
西里西亚	Cilicia	吉尔柏	Gilbert
西	Simeon	吉本	Gibbon
西徐斯	Scythis	吉比德	Gepid
西班牙	Hispania	吉美厄治	Jumieges
西頓	Sidon	吉拉尔德	Gerald
西薇士德	Sylvester	吉尔多	Gildo
西斯陀华	Sistova	托尔达	Thorda
西西尼那斯	Sicininus	托伦堡	Thoremburg
西斯特伦	Sisteron	托勒密	Ptolemy
西拉夫	Siraf	托利多	Toledo
西格夫里	Siegfried	托納斯	Taunus
西格河	Sieg	托魯斯	Taurus
多那特教派	Donatists	托力克	Tauric
多利安人	Dorian	托托薩	Tortosa
多米尼克派	Dominican	托厄尼	Toeni
多瑙河	Danube	朱未那尔	Juvenal
多哥伯特	Dogobert	朱密斯克斯	Tzimiskes
多斯加納	Tuscan	朱丽德	Juliet
多米提阿斯	Domitius	朱理雅	Julia
多米蒂安	Domitian	朱理安	Julian
多米尼谷	Domenicho	朱狄司	Judith
多非內	Dauphiny	朱理尔	Julier
多道夫	Dorndorf	朱拉	Jura
多瑙味特	Donauworth	色雷克斯	Thrax
多柏特	Dobbert	色雷斯	Thrace
多特蒙德	Dortmund	乔治亚	Georgia
米兰尼亚	Melania	乔治	George
米西亚	Moesia	毕加第	Picardy
米兰	Milan	毕尔比利斯	Bilbilis
米伦	Milne	毕尔巴鄂	Bilbao

华尔特	Walter
列塞默	Ricimer
列日	Liege
列斯堡	Lesbos
边恩	Bjorn
边谷	Bjorko
伏尔科夫	Volkhov
伏匹斯卡斯	Vopiscus
伏加斯提勃斯	Wogastiburg
优卑亚	Euboea
冰島	Iceland
考富曼	Kaufman
吉雷西阿斯	Gelasius
艾伯特	Albert
犹琴尼厄斯	Eugenius
朴茨默斯	Posthumus
乔济	Choisy
乔伊维尔	Joinville
休格	Hugh
因尼	Inn
刘特华	Liutward
扫桑普敦	Southampton
伦茨	Lenz
伦巴人	Lombard
伦巴第	Lombardy
伦涅堡	Luneburg
伟人阿郎	Alain Le Grand
伟恩	Vienne
芝诺	Zeno
芝加哥	Chicago
那塞里·库斯兰	Nasiri-Khusran
那息萨斯	Narcisus
那邦内细亚	Narbonensia
那泥	Narni
那巴	Narbo
那锡士	Narses
那尼亚	Narnia
那不勒斯	Naples
那普鲁斯	Napouse

那瓦	Navarre
那克索斯	Naxos
那旁	Narbonne
那布河	Nab

七 划

克勒卡	Kreka
克勒芒	Clermont
克罗特人	Croats
克劳第乌斯	Claudius
克立索斯吞	Chrysostom
克里尼派	Clunians
克里米亚	Crimea
克力奥	Clio
克洛维斯	Clovis
克朗马克诺厄	Clonmacnois
克拉尼	Cluny
克洛那德	Clonard
克劳曾堡	Klausenburg
克列斯马	Klysma
克尔海姆	Kehlheim
克利安得	Cleander
克力维奇	Krivichi
克里特	Crete
克旺都维克	Quantovic
克里摩拿	Cremona
克契	Kertch
克拉	Croix
克拉立斯基	Krariisky
克伦第亚人	Carinthians
克利奇	Clichy
克鲁太尔	Chlotair
克洛杜岡	Chrodogang
贝尔吉卡	Belgica
貝伦涅斯	Berenice
貝魯特	Beirut
貝督英	Bedouin
貝尔格莱德	Belgrade
貝尼温陀	Benevento

貝利撒留	Belisarius	麦森布里亚	Mesembria
貝基安塞斯	Beguensis	麦卡德	Murchadh
貝臧松	Besançon	麦琪	Magie
貝云	Bayonne	麦尔默第	Melmedy
貝卡	Birka	狄奥达特	Theodat
貝穆亚	Beziers	狄逊提斯	Dissentis
貝基奥	Birkio	狄頓霍芬	Diedenhefen
貝特尼薩	Bethnesa	狄茲那	Ditzina
貝尼溫敦	Beneventum	狄奥多罗	Theodoro
貝伦加	Berenger	狄麦特琉	Demetrius
貝加摩	Bergamo	狄西阿	Decian(Decius)
里摩黎克	Limerick	狄奥多理	Theodoric
里奎尔	Riquier	狄奥多西	Theodosius
里柏利	Ripuli	狄奥多西亚	Theodosia
里摩日	Limoges	狄奥多	Theodore
里发斯·阿尔特斯	Rivus Altus	伯諾尔德	Bernold
里阿尔托	Rialto	伯华德	Bernward
里維耶拉	Riviera	伯尔納德	Bernard
里細亚	Raetia	伯利恆	Bethlehem
里次尔	Laegaire	伯尔尼	Bern
里巴尼斯	Libanius	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us
里迈	Remi	达謝	Dacia
里普里安	Ripuarian	达馬薩	Damasus
里塞默	Ricimer	达克斯	Dux
里瓦	Riva	达米伊塔	Damietta
里曼	Le mans	达里厄尔	Dariel
里吉安	Rhegium	达夫	Duff
里昂	Lyons	达多	Dudo
麦提奥兰納斯	Mediolanus	达哥伯特	Dagobert
麦細亚	Mercia	达米尔尼斯	Dagmealness
麦利	Merri	达尔馬提亚	Dalmatia
麦列克·厄尔·阿	Malek-el-Adel	达馬亚特	Damyat
达尔		利普	Lippe
麦尔夫	Merv	利奥	Leo
麦則堡	Merseburg	利奥尔	Reole
麦尔克	Melk	利維亚	Livia
麦郎	Melun	利凡得	Levant
麦紐尔	Manuel	利奥維吉德	Leovigild
麦什特	Meshed	利比亚	Libya

利希脱	Richter	坎帕納	Campagna
利穆辛	Limousin	坎佩尼亚	Campania
利奥奈因	Leonine	坎塔布立亚	Cantabria
利古里亚	Liguria	伽图	Cato
希馬斯(巴尔干山)	Haemus	伽理略	Galerius
希罗多德	Herodotus	来巴哈	Laibach
希拉克略	Heraclius	来比錫	Leipzig
希力奥波力	Heliopolio	李亚	Lea
希拉波立	Hierapolis	努米底亚	Numidia
希伯伦	Hebron	努勒丁	Nureddin
沙特累因	Chartrain	启尔窝	Kilwa
沙巴	Charbar	廷巴克图	Timbuctoo
沙脱尔	Chartres	廷尼斯	Tinnis
沙立	Shari	汪达尔人	Vandal
沙塔	Shata	汪列尔	Wandrilie
杜森	Duchesne	伯斯塔特	Burstadt
杜力伊比	Dulyeby	但泽	Danzig
杜德拉	Tudela	犹提喀	Utica
杜易斯堡	Duisburg	彻尔尼谷夫	Chernigov
杜德尔斯塔德	Duderstadt	佐息馬斯	Zosimus
杜尔斯特德	Duurstede	佐哥	Giorgo
杜罗	Durrow	亨利·麵因	Henry maine
多米提阿斯	Domitius	邦尼非斯	Boniface
辛科維奇	Simkhovitch	沃姆斯	Wolms
辛尼加	Seneca	芒斯特	Munster
辛西格	Sinzig	阿提喀	Attica
辛布賴	Cimbri	阿塔內細阿	Athanasius
辛福林	Symphorien	阿利阿	Arius(Arian)
辛德巴德	Sindbad	阿那托力奧斯	Anatolios
君士坦查	Constantza	阿适	Arsheh
君士坦士	Constance	阿匹安	Appian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阿斯都里亚	Asturias
君士坦都	Constantius	阿波卡斯特	Arbogast
迈仙	Meissen	阿卡狄阿斯	Arcadius
迈罗	Milo	阿塞杜那	Asidona
迈奥斯·霍尔木斯	Myos·Hormus	阿那斯塔細亚	Anastasius
迈克尔	Michael	阿伦人	Alans
迈因哥尔德	Meingold	阿拉发特	Aravat
坎特布里	Canterbury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阿拉克賽	Araxes	阿拉德	Alard
阿拉美易卡	Aramaica	阿斯那帕	Asnapum
阿坡利那里	Apollinaris	阿尼安	Aniane
阿尔-奥芬	Alt-ofen	阿尔茲·苏·德赫	Aries sur-Tech
阿尔丁堡	Altenburg	阿尔琴	Alcuin
阿勒拉特	Arelate	阿波	Abbo
阿奎坦尼亚	Aquitania	阿哥巴	Agobard
阿卡莫因	Argamoyn	阿克太	Actard
阿姆尔·伊宾·厄	Amr-Ibn-el-	阿尔騰堡	Altenburg
尔·阿斯	As	阿达尔柏	Adalbert
阿根托拉敦	Argentoratum	阿斯脫拉罕	Astrakhan
阿文丁	Aventine	阿多夫	Adolph
阿特里亚	Atria	阿尔	Ahr
阿尔-穆哈利布	Al-Muhaleb	阿塔克薩塔	Artaxata
阿拉波那	Arrabona	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
阿耳凡索	Alfa-so	阿克苏謨	Axum
阿利振	Origen	阿尔匹安	Ulpian
阿基尔夫	Arculf	阿姆河	Oxus(Amu-Dar-
阿提那	Atina		ia)
阿尔·摩吉拉·伊	Al-mughira-ibn-	阿格利柯拉	Agricola
布·秀巴	shubah	阿敦里斯	Adonlis
阿勒曼尼克	Allemanic	阿利奥巴扎尼斯	Ariobarzanes
阿立奥維斯塔	Ariovis us	阿佛尔人	Avar
阿利根尼	Allegheny	阿馬斐	Amalfi
阿拉列	Alaric	阿哥远游队	Argonauts
阿布第拉	Abdera	阿斯科尔德	Askold
阿辛諾伊	Arsinoe	阿达巴尔	Ardabal
阿杜力斯	Adulis	阿尔·朱巴尔	Al-Jubal
阿索安	Assouan	阿瓦茲	Ahwaz
阿尔俾那	Albinus	阿密德	Amid
阿提拉	Attila	阿努尔	Arnoul
阿格利巴	Agrippa	阿拉斯	Arras
阿加狄亚	Arcadia	阿奎里亚	Aquileia
阿勒波	Aleppo	阿克奎	Acqui
阿尔卑斯山	Alpine	阿欣麦茲	Ahimaaz
阿柏哈特	Eberhard	阿布德·拉曼	Abd-er-Rahman
阿梭斯	Athos	阿杜尔	Adour
阿莫尼堡	Ambeneburg	阿波恩	Abbon
阿利斯	Arles		

波伦亚	Bologna	罗兰	Rolland
波力安族	Polyane	罗塞达	Rosetta
波洛夫茨	Polovtzy	罗提尔	Rowthiel
波未	Beauvais	罗尼河	Rhone
波美拉尼亚	Pomerania	罗斯托夫捷夫	Rostovtzeff
波波	Poppo	罗耳士	Lorsch
波旁	Bourbon	罗因河	Loing
波希蒙德	Bohemond	罗塞耳	Lothar
波那	Bona	罗尔瑟赫	Rohrschach
波斯特拉	Bostra	罗亚尔	Loire
波拉	Pola	罗得岛	Rhodes
波希米亚	Bohemia	帕马	Parma
波多西	Potosi	帕拉开昂	Palakaion
波斯尼亚	Bosnia	帕得鲍恩	Paderborn
波的亚	Boeotia	帕夫拉哥尼亚	Paphlagonia
波尔多	Bordeaux	帕特南	Putnam
波克亥姆	Bockelheim	帕雷狄阿斯	Palladius
波亚蒂尔	Poitiers	帕科密阿斯	Pachomius
波特芬	Poitevin	帕拉斯	Pallas
波恩	Bonn	帕特洛尼阿	Petronius
波亚图	Poitou	帕尔迈拉	Palmyra
波希米亚人	Bohemian	帕诺波立斯	Panopolis
波索	Boso	帕提亚人	Parthians
波河	Po	帕特洛克里斯	Patrocles
波里那斯	Paulinus	帕第克比姆	Pamticapaeum
波耳克利塔	Polgcleitus	帕提那克斯	Pertinax
波留	Beaulieu	帕拉泰因	Palatine
波厄尔德	Poehlde	帕诺马斯	Panormus
罗多尔弗斯	Rodolphus	法息斯	Phasia
罗尔	Leure	法加那	Farghana
罗哲尔	Roger	法马古斯塔	Famagusta
罗马纳	Romagna	法提马朝	Fatimite
罗得西亚	Rhodesia	法斯	Fars
罗灵逊	Rawlinson	法兰德斯	Flanders
罗斯托夫	Rostov	法兰西斯派	Franciscan
罗曼	Romans	法兰西岛	Ile-de-France
罗曼纳斯	Romanus	法拉米西	Faramish
罗多斯陀	Rodosto	法里西安	Frisian
罗地	Lodi	法里西亚	Frisia

法里斯兰	Friesland	孟勒本	Memleben
法尔康	Falcon	林肯郡	Lincolnshire
法拉特尼布	Flatneb	林尼	Lynn
法罗	Faroe	林斯德	Leister
法兰哥尼亚	Franconia	林哥尼斯	Lingones
法兰克福	Frankfurt	林斯馬尔	Linsmore
法雍	Fayum	图尔	Toul
易北河	Elbe	图拉真	Trajan
易宾·阿布德·哈坎	Ibn Abdel Hakon	图柏多	Thuburto
易宾·庫尔达巴	Ibn Khurdadabach	图尼	Turnu
易宾·卡尔頓	Ibn—Khaldun	底格拉尼	Tigranes
易宾·厄尔·阿提尔	Ibn el Athir	底比斯	Thebes
易格那提阿	Ignatius	坦納易斯	Tanais
易宾·科尔达柏	Ibn Khordabeh	坦尼	Taine
易宾·巴托塔	Ibn Batuta	坦納	Tanai
易斯巴斯克	Izborsk	坦涅特	Thanet
易宾·霍卡尔	Ibn Hawkal	的里亚斯特	Trieste
和闐	Khotan	的黎波里	Tripoli
非奥多西亚	Feodosyia	佩特拉斯	Patras
非基克	Figeac	佩拉	Pella
非拉得尔斐斯	Philadelphus	佩斯奇亚拉	Peschiera
佛卡塞	Vogasus	佩魯查	Perugia
佛亚	Foix	佩里雅斯拉夫尔	Pereyaslavl
佛来銘人	Flemings	岡城	Caen
佛罗伦薩	Florence	岡瑟	Gunther
佛尔克	Fulk	岡特雷姆	Guntram
佛吉尔	Virgil	岡曾霍逊	Gunzenhausen
佛吉力阿	Virgilius	奇微塔·維奇亚	Civita-Vecchia
帖木儿	Timurlane	奇尔	Chelle
帖撒利	Thessaly	杭廷頓	Huntington
帖撒罗尼加	Thessalonica	杭柏特	Humbert
帖奥度尔夫	Theodulf	松斯	Sens
彼特洛尼尔	Petronell	雨果	Hugo
奈斯波拉斯	Niceporus	彼尔利奥尼	Pierleone
奈法昂	Nymphaion	欧内斯特·雷南	Ernest Renan
孟都亚	Mantua	欧巴托里亚	Eupatoria
孟斐斯	Menphis	昆尼諾斯	Comnenos
孟加拉	Bengal	門的内哥罗	Montenegro
孟第維尔	Mandeville	岱雅那	Diana

杰腊德	Gerard
杰弗里	Geoffrey
杰罗姆	Jerome
迦薩	Gaza
卑尔根	Bergen
迪狄摩太春	Didymoteichon
弥德斐斯	Midfirth
欣克馬尔	Hincmar
庞培	Pompeii(Pompei- usl)

九 划

科伦	Cologne
科不林士	Cobenz
科琉麦拉	Columella
科兰巴	Columba
科替安·阿尔卑斯	Cottine Alps(Cot- tian Alps)
科伦西尔	Columelle
科斯洛厄茲	Chosroes
科林斯	Corinth
科索立那	Cosolina
科尔奇斯	Colchis
科普多斯	Coptos
科普特人	Copts
科西嘉	Corsica
科比	Corbie
科尼斯	Caunes
科米里	Cormery
科德柏克	Caudebec
科維	Corvey
科立	Kori
科馬杜斯	Comodus
科摩	Como
科兰班	Columban
科尔瓦提	Khorovaty
科馬奇奧	Comachio
科隆	Coron
科孚	Corfu

科德柏克	Caudebec
科德哥特	Caudecote
科利庫特	Calicut
科瓦尔	Kawar
哈尔斯塔	Hallstadt
哈茨山脉	Harz
哈德比	Haddeby
哈斯丁斯	Hastings
哈夫丹	Halfdan
哈夫勒	Harfleur
哈勒	Halie
哈托	Hatto
哈伯斯塔特	Halberstadt
哈尔斯大德	Halzstat
哈伦·阿尔·拉希德	Harun-ar-Ras- hid
哈德拉孟敦	Hadrumentum
哈赤	Hatch
哈德良	Hadrian
哈那克	Harnack
哈森堡	Hasenburg
哈汶斯坦因	Havenstein
哈夫尔斯峡湾	Hafrsfjord
哈罗德	Harold
哈馬丹	Hamadan
哈尔米洛斯	Halmyros
哈馬	Hamah
威斯巴登	Wiesbaden
威南塔斯	Venantus
威特金	Widukind
威特兰	Witlan
威尔	Werle
威特拉	Witla
威斯馬	Wismar
威堡	Viborg
威桑	Wissant
威尔士	Welsh
威尼西亚	Venetia
威森堡	Weissenburg

威拉·馬格那	Villa Magna	美多克	Medoc
威塞尔河	Weser	勃伦納山路	Brenner
威廉	William	勃兰登堡	Brandenburg
威力巴德	Willibald	勃艮第人	Burgundians
威尼斯	Venice	俄亥俄	Ohio
約翰·得·柏林	Jean-d'Ibelin	俄勒崗	Oregon
約瑟发特	Josaphat	俄特兰陀	Otranto
約但	Jordan	俄斯坦德	Ostend
約克	York	契尔得柏特	Childebert
約翰·得·馬里安	Jean-de-Maurienne	契尔柏立克	Chilperic
		契尔得立克	Childeric
約伯	Job	契維那	Chiavenne
約瑟福斯	Josephus	契索尼斯	Chersonese
約但尼斯	Jordnes	香宾—布里	Champagne-Brie
柏德勒	Bedr	香宾	Champagne
柏勒尼斯	Berenice	恩斯河	Enns
柏柏尔人	Berbers	恩斯堡	Ennsburg
柏立	Bury	恩諾狄阿斯	Ennodius
柏舍琉	Besalu	迦太基	Carthage
柏尼瓦尔	Berneval	保林	Paulin
柏嘉特	Burchard	保加尔人	Bulgars
柏坦	B rtin	律特柏夫	Ruteboeuf
柏基	Bergues	律伯克	Lubeck
柏格爾	Berger	英格尔亥姆	Ingelheim
柏吞	Burton	英克曼	Inkerman
查尼邱兰	Janiculum	英哥尔夫	Ingolf
查士丁尼	Justinian	英諾森	Innocent
查士丁	Justin	革拉苏	Crassus
查理曼	Charlemagne	革坡德	Gepids
查科拜教派	Jacobites	洛尔夫	Rolf
查克薩提	Jaxartes	洛塔列	Rothari
查斯克	Jask	洛林	Lorraine
美因河	Main	施奈德	schneider
美士谷	Mieszko	施勒尼	Cyrene
美拉	Malar	叙拉古	Syracuse
美哥	Mago	突尼斯	Tunis
美因斯	Meinz	昆斯坦斯	Constans
美黎达	Merida	南特	Nante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拜路·奧塞罗	Byelo Ozere

拜占廷	Byzantium
耶逊	Jason
耶路撒冷	Jerusalem
恆伯河	Humber
茲波斯	Tzibos
封特内	Fontenay
釐山	Mount Zion
柯尔曼	Kirman
柯托斯	Curthose
珀勒摩	Peremoum
珀茨	Pertz
珀琉細安	Pelusium
珀皮南	Perpignan
威海	Aral sea

十 划

馬格那	Magna
馬朱斯	Majus
馬脫那斯	Materius
馬克息馬斯	Maxmus
馬克森細阿	Maxentius
馬歇阿尔	Martial
馬賽	Marseilles
馬西利亚	Massilia
馬塞里納	Marcellinus
馬約林	Majorian
馬尔巴赫	Marbach
馬斯·拉特立	Mas Latrie
馬科曼族	Marcomanni
馬德尔	Martel
馬扎儿人	Magyars
馬拉松	Marathon
馬卡斯	Marcus
馬洛斯	Maros
馬利亚	Malea
馬格斯	Margus
馬庫第	Macoudi
馬哥波罗	Marco polo
馬索斯	Massouth

馬西利欧	Marsilio
馬克立西	Makkrissi
馬格里布	Magrib
馬伦教派	Maronites
馬塞拉斯	Marcellus
馬飞阿	Mafia
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馬拉特勒	Malaterra
馬塞坎那斯	Marsicanus
馬太	Matthew
馬加特	Margat
馬馬斯	Mamas
馬利	Mary
馬立諾	Marino
馬格基奧	Maggiore
馬西諾	Massino
馬拿西	Manasseh
馬德堡	Magdeburg
馬斯特立希	Maestricht
馬康	Macon
馬伦海	Marlenheim
馬拉巴	Malabar
馬克蘭	Makran
馬尔他人	Maltese
馬加多克索	Magadoxo
馬斯尔	Mussel
馬朱麻	Majuma
馬塞茲尔	Mascezel
馬拉加	Malaga
馬克	Mark
馬桑	Marcion
馬洛	Maro
特拉尼	Trani
特伦坎	Telemcan
特列茨	Trith
特魯伏尔	Truvor
特累伏伦	Trevorum
特里尔	Trier
特累甫	Treves

特普力茨	Teplitz	息烏特	Siut
特勒比遵德	Trebizonde	息尼細阿斯	Synesius
特拉比左斯	Trapezos	息維力斯	Civilis
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a	息多尼阿	Sidonius
特勒芬	Treffen	息尼厄斯	Sineus
特息丰	Ctesiphon	息立尔	Cyrl
特图良	Tertullian	息立	Scyri
特稜特	Trent	息米立亚	Cimmeria
特拉西那	Terracina	息德那斯	Sydnus
特拉斯特維尔	Trastevere	息泽柏特	Sigebert
特伦杰姆	Trondhjem	庫昔斯丹	Khuzistan
特德柏特	Theudebert	庫希斯坦	Kuhistan
特罗杜	Trudo	庫尔德族	Kurdish
特罗伊	Troyes	庫格勒	Kugler
特林斯	Trins	庫尔德人	Kurds
爱索立安	Isaurian	庫太巴	Kutaiba
爱奥尼亚海	Ionian Sea	庫发	Kufa
爱索立亚	Isauria	庫拉雅特	Kurayyat
爱斯图尔夫	Aistulf	庫尔敦	Coulton
爱达布	Aidab	庫斐克	Cufic(Kufic)
爱里尼阿斯	Irenaeus	庫尔兰	Kurland
爱提安人	Aeduan	庫曼人	Kumans
爱琴海	Aegean Sea	庫坦斯	Coutances
爱里尼	Irene	庫尔	Kur
爱特立厄斯	Etherias	庫波德	Kobad
爱德华	Edward	庫兰杰	Coulanges
爱科尼安	Iconium	格列高里	Gregory
爱丹普斯	Etampes	格累細亚	Gratian(Gratian- us)
爱因哈德	Einhard	格拉斯吞柏立	Gladstonbury
爱蒙	Aimon	格力斯坦	Gulistan
爱斐尔	Eifel	格罗内	Garonne
爱尔福特	Erfurt	格罗	Gero
息塞克	Szizek	格伯特	Gerbert
息太耶伏	Scitarjevo	格布哈	Gebhard
息普立安	Cyprian	格兰特	Grant
息里内易卡	Cyrenaica	格瓦达尔	Gwadur
息杰尔米薩	Sidjilmessa	格拉伯	Glaber
息斯脱西安	Cistercians	格陵兰	Greenland
息坎米諾斯	Sycaminos		

格洛那	Grona	哥尼留	Cornelius
格勒諾布尔	Grenoble	哥尔杜巴	Corduba
格里馬第	Grimaldi	哥尔多华	Cordova
索謨河	Somme	涅雅西斯提亚	Neyasystya
索拉克特	Soracte	涅拉	Nerra
索格狄亚那	Sogdiana	涅格勒滂	Negrepont
索左門	Sozomen	涅微伊	Nervii
索伦多	Sorrento	紐西亚	Nursia
索非亚	Sophia(Sofia)	紐伦堡	Nuremburg
索伦尼斯	Solemnis	紐弗勒特	Neauplette
索哥德拉	Sokotra	紐斯的里亚	Neustria
索发拉	Sofala	班諾尼亚	Pannonia
索尔比那	Thorburna	班哥	Bangor
索尔斯坦因	Thorstein	班堡	Bamberg
索尔	Thor	根特	Ghent
索尔德亚	Soldaia	根达拉	Gandhara
索瓦那	Sovana	埃匹非尼阿	Epiphanius
索斯特	Soest	埃塞尔烏德	Ethelwold
索来曼	Soleyman	埃尔-喀斯	El-kass
烏格罗-宾尼克	Ugro-Binnic	埃塞尔勒德	Ethelred
烏馬那	Humana	埃耳斯卢	Elsloo
烏得勒支	Utrecht	埃斯令根	Esslingen
烏尔斯特	Ulster	埃耳·馬第	El-Mahdi
烏耳赫尔	Urgel	埃耳·哈金	El-Hakim
烏尔班	Urban	埃耳·雅苏里	El-Yazuri
烏斐格孙	Ufeigson	埃耳·貝克里	El-Bekri
烏尔穆	Ulm	埃塔普尔	Etamples
烏拉赫	Urach	埃利安諾尔	Eleanor
烏斯特河	Oust	埃皮內	Epinay
烏尔立喜	Ulrich	埃耳柏茲	Elburz
哥連德	Corrientes	埃麦莪	Emesa
哥摩罗	Comoro	埃东	Edom
哥得弗立德	Godefrid	埃波罗	Ebro
哥拉森	Khorasan	埃田	Etienne
哥尔茲	Gorze	埃皮克提特	Epictetus
哥斯拉尔	Goslar	埃肯巴德	Erkembald
哥尔馬耳	Colmar	埃提阿斯	Aetius
哥特兰	Gothland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哥的克斯	Gothicus	埃西	Isis

高摩达	Commodus	第厄普	Dieppe
祖巴伊达	Zubaydah	第特馬	Thietmar
高卢	Gaul	基尔赛	Kiersey
热勒斯·得·拉·弗	Xerez de la Fro-	基耳得尔	Kildare
龙德拉	ntera	基輔	Kiev
热那亚	Genoa	基林	Geering
桑盖	Songhay	基云好人	Guillaume le Bon
泰晤士河	Thames	基柏特	Guibert
泰巴喀	Thabaca	基斯卡	Guiscard
浦尔契亚	Pulcheria	基恩	Guienne
修达	Ceula	基泰	Gaeta
閃族(塞姆族)	Semites	琉息安	Lucian
盎格鲁-薩克逊	Anglo-Saxon	琉息坦尼亚	Lusitania
哲佛	Gervais	琉卡尼亚	Lucania
秘魯	Peru	琉特法力德	Liutfrid
翁夫勒	Honfleur	琉比契	Liubech
朗格勒	Langres	康波斯提拉	Compostella
朗基多克	Languedoc	康瑪其尼	Commagene
倭丁神	Woden(Odin)	康諾得	Connaught
夏龙	Chalons	康拉德	Conrad
都納河	Duna	康边	Compiegne
都尔内	Tournai	康波斯特拉	Compostella
都柏林	Dublin	康华尔	Cornwall
都尔	Tours	勒尼尔	Renier
都兰斯	Durance	勒立克	Reric
都拉索	Durazzo	勒米	Remy

十一划

第聶斯德河	Dniester	勒敦	Redon
第勒尼安海	Tyrrhenian Sea	勒卡	Rakka
第聶伯河	Dnieper	勒佐	Reggio
第尔	Dill	勒吉斯	Regius
第奥塔魯斯	Deiotarus	勒赫	Lech
第阿罗得斯	Diarrhytus	勒恩	Rennes
第次	Dietz	俾巴斯	Bibars
第戎	Dijon	俾路支斯坦	Baluchistan
第尔廷安	Zeltinger	俾斯尼亚	Bithynia
第薩耳本	Desarborn	俾替卡	Baetica
第南特	Dinant	曼茲柏立	Malmesbury
		曼西克特	Manzikert
		曼苏拉	Mansourah

曼特斯图亚特	Mountstuart	鄂斯曼	Othman
曼麦琉克	Mamelukes	鄂图	Otto
曼夫勒德	Manfred	鄂斯人	Osmen
曼刹拉特	Manzalot	鄂多	Odo
海滨蒙特里伊尔	Montreuil-Sur-Mes	鄂多瓦	Odoacer(Odovacar)
海敦	Hayton	鄂图·西克	Otto Seeck
海伍德	Heywood	菲坎普	Fecamp
海派希亚	Hypatia	菲利波利	Philippolis
海基夫	Haguef	菲力柏特	Philibert
海耶	Hyerer	菲利波波利	Philippopolis
海洛尼馬斯	Hieronymus	莱茵河	Rhine
海厄拉	Hiera		
海德	Heyd		
符茨堡	Wurzburg		
符登堡	Wurtemberg		
理查	Richard		
理姆	Rheims		
得拉夫·撒夫	Drave save		
得比尔	Debil		
得拉瓦河	Drave		
累格纳	Legnago		
累根斯堡	Regensburg		
米勒	Miller		
莫三鼻给	Mozambique		
盖羽	Guy		
戚特魯克	Tschitluk		
梵蒂岡	Vatican		
培因斯	Bains		
梭恩	Saône		
崔格馬	Zeugma		
納塞安會	Nazianzan		
納苏斯	Naissus		
納穆提尔	Noirmoutier		
陶利斯	Tauris		
梯弗利斯	Tiflis		
梅喀陵堡	Mecklenburg		
梅斯	Metz		
鄂列伦	Oleron		
		斯特德	Stead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斯瓦比亚	Swabia
		斯特林加	Stellinga
		斯诺斐尔尼斯	Snowfelness
		斯普吕根	Splugen
		斯特累波	Strabo
		斯达維洛特	Stavelot
		斯图密	Sturmi
		斯瓦比亚人	Swabian
		斯路	Shuys
		斯拉窩尼亚	Slavonia
		斯达維洛特	Slavelet
		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斯坦因	Stein
		斯洛文人	Slovenes
		斯奎拉斯	Squillace
		斯多噶学派	Stoics
		斯帕拉托	Spalato
		斯特魯馬	Struma
		斯皮斯	Spes
		斯波戴陀	Spoleto
		斯图加特	Stuttgart
		斯底利哥	Stilicho
		斯克拉維尼斯	Sclavenes

十二划

斯提里特斯	Stylites	提奥多里塔斯	Theodoretus
斯摩稜斯克	Smolensk	提庇里亚	Tiberias
斯維雅多斯拉夫	Svyatoslav	提罗尔	Tyrol
斯坦波尔	Stamboul	提庇留	Tiberius
斯达布斯	Stubbs	提尼斯	Tinis
斯巴达	Sparta	提維尔茨	Tivertzy
斯德丁	Stettin	提尔	Tiel
斯拜尔	Speyer	提比里	Thibery
斯塔特堡	Stadtberge	提罗安尼	Therouanne
喀扎儿人	Khazars	提茲河	Tees
喀波那里	Carbonari	提斯諾	Ticino
喀姆布莱	Cambrai	喜拉尔	Hilaire
喀山	Kazan	喜尔得加德	Hildegard
喀他基那	Cartagena	喜尔杜因	Hilduin
喀罗林朝	Carolingian	喜尔得珊	Hildesheim
喀尔巴阡山	Carpathian	喜尔达	Hilda
喀拉布里亚	Calabria	喜尔得布兰	Hildebrandine
喀什葛尔	Kashgar	喜坡	Hippo
喀布尔	Kabul	喜斯特里亚	Histria
喀大尼亚	Catania	黑林	Schwarzwald
喀拉	Kalah	黑森	Hesse
喀拉科隴	Karakoram	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普勒孟斯特拉派	Premonstratensi- ans	斐立柏特	Philibert
普立息力安派	Priscillianists	斐西尔	Fisher
普拉克息特利	Praxiteles	斐拉腊	Ferrara
普林尼	Pliny	斐加那	Ferghana
普洛巴斯	Probus	斐贊	Fezzan
普力斯克斯	Priscus	斐林	Phelim
普里珀特	Pripet	雅洛斯拉夫	Yaroslav
普里穆斯	Plymouth	雅茲德	Yazd
普洛科匹阿	Procopius	雅庫比	Ya'Kubi
普丁格	Peutinger	雅利安	Aryan
普提奥利	Puteoli	雅穆斯	Yarmouth
普弗賴姆特	Pfreimt	腓力	Philip
普薩尔蒙第	Psalmondi	腓力伯特	Philibert
普非斐斯	Pfavers	腓尼基	Phoenician
提貝易德	Thebaid	腓利	Phile
提阿非罗	Theophilus	腓特烈	Frederick
		凱尔特	Celt

奥弗斯	Orpheus	奥特	Auth
奥赛阿	Osius	奥里腊克	Aurillac
奥赛烈司	Osiris	奥布	Aube
奥得	Oder	奥法	Offa
奥米耶	Ommeyad	奥麦	Omer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奥柏普法茨	Oberpfaez
奥斯特拉西亚	Austrasia	奥斯那布律克	Osnabrück
奥古斯都	Augustus	奥登瓦尔得	Odenwald
奥俾内	Aubigny	奥尔腾	Olten
奥科伦喀斯	Oxyrhyncus	奥理略	Aurelius
奥舍耳	Auxerre	奥利连	Aurelian
奥赛摩	Osimo	塞芬	Cevennes
奥格斯堡	Augsburg	塞提斯	Syrtes
奥林拜杜鲁斯	Olympiodorus	塞易斯	Sais
奥微亚托	Orvieto	塞斯坦	Seistan
奥得里克	Orderic	塞亚那	Siena
奥达尔	Oudalle	塞维立那	Severina
奥舍尔	Orcher	塞第卡	Serdica
奥伦治	Orange	塞拉匹	Serapeum
奥热	Ogier	塞维林	Severin
奥列格	Oleg	塞普替密斯	Septimius
奥伦梯河	Orontes	塞弗拉斯	Severus
奥伦	Oran	塞塔	Cirta
奥玛	Omar	塞琉细亚	Seleucia
奥纶河	Orne	塞拉皮斯	Serapis
奥拉	Aura	塞纳河	Seine
奥汾涅	Auvergne	塞维尔	Seville
奥杜卡斯特	Audoghast	塞普顿	Septem
奥索尼阿斯	Ausonius	塞兰克曼	Szlankamen
奥东	Autun	塞尔维亚人	Serbs
奥顿涅尔	O'Donnells	塞琉息兹	Seleucids
奥尼尔	O'Neils	塞普替默	Septimer
奥杜格尔多斯	O'Doughertos	塞普替美尼亚	Septimania
奥汉隆斯	O'Hanlous	塞列堡	Seleburg
奥古斯大	Augusta	塞巴洛	Cembalo
奥勃	Orbe	塞科	Cerco
奥克尼	Orkney	塞替斯	Syrtis
奥拉夫	Olaf	塞内加尔河	Senegal
奥德	Odd	塞尼山	Mont Cenis

塞汶	Severn	赫洛茨威撒	Hrotswitha
塞諾波斯	Seignobos	赫斯塔爾	Heristal(Herstal)
塞爾柱	Seljuk	赫芒達列	Hermunduri
雷拿德	Rainard	赫茹里	Heruli
雷因	Lane	赫斯珀立第	Hesperides
雷	Ray	赫勒斯滂	Hellespont
雷朗	Lerins	赫諾提康	Henotikon
雷苏	Lezoux	赫勒納	Helena
雷翁	Leon	赫爾馬茨	Hurmuz
雷普提斯	Leptis	赫拉特	Herat
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	赫爾文	Hulwan
新基德納姆	Singidunum	赫力阿斯	Helias
新辛納圖	Cincinnati	赫摩茲	Hurmuz
新普倫	Simplon	維希哥羅得	Vyshegorod
路求·阿夫立加那	Lucius Africanus	維罗那	Verona
路求·派索	Lucius Piso	維斯帕西安	Vespasian
路恩林根	Ruemlingen	維那西姆	Viminacium
瑟塞爾	Schesel	維塔利	Vitalis
瑟拉拉特	Sherarat	維里哈道	Villehardouin
瑟林吉亞	Thuringia	維密那西	Viminacium
頓尼爾	Donnel	維克多	Victor
歐拉茨	Shiraz	維遜肖	Vesontio
詹姆士	James	維尼德人	Veneds
瑞謨堡	Naumburg	維奇亞	Vecchia
藍伯特	Lambert	維發那	Vervaina
蒙特·卡西諾	Monte Cassino	維提奇夫	Vitichev
蒙特皮列	Montpellier	維格佛遜	Vigfusson
蒙托留	Montolieu	維斯比	Wisby
蒙斐拉	Montferrat	維特列·勒·弗朗斯	Vitry-le-Fran-
蒙巴薩	Mombasa	瓦	cois
蒙西諾爾	Monsignor	維吉尼亞	Virginia
蒙特	Monte	維特力阿斯	Vitellius
蓬真	Bondjer	維斯杜拉河	Vistula
		維多利亞	Vitoria
		福圖內塔斯	Fortunatus
		福斯	Fos
		福馬薩斯	Formosus
		福察姆	Forcheim
		福伊克斯	Foix

十四划

赫爾遜	Kherson
赫伊	Huy
赫斯斐爾德	Hersfeld
赫布里底群島	Hebrides

福斯塔特	Fostat
福細阿斯	Photius
福吉尔斯堡	Vogelsberg
瑪恩河	Marne
瑪納	Marnay
瑪摩拉海	Marmora
瑪喀比	Maccabees
瑪戴特人	Mardaites
瑪約里安	Majorian
瑪的尔达	Matilda
豪薩	Hausa
豪特維爾	Hauteville
豪兰	Hauran
魁罗阿	Quiloa
魁德林堡	Quedlinburg
魁迪	Quadi
盖塞立克	Gaiseric
慕尼黑	Munich

十五划

摩拉瓦	Morava
摩尔道	Moldau
摩里士	Maurice
摩塞耳河	Moselle
摩利亚	Morea
摩洛哥	Morocco
摩德拿	Modena
摩尔孟提	Molmenti
摩雷斯姆	Molesme
摩苏尔	Mosul
摩尔克	Molk
摩里得尼亚	Mauritania
摩敦	Modon
摩洛克	Moloch
摩勒斯	Maurus
摩尔	Maur
摩拉维亚人	Moravians
摩城	Meaux
德里納	Drina

德尔朋	Derbend
德維納	Dvina
德摩比利	Thermopylae
德拉倍泰	Therapeutai
德尔莫德	Dermod
德里佛斯	Treves
德文特	Dventer
德的摩尔	Detmold
德勒	Dreux
德里	Delhi
德兰索西阿那	Transoxiana
撒夫	Save
撒哈拉	Sahara
撒加利	Zachary
撒馬利亚	Samaria
撒地尼亚	Sardinia
撒狄卡	Sardica
撒摩撒达	Samosata
撒列諾	Salerno
撒馬尔罕	Samarkand
撒罗門	Salomon
墨累	Murray
墨洛温朝	Merovingians
墨士卡特	Muskat
墨西哥	Messina
魯吉兰	Rugiland
魯伯特	Rupert
魯佛斯	Rufus
魯息雍	Rouissillon
黎巴嫩	Lebanon
黎舍尔	Richer
黎契尔德	Richilde
潘提昂	Pantheon
察柏斯	Chappes
蕃那哥立亚	Phanagoria

十六划

諾米諾	Nomeroe
諾曼底	Normandy

諾夫哥羅得	Novgorod
諾德豪森	Nordhausen
諾干	Nordgan
諾森伯蘭	Northumberland
諾瓦拉	Novara
諾根特	Nogent
諾耳馬	Norma
諾立克	Noric(Noricum)
諾威巴薩	Novi-Bazar
諾拉	Nola
諾維細安	Novatian
諾立坎	Noricum
霍耳斯頓	Holstein
霍里奇	Horich
霍克海默	Hochheimer
霍恩	Horn
霍姆斯	Homs
霍耳狄奇	Holdich
霍比斯特斯	Hoeppeustus
霍勒斯	Horace
霍里亞	Horiea
霍姆加爾德	Holmgaard
霍治金	Hodgkin
霍亨士堡	Hohensyburg
霍密斯達	Hormisdus
霍亨斯陶芬	Hohenstaufen
霍挪留	Honorius
錫倍德	Shepherd
錫蘭	Ceylon
賴肯哈爾	Reichenhall
賴赫瑙	Reichnau
賴納赫	Reinach
穆斯喀特	Muskat
穆拉托里	Muratori
穆卡達塞	Mukaddasi
穆薩	Musa
鮑索里	Pozzuoli
鮑徹	Bouchier
鮑多	Bauto

鮑威爾	Powell
錢伯里	Chambery
錢馬維安人	Chamavian
薛西斯	Xerxes
澤耳	Zel

十七划

賽那	Sinai
賽伊尼	Syene
賽維立安	Syevryane
謝特蘭	Shetland
謝巴	Sheba
謝爾德河	Scheldt
戴奧斯邱里亞	Dioscurias
戴奧多拉斯	Diodorus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十八划

薩利安	Salian
薩羅尼卡	Salonika
薩米士基得斯達	Sarmizegetusta
薩克遜	Saxon
薩羅尼加	Salonika
薩巴	Saba
薩伏衣	Savoy
薩波拉特	Sabracte
薩薩尼朝	Sassanid
薩拉密斯	Salamis
薩卑尼那斯	Sabinianus
薩卑那姆	Sabinum
薩拉森人	Saracens
薩拉	Zara
薩爾維	Salvian
薩拉坎谷	Saracanco
薩來	Sarai
薩皮拉	Sapera
薩第	Sadi
薩拉哥撒	Saragossa
薩基塔	Sagetta

薩里	Sari	薩尔斯堡	Salzburg
薩浦尔	Sapor	薩特	Sarthe
薩利納	Salina	謬司河	Meuse
薩紐杜	Sanudo		十九划
薩拉丁	Saladin		
薩摩	Samo	瀾河	Lahn